



ISSN 3079-4552

eISSN 3079-4560

維普數據庫全文收錄

人文與社會科學學刊

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Humanities

Social Sciences



WISVORA



GotuTrack
國圖出版

ISSN 3079-4552



2026

第2卷第8期

8

編輯出版：廣東國圖出版管理有限公司

人文與社會科學學刊

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主辦 香港社會科學學術智庫有限公司
Wisvora Publishing

編輯出版 廣東國圖出版管理有限公司
《人文與社會科學學刊》編輯部
編輯部郵箱 xk@wisvora.com
投稿地址 gotu.wisvora.com



HONG KONG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THINK TANK LIMITED
香港社會科學學術智庫有限公司

總編輯 陳科存

副總編輯 梅見華 孫文傑

編輯委員會

李兆祺 林鑫 蘇天 穆艾偉 熊森浩

劉兆模 呂憬若 黃少安 劉宇 葉明裕

陳曦 景瑞亮 崔健 王正威 李澤宇

姚金芳 李明蔚 吳廷雙 穆海尚 曹一君

陳立立 舒波 袁臣輝 郝淑茹

版权声明

文章版權由文章作者所有，單篇文章由 Wisvora Publishing 正式出版，所刊載文章均依照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進行許可。根據該許可協議，任何第三方在明確署名原作者與出處的前提下，均可對本刊內容進行複製、傳播、演繹使用，無需作者及出版社另行個別授權。

《人文與社會科學學刊》依照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4.0 International 許可



Gotu Track

國圖出版

廣東國圖專注於數位學術出版基礎建設與學術服務創新，致力為全球科研工作提供專業、規範、高效的出版支援。公司透過建置數字期刊平台、孵化高水準學術期刊、提供國際出版服務，通過出版學術期刊、舉辦學術會議，推動學術界與社會各界的對話與合作。

www.wisvora.com gotu-track@wisvora.com



*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國際標準連續出版物號

印刷出版 ISSN 3079-4552

網上出版 ISSN 3079-4560

維普數據庫全文收錄

出版社: Wisvora Publishing
維思沃爾出版社

地址: 香港新界將軍澳景嶺街 99 號啟德
工業大廈 8 樓 D07
publisher@wisvora.com
www.wisvora.com

中國大陸編輯出版
廣東國圖出版管理有限公司

本刊依投稿原稿字體發行
不作繁簡互轉調整



WISVORA
Publishing



微信扫一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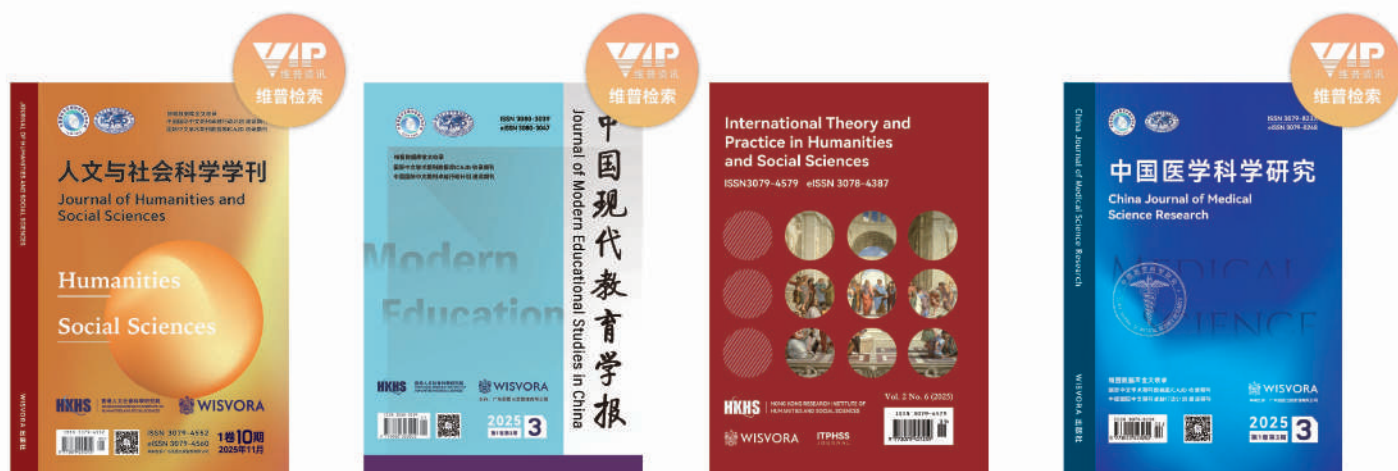
維思沃爾出版

学术无界，普惠可及

Scholarship Without Borders, Access Within Reach

 WISVORA

Gotu Track
国图出版



WISVORA是一家致力于促进创新和社会进步的国际学术出版商。我们相信，跨学科前沿研究对于理解世界和解决现实挑战至关重要。WISVORA出版社汇集了来自不同领域的专家、学者和实践者，致力于打破学科界限，将研究见解与实践经验相结合，为应对全球挑战提供深入的分析和有效的策略。

WISVORA 还致力于推动中文学术成果的全球传播，设立多个覆盖人文、社会科学、教育、管理、艺术等领域的中文学术期刊，为中文作者提供更便利、更高效、更专业的发表选择。我们重视学术原创性与表达自由，采用快速审稿、开放获取、普惠版面费机制，努力构建一个包容、多元、国际视野下的中文学术传播平台，助力更多优质中文研究走向世界、服务社会。

学术无界，普惠可及

Scholarship Without Borders, Access Within Reach

10+

我们目前已成功运营10余本学术期刊，涵盖人文、社科、管理、艺术、教育等多个领域

我们运营的期刊数量

400+

已有来自全球的300多位学者参与我们期刊的编辑、审稿与学术合作

我们的合作学者数量

10000+

我们的作者社群已超过3000人，汇聚青年学者、博士生与研究机构专家

我们的作者社群规模

www.wisvora.com
wisvora-publishing@wisvora.com



目 录 TABLE OF CONTENTS

经济与管理研究

论全民健康促进型地方立法的规范性质与实践困境 - 王晶晶.....1

新质生产力视域下 AI 技术赋能新电商产业发展的机制与路径研究 ——以杭州为例 - 刘思炜.....8

人工智能赋能人力资源管理研究综述： 理论框架、实践悖论与研究缺口 - 罗子敬..... 13

区域与发展研究

资源拼凑理论视角下大学生非遗文创创业机制研究——以佛山联和社区为例 - 鲍思烨、柳仪..... 22

安全共同体视阈下的上海合作组织研究 - 潘紫萱..... 28

基于黑龙江特色农产品电商 APP 设计 — 以 "龙田云市" 为例 - 刘雨菲、杜泽鑫..... 33

地区主义转向下欧盟对东盟的政策调试 - 李莹莹..... 38

健康老龄化背景下城乡老年人公共体育服务供需适配机制研究 - 石国帅、张思敏、雷静..... 43

从"通道经济"到"枢纽经济": 黑龙江省口岸经济转型的逻辑与路径 - 田丽、付洋、姜颖.....48

赫哲族文化元素在街津口旅游景观中的应用研究 - 王佳琪、于洋..... 53

教育理论与实践

数智化转型背景下"双师型"教师教学评价的重构路径 ——基于布迪厄场域理论的视角 - 张楚兰、阮春颜..... 59

新课标视域下统编版高中语文教材"学习提示"探究 ——以高中语文必修上下册为例 - 荀欣..... 64

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融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课的原则、路径和内容结合点 - 刘淑兰..... 71

生成式人工智能赋能中职财经商贸类课程学业评价的内在逻辑、场景风险与优化路径 - 贾瑜、谷笑笑..... 75

沉浸式科普视角下学龄前儿童天文 APP 设计研究 - 王惠、宋婷杰..... 82

医学研究生导学关系研究的演进、争议与未来展望 —— 兼论 "三维共生导学共同体" 的理论建构
李双洁、任海燕、吴斗艳、刘源、李梦泉..... 86

后人类时代教育冲突：技术真相下同步与异步的再审视 - 席宇哲..... 94

教师视角下孤独症儿童学前融合教育支持的现状与突破路径 - 孙立双、彭盈雪、刘小双.....100

新质生产力视域下深海装备人才培养体系研究 - 王芳、邱淑婷、颜东谊.....105

数字体育视域下我国体育硕士教育研究热点与前沿——基于 CiteSpace 的可视化分析 - 张象、贺莹	110
中职《单片机技术与应用》课程思政的实践探索 - 王高生	115
人工智能赋能高校教师教学发展的路径研究 - 查婷婷、白连汝	120
数字化背景下民办高校青年教师教学能力提升路径探析 - 白连汝、查婷婷	124
体质强健计划导向下县域小学体育家校共育现状研究与对策 - 朱禹、向浩荣	129
高职院校国际教育师资岗位能力清单构建路径研究 - 郇久阳、胡梦蝶、殷雨时	135
刺梨原汁干预对运动生理机能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 - 张新、甘婷	139

文化与艺术研究

VR 技术支持下宗教建筑沉浸式展示与用户体验研究 - 秦世骏、刁涵	145
言论、声望与行动之间的庆历士大夫——评王启玮《言以行道：庆历士大夫与北宋政治文化的转型》 读后 - 刘欣琛	149
贝叶斯确证理论中的"旧证据问题"及其当代辩护 - 王雅哲	152
以用户需求为基点的适老化产品包装设计与应用研究 - 董笑迎	158
论《桃花扇》柳、苏作结的人物安排和结构表达 - 吴苑陶	163
陕西红色体育文化的理论内涵、时代价值与内涵式发展路径 - 张卓、冯佳慧、唐勖、范耀元、 熊芮姝涵、梁静	168
"隐而不逸": 论明遗民从"外王"走向"内圣"的隐逸心理——以王夫之为例 - 方慧琳	173
师古·造化·我心——赖少其《黄山之雾》中的笔墨运用与精神还乡 - 刘雪风	179
文化转译视角下金上京历史博物馆铜镜纹饰文创设计研究 - 邬思文	185
格吕克《阿勒山》与《阿弗尔诺》中的反挽歌书写 - 江涵伟	189
罗马埃及行省治理与犹太人结构性困境 - 王佃玉、王丙宜	194
科学理性与道德想象：乔治·艾略特小说中的有机社会观 - 霍舒缓	200
《幽闲鼓吹》作者、版本考述及条目校勘 - 郝婷婷、梁仙缘	205
列宁妇女解放思想及其当代价值探析 - 任江东	211
《金阁寺》的废墟诗学与精神重构 - 魏美如	216
试论进步主义运动对美国水电开发的影响 - 金昱昊	220
产业补贴绩效评价机制的国际可解释性：规则压力、证据链构建与治理路径 - 黎银霞	225

论全民健康促进型地方立法的规范性质与实践困境

王晶晶

(苏州大学, 江苏 苏州 215031)

摘要: 地方健康促进立法是落实健康中国战略的重要制度载体。制度实践显示, 此类立法大量运用倡导性规范, 陷入法律责任模糊、激励机制虚化, 跨部门协同机制失灵, 公权力干预与个人健康自主的边界划定等困境。既有研究多局限于促进型立法的概念梳理, 未能解释柔性条款何以产生现实约束力。倡导性规范的实效依托法律对社会秩序的软性引导, 通过程序约束、配套激励与部门协同机制完善, 可以为地方健康立法完善提供制度方案。

关键词: 促进型立法; 健康权保障法治化; 程序约束; “活法”

DOI: doi.org/10.70693/202606302766

引言

经过多年的建设, 特别是历经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考验与推进, 我国已经形成了以宪法为根本依据, 以传染病防治、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为核心, 涵盖多个层级和领域的复合型公共卫生法治体系。²我国公共卫生法治正逐步从“被动防御”向“主动健康促进”转型, 健康促进型法律体系以《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为引领, 涵盖《精神卫生法》《母婴保健法》《职业病防治法》以及控烟、全民健身等相关法规。2026年1月1日正式施行的《杭州市全民健康促进条例》³是全国首部聚焦“全民健康促进”实现地方立法的规范。该条例共10章54条, 涵盖健康服务、健康保障、健康环境、健康生活、健康影响评估、健康产业、数智健康等内容, 其出台标志着我国健康促进立法从省级专项立法向市级综合立法延伸, 为全国健康城市建设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样本。河南、上海、四川、江苏等省市相继完成健康促进地方立法, 这些地方立法大量采用倡导性规范, 属于典型的促进型立法。与这一立法实践相呼应, 学术界围绕健康权的规范内涵、促进型立法的法理基础以及地方健康立法的实证分析展开了持续探讨。地方全民健康促进条例以保障公民健康权为核心宗旨, 涵盖了控烟、限酒、心理健康服务、健康信息采集、健身设施建设等多个领域, 体现了立法对公民健康福祉的积极关切。

埃里希(Eugen Ehrlich)的“活法”(living law)理论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资源——法律并非仅仅是国家制定的成文法条, 更是植根于社会群体内在秩序的“活法”。⁴健康促进立法的实效性, 恰恰取决于其能否有效识别、整合并引导社会生活中已然存在的健康惯习。与此同时, 卢曼(Niklas Luhmann)的系统论启示我们, 法律系统与健康生活世界的“结构耦合”(structural coupling), 构成了软法产生硬效果的深层机制。⁵

本文以地方全民健康促进条例为研究对象, 分析其规范特征、运作逻辑与实践困境, 试图回答: 健康促进立法的实效性来源于何处?“活法”如何入法? 国外健康权司法救济经验提供了哪些启示? 通过对这一问题的探讨, 本文希望从法理上为促进型立法的理解、适用提供新的视角, 并为地方健康立法的完善提供参考。

一、地方全民健康促进条例立法现状

我国地方健康促进立法尚处于起步探索阶段。由于“健康促进”概念具有广泛外延, 涉及控烟、全民健身、

作者简介: 王晶晶(2002—), 女, 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法学理论。

² 徐绪卿. 加强顶层设计坚定分类管理促进健康发展——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修订草案)(送审稿)》讨论的几点思考[J]. 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 2018, (09): 43-48.

³ 杭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杭州市全民健康促进条例[N]. 杭州日报, 2025-11-27(01).

⁴ [奥]尤金·埃里希:《法社会学原理》, 舒国滢译, 北京: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2009 年版。

⁵ [德]尼克拉斯·卢曼:《法律的自我复制及其限制》, 韩旭译, 载《北大法律评论》第2卷第2辑,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

精神卫生、中医药等领域的专项立法数量更为庞大（如全国绝大多数省份均已出台《爱国卫生条例》《全民健身条例》等），但此类立法不属于本文“地方健康促进条例”的研究范畴。以“健康促进”命名的综合性地方性法规数量有限，主要以设区的市地方性法规和自治县自治条例为主要立法层级。根据公开信息统计，整理目前全国范围内已出台或正在审议的、具有代表性的健康促进类地方性法规及条款情况如下：

表 1 部分地方性法规及条款情况表

序号	规范名称	健康促进类地方性法规及条款情况
1	《杭州市全民健康促进条例》	杭州市人大常委会，设区的市地方性法规，已通过，于 2026 年 1 月 1 日起正式施行。该条例在全国率先聚焦全生命周期体重管理与健康影响评估。
2	《上海市爱国卫生与健康促进条例》	上海市人大常委会，省级地方性法规，已施行（全面进入常态化贯彻落实阶段）。该法规取代了传统单一的条块立法，实现了爱国卫生与健康促进的体系效能整合。
3	《深圳经济特区健康条例》	深圳市人大常委会，经济特区法规，已施行，自 2021 年 1 月 1 日起实施。
4	《五峰土族自治县健康促进条例》	五峰土族自治县人大，自治条例，已施行，自 2024 年起实施。
5	《珠海经济特区健康促进条例（草案）》	珠海市人大常委会，经济特区法规，目前已列入立法规划并处于审议推进阶段。

随着地方健康促进立法的陆续出台，相关实证研究也逐渐增多。从宏观层面看，我国卫生健康法律规范体系日益完善。当下，专家指出，应统筹推进法律规范制度完善、依法行政、法治宣传教育等工作，为全面建成健康中国提供坚实法治保障。在健康影响评估制度这一具体领域，国家卫健委于 2014 年在全国健康促进县（区）建设中启动试点工作，积极探索公共政策的健康影响评估。宜昌、杭州、深圳、银川、威海等城市先后制定了健康影响评估制度或试点方案，杭州市还发布了国内首个《公共政策健康影响评估规范》地方标准。2025 年 5 月，湖北省宜昌市人民政府发布的《宜昌市健康影响评估暂行规定》是健康影响评估领域第一个专门性地方政府规章。⁶“民主、平等、可持续发展和合伦理的证据使用等健康影响评估立法的价值目标被确认为共识，评估程序至少包括筛选、界定范围、评估、报告和监测五个基本步骤。

当然，当前当前我国地方健康促进立法数据统计关于健康促进地方立法的文本统计与样本选择上，存在局限特此说明，这构成了本研究需要进行方法论补强的背景原因。

第一，立法草案公开机制的不透明性引致的统计非穷尽。部分省市人大常委会正在审议的健康促进立法草案、阶段性征求意见稿尚未公开全文，导致实证研究在捕捉动态立法样本时存在信息不对称，统计难以做到绝对穷尽。

第二，立法命名方式的多元异质性引致的统计口径泛化。各地立法实践中语词使用不一，部分法规虽未直接冠以“健康促进”之名，但其在实质内容与规范建构上大量涉及健康促进的积极给付责任（如传统的《爱国卫生条例》或专门的《控制吸烟条例》）。统计口径界定的宽严程度，直接影响了实证分析的数据完整性。

第三，战略推进的动态性与统计静态节点的时效张力。随着“健康中国”战略由政策动员向制度化法治化深水推进，预计未来五年将有更多城市和法域正式启动健康促进立法进程。本研究所依托的文本数据，仅代表截至 2026 年现阶段的阶段性立法存量状态，具有转型期法治研究特有的动态变化特质。

上述立法统计的局限性恰恰证明了，由于各地在以健康促进为名立法、标准设定以及给付内容上的模糊与不清晰（如上海、杭州与深圳的差异），更加凸显了单靠实体条文统计的无力。在标准和口径如此不一的背景下，如何通过程序性的健康影响评估机制与跨部门协调程序来规制地方行政机关的推诿与裁量，才是超越静态条文统计、建构整全性健康保障路径的法理关键。

二、健康促进进行法治化的实践困境

尽管健康促进立法在规范类型上呈现出日益丰富的制度形态，在理论层面建构了多层次的法律运作机制，但从目前的地方立法实践来看，相关规定的落实情况并不乐观。综观现有研究，学术界在健康权理论、促进型立法

⁶ 宜昌市人民政府：《宜昌市健康影响评估暂行规定》[R]。宜昌：宜昌市人民政府公报，2025：第 5 期。

法理以及地方健康立法实证分析等方面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健康权的复合性规范构造得到深入阐释,促进型立法的规范特征日益明晰,地方健康立法的实践探索也被初步纳入研究视野。

(一) 责任条款模糊与激励措施虚化

促进型立法作为与传统管理型立法相区别的法律类型,近年来受到学界的持续关注。李艳芳较早对促进型立法进行了系统研究,认为促进型立法主要应用于规模尚未形成或者基础薄弱、需要鼓励引导的领域,主要解决供给不足的问题,是一种前瞻性立法。这一研究奠定了促进型立法研究的基本框架。⁷

在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背景下,因应改革状态下中国式法治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需求,处于道德与法律交界处的“促进型立法”得以诞生与发展。从规范视角考察,促进型立法在规范效力上以倡导性规则为主,兼具弱强制性与强激励性;在权利义务安排上以授权性规则为主,兼具开放性与发展性。正是这些独特属性决定了该类立法的促进功能,主要表现为“刚柔相济”发挥法治的规范和德治的教化功能、“先行先试”形成目标导向并促进公众参与以及“精准滴灌”形成对重点领域突出问题的有效治理。在促进型立法的规范分析方面,有学者运用规范分析方法对我国促进型立法的体例结构、高频语词、规范要素进行了分析,指出促进型立法在体系结构、高频语词以及主体、内容、责任等方面与传统法律规范模式大有不同,对传统的法律规范结构提出了挑战。促进型立法应当严格遵守立法的合法性、必要性、现实性和可执行性原则,避免造成公共资源浪费,损害法律的权威。

健康促进立法的规范困境首先体现为责任条款的模糊性。对多部地方健康促进条例的文本分析显示,涉及政府职责的条款普遍存在有关部门、相关主管部门、相应部门等概括性表述。以《深圳经济特区健康条例》第四条为例,规定“市、区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健康工作的领导,将健康工作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建立健全健康工作协调机制”,但对于具体由哪个部门牵头协调、各部门的具体职责边界如何划分,条例未作明确规定。《五峰土家族自治县健康促进条例》第四条⁸规定“自治县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做好健康促进相关工作”,同样采用了“有关部门”的模糊指称。这种概括性规定在立法技术上固然有其灵活性考虑——便于适应政府机构调整、避免频繁修法,但在实施层面却可能导致实践中出现多头管理与无人负责并存的尴尬局面。当公民发现健康步道被占用、社区健康教育缺位、公共健身设施损坏时,往往不知道向哪个部门投诉、通过何种途径维权。责任条款的模糊性不仅削弱了立法的可操作性,也消解了公民监督的制度空间。

与责任条款模糊性相伴而生的是激励措施的普遍虚化。“对在健康促进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按照有关规定给予表彰和奖励”——类似条款在各地健康促进条例中反复出现,此类规范几乎成为条例的标准配置。然而,突出贡献的认定标准有待考察,表彰和奖励的具体形式与力度及负责部门也未明确。从法理角度审视,此类条款属于典型的法内倡导性规范,它们表达了立法者的价值取向和政策导向但缺乏完整的规范结构(行为模式+法律后果),难以产生直接的法律约束力。当激励性条款始终停留在原则层面,无法转化为可申请、可评审、可认定的具体制度时,其行为引导功能便大打折扣。原则性条款沦为宣示性条款,成为健康促进立法“软法困境”的典型表征。进一步分析,激励措施虚化的深层原因在于立法者对社会主体参与健康促进的制度激励需求认识不足。健康促进作为一项公共事务,需要政府、市场、社会多元主体的协同参与。社会组织、企业、个人参与健康促进的动力来源复杂多元,既有公益情怀,也有利益考量。单纯依靠表彰、奖励这类符号性表述,难以调动实质性的社会资源投入。从比较法视角观察,美国公共卫生立法中的激励措施往往与税收优惠、政府采购优先、特许经营等实质性利益挂钩,形成了更具操作性的激励制度体系。我国地方健康促进立法在激励措施的精细化设计方面仍有较大提升空间,需要从原则宣示走向细则配套,使激励性规范真正具备引导行为、调动资源的制度功能。

(二) 部门协同不足与基层执行乏力

健康促进立法的实践困境突出表现为部门协同机制的缺失。健康促进是一项典型的跨领域公共事务,涉及卫生健康、教育、体育、生态环境、城市规划、市场监管、民政等多个职能部门的职责范围。以中小学生心理健康促进为例,既需要教育部门落实学校心理健康课程与辅导服务,又需要卫生健康部门提供专业医疗资源与技术支持,还需要民政部门协同社区力量进行家庭支持,更涉及财政部门的经费保障。然而,对现有地方立法的考察表明,多数条例对部门协同缺乏明确有效的制度安排。《深圳经济特区健康条例》第六条规定“市、区卫生健康部门根据职责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健康深圳建设相关工作的统筹实施”,但统筹协调机制的组成方式、运行程序、决策效力等核心要素均未细化。实践中可能出现:卫健部门大力推行健康教育进校园,但学校因课时紧张、升学压力而消极配合;体育部门积极推进健身设施建设,但规划部门无法配套用地指标;市场监管部门实施健康警示标识检查,但基层执法力量严重不足。条块分割、部门壁垒、信息孤岛等问题,使健康促进的协同合力难以真正形

⁷ 李艳芳.“促进型立法”研究[J].法学评论,2005,(3):100-106.

⁸ 五峰土家族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五峰土家族自治县健康促进条例[N].三峡日报,2024-03-15(02).

成。部门协同困境的法理根源在于组织法缺失与程序法不足两大矛盾。拉伦茨强调,法律规范的完整实现需要组织规范与程序规范的配套支撑。实体规范规定了应当做什么,组织规范与程序规范则解决了由谁做、怎么做的问题。⁹地方健康促进立法普遍将重心放在实体规范层面,对组织保障与程序设计着墨不多。

基层执行乏力是健康促进立法的另一实践困境。许多条例将健康促进任务层层分解,要求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开展健康促进活动、组织健康教育、配备健康设施。但与此配套的人员编制、经费保障、专业培训往往未能同步落实。《五峰土家族自治县健康促进条例》第四条规定“乡(镇)人民政府协助做好本行政区域内的健康促进工作”,但对于乡镇一级如何协助组织、经费从何而来、人员如何配置等问题未作规定。基层干部在调研中坦言:“条例要求很多,但人手有限、经费有限,只能挑容易做的、能看得见的先做。有些要求根本无法落实,只能停留在文件上。”。

(三) 国家干预与个人自主的边界待厘定

健康促进立法面临一个根本性的价值张力:国家有权干预公民的生活方式吗?当法律倡导合理膳食、适量运动,当政府推行健康体重管理、健康行为干预时,其正当性边界究竟在哪里?¹⁰

健康权具有双重规范结构。作为社会权面向的健康权,要求国家积极作为,采取立法、行政、财政等措施,为公民健康权的实现创造制度条件与物质基础。健康权作为一切健康诉求的规范基础,构成健康中国制度化建设的基石性权利。学界对健康权的研究主要围绕其权利属性、规范构造和国家义务展开。在中国语境下,健康权呈现为一种公私复合、消极属性与积极属性交融的综合性权利。张帅宇从宪法教义学角度进一步分析,认为健康权在防御权功能面向指向“风险—危险—侵扰”为递进阶段的生理损害和内心痛苦,在受益权功能面向则以宪法上的最低保护水平为实现要求,通过国家履行最低医疗卫生照顾义务和基本健康促进义务来界定健康权的积极获益内容。¹¹在健康权的法治保障路径上,学者们形成了较为系统的认识。武亦文与王和民提出,我国语境下的“健康促进”应解释为健康权的完整实现,其实现进路应运用“健康融入万策”框架。该框架应当包含政策论证制定机制、跨部门合作机制、健康审查机制和健康报告机制四大部分。¹²温世扬、刘景琪则从私法角度探讨了健康权的规范供给问题,指出《民法典》及相关司法解释虽推动了健康权保护规范的更新,但因规范的笼统性存在权利边界不清晰、权能构造未臻完善、行为规范与救济路径供给不足等问题。¹³关于健康权的私权边界,温世扬等学者认为,健康权与身体权的区分关键在于人身侵权行为是否造成人体组织器官的结构破坏或功能障碍。健康权人对健康利益不享有支配权。联合国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委员会联合世界卫生组织在《第14号一般性意见》中明确指出,国家负有“尊重、保护、落实”健康权的三层义务——尊重义务要求国家不得干预个人健康自主,保护义务要求国家防范第三方健康风险,落实义务要求国家积极提供健康服务。健康促进立法正是国家履行健康权保护义务与落实义务的重要制度载体。¹⁴然而,作为自由权面向的健康选择,同样要求国家尊重个人自主——个体有权选择不健康的生活方式,有权拒绝国家对其行为的干预与引导。当健康倡导走向健康规训,当建议异化为要求,当柔性引导异化为隐性强制,就可能逾越国家干预的正当边界,侵害公民的自主选择权。

这一张力在健康促进立法实践中呈现出多种具体形态。信息性措施中的健康警示标识,看似仅提供信息而不强制行为,但其背后的行为心理学预设是“通过信息引导改变行为偏好”。当强制信息披露要求过于严苛,可能导致经营者被贴上“不健康”标签,实质影响其商业利益——这便产生了健康信息规制与营业自由的冲突。激励性措施中的税收优惠与财政补贴,看似仅提供激励而不进行强制,但当激励机制形成“健康行为受益、不健康行为受损”的制度环境时,实质产生了行为引导的强制效果。法律家长主义主张国家有权在一定条件下干预个人行为,以保护个人免受自身不明智选择的伤害。弱家长主义允许对信息不对称、认知能力受限的行为进行干预;强家长主义则主张国家有权对成年人完全自主的、但被视为“不理性”的选择进行干预。健康促进立法中的控烟规定、限酒措施、含糖饮料禁令,在不同程度上都带有家长主义色彩。如何在保障公共健康与尊重个人自主之间寻求平衡,既是健康促进立法的价值难题,也是检验法治国家正当性边界的试金石。美国公共卫生法学界提出的“跨

⁹ [德]卡尔·拉伦茨:《法学方法论》,黄家镇译,商务印书馆2020年版。

¹⁰ 田蒙蒙.“健康中国”的法理内涵及实现路径[J].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26,41(2):37-51.

¹¹ 张帅宇.论宪法健康权的保护范围[J].人权,2025,(2):123-145.

¹² 武亦文,王和民.论健康促进实现的法治保障——以“健康融入万策”框架为基础[J].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77(2):159-170.

¹³ 温世扬,刘景琪.健康权的私法内涵与规范供给[J].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25,33(2):130-145.

¹⁴ UN COMMITTEE ON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 General Comment No. 14: The right to the highest attainable standard of health (Art. 12)[R]. Geneva: United Nations, 2000: paragraphs 33-37.

学科方法”强调，健康干预应当遵循“证据本位”¹⁵。只有当干预措施具有充分的科学依据、能够切实改善公共健康时，其对个人自由的限制才可能具有正当性。这一思路为我国健康促进立法的价值权衡提供了有益参照。

综上所述，规范层面的模糊与虚化削弱了立法的可操作性，实践层面的协同不足与执行乏力制约了规范的实效性，价值层面的张力则提出了更深层次的正当性质疑。

三、地方健康促进立法的完善进路

基于上述规范类型分析与实践困境诊断，地方全民健康促进条例的完善应当聚焦“实效性”这一核心问题，在充分尊重软法特性的前提下，寻求增强规范效力的制度路径。健康促进立法的根本目标不是建立一套严密的法律强制体系，而是通过多样化的规范类型，有效引导社会行为、保障公民健康权。因此，应当在尊重健康促进立法基本属性的基础上，通过制度设计的精细化与程序保障的完备化，推动立法从政策宣示走向规范治理。

（一）明确政府责任，强化程序约束

破解责任条款模糊性的关键，不在于简单地将“有关部门”替换为具体部门名称，那样反而可能导致立法因机构调整而过时，而在于通过程序性规定强化责任的确定性与可监督性。程序约束是软法发挥效力的核心机制。具体而言，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完善制度设计：其一，建立部门职责清单制度，授权政府在条例实施后一定期限内（如六个月）编制并公布健康促进部门职责清单，明确牵头部门、配合部门及其具体职责，使“有关部门”的模糊指称在实施层面得以具体化。《深圳经济特区健康条例》第六条规定的“健康工作协调机制”¹⁶可以进一步细化为职责清单编制与动态调整机制，将抽象的协同要求转化为可操作的职责划分。其二，规定履职时限与报告制度，要求有关部门定期向本级人民政府或人大常委会报告健康促进职责履行情况，将履职进展纳入绩效考核体系。《杭州市全民健康促进条例》可借鉴预算公开、环保督察等领域的制度经验，建立健康促进年度报告制度，使政府履职情况可查询、可监督。其三，设置公众监督渠道，建立健康促进投诉举报平台，明确投诉处理时限与反馈程序，使公民在发现健康步道被占用、健康教育缺位时，能够找到明确的投诉对象与救济途径。程序性约束的核心逻辑在于：通过透明化、可问责的程序设计，将“应当”的要求转化为可操作、可监督的制度安排，使政府责任从抽象规范走向具体实践。以日本为例，日本在健康促进立法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日本健康立法的显著特点是体系完善、分类精细。日本制定了《健康增进法》《母子保健法》《职业卫生法》等一系列专门法律，实现了对不同人群健康权益的全覆盖保护。每类人群都有相应的法律可依、有标准可参照。在具体制度层面，日本《健康增进法》整合了此前分散在《食品卫生法》《营养改善法》等法律中的相关规定，形成了统一的健康促进法律框架。该法规定了健康检查、保健指导、特定保健指导等制度，并以法律形式明确了国家和地方公共团体、医疗保险人、企业、国民等多元主体在健康促进中的责任义务。

程序约束的强化还需要与法律责任的明确相衔接。对于禁止性措施，应当保持罚则的明确性与可操作性；对于服务性措施，虽然不宜直接设置罚则，但可以引入行政问责、绩效考核、公众评议等软性约束机制。法律责任不仅包括制裁性责任，也包括监督性责任、说明性责任、补救性责任。健康促进立法的完善，应当根据不同类型规范的特征，配置多元化的责任形式，使责任条款真正发挥约束功能。

（二）细化激励机制，增强可操作性

激励措施要产生实效，必须从原则走向细则。从美国公共卫生立法的经验来看，有效的激励机制通常具备三个特征：激励标准明确、激励方式具体、激励程序公开。我国地方健康促进立法的完善，应当借鉴这一经验，在条例出台后及时配套《健康促进激励实施办法》等规范性文件，对激励机制的运行作出系统规定。

具体而言，细化激励机制需要解决三个核心问题：第一，激励对象的具体化。“突出贡献”作为不确定法律概念，需要通过类型化思维加以具体化。可以借鉴拉伦茨的类型化方法，建构“突出贡献”的典型示例类型——例如，长期参与健康促进志愿服务的个人、在健康社区建设中成效显著的单位、研发健康促进创新产品的企业等。对每一类型设置可操作的认定指标，使“突出贡献”从抽象概念转化为可衡量、可比较的实践类型。第二，激励方式的明确化。“表彰和奖励”的具体形式应当予以明确——表彰是何种层级（县级、市级、省级）？奖励是精神奖励还是物质奖励？物质奖励的金额标准如何确定？税收优惠、政府采购优先等实质性激励措施如何与表彰制度衔接？这些问题的明确，直接关系到激励措施能否真正调动社会主体参与的积极性。第三，激励程序的规范化。激励措施的授予应当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程序要求，包括申报渠道的公开、评审标准的透明、评审过程的规

¹⁵ William Onzivu, 'Mind that Gap: International Climate Law, Health Protection and the United Kingdom's Climate Legislation', (2012), 21, European Energy and Environmental Law Review, Issue 2, pp. 79-91.

¹⁶ 深圳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深圳经济特区健康条例[M]. 深圳: 深圳报业集团出版社, 2021: 1-12.

范、评审结果的公示。程序性的规定既保障了激励措施的公信力，也防止了激励过程中的权力滥用与利益输送。

值得强调的是，激励措施的细化还应当与健康促进的类型谱系相衔接。对于不同类型的健康促进参与行为，可以配置差异化的激励方式：对于长期性、持续性的参与行为，可以授予荣誉称号并给予定期奖励；对于创新性、引领性的项目成果，可以给予专项资助或政策支持；对于偶发性、临时性的志愿服务，可以通过积分兑换、实物奖励等方式予以即时激励。通过激励方式的差异化设计，形成覆盖多元参与形式的完整激励体系。

（三）构建协同机制，整合治理资源

健康促进作为系统工程，需要多部门协同发力、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破解部门协同困境，需要在地方立法中建立制度化的协同机制，将分散的治理资源整合为健康促进的合力。

具体而言，协同机制的构建应当包括以下核心要素：第一，建立健康促进联席会议制度。在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层面设立健康促进联席会议，由分管卫生健康工作的领导担任召集人，卫健、教育、体育、环境、规划、财政、市场监管等相关部门为成员单位。联席会议负责统筹协调健康促进重大事项、审议健康促进规划计划、研究解决跨部门难点问题、督促检查各部门履职情况。第二，编制部门职责清单。在条例中明确授权联席会议制定并公布健康促进部门职责清单，将条例中“有关部门”的模糊表述转化为具体部门的职责条目。职责清单应当动态调整，定期更新，确保与政府机构改革相适应。第三，设置信息共享机制。建立健康促进信息平台，整合各部门的健康数据、项目信息、服务资源，实现信息互通、资源共享。信息共享机制不仅是协同治理的技术支撑，也是破除部门壁垒、形成工作合力的制度基础。第四，纳入政府绩效考核。将健康促进职责履行情况纳入政府绩效考核体系，设置科学合理的考核指标，使协同履职从软性要求转变为硬性约束。德国2015年通过的《加强健康促进与预防法》（以下简称《预防法》），被誉为德国健康政策的里程碑。该法的核心目标是加强“生活世界”（Lebenswelt）中的健康促进，促进社会保障机构与各级政府之间的合作，将健康促进理念持久、可持续地嵌入相关机构的结构和理念之中。¹⁷而如何实现从临时性政策激励向常态化结构锚定的平稳过渡，是现代公法学面临的共同难题。Dietrich和Schmidt对德国《预防法》实施效果的实证研究表明，由于该法将生活世界中的健康促进过度寄托于法定医疗保险机构有时限的项目化资助，最长周期为5年，导致大量高教机构在资助期满后因缺乏常态化的财政承接机制，使得健康促进重新退化为个别研究者的私人努力或偶发性捐赠，未能真正嵌入机构的组织结构之中。¹⁸这揭示了政策驱动型给付在面对刚性体制时的事实不确定性。健康促进工作仍然依赖个别研究者的个人努力或捐赠者的支持。针对这一组织法上的结构缺陷，德语区国家展现了不同的制度分野。Lückenbach等学者的比较研究进一步指出，德国模式过于依赖医疗保险机构的法团式主体地位；而瑞士与奥地利则通过更为整全的组织技术来冲抵属地主义的割裂。瑞士借由各州自治与联邦健康促进基金会的协同，实现了流动的属地化覆盖；奥地利则通过设立联邦全资的“健康奥地利有限公司”强化了中央维度的统筹与协调机能。研究还区分了健康促进立法的规范性正当化模式和功能性正当化模式（即“社会投资”策略），发现与社会投资相关的论证在三国立法讨论中日益增多，而规范性正当化的作用逐渐减弱。¹⁹协同机制的构建实质上是将健康促进从分散的部门事务整合为统一的政府职能。这一整合过程需要相应的组织载体与程序保障，使联席会议提供组织平台，职责清单明确职能分工，信息共享打破部门壁垒，绩效考核强化责任约束。四者相互配合，共同构成健康促进协同治理的制度框架。

结论

健康促进立法的发展，既是“健康中国”战略法治化的制度实践，也是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体现。唯有尊重法律系统的自主运作逻辑，同时保持对健康生活世界的开放性与回应性，地方健康促进立法才能真正承担起保障公民健康权、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的历史使命。健康促进立法的终极目标，不是用法律管住人，而是用文化浸润人。当健康成为社会风尚，当健康行为获得社会认同，当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生活，法律就无须强制，行为自会发生。健康促进立法的最高境界，是“法立而不用”——法律条文存在，却因社会成员普遍遵守而极少动用强制。实现这一境界，需要健康促进立法与文化培育相结合。综上所述，健康促进立法的完善应当坚持“软硬相济”的治理思路：硬的一面，通过程序约束明确政府责任、通过细则配套增强激励实效、通过协同机制整合治理资源；软的一面，通过文化培育引导社会风尚、通过观念转变实现行为自觉。软硬之间不是对立关系，而是相互支撑、相互促进的关系——硬约束为软引导提供制度保障，软引导为硬约束奠定社会基础。唯有如此，地方健

¹⁷ 王祖书. 法官受制定法约束的理论谱系及其评价——基于德国法学方法论视角的考察[J]. 北方法学, 2014, 8(01): 123-131.

¹⁸ DIETRICH M, SCHMIDT S. Gesundheitsförderung an Hochschulen unter dem PräVG: Nachhaltigkeit und strukturelle Verankerung nach Ablauf der Projektförderung[J]. Das Gesundheitswesen, 2022, 84(08): 712-720.

¹⁹ LÜCKENBACH C, MÜLLER O, WEBER A, et al. Vergleich der Organisationsstrukturen der Gesundheitsförderung und Prävention in Deutschland, Österreich und der Schweiz[J]. Zeitschrift für Evidenz, Fortbildung und Qualität im Gesundheitswesen, 2024, 118: 45-56.

康促进立法才能真正从“纸面上的法”走向“行动中的法”，从政策宣示走向规范治理，为“健康中国”战略提供坚实的法治支撑。

参考文献

- [1] 徐绪卿.加强顶层设计坚定分类管理促进健康发展——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修订草案)(送审稿)》讨论的几点思考[J].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18,(09):43-48.
- [2] [奥]尤金·埃里希:《法社会学原理》,舒国滢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2009 年版。
- [3] [德]尼克拉斯·卢曼:《法律自我复制及其限制》,韩旭译,载《北大法律评论》第 2 卷第 2 辑,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
- [4] 李艳芳.“促进型立法”研究[J].法学评论,2005,(3):100-106.
- [5] [德]卡尔·拉伦茨:《法学方法论》,黄家镇译,商务印书馆 2020 年版。
- [6] 田蒙蒙.“健康中国”的法理内涵及实现路径[J].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26,41(2):37-51.
- [7] 张帅宇.论宪法健康权的保护范围[J].人权,2025,(2):123-145.
- [8] 武亦文,王和民.论健康促进实现的法治保障——以“健康融入万策”框架为基础[J].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77(2):159-170.
- [9] 温世扬,刘景琪.健康权的私法内涵与规范供给[J].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25,33(2):130-145.
- [10] 王祖书.法官受制定法约束的理论谱系及其评价——基于德国法学方法论视角的考察[J].北方法学,2014,8(01):123-131.
- [11] DIETRICH M, SCHMIDT S. Gesundheitsförderung an Hochschulen unter dem PräVG: Nachhaltigkeit und strukturelle Verankerung nach Ablauf der Projektförderung[J]. Das Gesundheitswesen, 2022, 84(08): 712-720.
- [12] LÜCKENBACH C, MÜLLER O, WEBER A, et al. Vergleich der Organisationsstrukturen der Gesundheitsförderung und Prävention in Deutschland, Österreich und der Schweiz[J]. Zeitschrift für Evidenz, Fortbildung und Qualität im Gesundheitswesen, 2024, 118: 45-56.
- [13] UN COMMITTEE ON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 General Comment No. 14: The right to the highest attainable standard of health (Art. 12)[R]. Geneva: United Nations, 2000: paragraphs 33-37.
- [14] William Onzivu, 'Mind that Gap: International Climate Law, Health Protection and the United Kingdom's Climate Legislation', (2012), 21, European Energy and Environmental Law Review, Issue 2, pp. 79-91.

On the Normative Nature and Practical Challenges of Comprehensive Health

Promotion Local Legislation

Wang Jingjing

(Soochow University, Suzhou, Jiangsu, China)

Abstract: Local health promotion legislation serves as a crucial institutional vehicle for implementing the Healthy China strategy. Institutional practice reveals that such legislation extensively employs aspirational norms, leading to challenges including ambiguous legal liabilities, weakened incentive mechanisms, dysfunctional interdepartmental coordination, and unclear boundaries between public authority intervention and individual health autonomy. Existing research has largely focused on conceptual clarification of promotional legislation, failing to explain how soft provisions generate real-world enforceability. The effectiveness of aspirational norms relies on law's soft guidance of social order; through procedural constraints, complementary incentives, and improved interagency collaboration mechanisms, institutional solutions can be developed to enhance local health legislation.

Keywords: Promotional legislation; Legalization of health rights protection; Procedural constraints; "Living law"

新质生产力视域下 AI 技术赋能新电商产业发展的 机制与路径研究——以杭州为例

刘思炜

(浙江金融职业学院 电子商务与新消费研究院、杭州新电商发展研究基地, 浙江 杭州 310000)

摘要: 在新质生产力理论视角下, 本文探讨了 AI 技术赋能新电商产业发展的内在机制与实践路径, 并以杭州为例展开实证分析。研究构建了“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三要素赋能模型, 揭示 AI 技术通过智能工具嵌入、人机协同深化与数据要素驱动, 系统性推动新电商向高效能、高质量跃迁。杭州企业的实践表明, AI 技术已在全链路智能、内容场域再造与基础设施赋能等方面形成典型路径。最后, 提出“技术筑基—人才引领—生态协同—治理护航”的系统性发展建议, 为区域产业智能化升级提供参考。

关键词: 新质生产力; AI 技术; 新电商; 赋能机制

基金项目: 杭州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成果 (课题编号: 25JD029)、杭州新电商发展研究基地项目资助

DOI: doi.org/10.70693/202607063026

引言

当前, 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正驱动产业变革, 成为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动力。在此背景下, 新电商作为数字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业态正经历 AI 技术赋能的深刻重构。然而, 现有研究多聚焦具体应用, 缺乏从新质生产力理论出发系统阐释其内在机理与路径。本文基于“机制—路径—实证”分析框架, 以杭州典型企业为例, 探讨 AI 如何通过重塑劳动者、劳动资料与劳动对象, 推动新电商向新质生产力跃迁, 旨在为区域产业智能化升级提供理论与实践参考。

一、新质生产力与 AI 赋能的逻辑关联

系统剖析 AI 技术如何赋能新电商产业发展, 首先需要构建以新质生产力核心内涵为理论基点的分析框架, 将 AI 技术作为关键性劳动资料, 结合新电商产业的实践, 揭示其内在的赋能机理。

1.1 新质生产力的三要素与 AI 技术的定位

新质生产力是以创新起主导作用, 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 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 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遵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经典分析范式, 其核心构成可解构为三大要素: 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杜传忠等 (2023) 从新质生产力的内涵与特征入手, 从“生产要素—组织形态—产业体系—技术创新”四个维度揭示新质生产力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机制。

本文将 AI 技术明确界定为关键性、引领性的劳动资料。它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工具, 而是能够自主学习和优化、深度渗透并重塑其他生产要素的“劳动资料乘数”。它通过算法、算力和数据, 为劳动者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智能工具, 同时极大地拓展和深化了劳动对象的范围与层次, 驱动新质生产力的形成。

1.2 新电商产业作为 AI 技术赋能新质生产力的典型场域

新电商的本质是数据驱动的业态, 从用户画像、商品信息到交易流程均已高度数字化, 为 AI 技术的应用提供了天然的“数据燃料”。其产业链条长、环节多, 涵盖营销、销售、支付、供应链等, 为 AI 技术的渗透赋能提供了丰富的应用场景。此外, 新电商行业内部竞争激烈, 爆品商机转瞬即逝, 行业特点催生相关商家、从业者对效率和创新的极致追求, 构成了技术迭代的强劲市场动力。

在新电商产业中, AI 技术作为一种新型劳动资料与产业的深度融合, 并非简单地进行“AI+”的工具叠加, 而是触发了“AI×”的乘数效应, 系统性催生新质生产力。例如生成式 AI 技术采用机器学习和自然语言处理

作者简介: 刘思炜(1991—), 女, 硕士, 经济师, 研究方向为新电商、新消费。

等方法，具备自主生成文本、图像和声音等内容的能力，从而为电商直播带来了丰富多样的应用场景（张紫萱，2023）。

1.3 基于生产力三要素的赋能模型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三要素赋能模型：AI 技术通过分别赋能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三重要素，并在其相互作用的动态过程中，整体驱动新电商产业向新质生产力跃迁。

这一模型揭示了三大并行且相互交织的赋能路径：

1. 劳动资料的智能化迭代：AI 技术自身作为劳动资料，并与其他软硬件结合，催生了推荐引擎、智能客服、自动化营销平台、智慧供应链系统等一整套“智能基础设施”，实现了生产工具的颠覆性变革。

2. 劳动者的能力进化与角色重塑：AI 技术并非简单替代劳动者，而是通过人机协同，将从业者从重复性劳动中解放，转向需具备数据思维、AI 工具使用能力和创造性的战略性岗位，如 AI 训练师、直播策划、体验优化师等，从而培育了适应新质生产力要求的新型劳动者。

3. 劳动对象的范围拓展与精准化：在 AI 技术的赋能下，劳动对象从传统的、物理形态的“商品”，极大地拓展至“用户个性化的需求”、“潜在的市场趋势”乃至“数据要素本身”。通过精准洞察和创造需求，实现了价值创造源泉的爆炸式增长。

三条路径并非孤立，而是构成一个动态增强的循环。智能化的劳动资料（如数据分析平台）提升了劳动者洞察劳动对象（用户需求）的能力；而劳动者素质的提升，又反过来推动劳动资料的进一步创新。这一循环持续运行，共同构筑了新电商产业新质生产力生成的底层逻辑，为新电商产业案例实践提供了明确的理论透镜。

二、AI 驱动新电商产业跃升的内在路径

AI 技术对新电商产业的赋能，是源于生产力内核的深刻革命。通过触发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三大要素的系统性跃迁，重塑了产业的价值创造逻辑。本节将深入剖析这三条并行的核心赋能路径。

2.1 智能工具嵌入与劳动资料的革命性变革

劳动资料的质变是区分不同经济时代的标志。在新电商领域，人工智能的嵌入，正使得传统的数字平台、软件工具演进为具有感知、分析、决策和优化能力的“智能基础设施”，实现了劳动资料的革命性变革。

首先，算法模型成为核心生产工具。传统电商依赖人工经验判断，而 AI 推荐引擎、搜索排序和精准营销模型，可实时处理海量用户数据，自动完成“人货匹配”。推荐算法转变为主动的“超级导购”，以“信息找人”模式提升交易效率；数据挖掘技术则从数据中识别消费趋势、预测爆款，推动选品、定价等决策从经验驱动转向数据驱动。

其次，AI 驱动的系统平台构建起新型劳动资料体系，形成全链路智能生态。营销端，AI 自动生成广告创意并跨渠道智能投放；服务端，智能客服依托 NLP 技术实现 7×24 小时响应；供应链端，智能仓储与物流算法动态优化库存、规划配送。各系统协同运作，打通“需求洞察-精准营销-交易转化-履约交付”全流程，构成智能化生产资料集群。

最终，劳动资料的革新本质上是通过将生产与交易过程中的不确定性量化为可测度的概率模型，同时将复杂决策解构为标准化、程序化的操作范式。这一变革使新电商企业得以在组织生产与开展交易活动时，实现前所未有的精准性与高效性，为其构建起以高效能、高质量增长为特征的新质生产力体系提供了坚实的物质技术支撑。

2.2 人机协同深化与劳动者的角色创造性重塑

人工智能的普及并非意味着劳动者的边缘化，相反，它正催生一场深刻的“人机协同”，推动劳动者的角色从“操作执行者”向“创意决策者”和“AI 管理者”创造性重塑。

一方面，AI 技术可接管大量重复性、标准化工作，让劳动者聚焦高价值创造。如 AI 虚拟主播承担日常商品讲解直播，释放真人主播精力用于内容策划、IP 打造和粉丝互动；AIGC 工具助力快速生成内容素材，推动劳动者能力从“生产”向“策展”“审美判断”转变；智能问答系统处理 80% 常规客服问题，使人工客服专注处理需共情与复杂协商的个性化场景。

另一方面，新业态催生出 AI 训练师、数据标注师等新兴职业，对劳动者素质提出更高要求。这些岗位从业不仅熟悉电商业务，还需具备数据思维与 AI 工具应用能力，“数字素养”和“AI 素养”已成为核心技能。劳动者需掌握与 AI 协作的能力，包括精准下达指令、解读分析输出结果，并对 AI 运行进行监督优化。

因此，人机协同的演进并非单纯的替代关系，而是呈现为互补共生的协同进化模式。从技术赋能视角来看，人工智能作为人类劳动能力的智能化延伸，显著提升了劳动生产的智能化水平与效率；而人类劳动者则凭借自身的认知能力、价值判断和战略思维，在技术应用过程中发挥着方向把控与价值校准的关键作用。通过这种双向赋能机制，构建起以智能技术为核心生产资料、以人类智慧为价值导向的新型劳动范式，有效培育出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要求、具备智能技术应用与创新能力的高素质劳动者群体。

2.3 数据要素驱动与劳动对象的范围爆炸性拓展

在传统电商中，劳动对象主要是物理形态的商品。而人工智能的赋能，使得数据本身成为关键的生产要素，并通过对其的挖掘与利用，实现了劳动对象范围的“爆炸性拓展”。

最显著的拓展是从“经营商品”转向“经营用户需求”。AI 分析工具凭借数据挖掘能力，穿透表层交易，精准解析用户潜在需求、兴趣偏好与消费能力，将模糊的用户需求转化为可操作的服务对象。例如，通过整合用户浏览、搜索及社交数据，AI 可挖掘“长尾需求”与潜在消费场景，助力商家开发适配的新产品与服务。这一转变不仅拓宽市场边界，还推动个性化定制、C2M 模式的规模化落地。

其次，劳动对象拓展至虚拟化的“消费注意力和体验”。在内容与直播电商中，核心产品已从商品延伸至内容及用户体验。AI 通过优化内容分发、生成个性化互动（如抽奖、弹幕），并借助 AIGC 构建虚拟场景，直接以用户注意力与沉浸感为劳动对象，创造新商业价值。

最后，AI 借助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将“市场趋势”与“社会情绪”纳入分析范畴。通过解析社交媒体和新闻舆情，不仅能精准把握消费情绪变化、挖掘营销机遇，还能预警公关风险，使劳动对象从微观商品与用户，延伸至宏观社会文化领域。

综上所述，数据要素驱动的劳动对象拓展重塑了价值创造逻辑。新电商竞争已从商品质量比拼，升级为用户需求识别与响应能力的较量，为产业增长开拓无限新空间，彰显新质生产力“高质量”发展特质。

三、杭州新电商产业的实践经验

3.1 杭州数字生态与实践样本

杭州作为全国首个设立的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与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在近十年的发展进程中实现了跨越式增长，跨境电商规模增幅高达 1266 倍，缔造了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产业发展成果。杭州市域范围内已集聚跨境电商经营主体 6.5 万家，并成功构建起涵盖 AI 大模型研发、智能应用工具开发及全链条电商服务体系的完整产业生态。本文选取阿里巴巴国际站、遥望网络科技及 PingPong 作为核心研究样本，三者分别作为平台型电商、内容电商及跨境支付服务领域的典型代表，在 AI 技术应用赋能的实践探索中形成差异化发展路径，具备较强的行业代表性与研究价值。

3.2 三大赋能路径在杭州企业中的具体体现

（1）全链路智能：阿里巴巴国际站

阿里巴巴国际站通过部署 AI 生意助手，实现了从商品上架到交易达成的全链路智能化，充分印证了劳动资料的革命性变革这一赋能路径。具体而言，其 AI 工具能智能匹配“千人千面”的精准标题，将商品曝光转化率提升最高达 11%；智能客服助手具备 24 小时多语言接待与实时对话分析能力，能基于企业私有知识库进行高专业度客户沟通；风控助手可实时解析法规并主动侦测店铺风险；营销助手则能制定全站推广策略，实现精准投放。这些 AI 工具不再仅是辅助手段，而是构成了新一代智能劳动资料体系，将传统电商运营中依赖人工经验的环节全面自动化、智能化。

在劳动者角色重塑与劳动对象拓展层面，AI 技术展现出显著赋能作用。商家借助国际站 AI 系统，完成选品、上架等全流程业务，生成场景图与自动客服功能。不仅替代重复劳动，还通过数据分析延伸劳动者能力，提升单人效能。同时，AI 技术精准市场分析助力商家挖掘海外节庆用品需求，提前布局“黑五”、圣诞等销售旺季，推动业务从“经营货物”向“经营需求”转型，将劳动对象拓展至跨境细分市场。

（2）内容场域再造：遥望科技

作为直播电商领域的头部企业，遥望科技依托 AI 技术，对内容创作、互动体验及消费转化的全链条进行系统性革新。在劳动资料智能化建设层面，该企业率先构建社交电商行业首个内部 AI 应用框架——V5Chat，集成全链路自动化管理系统，能够高效处理海量重复性业务流程，员工仅需执行关键环节的审核与优化操作。

此外，基于 AIGC（人工智能生成内容）技术开发的短剧内容生产模式已实现产业化应用，为直播电商内容生态创新提供了新范式。

在劳动者能力重构维度，真人主播的职能已从传统的商品信息传递者，转型为兼具内容策划与人工智能协同管理的复合型角色。主播通过运用人工智能技术对观众交互数据及消费行为偏好进行深度挖掘与分析，实现直播脚本的科学化设计与直播节奏的精准化把控。这一转变推动企业组织架构优化，2024 年企业前台业务人员占比同比提升 16%，中后台职能人员数量绝对值减少 52%。

在劳动对象范围拓展上，AI 技术帮助遥望科技将劳动对象从“商品”本身延伸至用户的“注意力”和“沉浸式体验”。通过分析用户交互数据，AI 能够精准策划引发情感共鸣的内容主题。例如 2024 年双 11 期间，遥望科技为韩束品牌定制短剧《一束月光照蔷薇》，带动品牌曝光超 3000 万，并直接推动其定制礼盒单品 GMV 突破 5125 万元。公司将传统的交易场域进化为集娱乐、社交与消费为一体的新空间，通过“超级 IP+超级工厂”的模式，成功孵化了“朵薇”等新消费品牌，该品牌上市 40 天便实现 GMV 破亿，体现了从销售商品到经营用户情感与体验的转变。

（3）产业基础设施赋能：PingPong

作为跨境支付的服务商，PingPong 通过构建智能风控体系与近实时结算网络，彰显了其作为智能化产业基础设施的赋能价值。在劳动资料智能化维度，PingPong 的智能风控系统基于 AI 算法实时监测交易行为，已累计拦截 10 亿美元级别的欺诈资损，保护了近 20000 亿元的跨境交易资金安全。同时，其智能全球资金路由中心能根据个体客户需求与业务场景，自动匹配最优最短资金路径，将跨境资金到账时效从传统模式下的 1 周压缩至分钟级，客户 KYC 流程也从 3 天大幅缩减至 1 小时。

在劳动者角色重塑方面，PingPong 的智能系统通过自动化流程将跨境电商财务人员从繁琐的对账、核销工作中解放出来。其 AI 应用还能为企业提供智能选品等服务，跨平台产品匹配准确率超过 90%+，这使得企业运营和财务人员能将精力更多地投向市场策略优化与供应链协同等创造性领域，推动其核心价值从重复操作转向数据决策与风险管理。

于劳动对象拓展层面，PingPong 的平台在服务过程中沉淀了海量全球交易数据，使其自身成为一个宝贵的数据要素集合体。公司积极呼吁并推动建设数据共享联盟，主张在合法合规与数据脱敏的前提下，促进数据的流通与价值挖掘。这些经过处理的宏观交易数据能够反哺商家，辅助其洞察区域市场趋势、识别新兴消费需求，从而将原始的“数据”有效地转化为驱动业务增长的“信息”，持续拓展价值创造的对象与边界。

四、面向未来的产业优化与政策支撑

4.1 技术、人才、治理与生态层面的现实挑战与共性瓶颈

AI 技术的深度应用为杭州新电商产业发展注入强大动力，然而在推动产业向新质生产力转型升级过程中，仍存在诸多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在技术支撑维度，高性能算力资源存在显著的成本高企与供需结构性矛盾，多数中小微企业难以承受私有化部署的高额成本，而公有云服务模式在数据安全保障与个性化定制服务方面存在明显局限性。人才培养领域，既精通 AI 技术原理又熟悉电商业务运营的复合型人才供给严重不足，传统电商行业从业者的技能更新速度远不及技术创新迭代速率。在行业治理层面，数据隐私保护、算法公平性审查以及平台主体责任界定等监管机制尚不完善，跨境数据流动管理与知识产权保护面临制度性困境。产业生态方面，大中小企业数字化发展水平存在显著梯度差异，产业链上下游企业间数据壁垒依然存在，极大制约了产业协同创新效能的充分释放。上述发展瓶颈对人工智能技术赋能新电商产业的深度与广度形成明显制约。

4.2 基于机制与案例的系统性发展路径

基于前述赋能机制与相关案例研究，提出“技术筑基-人才引领-生态协同-治理护航”四位一体的系统性发展路径，以推动产业实现包容性、可持续的高质量发展。

（1）技术筑基：推动算力普惠与垂直工具创新

政府发挥统筹协调职能，联动行业龙头企业，构建区域级高性能异构算力普惠服务平台。通过制定差异化补贴政策与资源共享机制，有效消解中小企业在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层面的壁垒。与此同时，建议出台专项激励措施，推动科技企业聚焦电商垂直领域，研发具备 SaaS 化特征的人工智能工具链体系。针对智能选品、跨境营销、供应链优化等核心业务场景，开发标准化、模块化的“即插即用”解决方案，实现前沿技术成果向普适性生产资料的高效转化。

(2) 人才引领：构建产教融合的复合型人才培养体系

为响应新质生产力发展对劳动者角色转型的迫切需求，从产教协同创新与人才培养体系优化双维度发力。一方面，以深化"AI+电商"产教融合为抓手，推动高等院校与行业龙头企业开展深度合作，共同构建产学研一体化课程体系，联合建设现代化实训基地，促进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的有机衔接。另一方面，实施"新电商工匠"专项培育工程，聚焦在职人员专业能力提升，通过系统化课程设计，着重强化数据驱动思维、AI技术工具应用以及人机协同作业等核心技能，着力打造一支适应智能化生产方式、熟练掌握新型劳动资料的高素质复合型人才队伍。

(3) 生态协同：促进数据共享与产业链智能化协同

聚焦安全可信产业数据空间的系统性构建，基于数据隐私保护的法律法规框架，建立健全数据要素合规流通的制度体系，以实现数据资源价值的深度挖掘与有效转化。通过政策引导与市场激励相结合的方式，推动电商行业头部企业开放 AI 技术能力接口，构建"龙头企业主导技术平台搭建、中小企业依托平台创新发展"的协同创新生态系统。此外，需强化产业链各环节的协同联动，将 AI 技术深度嵌入绿色供应链管理体系与循环物流模式创新之中，从而提升电商产业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发展能力与整体效能。

(4) 治理护航：创新包容审慎的监管与标准体系

为有效应对 AI 技术迭代引发的新型治理难题，探索构建"新电商人工智能应用监管沙盒"制度，通过建立包容审慎的创新测试机制，为前沿技术应用提供可控性风险评估环境。同步加快推进 AI 技术在电商应用领域的标准化体系建设，重点围绕数据治理伦理规范、算法运行透明度、智能服务质量管控等核心维度，制定具有前瞻性和实操性的团体标准与地方标准，为产业可持续发展筑牢制度框架。此外，应积极构建跨境电子商务人工智能治理的国际协同机制，通过多边对话与规则互认，为本土电商企业国际化发展营造稳定可预期的制度环境，提升我国在全球数字贸易治理中的话语权。

参考文献

- [1]任保平,何厚聪.数字经济赋能高质量发展:理论逻辑、路径选择与政策取向[J].财经科学,2022(4):61-75.
- [2]杜传忠,疏爽,李泽浩.新质生产力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机制分析与实现路径[J].经济纵横,2023,(12):20-28.DOI:10.16528/j.cnki.22-1054/f.202312020.
- [3]蒋永穆,薛蔚然.新质生产力理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体系框架与路径设计[J].商业经济与管理,2024,(05):81-92.
- [4]褚善博.AI赋能电商新模式的探究[J].科技风,2021(03).
- [5]石德伦,沈伟,张鹏,尹亮和余其旺.人工智能在数字经济中的应用研究[J].商展经济,2024(06).
- [6]张爽,晏文龙、曹伟和崔可.人工智能助推文创产品设计在电商平台的实践探索——以淮阳神话文化为例[J].鞋类工艺与设计,2023(3).
- [7]张紫萱.生成式人工智能对电商直播的影响[J].文化产业, 2023 (35) .

Mechanisms and Pathways of AI - Empowered New E - commerce Industry Development in the Context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A Case Study of Hangzhou

Liu Siwei

(Zhejiang Financial College, E-commerce & New Consumption Institute; Hangzhou New E-commerce Development Research Base, Hangzhou 310000, Zhejiang)

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Theory,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intrinsic mechanisms and practical pathways through which AI technology empower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new e - commerce industry, with an empirical analysis centered on Hangzhou case. A tripartite empowerment model—comprising laborers, means of labor, and objects of labor—is constructed. It reveals that AI technology systematically drives the new e - commerce sector toward higher efficiency and quality through intelligent tool embedding, deepened human - machine collaboration, and data - factor driving. Practices of Hangzhou - based enterprises show that AI technology has formed distinctive pathways in full - chain intelligence, content - field reconstruction, and infrastructure empowerment. Finally, the paper proposes a systematic development framework of "technology foundation, talent leadership, ecosystem synergy, and governance safeguard," offering practical references for the intelligent upgrading of regional industries.

Keywords: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AI Technology; New E - commerce; Empowerment Mechanisms

人工智能赋能人力资源管理研究综述： 理论框架、实践悖论与研究缺口

罗子敬

(新余青云联合会计师事务所, 江西 新余 338000)

摘要：人工智能已经越过单纯的信息化辅助阶段，开始进入招聘甄选、培训开发、绩效评价、薪酬服务、员工关系与人才规划等管理环节。已有研究较充分地呈现了算法在信息处理、预测分析和个性化服务方面的潜力，但效率提升并不会自动带来公平、信任或更好的组织结果。本文在规范化检索的基础上，对 2015—2026 年中英文研究进行整合性述评，重点考察概念边界、研究演进、理论解释、应用情境及治理争议。梳理表明，相关研究的关注点经历了由流程电子化到预测分析、再到价值与责任治理的移动；国内成果偏重技术落地和组织转型，国外文献则较早讨论歧视、劳动控制、员工权利与问责。在此基础上，本文把技术、组织、个体、价值和结果纳入同一分析链条，并从实际管理过程归纳出五类持续存在的实践悖论：效率与公平、数据利用与隐私、自动化与人本沟通、技术更新与组织承载、量化判断与具体情境。文章认为，人工智能在人力资源管理中的价值取决于制度安排和使用方式，而非模型性能本身；对高影响人事决策实行分级管理、保留有意义的人工审查、建立解释和申诉渠道，是推进负责任应用的基本条件。

关键词：人工智能；人力资源管理；智能人力资源管理；算法治理；人机协同；研究综述

DOI: doi.org/10.70693/202607121395

一、引言

(一) 研究背景

在组织管理中，人工智能最先改变的是信息处理速度，随后才逐渐触及判断和决策。简历解析、考勤核验、薪资计算等任务具有较清晰的规则，容易被系统接管；潜力识别、绩效沟通、冲突调解和职业发展却依赖语境、关系与经验，难以压缩成稳定指标。正因为人力资源管理同时包含标准化事务与高度情境化活动，它成为观察技术如何进入组织权力和劳动关系的一个典型窗口。国内研究已从数字化转型视角讨论人工智能对组织结构、岗位能力和管理流程的影响[1]，国外研究则提醒，人力资源数据的样本、标签和因果关系具有特殊性，不能照搬一般商业分析的做法[2]。

算法带来的收益与代价往往同时出现。它可以缩短筛选时间，帮助管理者识别能力缺口、人员流动和用工需求，却也可能把过去形成的招聘偏好写入模型，把原本难以观察的员工行为转化为持续记录和比较的对象。相关综述已经指出，AI-HRM 能否产生正面结果，不只取决于模型精度，还受到组织能力、员工接受以及制度环境的共同影响[3][4]。因此，研究重点不宜停留在“技术有没有用”，而应进一步追问：哪些任务可以交给系统，最终决定由谁作出，受影响者能否了解依据并提出异议。

现有文献的议题覆盖面已经较广，但知识积累仍有明显断点。一些研究用应用清单代替机制分析，能够说明系统“做了什么”，却没有解释算法建议怎样经过流程、权责和管理者判断转化为实际后果。国内外比较也常以主题数量为主，对研究重心为何由提效转向治理说明不足。与此同时，算法偏见、隐私和员工抵触已被反复讨论，能够把风险来源、组织条件与具体治理工具连起来的框架仍然不多。

本文采用“实践张力”这一概念，是为了分析同一项技术安排为何会在带来增益的同时制造新的损耗，而不是简单罗列利弊。

(二) 研究问题与研究意义

作者简介：罗子敬（1989-），男，硕士，研究方向：人力资源管理、数字化转型与人工智能治理、工商管理。

通讯作者：罗子敬

本文关注三个相互关联的问题：人工智能赋能人力资源管理的边界如何划定，它与电子化、数字化人力资源管理有何实质差别；国内外研究在演进过程中呈现出哪些共同趋势，又为何形成不同的问题意识；现实应用中的矛盾由哪些机制触发，研究与实践应如何回应。分析并不预设人工智能必然改善绩效，而是把技术后果看作数据、制度、人员行为和价值规范共同作用的结果。

理论上，文章把技术接受、技术—组织—环境、人机协同和算法治理放入同一条解释链，区分“系统得到使用”与“系统产生正当且有效的结果”这两个不同命题。通过回顾研究演进，可以看到 AI-HRM 的知识基础已从工具效率逐步伸向权利、责任和劳动关系。实践上，本文依据任务的标准化程度、决策影响和人际互动强度识别适用边界，尤其强调录用、晋升、薪酬、处分等高影响事项不能仅凭模型输出完成，以避免企业在转型中形成重设备采购、轻流程治理，或重预测结果、轻沟通说明的倾向。

（三）研究方法与分析思路

本文采取整合性述评。为使文献来源与取舍过程可以复核，检索范围限定为 2015 年至 2026 年 7 月 2 日。中文文献从 CNKI 和万方获取，英文文献由 Web of Science 与 Scopus 检索。检索时分别设置技术、人力资源职能和治理三组词项，再依据各数据库的字段规则，在题名、摘要、关键词或主题项中进行组合查询。本文旨在辨析概念边界及作用机制，不进行统计意义上的效应量合并。

表 1 文献检索与筛选设置

检索维度	设置内容
时间范围	2015—2026 年；检索截止时间为 2026 年 7 月 2 日
中文数据库	CNKI、万方数据库
英文数据库	Web of Science、Scopus 数据库
检索词组	技术词（人工智能、机器学习、生成式人工智能等）+人力资源职能词+治理词
纳入原则	主题与 AI-HRM 直接相关；来源可核验；论证信息较完整；兼顾中英文代表性成果
排除原则	重复文献、弱相关材料、一般技术介绍及出版信息不完整的材料

材料整理不采用机械的主题计数，而是沿着问题形成过程展开。分析先处理人工智能赋能、智能人力资源管理与实践张力的概念关系，再结合技术条件和研究问题的变化梳理国内外演进；随后比较技术采纳、组织适配、人本管理及算法治理的解释范围，并将不同职能场景中的任务特征与风险放在一起考察。最后，文章从理论、样本、方法和生成式人工智能治理四个方面归纳尚未解决的问题。

这样的处理有助于避免把国外规范性概念直接移植到国内组织，也能保留不同制度情境下结论的适用边界。

二、核心概念界定

（一）人工智能赋能人力资源管理

人工智能赋能人力资源管理，是组织把机器学习、自然语言处理、知识图谱、智能推荐、生成式模型及其他数据技术嵌入人才获取、配置、评价、培养和保留过程，使系统参与信息识别、模式发现、内容生成、风险提示或决策支持。这里的“赋能”指管理能力得到扩展，并不等同于用机器替换人员。技术是否真正形成赋能，至少要满足两项条件：应用目标能够兼顾组织需要和员工发展；算法输出进入正式管理流程后，仍有明确的解释、判断和责任承担主体。计算过程复杂不能成为责任悬空的理由。

从实际作用看，人工智能大致通过四条路径进入人力资源管理。流程层面，它可以处理录入、问答、核验等重复事务；认知层面，它从分散数据中寻找关联，为岗位匹配、能力诊断和人员规划提供参考；互动层面，推荐和即时反馈改变了以往统一、周期性的服务方式；战略层面，岗位、能力和组织绩效数据被连接起来，用于人才盘点、继任计划与组织设计。四条路径的效果并不同步：流程更快，未必意味着解释更充分；预测更精细，也可能意味着员工受到更密集的观察。

因此，对“赋能”的判断不能只依据系统上线、处理时长或准确率。更有意义的评价还应包括决策质量是否改善、员工是否理解并接受程序、组织是否从反馈中学习，以及错误和风险能否被发现、纠正和追溯。若技术只是把原有的不合理规则自动执行得更快，所谓升级并没有带来管理意义上的进步。

（二）智能人力资源管理

智能人力资源管理可以理解为电子化和数字化管理继续发展的结果。电子化主要解决信息存储与流程上网，数字化强调数据贯通、可视化和业务协同，智能化则加入预测、推荐、生成及自适应反馈。它不是一套孤立的软件，而是由数据标准、算法模型、业务规则、岗位分工、决策程序和伦理规范共同构成的社会技术系统。若只评估模型而不考察数据来源、使用者能力和组织制度，技术的独立作用往往会被高估。

这一管理形态通常呈现五项特征。其一，判断依据由个人经验扩展到多源数据，但数据仍带有采集条件和组织历史；其二，模型会随新数据和使用反馈发生变化，需要持续监测而非一次验收；其三，不同场景对准确性、可解释性和人际互动的要求并不相同；其四，系统负责计算和提示，人类仍需处理价值冲突、例外情况与沟通；其五，数据边界、决策权限、复核程序、申诉渠道和责任主体必须被制度化。

由此可见，智能化成熟度不应以产品新旧或功能多少衡量，而应看组织是否具备稳定、可解释、可纠错的使用能力。技术新颖而制度空缺，往往只会把旧问题转化为更难识别的新问题。

（三）实践悖论与研究缺口

本文所说的实践悖论，是指一项 AI-HRM 安排在实现某个管理目标时，同时形成与该目标相牵制的后果。统一模型可以压缩人为随意性，却可能更隐蔽地延续历史偏见；扩大数据采集有利于风险预警，也可能损害心理安全；自动生成反馈提高了响应速度，却可能使管理者减少对个体处境的理解。这些现象不是彼此独立的优点和缺点，而是相互依赖的目标长期并存，组织很难通过一次技术调整彻底消除。

研究缺口则体现为解释范围、证据类型或治理效果仍不充分。把研究缺口与实践悖论结合起来，可以从“发现存在风险”进一步走向“说明风险怎样形成、何种条件下加剧、哪些措施能够缓解”。当前真正稀缺的并不是更多应用案例，而是能够连接技术设计、组织制度、员工感知、权力配置和结果反馈的中层理论，以及对审计、复核、员工参与等治理工具效果的持续检验。

三、国内外研究演进脉络

如果以技术所承担的任务和研究者提出的问题为线索，AI-HRM 文献可以辨认出三种相继出现、又彼此重叠的取向：最初关注人事事务的信息化处理，随后转向预测分析和职能场景扩展，近年则把人机协同、算法权力和责任治理置于中心。这里的阶段划分并非严格按年份切开，而是用于说明研究问题如何发生变化；在不少组织中，三种取向仍然同时存在。

（一）萌芽阶段：事务处理与工具导入

国内早期讨论主要承接人力资源信息化和电子化管理，关注档案、考勤、工资、招聘发布和培训记录等事务如何在线完成。评价标准多是行政成本、处理速度和信息共享，技术被放在既有流程的后台。由于数据尚未跨模块连接，预测和自动决策并非核心议题，员工感受、权利边界与模型责任也较少进入分析。这个阶段的重要贡献在于形成基础数据和流程接口，但也留下一个惯性：容易把纸面流程搬到线上视作管理改进本身。

国外同期研究同样从人力资源信息系统和在线测评起步，却较早注意技术对 HR 角色及员工关系的改变。Stone 等指出，技术不仅调整招聘、培训和绩效管理的方式，还会改变人力资源从业者所需能力以及其与员工的互动[5]。这一观察为后续研究提供了关键前提：技术并非置身组织之外的中性工具，它会重新安排信息可见性、判断权和控制方式。

（二）发展阶段：预测分析与场景扩展

云计算、大数据和机器学习被企业采用后，人力资源系统开始从记录过去转向估计未来。国内研究的对象随之扩展到简历解析、岗位匹配、人才画像、学习推荐、绩效预警和离职预测，并把人工智能与流程再造、职能升级联系起来。张琪等对相关理论和实践的梳理，反映了研究重心由事务自动化向数据分析与决策支持的转变[6]。这一时期仍以效率、成本和匹配精度为主要指标，但数据质量、系统集成和组织适配已逐渐成为不可回避的问题。

国外研究在拓展应用场景的同时，更强调人力资源数据的限制。Tambe 等指出，样本规模小、标签含义不稳定、结果受情境影响以及实验难以开展，都会削弱模型结论的可靠性[2]。招聘和人才分析研究由此不再只比较准确率，而开始考察程序公平、解释透明和候选人接受：预测出错由谁负责，被评价者能否理解结果，组织是否提供纠正机会，逐渐与技术效果一起成为评价内容。

（三）深化阶段：价值治理、人机协同与责任边界

2021 年以来，大模型和生成式人工智能显著降低了内容生成与知识交互门槛，国内议题也从系统功能延伸到数字压力、算法信任、组织能力和数据合规。越来越多的实践说明，购买产品不能替代流程重构。数据口径不统一、岗位责任含混、管理者缺少数字素养，或员工在部署前没有得到充分沟通，都会使系统停留在展示层面，甚至增加重复录入和核对。于是，AI-HRM 开始被视为一项组织变革，而不只是信息部门的项目。

国外文献在这一阶段明显加强了跨学科解释。Pan 与 Froese 提出应连接管理学、信息系统、心理学、伦理学和法学[3]；Vrontis 等把组织能力与制度环境视为理解技术后果的重要条件[4]；Budhwar 等则从国际人力资源管理出发，说明文化、监管和劳动关系差异会改变 AI 的可接受程度与治理方式[7]。Kellogg 等把算法放回劳动过程，揭示规则设定、持续监测和自动奖惩如何形成新的控制场域[8]。这类研究把问题从“工具是否先进”推向“工具怎样改变管理权力”。

伦理与权利研究进一步讨论个人完整性、差别影响和救济。Leicht-Deobald 等认为，过度追求效率的算法决策可能压缩员工的自主判断和尊严[9]；Ajunwa 以工作中的“黑箱”说明劳动者常常难以获知自动决策依据[10]；

Barocas 和 Selbst 指出,即使不直接使用敏感属性,代理变量仍可能造成差别影响[11];Raghavan 等对招聘算法供应商的公平声明进行评估,发现商业宣称与可检验效果之间存在距离[12]。由此,研究关注点逐渐由采用与否转向采用过程是否负责任。

(四) 国内外研究的差异与联系

国内外研究都显示出由流程电子化、预测分析走向价值治理的总体趋势,但两类文献的问题起点并不相同。国内研究更直接回应企业数字化转型、管理提效和人才供给变化,重视系统怎样进入已有组织;国外研究较早受数据保护、反歧视和劳动过程传统影响,更关心算法对公平、权力和责任的重构。这种差别源于制度环境、研究传统和企业应用阶段,不宜用简单的先进或落后来评价。

两种路径可以相互补充。国外关于透明、审计和劳动者权利的成果,有助于国内企业划定高影响决策边界并建立问责;国内组织在复杂流程协同、本土管理文化和多层级落地方面的经验,也能修正把治理理解为统一模板的倾向。更有价值的后续比较,应在共同概念下区分所有制、行业、规模和用工关系,既不直接套用国外结论,也不以情境特殊为由回避普遍的公平与权利问题。

表 2 国内外 AI-HRM 研究取向的演进对照

研究取向	国内文献关注	国外文献关注	问题变化
事务处理与工具导入	人事信息化、线上流程、行政提效	技术对 HR 角色、沟通和员工关系的影响	从纸面处理转向数字记录
预测分析与场景扩展	岗位匹配、人才画像、绩效预警、离职预测	效果评估、程序公平、解释和候选人接受	从事后记录转向预测与建议
价值治理与责任边界	组织适配、数字压力、数据合规、人本管理	算法权力、员工权利、问责与跨学科治理	从效率问题转向权利与责任

四、理论基础与整合性分析框架

(一) 技术采纳与组织适配

技术接受模型指出,感知有用性和感知易用性影响个体的使用意愿[13]。在人力资源场景中,系统能否减少实际负担、界面是否便于操作、输出能否理解,都会影响 HR 人员和员工是否持续使用。不过, AI-HRM 经常用于评价和资源分配,系统使用者与被评价者并非同一群体。管理者愿意使用,不代表候选人或员工认可;使用频率高,也不能证明结果正当。因此,技术接受需要与程序公平、信任和权力关系共同分析。

技术—组织—环境框架从技术条件、组织准备和外部环境解释创新采纳[14]。对应到 AI-HRM,技术条件包括数据质量、系统集成、稳定性和安全;组织条件包括高层支持、流程清晰度、数字素养、跨部门协同及文化氛围;外部环境则涉及监管、行业竞争、供应商和劳动力市场。该框架的意义在于把模型性能放回组织承载条件:技术可用只是起点,组织是否能够解释、复核和纠错,往往更直接地决定应用后果。

(二) 人本管理与人机协同

人力资源管理面对的是具有尊严、情感和发展诉求的行动者,而不是可任意加工的数据集合。谢小云等从人与技术交互角度提出,数字化人力资源管理需要同时考察系统特征与员工的行为、心理和关系变化[15]。据此,智能化评价不能只看成本和速度,还要观察员工是否得到充分说明、是否感到被尊重、能否参与与自身利益有关的程序,以及系统究竟支持能力发展,还是主要用于单向监控。

人机协同理论提供了任务分工的进一步解释。Raisch 和 Krakowski 指出,人工智能既可能替代人的任务,也可能增强人的判断,组织设计需要同时处理这两种逻辑[16]。在人力资源管理中,数据清洗、信息检索、规则校验和异常提示适合由系统承担;价值冲突、例外情形、绩效沟通和职业辅导则需要人的语境理解。合理边界不是固定清单,而应随决策影响、错误代价和可逆程度调整。

(三) 算法治理与伦理约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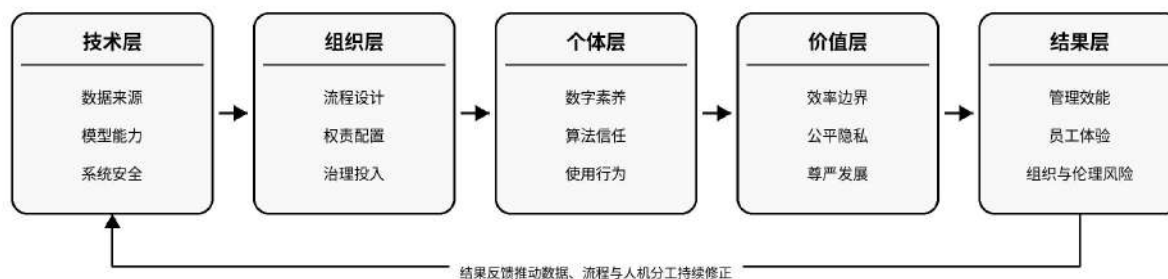
算法治理覆盖数据获取、模型设计、部署使用和结果反馈等环节,核心议题包括公平、透明、可解释性和问责。可解释人工智能研究显示,“解释”面对不同对象具有不同含义:开发者需要理解模型机制,管理者需要知道判断依据,员工则需要获得能够理解且与自身决定相关的说明[17]。受影响者不必掌握复杂算法,但应知道哪些数据被使用、哪些因素影响结果、如何补充信息,以及谁对最终决定负责。

制度规范为组织设定了最低边界。NIST 人工智能风险管理框架把治理、识别、测量和管理视为持续过程,要求兼顾可靠性、安全、隐私、公平和透明[18];OECD 人工智能原则强调以人为本、稳健和问责[19];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要求个人信息处理遵循合法、正当、必要和诚信,并对自动化决策的透明与公平作出规定[20]。这些规范虽然表述不同,却共同否定了一种做法:仅以商业效率证明高影响人事决策的正当性。

（四）整合性分析框架

综合上述理论，本文把 AI-HRM 置于技术、组织、个体、价值和结果五个层次中观察。技术层讨论数据来源、模型能力、系统稳定和安全；组织层考察流程设计、权责配置、治理结构与资源投入；个体层关注 HR 人员的数字素养、管理者使用建议的方式，以及员工的理解、信任和应对；价值层处理效率、公平、隐私、尊严与发展机会之间的边界；结果层同时观察管理效能、员工体验、组织绩效和伦理风险。五层并非平行清单，而是前后相接的转化链条。

图 1 人工智能赋能人力资源管理的五层转化链条



这一框架要说明的是，计算能力不会直接变成管理价值。技术层只能提供可能性，组织层决定算法被放入何种流程和由谁掌握决定权，个体层影响建议是被审慎采用、机械服从还是消极抵制，价值层为效率设置可接受边界，结果层则检验收益及副作用。当结果偏离目标时，组织需要回到数据、规则和使用方式查找原因，而不能把问题简单归结为员工“不适应”。从这个意义上说，AI-HRM 的效果来自技术能力、组织承载、人员信任和价值治理的共同作用。

五、应用场景与实践悖论

（一）主要应用场景

人工智能是否适合进入某项人力资源任务，首先取决于任务结构。规则稳定、数据相对完整、结果容易复核的工作，更适合自动化或半自动化；涉及重大权益、信息不充分或强情感互动的工作，则需要保持较高度的人类参与。招聘甄选是目前最常见的应用场景，系统可以解析简历、计算岗位匹配、辅助测评并形成候选人排序。Bogen 与 Rieke 提醒，训练样本、成功标准和代理变量都可能把偏差带入筛选[21]。

因此，招聘系统不能只看处理量和召回率，还要比较不同群体的错误率，说明筛选依据，并允许候选人补充无法结构化呈现的信息。

培训开发、绩效、薪酬和员工关系的任务要求各不相同。学习推荐可以依据岗位要求、能力测评和学习记录提高资源匹配，但历史记录也可能把员工锁定在既有路径；过程数据能为绩效评价提供更及时的证据，却难以完整表示创造性、协作贡献和长期潜力；薪资核算、福利问答适合明确规则的自动处理，薪酬差异和例外仍需管理者解释；离职预警、情绪识别和服务机器人提高了响应速度，同时也最容易触碰隐私、监控感与信任边界。

对于公共部门以及程序约束较强的组织，成本节约不能替代公共责任。凡自动化结果会改变人员录用、岗位安排、收入待遇或处分结果，相关组织都应说明决定所依据的关键信息，并为当事人保留复查和申诉路径。效率固然需要评估，但只能与程序正当、可救济性等指标一并考察。

表 3 人工智能在人力资源管理中的主要应用场景

应用场景	常见功能	可能收益	需要警惕的问题
招聘甄选	简历解析、岗位匹配、测评辅助、候选人排序	提高处理速度，扩大候选人识别范围	历史偏见、代理歧视、说明不足
培训开发	能力诊断、课程推荐、学习路径安排	提高资源匹配和学习个性化	历史记录固化、路径依赖、过度服从推荐
绩效管理	过程数据分析、异常提示、反馈草拟	增强及时性，补充评价证据	忽视隐性贡献、指标操纵、沟通减少
薪酬福利	薪资计算、福利问答、成本分析	提升规则执行与服务响应	数据安全、规则不透明、差异解释不足

应用场景	常见功能	可能收益	需要警惕的问题
员工关系	员工咨询、流失预警、情绪与风险识别	提高服务可及性和组织预警能力	隐私侵犯、监控感、误判和信任下降

（二）核心实践悖论

其一，效率提高并不等于公平改善，两者甚至可能朝相反方向变化。统一模型确实能够压缩部分人工判断，并加快大规模筛选和分析。

问题在于，模型所学习的仍是既有数据以及其中沉淀的用人偏好。如果某些群体过去较少获得机会，算法便可能把历史结果误当作能力差异。学校、居住区域、职业中断或语言特征等变量，也可能间接对应敏感属性。因此，形式上对所有人采用同一规则，并不等同于结果公平。

其二，预测所依赖的数据扩张，常与隐私空间收缩相伴。为了判断流失、绩效或情绪状态，系统可能把履历、学习、沟通和日常行为记录汇入同一分析过程。数据一旦跨越原定用途，越权调用、长期留存和再次利用的风险便随之增加，尤其是由模型推断出的离职倾向、心理或情绪信息，更不能按普通业务数据处理。数据发生在工作场所或可从公开渠道取得，并不意味着企业可以不受限制地使用。若员工不知道采集理由、保存期限以及分析结果将被用于何种决定，工具就容易被视为监控装置；信任下降后，还可能出现回避、修饰数据等策略性反应。

其三，自动化可以释放事务时间，也可能削弱人本沟通。智能问答、审批和文本生成确实能减少重复工作，但节省出的时间是否用于更高质量的交流，取决于岗位和流程是否同步调整。如果系统只是替代了接触窗口，员工在绩效争议、职业困惑或冲突处理中得到的可能只是标准答案，管理者也可能借“系统结论”回避说明。技术减少了事务负担，却未必增加倾听、协商和关怀。

其四，产品迭代速度往往超过组织调整速度。模型和功能快速更新，企业的标准、审批流程、岗位能力与责任制度却需要较长时间才能改变。试点阶段依靠少数人员维护的问题，在跨部门推广后会集中暴露，例如口径不一、接口割裂、规则含混和重复核对。技术越复杂，组织越需要具备问题定义、供应商管理、模型评估和风险沟通能力；缺少这些能力，先进系统反而可能成为新的信息孤岛。

其五，量化看似精准，却有明确的情境边界。算法擅长在规则相对稳定的任务中寻找模式，但模式并不等于因果，也不等于理解个体处境。出勤、薪资和资格核验可以较充分地算法化，创造潜力、团队影响、伦理判断和员工困难则很难由少数指标完整表达。当组织把“容易测量”误当成“最重要”，员工会围绕指标调整行为，隐性贡献和长期价值反而被挤出视野。真正的精准应包括对不确定性和适用范围的诚实表达。

表 4 AI-HRM 实践悖论及其治理着力点

实践张力	典型表现	治理着力点
效率与公平	统一规则提高速度，却可能延续历史偏见或形成代理歧视	群体差异测试、独立审计、人工复核
数据利用与隐私	数据范围扩大有利于预测，也增加目的漂移和监控风险	目的限定、最小必要、权限控制、保存期限
自动化与人本沟通	事务响应更快，但解释、倾听和协商空间可能缩小	高影响环节保留人类判断和面对面沟通
技术更新与组织承载	产品迭代快于流程、能力和责任制度调整	同步推进流程重构、人员能力和责任配置
量化判断与具体情境	模型擅长可测任务，却难以表示隐性贡献和复杂处境	明确适用范围、不确定性和例外处理

（三）张力的形成机制

上述张力并非来自某个孤立错误，而是技术、组织、个体和制度共同作用的结果。训练数据、标签定义和优化目标把特定的管理偏好写入模型；企业在部署中往往重视上线时间和可视化成果，对流程重构、责任划分和员工参与投入不足；HR 人员若缺少评估模型和质疑输出的能力，容易形成自动化依赖，员工则会因决定不透明而不信任或采取策略性适应；与此同时，数据权利、劳动管理权和自动决策责任在具体场景中仍需细化。国内关于 AI-HRM 理论模型、数字化整合、机器学习应用和公共部门实践的研究，都提示技术后果必须放回组织情境与制度约束中理解[22][23][24][25]。

这些机制之间还会相互强化。例如，组织为了追求短期上线而降低数据治理要求，模型错误便更容易发生；错误发生后若缺少解释和复核，员工信任下降，随后提供的数据和使用行为也会发生变化，进一步影响模型效果。由此可见，张力不是部署完成后的附带问题，而是在技术进入组织的全过程中逐步生成。

（四）技术、组织与人本的联动治理

治理需要同时作用于三个层面。技术层面应建立数据质量检查、群体差异测试、性能监测、版本留痕与安全控制，并使高影响模型能够提供与决定相关的说明；组织层面要明确算法建议、管理者判断和复核部门的责任，将风险评估嵌入需求提出、采购、试点、上线和迭代，而不是在争议发生后临时补救；人本层面则应在必要范围内告知员工数据用途，为其提供补充说明、人工复核和申诉渠道，并让受影响群体参与关键规则的讨论。

组织管理中的人工智能决策和算法劳动研究都表明，治理对象不能只限于模型误差[26][27]。同样重要的是决定权如何分配、员工是否具有发声空间、系统建议能否被质疑，以及问题发生后责任是否可追溯。只有把这些安排写入日常流程，治理才不会停留在原则声明。

六、研究缺口与未来方向

AI-HRM 文献增长很快，但理论仍较分散，样本和方法也存在集中现象。个体对算法决定的评价并不完全由结果好坏决定，程序是否透明、本人能否表达意见，以及决定被归因于机器还是管理者，都会影响公平感[28]。接下来的研究不宜只寻找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更需要解释作用过程，并比较不同治理安排是否真正改善决策质量和员工体验。

（一）理论研究缺口

理论推进的首要任务，不是继续叠加解释变量，而是说明技术、制度和员工体验如何在同一过程中相互作用。现有技术接受、组织变革与伦理治理研究各自揭示了一部分机制，却较少回答相同系统为何在不同单位呈现迥异后果。后续可围绕“建议—判断—反应—修正”的过程建立中层模型：观察管理者如何读取并使用算法建议，员工如何理解决定并调整行为，组织又怎样依据争议和反馈改动规则。在此基础上，再检验数据质量、权力距离、任务能否解释以及错误是否可逆等条件何时改变上述关系。

其次，技术性能、管理效能和规范正当性需要被分别测量。准确率高并不必然改善组织绩效，绩效改善也不能自动证明员工权利获得保障。后续研究可同时考察预测表现、决定一致性、员工信任、申诉成本、群体差异和长期组织学习，防止用一个效率指标代替多元价值判断。

再次，技术赋权并非对所有主体均等发生。人工智能可能增强管理者获取和处理信息的能力，也可能改善员工自助服务与职业发展；结果取决于谁能看到数据、谁拥有解释权和选择权。同一系统在平台企业、制造企业、中小企业或公共部门中的作用很可能不同。研究需要更具体地回答：技术赋权了谁，成本由谁承担，收益与风险在组织内部如何分配。

此外，算法治理不能被简化为对模型的技术修补。在线劳动平台研究显示，算法通过派单、评价、排名和奖惩重塑劳动控制[29]。在人力资源管理中，偏差既可能来自数据，也可能来自组织对“优秀”“高绩效”和“可用人才”的定义。只有把优化目标、组织文化和劳动关系纳入分析，才能判断公平指标究竟改变了权力结构，还是仅为既有标准增加了技术合法性。

本土化理论建构仍显不足。中国企业在层级结构、集体关系、用工形式和数据基础上差异显著，新一代人工智能又在加速岗位和能力重构[30]。可围绕员工数字权利、组织信任、算法申诉、人机责任和供应商治理开发本土量表与过程模型，再通过跨地区、跨制度比较辨认哪些机制具有普遍性，哪些结论依赖具体情境。

（二）实践研究缺口

现有案例和实证研究较多来自大型企业、互联网平台或数字化基础较好的组织，中小企业、传统制造业、劳动密集型服务业和公共机构受到的关注明显较少。已有综述主张把研究视线由技术功能转向组织情境、实施过程和实际绩效[31]。未来尤其需要记录失败案例和低成熟度组织，考察在预算有限、数据基础薄弱的情况下，如何确定最低数据标准、选择可解释工具、管理外部供应商，并避免系统闲置和重复建设。

治理工具是否有效，也缺少直接比较。算法审计、伦理委员会、员工参与和人工复核常被作为建议提出，但它们在不同场景中的成本、执行难度和实际作用尚不清楚。以情绪识别为例，技术效度、推断合理性和员工同意本身都存在争议[32]。现场实验、准实验和比较案例可以用来检验不同告知方式、解释类型、复核层级和申诉程序是否降低不公平感，同时观察治理安排是否出现形式化执行。

（三）研究方法缺口

AI-HRM 并非一次部署即可定型，系统和制度都会在使用中改变。然而，现有证据仍以横截面问卷和概念讨论为主，这类资料只能截取某一时点，难以看清员工从新奇、接受到依赖或抵触的变化，也无法还原试点扩围、规则调整和错误纠正的过程。今后的研究可把纵向案例、关键事件追踪、多轮访谈和数字行为记录结合起来，连续观察需求提出、供应商遴选、模型训练、试运行以及常态化使用等环节。

跨学科研究也需要从“同时引用不同领域”走向共同设计。算法偏差研究可以把计算检测与组织公平理论结合，隐私研究需要同时使用法律分析和员工感知测量，人机协同则可连接任务实验、认知研究和管理情境。关于算法与认知的成果提示，系统判断能否转化为管理创新，取决于使用者怎样理解、解释和修正输出[33]。建立同时包含模型指标、决策过程与员工结果的多层数据，是突破单端研究的重要方向。

(四) 本土化治理与生成式人工智能

本土治理首先要正视程序公平与责任归因。中国组织普遍重视效率、执行和规模化,但员工对隐私、尊严和公平的期待也在提高。研究发现,算法作出不利判断时,员工可能因为它看似较少受人情影响而提高公平评价,也可能因缺少解释和互动而降低公平评价[34]。组织信任、领导沟通和申诉可及性如何改变这种双重反应,值得在不同用工关系中开展分级比较。

生成式人工智能扩大了岗位说明、面试题、培训材料、绩效反馈、政策问答和职业建议的自动生成能力,同时也带来事实错误、内容偏见、知识产权、敏感信息泄露与责任不清。相较传统预测模型,生成内容语言流畅,使用者更容易高估可靠性。研究和实践都应区分“内容辅助”与“权益决定”:前者经过审核可以提高效率,后者直接涉及录用、晋升、薪酬或处分,必须由有权限的人复核并保留依据。

还应把注意力放在 AI 建议进入管理决定的中间环节。算法权力研究指出,默认选项、排序和界面设计本身就会影响行为[35]。当生成式系统成为管理者的首份草稿或主要信息入口,它可能在不易察觉的情况下改变问题定义和沟通措辞。后续研究有必要记录提示词、模型版本、引用来源及人工修改,比较不同协同方式对判断质量、责任感和员工体验的影响,也要防止管理者借“系统生成”转移其应承担的解释与决定责任。

七、研究结论

人工智能在人力资源管理中的角色已经从事务辅助扩展到预测分析、内容生成和决策支持,研究焦点也随之由流程效率转向价值与责任。国内外文献在总体方向上具有一致性,但国内更加关注数字化转型和组织落地,国外较早进入公平、隐私、劳动控制和问责讨论。两类研究共同提示, AI-HRM 既不能被理解为单纯的提效工具,也不能脱离真实组织条件只作规范性批判。

本文提出的五层框架表明,技术价值需要经过制度和行为过程才能实现。数据与模型限定系统能够提供何种信息,流程和权责决定信息如何被使用,管理者与员工的理解和信任影响建议能否转化为行动,价值规范则划定哪些效率收益可以接受。管理结果必须反向用于修正数据、制度和人机分工,而不是把系统视作部署后即可独立运行的装置。

上述五类张力表明,智能化管理没有“一次建成”的终点,其风险控制应随决策影响程度而变化。日常查询、规则核验等低影响事项,可侧重自动化效率和服务感受;影响适中的应用应设置抽检、持续监测和异常复核;涉及录用、晋升、薪酬或处分的决定,则必须由有权限的人员作出最终判断,并同步提供说明与申诉途径。后续研究还需在本土组织中检验这些安排,增加对中小企业和公共部门的长期观察,结合纵向与混合方法,考察生成式人工智能使用中的协作方式、过程留痕和责任落实是否真正有效。

参考文献:

- [1] 罗文豪, 霍伟伟, 赵宜萱, 等. 人工智能驱动的组织与人力资源管理变革: 实践洞察与研究方向[J]. 中国人力资源开发, 2022, 39(1): 4-16.
- [2] TAMBE P, CAPPELLI P, YAKUBOVICH V.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human resources management: challenges and a path forward[J]. California Management Review, 2019, 61(4): 15-42.
- [3] PAN Y, FROESE F J. An interdisciplinary review of AI and HRM: challenges and future directions[J].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Review, 2023, 33(1): 100924.
- [4] VRONTIS D, CHRISTOFI M, PEREIRA V, et al.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robotics, advanced technologies and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a systematic review[J].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2022, 33(6): 1237-1266.
- [5] STONE D L, DEADRICK D L, LUKASZEWSKI K M, et al. The influence of technology on the future of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J].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Review, 2015, 25(2): 216-231.
- [6] 张琪, 林佳怡, 陈璐, 等. 人工智能技术驱动下的人力资源管理: 理论与实践应用[J]. 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 25(1): 77-84.
- [7] BUDHWAR P, MALIK A, DE SILVA M T T, et al. Artificial intelligence—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for international HRM: a review and research agenda[J].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2022, 33(6): 1065-1097.
- [8] KELLOGG K C, VALENTINE M A, CHRISTIN A. Algorithms at work: the new contested terrain of control[J]. Academy of Management Annals, 2020, 14(1): 366-410.
- [9] LEICHT-DEOBALD U, BUSCH T, SCHANK C, et al. The challenges of algorithm-based HR decision-making for personal integrity[J]. 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 2019, 160(2): 377-392.
- [10] AJUNWA I. The black box at work[J]. Big Data & Society, 2020, 7(2): 2053951720966181.
- [11] BAROCAS S, SELBST A D. Big data's disparate impact[J]. California Law Review, 2016, 104(3): 671-732.
- [12] RAGHAVAN M, BAROCAS S, KLEINBERG J, et al. Mitigating bias in algorithmic hiring: evaluating claims and practices[C]//Proceedings of the 2020 Conference on Fairness, Accountability, and Transparency. New York: Association for Computing Machinery, 2020: 469-481.
- [13] DAVIS F D. Perceived usefulness, perceived ease of use, and user acceptance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J]. MIS Quarterly, 1989, 13(3): 319-340.
- [14] TORNATZKY L G, FLEISCHER M, CHAKRABARTI A K. The processes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M]. Lexington: Lexington Books, 1990.

- [15] 谢小云, 左玉涵, 胡琼晶. 数字化时代的人力资源管理: 基于人与技术交互的视角[J]. 管理世界, 2021, 37(1): 200-216.
- [16] RAISCH S, KRAKOWSKI 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management: the automation-augmentation paradox[J].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2021, 46(1): 192-210.
- [17] BARREDO ARRIETA A, DÍAZ-RODRÍGUEZ N, DEL SER J, et al. Explainabl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XAI): concepts, taxonomies,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toward responsible AI[J]. Information Fusion, 2020, 58: 82-115.
- [18] NATIONAL INSTITUTE OF STANDARDS AND TECHNOLOGY.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Risk Management Framework (AI RMF 1.0)[R/OL]. Gaithersburg: NIST, 2023[2026-07-08]. <https://nvlpubs.nist.gov/nistpubs/ai/NIST.AI.100-1.pdf>.
- [19] OECD. OECD AI Principles[EB/OL]. Paris: OECD, 2019[2026-07-08]. <https://oecd.ai/en/ai-principles>.
- [20]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EB/OL]. (2021-08-20)[2026-07-08]. https://www.gov.cn/xinwen/2021-08/20/content_5632486.htm.
- [21] BOGEN M, RIEKE A. Help Wanted: An Examination of Hiring Algorithms, Equity, and Bias[R/OL]. Washington, DC: Upturn, 2018[2026-07-08]. <https://www.upturn.org/work/help-wanted/>.
- [22] 赵宜萱, 赵曙明, 栾佳锐. 基于人工智能的人力资源管理: 理论模型及研究展望[J]. 南京社会科学, 2020(2): 36-43.
- [23] 李燕萍, 李乐, 胡翔. 数字化人力资源管理: 整合框架与研究展望[J]. 科技进步与对策, 2021, 38(23): 151-160.
- [24] 张敏, 赵宜萱. 机器学习在人力资源管理领域中的应用研究[J]. 中国人力资源开发, 2022, 39(1): 71-83.
- [25] 陈鼎祥, 刘帮成. 人工智能时代的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 实践应用与理论研究[J]. 公共管理与政策评论, 2022, 11(4): 38-51.
- [26] 张亚莉, 李辽辽, 丁振斌. 组织管理中的人工智能决策: 述评与展望[J]. 外国经济与管理, 2024, 46(10): 18-38.
- [27] 喻术红, 常春. 算法劳动管理的伦理诉求及其法制建设研究[J]. 华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 24(5): 52-59.
- [28] 蒋路远, 曹李梅, 秦昕, 等. 人工智能决策的公平感知[J]. 心理科学进展, 2022, 30(5): 1078-1092.
- [29] 刘善仕, 裴嘉良, 葛淳棉, 等. 在线劳动平台算法管理: 理论探索与研究展望[J]. 管理世界, 2022, 38(2): 225-239.
- [30] 彭剑锋. 新一代人工智能对组织与人力资源管理的影响与挑战[J]. 中国人力资源开发, 2023, 40(7): 8-14.
- [31] 贺伟, 汪林, 吴小玥. 人工智能技术对人力资源管理研究的影响述评[J]. 中国科学基金, 2024, 38(5): 831-840.
- [32] 胡心约, 张恬路, 李英武. 基于 AI 的情绪识别在组织中的实践: 现状、未来和挑战[J]. 中国人力资源开发, 2022, 39(1): 57-70.
- [33] 付春香, 闫宇航. 算法与认知: 人工智能驱动的人力资源管理创新[J]. 科技创业月刊, 2024, 37(8): 22-27.
- [34] 高记, 冯婧雯. 不利结果下算法决策对员工公平感的双刃剑效应: 基于归因理论的视角[J]. 中国人力资源开发, 2024, 41(5): 36-53.
- [35] 包艳, 马伟博, 廖建桥, 等. 算法权力在管理领域的研究回顾、探索与展望[J]. 外国经济与管理, 2024, 46(5): 120-135.

Artificial Intelligence-Enabled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Practical Paradoxes and Open Research Questions

ZOU Zijing

(Xinyu Qingyun Certified Public Accountants Co., Ltd., Xinyu, Jiangxi, China)

Abstract: AI is no longer used in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only to automate clerical work. Organizations also apply it to screening applicants, recommending training, drafting performance feedback, providing compensation and employee services, and planning the workforce. The literature reports faster information handling and stronger predictive support, but these improvements do not in themselves secure procedural fairness, employee trust, or better organizational results. This article reviews Chinese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published between 2015 and 2026. Rather than counting topics mechanically, it compares how the field has defined AI-enabled HRM, how its questions have changed, which theories have been used, and what disputes have emerged in practice. The review finds a movement from digitizing processes, to prediction and recommendation, and then to governance of values and responsibility. Chinese research has concentrated on implementation and organizational transformation; international research addressed discrimination, labor control, rights, and accountability earlier. A five-level framework links technological conditions, organizational arrangements, individual responses, value constraints, and management outcomes. Five recurring tensions are then examined: efficiency and fairness, data use and privacy, automation and human communication, rapid technical change and organizational capacity, and quantitative indicators and contextual judgment. The article concludes that model performance alone cannot determine whether AI-enabled HRM is responsible. What matters is how outputs enter decisions, who may question them, and who remains accountable. High-impact decisions should therefore be subject to differentiated risk controls, genuine human review, understandable reasons, appeal routes, employee participation, and auditable responsibility.

Keyword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intelligent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algorithmic governance; human-AI collaboration; literature review

资源拼凑理论视角下大学生非遗文创创业机制研究 ——以佛山联和社区为例

鲍思桦，柳仪

(广东东软学院，广东 佛山 528225)

摘要：突破传统资源约束、推进跨界融合型商业模式创新，是激活非遗文化生态、培育文创领域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路径。本文以资源拼凑理论为核心，结合生态系统理论动态演化逻辑，构建“手边资源识别—将就使用—创造性重构”分析框架，以佛山联和社区大学生非遗文创创业为案例，探究资源拼凑驱动商业模式创新的内在机制。研究发现，面对资金技术匮乏、非遗技艺传承断层、社会网络薄弱等创业困境，大学生创业者依托资源拼凑盘活乡村存量文化资源，通过认知重塑打破固有资源依赖，以敏捷试错验证创业可行性，借助网络拼凑实现多方价值共创，成功打造出集体验引流、IP赋能、产品变现于一体的复合型文创商业模式。本文突破传统静态研究范式，立足“认知—行动”动态演化视角展开分析，为破解非遗传承难题、赋能青年文创创业、构建非遗文创协同创新生态提供了理论参考与实践借鉴。

关键词：资源拼凑；生态系统；大学生创业；非遗文创；新质生产力

基金项目：广东大学生科技创新培育专项资金资助项目(pdjh2025bw268)；广东省教育厅特色创新项目(2025WTSCX134)；广东省普通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2022WZJD010)；教育部产学研合作协同育人项目(250702874131445)；广东东软学院校级科研团队(2024XKYTD05)

DOI: doi.org/10.70693/202607153753

一、问题提出

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与新质生产力蓬勃发展的背景下，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乡村文化记忆的载体，承载着民族认同与历史延续的双重价值。新质生产力以新技术深化应用为驱动，通过生产要素的创新组合与高效配置，重塑了人才培养模式与产业协同逻辑^[1]。在此背景下，具备跨学科知识、创新思维与数字技术应用能力的大学生群体，既是新质生产力的核心主体要素^[2]，亦是推动非遗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关键行动主体^[3]。大学生投身非遗文创创业，构筑了连接乡村文化传承与区域经济振兴的微观纽带，更是文化产业转型升级的微观基础。然而，区别于常规企业的成长路径，大学生非遗文创创业有着高度情境化的资源禀赋与成长逻辑。面对资源约束环境，其如何通过资源重构突破发展瓶颈、激活内生动力并实现可持续成长成为关键议题。

既有研究表明，大学生非遗文创创业深陷多维现实困境^[4]。具体而言，在资源禀赋层面，非遗传承面临核心传承人老龄化与青年人才断层并存的窘境，大学生创业者虽有创新思维，但普遍受制于传统工艺技能储备不足、资金匮乏及社会网络薄弱等资源短板^[5]；在转化机制层面，地方文化资源向经济增量转化时，易陷入产品开发表层化、数字化转型滞后及商业模式固化等结构性瓶颈^[6]；在生态系统层面，当前创新创业生态系统存在多元主体合力驱动效能不足、校企协同滞留于浅层合作等问题，致使创新资源难以实现跨组织的有效流动与重组^{[2][7]}。面对上述多重约束，大学生创业者如何突破非遗文创创业场景的资源壁垒，实现从“文化存量”向“经济增量”的创造性转化，构成了一项具有重要理论与现实意义的命题。资源拼凑理论为解析此困境提供了合适的切入视角。该理论指出，面临资源约束的创业者可通过现有资源的“将就”利用与创造性重构，整合实物、人力、技能及制度等要素，进而突破资源束缚并把握创业机会^{[4][8]}。伴随资源拼凑理论研究深化，资源拼凑逐渐被拓展至多元主体的动态演化分析：一方面，拼凑行为作为转化机制，创业者的信息获取、资源整合与机会识别能力构成了支撑其拼凑

作者简介：鲍思桦(2003—)，女，本科，就读于广东东软学院工商管理专业；

柳仪(1988—)，女，硕士，副教授，研究方向：数字经济、创新管理。

行动的关键变量^[9]；另一方面，资源拼凑能增强组织韧性以抵御创新风险，并驱动商业模式创新，促使手边资源高效转化为新的价值主张^[10]。文旅融合场域的研究亦证实，小微企业可借由“文化拼凑”策略塑造组织韧性以应对环境冲击^[11]。由此可见，资源拼凑不仅是资源利用行为，更是驱动价值创造与商业模式创新的综合性机制。

从以上文献回顾可以看出，关于大学生文创业与资源拼凑理论研究成果颇丰，但仍存在可深化研究空间。其一，在实践层面，现有研究多侧重宏观政策分析或单一资源开发路径^[6]，鲜少立足新质生产力背景，动态剖析大学生微观主体如何整合高校智力、非遗技艺与数字技术三类核心资源以开展拼凑实践。其二，在理论机制层面，既有探讨多聚焦资源拼凑对创业成效的直接影响或校企协同的单向赋能^[7]，未能深刻揭示拼凑行为演进与商业模式创新间的内在传导机制。其三，在分析视角层面，以往研究多囿于静态的“结构—制度”分析，相对忽视了非遗文创业网络的动态过程及行动者关系联结中的拼凑行为演化。

相较于既往研究，本文的边际贡献在于：第一，在研究内容上，依托资源拼凑理论，结合生态系统理论动态演化逻辑，构建“手边资源识别—将就使用—创造性重构”分析框架，动态揭示大学生创业者在资源匮乏情境下，如何识别并整合高校智力、非遗技艺与数字技术等手边资源，打破常规将其应用于非遗文创场域，进而驱动商业模式创新的内在机理。第二，在理论视角上，将资源拼凑理论的经典内核引入非遗传承与大学生创业的交叉领域以拓展其应用边界，并在既有研究基础上，进一步阐释传统文化要素与现代数字技术相融合的拼凑行为在非遗场域中的独特价值。第三，在实践路径上，突破将大学生视作被动受教育者的传统预设，将其重构为激活乡村文化生态与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行动者，为破解非遗传承断层、提升大学生创业成效及构建协同创新生态系统提供理论参考与实践路径。

二、理论框架与研究方法

（一）理论基础

资源拼凑理论由 Baker 和 Nelson（2005）系统提出，强调行动者在资源约束环境下通过对“现有资源”的创造性“将就”与重构来突破发展瓶颈，这一理论将焦点从传统资源基础观（RBT）所强调的“目标导向”与获取“最优资源”的逻辑，转向“手段导向”的“满意决策”与“现有资源的创造性利用”^[4]，为解析大学生非遗文创业中如何将分散的高校智力、非遗技艺、社会网络等“手边资源”转化为新价值提供了合适的理论基础^[7]。资源拼凑理论已广泛应用于新创企业成长、返乡青年创业及商业模式创新等研究^{[4][9][10]}，其核心在于通过人力、网络、制度乃至文化拼凑^[11]整合资源，驱动商业模式创新^[10]。

在此基础上，本文引入生态系统理论进一步拓展分析维度。该理论源于生物学，后被引入管理学与教育学领域，用于描述多元主体与外部环境相互作用的复杂演化系统，其核心运作依赖于“群落—外部环境相互作用”、“物质循环与能量流动”以及“生态位”等机制^[13]。在创新与创业研究中，该理论强调系统内各主体并非孤立存在，而是通过资源共享、信息互通形成具备开放性、协同性与动态适应性的有机整体^{[1][2]}。这与大学生非遗文创业机制研究高度适配，原因如下：大学生非遗文创业机制研究涉及高校、企业、政府、非遗传承人及乡村社区等多重主体，生态系统理论不仅能有效统筹这些多元化要素，更能通过系统视角揭示其动态演进逻辑。不同于仅关注静态主体结构，该理论强调系统是“动态平衡”与“良性循环”的过程^[1]，揭示了非遗文创业系统如何通过反馈机制适应环境变化，并借助人才、技术等要素的“物质循环与能量流动”实现自我调节与生态位优化^[13]。这种动态演进视角能够有效解析大学生创业项目从初创期资源拼凑、发展期能力构建到成熟期商业模式创新的全过程适应机制，从而为构建可持续的“政企校村”协同网络提供更具解释力的理论框架。

（二）分析框架

基于资源拼凑理论与生态系统理论的核心逻辑，本文构建了“手边资源识别—将就使用—创造性重构”的演化分析框架，以动态揭示商业模式创新的驱动机制。首先，手边资源识别作为逻辑起点，强调创业者突破常规认知，重新审视并评估身边分散资源的潜在价值；其次，将就使用是实践展开环节，指在不追求最优资源的前提下，打破常规进行低成本应用，以有效规避初创期的高昂试错成本并实现初步商业化落地；最后，为新目的整合资源构成价值跃升阶段，创业者以商业创新为目标，对前期要素进行深度重组与跨界融合，同时依托生态系统联结多元主体构建协同网络，推动资源跨组织流动与共生共创，进而实现商业模式的迭代升级与文化资源向经济价值的有效转化。

（三）研究方法 with 案例选择

本文采用单案例纵向研究方法，选取佛山市南海区联和社区大学生非遗文创业项目作为典型案例。该案例的选择主要基于以下三个原因：在情景上，该项目处于典型的资源约束环境，且周边蕴含丰富的传统文化底蕴与

可整合的创业要素,符合资源拼凑理论应用的前提;在对象上,其聚焦于大学生创业群体,并展现出多元主体协同参与的特征;在过程上,该项目完整呈现了从资源识别、将就使用到创造性重构以驱动商业模式创新的动态演化轨迹。基于此,采用单案例纵向研究能够深入剖析复杂情境下的动态演化机制,精准捕捉资源拼凑行为随时间推移的阶段性特征,进而系统验证资源拼凑行为演进与商业模式创新间的内在传导机制。

三、案例概况

本研究以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联和社区为典型案例。该社区位于罗村东部,总面积 3.86 平方公里,下辖 21 个村民小组。社区历史可追溯至明清时期,2013 年南海区区域调整后归并入狮山镇管辖。社区拥有金箔锻造、舞狮等特色非遗技艺,承载着广府地区传统民俗。当前,联和社区正积极明确改造主体与发展定位,规划向特色文化产业示范区、人居环境改善示范区和村级工业园改造提升示范区转型。然而,在这一深度的乡村转型进程中,社区的文化发展深陷资源约束,其现实困境直接映射在文化资源利用的各个环节。

(一) 资源的识别层面

社区现有的非遗文化要素呈现碎片化与传承断代问题。社区现存 18 座广府民居以及 4 座宗祠,其中吴氏宗祠的历史可追溯至明成化年间(1465-1487 年);金箔锻造技艺可追溯至明清时期,至今已历五代传承记录。但因学习周期长、过程艰苦,受多元文化和经济利益影响,年轻人大量外流,核心传承人呈现老龄化特征,创业所依赖的核心技艺资源面临后继无人风险。同时,社区内外来人口超户籍人口两倍,新老居民混居,新居民带来新观念但对本地传统文化了解有限,老居民则对传统坚守,文化背景与价值认同存在隔阂,导致本地传统文化底蕴、手工艺人经验等潜在要素较为分散。这种客观存在的断层与隔阂,使得社区内丰富的文化资源难以被有效评估和梳理,无法转化为成体系的“手边资源”以供后续开发。

(二) 资源的初步应用层面

社区现有的文化转化路径较为落后。目前,社区非遗文化传播高度依赖口口相传、传统节日活动及村内宣传栏等传统方式,新兴媒体渠道利用率较低。社区内图书馆藏书陈旧、文化活动中心设备老化,文化设施效能低下。尽管近年来取得了一定突破,如吴氏宗祠每年吸引超 2000 人次游客和学者参观,第四代金箔传人推出的文化创意产品年销售额突破 10 万元,但这种转化仍处于初级阶段。2023 年吴氏宗祠修缮工程中,村民自发捐款超 5 万元,缺乏大量外部资金注入。这种客观现状导致社区的非遗文化难以进行低成本的“将就”应用与快速试错。僵化的转化机制和缺乏深度与创新的传播内容,限制了文化产品与外部市场的初步接触,难以实现规模化、有效的商业化落地。

(三) 资源的跨界整合层面

基层社区、非遗传承人、村民及外部机构之间的网络联结多停留在浅层,缺乏“政府引导、市场运作、村民主体”的协同支撑机制。联和社区经济以工业、农业为主,具备一定的产业基础。但在文化话语体系建设方面,优势认知片面,对自然景观等资源价值挖掘不足。非遗传承人虽尝试文创开发,但面临市场推广不足、资金缺乏和专业人才匮乏等多重阻碍,村民对文化产业的认知与参与度较低。这种协同网络断裂的客观环境,致使社区庞大的工业资本与文化资本无法对既有要素进行深度重组,难以推动非遗技艺与现代数字技术、商业模式的跨界融合,制约了文化资源向经济价值的有效转化与商业模式的迭代升级,使得社区的非遗文化在实现“创造性重构”时面临结构性瓶颈。

四、案例分析

基于资源拼凑理论与生态系统理论的核心逻辑,本研究将联和社区大学生非遗文创业实践划分为“手边资源识别”“将就使用”和“创造性重构”三个演化分析阶段。在面临资金不足、社会网络薄弱等客观限制下,大学生创业者依托高校背景与青年群体特质,通过这三个阶段的拼凑实践,将联和社区内的文化要素转化为商业价值,体现了资源拼凑理论在大学生非遗文创业的具体应用。

(一) 手边资源识别:要素价值重估与创业资源池构建

手边资源识别是资源拼凑行为的逻辑起点,其核心在于创业者于资源约束情境下对既有要素价值的重新审视。与传统商业逻辑对“最优资源”的追求不同,大学生创业者依托青年视角,对联和社区内的现有要素进行了再界定。具体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非遗文化资源的价值再认知

基于对年轻消费市场的认知,大学生创业者将金箔锻造、舞狮等非遗技艺从“老化遗产”的惯性认知中剥离,再界定为具有区域稀缺性的创业资源。这一认知转换使闲置的乡村文化资产得以纳入创业资源体系,并为项目差异化发展提供了基础。

2、高校智力资源的低成本甄别

作为在校大学生,创业团队克服了外部市场获取专业服务的资金困难,将母校网络作为重要的资源来源。团队将数媒专业的IP设计能力、计算机专业的小程序开发能力以及财务专业的管控能力,连同“攀登计划”等扶持资金,识别为可低成本甚至无偿调用的外部支撑,形成了自身优势。

3、在地社会资源的挖掘识别

大学生借助“百千万工程”等社会实践契机进入社区,将社区的行政协调能力、非遗传承人的实操技能、老村民的在地记忆及村集体闲置空地,识别为项目落地不可或缺的在地资源。

通过这三个方面的识别,大学生创业者构建了一个涵盖文化底蕴、高校智力与乡村社会网络的资源库。

(二) 将就使用:低成本即兴试错与商业化初步落地

将就使用是资源约束情境下创业者突破既有资源配置规则、通过权宜性利用与试错探索推动项目落地的关键环节。大学生创业者依托其学生身份所赋予的灵活性,以相对较低的成本实现了商业化雏形的落地。具体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存量物理空间的将就式复用

面临资金约束时,团队并未采取重资产投入方式新建文旅设施,而是凭借“下乡服务学生”这一身份所衍生的信任优势,与社区及宗祠管理方协商,直接借用吴氏宗祠、金箔工坊等既有场地作为实景体验的承载空间。此种以资源置换或低成本租赁方式获取空间使用权的策略,既规避了高昂的建设投入,又保留了场地的历史氛围,从而为商业化体验场景的初步落地提供了低成本的物理空间基础。

2、非遗技艺产品的简易化适配改造

针对传统金箔技艺认知门槛高、体验形式单一的问题,大学生创业者没有追求工业化的大规模生产,而是依托高校数媒专业资源,对非遗技艺进行了简易化的适配改造。将复杂的非遗工序拆解、转化,即兴开发出包含简单工具与操作教程的“金箔DIY体验包”。这种将就现有材料与技术进行轻量化改造的方式,以极低成本实现非遗技艺的产品化包装,有效降低游客参与门槛与项目的试错成本,完成产品商业化的初步验证。

3、数字新媒体渠道的轻量化搭建

在市场推广与客源获取阶段,大学生团队针对缺乏专业营销资金与团队的短板,发挥自身熟悉数字媒体的代际优势,进行渠道的轻量化搭建。团队跳过开发独立应用或高投入营销的常规路径,即兴借助微信小程序等成熟且低成本的基础数字化工具,快速拼凑出预约报名与文创商城系统。这种轻量化的渠道搭建实现了“线上引流—线下体验”商业闭环的初步运转,使项目能够以极低的试错成本有效触达同龄客群与研学市场,真正推动商业化逻辑的落地验证。

(三) 创造性重构:跨界要素融合与商业生态迭代升级

创造性重构是资源拼凑理论中的高阶环节,其核心在于创业者突破既有要素组合方式,将异质性资源进行跨界重组以实现新的商业目的。在完成初步市场验证后,大学生团队以商业模式创新为主导,推动项目从单一体验形态向生态共创模式递进拓展。具体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文化内容与体验形式的跨界融合

大学生团队将自身熟悉的青年文化消费形态与传统文化元素有机整合,突破非遗资源的传统静态展陈模式。团队设计并推出了实景沉浸式剧本杀《谁!偷了我的传家宝》、主题研学路线“岭南古韵知多少”,以及专属IP形象“联联”“荷荷”。在此过程中,原本疏离于现代消费场景的乡村非遗文化记忆被具象化为可参与、可体验的文化产品,实现了非遗内容的年轻化转译与商业化落地。

2、商业模式的闭环迭代

大学生团队对现有要素进行重组,构建“文旅体验引流+文化IP赋能+文创产品变现”的三位一体闭环模式。产品体系按功能划分为基础款引流、进阶款强化互动、高端款聚焦收藏价值。这种分层设计体现了大学生将调研方法与商业实践相结合的能力,实现了从单一文创销售向复合型文旅服务的跨越。

3、多元主体协同网络的构建

在此阶段,大学生的角色从单纯的执行者演变为多方资源的链接者,构建了“政企合作+本地合伙人+高校支持”的协同网络。团队对接政府“非遗活化”与“百千万工程”政策获取资金与规划支持;引导村民以闲置空地

入股成为“本地合伙人”，激活乡村内生动力；并继续整合母校资源进行专业支撑。这一跨界整合机制推动了非遗技艺与现代商业模式的融合，促使分散的乡村文化资源转化为实际的经济收益，最终实现了商业模式的全面升级。

五、机制提炼

（一）手边资源识别阶段的认知重塑机制：打破资源依赖与要素重构

在创业初期，大学生面临资金、技能与社会网络的多重约束，难以通过常规途径获取最优资源。在此情境下，拼凑行为的触发有赖于认知层面的突破。大学生创业者借助跨界思维与青年视角，重新审视乡村非遗资源，将传统技艺与闲置空间从“老化遗产”再界定为具备稀缺性的文化资本；同时，他们突破单一组织边界，将高校智力资源与乡村在地社会网络整合进统一的资源池。这一认知重塑机制使关注重心从“资源匮乏的客观劣势”转移至“现有要素的主观赋能”，促使分散的异质性资源得以重新评估并纳入可控范畴，进而为后续拼凑行动奠定认知基础与要素底座。

（二）将就使用阶段的敏捷试错机制：非标准化组合与可行性验证

在识别手边资源后，项目进入实践落地环节。面对初创期的不确定性，大学生创业者并未追求资源配置的完美形态，而是采取了“将就使用”的敏捷试错机制。该机制强调在不投入高额沉没成本的前提下，对现有要素进行非标准化的组合与简易改造，快速生成最小可行性产品并推向市场。大学生利用自身试错成本低、转型灵活的优势，通过借用现有物理空间、简化非遗技艺门槛以及嫁接低成本数字工具，实现了项目的初步商业化落地。这一机制的核心在于“以行动代替等待”，通过快速的市场反馈验证商业逻辑，既规避了早期重资产投资的风险，又为项目在资源极度受限下的生存与初步发展找到了可行路径。

（三）创造性重构阶段的网络拼凑机制：价值共创与模式跃升

“将就使用”仅实现了初步的商业化落地，而商业模式的全面创新则依赖于创造性重构阶段。在此阶段，大学生的角色从单一的要素组合者演变为多方资源的链接者，其拼凑行为从个体层面的资源利用扩展至网络层面的价值共创。一方面，大学生以新商业目的为导向，将传统文化内容与现代消费形式深度融合，实现了非遗文化符号的跨界重构与产品化转译；另一方面，他们依托生态系统逻辑，构建了多元主体协同的共生网络。通过引导政府政策、乡村闲置资产与高校智力资源的跨组织流动，打破了传统非遗传承中合作浅层化的瓶颈。这种网络拼凑机制促使分散的资源实现深度耦合，推动项目从单一的体验销售向多维闭环的复合型商业模式跃升，最终完成了价值创造的根本性跨越。

综上所述，大学生非遗文创创业的成长逻辑，是认知重塑、敏捷试错与网络拼凑三个机制层层递进、相互耦合的结果。这一机制揭示了资源拼凑行为演进驱动商业模式创新的内在传导逻辑，也证实了大学生群体作为核心行动主体，在突破资源壁垒与激活非遗文化生态中的关键能动作用。

六、结论与展望

本研究基于资源拼凑理论与生态系统理论，以佛山联和社区为例，揭示了大学生非遗文创创业在资源约束下的成长逻辑与内在机制。研究表明，大学生非遗文创创业的成长是资源拼凑行为在“手边资源识别—将就使用—创造性重构”框架下动态演进的结果。这一过程由认知重塑、敏捷试错与网络拼凑三个机制相互耦合，共同驱动商业模式创新。大学生创业者打破资源依赖，通过低成本试错验证商业逻辑，并构建多元协同生态实现价值共创。大学生群体在非遗文创创业实践中并非被动受教育者，而是依托跨界思维与数字化能力激活乡村文化生态的核心行动主体，有效推动了非遗文化从“存量”向“经济增量”的创造性转化。

本研究虽对资源拼凑驱动大学生创业的内在机制进行了深入分析，但仍存在若干局限，有待后续研究加以完善。其一，单案例研究设计限制了结论的外部效度，后续可通过多案例比较或大样本实证研究加以验证。其二，关于新质生产力背景下数字技术等新兴要素在拼凑过程中的具体赋能路径，本文讨论尚不充分，未来可进一步考察其与资源拼凑的交互作用如何影响协同网络的演化。其三，商业模式创新具有持续演进特征，横截面数据难以捕捉其动态变化，后续可采用纵向跟踪设计，长期观察拼凑行为在企业成熟期或外部环境突变时的演化特征，并分析其模式迭代逻辑，以推进资源拼凑理论的动态发展。

参考文献：

[1] 乔宁宁. 新质生产力视野下金华地区产教融合协同创新生态系统构建研究[J]. 创新创业理论研究与实

践,2025,8(20)191-195.

[2]王翔. 新质生产力背景下大学生创新创业生态系统构建的要素、困境与优化策略[J].广东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26,24(1)71-75.

[3]樊荣. 大学生非遗手工艺创业赋能乡村传统文化传承的策略[J].农村科学实验,2026,(8)23-25.

[4]祝振铎,李新春.新创企业成长战略:资源拼凑的研究综述与展望[J].外国经济与管理,2016,38(11):71-82.

[5]孙银燕.基于文创行业视角的大学生创业现状研究:以Z校为例[D].浙江工业大学,2017.

[6]吴玉燕. 地方文化资源赋能创新创业的路径与模式研究——以温州市平阳县为例[J].品位·经典,2026,(7)107-109.

[7]克琴. 校企协同创新对大学生创业能力的影响研究——基于资源拼凑的中介作用[J].沿海企业与科技,2024,29(3)63-72.

[8]Baker T ,Nelson E R .Creating Something from Nothing: Resource Construction through Entrepreneurial Bricolage[J].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2005,50(3)329-366.

[9]林秋香,陆继霞. 资源拼凑、能力建构与返乡青年创业[J].东岳论丛,2024,45(9)82-91.

[10]徐紫璇.资源拼凑对商业模式创新的影响研究[D].江西财经大学,2025.

[11]陈攀,司崑. 危机情境下旅游小微企业组织韧性形成机制研究——基于动态能力与资源拼凑的双重视角[J].旅游导刊,2026,10(1)50-74.

[12]常悦,李北伟,李桃. 数字时代下欠发达地区产学研合作协同创新研究——基于资源拼凑理论视角[J].经济纵横,2023,(9)103-110.

[13]高建胜. 地方应用型高校产教融合协同育人生态系统构建研究[J].华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6,26(3)87-95.

Mechanisms of University Students' ICH Cultural and Creative

Entrepreneurship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source Bricolage: A Case Study of

Lianhe Community, Foshan

Bao Siye, Liu Yi

(Guangdong Neusoft Institute, Foshan, Guangdong)

Abstract: Overcoming conventional resource constraints and advancing cross-sector integrated business model innovation are critical pathways for revitalizing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CH) ecosystems and cultivating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in the 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ies. Drawing on resource bricolage theory and incorporating the dynamic evolutionary logic of ecosystem theory, this study constructs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of “identification of resources at hand—making do—creative reconfiguration.” Taking the ICH-based cultural entrepreneurship initiative by college students in Lianhe Community, Foshan, as a case, the paper examines the mechanisms through which resource bricolage drives business model innovation. The findings indicate that, when confronted with capital and technical shortages, intergenerational gaps in ICH craftsmanship transmission, and weak social networks, student entrepreneurs activate idle rural cultural assets through bricolage. They break path-dependent resource reliance by reframing cognitive schemas, validate entrepreneurial feasibility through agile experimentation, and orchestrate multi-actor value co-creation via network bricolage. In doing so, they establish a hybrid cultural business model that integrates experience-led customer acquisition, IP empowerment, and product revenue generation. Departing from static research conventions, this study adopts a dynamic “cognition – action” perspective. It offers both theoretical reference and practical guidance for addressing ICH sustainability challenges, empowering youth-led cultural entrepreneurship, and fostering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ecosystems in the ICH cultural sector.

Keywords: Resource bricolage; Ecosystem; College student entrepreneurship; ICH cultural and creativity; New productive forces

安全共同体视阈下的上海合作组织研究

潘紫萱

(同济大学, 上海 200092)

摘要: 在当前国际政治格局不断演变的背景下, 地区性国际组织在全球治理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上海合作组织作为欧亚地区的重要多边合作机制, 自成立以来, 在维护地区安全与稳定、促进成员国间合作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本文旨在以安全共同体为框架, 探讨上合组织构建安全共同体的动因及挑战, 并提供相关决策参考, 为如何看待上合组织发展趋势及其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拓展新的视角。本文将从动因、挑战和策略方面分析安全共同体视阈下的上海合作组织。

关键词: 上海合作组织; 安全共同体; 动因; 挑战; 策略

DOI: doi.org/10.70693/202607141885

一、引言

在全球化背景下, 国际政治格局复杂多变, 地区性国际组织在应对全球性挑战、维护地区稳定中扮演着关键角色。上海合作组织自 2001 年成立以来, 通过深化成员国间的安全合作, 为地区和平与稳定作出了积极贡献。然而, 面对国际形势的新变化, 如何进一步提升影响力和凝聚力, 成为其亟待解决的问题。安全共同体理论为此提供了新的分析视角, 强调通过制度化的合作与信任构建, 实现成员国间的长期和平与稳定。因此, 本文将全面探讨上合组织在安全共同体视阈下的发展动因、面临的挑战及应对策略, 旨在为相关决策者提供理论支撑与政策启示, 同时也为上合组织及同质性组织的发展提供有益参考。

二、安全共同体

(一) 安全共同体的核心意涵

安全共同体的核心理念最初源自 20 世纪 50 年代理查德·瓦根伦 (Richard W. Van Wagenen) 的构想, 经由卡尔·多伊奇 (Karl W. Deutsch) 等学者的理论化发展成型。冷战结束后, 建构主义学者如阿德勒 (Emanuel Adler) 与巴尼特 (Michael N. Barnett) 在多伊奇等人的基础上, 对安全共同体概念进行了再界定与分类。综合多位学者及理论流派的见解, 本文界定的安全共同体, 特指由主权国家构成的跨国区域, 其中成员国共享一种“共同体意识”, 并拥有坚实的制度与实践基础, 以保障内外部对“和平变革”的稳固预期。

(二) 上合组织与安全共同体

尽管上合组织安全共同体的正式构想提出较晚, 但学术界早有声音指出, 自成立以来, 上合组织在欧亚地区安全合作中的角色演变已显现出安全共同体的特征。结合安全共同体的特征与上合组织的实际情况, 本文认为上合组织属于安全共同体的范畴。在上合组织框架内, 成员国严格遵守不诉诸武力的原则, 以和平手段解决争端, 且组织内部不存在独立的竞争性军事力量。与此同时, 上合组织秉持以“上海精神”为核心的合作理念, 并不断丰富其内涵, 促进了成员国对组织的集体认同感。

三、上合组织构建安全共同体的动因

(一) 地缘政治

该观点认为, 随着地区大国与霸权力量间的竞争日益尖锐, 上海合作组织在中俄两国的引领下加速了安全协作的步伐, 旨在扩大自身影响力并削弱域外大国在本区域内的存在。中俄两国在推动上合组织的创立与壮大过程

作者简介: 潘紫萱(2002—), 女, 硕士, 研究方向为国际关系。

通讯作者: 潘紫萱

中发挥了核心作用,因此两国自然成为组织内的安全协作的主导力量。这一动向体现了中俄意图将上合组织构建为一个地区性的平衡架构,用以制衡美国的影响力。与此同时,中亚成员国则利用上合组织作为平台,在中俄两大力量间寻求策略性的平衡。上合组织安全合作的最新进展及强化趋势预示着它可能逐步演变为一个成熟的安全集团。²在此背景下,上合组织被视为一个针对西方国家的安全联盟,其反对霸权主义的言论及联合反恐军事训练活动被解读为对西方的一种对抗姿态,上合组织深化安全合作的动力来源于地区大国与域外大国间的力量博弈。

(二) 成本收益

该观点指出,成员国基于成本与收益的考量,倾向于推进安全合作以应对区域安全挑战,确保其国家安全不受侵害。区域安全局势的恶化促使安全合作机制向更高层次发展,上合组织的安全合作机制也随之从传统安全范畴向非传统安全领域延伸。成员国加入上合组织的重要动因在于其能够有效缓解区域安全威胁、捍卫国家主权独立,其中反恐合作带来的显著成效尤为吸引中亚国家。当前,上合组织提供的区域安全公共产品主要有军事互信机制、地区反恐机制、地区禁毒机制、信息安全合作机制、执法安全合作机制、上合组织——阿富汗联络组机制六大方面。³简而言之,成员国在多边安全合作框架内共享的利益,构成了推动上合组织发展的制度性驱动力。

(三) 价值观念

该观点强调,上海合作组织在安全合作领域的进展与其安全共同体的构建紧密相连,其中“新安全观”与命运共同体理念构成了上合组织安全协作的核心价值观念。在社会化的进程中,上合组织内部逐渐萌生了安全共同体的意识。伴随着组织机制的持续演进,“新安全观”日益成为推动上合组织安全合作的关键理念基础,促使成员国在构建安全共同体方面的意愿显著增强。2018年6月,习近平主席首次提出“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⁴可以说,“新安全观”与命运共同体理念不仅丰富了“上海精神”的内涵,还为上合组织安全共同体的构筑提供了强大动力。

四、上合组织构建安全共同体的挑战

在应对安全挑战与缓和地区冲突的过程中,上海合作组织的初创成员国围绕中国与俄罗斯两国的长期协作,将彼此间的相互信任外化,逐步建立了一系列制度性安排。中亚地区作为上合组织的核心区域,也维持了相对稳定的局面。与此同时,各成员国通过社会互动进程,将“上海精神”的核心价值内化于心,形成了较为松散的集体身份认同。然而,上合组织所采取的开放策略预示着其成员构成将不可避免地经历扩大,为上合组织安全共同体的构建引入了一系列新的难题。成员国对上合组织的认知日益趋于多元化,这些变化对初创成员国间既有的制度化信任构成了挑战。

(一) 成员国的边界争端

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间的争端,尤其是历史遗留的边界问题,对构建安全共同体构成了重大挑战。这些争端不仅反映了成员国间复杂的历史纠葛和地缘政治利益冲突,也考验着上合组织作为地区合作机制的有效性和韧性。

自苏联解体以来,中俄及中亚国家便面临着重新界定国家边界的艰巨任务。尽管通过签署一系列军事信任与裁军协定,以及创立“上海五国”机制,中俄与中亚三国间的边界划分取得了初步进展,但这种合作并未能彻底消除中亚国家间的边界争议。吉尔吉斯斯坦与塔吉克斯坦之间的边界争端尤为棘手,两国因边界不清多次爆发冲突,这些冲突不仅造成了人员伤亡,也严重破坏了地区稳定与安全,成为上合组织内部难以忽视的裂痕。

印度与巴基斯坦的加入进一步复杂化了上合组织成员国间的领土争端格局。中印边界争议,这一源自英国殖民时期的历史遗留问题,至今仍未得到正式解决。在印度加入上合组织后,中印在2017年、2020年先后发生了洞朗对峙事件和加勒万河谷冲突。⁵这些事件不仅加剧了双边关系的紧张,也对上合组织内部的和谐与合作构成了挑战。

印巴之间的边界争端则更加根深蒂固,克什米尔地区的归属问题一直是两国冲突的焦点。自独立以来,印巴两国为争夺克什米尔主权已爆发多次战争和冲突。加入上合组织后,两国在克什米尔地区的争端非但没有缓解,

² 李进峰.上海合作组织 20 年[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 238-240.

³ 陈小鼎,王翠梅.扩员后上合组织深化安全合作的路径选择[J].世界经济与政治,2019,(3): 113-115.

⁴ 习近平.弘扬“上海精神”构建命运共同体:——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上的讲话(2018年6月10日,青岛)[N].人民日报,2018-06-11,(003).

⁵ 刘若锋.上海合作组织安全共同体的构建:成效、挑战与应对[J].战略决策研究,2024,15(2): 60.

反而因印度撤销印控克什米尔自治权的决定而进一步激化,导致双边关系陷入低谷,地区安全形势骤然紧张。这一争端不仅影响了两国的正常交往与合作,也对上合组织内部的团结与稳定构成了潜在威胁。

(二) 成员国的多元认知

上海合作组织作为欧亚地区重要的多边合作机制,自成立以来,在促进成员国间的安全与稳定、经济合作及人文交流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然而,成员国对上合组织的认知差异,成为影响其深入发展与集体认同构建的关键因素。这种认知差异不仅源于成员国间的异质性,更与各自独特的利益诉求及地缘冲突紧密相关,对上合组织的未来发展带来了诸多挑战与影响。

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间的集体认同强度,深受各成员对本组织认知差异的影响。当前,除中国外,其余成员国对上合组织的认同尚存较大的提升空间,这种认知差异主要体现在对组织的认知积极与否、利益诉求大小以及有无具体行动。⁶具体而言,“认知”涉及利用上合组织解决成员国间冲突的看法,“利益诉求”关联加入上合组织所期望获得的益处,“行动”则是指基于认知并旨在实现利益诉求所采取的措施。中国、俄罗斯和中亚国家在文化、历史和地缘政治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这些差异使得它们在看待上合组织的作用和定位时存在分歧。中国视上合组织为推动新型国际和地区秩序理念实践的重要载体,积极参与其各项活动,致力于推动其发展;而俄罗斯虽对上合组织持正面看法,但并未将其视为提升决策能力和发挥实质性作用的核心平台,更多地聚焦于安全领域的合作;中亚国家则主要关注应对非传统威胁、解决地区争端以及维护国家主权与稳定等方面的利益。新加入的成员国,如巴基斯坦、印度和伊朗,则更加关注经济、安全和政治等方面的利益,期望通过上合组织平台实现各自的国家战略目标。

这种认知差异不仅体现在成员国对上合组织功能和作用的想法上,更在合作实践中产生了分歧和争议。不同成员国在加入上合组织时,都有其特定的利益诉求,这些利益诉求的差异使得成员国在合作中难以达成共识,影响了上合组织的整体效能。例如,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的争端以及中亚国家间的地缘政治利益冲突,使得成员国之间难以形成统一的认知和行动,限制了上合组织在处理地区事务时的效能和影响力。此外,成员国对上合组织的认知差异还可能导致其与其他国际组织的合作与交流受阻。不同成员国对上合组织的认知和定位不同,可能导致其与其他国际组织合作时存在分歧和争议,从而限制了上合组织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和话语权。这种认知差异不仅影响了上合组织的内部合作,更对其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和影响力产生了不利影响。

五、上合组织构建安全共同体的策略

(一) 完善调解机制

在《上海合作组织宪章》的框架下,成员国间的争端需遵循磋商与协商的和平解决路径。尽管各成员国致力于通过政治对话来调和领土、资源等领域的分歧,但此类争端往往根深蒂固,难以迅速化解。加之相应调解机制的缺失,现有的分歧与争端潜藏着升级为冲突的风险,这对上合组织成员国间信任关系的可持续性构成了挑战。学术界已对上合组织争端调解机制的必要性与可行性进行了深入探讨,并建议结合组织实际情况,构建包括设立“争端预防中心”在内的预防机制、以“反协商一致”原则为核心的管控机制以及灵活运用“协商一致”原则,建立协助解决争端小组的机制在内的“三位一体”争端调解机制。⁷自成立以来,上合组织已确立了年度元首峰会、联合反恐军演等机制,有效缓解了创始成员国间的潜在紧张态势。然而,随着印度、巴基斯坦等新成员的加入,它们原有的争端也被纳入上合组织的讨论范畴,且至今尚未得到妥善解决。因此,构建一套切实可行的争端调解机制,已成为上合组织亟需正视的议题。

一方面,可组建一个多元化的分析小组,成员涵盖争端当事国及其他成员国、观察员国和对话伙伴国的专家学者。该小组将深入研究相关原始文件,并利用上合组织论坛这一“二轨”外交平台,围绕新老成员国间的争端等议题展开讨论。目前,上合组织论坛的议题多聚焦于数字经济、青年创新创业等低政治领域,但组织的长远发展实则高度依赖于政治、安全等高政治领域的稳定。因此,未来论坛可增设专家分析小组,专注于探讨领土、边界等关乎成员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为成员国间的争端调解提供策略建议,供元首理事会审议并形成具体实施方案。

另一方面,依托上合组织现有的国家协调员理事会,可设立冲突调解中心,定期召集包括第三方在内的边防部门负责人会议,在不干涉内政的前提下交流边境冲突解决经验,提出建设性意见。以印巴冲突为例,两国在克什米尔地区的归属问题上存在长期争议,但双方均认识到通过对话和外交途径解决争端的重要性。近年来,印巴两国在国际社会的斡旋下,已多次举行和平对话和高层会晤,努力缓解边境紧张局势,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尽

⁶ 李孝天,陈小鼎.上海合作组织参与地区安全治理的特征、限制与改进路径[J].太平洋学报,2021,29(9): 35.

⁷ 王陈生,王树春.构建上合组织内部争端解决机制探析[J].新疆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50(3): 54-55.

管问题尚未完全解决,但双方的积极互动和外交努力表明,成员国间保持开放和建设的沟通态度对于解决复杂边界问题至关重要。

(二) 拓展共同利益

上合组织成员国间的合作基础根植于边境安全、联合反恐以及经济合作三大支柱,这些领域的协作不仅反映了组织成立的初衷,也是维系其长期发展与稳定的关键。上合组织的成立最初源于中国与其他成员国对于边境安全问题的共同关切,边境争端的和平解决与稳定成为所有参与国的共同利益所在。随着边界安全挑战的逐步缓解,打击中亚地区肆虐的“三股势力”——民族分裂主义、国际恐怖主义及宗教极端主义,逐渐成为了推动上合组织发展的新动力与成员国间的普遍共识。特别是“9·11”事件后,中亚安全局势因塔利班政权的覆灭而趋于稳定,尽管上述威胁依旧存在,但其紧迫性与致命性已大为减弱。加之美国在中亚的反恐军事部署,为地区国家提供了新的安全屏障,这一变化促使上合组织成员国在安全领域的共同利益格局发生了微妙调整。在此背景下,中国作为上合组织的重要成员,面临着如何进一步拓宽共同利益基础、确保组织活力的挑战。

长远来看,经济合作或可成为推动上合组织持续发展的最强动力,也是构建未来成员国间最主要共同利益的基础。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合组织比什凯克峰会上提出的建立上合组织能源俱乐部的倡议,以及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发表的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演讲,均为深化区域经济合作、促进欧亚地区经济一体化提供了战略指引与新契机。这些倡议旨在构建更加紧密的经济联系与发展空间,为成员国经济发展创造有利条件,同时也为上合组织框架下更广泛的区域经济合作开辟了新路径。中国与上合组织其他成员国在经贸领域的合作潜力巨大,已经成为俄罗斯的第一大贸易伙伴,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的第二大贸易伙伴。⁸然而,尽管经贸往来快速增长,成员国间的经济相互依赖仍处于初级阶段,远未形成利益共同体。这主要归因于合作领域的局限性、成员国经济实力的差异、互信机制的不足以及在某些领域的竞争,这些因素制约了多边合作的深入发展。

为应对上述挑战,中国需采取更加积极的策略,不仅要在上合组织框架下主持和推动具体的经济合作项目,还要利用自身在经济改革与市场空间方面的优势,帮助中亚成员国解决制约其经济发展的共性问题。这包括但不限于提供技术支持、资金援助以及分享发展经验,以促进中亚国家经济结构的优化与升级。同时,中国应适度采取“利益共享”策略,通过提升中亚国家的经济收益,促进其社会制度的完善,从而深化上合组织内部的合作基础与共同利益。目前,一系列重大能源合作项目已相继投入运营,标志着上合组织区域大能源合作网络已初具规模,为成员国间的经济合作与相互依存打下了地基。通过持续深化经济合作,上合组织成员国间的共同利益将进一步扩大,相互依存程度将不断加深,为最终构建安全共同体奠定坚实基础。

(三) 深化集体认同

集体认同作为构建安全共同体基石,其重要性不言而喻。集体认同的形成,不仅关乎组织内部的凝聚力与成员归属感,也是确立组织边界、获得外界认可的关键。尽管上合组织在构建集体认同的进程中仍面临诸多困难,但通过持续努力,中国有望在其中发挥引领作用,推动集体认同的深化。

首先,理论基础的构建是深化集体认同的首要任务。尽管各成员国在民族、宗教、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等方面存在差异,但“上海精神”的提出与弘扬,为上合组织集体认同的形成提供了重要支撑。这一精神体现了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核心价值,已初步获得各成员国的广泛认同。因此,中国应充分利用各种组织内外及国际场合,进一步宣扬“上海精神”,强化其作为集体认同理论基础的地位。通过深化对“上海精神”的理解与认同,各成员国将能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一起,为构建安全共同体奠定坚实基础。

其次,增进成员国间的沟通与互信是深化集体认同的关键环节。中国应致力于拓宽成员国间的联系渠道,完善多层次的会晤与协商机制。通过定期举办各类会议、论坛等活动,促进成员国在政治、经济、安全等领域的深入交流与合作。这些努力将有助于各成员国充分了解彼此的战略意图、行为方式及文化背景,进而增进相互之间的理解与信任。互信的增强将促进成员国在更多领域开展合作,强化上合组织的凝聚力与整体实力,为集体认同的发展提供有力保障。在增进互信的过程中,中国尤其需要重视与俄罗斯的关系。作为中亚地区的重要力量,俄罗斯对上合组织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中国需要以各种积极的姿态向俄罗斯表明中国在中亚建立睦邻稳定带的努力,与俄罗斯视中亚为“特殊利益区”并无根本利益的冲突。⁹双方应共同努力,实现高度互信与多领域合作,为其他成员国树立榜样,增强它们对上合组织的信心与认同感。

⁸张根海.“上海合作组织”区域合作机制:一个新的视角[J].学术论坛,2012,35(9): 55.

⁹张磊.迈向地区安全共同体的上海合作组织[J].军事政治学研究,2014,(1): 96.

此外,加强文化交流与合作也是深化集体认同的重要途径。文化作为连接各成员国的纽带,具有独特的魅力与力量。上合组织自成立以来,已在文化、教育等领域取得了显著成绩,但仍需进一步深化合作。中国应推动上合组织积极开展多边文化交流活动,形成政府倡导、民间积极参与的人文合作模式。通过加强在文化、教育、环保、科技、传媒、旅游等领域的合作,推动文化交流的市场化进程,增进各成员国人民之间的了解与友谊。这将极大地促进集体认同的发展,为构建安全共同体提供强有力的文化支撑。

六、结语

通过对上海合作组织在安全共同体视阈下的研究,我们可以看到,上合组织在促进地区安全合作、维护地区稳定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但也面临着诸多挑战。边界争端、多元认知差异等问题的存在,对上合组织的进一步发展构成了制约。为应对这些挑战,上合组织需要不断完善调解机制,拓展共同利益,深化集体认同,以增强成员国之间的互信与合作。在此过程中,中国作为上合组织的重要成员,应积极发挥引领作用,为构建地区安全共同体贡献智慧与力量。

上合组织在安全共同体视阈下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其在构建地区安全共同体过程中的经验与教训,不仅为自身的发展提供了借鉴,也为其他地区性国际组织的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参考。未来,上合组织应继续坚持“上海精神”,不断深化成员国之间的合作与交流,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为实现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作出更大的贡献。

参考文献:

- [1] 李进峰.上海合作组织 20 年[M].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
- [2] 陈小鼎,王翠梅.扩员后上合组织深化安全合作的路径选择[J].世界经济与政治,2019,(3): 108-134+159-160.
- [3] 习近平.弘扬“上海精神”构建命运共同体:——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上的讲话(2018 年 6 月 10 日,青岛)[N].人民日报,2018-06-11, (003).
- [4] 刘若锋.上海合作组织安全共同体的构建: 成效、挑战与应对[J].战略决策研究,2024,15(2): 47-73+117.
- [5] 李孝天,陈小鼎.上海合作组织参与地区安全治理的特征、限制与改进路径[J].太平洋学报,2021,29(9): 30-42.
- [6] 王陈生,王树春.构建上合组织内部争端解决机制探析[J].新疆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50(3): 48-56.
- [7] 张根海.“上海合作组织”区域合作机制:一个新的视角[J].学术论坛,2012,35(9): 53-57.
- [8] 张磊.迈向地区安全共同体的上海合作组织[J].军事政治学研究,2014,(1): 88-101.

Study on the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ecurity Community

Pan Zixuan

(Tongji University, Shanghai, China)

Abstract:Against the backdrop of the continuously evolving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landscape, regional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are playing an increasingly important role in global governance. As a key multilateral cooperation mechanism in the Eurasian region, the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 (SCO) has, since its establishment, played a positive role in safeguarding regional security and stability and promoting cooperation among member states. This paper aims to explore the motivations and challenges for the SCO in building a security community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security community theory, and to provide relevant policy references, thereby offering new perspectives for understanding the SCO's development trends and its role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SCO under the security community vision from the aspects of motivations, challenges, and strategies.

Keywords: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 Security Community; Motivations; Challenges; Strategies

基于黑龙江特色农产品电商 APP 设计——以“龙田云市”为例

刘雨菲，杜泽鑫

(黑龙江大学艺术学院，黑龙江 哈尔滨 150080)

摘 要：乡村数字化振兴是现代农业发展的核心路径，黑龙江省拥有寒地大米、杂粮、果蔬等优质特色农产品，但长期存在产销信息不对称、本土农产品线上渠道缺失、农户与消费者对接断层等现实问题。本文以黑龙江本土农产品交易需求为出发点，设计“龙田云市”特色农产品电商 APP，整合农产品展示、线上销售、农业信息交互、产地直播、VR 全景溯源多功能于一体。研究通过竞品分析、前期市场调研、用户画像构建、低保真到高保真界面迭代、用户旅程地图梳理完成整套 APP 视觉与交互设计，确立绿色乡土视觉规范、本地化功能架构。

关键词：乡村振兴；农产品电商；APP 界面设计；数字农业；黑龙江特色农产品

DOI: doi.org/10.70693/rwsk.v2i8.647

一、相关概述阐释

本章为全文搭建理论研究基础，分别从政策产业、区域市场、设计学科三个维度梳理现有研究成果与行业发展现状。先解读乡村振兴战略下农产品电商的整体发展趋势，再聚焦黑龙江寒地农产品数字化流通的现存痛点，最后界定农产品电商 APP 设计的核心内涵、设计流程与设计原则，为后文“龙田云市”APP 的设计定位、功能规划提供理论支撑。

1.1 乡村振兴下农产品电商发展概述

在乡村振兴的诸多举措中，发展农产品电商成为推动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繁荣的重要途径^[1]。数字乡村战略推动农业产业数字化转型，农产品电商成为打通农产品上行、拓宽农民增收渠道的关键载体。传统线下农产品流通模式层级繁多，中间商层层加价压缩农户利润，同时消费者难以溯源农产品产地，供需两端信息壁垒突出。

近年来，农产品销售的线上渠道日趋多样。早期以淘宝、京东等大型综合电商平台为主；随后，基于微信等社交工具的社交电商、以社区为中心的社区团购逐步兴起^[2]。国内主流农产品平台分为综合生鲜平台（叮咚买菜、小象超市）与垂直生鲜电商（邮乐、盒马），综合平台侧重城市生鲜即时配送，缺乏黑龙江寒地农产品专属板块；垂直生鲜平台全国化运营，地域特色服务薄弱，缺少适配东北农户产销习惯、贴合本地消费者需求的专属农产品交易平台。在此背景下，面向单一农业大省、聚焦地方特色农产的本地化电商 APP 具备极强市场与社会价值，能够依托地域资源打造差异化数字服务载体。

1.2 黑龙江特色农产品数字化发展现状概述

东北地区的农产品在电商推广方面的能力较为薄弱，主要依赖于参加展会和通过贸易商来拓展销售渠道，传统营销路径依赖制约着价值变现^[3]。黑龙江作为国内粮食核心产区，五常大米、寒地浆果、林下菌菇、东北杂粮等农产品品质优势突出，但数字化流通存在明显短板：第一，产销信息割裂，农户缺乏线上运营渠道，优质农产品难以走出县域；第二，现有电商平台地域适配性不足，缺少产地直播、农田 VR 溯源、本地农户专属入驻通道等特色功能；第三，目标用户分层需求未被满足，学生、工薪家庭、中老年采购群体的选购、使用习惯存在显著差异，通用生鲜 APP 无法精准匹配用户需求。

黑龙江省支持发展直播电商、社交电商、社区电商等新模式新业态，出台了财政补贴、税收优惠等相关支持

作者简介：刘雨菲(2002—)，女，硕士，研究方向为视觉传达与数字艺术设计；

杜泽鑫(2002—)，女，硕士，研究方向为视觉传达与数字艺术设计。

政策,持续推广“直播+农产品品牌”等新模式,将特色产品推向全国,助力乡村振兴^[4]。基于以上现状,打造专属黑龙江本土农产品交易 APP,能够依托数字化手段打通生产端与消费端链路,助力本土农产品品牌化发展。

1.3 农产品电商 APP 界面设计概述

农产品电商 APP 设计融合服务设计、UI 视觉设计、交互设计三大维度,核心目标是降低农户上架、消费者选购的操作门槛。视觉层面多采用绿色、大地色系传递自然、原生态的农产品属性;功能层面需覆盖商品展示、交易支付、产地溯源、直播带货、客服售后、农业资讯等完整闭环;设计流程遵循调研—竞品分析—用户研究—低保真原型搭建—高保真视觉落地—用户体验优化完整逻辑。区别于通用购物 APP,农产品本土电商设计需兼顾两类核心用户:农户(供给端)与消费者(需求端),在交互逻辑、功能模块上兼顾双向使用体验,同时融入地域文化符号,强化平台辨识度与乡土属性。

二、“龙田云市” APP 设计背景与需求分析

本章承接前文理论概述,落地到本次设计项目的现实市场环境,完整完成项目前期调研全流程工作。先明确平台差异化设计定位,再通过横向竞品对比找出现有生鲜平台的功能缺陷,最后依托调研数据构建三类典型用户画像,精准提炼市场空白与用户核心痛点,为后续整体设计实践划定清晰的功能、视觉、交互设计方向。

2.1 设计定位

农产品在经济学上兼具搜寻品、经验品和信任品的三重属性,地标农产品的品质蕴藏在特定地理产区的自然条件与人文积淀中,其与普通产品在外观上可能并无二致,若不借助品牌这一直观载体,其内在的独特性便无从于市场中彰显^[5]。“龙田云市”是聚焦黑龙江全省的综合性本土农产品电商 APP,以消解产销信息差、实现农户与消费者两端直连为核心定位,打造集农产品展示、线上交易、农业信息交流、产地直播、VR 农田溯源为一体的本地化数字服务平台,助力寒地农产品拓宽销路,赋能乡村数字化建设。

2.2 竞品分析

选取四类主流生鲜电商平台开展横向对比:小象超市、叮咚买菜、邮乐、盒马鲜生。首先,小象超市和叮咚买菜,优势为即时配送、城市生鲜品类丰富;短板为黑龙江特色农产品占比低,无农户自主入驻通道,缺少产地溯源、农业资讯板块,地域属性弱;其次,邮乐依托邮政覆盖县域乡村,农户入驻门槛低;短板界面老旧、交互繁琐,直播、VR 溯源等数字化功能缺失;最后,盒马鲜生生鲜品质管控完善,线上线下一体化;短板布局集中一二线城市,下沉市场覆盖不足,东北特色农产分类粗糙。

综合竞品短板,确定“龙田云市”差异化设计方向:深耕黑龙江本土农产品、增设农户直售模块、打造农田 VR 全景溯源、产地实景直播、本地化农业资讯专区。

2.3 用户画像构建

根据农产品移动消费场景,设计中建立了三类典型用户画像。第一类为年轻学生及初入职场群体。这类用户重视价格、优惠活动和操作效率,倾向于通过推荐页面、短视频或直播快速认识商品。第二类为具有稳定收入的城市工作群体,他们更加关注产品品质、配送效率和服务保障,希望通过清晰的信息对比减少选择成本。第三类为家庭型消费者,购买频率相对稳定,更重视食品安全、产地信息、售后服务和长期会员权益。不同用户的需求存在差异,但均关注商品信息是否真实、分类是否清晰、购买路径是否简便以及售后反馈是否及时。因此,设计需要在内容丰富度与界面简洁度之间建立平衡,避免因信息过多造成浏览压力。

三、“龙田云市” APP 整体设计实践

本次“龙田云市”APP 设计立足于黑龙江本土农业特色与双向用户需求,秉持本土化、实用性、数字化、便民化的核心设计理念,从视觉品牌体系搭建、信息架构梳理、原型迭代优化到特色功能落地,完成全维度、系统化的设计实践工作。整体设计摒弃通用电商 APP 的商业化设计逻辑,深度贴合乡村农产品电商的服务属性,兼顾视觉美观性、操作便捷性与功能专业性,打造适配黑龙江农户经营、本土消费者选购的专属数字化平台。

3.1 LOGO 与视觉规范设计

品牌视觉是 APP 的核心视觉标识,也是塑造平台本土化辨识度的关键,本次设计结合黑龙江地域特色与农业平台属性,完成专属 LOGO 设计与整套标准化视觉规范搭建。在 LOGO 设计环节,深度提炼地域与行业核心

元素，融合黑龙江地域缩写“HLJ”、象征原生态农业的绿叶、代表本土种植产业的农田三大核心视觉符号，经过艺术化融合重构形成专属品牌标识。主视觉选用自然绿色作为核心主色调，契合农产品绿色健康、原生态生长的核心特质，传递寒地沃土、天然种植的产品理念，搭配简约的“龙田云市”文字标识，图文结合的形式既强化了黑龙江本土农业的品牌辨识度，也直观诠释了“寒地沃土、云端产销”的平台核心定位。

为保障全平台视觉风格统一、适配全年龄段用户视觉体验，本次设计参考成熟的普惠视觉设计体系，搭建了一套适配农产品电商场景的标准化视觉规范，涵盖色值体系、字体层级、图标样式、导航规则等全方位内容。色彩体系摒弃艳丽花哨的商业化配色，采用大地绿、麦田黄、沃土棕三大自然色系作为核心视觉配色，整体色调质朴清新、贴合乡土农业场景，同时色彩对比度符合移动端视觉适配标准，能够有效适配中老年用户的视觉阅读需求。字体层面搭建多级字号规范，严格区分大标题、导航标题、正文文本、辅助备注文本的字号与字重，保证页面文字层级清晰、重点突出。图标设计统一采用简约线性农业风样式，弱化复杂装饰元素，所有功能图标风格统一、直观易懂，降低用户的识别与操作成本，全方位提升平台视觉质感与使用适配性。



图 1 LOGO 设计

3.2 信息架构与结构框架

科学合理的信息架构是保障 APP 操作流畅、功能清晰的核心基础，本次设计基于用户使用场景与操作逻辑，搭建层级清晰、逻辑通顺、覆盖全面的三级产品信息架构，彻底规避通用电商 APP 功能冗余、层级混乱、查找繁琐的问题。结合农产品电商的核心使用场景，设置首页、分类、直播、我的四大底部主导航栏，四大核心模块分工明确、各司其职，覆盖消费者选购、农户经营、资讯查询、个人管理全场景需求。

首页作为平台核心展示页面，承担流量承接、场景引导与活动展示的作用，页面整合新品活动弹窗、本土特产智能推荐、限时秒杀优惠、农田直播快捷入口等核心板块，优先展示用户高频使用功能与本土特色农产品，让用户进入平台即可快速获取核心服务，提升选购效率。分类页面打破传统单一的品类分类模式，创新采用地域分区+产品品类双维度分类体系，既可以按照黑龙江各地市特色产区筛选农产品，也可以按照米面粮油、杂粮菌菇、寒地果蔬等品类精准检索，贴合本土用户的选购习惯。直播页面聚焦产地数字化展示，整合农户实时产地带货、VR 全景农田溯源两大核心功能，将实景展示与线上交易深度结合，实现“所见即所得”的消费体验。个人中心页面兼顾供需两端用户需求，不仅包含普通用户的订单管理、会员中心、售后客服、优惠券管理功能，还专门增设农户专属入驻通道、店铺管理入口，实现消费者与农户双向功能全覆盖，整体架构简洁高效、场景适配度极高。

3.3 原型迭代设计：低保真至高保真

为保障 APP 交互逻辑的合理性与视觉落地的完整性，本次设计遵循从简到繁、从逻辑到视觉的迭代思路，完成从低保真原型搭建到高保真视觉落地的全流程优化迭代。低保真原型设计阶段以功能逻辑验证为核心目标，摒弃所有视觉装饰元素，仅通过线框结构搭建页面基础布局，重点规划登录注册、商品搜索、商品详情、VR 全景展示、产地直播、个人中心六大核心页面的结构排布，精准划分各页面的功能区域、按钮位置、弹窗模块与图

文布局结构。在原型搭建过程中,反复打磨页面跳转逻辑与操作链路,剔除所有冗余繁琐的操作步骤,简化用户下单、农户上架、直播观看、溯源查询的核心流程,确保整体交互逻辑通顺、操作门槛极低,同时结合前期用户需求调研结果,优化中老年用户、新手用户的操作链路,保障基础使用体验的普适性。

在低保真原型逻辑验证无误后,正式进入高保真视觉设计落地阶段,基于标准化视觉规范完成全页面视觉渲染与素材填充。设计过程中摒弃通用电商的网红风、商业化素材,全部采用黑龙江实景农田、本土农产品实拍高清素材,最大程度还原寒地农业的原生态场景,强化平台本土化特色。同时针对不同页面的功能属性优化视觉细节,商品页面突出农产品原生态质感,直播页面强化实景动态氛围,溯源页面侧重真实场景展示,整体页面统一绿色乡土的核心视觉风格,融入东北地域农耕文化视觉元素,弱化商业广告感、强化乡土质朴感,让用户在使用过程中能够直观感受到黑龙江本土农业的特色与优势,实现视觉体验与功能体验的高度统一。

3.4 核心特色功能界面设计

结合前期竞品分析得出的市场短板与用户核心痛点,本次“龙田云市”APP针对性打造三大差异化特色功能界面,突破传统农产品电商的功能局限,聚焦解决产销信息不对称、产品品质难溯源、地域特色不突出的核心问题。VR全景农田溯源界面是本次设计的核心创新功能,区别于传统平台单一的文字图片溯源模式,通过全景拍摄技术录入黑龙江各地农户种植基地的实景场景,用户在选购农产品时,可一键进入VR全景页面,沉浸式查看农田种植环境、作物生长状态、基地配套设施,实现农产品产地、种植过程的可视化、透明化溯源,彻底解决消费者对农产品产地存疑、品质不放心的消费痛点,搭建消费信任体系。

产地直播界面聚焦打通产销实时对接链路,为本土农户提供零门槛的线上直播带货渠道,农户可随时随地开启田间直播,实时展示作物种植、田间管理、农产品采摘、加工包装的全过程,通过实时讲解、在线答疑的方式,让消费者直观了解产品优势,用户可在直播界面直接下单购买,省去中间商环节,既提升农户营收,也保障消费者的选购性价比。本土特产专属分类界面则深度贴合黑龙江农业产业结构,摒弃笼统的生鲜分类方式,针对性设置五常大米、林下菌菇、寒地浆果、东北杂粮等专属特色专区,同时搭配农场直供、限时秒杀、本土特产特惠等活动板块,精准适配本地用户选购地道东北农产品的核心需求,让用户可以快速精准找到心仪的本土农产品,大幅提升选购效率与使用体验。



图2 界面设计

四、基于用户旅程地图的体验优化分析

依托用户完整使用链路绘制五阶段用户旅程地图,梳理各阶段触点、用户行为、情绪痛点与优化机会点:认知阶段用户通过朋友推荐、线上广告了解APP,普遍存在广告同质化、无地域差异化记忆点的问题,对此平台主打“黑龙江本土农户直供”的核心卖点,强化地域特色宣传,打造差异化品牌记忆点。探索阶段用户主要进行首页浏览、特产搜索操作,面临商品繁杂、精准检索效率低的痛点,通过增设地域特产快捷分类、搭载本地化智能推荐算法,根据用户浏览习惯精准推送本土农产品,提升检索效率。尝试阶段用户完成选品、下单、支付全流程,新手用户普遍存在操作陌生、上手难度高的问题,通过设置新人操作引导弹窗、新人专属优惠与售后保障福利,降低新手使用门槛。掌握阶段用户以复购、订单查询为核心操作,平台原有智能推荐精准度不足,优化后可根据

用户地域、饮食偏好、消费记录推送农产品搭配套餐与适配特产，提升用户复购意愿。反馈阶段用户完成订单评价、客服咨询操作，针对售后响应慢、用户反馈激励不足的问题，搭建极速人工客服通道，同时设置订单评价赠优惠券的激励机制，有效提升用户互动积极性与平台粘性。通过全旅程体验拆解与针对性优化，平衡了年轻用户高效操作需求与中老年用户简易使用需求，全面提升平台整体使用体验。

五、设计总结

本文以黑龙江乡村数字化振兴为落脚点，完成“龙田云市”本土农产品电商 APP 全流程设计，从市场调研、竞品分析、用户研究，到 LOGO 视觉规范、原型迭代、高保真界面落地、用户体验优化形成完整设计闭环。通过 VR 溯源、产地直播、农户直连等特色功能打通农产品上行通道。本次设计为东北农业大省垂直农产品电商 APP 提供完整设计实践案例，以数字化设计手段助力地方特色农产品品牌发展。

参考文献：

- [1] 潘心成. 乡村振兴背景下常州市农产品电商发展路径思考[J]. 农业装备技术, 2026, 52 (2): 55-58+64.
- [2] 张倩. “数商兴农”战略下农产品电商创新策略研究[J]. 现代商业研究, 2026, (4): 7-9.
- [3] 梁岩, 封贺. “互联网+黑土地”：东北农产品电商发展瓶颈与突围[J]. 科技创新与生产力, 2025, 46 (12): 31-34.
- [4] 张慧琳, 吕瑶. 东北地区农产品电商发展对策探究[J]. 广东蚕业, 2025, 59 (3): 87-89.
- [5] 王宸. 乡村振兴视域下地理标志农产品品牌建设困境与应对策略[J]. 时代经贸, 2026, 23 (9): 81-83.

Design of E-commerce APP for Characteristic Agricultural Products in Heilongjiang Province — A Case Study of "Longtian Yunshi"

LiuYuFei, DuZeXin

(School of Arts,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Heilongjiang, Harbin, China)

Abstract: Digital revitalization of rural areas stands as the core path for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agriculture. Heilongjiang Province boasts high-quality characteristic agricultural products such as cold-region rice, coarse cereals and fruits & vegetables. However, it has long been confronted with practical challenges including asymmetric production and sales information, insufficient online channels for local agricultural products, and disconnection between farmers and consumers. Taking the local trading demands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in Heilongjiang as the starting point, this paper designs "Longtian Yunshi", an e-commerce APP for characteristic agricultural products. The APP integrates multiple functions including agricultural product display, online sales, agricultural information exchange, live streaming from production sites and VR panoramic traceability. A full set of visual and interactive designs for the APP are completed through competitive product analysis, preliminary market research, user portrait construction, interface iteration from low-fidelity prototypes to high-fidelity visuals, and sorting out user journey maps, with a rural-style green visual specification and localized functional architecture established. The design outcomes build a digital service platform enabling direct connection between farmers in Heilongjiang and consumers both inside and outside the province, breaking the disconnection between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and sales. It also provides practical design references for the digital circulation of cold-region characteristic agricultural products, the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agricultural e-commerce platforms and the digital revitalization of rural areas.

Keywords: Rural Revitalization; Agricultural E-commerce; APP Interface Design; Digital Agriculture; Characteristic Agricultural Products of Heilongjiang.

地区主义转向下欧盟对东盟的政策调试

李莹莹

(同济大学, 上海 200082)

摘要:随着大国战略竞争加剧与“全球南方”整体性崛起,欧盟与东盟的互动逻辑正在发生结构性变化。一方面,欧盟在内外多重危机叠加下推动地区主义由“规范性力量”向“地缘政治欧洲”转向,亟需借助“全球南方”重塑战略影响并推进战略自主;另一方面,东盟的共同体意识与“东盟中心地位”规范持续强化,不再甘居“受援者”与“学习者”,而是以“社会化”策略要求外部大国按照“东盟方式”展开合作。这一双向变动使既有以欧盟为主导的合作模式遭遇“伙伴落差”,并在投资贸易与政治战略两个层面集中暴露。本文立足东盟自身的特殊性,结合近年来欧盟-东盟互动的最新实践,论证欧盟正经由对“东盟方式”的再适应来校准其对东盟政策:其一,强化机制化对话与公开共享,淡化“援助者”姿态;其二,尊重东盟的自主性与中立性,在印太与南海等敏感议题上寻求最大公约数;其三,以《数字经济框架协定》谈判、东盟电网等功能性议题嵌入东盟主导的制度进程,实现合作政策的再校准。研究认为,欧盟对“东盟方式”的再适应,本质上是规范实力相对下降背景下的策略性社会化,其深度与可持续性,将取决于欧盟能否由“规范输出”真正转向“平等共塑”。

关键词:欧盟;东盟;全球南方;东盟方式;合作政策校准

DOI: doi.org/10.70693/202606285492

一、引言

当今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大国战略竞争加剧、地缘政治回归与“全球南方”的整体性崛起,共同重塑着国际政治的基本图景。区域合作与地区间主义(inter-regionalism)日益成为大国争取战略空间、塑造国际秩序的重要场域。在这一宏观竞争背景下,作为具有世界性影响力的两大地区组织,欧盟与东盟的互动不仅关乎双边关系本身,更折射出旧有以西方为中心的地区主义范式与新兴“全球南方”地区主义之间的张力。

在两大组织以往近半个世纪的合作中,关系格局长期呈现“欧盟主导、东盟跟随”的非对称特征。欧盟惯于以“规范性力量”(normative power)自居,通过条件性援助、规则输出与价值观外交,将自身的制度模式与治理标准向外扩散。然而近年来,欧盟相继遭遇主权债务危机、难民危机、英国脱欧、民粹主义回潮与俄乌冲突等多重冲击,内部凝聚力下降、对外规范吸引力衰减,其规范性力量的扩散效应与利益拓展能力受到实质性约束。外部冲击导致的脆弱性暴露,促使欧盟重新审视自身的对外战略,欧盟的地区主义正经历由“规范导向”向“地缘政治导向”的明显转向,并试图加速布局“全球南方”、争取地缘政治优势、推进欧洲战略自主。正是在这一政策转变的关节点上,东南亚及其核心制度——东盟,成为欧盟战略再校准的关键对象。

然而,欧盟政策转向所面对的东盟,已非昔日的东盟。东盟作为另一具有重大影响力的特殊地区组织,其规范需求与区域情势正在发生渐进而深刻的演变:共同体建设持续推进,“东盟中心地位”(ASEAN centrality)由一种制度安排逐步固化为被各方反复确认的地区规范,东盟在与外部大国交往中更加强调平等互利的伙伴定位,不再满足于单纯的“学习者”与“接收者”角色。更值得注意的是,面对外部力量,东盟成员国往往采取“社会化”(socialization)策略,即引导大国接受并运用“东盟方式”来达成合作,从而以“弱者的逻辑”实现自身利益与自主性的最大化。这意味着,欧盟若要顺利推进对东盟战略,就不能仅凭物质实力与规范优势单向施压,而必须主动嵌入东盟主导的制度进程。

既有研究大多从欧盟“全球南方”战略布局的总体视角,或从“规范性力量”对外投射的视角,探讨欧盟对

东盟的政策调整,相对侧重欧盟一侧的能动性,而对东盟自身规范结构如何反向形塑欧盟行为的研究尚显不足。本文则尝试转换视角,立足东盟的特殊性与两大组织近年来在投资贸易、政治战略领域的现实分歧,提出并论证一个核心判断:在规范实力相对下降、亟需重新校准对东盟战略的前提下,欧盟正被迫依据“东盟方式”进行适应性调整,通过策略性的社会化参与,实现合作政策的再校准。下文首先剖析双方合作分歧的具体表现及其深层逻辑,继而从对话机制、自主中立与功能性嵌入三个维度,论证欧盟对“东盟方式”的再适应,最后讨论这一再适应的限度与前景。

二、欧盟与东盟的合作分歧

2022年12月,一场纪念东盟和欧盟建交45周年的特殊聚会在欧洲召开。这是双方首次举办“全员”领导人峰会,象征着两大组织关系的升格与联系的紧密化。然而,峰会上的交流同时表明,双方在投资贸易与政治战略两个层面仍存在结构性分歧。这些分歧并非偶发的立场差异,而是“欧盟主导型”旧合作模式与东盟日益强化的平等诉求之间的“伙伴落差”的集中显现。

(一) 投资贸易领域:“援助者”姿态与平等诉求的落差

在经贸合作领域,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承诺到2027年根据全球门户投资战略,向东盟成员国投资100亿欧元,主要用于绿色能源和基础设施建设。然而,东盟经济体的体量与这一投资额不匹配,100亿欧元甚至不到东盟国家经济增速的1%。东盟方面认为,欧盟仍以高姿态进行发展援助,未能与东盟平等合作的初衷相符。柬埔寨首相洪森批评称,双方经济应当互补,随着东盟人口和经济总量的增长,合作应从“援助与接受”转向平等伙伴关系,但欧盟尚未完全改变其对东盟的态度。特别是在此次峰会上,欧盟始终将经贸合作和互联互通作为重点,彰显其对于东盟的影响力,甚至想借用自身影响力改变东盟国家的立场,自然引起了东盟国家的诸多不满。

(二) 政治战略领域:阵营选择压力与战略中立的张力

在政治领域,欧盟与东盟的合作确实有着明显的地缘政治考量——将东南亚国家视为重要合作伙伴和战略抓手。以俄乌冲突为例,欧盟不断强调冲突对全球的影响,从而试图争取东盟的公开支持。但东盟成员国很大程度上保持中立,只有新加坡谴责俄罗斯并实施制裁。菲律宾总统马科斯警告称,“我们拒绝回到冷战时期,(反对)必须根据与哪个超级大国结盟来选择立场”。马科斯强调,东盟“致力于亚太地区的未来应该由亚太国家而不是地区以外的任何其他大国决定的想法”。柬埔寨首相洪森在出席活动时称,不会给“欧洲之火”浇上“亚洲之油”。由此可见,东盟希望与欧盟达成的是自贸协议,而不是获得欧盟方面的施舍,更不想成为大国竞争的棋子。

综上,无论是投资贸易领域的“伙伴落差”,还是政治战略领域的“站队压力”,其共同根源在于:欧盟仍在相当程度上沿用以自我为中心、自上而下的规范输出逻辑,而东盟则以强化中的“东盟中心地位”规范予以回应。要弥合这一落差,欧盟唯有改变互动方式本身——亦即,学会以“东盟方式”与东盟打交道。

三、欧盟对“东盟方式”的再适应

“东盟方式”是指该组织在处理成员国间关系以及与外部大国交往时的特有方式。这种方式强调在多边框架下通过对话与协商解决争端,注重平衡与包容性,避免强权干预和外部干涉。东盟的合作方式具有独特的灵活性与包容性,它不仅仅局限于传统合作,还包括文化交流和社会建设等多维度的互动。从规范理论的视角看,“东盟方式”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在与外部规范的互动中经由“本土化”(localization)不断再生产——东盟既吸纳外部规范的有益成分,又以自身的认知前提对其加以改造,从而维系规范的自主性。正因如此,外部大国要在东南亚有效行动,往往需要经历一个被“东盟方式”反向社会化的过程。

承接上文所言,欧盟在峰会上所提出的援助“100亿欧元”的全球门户策略,在东盟方面遭遇了一定的挑战。一方面,东盟认为欧盟的全球门户计划仍然是一种单方面的援助;另一方面,东盟认为欧盟企图用全球门户策略争取东盟在政治议题上的表态,影响东盟的中立态度。这两方面的反馈可以鲜明地体现东盟始终坚持“平等”、“中立”和“包容”的东盟原则。因此,欧盟积极运用东盟方式解决这两方面的难题,是顺利推进欧盟-东盟合

作的关键。近年来的实践显示, 欧盟正从对话机制、自主中立与功能性嵌入三个维度, 对“东盟方式”作出系统性再适应。

(一) 加强对话协调, 强调合作的公开与共享

欧盟与东盟通过召开联合工作委员会会议, 频繁相互接见对方集团重要人物, 不断就欧盟-东盟关系最新发展及印太地区和全球问题交换意见。2023年2月, 第30次东盟—欧盟联合合作委员会会议在雅加达召开。会议强调双方战略伙伴关系, 拥有共同利益。2023年8月, 第19届东盟-欧盟经济部长会议在印尼三宝壟市召开, 会议表示, 进一步加强东盟与欧盟之间的贸易和投资关系。2023年12月, 欧盟-东盟领导人会议在布鲁塞尔召开, 该会议标志着欧盟与东盟在战略伙伴关系框架下的进一步合作。

在增强型欧盟-东盟区域对话工具 (E-READI) 的支持下, 欧盟将继续与东盟进行广泛的实质性政策对话。E-READI 是一个促进欧盟与东盟国家深化合作的重要平台, 通过加强政策协调和信息共享, 推动双方在气候变化、公共卫生、数字经济等领域进行深入交流。例如, 在气候变化方面, E-READI 使欧盟为东盟提供技术支持和资金援助, 帮助其提升应对能力, 同时东盟的挑战也反馈给欧盟, 促进双方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协同合作。E-READI 的成功不仅体现在具体领域的合作成果上, 还在于其建立的机制化对话平台, 提升了欧盟与东盟在全球治理中的战略协同, 为两大区域提供了加强多边合作、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的有效工具, 推动了双方在全球舞台上的更紧密合作。

在具体项目层面, 欧盟反复申明“全球门户”并非单方面援助, 而是基于互利的合作关系。欧盟通过与东盟共同制定与实施项目, 确保东盟在规划与执行过程中拥有充分的话语权与参与度, 以此缓解东盟对“条件性援助”的疑虑。值得关注的是, 2025年欧盟将“全球门户”与东盟自身的旗舰项目相对接: 在2025年全球门户论坛上, 欧盟明确表态支持“东盟电网” (ASEAN Power Grid) 等区域互联互通项目, 强调由东盟主导项目议程、欧盟提供配套融资与技术。这种“东盟提需求、欧盟做配套”的模式转变, 相较于2022年单方面宣布投资额的做法, 更贴近东盟所期待的平等共建, 体现了欧盟在合作方式上的实质性再适应。

(二) 充分考虑东盟的自主性和中立性, 找到欧盟与东盟的最大公约数

针对“站队压力”的顾虑, 欧盟在涉及东盟核心利益的敏感议题上, 逐步学会尊重东盟的自主性与中立性, 主动寻求双方的最大公约数, 而非强求一致立场。在2024年2月召开的第24届欧盟-东盟部长级会议上, 欧盟始终明确尊重东盟的中立性和自主性, 表示其合作目标是促进区域的可持续发展和稳定, 而不是在政治议题上施加影响。在南海问题上, 欧盟、东盟在声明中强调了南海和平、安全、稳定以及南海航行和飞越自由的重要性, 认为应尊重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根据包括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下称《公约》) 在内的公认的国际法原则以和平手段解决争端。与个别国家期待的有所不同, 声明没有在南海问题上发表激烈的“刺激中国”的言辞, 欧盟、东盟在涉南海政策和行动上似乎仍刻意与美国保持着一定的距离。这既表明欧盟希望充分考虑东盟的舒适度、通过尊重东盟的战略自主, 来使欧盟的南海政策对东盟更具吸引力。

无独有偶, 2022年3月, 欧盟出台《安全与防务战略指南》, 再次肯定了东盟领导下的“印太”安全建制的积极作用, 并提出要通过东盟地区论坛, 进一步强化自身在印太地区的安全存在, 该举措强化了欧盟与东盟的认同感。除此之外, 在2023年2月第30次东盟—欧盟联合合作委员会会议上, 欧盟重申致力于加强东盟—欧盟合作, 并在印太战略中维护东盟中心地位。双方将根据《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东盟宪章》《东盟印太展望》的原则, 探讨在《东盟印太展望》的四个优先领域和《欧盟印太合作战略》的七个优先领域寻求合作。由此可见, 欧盟充分尊重东盟在印太地区的自主性, 获得了东盟国家的信任, 在2024年2月召开的第24届欧盟-东盟部长级会议中, 欧盟成功促成了双方在联合声明中加入对俄罗斯的谴责与对乌克兰的支持。这一来之不易的共识, 恰恰说明: 唯有先尊重东盟方式, 欧盟才能换取东盟在其关切议题上的有限合作。

(三) 嵌入功能性合作, 以低敏感议题深化制度化社会化

在对话机制与自主中立之外, 欧盟还以经贸、数字、互联互通等低敏感、高收益的功能性议题为突破口, 将

自身嵌入东盟主导的制度进程,实现更深层次的制度化社会化。最具代表性的进展是欧盟—东盟《数字经济框架协定》相关合作与区域数字治理对接:面对数字经济这一双方利益高度契合的领域,欧盟选择以技术标准对接、数据治理对话与能力建设支持等方式参与,而非强行输出自身规则,从而避免触动东盟对“数字主权”与战略自主的敏感神经。在区域互联互通方面,欧盟将“全球门户”资金更多投向由东盟设定优先序的项目,如清洁能源、数字基础设施与可持续交通,使援助议程“东盟化”。

这一维度的意义在于:功能性合作的渐进积累,能够在不直接挑战东盟规范底线的前提下,持续增进双方的相互信任与制度黏性,进而为更敏感议题上的合作创造条件。从规范本土化的逻辑看,欧盟正是通过在低敏感领域反复实践“协商一致、尊重舒适度”的东盟方式,逐步被纳入东盟的社会化轨道;而东盟则借助欧盟的资金与技术充实自身议程,同时牢牢守住议程主导权。双方由此形成一种“东盟定规则、欧盟做贡献”的新型互动样式,成为欧盟合作政策再校准的微观基础。

四、结语

随着大国竞争加剧和“全球南方”崛起,欧盟与东盟作为两大重要地区性组织,在全球政治经济体系中的地位愈发突出。然而,欧盟在与东盟合作中面临着内部矛盾与外部环境变化的挑战,影响了其规范性力量的扩展及利益拓展。因此,欧盟亟需调整对东盟的战略,以应对“全球南方”的变化,推动欧洲战略自主。东盟则进一步强化了共同体意识与“东盟中心地位”。在与欧盟合作中,东盟不想仅仅充当被动角色,而是更加强调平等互利的合作关系。

由于上述原因,尽管欧盟与东盟在纪念建交45周年峰会上展现了更加紧密的联系,但在投资、贸易和政治战略领域依然存在显著分歧。欧盟的投资承诺与东盟期望存在差距,东盟希望平等参与合作,而非仅接受援助。在政治领域,欧盟希望通过合作获得东盟在地缘政治议题上的支持,而东盟则更倾向于保持中立,避免成为大国竞争的棋子。两种变动的交汇,使得既有“欧盟主导型”合作模式在投资贸易与政治战略领域集中暴露出“伙伴落差”。

本文论证表明,为弥合分歧、推进合作,欧盟正经由对“东盟方式”的再适应来校准其对东盟政策:在对话机制上,强化机制化、公开共享的协调,淡化“援助者”姿态;在自主与中立上,尊重东盟的战略自主,在印太、南海等敏感议题上寻求最大公约数;在功能性议题上,以数字经济、东盟电网等合作嵌入东盟主导的制度进程,实现制度化社会化。三个维度共同指向一个判断:欧盟对“东盟方式”的再适应,本质上是其规范实力相对下降背景下的策略性社会化,是“地缘政治欧洲”在东南亚不得不作出的现实选择。

应当看到,这一再适应仍有其限度。欧盟的“规范惯性”并未根本消除,其“全球门户”投资规模、价值观附加与战略意图,仍可能与东盟的平等诉求及中立立场再度产生摩擦;东盟内部的异质性也使其“中心地位”面临持续的协调成本。因此,欧盟对“东盟方式”再适应的深度与可持续性,最终取决于欧盟能否真正完成从“规范输出者”向“平等共塑者”的角色转变。唯有如此,欧盟与东盟的合作才能超越短期的地缘算计,成为应对全球化挑战、推动区域与全球和平发展的稳定力量。

参考文献:

- [1] 关欣,连晨超. 欧盟—东盟战略伙伴关系的特点及限度[J]. 国际观察, 2021, (06): 79-99.
- [2] 文峰,谭佩琳. 欧盟与东盟的规范互动及其利益拓展——“规范性力量”的视角[J]. 东南亚研究, 2023, (01): 87-105.
- [3] 顾苏. 欧盟“全球南方”政策的调整——基于地区间主义视角的分析[J]. 欧洲研究, 2024, 42(5): 115-146.
- [4] 陈菲,蒲文杰. 从“规范接受者”到“秩序共塑者”: 欧盟对全球南方的认知流变与政策调整[J]. 国际论坛, 2025, 27(4): 3-24.
- [5] 耿协峰,陈灵芝. 超越“欧盟中心主义”: 全球南方地区主义研究的进展[J]. 欧洲研究, 2025, 43(3): 32-60.
- [6] 李雪威,李佳兴. 战略伙伴关系框架下欧盟与东盟的合作[J]. 欧洲研究, 2025, 43(1): 53-74.
- [7] 魏玲,陈子恒. “东盟中心”规范的历史过程和演变机制[J]. 外交评论(外交学院学报), 2024, 41(3): 104-126.

- [8] 王振玲. 欧盟对外战略转变及其东亚安全政策新动向[J]. 东南亚研究, 2022, (6): 96-113+156. DOI: 10.19561/j.cnki.sas.2022.06.096.
- [9] 颜欣. 体系压力、安全认知与东盟地区安全治理机制变迁[J]. 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 2019, (2): 76-105.
- [10] Zhang Yun. The Logics of the Weak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SEAN's External Relations with Major Powers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M]. Beijing: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2010.
- [11] Acharya, Amitav. How Ideas Spread: Whose Norms Matter? Norm Localization and Institutional Change in Asian Regionalism[J].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2004, 58(02): 239-275.
- [12] European Union External Action. A Strategic Compass for Security and Defence[EB/OL]. (2022-03-21)[2025-12-21]. https://www.eeas.europa.eu/eeas/strategic-compass-security-and-defence-0_en.
- [13] 安峥. 东盟欧盟首次“全员”峰会有何特殊? [N]. 解放日报, 2022-12, (004): 1-3.
- [14] 宋玮. 东盟东盟峰会召开, 欧盟投资 10 亿欧元, 菲总统: 不会卷入地缘冲突[EB/OL]. 搜狐网, https://www.sohu.com/a/618307789_121469946, 访问日期: 2022-12-27.
- [15] 中国社科院欧洲研究所副研究员. 欧盟“热捧”东盟弦外有音[J]. 环球, 2023, (18).
- [16] Enhanced Regional EU-ASEAN Dialogue Instrument (E-READI)[EB/OL]. <https://euraxess.ec.europa.eu/worldwide/asean/enhanced-regional-eu-asean-dialogue-instrument-e-readi>, 访问日期: 2026-06-28.
- [17] 南海之声. 专家解读: 欧盟东盟涉南海声明的弦外之音[EB/OL]. <https://vscs.cri.cn/m/20240207/6d6f1114-ef2b-1e14-813b-b1e6c0d0510e.html>, 访问日期: 2026-06-28.
- [18] European Union External Action. A Strategic Compass for Security and Defence — For a European Union that Protects Its Citizens, Values and Interests and Contributes to International Peace and Security[EB/OL]. (2022-03-21) [2023-12-21]. https://www.eeas.europa.eu/eeas/strategic-compass-security-and-defence-0_en.
- [19] 东盟商机. 东盟—欧盟推进合作[EB/OL]. https://www.sohu.com/a/733801659_121119270, 访问日期: 2026-06-28.
- [20] ASEAN-EU. Joint Ministerial Statement of the 24th ASEAN-EU Ministerial Meeting[EB/OL]. (2024-02-02). <https://asean.org/joint-ministerial-statement-of-the-24th-asean-eu-ministerial-meeting/>.

The EU's Policy Recalibration toward ASEAN amid the Regionalist Turn

Yingying Li

(School of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ongji University, Shanghai, China)

Abstract: As major-power strategic competition intensifies and the "Global South" rises as a collective force, the logic underpinning EU-ASEAN interaction is undergoing structural change. On one hand, amid compounding internal and external crises, the EU is steering its regionalism away from "normative power" toward a "Geopolitical Europe," urgently seeking to leverage the Global South to rebuild its strategic influence and advance strategic autonomy. On the other hand, ASEAN's sense of community and its norm of "ASEAN centrality" continue to strengthen; no longer content to remain a "recipient" or "learner," ASEAN now employs a "socialization" strategy to require external powers to engage on the terms of the "ASEAN Way." This two-way shift has exposed a "partnership gap" in the existing EU-led cooperation model, surfacing most acutely in the domains of investment and trade and of political strategy. Grounded in ASEAN's own distinctiveness and drawing on the most recent practices of EU-ASEAN interaction, this paper argues that the EU is recalibrating its ASEAN policy through a re-adaptation to the "ASEAN Way": first, by reinforcing institutionalized dialogue and open, shared cooperation while playing down its posture as a "donor"; second, by respecting ASEAN's autonomy and neutrality and seeking the greatest common ground on sensitive issues such as the Indo-Pacific and the South China Sea; and third, by embedding itself in ASEAN-led institutional processes through functional agendas such as the Digital Economy Framework Agreement (DEFA) negotiations and the ASEAN Power Grid. The study concludes that the EU's re-adaptation to the "ASEAN Way" is, in essence, a strategic socialization undertaken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its relatively declining normative power, and that its depth and sustainability will hinge on whether the EU can genuinely shift from "norm export" to "co-shaping among equals."

Keywords: European Union; ASEAN; Global South; the ASEAN Way; cooperation policy recalibration

健康老龄化背景下城乡老年人公共体育服务供需适配机制研究

石国帅, 张思敏, 雷 静

(西安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 陕西 西安 710021)

摘要: 目的: 阐明健康老龄化背景下城乡老年人公共体育服务供需适配的理论逻辑、现实问题与优化机制, 为地方公共体育服务精准供给和老年健康促进提供参考。方法: 采用文献分析、政策分析和逻辑分析方法, 基于健康老龄化、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建设视角, 分析城乡老年人体育服务需求变化、供给结构特征及其适配机制。结果: 城乡老年人公共体育服务需求呈现健康支持、空间可及、安全适老、社会参与和信息可达等复合特征, 而现实供给仍存在设施导向较强、健康指导不足、城乡资源配置不均、组织运行不稳和反馈评价薄弱等问题。结论: 应围绕需求识别、分层供给、医体融合、组织协同、数字包容和评价反馈建立供需适配机制, 推动公共体育服务从设施配置转向健康促进, 从平均供给转向精准适配, 从阶段性活动转向常态化治理。

关键词: 健康老龄化; 城乡老年人; 公共体育服务; 供需适配; 全民健身; 医体融合

基金项目: 2025 年陕西省体育局常规课题 (编号: 20250426); 西安医学院 2024 年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项目 (编号: 121524141); 陕西省教育科学“十四五”规划 2025 年度一般课题 (编号: SGH25Y3605); 西安医学院校级科研项目 (编号: 2023BS27)。

DOI: doi.org/10.70693/202607059151

一、前言

人口老龄化使公共体育服务的对象结构、服务内容和治理方式发生深刻变化。对老年人而言, 体育活动并不只是休闲娱乐, 也与慢性病预防、身体功能维持、心理健康、社会参与和生活质量提升密切相关。世界卫生组织提出的健康老龄化强调通过环境与机会支持老年人保持功能能力^[1], 这意味着公共体育服务不能只关注“有没有场地”, 还要关注老年人是否能够安全、便利、持续地参与体育活动。

在我国政策语境中, 健康中国建设、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战略和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不断交汇。《“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强调提高全民身体素质和促进健康生活方式^[2]; 《“十四五”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服务体系规划》提出完善老年健康支撑体系^[3]; 《全民健身计划 (2021—2025 年)》和《关于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的意见》则进一步强调场地设施供给、科学健身指导和重点人群服务^[4-5]。这些政策共同指向一个问题: 如何让公共体育服务更好适应老年群体的健康需求与生活场景。

陕西省城乡发展基础、人口结构、公共服务资源和老年人生活方式存在差异。城市社区在场地设施、社会组织 and 信息平台方面相对集中, 农村地区则更容易受到距离、交通、设施维护、专业指导和组织力量不足的影响。与此同时, 老年人群体内部也存在年龄、健康状况、收入水平、家庭支持和数字能力差异。因此, 城乡老年人公共体育服务建设的关键, 不在于简单增加供给数量, 而在于建立能够识别需求、回应差异并持续反馈的供需适配机制。

基于此, 本文以城乡老年人公共体育服务为研究对象, 围绕健康老龄化背景下的供需适配问题展开理论分析。研究重点不在于呈现具体调查数据, 而在于梳理需求变化、供给错位及其形成机制, 并提出可用于后续实证研究和地方治理实践的分析框架。

作者简介: 石国帅(1989—), 男, 博士, 研究方向为老龄健康;

张思敏(2003—), 女, 本科在读, 研究方向为卫生统计学;

雷 静(1968—), 女, 副教授, 研究方向为卫生统计学。

通讯作者: 雷 静

二、理论基础与分析逻辑

2.1 健康老龄化：从疾病控制到功能能力维护

健康老龄化并不意味着老年人完全没有疾病，而是强调在既有身体条件下尽可能保持功能能力、生活自主和社会参与^[1]。这一理念改变了老年体育服务的目标定位。传统公共体育服务更多关注设施覆盖和健身活动开展，而健康老龄化视角要求公共体育服务进一步承担健康促进、风险预防和社会支持功能。对于患有慢性病、身体机能下降或行动能力受限的老年人而言，体育服务需要与健康评估、运动指导、风险提示和持续陪伴相结合。

因此，老年公共体育服务不是普通全民健身服务的简单延伸，而是具有年龄友好和健康支持特征的公共服务。其服务对象具有身体能力差异大、风险敏感性强、参与持续性受生活条件影响明显等特点。只有把健康老龄化理念嵌入公共体育服务设计，才能使体育活动真正成为改善老年人生活质量和促进主动健康的重要手段。

2.2 城乡差异：从资源均衡到场景适配

公共体育服务均等化并不等同于城乡完全同质化供给。城市老年人生活半径较小，但社区人口密集、公共空间竞争激烈，对场地舒适度、专业指导、活动组织和信息服务的要求较高；农村老年人居住分散，公共体育设施维护、交通可达性、基层组织动员和健康指导供给更加关键。城乡差异的本质，不仅是资源数量差异，也是服务场景、组织基础和使用条件差异。这也要求公共体育服务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框架下进一步关注不同群体和不同地域的适用性^[6]。

因此，供需适配要从“配置了什么”转向“适不适用”。同样一套健身器材，在城市社区可能面临使用拥挤和预约管理问题，在农村地区则可能面临无人指导、损坏维护不足和活动组织不足等问题。公共体育服务只有进入老年人的真实生活场景，才能判断其是否具有可达性、可用性和可持续性。

2.3 供需适配：从供给逻辑到需求回应

供需适配是指公共体育服务供给结构、供给方式和运行机制与老年人健康需求、参与能力和生活场景之间形成相对匹配的过程。它既包含“供给什么”的内容适配，也包含“如何供给”的组织适配，还包含“供给效果如何”的评价适配。与单纯扩大设施数量相比，供需适配更强调服务可及、过程安全、内容适宜、组织稳定和反馈及时。

在理论上，城乡老年人公共体育服务供需适配可以理解为一个连续链条：首先识别老年人的健康状况、运动经验和服务偏好；其次根据城乡场景和人群差异进行分层分类供给；再次通过社区、村庄、体育组织和基层卫生机构形成运行网络；最后通过参与频率、健康感知、满意度和服务覆盖等指标进行反馈改进。

三、城乡老年人公共体育服务供需错位表现

3.1 需求由设施可得转向健康支持

随着老年人健康意识提高，其公共体育服务需求已经从单纯“有场地、有器材”转向“能指导、保安全、可持续”。老年人既关注场地距离和器材数量，也关注运动强度是否适宜、是否有人指导、是否有休息设施、是否能够预防运动损伤。相关研究表明，老年期身体活动与健康老龄化、功能保持和心理健康具有密切关系^[7-9]，这进一步说明老年体育服务需要从一般活动供给转向健康支持型服务。

3.2 供给仍存在设施导向倾向

现实中，一些地方公共体育服务仍以设施建设和活动次数作为主要工作指标。设施覆盖提升固然重要，但如果缺少适老化设计、专业指导和长期维护，就难以转化为老年人的实际参与。部分公共体育空间存在器材说明不清、照明不足、地面防滑不足、缺少休息点和应急支持等问题，导致老年人“不敢用”“不会用”或“用不久”。这种错位反映出公共体育服务供给仍需要从硬件建设进一步转向服务整合。

3.3 城乡供给能力不均衡

城乡之间的公共体育服务差异不仅体现在设施数量，也体现在组织能力和服务质量。城市地区具有较多场馆、公园和社区活动中心，但也存在空间拥挤、资源分配不均和服务碎片化问题；农村地区虽然通过全民健身工程改善了基础设施条件，但部分地区仍面临维护不足、指导员缺乏和活动组织不稳定等问题。若继续采用平均化配置方式，可能既不能满足城市老年人的品质化需求，也难以解决农村老年人的基础可及问题。

3.4 信息获取与反馈渠道不足

信息可达性直接影响老年人能否使用公共体育服务。城市老年人可能通过公众号、微信群和数字平台获取活动信息，但高龄老人和数字能力较弱者仍可能被排除在外；农村老年人则更依赖村组通知、熟人网络和线下动员。若服务信息发布过度依赖线上平台，就可能形成新的数字鸿沟。此外，一些服务项目缺少稳定的需求反馈和成效评价，难以及时发现老年人参与中的困难与风险。

四、城乡老年人公共体育服务供需适配机制构建

4.1 需求识别机制：形成老年人服务画像

供需适配的起点是识别需求。地方体育部门和基层组织可围绕年龄结构、健康状况、运动经验、居住距离、费用敏感性、信息获取方式和活动偏好等维度，建立老年人公共体育服务需求画像。需求识别不宜只依赖一次性满意度调查，而应通过问卷、访谈、社区观察、活动签到和偏好测量等方式持续收集信息。对于重点群体，如高龄老人、慢性病患者、独居老人和农村留守老人，应建立更具针对性的需求记录。

表 1 城乡老年人公共体育服务供需适配机制框架

机制环节	需求侧重点	供给侧回应	适配目标
需求识别	健康状况、运动经验、距离和费用敏感性	建立服务画像和动态需求记录	从经验判断转向精准识别
分层供给	城乡差异、年龄差异和健康差异	城市提质、农村补短板、群体分类服务	兼顾公平性与适宜性
医体融合	运动安全、慢病管理和科学指导	运动风险评估、运动处方和健康教育	把健身活动转化为健康促进
组织协同	持续参与和同伴支持	社区、村委、指导员和社会组织共建	形成常态化服务网络
数字包容	信息可达和操作便利	线上线下并行、保留传统通知方式	避免数字排斥
评价反馈	满意度、参与频率和健康感知	建立监测指标和项目调整机制	实现持续改进

4.2 分层分类供给机制：回应城乡差异与个体差异

分层分类供给是供需适配的核心。城镇地区可重点提升社区健身空间的舒适度、开放时间弹性、专业指导和活动多样性；农村地区则应突出近距离、低成本、易维护和易组织的服务模式。对于健康状况较好的老年人，可提供健步走、球类、广场舞和户外活动等项目；对于慢性病患者和身体功能下降者，则应提供低强度、低风险和有指导的康养类活动。这样既能体现公共服务公平，也能提高资源使用效率。

4.3 医体融合机制：把体育服务转化为健康促进服务

健康老龄化背景下，公共体育服务应与基层健康管理相衔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镇卫生院、社会体育指导员和基层体育组织可协同开展运动风险评估、运动处方建议、慢性病人运动指导和健康知识普及。医体融合并不是把体育活动医疗化，而是通过基本健康评估和科学运动指导降低参与风险，提高老年人参与信心，使体育服务从一般健身活动进一步转化为健康促进服务。

4.4 组织协同机制：形成常态化服务网络

老年公共体育服务能否持续运行，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基层组织能力。社区、村委会、老年协会、社会体育指导员、志愿者和社会组织都可以成为服务网络的重要节点。城市社区可依托网格化治理和社区活动中心形成常态化课程与活动安排；农村地区可依托村级公共文化空间、乡镇卫生院和基层群众组织开展就近服务。政府部门应在经费支持、人员培训、项目购买和安全监管方面发挥统筹作用。

4.5 数字包容与评价反馈机制：实现持续改进

数字化能够提升公共体育服务的组织效率，但必须坚持适老化原则。服务信息发布应采用线上线下并行方式，既利用数字地图、预约平台和微信群，也保留公告栏、电话通知、广播和现场告知。评价反馈方面，可将参与频

率、活动满意度、健康感知、服务可达性、设施维护状况和安全事件记录纳入常态监测。通过反馈闭环,公共体育服务才能从经验供给转向基于需求和证据的持续改进。

五、优化路径

5.1 建立老年人公共体育服务需求数据库

地方体育部门可联合卫健、民政、社区和村级组织,建立老年人公共体育服务需求数据库。数据库不应收集过度敏感信息,而应重点记录年龄结构、健康风险、运动偏好、场地可达性、数字能力和服务反馈等与体育服务供给直接相关的内容。通过年度更新和项目反馈,可以为设施布局、活动设计和人员配置提供依据。

5.2 推进公共体育设施适老化与无障碍改造

适老化改造应成为城乡公共体育设施建设的重要标准。城市社区应重点改善场地拥挤、器材老化、照明不足和休息设施不足等问题;农村地区应重点解决设施损坏维护、场地安全、基础照明和就近可达问题。适老化不仅是硬件改造,也包括动作说明、风险提示、应急标识和服务人员巡查等过程支持。

5.3 发展“体育+健康”基层服务模式

可在社区和乡镇层面探索“体育+健康”复合服务。体育部门负责活动组织和指导员培训,卫健部门负责健康评估和运动风险提示,社区或村级组织负责动员与场地协调。对于患有高血压、糖尿病、骨关节疾病等慢性病的老年人,应提供更温和、更安全、更连续的运动建议,避免简单套用普通健身项目。

5.4 完善社会参与和志愿服务机制

老年公共体育服务需要稳定的人和组织。可通过培训社会体育指导员、培育老年体育骨干、支持社区体育社会组织和购买公益服务等方式,形成多元主体参与格局。农村地区尤其需要培养本地组织者,通过村委会、老年协会、卫生室和文化活动室形成低成本、熟人化、可持续的组织网络。

5.5 提升信息可达性和数字包容水平

公共体育服务数字化应坚持“便利老年人”而不是“替代线下服务”。对于能够使用智能手机的老年人,可提供活动预约、场地查询、课程提醒和健身知识推送;对于高龄老人和数字能力较弱者,应继续保留电话咨询、纸质公告、广播通知和现场报名。数字平台还应尽量简化流程、放大字体、减少复杂操作,提高老年人实际使用意愿。

5.6 建立供需适配评价闭环

供需适配不是一次性完成的,而是一个持续改进过程。可从设施可及性、适老化水平、专业指导覆盖、活动参与频率、健康感知改善、满意度和城乡差距变化等方面建立评价指标。后续研究还可引入专家咨询、离散选择实验和案例比较方法,进一步识别老年人对不同服务属性的偏好强度,为公共体育服务精准供给提供量化支持^[10]。

六、结论

健康老龄化背景下,城乡老年人公共体育服务的重点正在从一般性设施供给转向功能能力维护、健康支持和生活场景适配。陕西省城乡老年人公共体育服务建设既要回应老年群体对可及、安全、指导、社交和信息服务的复合需求,也要正视城乡之间在资源基础、组织能力和服务场景方面的差异。

推动城乡老年人公共体育服务供需适配,应建立需求识别、分层供给、医体融合、组织协同、数字包容和评价反馈相互衔接的机制。未来研究可在本文理论框架基础上开展问卷调查、专家咨询和偏好测量,进一步验证不同机制对老年人体育参与和健康促进效果的影响,从而推动公共体育服务从资源配置导向走向需求回应导向和健康促进导向。

参考文献:

- [1]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orld report on ageing and health[M]. Geneva: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015.
- [2] 中共中央 国务院. “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EB/OL]. (2016-10-25)[2026-07-05]. <https://www.gov.cn/zhengce>

/2016-10/25/content_5124174.htm.

[3] 国务院. “十四五”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服务体系规划[EB/OL]. (2022-02-21)[2026-07-05]. https://www.gov.cn/zhengce/content/2022-02/21/content_5674844.htm.

[4] 国务院. 全民健身计划 (2021—2025 年) [EB/OL]. (2021-08-03)[2026-07-05]. https://www.gov.cn/zhengce/content/2021-08/03/content_5629218.htm.

[5]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 关于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的意见[EB/OL]. (2022-03-23)[2026-07-05]. https://www.gov.cn/zhengce/2022-03/23/content_5680908.htm.

[6] 国家发展改革委等. 国家基本公共服务标准 (2023 年版) [EB/OL]. (2023-08-09)[2026-07-05]. <https://www.ndrc.gov.cn/xwdt/tzgg/202308/P020230809627487368258.pdf>.

[7] McPhee J S, French D P, Jackson D, et al. Physical activity in older age: perspectives for healthy ageing and frailty[J]. *Biogerontology*, 2016, 17: 567-580.

[8] Gao W, Feng W, Xu Q, et al. Barriers associated with the public use of sports facilities in China: a qualitative study[J]. *BMC Public Health*, 2022, 22(1): 2112.

[9] Carless D, Douglas K. Sport and physical activity for mental health[M]. Chichester: John Wiley & Sons, 2011.

[10] Lancsar E, Louviere J. Conducting discrete choice experiments to inform healthcare decision making: a user's guide[J]. *PharmacoEconomics*, 2008, 26(8): 661-677.

Study on the Supply-Demand Adaptation Mechanism of Public Sports Services for Urban and Rural Older Adult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Healthy Ageing

Shi Guoshuai, Zhang Simin, Lei Jing

(School of Public Health, Xi'an Medical University, Xi'an, Shaanxi,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clarify the theoretical logic, practical problems and optimization mechanism of supply-demand adaptation of public sports services for urban and rural older adult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healthy ageing. Methods: Literature analysis, policy analysis and logical analysis were used to examine changes in service demand, supply characteristics and adaptation mechanisms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healthy ageing, equalization of basic public services and national fitness public service system construction. Results: The demand for public sports services among older adults shows compound features, including health support, spatial accessibility, age-friendly safety, social participation and information accessibility. However, the current supply still faces problems such as facility-oriented provision, insufficient health guidance, unbalanced urban-rural allocation, unstable organizational operation and weak feedback evaluation. Conclusion: A supply-demand adaptation mechanism should be established around demand identification, classified supply, integration of sports and health, organizational coordination, digital inclusion and evaluation feedback, so as to promote the transformation of public sports services from facility allocation to health promotion and from average supply to precise adaptation.

Key words: healthy ageing; urban and rural older adults; public sports services; supply-demand adaptation; national fitness; integration of sports and health

从“通道经济”到“枢纽经济”： 黑龙江省口岸经济转型的逻辑与路径

田 丽, 付 洋, 姜 颖

(哈尔滨金融学院, 黑龙江 哈尔滨 150030)

摘 要: 口岸经济是沿边地区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和融入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重要载体。黑龙江省作为我国向北开放的重要窗口和对俄开放的最前沿, 拥有 27 个国家一类口岸, 长期以来口岸经济以“通道经济”为主导特征, 主要承担货物过境中转功能, 产业附加值低、经济带动效应有限。通过阐释“通道经济”与“枢纽经济”概念内涵的基础上, 系统分析了黑龙江省口岸经济从“通道经济”向“枢纽经济”转型的内在逻辑, 从基础设施升级、产业集聚发展、制度创新突破三个维度梳理了转型的现实路径, 并针对转型中面临的发展不平衡、产业配套不足、国际合作对接有待深化等挑战提出对策建议。研究表明, 黑龙江省口岸经济转型的核心在于从“过境流量”向“经济增量”转化, 通过“通道+枢纽+网络”的体系重构, 实现对外开放从通道经济向进出口加工等多元化经济发展转变, 为沿边地区口岸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参考借鉴。

关键词: 通道经济; 枢纽经济; 口岸经济; 向北开放

基金项目: 哈尔滨金融学院省属本科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 基于向北开放战略视角的黑龙江省口岸经济高质量发展研究 (2024-KYYWF-005)

DOI: doi.org/10.70693/201607160011

一、引言

口岸是国家对外开放的门户, 是连接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重要节点。黑龙江省是对俄开放合作最前沿和共建“一带一路”重要节点, 在中国对外开放大局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全省拥有 27 个国家一类口岸, 其中对俄边境口岸 19 个, 是我国对俄口岸数量最多、分布最集中的省份之一。长期以来, 黑龙江省口岸经济发展以“通道经济”为主要模式, 口岸功能集中于货物的过境与中转, 对地方经济的辐射带动作用有限。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推进和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持续深化, 黑龙江省口岸经济面临从“通道经济”向“枢纽经济”转型升级的紧迫任务。2025 年, 黑龙江省委十三届八次全会明确提出, “发挥口岸作为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重要枢纽作用, 努力推动对外开放从通道经济向进出口加工等多元化经济发展转变”。这一战略部署标志着黑龙江省口岸经济转型已从学术探讨上升为省级政策共识。

二、“通道经济”与“枢纽经济”: 概念内涵与理论辨析

(一) 通道经济的概念与特征

通道经济是指依托交通通道 (包括铁路、公路、水路、航空等) 的过境运输功能而形成的经济活动形态。在通道经济模式下, 口岸或通道节点主要承担货物的集散与中转功能, 货物“过而不聚、流而不留”, 经济活动的附加值和本地化程度较低。通道经济具有以下典型特征: 其一, 功能单一化, 口岸主要发挥通关和过货功能, 缺乏加工制造、金融服务、信息处理等增值环节; 其二, 产业空心化, 过境贸易未能有效带动本地产业发展, 地方经济受益有限; 其三, 抗风险能力弱, 一旦外部市场需求波动或通道条件变化, 口岸经济即面临较大冲击。

作者简介: 田丽 (1990-), 女, 硕士, 讲师, 主要研究方向为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
付洋 (1994-), 女, 硕士, 讲师, 主要研究方向为产业经济理论与政策;
姜颖 (1985-), 女, 硕士, 讲师, 主要研究方向为区域经济合作。

（二）枢纽经济的内涵与优势

枢纽经济是指依托交通枢纽、物流枢纽或信息枢纽，通过汇聚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等要素，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和产业集聚发展的经济形态。枢纽不仅仅是货物的中转站，更是要素沉淀、价值转化、产业聚合的核心平台。相较于通道经济，枢纽经济的核心优势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流量”变“留量”，通过加工制造、保税仓储、展示交易等环节将过境货物转化为本地经济增量；二是“通道”变“平台”，将单一的运输通道升级为集贸易、物流、金融、信息服务于一体的综合服务平台；三是“过路”变“落地”，通过产业配套和集群发展实现经济价值的本地化沉淀。

（三）从通道经济到枢纽经济的转型逻辑

从通道经济向枢纽经济转型，本质上是口岸功能从“单一通道”向“综合枢纽”的系统性升级。这一转型的内在逻辑可从以下三个层面加以理解：

第一，价值链升级的逻辑。全球价值链理论表明，不同经济环节具有差异化的价值创造能力。通道经济所处的位置，本质上是全球价值链中的物流中转环节，属于典型的低附加值区间。口岸仅承担货物的集散与通过功能，货物“过境而过”，既不经过本地加工转化，也不嵌入本地产业体系，口岸经济的价值创造被锁定在运输、仓储、报关等有限环节。枢纽经济的转型则推动口岸深度嵌入区域乃至全球产业链。其核心在于：将口岸从“通道”升级为“节点”，使货物、信息、资金在口岸沉淀、加工、重组、增值，再以更高价值形态输出。

第二，空间重构的逻辑。空间组织形态的变革是口岸经济转型的又一核心逻辑。在经济地理学的视野中，通道经济与枢纽经济代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空间发展模式。通道经济遵循“点—轴”空间逻辑。经济活动沿交通通道呈线性分布，口岸作为通道上的节点，其功能主要是确保货物的顺畅通过，而非辐射带动周边区域发展。这种空间形态的典型特征是：要素沿通道单向或双向流动，不在节点处沉淀；口岸与腹地之间的经济联系松散，缺乏产业传导机制；通道沿线的城镇发展不均衡，口岸“孤岛化”现象突出。

第三，功能复合的逻辑。功能维度上的扩展与复合，是口岸经济转型逻辑中最为直观的层面，也是最体现枢纽经济综合竞争力的维度。通道经济的功能是相对单一的，其核心任务聚焦于通关便利化和货物集散。这种单一功能定位带来的突出问题是：口岸服务能力有限，难以满足现代国际贸易对综合服务的需求；口岸附加值空间狭窄，大量与贸易相关的金融、保险、法律、信息等高附加值服务无法在本地实现；口岸应对复杂经济环境的能力不足，一旦通关量下降即面临功能闲置。

三、黑龙江省口岸经济发展的现状与问题

（一）口岸基础设施与通道建设成效显著

“十四五”时期，黑龙江省综合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累计完成投资约 2690 亿元，对外开放水平明显提高。在跨境通道建设方面，黑河公路大桥、同江铁路大桥建成通车，不断提升国际道路运输效能，新增口岸过货能力 2700 万吨。“十四五”以来，黑龙江省已新建黑河公路口岸、黑河步行口岸、同江铁路口岸、黑瞎子岛公路口岸 4 个口岸，全省 19 个边境口岸设计年过货能力从 5347 万吨提升至 8294 万吨。在航空枢纽建设方面，哈尔滨太平国际机场被列为全国十大国际航空枢纽，成为东北地区首条双跑道机场。2025 年，哈尔滨机场共完成运输起降 16.2 万架次、旅客吞吐量 2465.1 万人次、货邮吞吐量 14.9 万吨，均创历史新高。黑龙江省已开通国际客货运航线 22 条，对俄远东客运航线数量居全国第一。

（二）口岸贸易规模持续扩大

2025 年，黑龙江省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达 3125.9 亿元人民币，规模再创历史新高，连续 5 年保持增长。“十四五”时期，黑龙江省口岸货运量达 3.1 亿吨，比“三五”十时期增长 70.3%。全省口岸过货量同比增长 12.8%，地产品出口同比增长 15%，跨境电商进出口同比增长 61.6%。从重点口岸来看，东宁口岸 2025 年进出口货运量历史性突破 100 万吨，实现贸易额、货运量“双百”目标。绥芬河口岸 2025 年货运量达 1043 万吨，占全省口岸货运量的 52.8%。同江铁路口岸截至 2025 年 12 月，年度货运量提前突破 600 万吨。逊克口岸 2025 年全年货运量达 14.65 万吨，同比增长 52.51%。

（三）存在的主要问题

尽管黑龙江省口岸经济发展在“十四五”时期取得了长足进步,过货规模连创新高,通道基础设施建设成效显著,但从“通道经济”向“枢纽经济”转型升级的战略高度审视,仍面临着结构性、体制性和深层次的突出矛盾与问题,制约着口岸经济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提升的跨越。

第一,口岸发展不平衡,空间布局呈现“一家独大”与“两极分化”并存的格局。

黑龙江省虽拥有27个国家一类口岸、19个对俄边境口岸,但口岸之间的发展差距极为悬殊。绥芬河口岸2025年货运量达1043万吨,占全省口岸货运量的52.8%,占据了绝对主导地位;而同江铁路口岸尽管开通三年多来货运量已实现翻倍增长,但年度货运量刚刚突破600万吨,与绥芬河仍有较大差距;部分边境口岸则长期处于“吃不饱”的状态,过货量远低于设计能力,口岸设施利用率偏低。这种“极核型”的空间格局,一方面导致优质口岸面临通关能力趋于饱和、疏港压力持续增大的困境,另一方面大量中小口岸的通道资源却处于闲置状态,口岸资源的空间错配问题突出。更深层地看,部分口岸对单一货源的过度依赖,使其抗风险能力极为脆弱,一旦国际市场价格波动或俄方出口政策调整,口岸经济即面临断崖式下滑的风险。口岸之间缺乏科学的分工协作机制,同质化竞争大于差异化互补,尚未形成“核心枢纽—区域支点—专业口岸”的梯度发展格局。

第二,通道经济特征依然明显,“过而不聚、流而不留”的困境尚未根本扭转。

尽管全省口岸过货量持续增长,但大量货物仍处于“过境而过”的状态,未能有效沉淀为本地经济增量。具体表现为:其一,进出口商品以原材料、能源等初级产品为主,进口方面以木材、铁矿砂、煤炭、粮食等大宗资源性商品占据绝对主导,出口方面则以机电产品、服装、日用百货等为主,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的产品占比偏低,贸易结构亟待优化。其二,落地加工和精深加工能力严重不足,大量进口原材料未经加工即转运至省外或出口,口岸仅承担了“中转站”功能,未能将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和税源优势。以东宁口岸为例,虽已实现帝王蟹等海产品的进口突破,但进口水产品的本地精深加工率仍然偏低,大部分产品仍以初级形态销往省外市场。其三,口岸经济对地方财政收入的直接贡献和就业的带动效应有限,口岸贸易额的增长并未同步带来地方税收和居民收入的显著提升,“过路经济”的特征在多数口岸依然突出。这一问题如若长期得不到解决,将直接影响地方政府对口岸基础设施持续投入的积极性和财政可持续性。

第三、产业配套能力不足,产业生态体系发育尚不成熟,难以支撑枢纽经济的全面构建。

枢纽经济的形成和发展,高度依赖完善的产业配套体系和良好的产业生态。然而,黑龙江省多数口岸周边地区的产业基础相对薄弱,突出表现在以下方面:加工制造业方面,与口岸进口大宗商品相配套的精深加工、装备制造、新材料等产业发展滞后,缺乏龙头企业引领带动,产业集聚效应尚未形成;物流仓储方面,冷链物流、保税仓储、智能仓储等现代物流设施供给不足,难以满足高附加值商品进出口对仓储条件的专业化需求;金融服务方面,面向跨境贸易的融资、担保、保险、结算等金融产品和服务供给单一,中小外贸企业普遍面临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专业服务方面,与国际贸易紧密相关的法律、会计、咨询、认证等现代服务业发育不足,口岸综合服务能力与国际一流口岸相比差距明显。这种产业配套的“短板”效应,使得口岸虽具备一定的过货能力,却无法将过境要素转化为本地产业发展的内生动力,形成“有通道无产业、有流量无沉淀”的尴尬局面。

第四、国际合作对接有待深化,跨境协同机制尚不健全,制约了口岸通关效率与贸易便利化水平的持续提升。

口岸经济的高质量发展,离不开中俄双方的密切协作与高效联动。但当前,中俄两国在口岸合作层面仍面临诸多体制性和机制性障碍:在通关便利化方面,中俄双方口岸通关标准、监管模式、信息共享等方面仍存在较大差异,俄方通关效率偏低的问题在一定时期内仍将存在,中方货物“出口快、进口慢”的非对称通关格局尚未根本改变,直接影响口岸整体通行效率;在标准互认方面,两国在商品检验检疫、质量标准、认证认可等领域的互认机制尚不完善,部分出口商品需重复检验,增加了企业的贸易成本和时间成本;在政策协调方面,两国在口岸开放时间、跨境运输规则、税费政策等方面的协调机制有待健全,政策的同步性和协调性不足,给企业跨境经营带来不确定性;在信息共享方面,中俄口岸之间缺乏常态化的数据交换和实时信息共享机制,中方口岸难以提前掌握俄方一侧的通关状态和车流信息,影响了通关计划的科学调度和资源的合理配置。俄乌冲突背景下,国际地缘政治格局的深刻变化进一步加剧了中俄口岸合作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俄方国内基础设施建设进度受西方制裁影响存在滞后风险,也为双边口岸合作的稳定推进增添了变数。上述问题相互交织,共同构成了制约黑龙江省口岸经济从“通道经济”向“枢纽经济”转型的现实瓶颈。这些问题的破解,不仅需要省内层面的政策创新和资源整合,更需要在国家层面的统筹协调下深化中俄双边务实合作,持续推动口岸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四、黑龙江省口岸经济转型的内在逻辑

（一）国家战略驱动：向北开放的时代要求

黑龙江省口岸经济转型首先是响应国家向北开放战略的必然要求。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推进和“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的加速，黑龙江省作为我国向北开放重要窗口的战略地位日益凸显。2025年，黑龙江省委十三届八次全会明确提出“加快建设哈尔滨向北开放门户枢纽城市，建设国际航空货运枢纽和物流集散枢纽”。这一战略定位要求口岸经济必须从单纯的通道功能向综合枢纽功能升级，以更好地服务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

（二）经济发展规律：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提升的内在要求

黑龙江省口岸贸易规模已连续5年保持增长，2025年进出口总值突破3125.9亿元。在规模持续扩大的背景下，单纯依靠“过货量”增长的发展模式已难以持续。经济发展的规律表明，当贸易规模达到一定量级后，必须通过产业延伸和价值链升级来实现高质量发展。将“过境流量”转化为“经济增量”，是口岸经济从规模扩张转向质量提升的必由之路。

（三）竞争优势重塑：从区位优势向产业优势的转化

黑龙江省拥有毗邻俄罗斯的独特区位优势，但区位优势本身并不自动转化为经济优势。从“通道经济”向“枢纽经济”转型，实质上是地缘区位优势转化为产业竞争优势的过程。通过发展进出口加工、落地加工、保税物流等产业，将“过路经济”转变为“落地经济”，实现口岸经济的本地化、产业化和集群化发展。枢纽经济的核心在于形成“原料进口—加工增值—全国流通”的完整产业链条。

（四）技术变革驱动：智慧化赋能转型

数字技术、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为口岸经济转型提供了技术支撑。智慧口岸建设通过通关流程优化、监管模式创新、信息服务升级等手段，大幅提升了口岸的运行效率和服务能力，为枢纽经济的形成创造了条件。虎林公路口岸成功获批纳入国家智慧口岸试点，同江海关通过三维可视化平台构建“数字孪生口岸”，绥芬河片区信息采集备案时间由30分钟缩短至两分钟、查验通关时间由10分钟缩短至30秒，这些技术变革正在重塑口岸经济的运行逻辑。

五、黑龙江省口岸经济转型的路径

（一）基础设施升级：构建“水陆铁空”立体枢纽网络

在陆路通道方面，持续释放黑河公路大桥、同江铁路大桥运力。黑河公路口岸自2022年6月通车以来，累计进出境货运车辆突破14万辆次，进出口货物超160万吨。同江铁路口岸开通三年多来，年货运量实现翻倍增长，进出口产品从最初的十多种拓展到100多种。黑河—布拉戈维申斯克跨境客运索道已完成整体进度的98%，届时将实现6至8分钟快速通关。在水运通道方面，抚远莽吉塔港作为向北开放的核心水运枢纽，从港口出发的船舶沿黑龙江顺流而下，经俄罗斯出海后直通太平洋，形成了“江连海、海通洋”的立体物流网。

（二）产业集聚发展：推动“通道过货”向“跨境集群”转变

产业是枢纽经济的核心支撑。黑龙江省以“出口抓加工、进口抓落地”为核心理念，推动外向型产业加速集聚。一培育新兴贸易业态。黑龙江省抓住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这一外贸新增长点。东宁口岸跨境电商出口贸易额突破11.3亿元，同比增长146%。黑河一季度跨境电商贸易额同比增长283%。二是推动贸易结构优化。东宁口岸在巩固大宗商品贸易的同时，积极培育高附加值商品，帝王蟹等海产品进口近1000吨，新品种饮料出口额超亿元。绥芬河片区先后获批肉类进口指定口岸、中药材进口指定口岸、钾肥一般贸易进口等资质。

（三）制度创新突破：以自贸试验区引领开放型经济体制改革

制度创新是口岸经济转型的关键保障。中国（黑龙江）自由贸易试验区自2019年设立以来，已成为制度创新的重要平台。绥芬河片区搭建了集贸易、生产、消费、物流、金融于一体的全链条“贸易综合服务平台”，建立自主备案、自主申报、自主核销、自主缴税、简化核准手续的模式。绥芬河铁路口岸与海关共建“关—铁—企”联动平台，推行“7×24”小时预约通关，单趟班列最快30分钟即可完成通关。虎林公路口岸成功获批纳

入国家智慧口岸试点，项目深度融合数字技术，以国际贸易“单一窗口”为数据中枢，构建“一池四体系”的创新架构。项目投入使用后，通关时效将提升40%以上，年货物吞吐能力可达150万吨。

结论

从“通道经济”通向“枢纽经济”转型，是黑龙江省口岸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这一转型既是响应国家向北开放战略的时代要求，也是遵循经济发展规律的内在选择，更是将地缘区位优势转化为产业竞争优势的必然路径。当前，黑龙江省正处于“十五五”开局的关键时期。面向未来，黑龙江省应坚持“出口抓加工、进口抓落地”的发展理念，持续推动对外开放从通道经济向进出口加工等多元化经济发展转变，加快建设立足东北亚、对接俄罗斯、联通东南亚、辐射欧美非的开放合作网络，为构筑我国向北开放新高地、推动东北全面振兴提供坚实支撑。

参考文献：

- [1] 广西口岸经济发展特征及RCEP下的转型升级思路[J]. 价格月刊, 2023(12).--2
- [2] “通道经济”转为“枢纽经济”的实践探索——以金华生产服务型国家物流枢纽建设为例[J]. 综合运输, 2024(2).--21
- [3] 中国枢纽经济发展实践与反思[J]. 区域经济评论, 2023(6).--24
- [4] 口岸经济由“通道经济”转向“产业经济”的对策——以文山州口岸经济发展为例[J]. 社会主义论坛, 2024(2).--
- [5] 黑龙江省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路径研究[J]. 北方经贸, 2024(4).--11
- [6] “开放大通道—沿边口岸—边疆区域经济”复合系统协同效应分析[J]. 商业经济研究, 2023(5).--
- [7] 落地加工：边境口岸避免“通道经济”的路径分析——以广西东兴口岸为例[J]. 环渤海经济瞭望, 2021(8).

From "Corridor Economy" to "Hub Economy": The Logic and Path of Port

Economy Transformation in Heilongjiang Province

Tian Li ; Fu Yang ;Jiang Ying

(Harbin Finance University , harbin, China)

Abstract:Port economy is a critical vehicle for border regions to participate in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nd the dual-circulation development paradigm. As China's strategic forefront of opening-up to Russia, Heilongjiang Province has 27 state-level ports, whose economy has long been dominated by a "corridor" model focused on cargo transit with low value-added and limited spillovers. This paper elucidates the concepts of "corridor economy" and "hub economy," systematically analyzes the internal logic of Heilongjiang's transition from the former to the latter, identifies practical pathways through infrastructure upgrading,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and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and proposes countermeasures to address challenges such as imbalanced development, inadequate industrial support, and insufficient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The study reveals that the essence of this transition is converting transit flows into economic value through a "corridor-hub-network" system, facilitating a shift from transit-oriented to processing-oriented diversified trade. This research offers valuable insights for high-quality port economy development in other border regions.

Keywords: Corridor Economy; Hub Economy; Port Economy; Northward Opening-up

赫哲族文化元素在街津口旅游景观中的应用研究

王佳琪, 于洋

(黑龙江大学艺术学院, 黑龙江 哈尔滨 150080)

摘要:街津口赫哲族乡兼具界江、山林、村落与民族文化资源,是展示赫哲族渔猎文明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窗口。随着文旅项目不断增加,赫哲族文化元素已被运用于建筑立面、入口标识、景观小品、导视设施和体验活动之中,但仍存在符号复制、语义浅表、空间叙事断裂、场景参与不足以及地方居民主体性不强等问题。本文以文化景观理论和设计转译方法为基础,通过文献整理、文化元素分类、公开资料分析与案例归纳,构建“物质载体—视觉符号—行为技艺—口述叙事—生态观念”五类文化元素体系,并从空间层级、使用场景和文化敏感度三个维度分析其在街津口旅游景观中的适用方式。研究提出,应建立文化元素档案与分级使用机制,形成“江—山—村—艺”连续叙事结构,将鱼皮技艺、渔猎工具、伊玛堪、传统纹样和自然崇拜转化为可识别、可参与、可维护的景观语言,同时通过社区共创、非遗工坊、四季活动和数字解说完善运营闭环。研究旨在避免民族文化景观的表面化和同质化,为街津口旅游景观更新及东北少数民族聚居区的文化表达提供参考。

关键词:赫哲族;文化元素;街津口;旅游景观;设计转译;活态传承

DOI: doi.org/10.70693/202607236889

1 引言

1.1 研究背景

文化是旅游目的地区别于一般休闲场所的核心内容,景观则是文化被感知、被理解并被参与的重要媒介。对于少数民族聚居区而言,旅游景观不仅承担游览、交通和服务功能,还关系到民族历史记忆的保存、地方形象的塑造以及社区生活的延续。若景观建设只提取几个醒目的民族符号进行装饰,容易把复杂的文化压缩为可消费的视觉标签;若过度强调原貌复原,又可能忽视现代生活和游客使用需求。因此,如何把文化元素转化为具有空间功能、叙事逻辑和体验价值的设计语言,是民族地区文旅景观建设中的关键问题^[14-15]。

街津口赫哲族乡位于黑龙江省同江市,是赫哲族重要聚居地之一。当地山水资源、边境区位与赫哲族渔猎文化相互交织,形成具有明显地域识别度的文化景观基础。近年来,街津口赫哲旅游度假区逐步形成北山观江、山水秘境、云谷田园等板块,并发展营地、垂钓、采摘、村寨游览和非遗研学等业态^[12]。旅游供给的扩展为文化展示提供了更多载体,也对文化表达的准确性、系统性和持续运营提出了更高要求。

赫哲族文化具有鲜明的渔猎文明特征。鱼皮制作技艺以北方冷水鱼鱼皮为原料,包含剥皮、干燥、熟软、拼剪缝合与艺术修饰等步骤,2006年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9]。伊玛堪则以赫哲语进行散韵结合的说唱,内容涵盖民族历史、英雄故事、渔猎生活、礼仪习俗和道德规范。2025年12月,赫哲族伊玛堪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转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其保护计划同时入选优秀保护实践名册^[10-11,16]。这些成果说明赫哲族文化的保护已由单纯抢救逐步走向社区参与、教育传播和文旅融合,也为景观中的活态应用提供了现实基础。

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本文以“赫哲族文化元素在街津口旅游景观中的应用”为研究对象,目的不是简单罗列鱼纹、鱼皮、渔船等形式,而是分析文化元素从原生语境进入旅游空间后所发生的意义变化,明确不同元素适合进入何种空间、承担何种功能以及应遵守何种文化边界。在此基础上,构建相对简明、可操作的应用框架,为入口、街巷、滨水空间、公共设施、非遗体验点和节庆场景的更新提供依据。

作者简介:王佳琪(2001—),女,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环境设计;

于洋(2001—),男,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环境设计。

理论上,研究有助于将文化景观基因、地方认同与设计转译相结合,强调文化元素既包括可见的器物 and 纹样,也包括行为方式、故事记忆和人与自然的关系^[1,7]。实践上,研究可减少民族文化景观中的符号堆砌,使文化表达与游览动线、休憩服务、研学活动和社区经营顺利衔接。对于街津口而言,形成统一而不过度的景观语言,还能够提升旅游空间的整体性和辨识度,降低重复建设与后期维护成本。

1.3 研究方法与技术思路

研究主要采用文献研究法、文化元素分类法、案例分析法和设计转译法。首先,根据民族学、民间美术、文化景观与旅游规划等资料梳理赫哲族文化要素^[1,7,14-15];其次,结合街津口公开规划与文旅资料,判断现有景观应用的主要类型;再次,从形态、材质、色彩、行为和叙事五个方面分析元素进入景观的转换机制;最后,以真实性、识别性、参与性、适地性和可维护性为评价标准提出优化策略。本文不虚构问卷和统计数据,重点形成面向后续规划设计的基础性研究框架。

2 街津口地域基础与赫哲族文化元素体系

2.1 山水环境与渔猎文化的生成基础

赫哲族长期生活在黑龙江、松花江、乌苏里江流域及完达山余脉地区,江河、湿地、森林、冰雪与季节性生产共同构成其文化形成的自然条件^[13]。水体既是交通通道和食物来源,也是生活秩序、审美想象和口述传统的重要背景;山林为狩猎、采集、木材和桦树皮使用提供条件;漫长冬季则影响交通工具、居住方式、材料选择和节庆节律。因此,赫哲族文化元素并不是孤立的装饰图形,而是从“逐水而居、依江生产、与林共生”的环境关系中产生。

街津口旅游景观的地域优势在于山、江、村之间具有真实联系。游客能够在较短距离内感受观江、登山、村落游览与非遗体验,这为构建连续文化叙事创造了条件。景观设计应首先保护江岸视线、山体轮廓、村落尺度和生产性空间,再选择合适的文化元素进行介入。若忽略自然基底,仅通过彩绘、图腾柱或仿古构筑物制造民族氛围,会削弱街津口本身最有价值的地域特征。

2.2 物质生产与生活器物元素

生产生活类元素是游客理解赫哲族文化最直接的入口,包括渔船、渔网、鱼叉、鱼篓、雪橇、滑雪板、桦皮器具、鱼皮服饰、鱼楼以及传统居住构筑物等。这类元素具有明确的功能原型,其形态与材料来自真实生产过程,适合用于博物展示、场景复原、研学体验和节点小品。应用时应区分“原物展示”与“抽象转译”:具有文物或传统工艺价值的器物应以保护和解说为主,不宜随意改变结构;普通景观设施可以提取其受力关系、编织方式或轮廓特征,转化为廊架、座椅、栏杆和遮阴构筑物。

鱼皮是最具代表性的物质文化媒介。其价值不仅在于表面纹理,更在于从原料获取到熟制、拼接、缝制的完整技艺链^[6,9]。若在景观中仅使用仿鱼鳞图案,游客难以理解鱼皮文化的劳动过程。更合适的方式是把工艺流程转化为连续体验:在入口或导览地图中提示鱼皮文化主题,在工坊外设置材料与工具展示,在室内组织小型制作课程,在休憩区陈列当代文创成果,并通过二维码连接传承人口述和工艺影像,从而形成“看材料—懂工序—做体验—带产品”的完整认知。

2.3 视觉纹样、色彩与材料元素

赫哲族传统纹样来源广泛,常见题材包括鱼纹、鱼鳞纹、水波纹、云纹、太阳纹、植物纹、鸟兽纹、龙纹、人鱼结合纹样和氏族树纹样等。相关研究指出,这些纹样在构成上常采用对称、连续、重复、变形和组合等方式,既具有装饰节奏,也承载对自然力量、生命繁衍和吉祥生活的理解^[2-5,8]。因此,纹样应用不宜把所有图形混合使用,而应根据空间主题选择主次:滨水空间可使用水波、鱼鳞和渔网结构;非遗工坊可使用鱼皮剪贴的边饰和缝合逻辑;儿童活动区可使用经过简化的鱼、鸟、鹿等自然形象;具有宗教或氏族意味的图形则应谨慎使用并征求社区与传承人意见。

色彩方面,应避免以高纯度红、黄、蓝进行大面积“民族化”装饰。街津口自然景观的主色来自江水灰蓝、森林深绿、桦树灰白、土壤棕褐和冬季雪白,传统服饰与手工艺则提供黑、白、红、蓝及自然鱼皮色的对比关系。旅游景观可形成“自然底色为主、民族色彩点缀”的控制逻辑:建筑与铺装保持木色、灰色和低饱和棕色,导视重点信息使用少量红蓝对比,节庆装置可适度提高明度和纯度。材料选择应优先考虑本地木材、石材、耐候金属、可再生复合材料及可替换的纹样构件;真实鱼皮和桦树皮更适合室内展陈或小尺度触摸样本,不宜在户外大面积消耗和暴露。

2.4 非物质文化与叙事元素

非物质文化元素包括伊玛堪、赫哲语、民歌舞蹈、渔猎知识、鱼皮和鱼骨工艺、饮食方式、节庆习俗、民间

故事以及有关自然的信仰观念。与器物纹样相比, 这些内容更难被静态景观直接呈现, 却更能形成深层体验。伊玛堪不是普通背景音乐, 而是一套与语言、表演者、故事情境和社区记忆相关的口述传统。其景观应用应突出“听、讲、聚、演”的空间条件, 例如设置小尺度围合座席、可控制音量的听音装置、夜间故事场、学校与传习所联动的演述活动, 而不是把完整唱段长期循环播放。

饮食、捕鱼知识和节庆活动同样具有时间性。旅游景观需要为这些行为保留可使用的场地, 而非只在墙面上展示文字。可在村落公共空间设置可拆装的市集接口、临时表演电源、洗手与垃圾分类设施, 为鱼食制作、工艺售卖和节庆聚会提供条件; 在江岸和安全水域附近设置关于鱼类、季节和传统捕捞智慧的科普节点; 在冬季则结合冰雪、渔猎故事和暖空间组织小型活动, 使文化表达从单一旺季延伸到全年。

3 赫哲族文化元素在街津口旅游景观中的应用现状

3.1 入口形象与建筑界面的符号化表达

从公开图像与旅游宣传资料看, 街津口现有文化表达多集中在入口门景、牌楼、建筑立面、彩绘墙面和主题雕塑等位置。这些载体能够在短时间内建立“赫哲族目的地”的视觉印象, 鱼形轮廓、渔船、人物服饰和几何边饰具有较高识别性。但此类表达常以完整图案或具象形象直接附着于建筑表面, 文化内容与建筑功能、空间尺度之间联系不足。部分符号在不同节点重复出现, 容易使入口、商业空间和生活空间呈现同一种装饰语言, 弱化村落真实生活的层次。

入口景观的主要任务应是识别、到达和信息组织, 而不是承载全部文化内容。若门景体量过大或图案过密, 会遮挡山水视线并增加维护难度。较合理的方式是利用简洁轮廓形成远距离识别, 在近人尺度配置地图、文化简介和游线选择, 把更丰富的纹样与故事留给后续节点, 使游客在行进中逐步认识文化。

3.2 公共空间与景观设施中的装饰性应用

鱼鳞、波浪、云纹和渔网等元素适合在铺装、栏杆、座椅、灯具、花池和垃圾分类设施中使用, 街津口相关空间已经具备将民族图案融入公共设施的基础。其积极意义在于把文化表达从纪念性节点扩展到日常使用, 游客在停留、行走和休息时能够持续感知地方特征。然而, 若同一纹样在不同材质上等比例复制, 容易形成表皮化装饰; 若设施只追求造型而忽略人体尺度、排水、积雪、抗冻和维修, 则会影响实际使用。

寒地旅游景观还需要考虑冬季识别。复杂镂空在积雪后可能失去图形效果, 浅浮雕铺装容易被冰雪覆盖, 颜色标识也可能因褪色而降低清晰度。因此, 赫哲族元素应更多进入设施轮廓、构件连接和触觉细节, 而不只依赖平面图案。比如座椅侧板可提取鱼尾和桦皮编织的结构关系, 栏杆可采用渔网节奏但满足安全间距, 导视立柱可使用木与耐候钢形成鱼皮自然色和黑色线脚的对比。

3.3 文化展示与体验项目的逐步增加

街津口及同江地区已形成鱼皮工艺品、鱼骨饰品、特色饮食、非遗研学和村寨游览等产品^[12], 说明文化元素正在由静态标识转向体验和消费。工坊、展馆与节庆活动能够直接连接传承人、居民和游客, 是文化活态传承的重要场所。与单纯景观小品相比, 这类项目更容易形成停留时间和消费转化, 也有助于年轻游客通过动手制作理解材料和技艺。

现阶段的问题在于体验项目与室外景观之间联系仍可加强。游客可能在某个室内场馆完成参观, 却难以在后续游线上继续辨认相关文化线索。鱼皮工艺、伊玛堪、渔猎知识和自然环境之间也缺乏一条清晰的叙事链。未来应通过导视编号、主题色、故事标题、活动时间和休憩节点, 把分散的展馆、工坊、滨水空间和村落生活场所连接起来。

3.4 自然景观与民族文化结合仍显不足

街津口最大的景观资源是江、山、林、田与村落的复合环境, 但文化元素的应用容易集中于建筑和小品, 生态空间多被当作观景背景。事实上, 赫哲族文化的核心正是人与江河、鱼类、森林及季节变化的长期互动。若能在滨水慢行、观景平台、植物配置、雨雪管理和生态解说中体现这种关系, 文化表达会更加自然。比如, 不必在每个观景台设置大型民族雕塑, 而可通过鱼类洄游信息、传统天气判断、江面季节变化和旧时交通方式的解说, 让游客理解自然环境如何塑造生活。

4 街津口旅游景观中文化元素应用的主要问题

4.1 文化元素选择缺少层级, 代表性与普遍性混淆

赫哲族文化内部存在不同性质的元素: 渔船、鱼篓等生活器物具有较强公共性; 鱼皮制作属于可展示、可体验的传统技艺; 伊玛堪需要特定语言、表演者和听众关系; 部分萨满信仰、氏族象征和祭祀内容则具有文化敏感性。如果缺少分级, 容易出现两种偏差: 一是把所有空间都装饰成“民族主题”, 造成视觉疲劳; 二是把具有精

神意义的图形当作普通商业图案,削弱其文化尊重。

因此,应建立“普遍使用、限定使用、授权使用、禁止误用”四级清单。鱼鳞、水波、渔网结构等可作为一般性视觉语言;伊玛堪文本、传承人形象和具体唱段应获得授权并标注来源;宗教器物、仪式动作和氏族图形应由社区文化主体判断是否适合公开使用。只有明确边界,文化应用才能兼顾传播与尊重。

4.2 视觉符号多、文化过程少,游客认知停留在表层

旅游景观中最容易实施的是墙绘、雕塑和纹样铺装,但游客看到“鱼”的形象,并不一定理解鱼皮衣如何制作、渔猎生产怎样安排、鱼与江河生态有何关系。文化元素若只表现结果,不呈现形成过程,就会变成拍照背景。尤其鱼皮技艺的价值在于材料处理和手工经验,伊玛堪的价值在于语言、叙事和共同聆听,仅以鱼鳞图案或人物剪影替代,无法传达其核心。

解决这一问题需要把景观节点从“展示物”转向“学习过程”。同一主题至少应包含识别信息、简短解释、可触摸或可操作内容以及进一步参与方式。比如鱼皮主题节点可同时提供鱼皮触感样本、五步工序图、工坊开放时间和作品展示;伊玛堪节点可提供故事梗概、赫哲语关键词、定时演说信息和安静聆听座席。

4.3 空间节点分散,缺少连续叙事与游览节奏

单个文化节点即使设计精美,如果缺少前后联系,也难以形成完整目的地体验。街津口的山水、村寨、非遗工坊和旅游服务空间分属不同板块,游客在移动过程中需要清晰的主题提示和节奏变化。目前常见的导视系统主要解决方向问题,对“为什么到这里、在这里理解什么、下一站将看到什么”的叙事支持不足。

连续叙事并不等于把道路两侧全部做成展览,而是根据游客注意规律设置关键节点。入口负责建立总体认知,主街负责展示生活与服务,工坊负责深入体验,滨水空间负责连接渔猎文明与生态环境,山林空间负责呈现季节和自然观念,离开前的文创与休憩区负责总结和转化。通过主题命名、色彩分区、编号系统和故事线索,形成由浅入深的体验结构。

4.4 体验活动季节性强,公共空间缺少可变使用条件

民族文化体验往往依赖节庆、表演和研学团队,旺季人流集中,淡季场地闲置。部分广场只适合观看固定演出,缺乏遮阴、避雨、取暖、储物和可移动设施,难以支持小型工坊、市集、讲述和社区日常活动。冬季积雪与低温进一步限制户外停留,使文化景观在较长时间内退化为静态观赏。

景观设计应把运营条件前置考虑。活动场地需要预留电源、给排水、灯光接口、移动摊位位置和设备存放空间;设置可拆装风屏、半室外廊下和小型暖屋;利用冬季雪墙、冰面反射与灯光形成低成本季节场景。这样,同一空间可以在平日服务居民,在周末组织手工体验,在节庆承担表演和市集,提升全年利用率。

4.5 社区居民参与不足,文化表达易被外部设计替代

赫哲族文化的主体是社区居民和传承人。外部设计团队若仅依据网络图案和一般民族风格进行创作,容易出现元素来源不清、语义误读和空间与生活脱节。旅游景观建成后还需要居民经营、维护和使用,缺少参与会导致“为游客建设、居民少使用”的情况。文化应用研究应把居民视为知识提供者、共同设计者和收益参与者,而不仅是被展示的对象。

5 赫哲族文化元素在街津口旅游景观中的应用策略

5.1 建立文化元素档案与分级转译机制

第一步是建立可持续更新的文化元素档案。档案不应只有图案图片,还应记录元素名称、赫哲语称谓、来源场景、使用对象、文化含义、传统材料、代表性传承人、可公开程度和推荐应用尺度。可由文化部门、乡政府、传承人、学校和设计团队共同整理,并形成图像、音频、视频和文字多种格式。通过档案可避免不同项目重复搜索、随意改造或相互矛盾。

第二步是采用“原型—提炼—组合—验证”的转译流程。原型阶段尊重真实器物 and 故事;提炼阶段提取轮廓、结构、色彩、材质或行为关系;组合阶段与座椅、铺装、导视、建筑界面和活动功能结合;验证阶段邀请社区居民、传承人和普通游客判断是否易懂、是否准确、是否好用。设计不应追求图案数量,而应强调一个元素在不同尺度上的一致逻辑。

第三步是建立文化敏感度分级。低敏感度元素如水波、鱼鳞、渔网结构,可广泛用于一般公共设施;中敏感度元素如传统服饰纹样、鱼皮工序和英雄故事,需要注明来源并保持基本形态;高敏感度元素如具体仪式、神灵形象和氏族标志,应由社区授权,并限定展示场景。分级机制既保护文化边界,也为设计师提供明确操作依据。

5.2 构建“江—山—村—艺”的总体文化叙事结构

结合街津口现有资源,可将旅游景观组织为“江、山、村、艺”四个相互连接的主题层次。“江”突出渔业

生产、船具、水路交通、鱼类知识与界江景观；“山”突出森林、桦树、采集、狩猎记忆和四季生态；“村”突出居住、饮食、节庆、邻里与当代生活；“艺”突出鱼皮、鱼骨、纹样、伊玛堪和文创生产。四个主题并非独立分区，而是通过一条主线和若干支线形成叙事顺序。

入口综合服务区可设置总体地图和四主题识别系统，让游客根据时间选择半日或一日路线。滨水段以低干预步道、观景平台和生态解说为主，避免过多装饰物干扰江景；村落段利用小尺度节点展示生活器物 and 饮食文化，控制商业招牌尺寸与色彩；工坊段强化可参与项目和文创销售；山林段通过植物标识、声音收集和季节观察呈现人与自然关系。离开节点可设置“今日所见”回顾墙或数字盖章系统，形成体验闭环。

5.3 按空间类型实施差异化设计

入口与交通空间应以清晰识别和秩序组织为主。入口标志可提取舟船上扬的轮廓或鱼尾的动态，但整体形态应简洁，控制高度，保留对街津山和江面方向的视觉提示。停车区、换乘点与游客中心采用统一的鱼鳞模块或水波纹作为识别边框，设置中英文和必要的赫哲语信息，提升边境旅游目的地的文化品质。

村落街巷应以生活真实性为主，避免整街仿古化。建筑更新可在檐口、门牌、院门和店招等小尺度位置使用传统边饰，在色彩上统一自然木色、灰白和低饱和蓝红点缀。居民院落可根据自愿原则设置“生活文化窗口”，展示捕鱼工具、家庭照片、手工艺或特色植物，但应保护隐私和正常生活。公共休憩点可将鱼篓编织、桦皮层叠和雪橇结构转化为座椅与遮阴设施。

滨水空间应以生态安全和文化解释为核心。栏杆、台阶和平台先满足防洪、防滑、抗冻和无障碍要求，再通过结构细节体现渔网、鱼骨或舟船元素。设置少量主题节点讲述鱼类、捕捞季节和江面交通，采用可替换图板以便更新。夜景照明保持低亮度和暖色，避免影响江岸生态；重点节点可利用水面反射和声音装置形成静态、克制的文化氛围。

非遗工坊与文化体验空间应强调“真实生产可见”。工坊外部设置开放时间、体验内容和传承人介绍，内部动线按照材料、工具、工序、作品和购买组织。室外可设置晾晒、清洗或材料展示的模拟区，但涉及卫生、安全和资源保护的环节应由专业人员操作。伊玛堪体验空间宜采用小型围合布局，配置可调声学设施和简洁字幕，不使用与故事无关的强光特效，避免表演被娱乐化包装。

5.4 从静态观看转向多感官与参与式体验

文化体验应同时调动视觉、听觉、触觉和行动。视觉层面通过纹样、材料和空间轮廓建立识别；听觉层面通过伊玛堪、赫哲语词汇、江水和劳动声音形成情境；触觉层面提供鱼皮、桦皮、木材和编织样本；行动层面设置鱼皮剪贴、纹样拓印、渔网结体验、故事接龙和季节观察任务。多感官并不等于技术越多越好，关键是每种媒介都指向明确文化内容。

针对不同游客可设置难度梯度。普通游客需要 5 至 15 分钟即可完成的微体验，如纹样盖章、听一段故事、触摸材料；亲子与研学团队可选择 30 至 90 分钟的工艺课程和自然观察；深度游客可预约传承人讲解、社区餐食和专题线路。通过梯度设计，避免所有项目都以大团体表演为中心，也为社区小规模经营创造条件。

数字技术适合补充而不是替代真实文化。二维码、AR 和小程序可提供多语种故事、工序视频、活动预约和路线导航，减少户外展板的文字负担。数字内容应标注来源、讲述人和版权信息，并保留离线可用的基础导览，避免网络条件限制。对于伊玛堪等口述传统，可以建立“听一句赫哲语—看一句译文—理解一个场景”的轻量化内容，使游客在短时间内获得准确认知。

5.5 形成适应寒地环境的色彩、材料与设施导则

街津口旅游景观需面对低温、积雪、冻融和季节性客流。文化元素的形式必须服从耐久与维护。铺装图案宜采用不同石材或模块拼接形成结构性差异，减少后期涂料褪色；木构件应选择耐候处理和可替换节点，避免大面积精细雕刻暴露在冰雪中；金属构件应控制冬季直接接触面，座椅增加木质或复合材料面层；导视文字和图形应在积雪背景下保持高对比。

色彩导则可分为基底色、识别色和活动色。基底色以灰白、深木色、鱼皮棕和森林绿为主，覆盖建筑、铺装和大型设施；识别色选用低饱和蓝与红，用于导视编号和关键节点；活动色在乌日贡、冰雪活动和市集期间临时使用，活动结束后撤除。该方法既保持日常景观稳定，也为节庆营造留出变化空间。

5.6 完善社区共创、运营反馈与分期实施

文化景观项目应建立社区共创机制。前期通过传承人访谈、居民照片征集、旧物故事会和儿童绘画收集元素；方案阶段组织小型工作坊，让居民选择更能代表本地生活的主题并评价使用便利性；建设阶段优先吸纳本地工匠和合作社参与可制作的构件；运营阶段把工坊、市集、讲述和维护岗位与居民收益连接。社区参与不仅提高文化准确性，也能减少建成后闲置。

实施上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完成元素档案、导视系统和关键节点微更新，以较低成本解决识别混乱和信息缺失；第二阶段完善滨水、村落与非遗工坊之间的游线，增设参与式体验和可变活动设施；第三阶段建立数字内容平台、全年节事体系和品牌化文创，并根据游客反馈与社区收益持续调整。评价指标应同时关注游客理解度、设施使用率、居民参与人数、活动复购率、维护成本和文化授权情况，而不能只评价拍照效果。

6 结论

赫哲族文化元素是街津口旅游景观形成地域识别与文化深度的重要资源。其内容不仅包括鱼纹、鱼皮、渔船等可见形态,还包括渔猎生产过程、伊玛堪口述传统、节庆饮食、社区生活以及人与江河山林相处的生态观念。只有将这些要素作为相互关联的文化体系,而非零散装饰素材,才能避免民族景观的同质化。

研究认为,街津口现有应用已经覆盖入口形象、公共设施、文化展示和体验项目,但仍存在元素层级不清、视觉符号偏多、空间叙事断裂、淡旺季差异明显和社区主体性不足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应建立文化元素档案和敏感度分级,采用原型提取与功能结合的设计转译方法,构建“江—山—村—艺”的连续叙事,并按照入口、街巷、滨水、工坊和活动空间实施差异化设计。

未来的重点不是增加更多民族装饰,而是提高文化表达的准确度、参与度和可持续性。通过多感官体验、数字解说、寒地设施导则、社区共创和分期运营,街津口可以形成既服务游客又融入居民生活的文化景观。本文主要依据文献和公开资料进行框架性研究,后续还需结合实地测绘、游客访谈、居民意见和建成后评价,对具体节点、纹样尺度、色彩参数及游线效果进行验证。

参考文献:

- [1] 董禹, 费月, 董慰. 基于文化景观基因法的赫哲族传统聚落文化景观特征探析——以四排赫哲族乡为例[J]. 小城镇建设, 2019.
- [2] 王锐, 田丽华, 郭杰. 赫哲族传统吉祥纹样[J]. 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11, 29(4): 99-101.
- [3] 姜洪波. 赫哲族纹饰文化初探[J]. 黑龙江民族丛刊, 1995(2): 94-97.
- [4] 王相生, 孙海佳, 温洪伟. 赫哲族传统图案研究[J]. 艺术教育, 2011(8): 126.
- [5] 张思凯, 张秀梅. 赫哲族传统纹饰研究[J]. 学理论, 2009(18): 127.
- [6] 闪烁. 乡村振兴背景下鱼皮服饰文化的传承与创新[J]. 边疆经济与文化, 2022(5): 62-64.
- [7] 范铁明, 毕辛格. 黑龙江街津口赫哲族鱼骨手工艺传承与发展[D]. 2022.
- [8] 庄善洁, 崔广丽. 赫哲族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挖掘与数字化实践[J]. 2023.
- [9]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网. 赫哲族鱼皮制作技艺[EB/OL]. https://www.ihchina.cn/project_details/14425/, 2026-07-22.
- [10]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网. 赫哲族伊玛堪[EB/OL]. https://www.ihchina.cn/directory_details/11896/, 2026-07-22.
- [11] UNESCO. Hezhen Yimakan storytelling[EB/OL]. <https://ich.unesco.org/en/RL/hezhen-yimakan-storytelling-02224>, 2026-07-22.
- [12] 黑龙江省文化和旅游厅. 黑龙江: 同江让百姓吃好“文旅饭”[EB/OL]. 2025-04-03.
- [13] 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 赫哲族概况[EB/OL]. <https://www.neac.gov.cn/seac/ztzl/hzz/gk.shtml>, 2026-07-22.
- [14] 王英海, 孙煜, 吕品. 赫哲族传统图案集锦[M]. 哈尔滨: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2011.
- [15] 俞孔坚. 景观: 文化、生态与感知[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1998.
- [16] 吴必虎. 区域旅游规划原理[M]. 北京: 中国旅游出版社, 2001.

Application of Hezhe Cultural Elements in the Tourism Landscape of Jiejinkou

Jiaqi Wang, Yang Yang

(School of Arts,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Heilongjiang, Harbin, China)

Abstract: Jiejinkou Hezhe Township integrates river, mountain, village and ethnic cultural resources, and is an important place for presenting Hezhe fishing-hunting civilization and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Based on literature review, cultural-element classification, public-document analysis and design translation, this study establishes a five-part system consisting of material carriers, visual symbols, behavioral crafts, oral narratives and ecological concepts. It finds that Hezhe elements have been used in entrances, building facades, landscape facilities, interpretation systems and cultural activities, but problems remain, including superficial symbol reproduction, fragmented spatial narratives, insufficient participation, seasonal operation and weak community agency. The paper proposes a graded cultural-element archive, a continuous “river-mountain-village-craft” narrative, differentiated design for multiple spatial types, multisensory experiences, cold-region material guidelines, and a community-based operation mechanism. The study provides a practical reference for cultural landscape renewal in Jiejinkou and other ethnic tourism settlements in Northeast China.

Keywords: Hezhe Ethnic Group; Cultural Elements; Jiejinkou; Tourism Landscape; Design Translation; Living Heritage

数智化转型背景下“双师型”教师教学评价的重构路径 ——基于布迪厄场域理论的视角

张楚兰，阮春颜

(东莞城市学院，广东 东莞 523419)

摘要：伴随教育评价改革持续深入与数字技术向职业教育的纵深渗透，“双师型”教师教学评价正处在由经验主导迈向数据驱动的过渡期。这一过渡期里，旧的评价逻辑开始失效，新的评价范式尚未稳固，问题集中显现。本研究以布迪厄场域理论为观察透镜，借鉴文献分析、理论推演与系统分析等研究方法，搭建起“场域—资本—惯习”的三维解释框架，从社会学视角切入“双师型”教师教学评价面临的现实难题。透过分析发现，评价主体认知偏差、相关利益方博弈干扰、实践教学资源支撑薄弱，是当前尤为突出的三方面困境，彼此之间相互交织，束缚着“双师型”队伍整体质量的提升。本研究据此提出破局思路：把“以人为本”作为价值方向，把职业场域和数智时代作为两条支撑基线，把“教学评一致性”、区域性教师研修共同体、校内外一体化实训基地作为三条落地路径。期望能够为“双师型”教师队伍在新时期的高质量建设，提供兼具学理依据与实操价值的参考。

关键词：数智化转型；“双师型”教师；教学评价；场域理论

DOI: doi.org/10.70693/202606283272

一、引言

“双师型”教师是支撑职业教育类型特色落地的关键力量，其教学评价水准直接影响技术技能人才培养的整体质量。理解这一群体的评价实践，离不开对其所处社会空间的细致考察——教师并非孤立个体，而是被一组复杂的关系网络所塑造。布迪厄提出的场域理论，恰好为剖析这种关系网络提供了便利工具。它关注的“位置—资本—惯习”三角结构，能够把评价过程中的多方博弈、隐性规则与文化惯习一并呈现出来，这对破解当前“双师型”教师评价中的认知偏差与利益冲突颇具解释力。既往研究较多从管理学或课程论角度入手，社会学视角的引入相对薄弱，本研究正是希望在这一空间内作些尝试。选择“双师型”教师作为分析对象，原因并不复杂：这一群体既是教育评价改革锁定的重点人群，又身处于数字化与智能化转型的最前沿，兼具政策敏感性与实践复杂性，可视为观察“评价范式如何转型”的一个合适样本。

教学评价一向被视为教师反思教学、改善课堂的重要抓手，也是教育评价改革绕不开的环节。回顾近年来的政策走向：2018年4月，教育部发布《教育信息化2.0行动计划》，把推进智能教育作为重要方向，鼓励人工智能在教师管理、课堂教学等领域落地；^[1]2020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明确将“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纳入重点评价范围，要求建立与职业教育发展相匹配的评价机制。^[2]政策信号已经相当清晰：一方面，信息化2.0为智能教学打开了新的可能空间；另一方面，“双师型”教师队伍如果不能抓住数智化这一窗口期实现跃升，建设目标便难以真正落地。职教场域正在发生结构性变化，评价体系如何回应这种变化，成为一个绕不开的现实议题。本文以布迪厄场域理论作为分析坐标，围绕“双师型”教师教学评价的现实困境展开讨论，并尝试给出系统化的重构思路，为教师队伍建设提供可参考的学理与实践方案。

二、数智化转型背景下“双师型”教师的角色定位

作者简介：张楚兰（1986-），女，硕士，研究方向为课程与教学论、教师专业发展；

阮春颜（1980-），女，博士，研究方向为教学法。

通讯作者：阮春颜

布迪厄在长期社会学研究中提炼出“场域”这一核心概念，用以描述社会空间中各种位置之间的客观关系。在他看来，社会并非铁板一块，而是由若干相对独立又彼此关联的场域组成；每个场域都有自己的运行逻辑和资源分配机制，而行动者在场域中所处位置，又取决于其所掌握的资本总量及其惯习倾向。^[3]把这一视角迁移到职业教育领域，可以观察到，“双师型”教师的教学评价正是在职业场域和数智场域的交叉点上生成的，其形态由两种场域的资源分布、文化惯习共同塑造。理解这一点，对设计合理评价体系至关重要：评价不应只考察教师个体的教学能力，更需要关照其所处的资源条件与制度环境。基于此，本文认为“双师型”教师教学评价应当贴近职业教育的内在规律，做到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并重，既能服务特色化人才培养，又能推动基础知识与实践能力的双向融合，最终导向一支既具扎实理论功底、又具过硬实操能力的教师队伍。

（一）“以人为本”作为评价的底层逻辑

“以人为本”的提法，在不少场合被当作一种修辞而非操作原则使用。在教学评价语境中真正落实这一原则，关键在于把教师与学生共同置于评价的中心位置，让评价过程同时成为教与学协同改进的过程。这种评价范式建立在教师的职业自觉之上，不依赖外部强力推动，而是对教学复杂性给予充分理解与尊重。^[4]具体而言，有两个层面的工作需要展开：一方面，把教师的专业成长本身视为评价的应有之义，关心其身心投入与持续发展，把过程性反馈和结果性判定结合起来，让评价数据真正服务于教师改进教学；另一方面，不能忽视学生作为评价主体的地位，评价既要听外部的、也要听教学一线的声音。过去的做法偏重经验感知，评价主体单一，定量与定性分析相互割裂，主观判断与客观证据难以兼容。这些老问题如果不加正视，评价就容易与职业教育的真实需求之间出现落差。“双师型”教师教学评价有必要跳出惯性，主动对接数智化趋势，把互联网平台、大数据分析等手段纳入评价工具箱，让评价结果更具说服力。

（二）课堂教学质量作为评价的核心落脚点

如果把场域理解为一种相对自主的活动空间，那么个体的行为取向就会明显受到所在空间的塑造。当“互联网+”渗入职业教育的日常，教与学的时空边界被大幅打开，正式学习与非正式学习相互交织，线上教学与线下教学不再是非此即彼的二元选择，而是开始融合为一张网络。教学评价如果要适应这种变化，就必须把视角从单一课堂扩展到整个教学网络：教学设计、师生互动、学习痕迹都应当进入评价的视野。智能录播、情感识别、智能评测等技术的成熟，为多源数据的采集与分析提供了可能，过去那种依赖主观印象的评价方式，正在让位于立体化、伴随式的精确判断。需要承认，眼下教学评价的数据来源仍然偏窄，数据类型与维度都不够丰富，对教学行为的解释力也有限。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在评价技术、评价工具上同时下功夫，让跨场景、跨模态的数据能够真正整合起来，支撑起更可信的评价结论。

（三）资源整合作为评价的现实支撑

实践教学评价是“双师型”教师评价中容易被忽视、却分量很重的一块。它牵涉的并不只是某一次课或某一个项目，而是教师带领学生完成实验、进入企业、做出成果的全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教师能不能把校内外资源用好，决定了实践教学究竟能走多远。从学校端看，实验室与校内实训基地是基本盘，但仅有这些还不够，教师的工程经验、对接产业的能力同样关键；从企业端看，工程现场、生产一线是天然的教学资源，但现实中学生往往被安排在流水线边缘，难以深度参与核心环节，这一矛盾长期存在。破解之道在于让学校资源与产业资源真正发生化学反应。教师需要把企业能提供的真实课题、真实工艺、真实问题引入教学，学生也需要走出教室、走进车间，在解决真实问题中锻炼能力。^[5]职业院校要做的，是搭建起校内外资源流转的桥梁，让教师评价能够真实地反映教师的资源整合水平，而不是只看课堂表现。

三、“双师型”教师教学评价面临的现实困境

把教学评价看作一个系统，可以看到它由主体、环境、数据三类要素构成，三者并非孤立存在，而是相互嵌套、彼此影响。教学环境支撑教学行为、生产教学数据；教学数据反映教学过程、记录教学效果；主体则对二者进行解读与重构。这意味着，对教学评价的反思不能只盯着评价行为本身，而要把环境优化与数据治理同时纳入考量。结合当前教育评价改革的方向与基层调研情况，“双师型”教师教学评价的问题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每一方面都有其特定的成因与表现。

（一）评价主体层面的认知偏差

评价实践中长期存在一种偏向：管理者视角占据主导，教师个体的努力和付出被压缩成可比较的分数。这种偏向带来的直接后果是评价更多服务管理需要，而不是真正回应教师成长。学生的评价权也常被边缘化，学生给

出的反馈,多基于印象与情绪,难以覆盖教师投入的全貌;评价结果容易受学生个人偏好影响,呈现出“印象分”而非“证据分”的状态。再看评价的时段分布——多数评价集中于学期末,中期反馈流于形式,对教学过程的持续追踪几乎缺位,教师拿到评价时课程往往已经结束,改进窗口已经关闭。换言之,当下的评价在“管”而非“促”,在“评”而非“育”,这种偏差如果持续,将进一步削弱评价对教师专业发展的推动作用。

(二) 教学过程中利益相关方的博弈干扰

高职院校带有明显的多元主体特征:一头连着学校、教师、学生这些内部主体,另一头牵着政府、企业、市场等外部主体,每一方都带有自己的利益考量与资源掌控能力。^[6]理想状态下,评价应当是各方在公共空间中找到最大公约数,达成深度合作;可实际情况要复杂得多。不同学校掌握的资源差异显著,教师在跨校交流、跨校评价时往往处于不对等地位。资源相对充裕的学校,评价工具更先进、数据基础更扎实;资源紧张的学校,则更倾向于沿用经验型、粗放型的评价方式。这种差异在评价结果上被进一步放大,导致同一职称层级、同一岗位类别的教师,得到的评价结论却难以直接比较。更深层的问题是,评价工具与教师实际工作场景之间出现了错位,“双师型”教师本就承担理论与实践的双重任务,可现有评价往往只考核了其中一面,难以反映其工作全貌,也难以对其改进形成有效指引。

(三) 实践教学评价中的资源支撑薄弱

“互联网+教育”已经不再是新鲜概念,疫情之后,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更是成为职业院校的常态。在这种背景下,教师的精力投入方式已经发生显著变化:除了站在讲台上,他们还要维护网络课程、组织线上活动、整理数字化资源、设计线上线下的衔接环节。这部分工作投入大、过程性强,传统的总结性评价方式很难捕捉到其真实价值,中期反馈又往往流于形式,无法形成动态校准。^[4]换句话说,评价系统在“实时性”这一点上明显滞后——评价结果出来时,教学场景已经切换,教师无法根据评价调整下一阶段的教学。要破解这一难题,需要把“人—事—场”这三个维度串起来:教师、学生、教学场景应当被作为一个整体来观察,评价数据也应尽可能覆盖从课前准备到课后反馈的全链路。已有的评价证据大致可以归为五个层面:课程设计的证据、教学实施的证据、学习过程的证据、学习结果的证据,以及教学环境与资源的证据。^[7]当前的实践教学评价之所以难见成效,原因之一就在于对这五个层面的覆盖不全,评价证据与教师实际工作之间存在结构性落差。

四、数智化转型背景下“双师型”教师教学评价的路径

(一) 把“以人为本”作为评价的方向盘

“以人为本”四个字在职业教育评价话语中频繁出现,但真正落到操作层面并不容易。这里的“人”,既指教师,也指学生,还包括所有与评价相关的工作主体。价值取向的调整需要贯穿评价全过程——从指标设计、数据采集到结果反馈,都要回到“人”本身。^[3]过去一段时间,职业院校评价体系中分数、绩点、排名占据了相当大的权重,这种量化取向便于管理,却容易让评价落入“只见数字不见人”的尴尬境地。事实上,职业教育的实践属性决定了单纯靠分数难以刻画教师的真实贡献,学生的成长也绝非几个数字所能涵盖。要让人本理念真正落地,评价改革需要在方法层面做出实质性调整。质性评价不是对量化评价的简单否定,而是一种补充与平衡——它关注教师在具体情境中做了什么、怎么做的、产生了什么影响,这种判断往往比分数更能反映教学的实际样貌。具体的质性方法可以是多种多样的:档案袋评价记录教师的成长轨迹,表现性评价观察教师在真实任务中的表现,苏格拉底式研讨评价通过对话挖掘教学反思,答辩法则让教师在公开场合陈述与回应问题。^[8]不同类型的课程也应当匹配不同的评价策略:理论课侧重理解深度,开放性试题更能反映真实水平;实训课则应提高过程性评价比重,把学生互评与教师评价结合起来;与职业资格证书挂钩的课程,可以直接参考资格考核的结果,避免重复评价。

(二) 把“职业场域”和“数智时代”作为两条支撑线

1. 夯实与区域产业同频的内部场域

“双师型”教师评价的根基在于学校与所在区域的真实联系。脱离地方产业谈教师培养,无异于纸上谈兵。职业院校的特色,归根结底要看它能不能培养出“当地用得上、业内叫得响”的人才;而教师评价的导向,则要看它是不是真正在引导教师走入地方、走入产业、走入真实的文化生态中。脱贫攻坚、乡村振兴、农民工技能提升、非遗传承等具体场景,既是教师施展才能的舞台,也是评价教师实践能力的最佳考卷。鼓励教师扎根这些场景,评价体系就需要相应地给出“加分项”,让真正下到基层、下到产业的教师获得认可,让浮在表面、只做纸面文章的教师难以蒙混过关。区域文化的发掘与课程资源的整合,也是这一过程中的应有之义:把地方特色文化、

产业文化带入课堂,本身就是“双师型”教师应该具备的能力。^[9]

2. 搭建以多维数据为支撑的外部评价场域

数智化时代给教师评价带来的最大变化,是评价素材的极大丰富。课堂上的互动数据、平台上的学习行为数据、实训中的操作记录、校企合作中的反馈信息,都有可能成为评价的支撑。如何让这些来源不同、形态各异的数据真正服务于评价,需要在方法层面下功夫。简单堆叠数据并不能带来真实价值——线上数据与线下数据需要按教学活动的实际序列重新组织,时间维度上的累积数据与空间维度上的分布数据需要放入统一坐标系进行配准与整合。^[10]在数据整合的基础上,评价视角才能从“单点考核”走向“全程画像”,从“经验判断”走向“证据判断”。对教师而言,这意味着评价不再只是学期末的一张成绩单,而是一幅持续更新的工作图景;对学生而言,评价也能更准确地反映其在不同学习场景中的真实状态。数据驱动的评价要想真正落地,学校层面需要建设数据治理的基础设施,教师层面则需要具备基本的数据素养,这两点都应当在评价改革中同步推进。

(三) 把三个着力点做实:教学评一致、研修共同体、校内外一体

1. 把“教学评一致性”作为课堂改进的切口

“教什么就评什么、怎么教就怎么评”,说起来简单,做起来却是课堂改革中最难落地的环节之一。传统课堂的一大症结在于:课上教完了,作业批完了,课程就结束了,至于学生究竟学到了什么、哪些目标达成了、哪些没有,往往到学期末才仓促盘点。这种“事后盘点”式的评价很难真正改进教学,反而容易演变为“走过场”。要实现“教学评一致性”,课堂本身需要被重新设计——课前要让学生带着问题进入学习,课中要有充分的活动让学生暴露真实理解,课后要有针对性练习让学生巩固迁移。^[11]评价嵌入到这三个环节中,而不只是在末尾出现一次,教师也才能从评价中获得及时反馈,动态调整后续教学。学生方面,则在持续的“学—做—评”循环中培养起真正的学习能力,而不是被动应付作业。元认知能力的培养是这一过程中的关键目标:让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不断反思自己的理解、监控自己的进度、调整自己的策略,这样的学习才有可能走得更远。

2. 用区域性教师研修共同体打破校际壁垒

职业教育的生命力在于与产业的深度互动,而产业的文化积淀恰恰是最容易被忽视的资源。把当地产业文化挖掘出来、整理出来、带入课堂,是“双师型”教师应当具备的“软实力”。这一能力不可能单靠一所学校培养出来,需要区域内的教师们彼此协作、共同打磨。借助区域已有的经验,搭建起跨校的“双师型”教师研修平台,可以汇聚不同学校、不同专业的师资力量,形成开放、互补、互鉴的研修生态。这样的研修平台并不追求整齐划一,而是鼓励不同学校贡献自己的特色资源:有的学校对地方文化有深入研究,有的学校与企业有长期合作,有的学校在数字化教学方面积累丰厚,资源在平台上流动起来,就能产生“1+1>2”的效果。互联网工具可以进一步放大这种效应——跨校的集体备课、专题研讨、案例分析,都可以在线上完成,物理空间的限制由此被大幅突破。更为重要的是,这种研修模式还能够反哺课程建设:跨学科、跨领域的合作能够催生新的课程方向,让学生的视野从单一专业扩展到更广阔的真实世界。

3. 让学校与企业形成育人共同体

“双师型”教师的实践能力,离不开真实产业的滋养;评价“双师型”教师,也不能只看校内表现。理想的实践教学评价应当把校内外两个场景的信息都纳入进来:学生作为教学的直接感受者,他们的评价应当占有重要权重;教研室与系部作为同行,对教学设计与实施的过程最为了解,他们的判断能够补充学生视角的盲区;学院层面的专家组审定,则承担最终把关的角色,把前两方面的评价整合成结论。^[12]评价结果的使用也应当走出“分数即奖惩”的窄路:对在实践中表现突出的教师,在职称晋升、课题分配、评优推优上给予明确倾斜,让“双师型”身份与实际收益真正挂钩;对暂时表现欠佳的教师,则要给出有针对性的改进建议、必要时配以指导教师,避免“一刀切”式的退出机制。只有当评价结果与教师发展真正形成回路,“双师型”教师队伍才能在动态调整中保持活力。

五、结语

“双师型”教师教学评价是一项需要持续打磨的工作,职业教育的转型节奏越快,对评价体系的反作用力就越大。把布迪厄场域理论作为观察工具,可以看到评价实践中那些被忽视的结构性力量:资源分布、利益博弈、文化惯习,都在塑造着评价的实际样貌。本文尝试以“以人为本”为方向、以“职业场域”和“数智时代”为基线、以“教学评一致、研修共同体、校内外一体”为路径,给出一组可供操作的建议。落地效果如何,需要在更具体的院校场景中加以检验。“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是一个长期工程,教学评价也不可能一蹴而就,它需要随着职业教育改革的推进不断迭代、不断精进。

参考文献:

- [1] 教育部印发《教育信息化 2.0 行动计划》[EB/OL].http://www.moe.gov.cn/srcsite/A16/s3342/201804/t20180425_334188.html
- [2] 新华社.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EB/OL].http://www.gov.cn/zhengce/2020-10/13/content_5551032.htm,2020-10-13.
- [3] [法]皮埃尔·布迪厄.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M].李猛,李康,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133.
- [4] 曹志平.“以人为本”理念下的高职教学管理探索[J].教育与职业,2009(17):47-48.
- [5] 牟智佳,刘珊珊,陈明选.循证教学评价:数智化时代下高校教师教学评价的新取向[J].中国电化教育,2021.
- [6] 杜蜀宾,贺建华.双师型教师教学评价探析[J].徐州建筑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7.
- [7] 石伟平.职业教育国际化水平和国际竞争力提升:战略重点及具体方略[J].现代教育管理,2018.
- [8] 毛刚,周跃良等.教育大数据背景下教学评价理论发展的路向[J].电化教育研究,2020.
- [9] 牟婷,柏文涌.特色高水平院校建设背景下高职内涵发展的问题与路径[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19.
- [10] 袁剑波,郑健龙.工程实践能力:培养应用型人才的关键[J].高等工程教育研究,2002,(3):35-37.
- [11] 王琳.高职教学评价现状分析[J].职业教育研究,2007.

Rethinking the Teaching Evaluation of “Dual-Qualified” Teachers amid

Digital-Intelligent Transformation: Insights from Bourdieu's Field Theory

ZhangChulan,RuanChuYan

(DongguanCityUniversity,DongguanCityUniversity,Dongguan,China)

Abstract: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the ongoing reform of educational evaluation and the deepening penetration of digital technology into vocational education, the teaching evaluation of "dual-qualified" teachers is currently navigating a critical transition from an experience-driven to a data-driven paradigm. In this transitional phase, the established evaluation logic is gradually losing its explanatory power, while the emerging paradigm has yet to attain stability, giving rise to a pronounced concentration of problems. Taking Bourdieu's field theory as an interpretive lens and employing literature analysis, theoretical reasoning, and systematic analysis as its research methods, this study constructs a three-dimensional analytical framework of “Field—Capital—Habitus” to investigate, from a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 the practical dilemmas confronting the teaching evaluation of “dual-qualified” teachers. The analysis identifies three particularly salient challenges: cognitive biases among evaluation subjects, distortions induced by stakeholder contestation, and weak institutional support for practical teaching resources. These three challenges are mutually intertwined and collectively constrain the overall quality improvement of the “dual-qualified” teacher workforce. Accordingly, the study proposes a breakthrough strategy: adopting a “people-oriented” approach as the guiding value, anchoring the vocational field and the digital-intelligent era as two foundational pillars, and operationalizing the “alignment of teaching, learning, and evaluation”, regional teacher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communities, and integrated school-enterprise training bases as three implementation pathways. The study is expected to provide a reference that integrates theoretical rigor with practical relevance for advancing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dual-qualified" teacher workforce in the new era.

Keywords: digital-intelligent transformation; “dual-qualified” teachers; Teaching-agedifferences; Primaryeducation; Studentcultivation

新课标视域下统编版高中语文教材“学习提示”探究 ——以高中语文必修上下册为例

荀欣

(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 四川 成都 610000)

摘要: 统编版高中语文教材在课后习题设计上进行了革新, 以“学习提示”替代传统习题。本文以高中语文必修上下册为例, 系统阐明“学习提示”的概念内涵, 分析其“一课一篇”与“一课多篇”两种编排形式下的呈现方式差异, 并将其功能划分为文本解读与认知、学习策略与方法指导、延伸拓展与应用三大类别。在此基础上, 探讨学习提示在落实课标理念、促进学生语文能力发展中的重要价值。

关键词: 课程标准; 学习提示; 助读系统; 统编高中语文教材

DOI: doi.org/10.70693/202607012110

语文教材是教师与学生之间进行教学互动的重要媒介, 承担着知识传递、思维培养、情感熏陶与审美教育等多重功能。它不仅是学生学习语文学科知识的关键载体, 也为语文教师提供了具体的教学依据, 在语文课堂教学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随着教育的不断推进, 统编高中语文教材与以往的教材相比, 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尤其是在课后习题的设计上。新教材没有设置课后习题, 每一课安排简短的学习提示, 主要是设定学习情境, 引发兴趣, 提示学习要点和方法^[4]。

“学习提示”是教师和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重要依托, 能够帮助教师构建有效的学习情境, 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并提示学习的关键要点和方法。师生若想要更加高效地发挥学习提示的辅助作用, 对其进行基础且全面的研究是首要前提。因此我将以高中语文必修上下册为例, 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研究: 阐明“学习提示”的相关概念, 对其呈现方式与内容进行简要分类梳理, 并探讨其与新课标的关联性。

一、学习提示的概念

目前对于学习提示的概念, 学术界还没有统一明确的界定。根据诸多学者的相关研究, 我将其定义整理归纳如下: “学习提示”是指统编版高中语文教材在单元每一篇课文后设置的简短、结构有序的助读文字, 旨在通过提醒和指示, 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课文内容, 掌握阅读方法, 激发学习兴趣, 并为学生的自主学习提供指导和支持。

从字面上看, “学习提示”由“学习”和“提示”两个核心词组成。“学习”指的是学生通过阅读、听讲、研究、实践等方式, 逐步获取知识、训练技能或提升认知的过程; 而“提示”则是提醒和指示, 意味着对学习者的提供方向、建议或帮助^[5]。在这一概念下, 学习提示可以被看作是在教材编写过程中, 针对课文内容、学习方法及相关知识等方面所做的引导性、指示性说明, 目的是在学生学习的过程中提供帮助, 解答疑惑, 明确学习目标, 促进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和应用。

从系统归属上看, 学习提示属于助读系统的一部分 (系统归属有争议, 但本文更偏向于助读系统)。助读系统是语文教材中为学生自主学习提供辅助支持的模块^[6], 学习提示在其中的作用主要是为学生的学习提供预设的

作者简介: 荀欣 (2002-), 女, 硕士, 研究方向为学科教学。

指导和帮助。与教材中的“单元导语”、“单元学习任务”等部分共同构成助读系统,学习提示从内容的指引性和功能性上,直接服务于课文学习,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消化课文内容。

从具体位置来看,学习提示位于教材每一篇课文之后,并且通常采用多段落式的结构,内容简洁而有序。每篇学习提示的篇幅适中,段数可多可少,形式灵活,便于学生快速查阅与理解。

二、学习提示的呈现方式及类别

(一) 呈现方式

统编版高中语文教材在编排方式上进行了重要创新,突破了传统“单篇文本为一课”的编排模式,采用了“单篇选文为一课”(即“一课一篇”)和“多篇选文为一课”(即“一课多篇”)两种形式。这种编排方式充分体现了教材内容的整合性,并指向学习任务群的教学的实施。既借鉴了以往教材编写与教学实践的成果,又打破了文体限制,增强了课程内容的整合度。以高中语文必修上下册为例^{[2][3]},其分布数据如下图所示。

	必修上册	必修下册	总计
一课一篇	5	8	13
一课多篇	11	8	19

与此相适应,学习提示的设置方式也发生了变化。学习提示统一设置在每一课的后面,而非每篇课文之后,并且根据“一课一篇”和“一课多篇”的不同编排形式,呈现出内容上差异。

1. 一课一篇

在“一课一篇”中,学习提示通常围绕单篇课文的深入解读展开。这类课文多为精读文本,篇幅较长或理解难度较高,学习提示侧重于阐明课文的重点,提示学生的阅读方法 with 学习策略,并进一步拓展课外阅读范围。例如通过强调反复诵读、体会诗歌意象或赏析语言艺术,帮助学生深化对文本内容的理解和感悟,体现出对语文学科工具性与人文性的兼顾^[7]。

以统编高中语文教材必修下册第六单元的第一课为例^[3],《祝福》是一篇教读课文,归属“文学阅读与写作”任务群,人文主题是“观察与批判”,除选编了三篇不同年代的中国小说外,还选入了两篇外国小说作为自读课文。这五篇小说分别反映了不同年代的社会生活,描摹了当时的人情世态。作为进入小说单元学习的第一课,《祝福》起着牵引作用,这段“学习提示”的内容以四个段落展现,首先从标题入手,考察标题的作用,然后关注到“三要素”中次要人物的作用(尤其对环境),接着由本篇课文向外拓展,提示学生联系已学知识思考鲁迅的创作意图:小说必须是“为人生”的,要能“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我怎么做起小说来》),最后要求学生品味鲁迅的小说语言。

整个“学习提示”的内容也呼应了单元导语与单元学习任务,单元导语中指出,要注意知人论世,在人物与社会环境共生、互动的关系中认识人物性格的形成和发展关注作品的社会批判性。要了解作者如何运用多种艺术手法实现创作意图,品味小说在形象、情节、语言等方面的独特魅力,欣赏小说不同的风格类型;学生应理解诗歌如何运用意象来表达感情,并从语言、形象、情感等不同角度欣赏作品,以获得审美体验。单元学习任务中也指出要分析社会环境对人物命运的影响,以及个性化的人物语言。所以单篇选文课后的“学习提示”紧紧地围绕者文本内容提示学生阅读方法与技巧,体现了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

2. 一课多篇

相比之下,“一课多篇”后的学习提示因文本数量与结构的复杂性而更需要以整合的角度来看待。这一形式通常将教读课文与若干篇自读课文组合为一个整体,以实现不同文本间的联结与互补。其内容通常整合多篇课文的主题、体裁及学习要点,通过指引学生关注重点语句、探究作者创作背景以及比较分析多篇课文之间的异同点,

帮助学生进行群文阅读和综合学习。这种学习提示不仅深化了学生对文本的理解,还提升了其分析与评价能力,凸显了统编教材对阅读教学多维度发展的要求。

以统编高中语文教材必修上册^[2]第二单元的第四课为例,本课由三篇通讯组成,都很注意通过具有典型意义的事件来表现人物的优秀品质。《喜看稻菽千重浪——记首届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袁隆平》是教读课文,而《心有一团火,温暖众人心》《“探界者”钟扬》则是自读课文。本课后的“学习提示”分为四段,首段总括三篇通讯所要表达的主题,指出共同点;接着第二段中指出三篇通讯分别报告的内容,第三段中也指出要关注作者通过具有典型意义的事件来表现人物的优秀品质。最后一段提示注意了通讯报道的一般特点,关注作者如何通过不同的渠道采集材料,又是怎样多角度、分层次进行报道的。理解事实与观点的关系,把握作者表达观点的方法。

所以一课多篇课后的“学习提示”通过引导学生关注课文的主旨以及比较分析三篇课文之间的共同之处,帮助学生更好地进行群文阅读和综合学习。

(二) 分类

根据对统编版高中语文教材“学习提示”内容及内容中包含的阅读要求和指导的分析,可以将其归类为以下三大类,每类包含不同的功能模块,分别是:文本解读与认知类、学习策略与方法指导类、延伸拓展与应用类。

1. 文本解读与认知类

文本解读与认知类是统编版高中语文教材中“学习提示”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旨在为学生理解课文的思想内容、艺术特色及其文化背景提供支架,进而提升其文本分析与思辨能力。具体而言文本解读与认知类提示包含以下几个功能板块:

文体知识这一部分重点讲解了文本所属文体的基本特征与写作技巧。教材通过指明文体,使学生明确每篇课文的文体类型,从而帮助他们掌握不同文体的阅读与解读方法。例如《以工匠精神雕琢时代品质》学习提示介绍新闻评论的特点——结合了议论性与新闻属性;又如《速逐客书》《与妻书》一课,其学习提示强调了两者在文体上的差异,前者是奏疏体裁,偏重政治议论,后者则为书信体裁,更具个人情感。

语言知识,比如在文言文课后的学习提示,会详细解释一些难度较高的文言实词与虚词,帮助学生逐步积累文言词汇,进而提高他们的文言文素养。例如《劝学》《师说》学习提示中关于“而”的解释——是古代汉语中常见的连词,可用于表示并列、承接、递进、转折、修饰等多种语义关系。这两篇文章中的许多语句用了“而”,诵读时注意体会这些“而”字表现的语义关系。

然后是文学常识,其主要是在“学习提示”中补充与课文相关的背景知识,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课文的文化与历史内涵。通过对某些文学作品的背景、历史地位等的简要介绍,学生能够在更广阔的文化语境中理解文本的深层意义。例如,对于《左传》和《史记》等古代史书的介绍,教材不仅阐明了其文学地位与历史价值,还引导学生思考这些作品在中国古代文学中的独特贡献。

以及篇章主旨,每一篇课文的“学习提示”中都会概括该篇的主要思想和情感,尤其是对于古诗文中的思想情感的总结。诗词通过表达作者的个人情感,文言文则侧重于内容梗概的提炼。例如《短歌行》的提示指出该诗表现了“对时光流逝的感慨,以及建功立业的宏愿”,《谏太宗十思疏》则通过简洁的梗概提示,让学生明确文章的政治主张。

还有选文背景,在学习提示中简要介绍背景信息和写作目的,在帮助学生读懂课文写作意图之余,旨在将选文内容放置于特定的时代环境之中,帮助学生理解作者创作时所处的历史语境,进而理解其作品的深层含义。例如《谏太宗十思疏》《答司马谏议书》的学习提示介绍了魏征和王安石的身份地位、写作特点和变法主张。

最后是艺术特色,学习提示多用短句来评价并分析课文的艺术风格,点明文章的写作优势与特点,通常多见于诗词、散文和文言文之中。古诗词的艺术特色包括其独特的语言风格、意象的运用、节奏音韵的美感等,而文

言文则侧重于其逻辑和修辞手法的运用。例如《登高》的学习提示中,强调了该诗的“写诗人登高远眺,身世之悲与忧国之情齐集心头”,引导学生分析诗人的情感态度。

2. 学习策略与方法指导类

学习策略与方法指导类“学习提示”通过具体、明确的学习指令和阅读路径,帮助学生建立科学、高效的学习方法。这一类提示以阅读要点、朗读要求、背诵任务为核心,通过具体方法的指导,增强了学生对文本的理解力和分析能力,发展了学生的阅读思维和个性化学习方式,为学生的语文学习提供了重要的支持与引导。具体而言学习策略与方法指导类学习提示包含以下几个功能板块:

首先是阅读方法的指导,注重培养学生的阅读习惯和技巧,根据课文的体裁和内容特点,提供适合的阅读方法指导。比如精读适用于需要深入分析内容或探究思想内涵的课文,帮助学生理解文章的深层意义,略读则适合内容较浅显、需要快速获取信息的文本。朗读尤其在学习诗歌、散文和戏剧时显得尤为重要。通过声音的节奏、抑扬顿挫,朗读能够帮助学生更好地体会文本情感。《芣苢》和《插秧歌》提示“反复诵读,认真体会”,引导学生感受不同诗体的表现特色;《故都的秋》提示“慢慢读”。背诵任务以文言文和古诗词为主,通过熟记重点段落或全文,将经典语言内化为学生的知识储备。如《短歌行》《赤壁赋》等课文的提示均明确要求背诵重点内容。

然后是联系生活实际,通过引导学生联系课文内容与自身生活体验,将语文学习融入生活情境,从而提升学习的现实意义和文化价值。比如《上图图书馆》的学习提示鼓励学生反思自身的阅读经历,探讨阅读对人生的意义。

最后是点明重点,通过明确课文的重难点内容,帮助学生抓住关键信息,理清学习思路,增强学习针对性。比如分析关键语句,《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的学习提示要求关注主旨句“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引导学生深入理解作者的情感与思想。《我与地坛》的学习提示则要求学生重点关注富有哲理的句子,从而体会文本的思想深度。再如细化学习路径,学习提示往往结合不同体裁的特点,提出具体的学习方法,通过指令性语言“抓住线索”“分析人物性格”“注意叙述手法”等引导学生。在分析两篇同类作品时,提示通常要求学生比较作品的手法与风格,从而提升学生对文本的鉴赏能力。

3. 延伸拓展与应用类

延伸拓展与应用类学习提示以课文为依托,灵活地将学生的学习从课内延伸到课外,通过阅读资源和话题资源的延伸与扩展,为语文阅读教学开辟了广阔的发展空间[8]。主要包括阅读资源的拓展和话题资源的延伸两大方面:

首先是阅读资源的拓展,其旨在引导学生扩大阅读面,深入理解课文内容,培养良好的语文阅读习惯和人文素养。比如课外阅读的推荐与指导,针对课文内容,推荐相关的课外阅读书目。这些书目通常包括以下几类:论著类阅读,扩大学生知识面,提升思想深度;同题材文章群文阅读,帮助学生掌握体裁特征,形成阅读方法;同主题文章群文阅读,深化学生对主题的理解,拓展视角。《我与地坛》的“学习提示”建议学生在课文节选基础上,通读全文,以更全面地感受史铁生的人生状态与情感表达;《哈姆莱特》的提示鼓励学生阅读莎士比亚的整部剧作,以深入领会人物形象及剧作魅力。

再如通过推荐同一作家不同作品或不同作家同一体裁作品进行对比阅读,帮助学生深化理解。《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课后推荐阅读辛弃疾的《菩萨蛮·书江西造口壁》,通过对比分析不同作品中作者情感表达的异同。《登泰山记》建议学生对比阅读《滕王阁序》《黄冈竹楼记》等同类写景记游作品,从中感受不同作家笔下的写景风格与表达方式。还比如辅助研读资源的补充,为加深学生对课文的理解,“学习提示”中常引用经典文学典籍内容作为辅助资源。例如,《芣苢》的提示引用了方玉润《诗经原始》中的相关点评,帮助学生从更具深度的文学视角体会诗中劳动之美。

然后是话题资源的延伸,其侧重于以课文内容为起点,鼓励学生结合实际生活开展讨论与思辨,提升语言表

达能力与思维深度。比如围绕课文展开讨论,部分“学习提示”围绕课文中的观点或情节展开话题讨论。《谏太宗十思疏》《答司马谏议书》学习提示提到与同学探讨“创业与守成”“善始与克终”“墨守成法与因时而变”“同俗媚众与坚持自我等问题。

再如从课文延伸至相关领域,通过拓展课文相关内容,引导学生围绕课外话题开展讨论。《青蒿素:人类征服疾病的一小步》《一名物理学家的教育历程》学习提示提及同学可自主探究,深入思考课文提到的一些科学话题,如中医药学的贡献、“高维世界”的理论意义等。

三、与新课标的关联性

《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2017年版,2020年修订)(以下简称“新课标”)^[1]提出,要注重学生语文学科核心素养的培养,促进学生的自主学习和个性化发展,提升学生的语言文字运用能力。学习提示作为统编版高中语文教材中的重要板块,在编写理念、内容设计和功能实践上,与新课标的要求紧密结合。

(一) 体现了新课标“核心素养”的要求

新课标从“语言建构与运用”“思维发展与提升”“审美鉴赏与创造”“文化传承与理解”四个方面阐释了语文学科核心素养的内涵。学习提示的设计围绕这些核心素养展开,以具体化的方式落实其理念:

1. 语言建构与运用

学习提示通过精炼概括课文内容和语言要点,引导学生掌握语言运用的基本规律。比如对于不同文体的文本,学习提示常提炼其写作特点、表现手法和语言风格,帮助学生在具体语境中完成语言知识的迁移与运用。这种设计不仅关注语言知识的积累,更注重学生语言能力的实践性培养。

2. 思维发展与提升

学习提示中常设置多样化的问题,以“思考”“注意”“比较”等形式引导学生展开逻辑思维活动。比如提示中可能会要求学生在文本阅读中进行归纳、演绎、对比或类比,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 and 创新能力。提升学生的思维深度与广度,在语言运用中形成更敏锐的分析视角和判断能力。

3. 审美鉴赏与创造

学习提示通过挖掘课文的文化美感,引导学生进行独立的审美体验。比如在涉及古典诗文或文学作品时,学习提示常以最简洁的语言突出文本的思想意蕴与艺术特色,激发学生主动品味文本之美。并且学习提示还会结合单元学习任务,引导学生开展表达与创作活动,将审美体验与创造能力相结合,培养学生综合的审美能力。

4. 文化传承与理解

学习提示通过强调文本中的文化内涵,引导学生体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增强文化自信。比如借教材中不同国家的文学经典突出不同文化的独特性和多样性,鼓励学生在学习中体会文化差异,批判性地审视并弘扬本民族优秀文化。为学生开阔文化视野、提升文化认同感提供了指引。

(二) 学习提示契合新教材“双线组元”编写理念

新教材倡导以“人文主题”和“语文要素”两条线索构建单元结构。学习提示作为教材的重要组成部分,具体落实了“双线结构”编写思路:

1. 人文主题的呈现

人文主题是教材组织单元的显性线索,主要围绕“理想信念”“文化自信”“责任担当”等精神主线展开。学习提示通过结合单元人文主题,在具体课文中深化对主题的理解。比如在“劳动光荣”这一单元中,学习提示不仅引导学生认识劳动的重要意义,还通过课文解读激发学生尊重劳动、追求卓越的价值情感。学习提示的设计使

人文主题从抽象的理念转化为具体的学习目标, 增强了主题的思想熏陶作用。

2. 学习任务群的支撑

统编教材提倡以“学习任务群”为中心的大单元教学, 以“任务”来带动单元教学, 这就是所谓的“任务驱动”。实施“任务驱动”, 教师必须用好每一课后面的“学习提示”。[4]以前的教材也有导读之类的设计, 着重介绍某篇课文写了什么、怎么写的、用了什么手法等。而“学习提示”重点放在怎么读、阅读时注意什么、怎样进入探究性学习等。学习任务群是教材的隐性线索, 贯穿多个单元以落实核心素养的目标。学习提示作为学习任务群的具体化路径, 将学习任务群目标细化为各单元的学习要求, 并进一步分解为具体课文的学习提示。比如在“实用性阅读与交流”任务群中, 学习提示通过介绍新闻通讯、新闻评论的写作要领, 为学生提供学习策略, 帮助其在多单元学习中逐步掌握实用性文本的阅读与写作技巧。学习提示通过紧扣任务群的学习目标, 推动学生实现学科能力有效整体提升。

(三) 学习提示支撑学生自主学习

新课标提出要学生要以自主、合作、探究性学习为主要学习方式[1], 学习提示从内容设计到表达方式都体现了对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关注:

1. 搭建学习支架

学习提示为学生提供了清晰的学习方法和策略。比如在古诗文学习中, 提示从文本的核心内容出发, 循序渐进地为学生提供阅读策略, 帮助学生降低学习难度, 逐步掌握阅读方法。为学生搭建了学习支架的同时, 也为其培养良好的学习习惯奠定了基础。

2. 激发学习兴趣

学习提示通过设置开放性问题 and 多样化的引导语言, 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比如学习提示中可能以“想一想”“试一试”的形式, 鼓励学生主动思考和探究。这种互动式的引导增强了学生的学习兴趣, 使其能够在积极的学习状态中完成阅读与思考。

3. 促进个性化学习

学习提示注重为学生提供开放性的学习资源和思路, 引导学生根据自己的理解与兴趣深入探究文本内容。比如通过提示学生在课外寻找相关资料或展开创作活动, 学习提示为学生个性化学习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符合新课标的理念。

(四) 学习提示与教材整体设计的衔接

学习提示在教材体系中与单元导语、课文、单元学习任务等要素紧密衔接, 形成整体性设计。学习提示延续单元导语的主题阐释, 将学习目标细化为课文层面的具体要求, 与单元导语呼应; 学习提示围绕课文展开阅读引导与要点提示, 为学生的文本学习提供路径和方法, 与课文内容结合; 学习提示以任务群目标为核心, 将综合性学习任务分解为多个细化任务, 通过引导学生逐步完成具体任务, 推动单元核心任务的实现。这一设计思路既强化了教材的整体性, 也有效落实了新课标的编写理念。

新课标作为语文教育的纲领性文件, 其宏观性目标通过教材的具体设计得以落实。学习提示作为教材的重要组成部分, 使课标的理念具体化呈现, 支持教学实践的有效实施。它不仅是学生自主学习的指南, 更是教师组织教学的重要参考。通过学习提示的引导, 语文学科核心素养得以在真实的语言实践中逐步形成。

四、结语

综上所述, 统编版高中语文教材中的“学习提示”不仅是教材编写的独特创新, 也是新课标理念在实际教学

中的有效落地。通过对“学习提示”概念、呈现形式、功能分类、与新课标的关联性的探讨,可以发现其在语文学科核心素养的培养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学习提示通过引导学生自主探究、激发学习兴趣、提供有效学习策略,促进了学生全面发展的核心素养培养。尤其在“学习任务群”的框架下,学习提示衔接单元学习目标和任务,达成了课程内容与学习目标的有机结合。

在未来的语文教育实践中,如何进一步优化和完善“学习提示”的设计,发挥其在自主学习和个性化教学中的潜力,仍是值得持续探索的问题。总而言之,统编版高中语文教材的“学习提示”不仅符合新课标的理念,更为学生的语文学习提供了有效的指导,具有较大的教育价值和实践意义。

参考文献:

- [1]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 2017 年版 2020 年修订[M].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2020.05.
- [2]人民教育出版社教学资源编辑室组 编. 普通高中教科书 高中语文 必修 上[M].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2020.02.
- [3]人民教育出版社教学资源编辑室组 编. 普通高中教科书 语文 必修 下[M].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2022.05.
- [4]温儒敏. 统编高中语文教材的特色与使用建议[J]. 语文学习, 2019, (09): 4-10.
- [5]陈晓茜. 统编版高中语文教材学习提示使用策略研究[D]. 陕西理工大学, 2024.
- [6]语文教育学引论[M]. 阎立钦等主编; 中国教育学会语文教学法研究会组织编写. 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6.
- [7]易陈. 统编版高中语文教材“学习提示”使用研究[D]. 江西师范大学, 2024.
- [8]薛天娇. 统编高中语文必修教材“学习提示”研究[D]. 山东师范大学, 2023.
- [9]沙廷婷. 统编高中语文必修教材学习提示研究[D]. 上海师范大学, 2021.
- [10]李雪情. 统编版高中语文必修教材古诗文“学习提示”使用研究[D]. 河南师范大学, 2023.

An Exploration of “Learning Prompts” in the Unified High School Chinese

Textbook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New Curriculum Standards: Taking the Compulsory Volumes I and II as Examples

Gou Xin

(School of Literature, Sichuan Normal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China)

Abstract: The unified high school Chinese textbooks have innovated the design of after-class exercises by replacing traditional exercises with “Learning Prompts.” Taking the compulsory volumes I and II as examples,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clarifies the conceptual connotations of “Learning Prompts,” analyzes the differences in their presentation under the two organizational modes of “one text per lesson” and “multiple texts per lesson,” and categorizes their functions into three major types: text interpretation and cognition, learning strategies and method guidance, and extension and application. On this basis, the paper explores the significant value of Learning Prompts in implementing the curriculum standards and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students’ Chinese language abilities.

Keywords: Curriculum Standards; Learning Prompts; Reading Aid System; Unified High School Chinese Textbooks

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融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的原则、路径和内容结合点

刘淑兰

(西南科技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四川 绵阳 621000)

摘要:习近平总书记指示,党的创新理论武装要融入思政课教学。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作为党最新的创新理论,将其融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是思政课教师的政治任务也是提升课程质量,培养时代新人的重要途径。本文从深入学习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全面把握全会精神;熟悉原理体系,将政治性、专业性、知识性和价值性有机统一;确定教学目标;融入课程主攻点等四个方面分析了三中全会精神融入“原理”课的原则。同时分析了融入“原理”课的方法路径选择;并从真理维度、价值维度、方法论维度分析了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与“原理”课教学内容的结合点,以求攻克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融入“原理”课的最后一个堡垒。

关键词:二十届三中全会;“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内容结合点

基金项目:西南科技大学教务处课题(219-24xn0044)坚持思政课建设和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同步推进——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融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程教学研究。

DOI: doi.org/10.70693/202607021627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融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以下简称“原理”)课既是该课程教师的政治任务,也是“原理”课通过课程建设与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同步推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重任时代新人的重要保障。针对如何将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融入“原理”课,笔者作为课程教师从融入原则、融入路径、三中全会精神与“原理”课内容具体结合点作了如下思考。

一、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融入“原理”课的原则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阐述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意义、总体要求、重要举措、根本保证等重大问题,并对贯彻落实全会精神提出明确要求。“原理”课作为思政课程体系中帮助学生系统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核心基础课,将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融入“原理”课应该坚持如下原则:

(一) 深入学习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全面把握全会精神,防止浮光掠影或者断章取义。

从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公报到总书记的《说明》以及《决定》文本和后续出版的相关辅导读本,需要教师搜集起来学习。二十届三中全会是党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通过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总动员总部署。新的历史起点是指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的全面深化改革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就成效,踏上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决定》明确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就是继续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对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出了系统部署,是新时代新征程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路线图。国际社会认为它是观察中国未来政策走向的一个风向标,会深刻影响中国未来5年甚至更长时期发展的态势。这就要求教师不仅要仔细研读二十届三中全会的系列资料,解读《决定》的基本内容,还要理解和掌握其框架逻辑;同时要跳出二十届三中全会,从历史、理论、实践的三重逻辑,把二十届三中全会放在党的百年奋斗历程来看,放到改革开放的历史和实践中来看,深刻领悟今天的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精神。

(二) 熟悉原理体系,紧密结合“原理”课特点,做到有的放矢,将政治性、专业性、知识性和价值性有机统一,防止空泛而谈。

“原理”课是关于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基本观点、基本方法的课程,教师要熟悉马克思主义原理体系,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魅力在于它通过逻辑揭示事物的本质和规律。马克思主义首先揭示了整个世界的辩证运动变化规律:唯物辩证法;进而揭示了人类社会的运动变化规律:唯物史观;进而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运动变化规律:

作者简介:刘淑兰,女,西南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法学硕士,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

资本主义政治经济；预测资本主义发展的趋势和科学共产主义必将诞生。三中全会的内容非常丰富，从很多方面部署全面深化改革，提出了300多项的改革举措，这些改革的举措都是有专业门槛的，而“原理”课教师和上“原理”课的学生，都不大可能全部具有这些专业的知识背景，这里就涉及到“原理”课教学中的政治性与专业性、知识性与价值性有机统一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思政课要将政治性和学理性相统一，以透彻的学理分析和真理的力量武装学生，要将价值观的传导融于知识传授之中。我们看世界不能被乱花浮云迷眼，要端起历史规律的望远镜去仔细观望，要善于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深邃眼光来观察世界，从其发展变化中把握世界整体发展趋势和全局，将局部世界的专业知识和人类社会发展历史规律的真理相结合，启迪和领悟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价值意蕴。

（三）确定将三中全会精神融入“原理”课的教学目标。

将党最新的理论创新成果融入“原理”课，不是为融而融，不是摆形式图虚名，是要达成如下教学目标：第一，让学生能够明确我们中国社会发展的方向，能够正确地认识改革的大趋势。《决定》的时间表有两个时间节点，一个5年目标，即202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八十周年时，完成本决定提出的改革任务，现在上“原理”课的学生2029年大学本科毕业，有的继续攻读硕士学位、有的已经踏上社会岗位，他们需要学会认识这个时代，了解中国社会发展中的机遇和挑战；另一个时间节点是2035年，全面建成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2035年也就是10年之后，现在上“马原”课的学生会成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力军、骨干。基于此，第二个教学目标就是增强学生投身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担当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历史使命感，并将这种历史使命感转化为努力学习、勇于创新、敢于担当的动力。我们的学生通过思政课的学习要培植起历史责任感、要有强国有我、使命担当的魄力和动力。第三，让学生掌握三中全会精神所蕴涵的科学思想和方法。通过三中全会精神融入“原理”课的学习，对学生进行理论的引导和武装，让学生理解改革是遵循社会历史发展客观规律的，是遵循真理尺度的实践；通过讲解改革历史和现实的经验总结和创新，让学生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获得认识世界的科学工具，让他具备敏锐的辨识力和洞察力，在遇到社会问题的时候，能够历史地、辩证地、独立自主地判断和思考。

二、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融入“原理”课的路径选择

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融入“原理”课主要有课堂教学、实践考察调研、校外专家或模范工作者主题宣讲交流等路径。

（一）课堂教学

课堂教学有两种方式融入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一是可以通过专题讲座或者学生课堂讨论的方式，从二十届三中全会的内容中阐释其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原理”内涵；二是在按照教学框架和内容体系循序渐进学习“原理”时，融入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的相关论述。当前从国际环境来看，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大国竞争激烈、新一轮科技革命带来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上升；国内来看，有效需求不足、大学生就业难、区域发展不平衡等问题凸显，这些时代的风云际会都会投射在大学生的心灵和头脑之中。我们党直面这样的现实情况，作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总动员总部署，大学生是非常关注的，他们会自发查阅和讨论与三中全会精神相关的内容，这时就可以根据学生的核心需要，开展专题讲座或者师生讨论的方式，针对三中全会精神的内容，阐释其所蕴涵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当然，随着教学内容体系进度，在循序渐进学习“原理”时，及时融入二十届三中全会的相关论述，让学生从不同原理中理论联系实际地领会三中全会精神，更是常见的路径选择。

（二）实践考察调研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是我们党的创新理论成果，它还要转为实践的力量，转化为人民群众的集体行动。理论要转化为群众的行动，除了要在思想上让理论、政策为群众所理解所掌握；还需要联系实际，在实践中去证实理论的真理性和真理性，将理论高度与实践深度有机结合，才能转化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现实力量。教师可以组织学生深入社会，围绕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区域协调发展、生态环境保护、基层全过程人民民主实践等等重大问题展开调研形成报告并开展班级分享讨论。比如西南科技大学处于绵阳市，多数学生来自乡村和城镇，可以让学生深入绵阳市低空经济、智慧物流、园区无人驾驶、核医疗健康产业发展实践中体验、调研；让学生参观并调研绵阳市每年一届的科博会，既能领略国内外领先的科技成果形成丰富的感性认识也能通过参与调研学术交流、产业对接活动，从科技的创新、发展趋势、产业转化等多方面分析总结形成深入的理性认识；当然也可以利用寒暑假带领学生去怀柔、张江等国家综合性的国家科学中心或者华为、武汉光谷等实体产业，从实践中认识国家的高质量发展和全面深化改革实情。通过实践考察调研，一方面用丰富的实践活动解放大学生的思想，使之认同并理解全面深化改革的部署；另一方面用鲜活、感性的现实活动改变学生的精神状态，使之充满活力，形成积极向上的愿意投身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共同力量。

（三）专家学者、模范工作者主题宣讲交流

课堂教学侧重于理论认识，实践考察调研侧重于个人实践基础上的感性认识，校外专家或模范工作者的主题宣讲交流则是用他人的经验和理论从深度和广度上拓宽师生们对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认识

维度。可以邀请专家学者到校内做关于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的讲座,比如邀请科技界的专家宣讲当前我国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改革;邀请教育界的学者宣讲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体制机制改革;邀请经济界专家宣讲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体制机制改革等等。还可以邀请行业模范工作者,比如邀请优秀的第一书记给师生们宣讲基层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制度创新和基层经济发展;邀请优秀的模范工作者或者校友开讲座、跟大学生交流;挖掘本地区、本校在全面深化改革中作出卓越贡献的典型案例或素材跟学生讨论分享等等。通过这些主题宣讲交流活动一方面让学生认识到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既是大变局下大国博弈的惊涛骇浪中,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伟大大局,也是老百姓衣食住行的身边事;既是大国建设大工程高科技的大视野,也是身边一个个鲜活的潜心创新发展的赶路人。它是接地气冒热气的,是烟火中每一个新时代中国人责任的合力。

三、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与“原理”课内容的结合点

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的内容很丰富,从很多方面部署改革,提出了300多项的改革举措,跟“原理”课的教学内容体系结合的点也非常多。三中全会是我们党勇于自我革命、不断开拓创新的历史主动精神的彰显。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改革开放,从发展是硬道理,到高质量发展;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到市场起资源配置基础性作用,再到市场决定性作用,今天强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牵引作用;我们的改革从当年的局部探索破冰突围,到今天的系统集成全面深化,我们党始终如一地发扬顺应历史潮流、实事求是、开拓创新的伟大历史主动精神。发扬历史主动精神要遵循社会历史客观规律的真理维度、马克思主义立场的价值维度;要运用科学的唯物辩证法,在砥砺奋进中把人们的主观力量充分发挥出来。

(一) 真理维度: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回应了马克思主义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发展的普遍规律。

《决定》强调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新质生产力是新时代新征程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客观要求;是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的必然要求。发展新质生产力对于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具有非常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这就回应了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发展中最基本的动力,是社会发展和进步的最终决定力量。

《决定》在“重大举措”部分明确提出要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健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体制机制、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完善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这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运用和对中国发展实践的准确判断之上的。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体制机制从狭义上来看,就是《决定》当中所重点突出的发展新质生产力和现代化产业体系;从广义上讲就是包括一切有助于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体制机制,以上经济体制改革的内容大致对应着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等新发展理念,都属于广义上的经济高质量发展体制机制改革。《决定》通过围绕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体制机制改革来解放出巨大的生产力,这就回应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发展规律。

(二) 价值维度: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体现了人民至上谋改革的价值取向。

马克思主义的价值目标是实现真正的人的时代自由的时代,即共产主义社会。在这样的社会里就人与自然的关系层面,生产力高度发达,物质资料极大丰富,人不再受制于物的奴役;就人与人的关系层面,在公有制社会下各尽所能,按需分配,没有阶级和阶级压迫;就个人层面,每个个体都能够实现自由而全面发展,劳动不再是谋生的手段,而是成了人生活的第一需要,成了人本质力量的展现。在人类社会向共产主义发展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民群众才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群众是社会历史实践的主体,在创造历史中起着决定性作用;人民群众的总体意愿和行动代表了历史发展的方向,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最终决定了历史发展的结局。

总书记在《说明》中明确指出在《决定》起草过程中重点把握“坚持人民至上,从人民整体利益、根本利益、长远利益出发谋划和推进改革。”²在《决定》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原则中,强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人民有所呼、改革有所应,做到改革为了人民、改革依靠人民、改革成果由人民共享。”³三中全会的精神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人民至上的价值取向,说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逻辑出发点和落脚点始终是人民立场。将三中全会精神融入“原理”课教学,一定要把握好人民至上的价值旨趣,在教学中往精神上升华,在实效上接地,让改革的举措与学生的实际利益结合起来。

(三) 方法论维度: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方法论。

世界的物质统一性原理是马克思主义的基石,有助于我们树立唯物主义科学世界观和正确的思想方法,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实践是认识的基础,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变化着的实际出发,是马克思主义的灵魂也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根本立足点。总书记在《说明》中提到“这次全会文件起草,把发扬民主、集思广益贯穿全过程。2023年11月27日,党中央发出通知,就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会议题征求各地

² 习近平.《关于〈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的说明》[EB/OL].中国共产党新闻网.2024-07-22 [2025-02-11].<http://cpc.people.com.cn/n1/2024/0722/c64094-40282391.html>

³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EB/OL].央视网.2024-07-21 [2025-02-11].<https://news.cctv.com/2024/07/21/ARTIYVrZoAt2cqyiPC0Os5fC240721.shtml>

区各部门各方面和部分干部群众意见”⁴、“2024年5月7日，决定稿下发党内一定范围征求意见，征求党内老同志意见，专门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意见，听取相关企业和专家学者意见”⁵，这说明三中全会的整个筹备过程及标志性成果《决定》坚持实事求是，充分调研，彰显了实事求是的方法论。

辩证法认为事物总体特征是普遍联系和永恒发展，我们要深入到事物具体的联系环节，以及事物具体的运动变化的过程中来认识它，坚持对事物的整体原则和历史原则。《决定》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基本原则上强调“坚持系统观念，处理好经济和社会、政府和市场、效率和公平、活力和秩序、发展和安全等重大关系，增强改革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⁶习总书记在《说明》中也强调“注重全面改革。决定稿在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框架下谋划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统筹部署经济体制改革和其他各领域改革。”⁷这充分体现了辩证法的整体观、系统观，用系统思维方法分析和处理问题，以系统思维聚合全面深化改革各要素，谋划全局、整体推进。

参考文献：

- [1]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N]新京报，2024-07-18（1）。
- [2]习近平.《关于《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的说明》[EB/OL].中国共产党新闻网.2024-07-22[2025-2-11].<http://cpc.people.com.cn/n1/2024/0722/c64094-40282391.html>
- [3]《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EB/OL].央视网.2024-07-2[2025-2-11].<https://news.cctv.com/2024/07/21/ARTIyVrZoAt2cqyPC0Os5fC240721.shtml>
- [4]《(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教学要点及参考资料》编写组.党的二十大精神融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研究.思想政治课研究，2024（4）：38-40.
- [5]习近平主持召开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强调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N].人民日报，2019-03-18(1).
- [6]习近平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强调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开创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新局面[N].人民日报，2016-12-09(1).
- [7]《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共产党员网.2013-11-15.<https://news.12371.cn/2013/11/15/VIDE1384515603214368.shtml>
- [8]牛小侠，付悦文.党的二十大精神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的原则、重难点和路径[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24（3）

Spirit of the Third Plenary Session of the 20th Central Committee Principles, paths, and content integration points for integrating into the course of "Basic Principles of Marxism"

Liu Shulan

(School of Marxism, Southwest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ianyang, Sichuan, China)

Summary: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 instructed that the Party's innovative theoretical armament should be integrated into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The spirit of the Third Plenary Session of the 20th Central Committee, as the latest innovative theory of the Party, is integrated into the course of "Basic Principles of Marxism". This is not only the political task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eachers, but also an important way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the course and cultivate new talents of the times. This article delves into the spirit of the Third Plenary Session of the 20th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nd comprehensively grasps its essence; Familiar with the principle system, organically integrating politics, professionalism, knowledge, and value; Determine teaching objectives; The principles of integrating the spirit of the Third Plenum into the "Principles" course were analyzed from four aspects, including the main focus of the curriculum. At the same time, the method path selection for integrating the "Principles" course was analyzed, and the integration point between the spirit of the Third Plenary Session of the 20th Central Committee and the teaching content of the "Principles" course was analyzed from the dimensions of truth, value, and methodology.

Keywords: Third Plenary Session of the 20th Central Committee; Course on "Basic Principles of Marxism"; principle; route; Content integration point

⁴ 习近平.《关于《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的说明》[EB/OL].中国共产党新闻网.2024-07-22[2025-02-11].<http://cpc.people.com.cn/n1/2024/0722/c64094-40282391.html>

⁵ 同上

⁶ 习近平.《关于《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的说明》[EB/OL].中国共产党新闻网.2024-07-22[2025-02-11].<http://cpc.people.com.cn/n1/2024/0722/c64094-40282391.html>

⁷ 习近平.《关于《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的说明》[EB/OL].中国共产党新闻网.2024-07-22[2025-02-11].<http://cpc.people.com.cn/n1/2024/0722/c64094-40282391.html>

生成式人工智能赋能中职财经商贸类课程学业评价的 内在逻辑、场景风险与优化路径

贾 瑜，谷笑笑*

(北京联合大学，北京 100101)

摘 要：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与教育评价改革的推进，对中职课程学业评价提出了由结果判定走向过程诊断、由知识考查走向能力评价的新要求。中职财经商贸类课程具有岗位导向鲜明、操作规范严格、数据属性敏感和职业素养要求较高等特点，传统学业评价在评价内容、过程证据、反馈方式和职业情境融入等方面仍存在不足。生成式人工智能为学习过程留痕、个性化反馈、职业任务情境创设和评价证据整合提供了新的技术条件，但也可能引发合规性误判、成果真实性削弱、数据安全隐患、技术依赖以及职业素养判断不足等风险。本文基于文献研究、逻辑分析与场景分析认为，生成式人工智能赋能中职财经商贸类课程学业评价的关键，不在于替代教师评分，而在于辅助教师更准确地识别学生在职业任务中的知识运用、技能表现、规范意识和反思能力。为此，应构建“AI初评—学生修正—教师终评”的评价流程，完善“知识—技能—规范—反思”多维评价标准，形成“原始作品—修改过程—AI反馈—教师意见”的评价证据链，推动中职财经商贸类课程学业评价向过程性、诊断性和素养导向转型。

关键词：生成式人工智能；中职教育；财经商贸类课程；学业评价；人机协同

DOI: doi.org/10.70693/202607012432

一、中职财经商贸类课程学业评价的现实困境

生成式人工智能（以下简称“生成式AI”）的快速迭代，为职业教育评价数字化转型注入了新的技术动能。现有研究多从宏观层面讨论生成式AI对职业教育教学与评价的影响，但对中职财经商贸类课程这一具体领域的学业评价场景、专业风险与协同路径关注仍显不足。相较于普通文化课程，中职财经商贸类课程具有较强的岗位导向、操作规范和职业情境属性。会计事务、电子商务、市场营销、客户服务、财务数据处理等课程内容，不仅要求学生掌握基础知识，更强调其在具体业务情境中完成任务、遵循规范、分析问题和反思改进的能力。职业教育学习质量评价应体现职业教育的类型特征，关注学习过程的实践性、学习内容的综合性和学习成果的完整性^[1]。生成式AI为职业教育教学与评价重构提供了新的可能，但技术进入评价场景并不天然意味着评价质量提升，其作用仍需置于具体课程任务和教师专业判断之中加以考察^{[2][3]}。

当前，中职财经商贸类课程学业评价仍存在一定的结果化、单一化和滞后化倾向。对于中职教育而言，评价不宜过度依赖可观测、易量化、短期可见的显性成果，而应进一步关注学生长期发展、课堂实效和伴随式评价^[4]。具体到中职财经商贸类课程，其学业评价主要面临以下问题。

（一）评价内容偏重知识结果，职业能力体现不足

中职财经商贸类课程具有鲜明的实践性和应用性，学生学习成效不仅体现在是否掌握概念、原理和操作步骤，更体现在能否将知识迁移到具体业务任务之中。以会计类课程为例，学生完成账务处理任务时，不仅要判断会计分录是否正确，还要理解业务背景、凭证来源、会计科目适用依据以及处理流程是否合规。以电子商务类课程为例，学生设计商品标题、营销文案或直播脚本时，也不能只看文本是否通顺、结构是否完整，还应考察其是否理解目标用户、平台规则、商品卖点和运营逻辑。

作者简介：贾 瑜（2001-），男，甘肃张掖人，在读硕士生，从事职业技术教育研究；

通讯作者：谷笑笑（2000-），女，河北涿州人，在读硕士生，从事职业技术教育研究。

但在部分评价实践中,教师仍容易将评价重点放在知识记忆、标准答案和最终成果上。会计课程评价往往强调分录是否正确、计算结果是否准确;电商课程评价则可能侧重作品是否提交、文案是否完整、方案格式是否规范。这种评价便于操作和量化,却难以充分呈现学生的业务分析能力、职业判断能力和综合实践能力。工作知识理论提醒我们,职业教育课程内容不应被简单拆分为知识与技能,而应指向工作原理、工作过程、工作方法和工作诀窍等具有实践功能的知识^[5]。如果评价长期停留在知识结果层面,就容易形成“会答题但不会做事”“作品完整但能力不足”的问题。

(二) 评价证据偏重最终作品,学习过程记录不足

职业能力的形成不是一次性完成的,而是在任务理解、方案设计、操作实施、错误修正和反思改进的连续过程中逐步生成的。因此,学业评价不仅要关注最终作品,更要关注作品形成的过程。然而,在传统评价方式下,教师能够直接获得的评价材料往往是学生最终提交的作业、实训报告、账务处理结果或营销方案,对于学生在完成任务过程中的思考路径、修改过程和问题解决方式掌握不足。

在财经商贸类课程中,过程证据缺失会直接影响评价的真实性。例如,两个学生可能提交相同正确的账务处理结果,但其中一名学生是基于业务情境独立分析完成,另一名学生则可能参考同伴答案或套用模板完成。如果评价只看最终结果,两者很容易获得相近评价,真实能力差异却被遮蔽。中职课程任务驱动教学评价研究表明,课程评价应关注任务开展背景、任务设计与资源保障、任务执行过程和任务成果等多个环节^[6]。这说明,对中职财经商贸类课程而言,学习过程本身就是评价证据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 评价反馈偏向统一批改,个性化诊断不足

中职学生在学习基础、认知水平、操作经验和学习习惯方面存在较大差异。财经商贸类课程又具有一定的专业性和综合性,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并不完全相同。有的学生基础概念掌握不牢,有的学生能够记住操作步骤却不能理解业务逻辑,有的学生作品形式完整但缺乏用户意识和职业规范。如果评价反馈只是统一性的分数、等级或简短评语,就难以回应学生差异。

生成式 AI 在文本理解、错误识别和反馈生成方面具有一定优势,可以在教师主导下为学生提供更及时、更具体的初步诊断。已有研究指出,人工智能赋能学生评价的价值,不应停留于提高评价效率,而应通过多源证据采集、智能融合分析和场景化反馈,推动评价由筛选逻辑转向发展促进逻辑^[7]。但在现实教学中,教师通常承担较重的教学、管理和评价任务,面对较多学生提交的账务处理作业、实训报告、电商文案或营销方案,很难逐一进行细致诊断。评价反馈由此容易停留在“正确”、“错误”、“格式不规范”、“内容不完整”等概括性层面,学生知道“哪里扣分”,却未必知道“为什么错”和“怎么改”。

(四) 评价场景偏离岗位任务,职业规范融入不足

财经商贸类课程具有明确的岗位指向,其学业评价应尽可能对接真实或仿真的职业任务。真实性评价强调通过真实或模拟性的工作任务评价学生运用知识、技能和职业素养完成任务的综合职业能力^[8]。如果评价脱离岗位场景,就难以准确判断学生能否在真实工作环境中完成任务。

财经商贸类中职生职业核心素养包括职业理想与信念、职业道德人格和关键职业能力等方面,财经商贸类岗位还特别强调主动服务、团队合作、法律规则和职业责任等意识^[9]。但在部分课程评价中,任务仍以课堂练习、纸笔测验或单一作业为主,职业情境设计不足。会计课程可能更多考查会计科目和分录规则,却较少关注学生在业务情境中识别凭证、判断流程和遵守规范的能力;电商课程可能要求学生完成商品详情页或营销文案,却较少评价其对平台规则、客户需求、数据分析和沟通服务的综合把握。评价场景与岗位任务之间存在距离,容易导致学习成果与真实职业能力脱节。

由表 1 可见,生成式 AI 介入中职财经商贸类课程学业评价,并非简单提高批改效率,而是通过评价内容、评价证据、反馈方式和任务场景的重构,推动学业评价由结果判定走向过程诊断和能力发展。

表 1 中职财经商贸类课程学业评价的现实困境及生成式 AI 赋能切入点

现实困境	主要表现	生成式 AI 赋能切入点	评价转向
评价内容偏重知识结果	重知识记忆、标准答案和最终成果，职业能力呈现不足	辅助识别知识迁移、业务判断和操作依据	从知识结果转向职业能力
评价证据偏重最终作品	任务理解、修改过程和问题解决路径记录不足	留存初稿、修改稿、AI 反馈和反思说明	从静态成果转向过程证据
评价反馈偏向统一批改	反馈停留在对错判断和格式修正，个性化诊断不足	生成问题提示、修改建议和差异化反馈	从统一反馈转向精准诊断
评价场景偏离岗位任务	与会计、电商、客户服务等岗位情境衔接不足	辅助创设真实或仿真的职业任务情境	从课堂作业转向任务评价

二、生成式 AI 赋能学业评价的内在逻辑

生成式 AI 介入中职财经商贸类课程学业评价，并不是将人工批改简单替换为机器批改。其更深层的意义在于借助智能生成、文本理解、过程记录和即时反馈等功能，推动评价对象、评价证据和评价功能发生转变。表现性评价强调学生在真实或仿真情境中完成复杂任务，其评价对象不仅包括最终产品，也包括完成任务过程中的行为表现和认知活动^[10]。据此，生成式 AI 赋能学业评价的内在逻辑，主要体现为过程性、诊断性和情境性三个方面。

（一）过程性逻辑：从结果评价走向过程评价

从评价证据看，生成式 AI 的价值首先体现为过程留痕。中职财经商贸类课程中的账务处理、电商文案设计、营销方案制定和客服沟通模拟，通常包含任务理解、信息筛选、方案生成、操作执行、修改完善等环节。如果评价只看最终提交的作品或答案，就难以反映学生能力形成的真实过程。生成式 AI 可以辅助记录学生初稿、修改稿、反馈记录和反思说明，帮助教师看到学生“如何完成任务”，而不仅是看到学生“完成了什么”。

（二）诊断性逻辑：从统一反馈走向精准反馈

从评价功能看，生成式 AI 的意义还体现在诊断反馈。传统评价往往以分数、等级或简短评语呈现结果，能够说明学生表现好坏，却不一定揭示问题原因。对于基础差异较大的中职学生而言，缺少诊断性的评价反馈很难转化为真实的学习改进行动。

生成式 AI 可以在教师主导下为学生提供更及时、更具体的初步诊断，但诊断反馈并不等于最终评价。COMET 综合职业能力测评表明，职业能力评价不仅要给出结果，还要诊断学生职业能力发展水平、能力特征以及职业认同感和职业承诺^[11]。借鉴这一思路，生成式 AI 在财经商贸类课程学业评价中的作用，不应停留在“给分”，而应帮助教师和学生识别问题类型、理解错误原因并形成改进路径。

（三）情境性逻辑：从知识测验走向任务评价

从评价对象看，生成式 AI 的意义不在于生成更多练习材料，而在于为职业任务评价提供可变的情境载体，使学生能力表现从静态答题转向情境化问题解决。在财经商贸类课程中，教师可以借助生成式 AI 设计更加贴近岗位实际的任务材料，如小微企业采购业务处理、网店商品标题优化、直播带货脚本设计、客户投诉回复、节日促销方案制定、财务数据异常分析等。

这类任务能够将专业知识、技能操作、沟通表达和职业规范整合到同一评价情境之中，使学生在完成任务过程中展示综合能力。相较于单一知识测验，任务评价更能体现职业教育“学以致用”的培养要求。

三、生成式 AI 介入学业评价的场景风险

生成式 AI 为中职财经商贸类课程学业评价提供了新的技术支撑,但技术进入评价场景并不必然带来评价质量提升。技术赋能的职业能力测评在行为预测与素养判断上仍存在明显局限,职业能力评价不能只关注“会做事”,还要关注学生是否真正愿意、能够并持续“去做事”^[12]。对于财经商贸类课程而言,以下风险尤其需要警惕。

(一) 会计类任务中的合规性误判风险

会计类课程具有较强的规范性和责任性。学生完成账务处理、凭证审核、报表编制等任务时,不仅要追求结果正确,还要符合会计准则、业务流程和岗位规范。生成式 AI 虽然可以根据输入内容生成解释、反馈或修改建议,但其判断主要依赖语言模式和已有语料,并不必然具备严格的专业审查能力。

在会计类任务评价中,涉及会计准则适用、凭证规范、业务流程和职业责任的问题,不能由生成式 AI 独立判断,必须由教师进行专业复核。否则,AI 生成的解释可能表面合理,却与具体业务情境、岗位流程或专业规范不完全一致,进而影响评价结论的准确性。

(二) 电商运营任务中的真实性削弱风险

电子商务类课程与生成式 AI 的结合较为直接。商品标题优化、详情页文案撰写、直播脚本设计、短视频脚本生成、客服话术拟定和营销方案撰写等任务,都可以借助生成式 AI 快速完成。表面上看,这有助于提高作品质量和任务完成效率;但从学业评价角度看,也可能削弱评价结果真实性。

对电商运营类课程而言,AI 生成文本的完整性容易掩盖学生市场分析、用户理解和平台规则判断的薄弱,进而造成“作品质量”与“能力水平”之间的错位。如果学生直接提交 AI 生成成果,评价看到的可能是工具加工后的文本,而不是学生真实的市场分析能力、内容策划能力和客户沟通能力。

(三) 财经数据处理中的隐私安全风险

与一般课程相比,财经商贸类课程中的数据安全风险更具专业敏感性。会计实训、电商运营和客户服务任务往往涉及交易记录、客户信息、票据资料、企业案例、运营数据和财务数据等内容。即使这些数据来自教学案例或仿真实训,也常常具有较强的业务属性和敏感特征。生成式 AI 介入学业评价时,如果教师或学生缺少数据安全意识,直接将未经处理的企业案例、客户资料或交易数据输入外部智能工具,就可能带来数据泄露、信息滥用和合规风险。

这一风险在财经商贸类课程中尤为突出。会计岗位强调保密意识和责任意识,电商岗位也要求遵守平台规则 and 用户信息保护要求。如果学业评价环节本身忽视数据保护,就会与课程育人目标发生冲突。因此,凡涉及客户信息、企业资料、交易记录和财务数据的内容,都应进行脱敏处理,真实企业和真实用户信息不宜直接输入开放式人工智能平台。

(四) 学生学习过程中的技术依赖风险

在财经商贸类课程中,技术依赖风险并不只是学生使用 AI 完成作业的问题,更表现为学生跳过业务分析、市场判断、规范核验和方案修正等关键学习环节。生成式 AI 降低了文本生成、方案撰写和任务表达的难度,也使学生更容易在短时间内完成看似完整的作业成果。对于学习基础较弱、自主学习能力不足或任务压力较大的学生而言,生成式 AI 可能被用于直接替代思考和操作。

由此带来的问题是,学生表面上完成了任务,实际上却没有经历必要的分析、判断和改进过程。如果学生长期依赖 AI 直接给出答案、文案或方案,就可能跳过职业能力形成所必需的练习、判断和反思过程。评价结果越依赖最终成果,技术依赖风险就越容易被掩盖。

(五) 职业素养评价中的判断缺位风险

财经商贸类课程的学业评价不仅要评价知识和技能,还要评价学生的职业素养。会计类岗位要求真实准确、遵守制度、严守秘密;电商类岗位要求诚信经营、尊重用户、规范表达和承担服务责任。生成式 AI 可以分析学生提交的文本、方案和说明,也可以生成关于职业规范的提示,但它很难充分判断学生在具体情境中的真实态度、价值选择和行为表现。

如果评价过度依赖生成式 AI,职业素养评价就可能被文本化、表层化。学生只要提交符合语言规范的说明,就可能获得较好评价,而其真实职业态度和规范意识却未必得到充分考察。

四、生成式 AI 赋能学业评价的优化路径

生成式 AI 介入中职财经商贸类课程学业评价，不能停留在工具使用层面，更不能简单地以人工智能替代教师评价。人机协同智能评价研究强调，应明确机器与教师的协同边界，实现机器智能与教师专业判断的深度互补^[13]。据此，生成式 AI 赋能学业评价的关键，在于构建教师主导、AI 辅助、过程留痕、规范约束和素养导向相结合的评价机制。

表 2 生成式 AI 赋能中职财经商贸类课程学业评价的人机协同路径设计

优化路径	关键做法	评价功能	风险控制重点
构建三阶段评价流程	形成"AI 初评-学生修正-教师终评"流程，教师设置提示词，学生提交修改说明，教师进行专业复核	提高反馈效率，保留学生修正过程，强化教师终评责任	防止 AI 替代教师评分
建立多维评价标准	围绕知识理解、技能操作、职业规范和反思改进评价学生表现	推动评价由单一结果判断转向综合职业能力评价	防止只看文本质量和作品形式
完善全过程证据链	留存原始作品、修改过程、AI 反馈和教师意见	增强评价真实性、可追溯性和解释力	防止 AI 代写和成果失真
明确 AI 辅助边界	将生成式 AI 用于初步批改、问题提示、反馈生成和材料整理，终结性评分由教师完成	维护评价的专业性和育人性	防止技术越位和专业误判
提升教师协同能力	提升教师任务设计、反馈甄别、使用监管和成果转化能力	促进评价结果反哺教学改进	防止教师判断弱化和学生技术依赖

由表 2 可见，生成式 AI 赋能学业评价的关键不在于单一工具使用，而在于形成教师主导、AI 辅助、证据留痕和边界约束相结合的人机协同评价机制。

（一）构建“AI 初评—学生修正—教师终评”的评价流程

生成式 AI 适合承担初步诊断、问题提示和反馈生成等辅助性工作，但不宜直接承担最终评价职责。中职财经商贸类课程评价涉及专业规范、岗位标准和职业责任，最终判断必须由教师基于课程目标和学生实际作出。因此，可构建“AI 初评—学生修正—教师终评”的评价流程，使人工智能的效率优势与教师的专业判断形成互补。

AI 初评阶段，教师可根据课程目标和任务要求设置评价提示词，引导生成式 AI 从知识理解、任务完成、操作规范、表达质量等方面对学生作品进行初步分析。学生修正阶段，学生应根据 AI 反馈修改作品，并说明采纳或未采纳建议的理由。教师终评阶段，教师综合原始作品、AI 反馈记录、学生修改说明和最终作品作出评价。该流程既能提高反馈效率，也能保留学生思考过程和教师专业判断。

（二）建立“知识—技能—规范—反思”多维评价标准

生成式 AI 赋能学业评价，不能只改变评价工具，还应推动评价标准重构。中职财经商贸类课程具有知识性、操作性、规范性和职业性相统一的特点，评价标准如果仍停留在答案正确、作品完整和格式规范层面，就难以体现职业教育能力培养要求。

结合财经商贸类课程特点，可将评价标准划分为四个维度：知识理解，关注学生是否掌握财经商贸基础概念、业务原理和操作依据；技能操作，关注学生能否完成账务处理、电商运营、营销策划等任务；职业规范，关注学生是否符合会计准则、平台规则、商业伦理和数据安全要求；反思改进，关注学生是否能根据 AI 反馈、教师意见和任务要求修改完善作品。这样才能避免评价只看结果、只看文本、只看形式，而忽视学生真实能力发展。

（三）完善“原始作品—修改过程—AI 反馈—教师意见”的评价证据链

生成式 AI 介入学业评价后,评价真实性问题更加突出。学生最终提交的作品可能经过 AI 加工,甚至可能主要由 AI 生成。如果评价仍只看最终成果,就难以判断学生真实学习水平。因此,应完善“原始作品—修改过程—AI 反馈—教师意见”的评价证据链,通过过程留痕提升评价的真实性和可解释性。

教师应要求学生保留原始作品、记录修改过程、提交 AI 反馈记录,并形成教师复核意见。这样既能降低 AI 代写和成果失真的风险,也能帮助教师判断学生是否真正理解问题、是否能够根据反馈进行有效修改。

(四) 明确生成式 AI 在学业评价中的辅助边界

生成式 AI 具有较强的文本生成和反馈生成能力,但并不意味着它可以覆盖学业评价的全部环节。尤其是在中职财经商贸类课程中,评价不仅涉及知识和文本,还涉及专业规范、职业伦理、数据安全和岗位责任。因此,必须明确生成式 AI 在学业评价中的辅助边界,防止技术越位。

生成式 AI 适合用于初步批改、问题提示、文本反馈、方案优化建议、学习资源推荐和评价材料整理等环节;但在终结性评分、专业责任判断、职业伦理评价和学生真实能力认定等方面,不宜独立作出结论。会计处理是否符合业务情境和规范要求,电商运营方案是否体现用户分析和平台规则意识,学生是否具备诚信、合规和保密意识,都需要教师结合课堂观察、任务表现和专业标准进行综合判断。

(五) 提升教师的人机协同评价能力

教师的人机协同评价能力,本质上是将技术反馈转化为教育判断的能力。生成式 AI 能否真正赋能学业评价,最终取决于教师能否合理设计、使用和判断人工智能。对于中职财经商贸类课程教师而言,未来的评价能力不仅包括传统的专业评价能力,还应包括人工智能工具使用能力、反馈质量判断能力和数据安全能力。

教师需要具备四方面能力:一是 AI 评价任务设计能力,能够根据课程目标、评价标准和任务特点设计评价提示词;二是 AI 反馈甄别能力,能够识别 AI 反馈中的专业偏差和逻辑漏洞;三是学生 AI 使用监管能力,能够通过过程材料、展示答辩和追问核查识别 AI 依赖行为;四是评价结果转化能力,能够根据学生共性问题调整后续教学内容。只有教师能够把 AI 反馈转化为专业判断和教学改进,学业评价才可能真正形成闭环。

五、结语

生成式 AI 为中职财经商贸类课程学业评价改革提供了新的技术条件和实践空间,其价值不在于替代教师评分,而在于通过过程留痕、个性化反馈、任务情境生成和评价证据整合,辅助教师更准确地判断学生在职业任务中的知识运用、技能表现、规范意识和反思能力。但中职财经商贸类课程具有较强的专业规范、数据敏感和职业伦理属性,AI 介入评价过程也可能带来合规性误判、成果真实性削弱、数据安全隐患、技术依赖和职业素养判断不足等问题。因此,生成式 AI 赋能学业评价应坚持教师主导、AI 辅助、专业规范和素养导向,通过构建“AI 初评—学生修正—教师终评”的评价流程,完善多维评价标准和全过程证据链,推动学业评价向过程性、诊断性和情境性转型。后续研究可选取会计实训、电商运营等具体课程开展行动研究或教学实验,进一步检验人机协同评价机制的实践效果,为职业教育评价数字化转型提供可落地的实践参考。

参考文献

- [1] 李文静,吴全全,闫智勇.工作过程系统化课程范式下职业教育学习质量评价模式构思[J].教育与职业,2021,(8):27-33.
- [2] 赵志群,余超凡.生成式人工智能赋能职业教育教学:理论与案例[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26,(2):86-93.
- [3] 王悦晓,郝天聪.生成式人工智能赋能职业教育变革:挑战与现实路径[J].教育与职业,2025,(4):14-20.
- [4] 刘磊.隐性评价:教育强国进程中的中等职业教育评价导向[J].教育与职业,2026,(5):49-58.
- [5] 徐国庆.工作知识:职业教育课程内容开发的新视角[J].教育发展研究,2009,28(11):59-63.
- [6] 朱湖英,易杰.中职课程任务驱动教学的 CIPP 评价及质量提升路径研究[J].教育与职业,2025,(17):107-112.
- [7] 方东玲,赵一婷,唐烨伟,陆学莉,董萍.智能驱动与范式跃迁:人工智能赋能学生评价转型研究[J].中国电化教育,2026,(6):78-86.
- [8] 刘虎.职业教育真实性评价的理论基础与应用设计[J].职教通讯,2015,(16):26-29+34.
- [9] 陆玉梅,马建富,郑晓梅.财经商贸类中职生职业核心素养的培育路径[J].职教论坛,2019,(12):161-165.
- [10] 殷明,季琼.高职课程学业表现性评价的任务框架设计与评分量规设计[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24,(11):76-85.
- [11] 赵志群,高帆.综合职业能力测评 (COMET) 的理论与实践[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22,(8):5-11.

- [12] 刘昌龙,王新波.从“会做事”到“去做事”:对基于技术的职业能力测评的反思及展望[J].职教论坛,2024,40(10):106-113.
- [13] 王志军,龙帅,张吉.人机协同智能课堂教学评价层级模型构建研究[J].远程教育杂志,2025,43(5):32-40.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Academic Evaluation for Finance and Commerce Courses in Secondary Vocational Schools: Internal Logic, Scenario Risks, and Optimization Paths

Jia Yu, Gu Xiaoxiao*

(Beijing Union University, Beijing 100101)

Abstract: With the advancement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in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the reform of educational evaluation, academic evaluation in secondary vocational schools is increasingly expected to shift from result-oriented judgment to process-oriented diagnosis, and from knowledge-based assessment to competence-based evaluation. Finance and commerce courses in secondary vocational schools are characterized by strong occupational orientation, strict operational norms, sensitive data attributes, and high requirements for professional literacy. However, traditional academic evaluation still faces problems such as an excessive emphasis on knowledge outcomes, insufficient process evidence, generalized feedback, and weak integration of occupational contexts.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provides new technical conditions for recording learning processes, offering personalized feedback, creating occupational task scenarios, and integrating evaluation evidence. Nevertheless, its application may also bring risks such as compliance misjudgment, weakened authenticity of student work, data security concerns, technological dependence, and insufficient judgment of professional literacy. Based on literature review, logical analysis, and scenario analysis, this paper argues that the key role of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empowering academic evaluation of finance and commerce courses in secondary vocational schools is not to replace teachers' assessment, but to assist teachers in more accurately identifying students' knowledge application, skill performance, normative awareness, and reflective competence in occupational tasks.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construct an evaluation process of "AI preliminary assessment—student revision—teacher final assessment," establish multidimensional evaluation standards covering knowledge, skills, norms, and reflection, and build an evidence chain consisting of original work, revision process, AI feedback, and teacher comments. These measures can promote the transformation of academic evaluation toward process orientation, diagnostic function, and professional competence development.

Keywords: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secondary vocational education; finance and commerce courses; academic evaluation; human-AI collaboration

沉浸式科普视角下学龄前儿童天文 APP 设计研究

王 惠, 宋婷杰

(黑龙江大学艺术学院, 黑龙江 哈尔滨 150080)

摘 要: 针对当下学龄前儿童天文启蒙资源碎片化、科普形式枯燥、适龄交互缺失的行业痛点, 以 3~6 岁学龄前儿童生理与认知发展特征为设计依据, 围绕沉浸式科普教育理念, 完成儿童天文科普 APP《星际探索》全流程 UI 设计实践。从项目调研、用户画像、产品架构、视觉规范、IP 形象、原型迭代、界面落地等多维度展开设计研究, 依托轻量化游戏化设计手法, 融合天文科普知识与童趣交互, 搭建集星球探秘、天文观影、知识答题、创意手工于一体的产品功能体系。通过情绪版、低保真原型、高保真界面分层落地视觉方案, 验证适配学龄前儿童的科普类 APPUI 设计策略, 为同类幼儿科教类移动端产品设计提供参考思路。

关键词: 学龄前儿童; 沉浸式科普; UI 设计; 天文启蒙; 游戏化交互

基金项目: 黑龙江大学校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 C 类项目“基于沉浸式交互视角下儿童天文科普书籍设计研究”(项目编号: 2025174)

DOI: doi.org/10.70693/202607098552

一、绪论

1.1 研究背景

儿童是国家的未来, 做好儿童科普教育、提升全民科学素质, 不仅关系到个体科学思维与创新能力的培育, 更与国家科技事业的长远发展和民族复兴息息相关^[1]。传统的科普绘本多以单向知识灌输为主, 其静态、线性的叙事模式已难以满足当代儿童在互动性与体验感方面的多元化学习需求^[2]。目前国内儿童科普类 APP 市场发展迅速, 但面向 3~6 岁学龄前群体的天文专项产品仍存在明显短板, 多数产品知识内容生硬堆砌, 违背幼儿具象化认知规律, 同时界面布局、操作逻辑沿用成人设计思路, 操作复杂、趣味性不足, 难以让儿童沉浸其中开展自主学习。结合当下家长偏好借助移动端工具开展碎片化亲子科普的使用现状, 本次开展《星际探索》APP 设计研究, 力求打造一款真正适配学龄前儿童的天文启蒙产品。

本次研究结合儿童认知心理学、沉浸式体验设计、游戏化交互等相关理论, 探索适合低龄儿童的天文科普 APP 设计路径, 解决现有产品内容晦涩、交互不适配、体验感弱等问题, 构建场景、知识、玩乐相结合的设计模式。从理论层面来看, 本次研究能够丰富沉浸式设计在幼儿科普 UI 领域的应用成果, 细化低龄用户视觉、交互与内容设计的相关准则; 从实践层面来讲, 完整落地的设计方案可直接应用于学前天文启蒙场景, 也能为同类科教产品的开发提供可借鉴的思路。

国外对于科普类交互界面设计研究相较国内早 100 多年, 且自 2006 年之后呈快速发展趋势^[3]。普遍擅长结合儿童心理打造场景化、游戏化内容, 但知识体系与国内幼儿启蒙要求不匹配。国内相关产品大多面向学龄阶段儿童, 针对学龄前群体的优质天文 APP 数量较少, 要么娱乐性过强缺少科学内核, 要么知识难度超标不适合幼儿理解, 沉浸式设计的运用也不够成熟, 这也让本次设计与研究具备实际价值。

二、相关理论与设计依据

学龄前儿童一般指 3—6 岁的儿童, 此阶段的儿童在生理和心理上还处于不稳定时期^[4]。此阶段儿童以具象思维为主, 更愿意通过图像、色彩、动画获取信息, 注意力集中时间较短, 无法接受大段文字内容。同时幼儿手

作者简介: 王 惠(2001—), 女, 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视觉传达与数字艺术设计;

宋婷杰(1999—), 男, 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信息可视化艺术设计。

部精细动作尚未发育完善,操作能力有限,复杂点击、多级菜单等设计都会提升使用门槛。在审美上,幼儿偏爱柔和高亮度色彩、圆润可爱的造型,排斥尖锐线条与暗沉色调,这些特征成为本次 APP 视觉、字体、图标及交互设计的核心依据。

沉浸式科普打破了传统单向灌输的科普模式,依靠场景营造、趣味交互和任务引导,引导使用者主动探索知识。本次设计将天文知识点拆分融入闯关、观影、手工制作等环节,从场景、交互、内容三个维度实现沉浸式学习。而轻量化与游戏化设计则进一步贴合幼儿使用特点,简化界面层级与操作步骤降低使用难度,把学习目标转化为闯关、收集、答题等趣味任务,借助激励机制提升儿童的使用兴趣与停留时长。

三、《星际探索》产品前期调研与用户分析

结合市场调研可以发现,市面上主流儿童天文 APP 知识储备较为充足,但普遍存在界面繁琐、形式刻板、缺乏适龄交互等问题。结合市场现存缺口,本次将产品定位为面向 3~6 岁学龄前儿童的沉浸式天文启蒙 APP,兼顾儿童自主使用与家长辅助教学两类使用场景。

本次产品主要分为两大使用群体,核心使用者是 3~6 岁学龄前儿童,这类用户对宇宙、星球、航天元素充满好奇,喜欢动画与小游戏,但理解能力有限,无法读懂复杂文字与专业知识,枯燥的讲解也难以让他们集中注意力。针对这一特点,设计中尽量以图形、动画替代文字,将专业知识转化为简单易懂的内容。另一类用户为幼儿家长,他们具备科学启蒙意识,希望借助优质数字化产品完成家庭科普,但日常时间有限,也难以筛选出适龄、内容严谨的科普资源,因此产品在满足儿童使用需求的同时,也配套了辅助讲解内容,方便家长开展亲子教学(如图 1 所示)。



图 1 学龄前儿童天文科普用户画像

综合市场与用户分析,本次设计明确四大核心方向:操作上做到简单轻量化,适配幼儿使用能力;视觉上选用鲜活柔和的色彩与可爱造型,契合儿童审美;内容上保证科学严谨,知识难度贴合学龄前认知水平;整体体验上强化趣味性与场景沉浸感,实现寓教于乐。

四、产品架构与功能设计

《星际探索》采用扁平化信息架构,整体分为首页、星球探秘、天文观影、创意空间、星际挑战、个人中心六大板块,以星际探索作为核心主题串联全部功能,主要应用于居家碎片化科普场景。

登录与首页设置专属 IP 形象作为引导,整合所有功能入口,以卡通星球作为导航元素,保证儿童可以一键进入对应板块。星球探秘是核心学习模块,以宇宙遨游作为故事主线,设置层层闯关玩法,儿童在解锁不同星球关卡的过程中,同步学习对应的天文知识,依托连贯场景实现沉浸式科普。天文观影板块搭配简短科普动画,将天体常识、星球特点等内容以动态画面呈现,符合幼儿具象化认知习惯。星际挑战以图文选择题的形式开展知识问答,答题闯关成功后可解锁星球图鉴,帮助儿童巩固所学内容。创意空间主打动手体验,提供行星线稿涂色功能,让儿童在创作过程中加深对天体外形的记忆。个人中心会汇总所有收集到的星球卡片与闯关成果,利用收集机制提升儿童的使用粘性。整套功能体系相互配合,兼顾知识学习、趣味互动与创意实践,完整覆盖幼儿天文启蒙的多元需求。

五、视觉系统设计

结合太空主题与儿童色彩心理学,本次确定专属色彩体系,主色调选用晴空蓝,营造轻松的宇宙氛围,大面积应用于界面底色与导航区域;辅助色搭配暖橙与明黄,用于按钮、图标、重点提示等元素,冷暖色彩相互平衡,

弱化太空题材自带的疏离感。所有色彩均保证高亮度、低饱和度，视觉柔和不刺眼，符合幼儿眼部发育特点。

字体选用字形圆润的阿里妈妈方圆体作为标题与功能名称字体，正文内容使用苹方字体，同时区分多级字号，整体字号偏大，大幅缩减文字数量，优先用图标替代文字说明，降低儿童阅读压力。功能图标统一采用圆角面性样式，提炼火箭、星球、播放、画笔等标志性符号，造型简洁圆润、辨识度高。天体素材在写实基础上做卡通化简化处理，保留行星典型特征的同时弱化复杂细节，统一全产品视觉风格。

本次设计打造了专属 IP 形象，将主角塑造成与目标读者年龄相仿的拟人化形象，从而增强儿童的认同感^[5]。

“宇航员小 Q”以企鹅为原型搭配宇航造型，定位为宇宙探索向导。该 IP 贯穿开屏页面、功能引导、弹窗、界面装饰等全场景，用拟人化的形象拉近产品与儿童的距离，让整体界面更具亲和力（如图 2 所示）。



图 2 小 Q IP 形象设计

六、设计迭代与界面落地

设计前期制作情绪版，收集太空绘本、航天元素、天体插画等素材，提炼曲线、星球、飞船等核心视觉符号，确定梦幻童趣的整体风格，为后续设计划定方向。低保真原型阶段重点梳理信息层级与交互逻辑，不断简化页面布局，删减多余按钮与弹窗，保证操作路径简短直观，完成所有页面线框布局与交互流程设计后，再进入高保真制作环节。

高保真界面严格遵循既定的色彩、字体、图标规范，融入星球、星云等主题底纹，搭配 IP 形象做趣味点缀，最终完成登录页、首页、闯关页、视频播放页、答题页、涂色创作页等全套界面设计。从情绪版到原型再到最终界面的完整迭代，让设计方案从概念逐步落地，也保证了视觉风格、交互逻辑的统一性（如图 3 所示）。



图 3 《星际探索》APP 界面设计

七、设计创新点

本次设计在科普模式上做出创新,摒弃传统视频加文字的单一讲解形式,将天文知识点拆解融入闯关、答题、创意涂色等游戏环节,用连贯的星际故事打造沉浸式场景,让儿童在玩乐过程中主动吸收知识,完全贴合学龄前儿童“玩中学”的教育特点。在视觉体系上,整套色彩、造型、IP形象均围绕低龄用户量身打造,解决了同类天文产品色调沉闷、风格成人化的问题,形成专属的儿童太空视觉语言。同时产品兼顾儿童与家长两类用户,在满足幼儿趣味学习需求的基础上,增设家长辅助科普内容,弥补了多数同类产品只关注儿童使用、忽略亲子教学需求的不足。

八、结语

本文以《星际探索》天文APP为实践载体,结合沉浸式科普、儿童设计相关理论,从市场调研、用户分析、功能规划、视觉设计到原型落地完成全流程研究与设计。实践证明,面向学龄前儿童的科教类APP,必须跳出成人产品的设计思维,立足儿童认知特点与使用能力,以沉浸式场景和游戏化交互为载体,平衡科学性与趣味性。本次设计不仅填补了适龄幼儿天文启蒙产品的部分空白,也总结出一套可落地的低龄科普APP设计方法,希望能为幼儿数字化科普行业的发展提供参考。

参考文献:

- [1] 王韬雅.科技馆开展儿童科普教育的意义与路径[J].亲子,2025,(24):122-124.
- [2] 涂琴,廖曦.游戏化思维中儿童科普绘本的视觉叙事特征[J].时尚设计与工程,1-3.
- [3] 宋珂凡.基于情感需求的科普类交互界面叙事性设计研究[D].南京理工大学,2023.
- [4] 周京璇,张永宁.基于情感化设计的学龄前儿童科普类App设计研究[J].浙江工艺美术,2025,(19):181-183.
- [5] 侯佳,赵晓蝶,王诗尧.基于儿童认知特征的航天科普绘本设计[J].玩具世界,2025,(12):30-32.

Research on the Design of Astronomy APP for Preschool Childre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mmersive Science Popularization

Wang Hui, Song Tingjie

(School of Arts,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Heilongjiang, Harbin, China)

Abstract: In response to the industry pain points of fragmented astronomical enlightenment resources, dry popular science forms, and lack of age appropriate interaction for preschool children, based on the physiological and cognitive development characteristics of 3-6 year old preschool children, and around the concept of immersive popular science education, we have completed the full process UI design practice of the children's astronomical popular science APP "Interstellar Exploration". Design research is conducted from multiple dimensions including project research, user profiling, product architecture, visual specifications, IP image, prototype iteration, and interface implementation. Leveraging lightweight gamification design techniques and integrating astronomical science popularization knowledge with child friendly interaction, a product functional system is built that integrates planetary exploration, astronomical viewing, knowledge quiz, and creative handcrafting. By implementing an emotional version, low fidelity prototype, and high fidelity interface layered visual solution, we aim to validate the design strategy of science popularization APPUI that is suitable for preschool children, and provide reference ideas for the design of similar preschool education mobile products.

Keywords: Preschool Children; Immersive Science Popularization; UI Design; Astronomical Enlightenment; Gamified Interaction

医学研究生导学关系研究的演进、争议与未来展望 —— 兼论 "三维共生导学共同体" 的理论建构

李双洁¹, 任海燕¹, 吴斗艳¹, 刘 源², 李梦泉³, 荀 涛⁴

(1.河南大学 基础医学院, 河南 郑州 475001, 2.河南大学研究生院, 河南 郑州 475001, 3.河南大学 国际(欧美)理工学院, 河南 郑州 475001, 4.河南大学 教育学部 河南 郑州 475001)

摘 要: 导学关系是医学研究生教育质量的核心决定因素, 其特殊性源于医学教育 "学术 - 临床双轨制" 的本质特征。本文采用文献计量分析与系统综述方法, 检索 CNKI、Web of Science、PubMed 等数据库 2000-2025 年发表的 876 篇中英文核心文献, 系统梳理了医学研究生导学关系研究的三个发展阶段, 归纳了 "内涵与类型学""影响因素与作用机制""问题与优化策略" 三大核心研究主题, 辨析了关于导师角色定位、双导师制效果、师生权责边界等关键争议点。研究发现, 现有研究存在 "理论建构碎片化""实证研究同质化""医学特殊性凸显不足""人文维度边缘化" 四大局限。针对这些不足, 本文创新性地整合现有研究成果, 提出了 "三维共生导学共同体" 理论框架, 从学术共生、临床共生和人文共生三个维度阐释了新时代医学研究生导学关系的本质内涵, 并从理论建构、实证研究、实践应用三个层面展望了未来研究方向, 为医学研究生教育改革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和研究思路。

关键词: 医学研究生; 导学关系; 系统综述; 三维共生; 导学共同体; 医学教育

基金项目: 2025 年度河南大学研究生思政项目 (HDYJSSZ019)

DOI: doi.org/10.70693/202607094707

一、引言

医学研究生教育是培养高层次医学人才的关键环节, 直接关系到 "健康中国 2030" 战略目标的实现。截至 2024 年底, 我国医学研究生在学人数已突破 60 万人, 占全国研究生总数的 18.7%, 成为研究生教育体系中规模最大、增长最快的学科门类之一。导学关系作为研究生教育中最基本、最重要的人际关系, 贯穿于研究生培养的全过程, 对研究生的学术成长、临床技能、职业发展和人格塑造具有决定性影响。

与其他学科相比, 医学研究生教育具有鲜明的 "双轨制" 特点, 研究生同时承担 "学生" 研究者 "和" 准医生 " 三重身份, 需要在实验室和临床一线两个完全不同的场域完成学习任务。这种特殊性使得医学研究生的导学关系远比其他学科复杂, 也更容易出现各种问题。近年来, 随着医学研究生招生规模的快速扩张、医学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以及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 传统的导学关系模式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 师生矛盾、学术不端、研究生职业倦怠等问题日益突出, 引起了学术界和教育管理部门的高度关注。

国内外学者围绕医学研究生导学关系开展了大量研究, 积累了丰富的研究成果。然而, 现有研究大多是针对某一具体问题的零散研究, 缺乏对医学研究生导学关系研究的系统梳理和整体把握, 特别是没有形成一个能够体现医学学科特殊性的整合性理论框架。不同研究之间的结论存在较大分歧, 甚至相互矛盾, 难以有效指导医学研究生教育改革实践。因此, 系统梳理国内外医学研究生导学关系研究的发展脉络, 总结研究成果, 辨析争议焦点, 反思研究不足, 并在此基础上构建具有解释力和指导力的理论框架, 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作者简介: 李双洁 (1990-), 女, 博士, 副教授, 基础医学;
任海燕 (1991-), 女, 博士, 讲师, 基础医学;
吴斗艳 (2001-), 女, 在读硕士研究生, 基础医学;
刘 源 (1992-), 男, 硕士, 助教, 大学生心理健康;
李梦泉 (2005-), 女, 在读本科生, 生物工程;
荀 涛 (1992-), 男, 在读博士研究生, 教育学原理。

本文采用系统综述方法,全面检索了 2000-2025 年国内外关于医学研究生导学关系的核心文献,运用文献计量分析和内容分析法对文献进行了深入分析。研究目的在于:(1)厘清医学研究生导学关系研究的演进历程和发展趋势;(2)归纳核心研究主题和主要研究成果;(3)辨析研究中的关键争议点及其产生原因;(4)反思现有研究的不足;(5)提出“三维共生导学共同体”理论框架;(6)展望未来研究方向。

二、医学研究生导学关系研究的演进历程

基于文献计量分析结果和研究内容的特点,本文将 2000 年以来国内外医学研究生导学关系研究划分为三个发展阶段,每个阶段都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研究重点。

(一) 萌芽探索期(2000-2010 年):问题意识初现与经验总结为主

这一阶段是我国医学研究生教育快速发展的起步期,医学研究生招生规模从 2000 年的 3.2 万人增长到 2010 年的 12.8 万人,增长了近 4 倍。随着招生规模的扩大,导学关系中存在的问题开始显现,如导师指导时间不足、师生交流不够、研究生培养质量下降等。

此阶段的研究主要具有以下特点:第一,研究数量较少,年均发表论文不足 20 篇,且以中文文献为主,英文文献非常有限。第二,研究方法单一,绝大多数研究是经验总结和定性描述,缺乏实证研究。第三,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对导学关系中存在问题的一般性对策建议上,如“加强导师队伍建设”“完善导师考核制度”“增加师生交流时间”等。第四,研究视角较为狭窄,大多从导师的角度出发,强调导师的责任和义务,很少关注研究生的主体性和需求。

代表性研究如刘艳辉等(2008)分析了临床医学研究生导师队伍建设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严格导师遴选标准、加强导师培训、建立导师考核机制等对策建议。这一阶段的研究虽然比较初步,但首次将医学研究生导学关系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问题提出来,为后续研究奠定了基础。

(二) 快速发展期(2011-2020 年):实证研究兴起与多视角探索

2010 年以后,我国医学研究生教育进入了快速发展和深化改革的时期。2013 年,国家启动了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制度,2015 年全面推开临床医学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与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并轨”改革,这对医学研究生导学关系产生了深远影响。与此同时,学术界对导学关系的研究也进入了快速发展期,研究数量呈指数级增长,年均发表论文超过 60 篇。代表性研究如孙宏玉等(2016)采用问卷调查法对全国 10 所医学院校的 1200 名医学研究生进行了调查,分析了导学关系质量与研究生学业满意度、职业倦怠之间的关系,发现导学关系质量是影响研究生职业倦怠的重要因素。这一阶段的研究极大地丰富了我们对于医学研究生导学关系的认识,为教育改革提供了重要的实证依据。

这一阶段的研究主要具有以下特点:第一,实证研究开始兴起,问卷调查、访谈法等研究方法得到广泛应用,研究的科学性和规范性显著提高。第二,研究视角日益多元化,除了传统的教育学视角外,心理学、社会学、管理学等多学科视角被引入导学关系研究中。第三,研究内容不断深化,从对问题的表面描述深入到对影响因素和作用机制的探讨,如导师指导风格、师生匹配度、研究生人格特征等对导学关系质量的影响。第四,开始关注医学学科的特殊性,特别是“双轨制”培养模式对导学关系的影响,双导师制成为研究热点。

(三) 深化转型期(2021 年至今):理论建构与系统优化并重

进入新时代,随着“健康中国 2030”战略的深入实施和新一轮医学教育改革的推进,医学研究生教育更加注重质量提升和内涵发展。2020 年,教育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等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加快医学教育创新发展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要“完善导师指导制度,强化导师立德树人职责”。在这一背景下,医学研究生导学关系研究进入了深化转型期。代表性研究如王辰等(2023)基于协同创新理论,提出了“医教协同背景下临床医学研究生导学共同体”的概念,强调导师与研究生之间的协同合作和共同发展。这一阶段的研究标志着医学研究生导学关系研究从“问题导向”向“理论导向”和“系统优化导向”转变。

这一阶段的研究主要具有以下特点:第一,研究数量持续增长,年均发表论文超过 100 篇,且高质量研究成果不断涌现。第二,理论建构受到重视,学者们开始尝试构建具有医学特色的导学关系理论模型,如“双轨融合导学模型”“临床-科研一体化导学模式”等。第三,研究更加关注导学关系的动态发展过程和长期影响,纵向研究开始出现。第四,数字化背景下的导学关系成为新的研究热点,如线上导学、人工智能在导学中的应用等。第五,人文关怀和心理健康成为研究的重要内容,导学关系对研究生心理健康的影响受到广泛关注。

三、医学研究生导学关系研究的核心主题与争议焦点

通过对文献的内容分析, 本文将医学研究生导学关系研究归纳为三大核心主题, 每个主题下都存在一些争议焦点。

(一) 核心主题一: 医学研究生导学关系的内涵与类型学研究

1. 主要研究成果

关于导学关系的内涵, 学者们从不同角度进行了界定。早期的研究大多将导学关系视为一种 "师徒关系" 或 "指导者 - 被指导者" 关系, 强调导师对研究生的单向指导作用。随着研究的深入, 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导学关系是一种双向互动的人际关系, 是导师与研究生在学术、生活和职业发展等方面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过程。针对医学学科的特殊性, 学者们提出了医学研究生导学关系的独特内涵。张炜等 (2022) 指出, 医学研究生导学关系是 "导师与研究生在学术研究和临床实践两个场域中形成的, 以知识传承、技能培养和人格塑造为目标的特殊人际关系"。它不仅包括学术指导关系, 还包括临床带教关系和人文关怀关系。

在导学关系的类型学研究方面, 学者们根据不同的标准对导学关系进行了分类。根据导师的指导风格, 可以分为权威型、民主型和放任型三种类型; 根据师生互动的密切程度, 可以分为亲密型、一般型和疏远型三种类型; 根据导学关系的功能, 可以分为学术型、临床型和综合型三种类型。

2. 争议焦点

关于导学关系的内涵, 争议主要集中在导学关系的边界和范围上。有学者认为, 导学关系应该局限于学术和临床指导领域, 导师不应该过多干预研究生的个人生活; 而另一些学者则认为, 导学关系是一种全方位的师生关系, 导师不仅要指导研究生的学习和工作, 还要关心他们的生活和心理健康, 承担起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

关于导学关系的类型学研究, 争议主要集中在分类标准的科学性和适用性上。现有分类大多是基于一般研究生导学关系的研究, 没有充分考虑医学学科的特殊性, 特别是 "双轨制" 培养模式下导学关系的复杂性。例如, 有些导师在学术上是权威型, 但在临床上是民主型, 这种混合型的指导风格在现有分类中无法得到很好的体现。

(二) 核心主题二: 医学研究生导学关系的影响因素与作用机制研究

1. 主要研究成果

现有研究从导师、研究生、环境三个层面探讨了影响医学研究生导学关系质量的因素。

导师层面的因素主要包括导师的学术水平、临床能力、指导风格、师德师风、指导时间投入等。研究表明, 导师的学术水平和临床能力是影响导学关系质量的基础因素, 而导师的指导风格和师德师风则是关键因素。民主型指导风格、具有良好师德师风的导师更容易与研究生建立和谐的导学关系。

研究生层面的因素主要包括研究生的学习动机、学术能力、临床技能、人格特征、沟通能力等。研究发现, 具有内在学习动机、较强学术能力和沟通能力的研究生更容易与导师建立良好的导学关系。而具有神经质人格特征的研究生则更容易出现师生矛盾。

环境层面的因素主要包括学校的管理制度、医院的工作环境、学科文化、社会舆论等。研究表明, 完善的导师考核制度、合理的研究生培养方案、良好的学科文化有助于建立和谐的导学关系。而繁重的临床工作任务、激烈的科研竞争压力则会对导学关系产生负面影响。

在作用机制方面, 学者们探讨了导学关系质量对研究生学业成就、临床能力、心理健康、职业发展等方面的影响。大量研究表明, 高质量的导学关系能够显著提高研究生的学业满意度、学术产出和临床技能水平, 降低研究生的职业倦怠和焦虑抑郁水平, 促进研究生的职业发展。

2. 争议焦点

关于影响因素的研究, 争议主要集中在各因素的相对重要性上。不同研究得出的结论存在较大差异, 有些研究认为导师因素是最重要的, 有些研究则认为研究生因素或环境因素更为重要。这种差异可能是由于研究样本、研究方法和测量工具的不同导致的。

关于作用机制的研究, 争议主要集中在导学关系影响研究生发展的中介变量和调节变量上。虽然已有研究发现了一些中介变量, 如学术自我效能感、学习投入、组织支持感等, 但对作用机制的深入探讨还不够, 特别是缺乏对不同类别研究生 (如学术学位与专业学位研究生) 作用机制差异的研究。

(三) 核心主题三: 医学研究生导学关系存在的问题与优化策略研究

1. 主要研究成果

现有研究普遍认为, 当前我国医学研究生导学关系存在以下几个主要问题: 第一, 学术指导与临床实践割裂,

导师“重学术轻临床”或“重临床轻学术”的现象普遍存在；第二，导师权威与学生主体性失衡，部分导师存在“老板化”倾向，而部分研究生则缺乏主动性和责任感；第三，导学关系功利化，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背离，师生之间缺乏情感交流和人文关怀；第四，双导师制实施效果不佳，学术导师与临床导师之间缺乏有效沟通和协作；第五，导学关系矛盾调解机制不健全，师生矛盾得不到及时有效解决。

针对这些问题，学者们从不同层面提出了优化策略。在制度层面，主要包括完善导师遴选和考核制度、推行双导师制和团队指导制、建立导学关系矛盾调解机制等；在过程层面，主要包括加强研究生培养全过程管理、规范临床带教制度、强化学术规范教育等；在文化层面，主要包括构建和谐导学文化、弘扬医学人文精神、加强师生沟通交流等；在保障层面，主要包括加强导师队伍建设、完善研究生心理健康服务体系、加大对医学研究生教育的投入等。

2. 争议焦点

关于双导师制的效果，学术界存在较大争议。支持者认为，双导师制能够弥补单个导师知识和能力的不足，实现学术指导与临床实践的有机融合，提高研究生的培养质量；而反对者则认为，双导师制在实际执行中存在“双导师都不管”的现象，导致研究生培养责任不清，反而降低了培养质量。争议的核心在于如何明确双导师的职责分工，建立有效的沟通协作机制。

关于导师考核制度的改革，争议主要集中在考核指标的设置上。现有导师考核制度大多以科研成果为导向，导致导师“重科研轻教学”。学者们普遍认为应该改革导师考核制度，增加教学和人才培养指标的权重，但对于如何设置合理的考核指标，特别是如何量化临床带教和人文指导的工作量，还存在不同意见。

四、现有研究的不足与反思

尽管国内外医学研究生导学关系研究取得了丰富的成果，但通过系统分析可以发现，现有研究仍然存在一些明显的不足，需要在未来的研究中进行改进。

（一）理论建构碎片化，缺乏整合性理论框架

现有研究大多是针对某一具体问题的零散研究，缺乏系统的理论建构。虽然有学者尝试构建了一些理论模型，但这些模型大多是基于一般研究生导学关系的研究，没有充分体现医学学科的特殊性，特别是“双轨制”培养模式下导学关系的复杂性。不同理论模型之间缺乏对话和整合，导致研究成果难以形成合力，无法为医学研究生导学关系建设提供一个统一的理论指导。

（二）实证研究同质化，方法单一且缺乏深度

现有实证研究大多采用问卷调查法，研究方法较为单一。问卷调查虽然能够在短时间内收集大量数据，但难以深入了解导学关系的动态发展过程和复杂的互动机制。同时，现有研究大多是横截面研究，缺乏纵向追踪研究，无法揭示导学关系随时间变化的规律以及对研究生发展的长期影响。此外，研究样本大多集中在某一地区或某几所医学院校，样本的代表性有待进一步提高。

（三）医学特殊性凸显不足，研究针对性不强

虽然现有研究已经开始关注医学学科的特殊性，但大多数研究仍然是在一般研究生导学关系研究的框架下进行的，没有充分考虑医学研究生教育“双轨制”的本质特征。例如，现有研究很少探讨临床实践场域中导学关系的独特性，也很少比较学术学位研究生和专业学位研究生导学关系的差异。这导致研究结论的针对性和适用性不强，难以有效指导医学研究生教育改革实践。

（四）人文维度边缘化，对情感和价值层面关注不够

现有研究大多关注导学关系的工具性层面，如学术指导、临床带教等，而对导学关系的人文维度关注不够。医学是一门“人学”，医学教育不仅要传授专业知识和技能，还要培养研究生的人文素养和职业道德。然而，现有研究很少探讨导师如何在导学过程中对研究生进行人文关怀和价值引领，也很少研究导学关系中的情感互动机制。

（五）实践导向性不强，对策建议缺乏可操作性

现有研究提出的优化策略大多是原则性、方向性的建议，缺乏具体的、可操作的实施方案。例如，很多研究都提出要“加强导师队伍建设”“完善导师考核制度”，但对于如何加强、如何完善，没有提出具体的措施和方法。同时，现有研究很少对所提出的策略进行实证检验，无法评估其实施效果。

五、理论整合与创新："三维共生导学共同体"的建构

针对现有研究的不足,本文在整合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创新性地提出了"三维共生导学共同体"理论框架,试图为医学研究生导学关系研究提供一个整合性的理论视角。

(一)"三维共生导学共同体"的核心内涵

"三维共生导学共同体"是指在医学研究生培养过程中,导师与研究生基于共同的目标和利益,在学术、临床和人文三个维度上形成的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有机整体。其核心内涵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共生性。导师与研究生之间不是一种单向的指导与被指导关系,而是一种双向互动、互利共赢的共生关系。导师在指导研究生的过程中实现自身的学术发展和职业价值,研究生在导师的指导下实现自身的成长和进步。

第二,三维性。导学关系包括学术、临床和人文三个相互联系、相互渗透的维度。学术共生是基础,临床共生是核心,人文共生是保障。只有实现了三个维度的共生发展,才能构建起和谐、健康、高效的导学关系。

第三,共同体性。导师与研究生组成一个学习共同体和发展共同体,具有共同的目标、共同的价值观和共同的行为规范。共同体内部强调平等合作、相互尊重、相互支持,共同追求卓越。

(二)"三维共生导学共同体"的维度解析

1.学术共生:科研创新中的平等合作

学术共生是指导师与研究生在学术研究过程中形成的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关系。在学术共生关系中,导师与研究生是平等的合作伙伴。导师是学术研究的引领者和组织者,负责把握研究方向、提供研究资源和学术指导;研究生是学术研究的参与者和执行者,负责具体的研究工作和创新探索。导师与研究生在学术研究中相互学习、相互启发,共同推动学术创新。

实现学术共生,需要建立平等的学术交流机制,尊重研究生的学术兴趣和主体性,实行团队合作研究模式,加强学术规范教育。

2.临床共生:医疗实践中的教学相长

临床共生是指导师与研究生在临床实践过程中形成的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关系。在临床共生关系中,导师与研究生是教学相长的伙伴。导师是临床实践的指导者和示范者,负责传授临床技能和临床经验,培养研究生的临床思维能力;研究生是临床实践的参与者和学习者,同时也是导师的得力助手,可以帮助导师完成一些日常的医疗工作。导师与研究生在临床实践中相互学习、共同提高,实现医疗质量和教学质量的双提升。

实现临床共生,需要明确导师的临床带教职责,采用多元化的临床教学方法,加强临床实践过程管理,注重临床人文教育。

3.人文共生:职业成长中的情感共鸣

人文共生是指导师与研究生在职业成长过程中形成的相互理解、相互支持的情感关系。在人文共生关系中,导师与研究生是人生道路上的良师益友。导师不仅要关心研究生的学习和工作,还要关心他们的生活和心理健康,在他们遇到困难和挫折时给予及时的帮助和支持;研究生也要尊重导师,理解导师的辛苦,主动与导师沟通交流,建立起相互信任、相互尊重的良好关系。

实现人文共生,需要加强师生之间的情感交流,关注研究生的心理健康,加强研究生的职业规划指导,营造和谐的导学文化。

(三)"三维共生导学共同体"的理论价值

"三维共生导学共同体"理论框架的提出,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理论价值:

第一,整合了现有研究成果。该框架将学术、临床和人文三个维度有机统一起来,克服了现有研究碎片化的不足,为医学研究生导学关系研究提供了一个整合性的理论视角。

第二,凸显了医学学科的特殊性。该框架充分考虑了医学教育"双轨制"的本质特征,将临床共生作为核心维度,体现了医学研究生导学关系与其他学科的本质区别。

第三,丰富了导学关系的内涵。该框架将人文共生作为重要维度,强调了导学关系中的情感互动和价值引领,弥补了现有研究对人文维度关注不够的不足。

第四,为实践提供了理论指导。该框架明确了构建和谐导学关系的目标和方向,为医学院校加强导学关系建设提供了可操作的理论依据。

六、未来研究展望

基于上述系统综述和理论建构, 本文认为未来医学研究生导学关系研究应重点关注以下几个方面:

(一) 深化理论研究, 构建具有医学特色的理论体系

未来研究应加强理论建构, 在 "三维共生导学共同体" 理论框架的基础上, 进一步深入探讨各维度之间的相互关系和作用机制, 构建更加完善、更加系统的医学研究生导学关系理论体系。同时, 应加强国际比较研究, 借鉴国外先进的理论和经验, 结合我国医学研究生教育的实际情况, 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医学研究生导学关系理论。

(二) 创新研究方法, 开展多方法融合的实证研究

未来研究应突破单一问卷调查法的局限, 采用多种研究方法相结合的混合研究设计, 如纵向追踪研究、案例研究、行动研究、实验研究等, 深入探讨导学关系的动态发展过程和复杂的互动机制。同时, 应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 开发更加科学、有效的测量工具, 提高研究的科学性和准确性。

(三) 聚焦医学特殊性, 开展分类分层研究

未来研究应更加关注医学学科的特殊性, 深入探讨不同类型研究生 (学术学位与专业学位研究生、临床医学与基础医学研究生等)、不同类型导师 (学术型导师与临床型导师、青年导师与资深导师等) 导学关系的特点和规律。同时, 应开展分层研究, 探讨不同层次医学院校导学关系的差异, 为不同类型的院校提供针对性的指导。

(四) 拓展研究视野, 关注前沿问题和新兴领域

未来研究应拓展研究视野, 关注数字化转型、人工智能、后疫情时代等对医学研究生导学关系的影响。例如, 探讨线上导学与线下导学的融合模式、人工智能在导学中的应用、远程医疗背景下的临床带教等新兴问题。同时, 应加强导学关系与研究生心理健康、职业认同、学术不端等问题的交叉研究。

(五) 强化实践导向, 开展干预研究和效果评估

未来研究应强化实践导向, 针对当前医学研究生导学关系中存在的突出问题, 设计具体的、可操作的干预方案, 并通过实证研究评估其实施效果。例如, 开展双导师制运行机制的干预研究、导师指导能力提升的培训研究、导学关系矛盾调解机制的实践研究等, 为医学研究生教育改革提供可推广、可复制的实践经验。

七、结论

医学研究生导学关系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 涉及导师、研究生、学校、医院等多个主体, 涵盖学术、临床、人文等多个维度。本文通过系统梳理 2000-2025 年国内外医学研究生导学关系研究的文献, 将研究历程划分为萌芽探索期、快速发展期和深化转型期三个阶段, 归纳了三大核心研究主题和关键争议点, 反思了现有研究存在的不足。在此基础上, 本文创新性地提出了 "三维共生导学共同体" 理论框架, 从学术共生、临床共生和人文共生三个维度阐释了新时代医学研究生导学关系的本质内涵, 并展望了未来研究方向。

构建和谐、健康、高效的医学研究生导学关系, 是提高医学研究生培养质量、推动 "健康中国 2030" 战略实施的重要保障。未来的研究应进一步深化理论建构, 创新研究方法, 聚焦医学特殊性, 拓展研究视野, 强化实践导向, 为我国医学研究生教育事业的发展提供更加坚实的理论支撑和实践指导。

参考文献

- [1] 教育部. 2024 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 [EB/OL]. (2025-03-01)[2025-05-20]. http://www.moe.gov.cn/jyb_sjzl/sjzl_fztjgb/202503/t20250301_1112345.html.
- [2] 王战军. 中国研究生教育质量保障体系研究 [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21:125-132.
- [3] 汪玲. 我国医学研究生教育的改革与发展 [J]. 中华医学教育杂志, 2022, 42 (1):1-5.
- [4] 教育部,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 关于加快医学教育创新发展的指导意见 [Z]. 2020-09-17.
- [5] SMITH A, JONES B. Mentorship in medical education: a systematic review [J]. Medical Education, 2020, 54 (12):1089-1102.
- [6]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 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年度报告 (2010)[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1:45-52.
- [7] 李培根. 研究生教育中的师生关系 [J]. 高等教育研究, 2012, 33 (1):1-6.
- [8] 刘艳辉, 王辰. 临床医学研究生导师队伍建设的思考与实践 [J]. 中华医学教育杂志, 2008, 28 (3):112-114.
- [9]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 关于建立完善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制度的指导意见 [Z]. 2013-12-31.

- [10] 张炜. 研究生导学关系的社会学分析 [J]. 高等教育研究, 2019, 40 (5):78-84.
- [11] 孙宏玉. 医学研究生导学关系质量的影响因素研究 [J]. 中华护理教育, 2016, 13 (7):485-489.
- [12] 何珂, 汪玲. 临床医学专业学位研究生双导师制的实践与思考 [J]. 中华医学教育探索杂志, 2018, 17 (10):973-977.
- [13] SUN H Y, LIU Y 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entorship quality and burnout among medical postgraduates: the mediating role of academic self-efficacy [J]. Journal of Advanced Nursing, 2016, 72 (12):3012-3021.
- [14] 教育部,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 关于加强医教协同实施卓越医生教育培养计划 2.0 的意见 [Z]. 2018-09-17.
- [15] 王辰, 刘艳辉. 医教协同背景下临床医学研究生导学共同体的构建 [J]. 中华医学教育杂志, 2023, 43 (5):321-325.
- [16] JOHNSON C, WILLIAMS D. A longitudinal study of mentorship relationships in medical school [J]. Academic Medicine, 2022, 97 (8):1234-1240.
- [17] 李明, 张华. 数字化背景下医学研究生线上导学模式的探索与实践 [J]. 中国医学教育技术, 2024, 38 (2):189-193.
- [18] 王艳, 刘强. 医学研究生导学关系与心理健康的相关性研究 [J]. 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 2023, 31 (6):921-925.
- [19] WANG C, LIU Y H. The construction of mentorship community for clinical medical postgraduate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medical-education collaboration [J]. Chinese Medical Education Journal, 2023, 43 (5):321-325.
- [20] ANDERSON L. The mentor-protégé relationship in academic medicine [J]. Academic Medicine, 2000, 75 (10):1012-1017.
- [21] 陈向明. 师生关系的本质是一种人际关系 [J]. 教育研究, 2013, 34 (1):12-18.
- [22] 张炜, 李娜. 医学研究生导学关系的内涵与特征 [J]. 学位与研究生教育, 2022 (6):45-50.
- [23] EBY L T, ALLEN T D. Perceptions of mentoring relationships: a comparison of men and women in academia [J]. Journal of Vocational Behavior, 2006, 68 (3):469-484.
- [24] 刘慧, 王健. 医学研究生导学关系类型及其对学业满意度的影响 [J]. 中华医学教育杂志, 2021, 41 (8):701-705.
- [25] 赵刚, 孙丽. 临床医学研究生导学关系类型的实证研究 [J]. 中国高等医学教育, 2020 (12):121-122.
- [26] 王英杰. 关于研究生导师职责的思考 [J]. 学位与研究生教育, 2019 (9):1-6.
- [27] 教育部. 关于全面落实研究生导师立德树人职责的意见 [Z]. 2018-02-06.
- [28] 陈静, 李明. 医学研究生导师指导风格的混合性研究 [J]. 中华医学教育探索杂志, 2024, 23 (3):241-245.
- [29] 张艳, 王强. 医学研究生导学关系质量的影响因素分析 [J]. 中国高等医学教育, 2022 (5):123-124.
- [30] DAVIS M, JACKSON N. Mentor characteristics and mentorship outcomes in medical education [J]. Medical Teacher, 2021, 43 (6):678-684.
- [31] 李丽, 王芳. 研究生个人特征对导学关系质量的影响 [J]. 教育学术月刊, 2023 (4):56-62.
- [32] 赵雪, 刘军. 人格特征与医学研究生导学关系的相关性研究 [J]. 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 2022, 30 (11):1735-1739.
- [33] 王建国, 张华. 环境因素对医学研究生导学关系的影响 [J]. 中华医学教育杂志, 2023, 43 (2):101-105.
- [34] BROWN K, GREEN A. The impact of clinical workload on mentorship in residency training [J]. Journal of Graduate Medical Education, 2020, 12 (3):345-350.
- [35] 刘艳辉, 王辰. 导学关系质量对临床医学研究生职业发展的影响 [J]. 中华医学教育杂志, 2024, 44 (4):289-293.
- [36] 陈丽, 李强. 医学研究生导学关系影响因素的相对重要性研究 [J]. 中国高等医学教育, 2023 (8):125-126.
- [37] 王静, 赵刚. 导学关系影响医学研究生心理健康的中介机制研究 [J]. 中华医学教育探索杂志, 2024, 23 (5):456-460.
- [38] 何珂, 汪玲. 临床医学研究生学术与临床培养的矛盾与协调 [J]. 中华医学教育杂志, 2021, 41 (3):193-196.
- [39] 张炜. 研究生导学关系的异化与回归 [J]. 中国高等教育, 2019 (12):34-36.
- [40] 杨卫. 研究生教育的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 [J]. 高等教育研究, 2020, 41 (1):1-6.
- [41] 李娜, 张炜. 临床医学专业学位研究生双导师制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J]. 学位与研究生教育, 2023 (2):34-39.
- [42] 王健, 刘慧. 医学研究生导学关系矛盾调解机制的构建 [J]. 中华医学教育杂志, 2022, 42 (11):977-981.
- [43] 黄达人. 关于研究生培养质量的若干思考 [J]. 中国高等教育, 2011 (13/14):19-21.

- [44] 孙宏玉。医学研究生教育质量保障体系的构建与实践 [J]. 中华医学教育杂志, 2020, 40 (1):1-4.
- [45] 杜治政。医学人文精神的本质与内涵 [J]. 医学与哲学, 2017, 38 (1A):1-4.
- [46] 钟秉林。我国研究生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战略思考 [J]. 教育研究, 2011, 32 (4):20-25.
- [47] 王辰。临床医学专业学位研究生双导师制的优势与实施路径 [J]. 中华医学教育杂志, 2019, 39 (1):1-4.
- [48] 汪玲。临床医学专业学位研究生双导师制的挑战与对策 [J]. 中华医学教育探索杂志, 2020, 19 (1):1-5.
- [49] 吴启迪。提高研究生教育质量的若干思考 [J]. 学位与研究生教育, 2006 (12):1-4.
- [50] 谢维和。研究生教育的质量观 [J]. 教育研究, 2014, 35 (10):4-11.
- [51] 陈向明。质的研究方法与社会科学研究 [M]. 北京: 教育科学出版社, 2000:123-156.
- [52] 刘艳辉, 王辰。医学研究生导学关系研究的特殊性与未来方向 [J]. 中华医学教育杂志, 2025, 45 (1):1-5.
- [53] 张大庆。医学人文教育的历史与未来 [J]. 中华医学教育杂志, 2023, 43 (1):1-5.
- [54] 李培根。研究生教育改革的若干思考 [J]. 高等教育研究, 2021, 42 (1):1-7.

The evolution, controversies, and future prospects of research on the tutor-graduate student relationship in medicine - also discussing the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of the "three-dimensional symbiotic tutor-graduate student community"

Li Shuangjie¹, Ren Haiyan¹, Wu Douyan¹, Liu Yuan², Li Mengquan³, Xun Tao⁴

(¹School of Basic Medical Sciences, Henan University, Zhengzhou, Henan; ²Graduate School, Henan University, Zhengzhou, Henan; ³International (European and America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Henan University, Zhengzhou, Henan; ⁴Department of Education, Henan University, Zhengzhou, Henan)

Abstract: The tutor-graduate student relationship is a core determinant of the quality of medical graduate education, and its uniqueness stems from the essential characteristic of the "academic-clinical dual-track system" in medical education. This paper adopts bibliometric analysis and systematic review methods to systematically sort out three developmental stages of research on the tutor-graduate student relationship in medical graduate education. It summarizes three core research themes: "connotation and typology,"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mechanisms," and "problems and optimization strategies," and analyzes key controversial points such as the role orientation of mentors,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dual-mentor system, and the boundaries of teacher-student rights and responsibilities. The study finds that existing research suffers from four major limitations: "fragmented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homogenization of empirical research," "insufficient emphasis on the specificity of medicine," and "marginalization of the humanistic dimension." In response to these deficiencies, this paper innovatively integrates existing research findings and proposes a "three-dimensional symbiotic tutor-graduate student community" theoretical framework. This framework elucidates the essential connotation of the tutor-graduate student relationship in medical graduate education in the new era from three dimensions: academic symbiosis, clinical symbiosis, and humanistic symbiosis. It also outlines future research directions from three levels: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empirical research, and practical application, providing a new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and research approach for the reform of medical graduate education.

Keywords: medical graduate students; tutor-student relationship; systematic review; three-dimensional symbiosis; tutor-student community; medical education

后人类时代教育冲突：技术真相下同步与异步的再审视

席宇哲

(杭州师范大学, 浙江 杭州 310000)

摘 要：生成式人工智能与学习平台的深度介入，使教育运行逻辑由课堂组织转向平台组织，同步性与异步性由此演变为两种不同的教育时间制度。本文以富兰克林“整体性技术”与“规范性技术”为起点，结合后人类理论，考察 AI 时代同步与异步教育的生成逻辑。研究发现：同步教育维护共享时间中的教育生成，异步教育则体现平台化的程序时间，二者深层冲突实为生成性时间与可编程时间、教育公共性与个体化服务、分布式行动力与不可转让责任之间的张力。据此，本文提出“教育节律正义”，主张依据教育活动性质重新配置同步与异步结构，以重建 AI 时代教育的公共性与生成性。

关键词：人工智能；同步性教育；异步性教育；后人类理论；教育时间；教育节律正义

DOI: doi.org/10.70693/202607134406

一、问题提出：人工智能正在重构教育时间，而不仅仅改变教学方式

长期以来，人们习惯于将教育技术理解为提升效率、拓展边界的工具。从广播电视教学到慕课平台，再到生成式人工智能与学习分析系统，技术不断突破课堂的物理限制，使学习得以跨越时空。同步与异步教学通常被视作两种教学组织形式：同步强调实时互动，异步强调自主节奏，二者似乎只是教学设计的不同选择，体现为互动效率与学习灵活性的权衡。然而，仅将同步与异步理解为教学策略，已难以解释人工智能时代的新现象。学生虽获得更大的学习自主性，却普遍面临持续在线与持续回应的压力；教师借助 AI 提升效率，却越来越受平台数据、算法指标和绩效评价的约束。人工智能真正改变的，不是教学媒介，而是教育活动赖以发生的时间结构及其组织原则。教育本质上是一种时间性实践，教师与学生在持续的回应、协商与互动中共同生成理解 and 意义。因此，教育时间不是外在于活动的客观背景，而是教育得以发生的重要条件。同步教育维系的是共同生活中的生成性时间，而非简单的“同时在线”；数字平台则通过课程模块化、学习路径规划和即时反馈，将连续的教育过程转化为可记录、可计算、可优化的数据流程，使教育时间由共同经历的生活时间逐渐转向平台组织的程序时间。由此，同步与异步不再只是两种教学形式，而应被理解为两种不同的教育时间制度：前者强调共同时间中的关系生成与意义共创，后者体现平台逻辑下的程序安排与流程控制。二者的差异，实质上是教育时间观的分殊，而非技术手段的优劣之别。理解这一转变，是重新思考人工智能时代教育方向的前提。

近年研究主要围绕在线学习组织、AI 教育应用、平台治理和后人类教育理论展开，但缺乏统一的教育哲学解释框架。国内研究集中于教育数字化转型、AI 赋能教学及同步异步模式优化，多停留于应用层面，追问“如何提升效率”而非“技术何以重构教育时间、关系与主体”。国外研究则呈现多元路径：富兰克林区分“整体性技术”与“规范性技术”，强调技术作为组织活动的方式；威廉姆森指出数字平台成为新治理基础设施；罗萨关于社会加速与共鸣理论揭示时间结构重构；后人类理论（哈拉维、巴拉德、布雷多蒂）突破人类中心主义，将技术、物质与环境纳入主体生成。这些研究分别贡献了视角，但三方面不足：较少讨论技术如何重构教育时间这一基础条件；同步异步研究

作者简介：席宇哲（2003—），男，硕士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为教育哲学。

多停留于组织方式比较, 缺乏对时间制度和组织原则的哲学解释; 后人类理论虽强调技术参与主体生成, 但对教育公共性、责任和伦理如何重建尚缺乏系统讨论。

基于此, 本文以富兰克林技术哲学为起点, 引入后人类理论的关系性主体和分布式行动力视角, 将同步与异步理解为两种教育时间制度, 探讨 AI 如何重构教育时间、关系与主体, 并提出“教育节律正义”作为规范原则。文章不再将同步性与异步性视为简单教学模式, 而是置于技术哲学与后人类理论框架中, 回答教育时间为何变化、关系如何生成、责任如何重建, 最终提出教育节律正义作为人工智能时代教育实践的重要价值原则。

二、技术组织原则的转变: 富兰克林技术哲学与后人类理论的教育学解释

(一) 技术作为组织原则: 富兰克林技术哲学的教育学意涵

在教育数字化转型中, 人们往往视 AI、学习平台为提升效率的工具, 却容易忽略技术对教育本身的深层塑造。富兰克林在《技术的真相》中指出, 技术不仅是机器或设备, 更是一种组织人类活动的方式。技术真正改变的是劳动组织、权力分配和社会关系, 而非仅仅设备使用。因此理解技术须深入考察其背后的组织原则。

这一观点对理解 AI 时代教育变革具有启发。传统学校教育依赖教师组织课堂、安排节奏和建构关系, 教师拥有依据情境调整教学的专业判断权。但随着学习平台、生成式 AI 和分析系统广泛应用, 教学活动日益依据平台逻辑组织: 课程模块化、路径算法推荐、行为实时记录、评价系统自动生成。教育组织方式从教师主导转向平台协同, 过程趋向程序化和标准化。

富兰克林提出“整体性技术”与“规范性技术”的经典区分。整体性技术强调实践者整体把握活动, 依据具体情境持续判断、修正和创造, 知识、经验、责任和行动统一, 实践高度开放。规范性技术则将复杂活动拆解为标准步骤, 参与者执行程序, 整体由规则控制, 实践者逐渐失去整体判断, 行动变为程序执行。将此理论引入教育, 传统课堂教学具整体性技术特征。教师虽依据课程标准, 但真正课堂始终开放: 学生问题、讨论走向、偶然事件和教师即时判断共同决定发展方向。教育价值不来自计划完美执行, 而来自师生共同活动中不断生成新理解。教育本质是生成性实践, 非简单信息传递。然而, AI 平台组织的大量异步学习越来越体现规范性技术: 课程切分为单元, 活动划分为任务, 平台依据数据调整路径, 教师承担资源上传、发布和监督角色。教育从开放实践转向可管理、可预测、可优化的数据流程。规范性技术能提高资源供给效率、扩大覆盖范围, 但当它不断取代整体性技术时, 专业判断、教育事件和共同生成的意义空间可能被压缩。富兰克林哲学的重要价值在于提醒: 教育需要反思的不是是否应用 AI, 而是 AI 以何种组织原则介入。当教育越来越依据平台程序运行时, 我们必须重新思考教育活动究竟服从技术逻辑, 还是坚持自身的生成逻辑。

(二) 后人类理论: 教育主体从个体走向关系网络

富兰克林揭示了技术如何改变组织方式, 后人类理论则进一步解释 AI 为何改变教育主体本身。传统教育理论多基于人类中心主义, 教师与学生是独立自主主体, 教材、技术设备仅为辅助资源。但数字技术深度介入后, 教师和学生不再是唯一行动者: 平台组织课程, 算法推荐顺序, 生成式 AI 参与设计, 分析系统预测风险, 设备记录行为。教育活动表现为教师、学生、平台、算法、数据、制度和物质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

拉图尔的行动者网络理论认为社会行动在人类与非人行动者共同构成的网络中生成, 技术不是被动工具而是影响行动的重要参与者。哈拉维提出“共生生成”, 强调主体在复杂关系中形成。巴拉德提出“内在互动”, 认为主体在关系发生过程中共同生成, 而非先有独立主体再互动。

将后人类理论引入教育, AI 时代教育主体已深刻变化: 教师决策依赖平台数据, 学生路径受算法推荐影响, 评价基于数据分析。教育主体不再只是师生, 而是师生、平台、算法、数据库、终端设备和制度共同构成的关系网络。教育活动不再是简单的“教与学”, 而是多主体共同参与的生成过程。但后人类理论不意味着放弃人的主体地位。它提醒我们, 随着技术行动力增强, 教育更需要重新界定责任边界。平台能提供建议但不能承担判断, 算法能预测风

险但不能决定方向，生成式 AI 能生成资源但不能替代教师理解生命经验。教育主体虽扩展为关系网络，但教育责任仍需具体的人承担。因此，后人类理论的重要意义在于帮助重新理解 AI 时代教育主体的生成方式，促使教育研究从人类中心主义转向关系性主体观，把教育理解为师生、技术、制度与环境共同参与的生成性实践。这一理论转向既能解释组织方式变化，也为后文分析同步与异步教育提供了理论基础。

三、同步与异步：两种教育时间制度的生成逻辑

（一）同步教育：共享时间中的教育生成

同步教育通常被理解为教师与学生在同一时间共同参与教学活动的组织形式，因此其价值常常被概括为即时互动、实时反馈以及课堂交流。然而，如果仅仅将同步教育理解为一种教学安排，就容易忽视其真正的教育意义。同步教育之所以长期构成学校教育的基本形态，并不是因为它能够实现“同时在线”，而是因为它为教育活动提供了共同生成（co-generation）的时间条件。

教育不同于知识传播。知识可以通过教材、视频或人工智能系统进行复制和传递，而教育则始终发生于人与人的共同生活之中。教师依据学生的回应不断调整教学节奏，学生又因教师的追问重新理解知识，同伴之间的讨论不断改变课堂的发展方向。教育意义并不是预先存在于课程内容之中，而是在持续互动中不断生成。因此，教育真正依赖的并不是统一的课程安排，而是共享时间（shared temporality）。

共享时间意味着教师与学生共同进入开放的教育情境，并在持续回应中生成新的教育意义。课堂中的提问、讨论与修正共同推动教育不断展开。富兰克林所提出的整体性技术恰恰体现了这种教育组织方式。在整体性技术中，实践者能够整体把握活动过程，并依据具体情境持续调整行动。传统课堂中的教师并不是机械执行教学方案，而是在面对真实学生时不断重新组织课堂。课程标准、教学设计和教材内容虽然提供了基本框架，但真正决定课堂质量的，始终是教师面对具体教育情境时所作出的专业判断。正因如此，同步教育能够不断产生新的教育事件，使课堂始终保持开放性。

从教育哲学的角度来看，同步教育真正维护的是教育作为公共实践的存在方式，而不是一种固定的课堂形式。共同时间使教师和学生能够不断暴露于彼此的差异之中，在持续回应和协商中形成共同理解。这种共同生活所产生的教育经验，是任何单向知识传递都难以替代的。

（二）异步教育：平台组织下的教育时间重构

异步教育通常被理解为学习者自主安排学习活动的组织形式，突破统一时间限制，使学习跨越时空。数字平台、在线课程和生成式 AI 进一步强化这种方式，资源随时调用，反馈即时生成，学习逐渐摆脱固定课堂束缚。

但异步教育真正带来的变化，不仅是时间更灵活，而是教育时间开始按平台逻辑重新组织。课程拆分为独立模块，路径算法自动调整，平台根据学习行为持续生成新任务。教育时间不再表现为共同经历的课堂，而转化为可切割、记录、计算和优化的数据流程。由此，教育时间从共享时间转向程序时间。学生虽有更多自主安排机会，却越来越受平台运行节律影响：学习提醒、排行榜、连续奖励、自动推送、即时反馈构成持续运行的数字环境。学习活动不再有明确边界，演变为全天候持续实践。学习者获得时间自由，也进入平台持续组织的时间秩序。罗萨关于社会加速的分析提供了重要视角：现代社会不断压缩完成任务的时间，产生持续加速的生活方式。AI 教育虽提高学习效率，却未减少任务，相反平台能持续生成新内容，学习者陷入“永远学不完”的状态。教育时间向生活时间扩张，学习成为持续在线的方式。可见，异步教育最大的变化是教育组织原则从教师主导转向平台协同。教师依赖平台分析组织教学，学生依据反馈调整策略，教育活动服从算法逻辑。异步教育已不仅是一种教学模式，而是一种新的教育时间制度。

（三）教育时间的双重逻辑：生成性时间与可编程时间

同步教育与异步教育的真正区别，不应理解为教师是否在线，而应理解为教育活动遵循何种时间逻辑。

同步教育体现的是生成性时间——不是预先设计好的程序，而是在过程中不断生成新意义。教师依据反馈重新组织，学生因讨论修正理解，课堂节奏具有开放性，教育价值在共同生成中形成。异步教育则越来越体现可编程时间——平台需将学习活动拆分为可管理的数据单元，课程模块、任务、评价和反馈都按统一程序持续运行，学习过程日益可预测和可管理。

需指出，两种时间并非简单对应两种教育形式。同步课堂也可能因高度标准化沦为程序化教学；异步学习也可能因教师持续介入和学生主动反思保持生成性。二者并非对立，而是体现教育组织原则的不同取向。真正值得关注的是，当 AI 不断提高教育效率时，教育是否仍能保留那些无法被程序化、无法被算法预测但对人的成长至关重要的时间——等待、犹豫、沉默、失败、争论、重新开始，这些构成生成性时间的重要组成部分，虽难量化，却是主体成长不可替代的生命经验。因此，AI 时代教育真正需要平衡的不是同步与异步，而是生成性时间与可编程时间的关系。技术能帮助突破时间限制，却不能替代教育所依赖的共同生活时间。只有保留生成意义、形成关系和塑造主体的时间条件，技术赋能才能真正服务于人的成长，而非使教育退化为持续优化的数据流程。

四、后人类时代教育的重构：时间、公共性与责任的三重张力

前文分析表明，人工智能对教育产生的影响已经超越了课堂形态的改变。同步教育与异步教育的讨论之所以具有教育哲学意义，并不在于二者采用了不同的教学方式，而在于二者分别体现了两种不同的教育组织逻辑。随着人工智能不断介入教育实践，教育活动越来越表现为教师、学生、平台、算法和制度共同作用的结果，教育冲突也由传统课堂与在线课堂之争，逐渐转向教育时间、教育公共性和教育责任之间的深层张力。

（一）生成性时间与可编程时间的张力

教育首先是时间性实践。不同于标准化劳动，教育依赖人的成长节律，本质是不断生成理解、建构意义和形成主体的过程。教师等待学生理解，学生在试错中调整认知，同伴在讨论中修正观点，这些共同构成生成性时间。

而平台化教育推动另一种时间逻辑：为便于记录、分析和优化，平台将学习活动拆分为可计算的数据单元，课程模块、任务时长、成绩、点击等被量化，学习时间转为可管理、预测和优化的程序时间，学习节奏依据平台推荐而非主体成长。程序时间并非毫无价值——它能实现资源共享、补偿和差异化支持，促进公平。但当程序时间成为唯一逻辑时，无法量化、无法即时评价却决定成长的重要经验便被排除。阅读经典的沉思、课堂讨论的震动、教师等待学生理解的过程，都难以进入评价体系，却构成教育最重要的部分。因此，AI 时代教育真正需要解决的问题不是如何进一步提高效率，而是如何在技术赋能与主体成长间重建时间平衡，使程序时间服务于生成性时间而非替代之。

（二）教育公共性与平台个性化的张力

AI 教育的重要特点是能持续提供个性化学习支持，通过学习分析、智能推荐和生成式 AI 调整内容，使每个学习者获得相对适合的资源，突破统一节奏局限。

但教育不仅促进个体发展，更承担建构公共生活的使命。学校不同于私人学习，在于为不同背景、能力和价值取向的人提供共同进入公共世界的机会。学生不仅学知识，更在共同讨论、合作和冲突中形成理解他人、尊重差异和承担公共责任的能力。平台化教育提高个性化程度，却可能削弱公共属性。推荐算法依据既有兴趣持续推送内容，学习路径围绕个人经验展开，不同学习者共同面对同一问题、共同形成公共判断的机会减少。教育容易从公共实践转为个体消费，学校共同体可能细分为相互独立的数据主体。

公共性弱化意味着教育失去共同讨论的重要空间，也削弱学校作为公共文化共同体的价值。若教育仅服务于个体效率而缺乏共同生活经验，就难以培养公民所需的公共精神。因此，AI 时代教育改革不能仅关注个体学习效果，还应思考如何利用数字技术重建共同学习、讨论和创造的公共空间。

（三）分布式行动力与教育责任的张力

后人类理论突破人类中心主义，强调行动力并非完全源于个体，而在师生、技术、制度、环境等多种行动者共同作用中生成。AI 教育强化了这一特点：平台推荐影响路径，生成式 AI 参与资源生成，分析系统辅助决策，算法深度嵌入全过程。然而，行动力分布并不意味着责任消失。教育始终是伦理实践，核心不仅是知识传递，更是价值引导、人格塑造和生命成长。算法能分析数据却无法承担教育责任，平台能预测风险却无法回答何种成长值得追求，AI 能生成内容却无法替代教师对生命经验的理解。因此，后人类时代教育最需要重建的不是教师重回技术中心，而是明确不同主体的责任边界。平台开发者承担算法透明和数据安全责任，管理者承担制度设计责任，学校承担应用规范责任，教师始终保有教育判断和价值引导的最终责任。只有当责任能明确追溯，人机协同才能真正促进教育发展，而非演变为责任不断被技术转移的治理模式。

五、教育节律正义：人工智能时代教育组织原则的重建

（一）教育节律正义：一种新的教育规范原则

传统教育公平关注资源公平、机会公平和结果公平，而 AI 时代教育冲突已不主要表现为资源不足，而是教育时间如何被重新组织。平台算法持续安排任务、实时反馈、塑造行动节奏，教育时间从共同生活时间转向可计算、可预测、可优化的程序时间。新问题不是资源是否充足，而是不同主体是否仍能拥有符合教育规律的发展节律。

因此，本文提出“教育节律正义”。这里的“节律”并非仅指学习速度或课堂节奏，而是教育活动中不同主体围绕共同成长所形成的时间秩序，既包括共同生活、讨论、回应形成的共享时间，也包括学习者自主安排的发展时间。教育节律正义强调技术不应重新规定人的成长节律，而应尊重教育作为生成性实践的时间逻辑，使技术时间始终服务于教育时间，而非使教育适应平台运行节律。这一概念与传统公平不同：传统公平关注“是否拥有受教育机会”，教育节律正义进一步关注“教育是否仍按人的成长规律展开”。前者强调资源分配，后者强调时间组织；前者解决机会问题，后者回应 AI 时代教育组织原则的重构。因此，教育节律正义是 AI 时代教育公平的重要拓展，也是后人类教育伦理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教育节律正义的四项原则

共同时间原则：学校应始终保留师生共同经历教育生活的空间。教育核心价值在于人与人在共同生活中的相互回应和共同成长。AI 虽支持异步学习，但不能替代共同讨论、合作和反思所形成的经验。涉及价值教育、合作探究、伦理讨论和创造性学习等活动，应优先采用同步组织方式，使学生能在共同时间中形成公共理解，而非长期停留于个体化学习空间。此原则的目的不是回归传统课堂，而是在 AI 时代维护教育作为公共实践的存在方式；发展节律原则：教育不存在唯一正确的发展速度。不同学习者在知识理解、能力形成和人格发展中有不同节律。AI 的重要价值在于提供差异化支持，因此教育节律正义不否定异步学习，但强调异步学习应服务于主体成长而非平台效率。平台应允许学习者灵活调整安排，避免用统一算法压缩学习节奏，使 AI 真正成为促进个体发展的支持系统，而非制造持续竞争的新机制；技术可中断原则：AI 能生成建议，却不能代替教育判断。教育活动包含大量无法标准化处理的生命经验，如情绪变化、课堂偶然事件和伦理选择，需要教师依据情境作专业判断。所有涉及学习评价、课程推荐、学业预警和路径规划的重要决策，都应允许教师重新解释平台结果并保留人工干预机制。平台应成为教师专业判断的支持，而非最终决策依据；责任可追溯原则：随着平台、算法和 AI 不断参与教育活动，责任呈分布式特征，但行动力可分布，责任不能消失。任何 AI 参与的重要决策都必须明确责任主体。平台开发者承担算法透明责任，学校承担制度规范责任，教育行政部门承担治理责任，教师始终承担教育判断与价值引导责任。技术越深入，越需建立清晰的人机责任体系，避免责任在平台运行中被稀释。

（三）教育节律正义的理论价值

本文提出的“教育节律正义”，并不是对同步教育或异步教育的价值判断，而是人工智能时代教育组织原则的一种规范性表达。它既不同于传统教育公平，也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技术伦理，而是试图回答人工智能时代教育应当遵循何种时间秩序的问题。从理论上讲，教育节律正义将富兰克林关于技术组织原则的分析、后人类理论关于关系性主体的理解以及教育哲学关于生成性实践的讨论整合到统一框架之中，进一步丰富了人工智能时代教育哲学研究的理论视角。从实践上看，它强调人工智能应当重新回归教育目的，使平台运行、算法推荐和生成式人工智能始终服务于人的全面发展，而不是让人的成长不断适应技术程序。只有在教育逻辑始终居于主导地位的前提下，人机协同才能真正成为推动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

参考文献：

- [1] 李政涛. 人工智能时代教育的新挑战与新机遇[J]. 教育研究, 2019(5):4-12.
- [2] 熊才平, 张华. 人工智能时代教育本体论转向[J]. 中国电化教育, 2020(8):1-8.
- [3] FRANKLIN U M. *The Real World of Technology*[M]. Toronto: House of Anansi Press, 1990.
- [4] WILLIAMSON B. *Big Data in Education: The Digital Future of Learning, Policy and Practice*[M].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2017.
- [5] ROSA H. *Social Acceleration: A New Theory of Modernity*[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3.
- [6] LATOUR B. *Reassembling the Social: An Introduction to Actor-Network-Theory*[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 [7] HARAWAY D J. *Staying with the Trouble: Making Kin in the Chthulucene*[M].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16.
- [8] BARAD K. *Meeting the Universe Halfway: Quantum Physics and the Entanglement of Matter and Meaning*[M].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7.
- [9] 马会梅. 后人类主义教育研究的理论转向[J]. 外国教育研究, 2022,49(6):95-107.
- [10] 石中英. 教育哲学导论[M].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5.
- [11] 刘铁芳. 教育的时间性与人的生成[J].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2017,35(3):1-9.
- [12] 项贤明. 教育公共性的哲学阐释[J]. 教育研究, 2015(9):20-27.
- [13] BIESTA G. *The Beautiful Risk of Education*[M]. Boulder: Paradigm Publishers, 2013.
- [14] 冯建军. 教育哲学[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9.

Educational Conflicts In The Post-Human Era: A Re-examination Of Synchrony And Asynchrony In Education Based On The Truth About Technology

Xi Yuzhe

(Hangzhou Normal University, Hangzhou, Zhejiang, China)

Abstract: The deep integration of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learning platforms has shifted the operational logic of education from classroom organisation to platform organisation, transforming synchrony and asynchrony into two distinct regimes of educational time. Drawing on Ursula Franklin's distinction between "holistic technologies" and "prescriptive technologies," and incorporating posthumanist theoretical resources,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generative logic of synchronous and asynchronous education in the AI era. The study finds that synchronous education sustains educational generation within shared temporality, whereas asynchronous education increasingly embodies platform-based programmable time. The underlying conflict is not a choice between the two formats, but rather the tensions between generative time and programmable time, between educational publicness and individualised services, and between distributed agency and non-transferable responsibility. Accordingly, this paper proposes the concept of "Temporal Justice of Education," advocating for the reconfiguration of synchronous and asynchronous structures according to the nature of educational activities, so as to rebuild the publicness and generativity of education in the age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Keyword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Synchronous education; Asynchronous Education; Posthuman theory; Educational time; Temporal justice of education

教师视角下孤独症儿童学前融合教育支持的现状与突破路径

孙立双, 彭盈雪, 刘小双

(唐山师范学院, 河北 唐山 063000)

摘要: 开展融合教育支持相关研究, 能够助力孤独症幼儿深度参与全纳教育、保障学前融合教育落地实施。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法, 选取唐山市 80 名从事孤独症学前融合教育的一线教师为调查对象, 从行政支持、教师支持、家长支持三个维度, 基于教师视角探究当地孤独症幼儿学前融合教育支持现状。研究结果显示: 第一, 唐山市孤独症学前融合教育支持整体处于中等偏上水平, 教师支持维度表现最优; 第二, 融合教育支持评价在教师学历维度存在显著差异, 在所学专业、教师岗位类型维度无显著差异; 第三, 幼儿情绪行为问题突出、综合发展能力薄弱、家长消极放任的教养态度是当前亟待破解的现实困境。据此提出优化路径: 加大融合教育社会宣传力度, 完善专业教育资源配套, 健全特教人才分层培养体系, 贴合学前融合实践现实需求, 构建学校、家庭、社会多主体协同联动的孤独症幼儿全纳教育支持体系。

关键词: 孤独症谱系障碍; 学前融合教育; 支持体系; 生态系统理论

基金项目: 唐山师范学院校级科研项目: 适宜融合视域下孤独症儿童学前融合教育支持现状与策略研究, 20251119056

DOI: doi.org/10.70693/

一、引言

融合教育从规模普及向质量提升的范式转型, 已成为我国特殊教育发展的核心议题。2017 年修订的《残疾人教育条例》总则第三条明确提出, 残疾人教育应当积极推进融合教育, 根据残疾人的残疾类别和接受能力, 采取普通教育方式或者特殊教育方式, 优先采取普通教育方式; 第四章学前教育第三十一条规定,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逐步提高残疾幼儿接受学前教育的比例, 支持普通幼儿园接收残疾幼儿, 凸显学前阶段融合普及与质量提升的政策导向^[1]。2023 年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联合印发《关于实施新时代基础教育扩优提质行动计划的意见》, 文件明确主要目标, 提出到 2027 年“特殊教育优质融合发展的格局基本形成”, 并专门部署学前特殊教育发展任务, 将学前融合教育纳入基础教育扩优提质整体战略框架^[2]。系列政策的密集出台, 标志着学前融合教育已从理念倡导阶段步入制度化的纵深推进期。

0-6 岁学前阶段大脑突触发育活跃、神经可塑性水平最高, 针对特殊儿童的早期干预在此窗口期实施, 干预成效最为显著^[3]。然而, 当前学前融合教育的实践推进普遍面临理想图景与落地效果之间存在明显落差。究其根源, 教师作为融合教育生态中最核心的实施主体, 其困境与诉求却较少被系统性地纳入分析视野。教师的支持体验不仅是衡量融合教育质量的关键指标, 更是诊断支持体系是否完备的核心依据。因此, 从教师视角系统检视孤独症儿童学前融合教育支持的现状, 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实践紧迫性。

二、研究对象

研究主要采用问卷调查法, 以从事孤独症学前融合教育事业的教师为研究对象进行问卷调查, 共发放问卷

作者简介: 孙立双 (1982-), 女, 硕士, 研究方向为融合教育、特殊教育师资;

彭盈雪 (1995-), 女, 硕士, 研究方向为特殊儿童心理与教育;

刘小双 (1979-), 女, 硕士, 研究方向为基础教育;

84 份，剔除无效问卷 4 份，有效回收率为 95.2%。研究对象分布信息见表 1 所示。

表 1 教师基本信息表 (N=80)

项目	选项	频率	百分比 (%)
教师岗位类型	主班教师	17	21.3
	特教教师	46	57.4
	配班教师	11	13.8
	其他	6	7.5
最高学历	大专及以下	35	43.8
	本科及以上	45	56.2
专业	特殊教育	31	38.5
	学前教育	23	28.8
	其他	26	32.4

三、研究方法

问卷改编自靳敬坤的调查问卷《自闭症幼儿学前融合教育支持状况调查表》[4]，问卷共包含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为教师基本信息，包含教师工作岗位类别、学历、专业等。第二部分为教师自评，包括三个维度，即行政支持、教师支持、家长支持三个维度，共 21 道题目。自评部分采用李克特氏四点计分，4 表示“总是如此”，3 表示“经常如此”、2 表示“偶尔如此”、1 表示“很少如此”。第三部分涉及实际的支持困境及优化建议，以多选及开放式题目呈现。

四、研究结果

(一) 孤独症学前融合教育支持总体情况

唐山市孤独症学前融合教育支持总体均值 3.25，整体处于中等偏上水平，各支持维度发展不均衡。基于布朗芬布伦纳生态系统理论进行审视，微观系统下教师支持均值达 3.45，得分居于首位，可见班级师幼层面的融合支持落地成效较好，这与样本中 57.4% 的特教专任教师具备融合教育相关专业培训背景直接相关。而代表家园互动的微观子系统家长支持、代表园所管理的中观系统行政支持得分均低于总体均值，其中行政支持短板最为突出。这反映出当前本地融合支持资源集中布局于微观班级场域，侧重一线教师的现场干预支持，作为中观系统核心载体的幼儿园行政保障体系建设滞后，仍需从行政资源供给、园内制度配套层面完善支撑力量 [5]。

表 2 唐山市孤独症学前融合教育支持整体表现 (N=80)

维度	均值	标准差	排序
行政支持	3.09	0.92	3
教师支持	3.45	0.61	1
家长支持	3.24	0.75	2
总体	3.25	0.69	3

(二) 不同群体教师学前融合教育支持差异分析

1.教师岗位类型

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对不同岗位类型教师融合教育支持进行差异检验，结果如表 3 可知。如表 3 所示，岗位类型未在融合教育支持各维度及总体得分上呈现统计学显著差异。其中“其他岗位”教师在全部维度评分

最高，结合生态系统理论分析，该群体极少参与微观班级融合实践，缺乏一线干预现实体验，评价易偏向理想化，与真实支持现状存在偏差。

表 3 不同岗位类型教师学前融合教育支持差异情况 (M ± SD)

维度	特教教师	主班教师	配班教师	其他	F	p
行政支持	3 ± 1.03	3.17 ± 0.87	3.11 ± 0.67	3.54 ± 0.51	0.656	0.581
教师支持	3.46 ± 0.56	3.41 ± 0.76	3.29 ± 0.64	3.74 ± 0.40	0.725	0.54
家长支持	3.20 ± 0.75	3.22 ± 0.87	3.20 ± 0.65	3.67 ± 0.41	0.7	0.555
总体	3.20 ± 0.70	3.26 ± 0.80	3.19 ± 0.62	3.63 ± 0.41	0.716	0.545

2.学历

独立样本 t 检验结果显示，学历对融合教育支持总体及各维度评分均存在显著差异 (p < 0.05)，大专及以上学历教师各维度、总体均值均高于本科及以上学历教师。究其原因：其一，本科及以上学历教师在校期间系统学习融合教育理论，对全纳教育环境具备更高理想化预期，落地一线实践后易产生心理落差；其二，专科层次幼师培养侧重实操训练，一线问题应对经验更为充足，评判标准相对宽松，因此对现有支持体系给出更高评价。

表 4 不同学历教师学前融合教育支持差异情况 (M ± SD)

维度	本科及以上学历	专科及以下	t	p
行政支持	2.89 ± 0.96	3.36 ± 0.80	-2.357*	0.021
教师支持	3.31 ± 0.60	3.62 ± 0.60	-2.244*	0.028
家长支持	3.09 ± 0.70	3.43 ± 0.77	-2.028*	0.046
总体	3.08 ± 0.67	3.46 ± 0.66	-2.55*	0.013

注：*p < 0.05，**p < 0.01，***p < 0.001，下同。

3.专业背景

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显示，专业背景对融合教育支持总体及各维度评分均无显著影响，特殊教育、康复医疗类专业教师总体均值最低，且在行政支持、教师支持、家长支持三个维度得分均为各组最低。形成该结果的原因主要有两方面：其一，特教与康复相关专业教师专业储备更为充足，评判标准更为严谨，对现有支持体系的不足感知更为清晰；其二，该专业培养侧重理论研习与模拟化技能训练，教师投身一线教学后，在现场实操、家园沟通等方面易产生适应障碍。

表 5 不同专业背景教师学前融合教育支持差异情况 (M ± SD)

维度	学前教育	特殊教育/康复/医疗专业	其他	F	p
行政支持	3.19 ± 0.85	2.94 ± 0.89	3.17 ± 1.03	0.63	0.536
教师支持	3.55 ± 0.45	3.32 ± 0.76	3.49 ± 0.57	1.04	0.358
家长支持	3.51 ± 0.54	3.02 ± 0.89	3.21 ± 0.69	3.01	0.055
总体	3.38 ± 0.54	3.08 ± 0.77	3.29 ± 0.73	1.338	0.268

(三) 孤独症儿童学前融合教育支持困境与优化建议

本研究设置多选题收集教师面临的融合支持困境，统计各类问题的选择频次与占比并完成排序。由表 7 数据可见，当前制约本地学前融合推进的三大核心困境依次为幼儿情绪行为问题突出、幼儿学习与自理能力薄弱、

家长教养态度消极放任，对应占比分别为 71.25%、56.25%、53.75%。结合生态系统理论分析，该结果反映出微观系统内部存在双重短板：一是教师与家长的协同沟通机制不完善，家园联动支持效能不足；二是一线教师干预实操能力存在缺口。其余各类困境则表明，在提升教师专业能力之外，配套专业资源供给、标准化干预教学经验同样是完善融合支持体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表 6 唐山市孤独症儿童学前融合教育支持的困境统计情况 (N=80)

支持困境	数量	百分比 (%)	排序
该儿童情绪行为严重	57	71.25	1
该儿童能力差 (学习、自理)	45	56.25	2
家长的教育态度放任	43	53.75	3
教育行政支持不足	31	38.75	4
缺少教学设备	30	37.5	5
缺少有效的特教方法和策略	29	36.25	6
对孤独症儿童的特点并不了解	12	15	7

四、研究结论

- 第一，唐山市孤独症学前融合教育支持整体处于中等偏上水平，三维度得分排序为教师支持 > 家长支持 > 行政支持，园所行政保障是体系主要薄弱环节。
- 第二，教师学历对融合教育支持评价存在显著差异，大专及以下学历教师评分整体高于本科及以上学历教师；所学专业、岗位类型不会对支持评价产生显著组间差异。
- 第三，一线教师对本地孤独症学前融合教育支持体系整体满意度一般。
- 第四，当前融合教育最亟待解决的三类现实困境为孤独症幼儿情绪行为障碍、幼儿综合发展能力不足、家长放任式教养观念。

六、孤独症儿童学前融合教育支持的突破路径

（一）提升教师融合教育素养，夯实微观系统支持力量

研究结果显示，多数教师难以妥善处置孤独症幼儿突发情绪行为问题，根源在于师资融合教育专业能力存在不足。唐山融合教师专业背景多元，学前教育、特殊教育及其他专业从业者并存，但整体融合教育专业素养参差不齐，学前融合教育面临多重现实难题，需各类教师协同发力。立足生态微观系统建设，需分层提升教师融合教育综合素养：加大师资培训经费与专家指导投入，搭建优秀融合教学经验交流平台，常态化开展在职专项培训；建立标准化教学考核监督机制，依托园内督导部门动态考评融合教学实施质量。教师也需立足幼儿实际需求开展教学反思，及时优化干预策略，确保班级层面融合支持落地见效。

（二）加大园所行政资源供给，完善中观系统保障体系

本研究中行政支持维度得分最低，问卷开放题反馈集中反映园内专业教具、康复教材、干预场地等配套资源供给不足。孤独症幼儿情绪行为具备突发性、不可预判的特征，对教学空间安全与专业配套资源要求较高。作为中观系统核心载体，幼儿园需增设融合教育专项经费，配齐标准化特教资源，优化教学空间安全布局；常态化收集一线教师实操诉求，按需更新配套设施，定期开展园区环境安全排查改造；健全园内融合教育管理制度，强化内部监管，加快补齐环境与设备短板；主动对接具备成熟融合办学经验的机构开展教研交流，同步配套教师专项培训，营造专业化全纳教育氛围。完善的园所行政保障，既能降低教师干预实施难度，也可为孤独症幼儿打造安全稳定的融合成长环境。

(三) 健全家校协同机制, 打通微观系统联动渠道

调研表明, 家园协同是本地融合支持体系的薄弱环节, 家长放任、不配合的教养态度直接制约融合教学成效, 问卷开放作答也多次反映大众对孤独症与全纳教育存在认知偏见。依托生态系统理论, 家园同属微观支持圈层, 仅依靠幼儿园单一主体难以实现长效干预, 家庭教育对孤独症幼儿发展具备长期深远影响。幼儿园应搭建常态化家校沟通渠道, 组建家长互助社群, 开设免费孤独症科普公益课堂, 及时回应家长教育困惑。常态化家校协作可缓解家长抵触与焦虑情绪, 构建连贯统一的教育环境; 便于教师同步掌握幼儿居家状态, 动态调整园所干预方案, 缓解幼儿家园行为表现脱节问题, 延续干预长效性。家校协同能够营造包容接纳的教育氛围, 提升区域全纳教育包容度, 保障学前融合教育持续推进, 助力孤独症幼儿良性发展。

参考文献:

- [1]国务院.残疾人教育条例 [EB/OL]. (2017-02-23)[2026-06-24].https://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17-02/23/content_5170264.htm.
- [2]教育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关于实施新时代基础教育扩优提质行动计划的意见 [EB/OL]. (2023-07-26)[2026-06-24].http://www.moe.gov.cn/srcsite/A06/s3321/202308/t20230830_1076888.html.
- [3]邓猛.融合教育理论指南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7:112-118.9.
- [4]靳敬坤.自闭症幼儿学前融合教育支持现状研究[D].辽宁师范大学,2013.
- [5]丁勇.生态系统理论视域下特殊儿童融合教育支持体系建构 [J]. 现代特殊教育, 2021 (17): 5-9.

Current Status and Breakthrough Pathways of Support for Preschool Inclusive

Education for Children with Autism: A Teacher's Perspective

Sun Lishuang, Peng Yingxue, Liu Xiaoshuang

(Tangshan Normal University, Tangshan, Hebei, China)

Abstract: Research on inclusive education support is conducive to facilitating the deep engagement of autistic preschoolers in inclusive education and ensuring the implementation of preschool inclusive education. This study adopted a questionnaire survey approach, selecting 80 frontline teachers engaged in preschool inclusive education for children with autism in Tangshan City as respondents. From the teacher's perspective, it explored the current status of support for preschool inclusive education for autistic children in the local area from three dimensions: administrative support, teacher support, and parental support. The results revealed that: First, the overall support for preschool inclusive education for children with autism in Tangshan is at an above-average level, with the teacher support dimension performing the best; Second, there a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evaluation of inclusive education support across teachers' educational levels, whil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exist in terms of their academic majors or job types; Third, prominent emotional and behavioral problems of children, weak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al abilities, and parents' passive and laissez-faire parenting attitudes are the practical dilemmas that urgently need to be addressed. Based on these findings, the following optimization pathways are proposed: Strengthen social publicity on inclusive education, improve the allocation of professional educational resources, perfect the hierarchical training system for special education talents, align with the practical needs of preschool inclusive education, and construct a multi-agent collaborative support system for inclusive education for autistic preschoolers involving schools, families, and society.

Keywords: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 Preschool Inclusive Education; Support System; Ecological Systems Theory

新质生产力视域下深海装备人才培养体系研究

王芳^{1,2}, 邱淑婷^{1,2}, 颜东谊^{1,2}

(1.福建理工大学 智慧海洋科学技术学院, 福建 福州, 350118, 2.海洋智能装备福建省高校重点实验室, 福建 福州, 350118)

摘要: 深海装备是经略深海、培育海洋新质生产力的核心硬件载体, 自主可控、智能化、绿色化深海装备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高度依赖多层次、跨学科创新人才供给。新质生产力以科技创新为主导, 融合数字技术、新材料、人工智能与深海工程等多学科, 对深海装备人才的知识结构、创新能力、工程实践素养提出全新要求。当前我国深海装备人才培养存在学科交叉融合不充分、数字智能类课程供给相对滞后、全周期实践育人平台短缺、分层分类培养体系不完善等现实短板, 难以匹配深海装备新质生产力发展需求。F理工大学立足新质生产力核心内涵, 系统梳理现有培养体系存在的突出矛盾, 构建新型人才培养体系, 提出分层分类育人、跨学科课程集群、科教产用协同实训、数字孪生实践平台等落地路径, 为支撑海洋强国战略、壮大深海领域新质人才队伍提供理论参考与实践方案。

关键词: 新质生产力; 深海装备; 人才培养

基金项目: 福建理工大学 2026 年研究生教育教学改革提升计划项目 (YJG26004); 机械工业人才开发服务中心 2025 年度人才发展专项课题 (Cmitz2025061); 福建理工大学 2025 年校级本科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 (JG2025030); 2024 年福建理工大学高等工程实践教育研究项目 (项目编号: SJ2024028); 2024 年福建理工大学实验室研究专项课题 (项目编号: E3400206)。

DOI: doi.org/10.70693/202607093642

1 引言

“十五五”规划明确将深海探测、深远海资源开发、高端海洋装备制造列为前沿战略性新兴产业, 作为培育海洋领域新质生产力、保障国家资源安全、拓展战略空间的核心抓手。从“蛟龙”号、“深海勇士”号到“奋斗者”号, 我国深海载人平台、无人潜航器、深海耐压装备、海底观测网络等核心装备实现跨越式突破^[1], 但在产业链高端环节、智能控制系统、深海特种材料、水下人工智能等领域仍存在技术短板, 人才供给不足成为制约深海装备产业提质升级、释放新质生产力的关键瓶颈^[2]。

新质生产力区别于传统要素驱动生产力, 核心特征是科技创新引领、数字智能赋能、多产业跨界融合、绿色低碳可持续, 重构了深海装备产业技术范式与人才能力标准^[3]。传统深海装备人才以船舶机械、海洋工程单一学科培养为主, 侧重结构设计与传统制造, 缺少人工智能、数字孪生、深海大数据、极端环境新材料、水下智能算法等交叉知识储备, 无法适配智能化、无人化、自主化深海装备研发制造与运维全链条需求。

与此同时, 国内涉海高校、科研院所、深海装备龙头企业协同育人机制尚未成熟, 海上科考实训、深海装备中试、万米级装备实海测试等高成本实践平台稀缺, 人才培养与产业需求脱节、分层培养断层、高层次创新领军人才与一线工程技能人才双向短缺问题凸显。在此背景下, 立足新质生产力逻辑重构深海装备人才培养体系, 成为破解深海产业人才约束、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大现实课题。

2 深海装备人才培养体系构建的意义

作者简介: 王芳(1978—), 男, 高级工程师, 硕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为海洋智能装备;

邱淑婷(1994—), 女, 硕士, 研究实习员, 研究方向人才培养与教学方法;

颜东谊(1992—), 男, 副教授, 硕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为海洋岛能装置设计。

通讯作者: 王芳

F理工大学将新质生产力理论嵌入海洋工程人才培养研究,拓展新质生产力在海洋工科领域的应用场景,完善深海装备跨学科人才培养理论框架,弥补现有研究偏重技术、忽视人才供给体系建设的不足。

F理工大学直面深海装备产业人才结构性缺口,构建可落地、分层分类的一体化育人体系,打通高校、科研院所、深海装备企业、科考平台协同育人壁垒,为涉海院校专业改革、企业人才储备、国家深海人才战略实施提供实操路径。

F理工大学夯实海洋新质生产力人才底座,支撑深海核心装备自主可控攻关,提升深海开发、海底资源勘探、深海空间治理领域的核心竞争力,服务海洋强国建设目标。

我国高校内现有研究多聚焦深海装备技术攻关、海洋工程单一专业建设,少量文献探讨海洋人才培养,但存在三点局限:一是未紧扣新质生产力数字化、智能化、融合化核心特征重塑人才能力模型;二是缺乏覆盖本科、研究生、产业工匠、科研领军人才的分层完整培养框架;三是产教融合多停留在校企实习浅层合作,缺少面向深海极端装备研发的长效协同机制设计^[4]。本文弥补现有研究短板,以新质生产力为分析框架,系统搭建全链条深海装备人才培养体系。

3 新质生产力与海洋装备内在机理

3.1 新质生产力内涵与海洋装备适配性

新质生产力是以科技创新为主引擎,以数字技术、先进材料、绿色技术为核心生产要素,融合新型生产关系形成的先进生产力形态,三大核心特征与深海装备产业高度契合。深海装备突破依赖水下智能算法、耐压特种材料、深海原位探测芯片等原创技术,是典型科技创新驱动产业。融合海洋科学、船舶工程、机械、自动化、人工智能、材料、地质、能源多学科,具备复合型产业特征。包含数字孪生、水下大数据、自主航行控制、深海仿真建模贯穿装备设计、制造、运维全生命周期。

新质生产力视角下深海装备人才核心能力模型区别于传统海洋工程人才,适配新质生产力的深海装备人才需具备底层基础能力、专业工程能力、数字智能创新能力、跨学科融合能力、产业实践与价值素养五层复合能力。海洋新质生产力本质是依靠深海高端装备实现深海资源、空间、生态价值转化,人才作为核心创新要素,是连接技术创新与产业落地的关键纽带。

3.2 新质生产力重塑深海装备人才培养的内在逻辑

新质生产力将数字、智能、创新人才作为核心生产要素,倒逼人才培养从单一工程技能转向“数字+工程+创新”复合素养培育;深海装备产业链延长、细分赛道增多,要求分层分类、精准匹配人才供给;深海装备研发成本高、试验周期长,高校必须构建政产学研用多元协同培养关系,形成完整育人闭环;同时,新质生产力兼顾发展安全与绿色可持续,人才培养必须同步植入海洋安全、深海生态保护思政内涵。

4 新质生产力导向下深海装备人才培养现存突出问题

4.1 学科体系壁垒固化,跨学科融合育人供给不足

现有高校专业设置多沿用传统船舶与海洋工程、机械设计、自动化单一分科模式,课程体系割裂:机械类缺少深海人工智能、水下大数据课程;计算机类缺少深海极端环境工程背景;海洋科学专业缺少装备制造实操训练^[5]。面向深海智能装备、数字孪生仿真、深海特种新材料的交叉选修模块稀缺,复合型课程集群尚未成型,难以匹配新质生产力融合创新需求。

4.2 产教研用协同浅层化,人才供需错配严重

校企合作多以短期实习、毕业参观为主,企业深度参与课程设计、项目教学、联合实验室共建比例低;深海装备重大科研项目、万米级装备中试平台对学生开放度不足,学生缺少参与核心装备攻关的实战机会;人才需求传导机制缺失,高校专业调整滞后于深海装备产业智能化升级节奏,智能潜器、深海数字平台相关人才缺口持续扩大;科研院所、装备企业、科考船平台育人资源分散,未形成统一协同育人联盟。

4.3 高端实践育人平台短缺,数字仿真与实海实训脱节

深海装备试验成本极高,万米级耐压水池、深海综合仿真实验室、海上科考实训船资源稀缺,多数院校仅能开展小型模型试验,学生缺乏完整装备集成、海试调试实操经验。同时数字孪生、水下智能仿真虚拟实训平台建设相对滞后,线上虚拟实训与线下实体试验未能联动,数字化实践育人短板突出,不符合新质生产力数字赋能要求^[6]。

4.4 分层分类培养体系断层，人才梯队结构性失衡

深海装备高层次领军人才稀缺，兼具深海装备工程、人工智能、深海科学的战略型科研带头人供给不足，核心技术攻关团队断层；掌握智能潜器设计、数字仿真、装备运维的复合型工程人才紧缺，头部深海装备企业千人级人才缺口普遍存在^[7]；深海装备装配、水下设备现场调试、科考船运维等高技能人才培养规模不足；本科、硕士、博士、职业技能人才培养未形成梯度人才供给链条。

5 新质生产力视域下深海装备人才培养体系构建

F理工大学紧扣新质生产力创新、数字、融合、协同特征，构建价值引领铸魂体系、跨学科课程重构体系、产教研协同育人体系、虚实融合实践平台体系、多元动态质量评价体系。

5.1 培养目标

深海装备人才培养体系以海洋强国战略为价值主线^[8]，以新质生产力人才能力模型为标准，打通基础教育、本科专业、研究生创新、产业终身培育全周期链条，联动政府、高校、深海科研院所、装备龙头企业、深海科考平台、行业协会六大主体，实现学科交叉、产教融汇、虚实实训、分层育人闭环运行。

将分层培养总目标定为4级，从产业技能到领军人才的培养，逐级递进，分层制定行之有效的培养总目标。

①产业技能层次：培育深海装备制造、海试运维、科考操作高端技能工匠，支撑装备产业化落地。

②本科层次：培养深海装备基础创新工程师，掌握机械、海洋、数字基础，具备装备初步设计与仿真能力。

③硕士层次：培养深海装备细分领域创新研发人才，聚焦智能潜器、深海传感、数字孪生等前沿方向。

④博士/博士后层次：培育深海装备战略领军人才，攻克卡脖子核心技术，引领产业技术迭代。

5.2 课程思政引领培养全过程

新质生产力兼具经济属性与国家安全属性，深海装备直接关系海洋主权、资源安全，必须将思政价值贯穿育人全过程，锚定新质生产力战略底色；打造深蓝特色思政课堂，开设思政课，建立深海装备大国工匠、深海科研先锋案例库，强化自主可控、向海图强使命教育，价值引领铸魂育人新体系。

在深海耐压结构、水下智能系统、深海资源开发等课程中融入核心技术攻关、产业链安全案例，实现专业教学与战略育人融合，完成专业课程思政嵌入式改造。

培育学生兼顾深海装备自主创新与深海生态绿色开发意识，契合新质生产力绿色发展要求，建立海洋国防与生态双导向价值标准。

5.3 跨学科课程重构

围绕五层复合能力模型，搭建通识基础、工程核心、数字智能交叉、前沿产业模块四级课程集群，设置通识基础模块、深海装备工程核心模块、数字智能交叉核心模块、前沿产业细分模块等，适配数字化融合创新需求^[9]。

开设海洋环境科学、深海极端力学、人工智能基础、大数据基础、海洋法律法规、耐压壳体设计、水下推进技术、深海传感器、载人/无人潜器集成、海底观测装备、水下机器人控制、深海数字孪生仿真、水下机器视觉、深海装备智能运维、水下通信与组网、深海矿产开采装备、深海储能装备、极地深海装备、深海装备绿色防腐材料等课程，打破学科壁垒。

创新动态课程更新机制，建立产业需求图谱、人才能力矩阵、课程模块三级联动，每年联合深海企业更新前沿课程，新增AI、数字仿真相关教学内容，匹配产业技术迭代速度。

5.4 优化政产学研用协同育人体系

构建多元主体长效协同机制，解决人才供需错配问题。组建深海装备协同育人联盟，由地方海洋主管部门牵头，联合涉海高校、重点实验室、深海装备龙头企业、深海科考基地、行业协会成立联盟，统一制定人才培养标准、共建课程、共享实训资源。

邀请企业高级工程师、深海总设计师入校担任产业导师，高校教师入驻企业研发中心参与装备攻关；设立深海产业特聘教授、工匠讲师岗位；完善双师型师资双向流动机制。

将万米潜器、深海观测网、海底采矿装备等国家级科研项目转化为研究生课题、本科创新项目，学生全程参与装备设计、仿真、海试全流程，设立重大项目牵引式科教融合^[10]。

面向企业紧缺岗位开设智能潜器、深海数字系统定向班，企业提供实训经费、设备、就业通道，实现毕业即适配岗位，打通创新与产业转化链条。共建深海装备中试基地，支持学生专利、样机成果产业化，强化新质生产

力技术落地导向。

5.5 虚实融合实践平台赋能体系

依托数字技术构建虚拟仿真平台、实体实验室和海上科考实训平台三级实践载体^[1]；创建数字孪生虚拟实训平台，开发全流程深海装备仿真系统，覆盖耐压结构仿真、水下航行模拟、智能控制调试、万米海况虚拟测试，解决实体试验成本高、风险大问题；补齐数字化、实海实训短板。

整合海洋工程、人工智能、新材料实验室，建设深海装备集成试验水池、水下机器人测试平台，整合校内跨学科实体实验室；联合共建单位利用科考船、海上试验平台，设立常态化学生海试实习航次，让学生参与装备海上调试、深海原位探测实操，设置常态化海上流动实训平台；联合深海装备制造车间、深海运维场站共建长期实训基地，覆盖装备加工、装配、现场运维全链条实操，建设企业一线实训基地。

6 新质生产力视域下深海装备人才培养体系实施路径

6.1 顶层设计

完善深海装备人才专项发展规划，出台深海新质人才培育专项政策，将深海装备跨学科专业纳入高校重点建设序列；加大深海实训平台、交叉学科实验室财政投入；设立深海创新人才专项基金，支持学生参与装备研发与海试实践。

6.2 学科改革

推进深海装备交叉学科专业建设；支持高校增设深海智能装备工程交叉新专业，整合海洋工程、自动化、人工智能师资；推行大类招生、中期分流培养模式，低年级夯实数理海洋基础，高年级根据产业细分赛道选择智能潜器、深海数字系统、深海材料方向；开设微专业、辅修模块，面向计算机、机械专业学生增设深海装备交叉辅修，扩大复合型人才培养。

6.3 协同机制落地

协同育人联盟每年召开产业人才需求研讨会，发布深海装备人才需求白皮书，设立常态化联盟共建与项目共育；推行一年企业沉浸式实训+重大科研项目全程参与的培养模式，硕士研究生不少于6个月企业研发中心驻场学习；建立深海装备人才共享库，实现高校、企业、科研院所师资、设备、项目资源互通。

6.4 升级实训平台

加快数字化深海实训载体建设，国家级、省级涉海院校优先建设深海装备数字孪生仿真中心，纳入新工科重点建设项目；统筹全国科考船资源，建立学生海试实习统一调度机制，扩大实海实训覆盖规模；鼓励企业向高校捐赠退役深海装备样机，搭建实体实操实训载体。

6.5 人才梯队建设

分层分类精准培育深海装备人才梯队，依托国家深海重点实验室设立博士后流动站，支持青年科研人员牵头深海装备前沿攻关项目，柔性引进全球深海领域顶尖专家，扶持领军人才培优计划；校企联合开设硕士专项班，创新工程师培育计划，定向培养智能深海装备研发人才；海洋职业院校与装备制造企业共建现代产业学院，聚焦装备装配、水下现场运维技能培训，深化深海工匠培育计划；开设深海装备科创竞赛、夏令营，吸引初高中、本科生深耕深海领域，拓宽人才源头，储备青年后备人才。

6 结论与展望

新质生产力对深海装备产业的重塑，本质是对人才能力标准与培养模式的系统性变革。当前我国深海装备人才培养存在学科分散、产教协同不足、数字实训平台短缺、分层培养断层等核心矛盾，无法支撑深海领域新质生产力持续释放。通过构建的价值引领、课程重构、协同育人、平台赋能、多元评价五位一体人才培养体系，以跨学科复合能力为核心，打通政产学研用协同闭环，搭建虚实融合数字化实践载体，分层覆盖本科、研究生、产业工匠、领军人才全梯队，能够有效破解深海装备人才结构性短缺问题，实现人才供给与深海智能化、自主化装备产业发展精准匹配，为海洋新质生产力培育提供坚实人才支撑。

未来深海装备将向全自主无人集群、海底永久基地、深海绿色开采、深海人工智能大模型方向演进，新质生产力的技术形态将持续迭代。后续研究可进一步聚焦：一是基于大数据构建深海装备人才需求动态预测模型；二是探索深海装备国际化联合育人模式，提升我国深海领域全球人才竞争力；三是量化测算本培养体系的人才产出

效能,完善人才培养质量量化评估指标体系。深海事业前途广阔,唯有持续完善新型人才培养体系,源源不断培育创新型深海装备人才,方能实现深海核心技术自主可控,全面建成海洋强国。

参考文献:

- [1] 高泽鹏,李丙瑞,窦银科,等.无人潜航器的发展与应用[J].科学,2026,78(1):53-58+69..
- [2] 崔维成,邵鑫浩.深海探测技术进展及未来发展趋势[J].科技导报,2025,43(12):38-54..
- [3] 于艳文,史春林.新质生产力赋能海洋强国建设的内在逻辑与实践路径[J].江苏海洋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6,24(3):10-18..
- [4] 赵倩.新质生产力赋能福建船政文化创新性发展研究[J].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26,44(5):132-135.
- [5] 刘瑜.OBE理念导向下高校新工科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体系研究[J/OL].黑龙江教育(理论与实践),1-4[2026-06-30].<https://link.cnki.net/urlid/23.1064.G4.20260626.1714.006>.
- [6] 李小民,史岩,邱杨.基于粤港澳大湾区电子类创新人才培养的虚拟仿真实实践教学体系研究与实践[J].高教学刊,2026,12(17):1-6.
- [7] 杨云箐.产教融合背景下高端装备制造业人才培养成效评价体系研究[J].湖北开放职业学院学报,2026,39(11):74-76.
- [8] 余杨,张建华,余建星,等.高端海洋装备创新领军人才培养的探索及实践[J].天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24(1):53-57.
- [9] 施岳定,张学昌,吴红兵,等.地方高校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建设与实践[J].中国大学教学,2015,(2):34-36.
- [10] 李伟.协同创新视角下研究生培养的现实困境与应对策略[J].教育理论与实践,2019,39(27):7-9.
- [11] 王从严.关于高校激发领军人才创新活力的思考[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21,(16):30-32.

Research on the Talent Cultivation System for Deep-Sea Equipment Under the Perspective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Fang Wang^{1,2}, Shuting Qiu^{1,2}, Dongyi Yan^{1,2}

(1. School of Smart Marin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Fuji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Fuzhou, , China; 2. Fujian Provincial Key Laboratory of Marine Smart Equipment, Fuzhou, China)

Abstract: Deep-sea equipment serves as the core hardware carrier for exploring the deep sea and cultivating new high-quality marine productivity.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deep-sea equipment industry—characterized by autonomy, controllability, intelligence, and green sustainability—strongly depends on the supply of multidisciplinary and cross-disciplinary innovation talents. New high-quality productivity is primarily driven by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ntegrating digital technologies, new material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deep-sea engineering, among other disciplines. This imposes novel requirements on the knowledge structure, innovation capabilities, and engineering practice competencies of deep-sea equipment professionals. Currently, China's deep-sea equipment talent cultivation faces practical shortcomings, such as insufficient interdisciplinary integration, relatively lagging digital and intelligent course offerings, a lack of full-cycle practical education platforms, and an incomplete hierarchical and categorized training system, making it difficult to meet the demands of new high-quality productivity in the deep-sea equipment sector. F University, grounded in the core connotations of new high-quality productivity, systematically identifies prominent contradictions in the existing training system. It constructs a new talent cultivation framework, proposing hierarchical and categorized education, interdisciplinary course clusters, collaborative training in science, education, industry, and application, and digital twin practice platforms as actionable pathways. This provides theoretical references and practical solutions to support the strategy of building a maritime power and strengthen the new high-quality talent pool in the deep-sea field.

Keywords: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Deep sea equipment; talent cultivation

数字体育视域下我国体育硕士教育研究热点与前沿 ——基于 CiteSpace 的可视化分析

张象, 贺莹

(成都大学 四川 成都 610106)

摘要: 为明晰数字体育视域下我国体育硕士教育的研究热点与前沿, 以 2016-2026 年 CNKI 中 657 篇相关文献为对象, 采用 CiteSpace 可视化分析。结果表明研究主体合作松散、跨主体及国际合作不足; 形成以“体育硕士”为核心、“人才培养”“培养模式”为支柱的框架, 研究向微观化、实证化延伸但新兴主题融合度低, 演进历经三阶段且紧扣政策与实践; 前沿聚焦案例教学、就业与科研能力培养及跨学科交叉。研究还存在差异化培养研究不足等问题, 可为该领域教育优化、质量提升及学科交叉提供理论参考。

关键词: 数字体育; 体育硕士教育; CiteSpace

基金项目: 2024 年成都大学研究生教育教学改革项目 (CDJGY2024021)

DOI: doi.org/10.70693/202607198399

随着数字中国、体育强国、健康中国三大国家战略深度融合, 大数据、人工智能、元宇宙、数字孪生等数字技术加速渗透体育领域, 推动体育产业、全民健身、学校体育、竞技体育等板块实现数字化转型, 数字体育已成为体育学学科发展的核心热点与重要方向^[1]。2020 年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和财政部联合印发《关于加快新时代研究生教育改革发展的意见》提出: “强化产教融合育人机制, 加强专业学位研究生实践创新能力培养^[2]。体育硕士研究生作为体育学研究的新生力量, 与其相关研究文献的选题与成果, 直接反映数字体育领域的研究动态、实践需求与发展趋势, 关系到体育学学科交叉融合的推进与高层次体育人才的培养质量。本文采用 CiteSpace 可视化分析工具, 以数字体育视域下我国体育硕士教育相关文献为研究对象, 系统梳理其研究热点、前沿演进与核心特征, 揭示当前研究存在的问题与未来发展方向, 为优化及体育学学科交叉发展提供理论参考与实践借鉴。

1 数据来源与方法

CiteSpace 软件功能丰富, 能够生成时间趋势图, 并对特定研究领域进行聚类分析, 揭示数据库背后的规律与现象。它能够深入分析某一领域的发展趋势和研究前沿的演进历程, 并对大数据进行处理, 清晰呈现聚类视图, 展现节点间的关联^[3]。本文数据来源通过中国 (CNKI), 采用高级检索以“体育硕士、研究生、教育”为主题进行检索, 检索时间跨度为 2016 年 1 月-2026 年 4 月, 共计检索出 759 篇文章, 为了确保研究的可行性, 经过人工剔除与研究相关性不大的文献, 总共得到文献 657 篇。通过绘制知识图谱, 发现该领域的核心作者和重要机构, 对文献关键词的出现频率、共现关系进行分析直观呈现研究主体、研究热点及演进脉络。

2 我国体育硕士研究生研究现状分析

2.1 作者共现分析

根据 CiteSpace 作者合作网络图谱分析得到, 节点 286 个、连线 125 条、网络密度为 0.0031, 说明整体合作松散领域内以小团队、独立研究为主, 跨团队合作极少。其中周君华为中心的节点最大, 其次为余玲、王涛、苗成龙、陈仔、唐海英等, 是该领域的核心研究者。根据 Q 值=0.8431, S 值=0.9634 可以看出, 该作者共现图谱存在清晰的聚类结构, 即多个相对独立的学术合作团队。将团队分为三类: 核心圈以周君华为中心, 辐射余玲、王涛、宋君毅、陈洪琪、李世明等, 是领域内规模最大、合作最紧密的核心团队, 节点多为暖黄色, 代表近年持续活跃。中型圈以张彦秋、刘义峰、解长福为中心的团队, 以陈仔、唐海英、张勇明为中心的团队, 以宋全秋、崔光震、陈乐琴为中心的团队等。小型孤立圈大量节点仅存在 1-2 条连线, 甚至孤立无连线如左侧刘静、姜涛, 右侧唐元超等, 代表独立研究者或仅与少数人合作的小团队。

作者简介: 张象 (1978-), 男, 硕士研究生, 教授, 研究方向为体育教学;

贺莹 (2002-), 女, 硕士在读, 研究方向为体育教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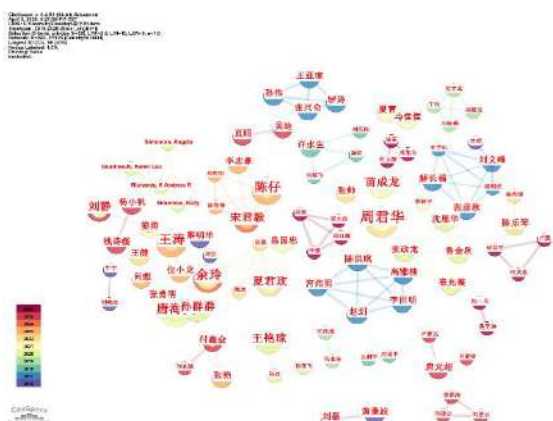


图 1 作者共现网络图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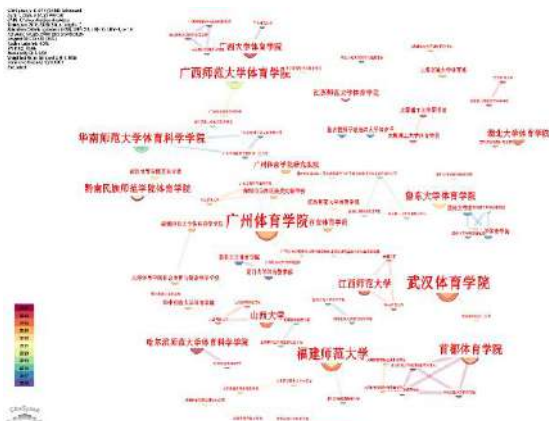


图 2 机构合作网络图谱

根据发文量来看，排名前五的分别是：周君华（5 篇）、唐海英（4 篇）、余玲（4 篇）、王涛（4 篇）、叶松东（4 篇），大多数作者发文量集中在 4 篇左右，总体发文量不高。图谱中存在少量国际作者，但仅与少数国内作者有合作，说明国际合作规模小、频次低，领域研究以国内学者为主。

2.2 科研机构共现分析

由图 2 所知，科研机构节点为 228，连线为 66 条，网络密度为 0.0026。表明机构间整体合作程度较低，多数机构处于孤立或弱关联状态，跨区域、跨层级的深度合作不足，科研资源整合效率有待提升。从节点规模来看，广州体育学院、武汉体育学院、首都体育学院等专业体育院校节点最大，是国内体育科研的核心产出主体；同时，华南师范大学体育科学学院、广西师范大学体育学院、福建师范大学等师范类院校体育学院节点规模突出，山西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综合类大学体育院系也形成了一定规模的研究节点，体现了综合类高校在体育交叉学科研究中的参与度。

机构合作呈现显著的地域邻近性特征，同一省份、同一区域内的机构合作更为紧密，跨区域大规模合作较少，反映出体育科研合作受地理空间、资源分配的影响较为明显。图谱边缘的地方师范院校、综合类大学及中小学教研机构连线稀疏，多为孤立节点或弱关联，表明基层体育教研机构与核心科研院所的合作深度不足，跨区域、跨层级的合作网络尚未完全形成。

3. 我国体育硕士研究生研究热点分析

3.1 关键词共现分析

使用 citespace 软件，对有效文献进行分析，得到了关键词的共现网络图谱。据图所知，生成的节点数为 281、连线为 302 条（ $E=202$ ）、节点密度为 0.0077。“体育硕士”节点规模最大，是该领域的研究核心与逻辑起点，所有研究均围绕其展开；“研究生”“培养模式”“人才培养”节点紧随其后，构成体育硕士教育研究的三大核心主题，表明对体育硕士的本质属性、人才培养路径及模式创新的关注度最高。整体来看，关键词连线呈现核心集中、周边分散的结构，核心议题与细分主题的关联度高，但部分新兴细分主题与核心聚类的连线相对稀疏，表明该方向研究尚处于初步探索阶段，与主流研究的融合度有待提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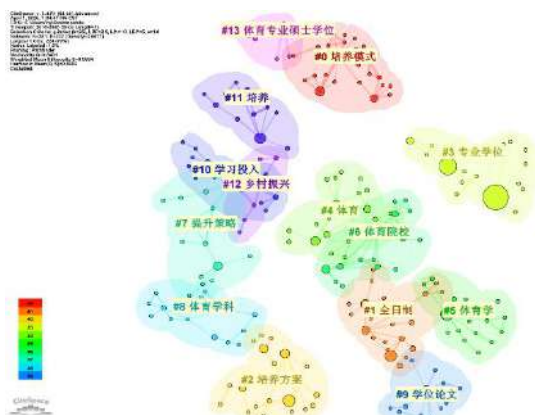


图 3 关键词共现图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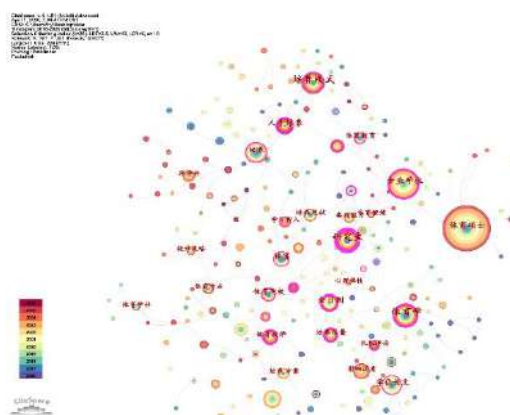


图 4 关键词聚类图谱

关键词出现频次较高的主要有：体育硕士（154次）、专业学位（70次）、体育学（38次）、培养模式（36次）、课程设置（30次）、影响因素（28次）、培养（25次）、研究生（24次）、学位论文（23次）、全日制（19次）。根据图谱和出现频次可知，“体育硕士”是核心，“人才培养”“培养模式”为两大支柱的研究框架长期稳定，是体育硕士教育研究的永恒议题，体现该领域研究的传承性与系统性。部分新兴研究主题与核心聚类的关联度较低，研究较为分散，尚未形成与主流研究深度融合的系统化成果，同时现有研究对不同区域、不同类型院校体育硕士教育的差异化对比研究不足，难以支撑多样化培养模式的构建。

3.2 关键词聚类分析

通过分析得到图 4 关键词聚类图谱，网络节点数 $N=281$ ，连线数 $E=302$ ，网络密度 $Density=0.0077$ ；模块化 Q 值 (Modularity Q) 为 0.8431 (>0.3)，加权平均轮廓值 (Weighted Mean Silhouette) 为 0.9634 (>0.7)，表明图谱聚类结构显著、信度优良，可有效反映该领域的研究主题分布与结构特征。

图中共显示 14 个聚类词组，分别是#0 培养模式、#1 全日制、#2 培养方案、#3 专业学位、#4 体育、#5 体育学、#6 体育院校、#7 提升策略、#8 体育学科、#9 学位论文、#10 学习投入、#11 培养、#12 乡村振兴、#13 体育专业硕士学位。整体来看核心聚类之间连线密集，#0“培养模式”与#1“全日制”、#2“培养方案”深度关联，表明体育硕士培养的顶层设计与实施环节高度融合；新兴聚类与核心聚类存在弱关联，体现了研究的拓展性与成长性。

表 1 研究热点聚类表

聚类号	聚类名称	规模值	轮廓值	发表年份	关键词（前 3）
#0	培养模式	25	1	2019	体育教育、人才培养、教育改革
#1	全日制	23	0.97	2019	影响因素、扎根理论、培养目标
#2	培养方案	21	1	2018	体育教学、就业、专业硕士
#3	专业学位	20	0.98	2020	体育硕士、案例教学、硕士研究生
#4	体育	20	0.97	2018	培养现状、实践能力、课程思政
#5	体育学	18	0.95	2018	体育硕士、硕士学位论文、学术活动
#6	体育院校	17	0.96	2020	研究生、心理弹性、体育锻炼
#7	提升策略	16	0.93	2021	中国、体育专业、小学体育
#8	体育学科	14	0.95	2021	学科交叉、培养误区、培养优化
#9	学位论文	13	0.88	2018	选题、休闲体育、运动训练领域
#10	学习投入	13	0.98	2021	广东省、跨学科、体育类硕士研究生
#11	培养	12	0.94	2018	实践技能、舞蹈学、篮球
#12	乡村振兴	7	0.98	2021	学科教学体育、创新培养、4access 培养模式
#13	体育专业硕士学位	5	0.96	2021	制度、体医融合、优化策略

规模值反映各聚类内部所涉及的关键词规模，平均值越高意味着在该分类下的研究文档的数量越多，而轮廓值的作用在于展示不同关键词之间的联系，越高的轮廓值表明该分类的效率越好^[4]。结合图谱与表 1，#0 培养模式、#1 全日制、#2 培养方案、#3 专业学位为规模的核心聚类，是体育硕士教育研究的绝对主线，在图谱中占据核心位置，连线密集、辐射范围广。四大核心聚类轮廓值均 ≥ 0.97 ，主题高度聚焦，在图谱中形成“专业学位定位-培养模式设计-培养方案落地-全日制差异化实施”的完整逻辑链条，构成了体育硕士教育研究的主体框架，是领域发展的核心驱动力。

3.3 关键词时区分析

图 5 时间轴横向跨度为 2016-2026 年，纵向为 14 个核心聚类节点代表关键词，节点大小对应关键词频次，连线代表关键词共现关系，节点颜色对应关键词首次出现年份。据图 5 可知，关键词以#0 培养模式为核心，形成“核心聚类主导、中观聚类支撑、新兴聚类拓展”的层级结构，各聚类沿时间轴有序演化，逻辑链条完整。研究从早期的制度设计，逐步向质量提升、个体研究、国家战略响应迭代，始终紧扣体育教育事业发展与国家政策导向。将领域研究整体演化分为三个阶段：基础奠基期（2016-2018 年），核心聚类为#2 培养方案、#4 体

育、#5 体育学、#9 学位论文、#11 培养，聚焦体育硕士培养的基础定位、方案设计、学科载体与质量评价，构建领域研究的基本框架，研究以宏观理论思辨为主；核心深化期（2019-2020 年），核心聚类为#0 培养模式、#1 全日制、#3 专业学位、#6 体育院校，向培养模式创新、全日制差异化发展、专业学位属性深化、院校主体研究延伸，形成领域研究的核心体系，研究方法开始向实证研究转型；前沿拓展期（2021 年至今），核心聚类为#7 提升策略、#8 体育学科、#10 学习投入、#12 乡村振兴、#13 体育专业硕士学位，向质量提升、学科交叉、个体微观、国家战略响应等方向拓展，研究呈现多元化、精细化、时代化特征，跨学科、实证研究成为主流。

3.4 关键词突现分析

关键词突现率能够反映一段时间内影响力较大的研究领域，帮助分析该领域阶段性研究热点问题^[5]。该研究领域 2016-2026 年突现词前 10 位是根据突现的开始年份进行排序，分别展示关键词的突现强度、开始和结束时间等。

Top 10 Keywords with the Strongest Citation Bursts

Keywords	Year	Strength	Begin	End	2016 - 2026
篮球	2016	2.42	2016	2017	
学位论文	2016	2.79	2017	2021	
就业	2016	2.75	2018	2022	
跨学科	2020	2.97	2022	2024	
评价体系	2022	2.54	2022	2024	
案例教学	2022	2.45	2022	2026	
学业成就	2023	2.76	2023	2024	
就业能力	2024	2.59	2024	2026	
科研能力	2024	2.59	2024	2026	
扎根理论	2021	2.42	2024	2026	

图 5 关键词时间线图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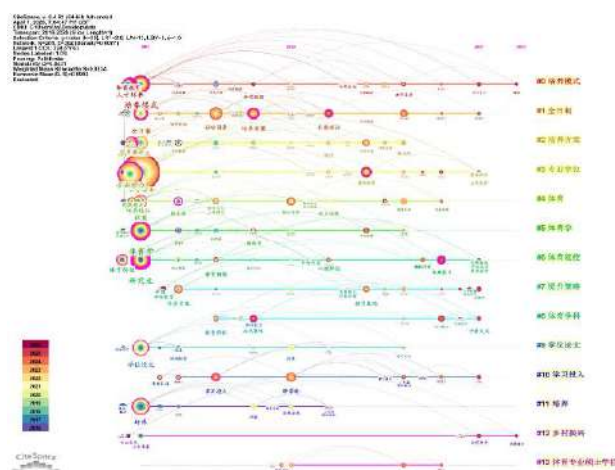


图 6 关键词突现图谱

突现词是根据某年份文献中使用频次的程度探测出的，与关键词使用的总频数无关^[6]。根据突现词出现的时间特征划为 3 个阶段，早期热点（2016-202 年）关键词为篮球、学位论文、就业，突现强度分别为 2.42、2.79、2.75，该阶段突现词聚焦体育硕士培养的基础实践问题，是领域发展初期的核心研究方向。研究以实践需求为核心，聚焦专项培养、质量评价、就业等基础问题，研究视角宏观，以解决体育硕士培养的现实痛点为目标，为后续研究奠定基础。中期热点（2022-2024 年）关键词为跨学科、评价体系、学业成就，突现强度分别为 2.97、2.54、2.76，该阶段突现词体现了研究从宏观实践向方法创新、质量提升的转型，是领域研究深化的关键阶段。研究方法视角全面升级，跨学科成为核心趋势，质量评价体系化、研究视角微观化成为主流，领域研究从“粗放型”向“精细化”转型。当前与未来前沿（2024-2026 年），关键词为案例教学、就业能力、科研能力、扎根理论，突现强度为 2.45、2.59、2.59、2.42，该阶段突现词为当前持续活跃的研究热点，代表 2024-2026 年领域研究的前沿方向。基于突现词的结束时间与生命周期，预测 2026 年后的研究方向，案例教学、就业能力、科研能力的突现条带延伸至 2026 年，预示这三个方向将在未来持续成为研究重点，是体育硕士培养改革的核心抓手。跨学科、评价体系虽在 2024 年结束突现，但作为强度极高的关键词，其研究惯性将转化为“体医融合”“智慧体育”“数字体育”等具体交叉领域的研究爆发。

4. 结论

研究合作松散、区域化，国际及跨层级合作不足。作者以小团队和独立研究为主，核心团队以周君华为代表，多数作者发文量低；科研机构形成三大区域合作集群，跨区域资源整合效率低；热点以“体育硕士”“人才培养”为核心，向精细化、多元化延伸，乡村振兴等方向丰富研究维度，但部分新兴主题研究分散，未形成系统成果。研究分三阶段推进，紧扣政策与实践需求，从理论思辨转向实证研究，逐步向质量提升、学科交叉方向拓展；前沿聚焦能力培养与方法创新，学科交叉成趋势，数字技术与体育硕士培养融合是发展关键，仍存在短板，差异化培养、新兴方向及数字技术应用研究不足，难以适配高层次体育人才需求。

参考文献

- [1] 张宏伟,李娟.数字体育的内涵、特征与发展路径研究[J].体育科学,2020,40(5): 3-13.

- [2] 国务院.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A/OL]. (2021-03-13) [2025-09-24].https://www.gov.cn/xinwen/2021-03/13/content_5592681.htm.
- [3] 李立峰,王洪彪.中国公共体育服务研究 10 年(2007—2016):热点、趋势与展望——基于 CiteSpace Ⅲ 的可视化分析 [J]. 沈阳体育学院学报,2017,36(3):39–47.
- [4] 丁广鹏,王力,李思宇等.基于 CiteSpace 的体育助力乡村振兴研究可视化分析[J].体育科技文献通报,2025,33(02):70-74.
- [5] 刘梓汐,罗盛锋.我国红色旅游研究进展及趋势——基于 CiteSpace 计量分析(2009–2019) [J]. 社会科学家,2020(11):44–49.
- [6] 丁颖,洪晨璐,吴飞.中国乒乓球近 30 年知识图谱与热点趋势分析 [J]. 山东体育学院学报,2021,37(3):111–118.

Research Hotspots and Frontiers of Sports Master Education in Chin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igital Sports — A Visual Analysis Based on CiteSpace

Zhang Xiang, He Ying

(Chengdu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China)

Abstract: To clarify the research hotspots and frontiers of sports master education in China under the perspective of digital sports, this paper takes 657 relevant literatures retrieved from CNKI from 2016 to 2026 as research objects and conducts visual analysis via CiteSpace. The results reveal that the cooperation among research entities is loose, with insufficient cross-institu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collaboration. A research framework centered on "sports masters" and supported by "talent cultivation" and "training modes" has been formed. Relevant research has developed toward micro and empirical orientations, yet the integration level of emerging research themes remains low. The research evolution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stages closely linked to national policies and practical demands. Current research frontiers focus on case teaching, employment competence cultivation, scientific research ability training, and interdisciplinary integration. This study also identifies existing deficiencies including insufficient research on differentiated training schemes. It can provide theoretical references for educational optimization, quality improvement and interdisciplinary development in this field.

Keywords: Digital sports; Sports master education; CiteSpace

中职《单片机技术与应用》课程思政的实践探索

王高生, 秦诗雨

(四川省金堂县职业高级中学, 四川 金堂 610400)

摘要:在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指引下, 深化专业课程思政建设已成为中职教育改革的必然要求。研究聚焦《单片机技术与应用》课程, 针对思政元素与专业技能教学“两张皮”的难题, 将价值塑造有机嵌入“理论认知、虚拟仿真、实践操作”三阶递进的教学全过程, 并通过“课堂导入引发价值认知、课中实践促进价值体认、课后拓展引导价值践行”的闭环设计, 实现思政教育的无痕渗透与深度内化。实践表明, 该路径有效激发了学生的科技报国情怀、工匠精神与社会责任感, 显著提升了综合职业素养, 为同类工科专业课程思政改革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范式。

关键词:课程思政; 《单片机技术与应用》; 中职教学改革

基金项目:本文系四川省职业技术教育学会 2025-2026 年度职业教育教学改革课题“基于‘天府工匠’精神中职学校专业课程思政研究”(项目编号: Y252071) 阶段性研究成果

DOI: doi.org/10.70693/202607163731

随着产业升级与中国制造向“中国智造”的转型, 国家对兼具精湛技艺与优良品德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的需求日益迫切。中职教育作为人才培养的起点, 中职学生正处于人生的“拔节孕穗期”和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期, 多渠道融入思政教育, 实现教学设计内容与思政教育的有效融合, 会帮助学生在潜移默化中实现自我价值和社会价值的统一^[1], 其专业课教学肩负着知识传授、能力培养与价值引领的三重使命。然而, 经过文献检索研究, 专业课程思政内容缺乏系统性, 在单片机应用技术这门专业课程的教学过程中, 未形成系统性的思政教学设计模块^[2]。针对中职阶段《单片机技术与应用》课程的课程思政研究与实践较少, 而现有研究在思政元素挖掘上存在视角趋同现象, 多集中于技术突围层面, 对工程伦理、职业规范等深层价值维度关注不足^[3]。在《单片机技术与应用》课程教学中, 基于“理虚实”一体化项目教学的思政融入系统路径, 实现单片机知识技能掌握与价值引领的有机统一, 为《单片机技术与应用》课程思政建设提供针对性的实践参考。

一、中职《单片机技术与应用》课程“理虚实”一体化教学的“三维”思政融入载体

理虚实一体化教学是职业教育中理实一体化教学深入发展的一种新的教育模式, 指在课堂教学中, 将理论教育与实践教学相结合, 虚拟仿真与实践操作相结合, 虚拟资源与现实资源相结合^[4]。“理虚实”一体化项目教学, 并非理论、仿真、实践三环节的简单叠加, 而是构建了一个层次分明、循环促进的学习生态系统, 这为课程思政的立体化融入提供了天然的三维载体。

(一) “理”之维, 理论教学载体

在讲解单片机原理、电路设计、编程思想等理论知识时, 可自然融入科学精神、工程哲学与科技伦理的启蒙。例如, 讲解芯片内部结构时, 引入我国集成电路产业攻坚克难的故事, 如华为海思麒麟芯片的自主研发历程, 激发学生投身核心科技的责任感, 培育科技自立自强的信念。

(二) “虚”之维, 虚拟仿真载体

利用 Proteus 等仿真软件搭建虚拟项目环境, 允许学生在“试错”成本极低的情况下, 反复设计与调试。此环节是培养严谨细致、系统思维和规范意识的绝佳时机。教师可设置包含伦理选择的情境任务, 如仿真中要求优

作者简介:王高生(1990—), 男, 学士, 研究方向为中职教育与教学;

通讯作者:秦诗雨

先处理应急信号，引导学生思考技术设计中的价值排序。例如，可引入智能交通系统因软件时序错误导致多路口信号冲突的真实案例，组织学生在仿真中复现并修复该问题，强化“代码即责任”的意识。

（三）“实”之维，实践操作载体

在实物焊接、组装、调试的真实过程中，学生的操作行为直接受其职业态度影响。这是锤炼工匠精神、质量意识、安全规范和团队协作能力的核心场域。一个焊点的质量、一份调试记录的完整性，都是思政教育的生动教材。例如，引入“大国工匠”李万君的故事，讲述他在高铁转向架焊接中追求“零缺陷”的事迹，鼓励学生在焊接单片机电路时做到“一次做对、次次做精”。

二、中职《单片机技术与应用》课程“理虚实”一体化教学的“三段闭环”思政融入路径

中职学校专业课“课程思政”的建设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随着课程思政理念的不断落实，立德树人的思想政治教育目标将贯穿教育的整个过程^[5]。为确保思政教育贯穿教学始终并落到实处，设计了“三段闭环”融入路径，如图1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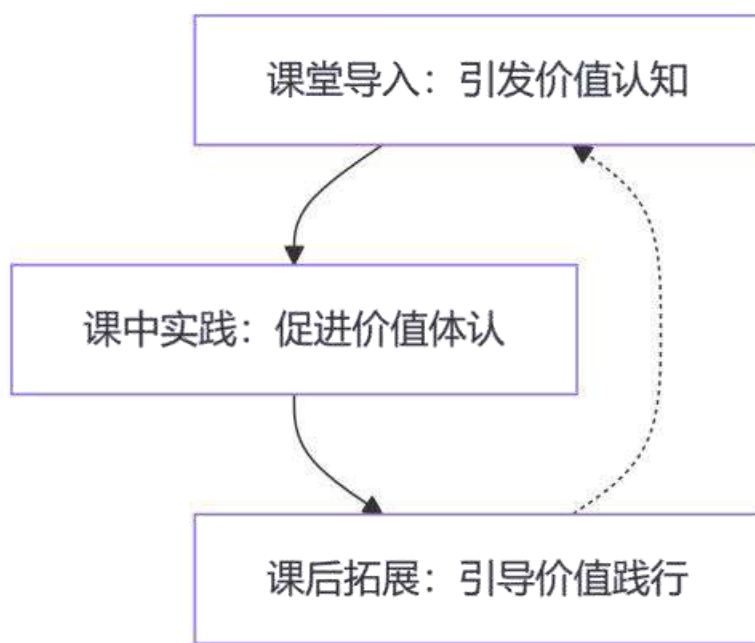


图1 “三段闭环”思政融入路径图

（一）课堂导入阶段：情境创设，引发价值认知

在项目启动时，通过精选案例、故事讲述、视频展示、问题链导学等方式，创设蕴含思政元素的学习情境。目标是将抽象的价值观转化为与学生即将开展的技术活动相关的具体问题，激发其探究兴趣与情感共鸣。例如，在“火箭发射倒计时器”项目导入时，讲述中国航天发射“零窗口”背后精准协同的故事，将“航天精神”与“精准计时”的技术要求建立连接，结合长征五号遥八发射任务中时序控制精度达毫秒级的真实数据，使学生在情感上认同严谨、协同的价值。

（二）课中实践阶段：任务驱动，促进价值体认

这是价值内化的关键环节。学生在完成“理—虚—实”的递进任务过程中，亲身体验价值观在解决技术问题时的指导作用。教师在关键节点设置反思性问题，引导学生将技术操作背后的价值选择显性化。例如，在“汽车转向灯”项目调试中，强调按键消抖程序对行车安全的重要性，并组织讨论“一个不起眼的程序漏洞可能引发什么后果”，使“安全责任”从外部要求内化为学生的自觉意识。

（三）课后拓展阶段：迁移应用，引导价值践行

项目基本完成后，设计开放性、综合性的拓展任务或社会性议题讨论，鼓励学生将习得的技能与价值观应用

于更广阔的领域，实现从“知道”到“做到”的跨越。例如，完成“数字钟”项目后，引导学生为校园设计“智能作息提示系统”，融入时间管理与集体纪律意识；学完“电子温度计”后，组织讨论温度监测技术在智慧农业、疫情防控中的社会价值，强化科技服务社会的使命感。

三、中职《单片机技术与应用》课程“理虚实”一体化教学的项目群与思政映射矩阵设计

基于单片机技术应用的典型场景，研究设计了涵盖基础、进阶、综合三个层次的 12 个教学项目，并构建了“项目－思政”映射矩阵（见表 1），确保思政教育不断线、有层次、成体系。

表 1：中职《单片机技术与应用》课程“理虚实”一体化教学“项目－思政”映射矩阵

层次	项目名称	思政环节	思政形式	思政内容	核心思政元素	思政目标
基础	单片机最小系统	课堂导入	案例分析	介绍中国芯片自主化进程中的“天府工匠”故事，强调集成电路的重要性	工匠精神、科技报国、严谨细致	树立科技报国信念，培养严谨细致的基础工程态度
	花样车尾灯	课堂导入	视频展示+讨论	播放国产红旗轿车车尾灯设计视频，讨论“中国制造”与工匠创新	创新意识、审美追求、民族自豪感	激发民族自豪感，培养创新意识和审美追求
	汽车转向灯	课中实践	情景模拟+反思	模拟汽车安全场景，强调转向灯的可靠性与责任意识	安全责任、工程伦理、职业操守	培养安全第一的工程伦理和职业责任感
	火箭发射倒计时器	课堂导入	故事讲述	讲述中国航天发射倒计时系统的精准性与航天精神	航天精神、系统思维、精准意识	弘扬航天精神，培养时间观念与系统思维
	运动秒表	课中实践	竞赛体验+反思	组织“计时精度比拼”，强调精准测量的重要性	工匠精神、精益求精、竞争意识	培养精益求精、追求极致的工匠精神
进阶	数字钟	课后拓展	项目延伸	引导学生设计“校园作息钟”，融入时间管理与纪律意识	纪律意识、时间观念、社会责任	增强纪律意识与社会责任
	门铃	课堂导入	情景对话	讨论“门铃礼仪”与和谐社会的关系	文明礼仪、社会和谐、人文关怀	培养文明礼仪与社会和谐意识
	音乐盒	课中实践	文化融入	播放《我和我的祖国》等曲目，讲述音乐与情感表达	文化自信、情感表达、美育浸润	增强文化自信与情感表达能力
	电子琴	课堂导入	互动体验	体验“自制乐器”，强调动手创造与艺术结合	创新思维、艺术修养、动手创造	培养创新思维与艺术修养
综合	电子温度计	课中实践	社会联系	讨论温度监测在疫情防控中的应用	科技为民、服务社会、实证精神	培养科技服务社会的意识
	交通灯	课堂导入	案例分析	分析智能交通系统与城市治理的关系	规则意识、社会责任、系统治理	增强规则意识与责任感
	出租车计价器	课后拓展	伦理讨论	讨论“计价诚信”与职业道德	诚信经营、职业道德、公平正义	培养诚信经营、公平公正的职业操守

四、中职《单片机技术与应用》课程“理虚实”一体化教学的思政融入实践课例

以“交通灯控制系统”项目为例，系统设计思政环节及元素，开展“理虚实”一体化教学，育人成效显著提

升。

（一）项目概述与思政目标锚定

“交通灯控制系统”要求学生设计并实现一个具备倒计时显示、状态自动切换、紧急干预等功能的十字路口交通灯模型。该项目技术综合性强，涉及定时器、中断等核心知识。我们锚定的核心思政目标是：深化对技术规则与社会规则内在统一性的理解，培育保障公共安全的强烈责任感，以及基于系统思维解决复杂工程问题的能力。

（二）思政融入路径的具体实施

1. 课堂导入，价值认知

播放一段因交通灯故障导致路口混乱的模拟视频，引出核心问题：“一个可靠的交通灯系统，技术上的‘正确’与社会意义上的‘安全’如何统一？”随后，介绍我国智能交通系统的发展成就，将项目任务置于“智慧城市”建设的大背景下，激发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学习使命感。

2. 课中实践，价值体认

理论、虚拟仿真阶段，在讲解状态机设计时，不仅分析红、绿、黄灯的逻辑切换，更引导学生讨论“全红缓冲期”设置的安全意义。在 Proteus 仿真中，故意设置一个时序竞争漏洞，让学生观察其导致的“绿冲突”现象，深刻理解代码严谨性关乎生命安全。实践操作阶段，在实物调试环节，引入“特种车辆优先通行”的拓展要求。学生需要设计外部中断响应机制。教师在此组织小组讨论：“在单 CPU 的情况下，如何平衡常规通行效率与应急响应速度？这体现了怎样的工程伦理价值排序？”通过技术决策中的伦理思辨，使“生命至上”的价值观深入人心。

3. 课后拓展，价值践行

项目验收后，发布拓展课题：“如何为校园或社区的一个非标准路口，如 T 型、Y 型路口，设计更合理的灯控方案？”鼓励学生进行实地调研、数据采集，运用所学知识提出优化建议，并以报告或提案形式展示。此活动将技术学习从实验室延伸到真实社会场景，强化了学生运用技术参与社会改进的公民意识。

（三）教学反思与成效

通过该项目教学，学生普遍表现出更高的调试耐心和对细节的关注。项目报告中，超过 80% 的学生能主动分析自己设计中的安全考量。在拓展课题中，涌现出多个考虑行人过街、车流量时段调整的创新方案。这表明，系统化的思政融入路径不仅未干扰技术学习，反而通过赋予技术活动以深刻的社会意义，提升了学生的学习深度与内在动力。

五、实施成效与改进方向

（一）综合育人成效

经过教学实践，该模式的成效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学生职业素养显著提升，在技能大赛及企业实习中展现出更强的规范意识、质量观念和协作精神；二是学习动机与认同感增强，学生对专业价值的理解从“学会一门技术”向“担当一份社会责任”转变；三是教师课程育人能力得到发展，专业课教师主动挖掘思政元素、设计育人环节的意识 and 能力明显提高。

（二）面临的挑战与改进方向

实践中也面临挑战：其一，思政评价的精准量化难，需进一步探索将行为观察、反思日志、项目答辩等过程性评价进行科学整合的方式；其二，校企协同育人中的思政资源有待深化，需邀请企业工程师更多参与讲述产业真实伦理案例；其三，教师跨学科思政设计能力需持续培训。

（三）未来展望

未来，本探索可向两个方向深化，一是构建数字化思政资源库，利用 AR、VR 技术开发沉浸式思政情境仿真项目；二是推动“岗课赛证”与“思政”融通，在职业技能等级标准、比赛赛题中明确融入职业道德与规范要求，形成育人合力。

六、结语

课程思政与学科教学的深度融合正成为中国教育转型的重要推手与引擎^[6]，课程思政不是简单的“课程+思政”，而是要在专业教学中实现价值引领的“化学反应”。《单片机技术与应用》课程通过“理虚实”一体化教

学的系统设计与实践,实现了知识传授、能力培养与价值塑造的深度融合,为中职电子信息类专业课程思政建设提供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智慧。

参考文献:

- [1]李敏,李振良.课程思政视角下中职学生理工科专业教学方法研究——以单片机技术与应用课程建设为例[J].中国教育技术装备,2022,(18):61-63+70.
- [2]李媛媛.中职专业课程思政的教学改革与实践探索[J].职业,2024,(04):23-25.
- [3]张佳音.中职《单片机技术及应用》课程思政元素的挖掘及实践探索[D].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2025.
- [4]春艳.单片机应用技术理虚实一体化教学模式研究与实践 [J]. 现代职业教育, 2018, (06): 19.
- [5]朱轶轶.在中职“客房服务与管理”教学中进行思政教育的思考与实践 [J]. 文科爱好者(教育教学), 2022, (01): 13-15+24.
- [6]乔丹洋.构筑思政桥梁:高中英语读写教学创新路径研究——以外研版选择性必修二第四单元 My 100 Days with MSF 为例 [J]. 文科爱好者, 2025, (04): 73-75.

Practical Exploration of Curriculum Ideology and Politics in Secondary

Vocational "Microcontroller Technology and Application"

Wang Gaosheng, Qin Shiyu

(Jintang County Vocational Senior High School of Sichuan Province)

Abstract: Guided by the fundamental task of fostering virtue and cultivating talents, deepening the construc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professional courses has become an inevitable requirement for the reform of secondary vocational education. Focusing on the course "Microcontroller Technology and Application," and addressing the challenge of the disconnect ("two skins") between ideological elements and professional skill teaching, this study organically embeds value shaping into the entire three-stage progressive teaching process of "theoretical cognition, virtual simulation, and practical operation." Through a closed-loop design of "triggering value cognition through classroom introduction, promoting value identification through in-class practice, and guiding value practice through after-class expansion," it achieves the imperceptible penetration and deep internaliz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Practice shows that this path effectively stimulates students' sentiments of serving the country through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raftsman spirit, and sense of social responsibility, significantly improving comprehensive vocational literacy, and providing a reference model for the reform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similar engineering professional courses.

Keywords: Curriculum Ideology and Politics; "Microcontroller Technology and Application"; Secondary Vocational Teaching Reform

人工智能赋能高校教师教学发展的路径研究

查婷婷, 白连汝

(淮北理工学院, 安徽 淮北 235000)

摘要: 以 deep seek、ChatGPT 等为代表的人工智能正在不断地融入高校教学中。人工智能赋能高校教师教学发展是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必然趋势,也是推动教师队伍高质量建设、提升人才培养质量的核心路径。然而,在赋能的过程中也凸显了应用适配不足、角色认知模糊及伦理风险等问题。人工智能与教师专业发展的深度融合应从智能素养培养、教学框架构建、制度保障完善等多维发力,更好地促进高校教学发展。

关键词: 人工智能; 高校教学; 教师发展

基金项目: 淮北理工学院校级科研项目: 人工智能赋能学前师范生数字素养提升的实践研究——以淮北理工学院为例 (2025SK008)

DOI: doi.org/10.70693/202607216359

一、引言

近年以来,以 deep seek、ChatGPT 等为代表的语言大模型、多模态交互系统与智能教学体技术快速迭代,人工智能技术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融入教育领域,推动全球教育生态发生转变。《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提出“以教育数字化开辟发展新赛道、塑造发展新优势”“促进人工智能助力教育变革”“建立协同服务的数字教育体系”^[1]。2024年,教育部启动了“人工智能赋能教育行动”,旨在通过人工智能技术创新驱动教育体系的全方位变革^[2]。2026年4月,教育部等五部门进一步联合印发《“人工智能+教育”行动计划》,提出推动智能技术与教育全要素融合、全过程贯通、全场景覆盖,加快构建人机协同、虚实结合、泛在可及的智慧教育新形态^[3]。在国家政策的有力推动下,各高校积极探索人工智能赋能教学创新的实践路径,人工智能加教育正成为高校教学的常态。

二、人工智能赋能高校教师教学发展的现实困境

人工智能正凭借大数据分析、智能生成、精准诊断、动态评估等优势,打破传统高校教师教学发展的时空限制与模式壁垒,成为驱动高等教育教学改革、激活教师发展内生动力的核心动能。教育部2024年认证了50个“AI+高等教育”标杆案例,通过人工智能技术与教学全流程的深度融合,构建了“教、学、管、评、研”一体化的智慧教育新生态。在国家政策的有力推动下,各高校积极探索人工智能赋能教学创新的实践路径。如北京大学“北大问学”平台,通过教材知识驱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助教系统,实现“教材—习题—答疑”的认知闭环,人工智能助教能依据教材上下文提供学科精准解答,数学工具 MathCopilot 解题准确率达92%^[4]。然而,技术赋能的广度拓展并不意味着育人实效的深度实现。当前,人工智能赋能高校教学仍面临诸多现实问题。

(一) 技术应用浅层化,工具赋能流于形式

人工智能赋能教育已普遍成为当前高校的共识性选择,不少高校都投入大量资源搭建智慧教学平台、引入人工智能教学工具,用技术赋能教学。但很多时候对技术的应用仅停留在形式层面,未能真正渗透到教学设计、能力培养等核心教学环节中。部分教师只是将人工智能作为线下教学的“电子替代品”,用智能题库代替纸质习题,用AI智能批改减轻教师的工作量,将人工智能用于课件制作、文案优化、资源检索等基础工作,未能将AI深度融入教学设计、课堂互动、教学诊断、课后改进、教学研究等核心环节。导致部分高校管理者与教师陷入“技术

作者简介: 查婷婷(2000—),女,硕士,教师教育与教师专业发展研究;

白连汝(1998—),女,硕士,教师教育与教师专业发展研究。

至上”的认知误区,形成“为用 AI 而用 AI”的错误理念,将人工智能赋能教学发展简单等同于用 AI 备课工具,把技术覆盖率、工具使用频次作为衡量教学创新成效的核心指标。没有借助人工智能技术真正重构教学流程、优化教学逻辑,也未能发挥技术对学生个性化成长的支持作用,导致工具赋能停留在表面,难以转化为实际的育人质量提升。

(二) 发展模式同质化,精准赋能体系缺失

当前国内多数高校推进人工智能赋能教师教学发展的过程中普遍存在“一刀切”的同质化建设倾向问题,未结合不同学科属性、不同课程类型、不同教师群体的差异化需求搭建分层分类的精准赋能体系。有研究指出,当前高校 AI 通识课程及教师培训普遍面临“体系同质化、适配性不足、技术融合浅”等问题^[5]。大多数高校的人工智能赋能教学发展采用“全员统一培训、统一资源推送、统一考核标准”的模式,导致赋能对象模糊,忽视了教师群体的差异化成长需求。比如文科教师和理科教师对于课程的建设是有所不同的,这种统一化的培训没有精准给予教师需求。而且当前多数高校的人工智能教学赋能仅集中在“工具入门培训”这一个单一环节,没有搭建覆盖课前教学设计、课中动态调整、课后反思迭代、教学成果沉淀的完整支持体系。如在《学前儿童社会教育》的授课过程,教师课前需要大量本土化的幼儿园一线教学素材支撑活动设计,课中需要实时捕捉师范生的模拟教学表现并给出针对性反馈,课后需要对整节课的教学效果做深度复盘反思,但当前的人工智能赋能体系完全没有对应环节的支持,导致人工智能赋能只能停留在“用大模型写教案”的浅层次,无法真正推动教师教学能力的内生性、持续性成长。

除此之外,当前绝大多数高校的人工智能教学赋能体系基本上围绕理工科类的理论课、实验课搭建,针对人文社科类课程较少^[6]。可见课程适配性的培训赋能缺位,通用 AI 能力与专业教学场景脱节。拿笔者所带的《学前儿童社会教育》这门课程来说,该课程的核心教学目标是培养师范生根据学前儿童的社会性发展规律设计活动、观察解读幼儿社会性行为、开展家园社协同育人的专业能力。因此,所需要的人工智能赋能需求应当是“AI 辅助生成本土化幼儿社会教育案例、AI 模拟不同年龄段幼儿的社会性行为反应、AI 生成幼儿社会性观察记录模板”等高度贴合专业场景的功能。但当前高校提供的智慧教学平台,仅能支持课件生成、作业批改这类基础通用功能,无法覆盖这类专业专属需求。不少教师只能自行借助市面上的通用大模型进行尝试适配,却会出现生成的案例不符合《3-6 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要求、价值导向存在偏差等问题,不仅没有实现赋能效果,反而额外增加了教师的内容审核负担。

(三) 人机协同认知错位,教师角色转型滞后

在人工智能深度融入高校教学的背景下,人机协同认知错位、教师角色转型滞后已成为制约人工智能赋能教学发展的障碍。有研究指出,当前高校教师在人机协作过程中普遍面临“认知模糊与方向困惑”“能力储备与素养结构的不足”等^[7],也有学者发现,人机协同教学存在“过度依赖机器智能”的突出问题,表现为学校看重机器智能本身而忽视人机协同性,导致教学过程碎片化^[8]。在此基础上,呈现出部分教师过度依赖人工智能,将教学设计、课堂答疑、教学评价等核心工作全部交由 AI 完成,弱化自身育人主体地位,对“AI 能做什么、该做什么、不能做什么”的边界认知普遍模糊。另一部分教师则陷入“技术无用论”的认知误区,将 AI 完全视为教学的“外来入侵者”,彻底否定其在降低事务性工作负担、拓展课程资源边界上的辅助作用,坚决拒绝任何 AI 工具进入课堂,始终固守“教师单中心”的传统教学模式,完全错失了借助技术破解课程资源不足、学情分析滞后等传统痛点的改革机遇。究其原因,产生上述问题的偏差在于教师对于角色定位的不清晰。多数高校尚未明确智能时代教师角色定位,教师“被赋予来自社会各界的诸多期待,而角色期待的多样性与复杂性常常导致教师出现角色模糊等危机”。由于缺乏清晰的转型方向与支撑体系,教师难以实现从“知识传授者”向“学习组织者、价值引领者、创新引导者”的角色跃迁。其后果是技术应用与教学育人脱节、工具赋能与能力提升脱节,最终破坏了“AI 增智、教师育人”协同生态的内在平衡。

(四) 保障机制不健全,长效发展动力不足

人工智能赋能高校教师教学发展的长效落地,离不开完善的制度保障体系。但当前多数高校的相关保障机制仍处于碎片化、临时化的状态。多数高校未出台 AI 赋能教师教学发展的专项制度,缺乏明确的实施标准、考核机制与激励政策,教师参与智能教学创新、AI 教学能力提升的主动性不足,导致 AI 教学创新难以持续推进,教师的长效发展动力严重不足。

同时当前高校针对人工智能赋能教学的评价,普遍采用“统一量化指标”的同质化考核方式,以学生评教、听课打分或者以教师的 AI 工具使用时长、生成资源数量为评价标准,未纳入智能教学应用、教学创新成效、个性化育人成果等核心指标,无法全面衡量教师智能化教学发展水平。

（五）数据安全与伦理风险防控机制的系统性缺位

人工智能技术在高校教学场景的应用，意味着教师教学过程、学生学习行为等大量数据会被持续采集、存储与分析，这也就引申出了一个新的问题——数据安全。而当前多数高校尚未建立数据安全规范，也未出台明确的 AI 教学应用伦理准则。一方面，部分商用人工智能教学工具存在过度收集师生隐私数据的风险，而高校缺少统一的数据合规审核与动态监管机制，无法有效防控数据泄露、滥用等安全问题；另一方面，针对 AI 生成教学内容的版权归属、智能算法可能存在的偏见偏差、过度依赖 AI 导致教师教学自主性弱化等伦理问题，多数高校也缺乏对应的监管规范与引导机制，既无法为教师合理合规应用人工智能提供明确指引，也难以有效防范潜在的伦理风险，阻碍了人工智能赋能教师教学发展的健康推进。

三、人工智能赋能高校教师教学发展的实践路径

人工智能赋能高校教师教学发展，不是简单的技术工具的叠加，而是一场多方面多维度的变革。当前，各高校围绕人工智能赋能教师教学发展进行了多维度、多层次的实践探索，逐步形成了从理念引领到能力提升、从场景落地到生态保障的实践路径体系。

（一）培育教师智能教育素养，重塑教学发展目标

人工智能赋能教师教学发展的最重要的一点在于观念的更新。有学者指出，人工智能为教师专业发展带来了三大新机遇：一是构建智慧教育环境，为教师的自适应学习奠定基础；二是推动智能研修，促进教师群体的协同发展；三是实施全景式管理与评价，为科学决策提供数据支撑^[9]。然而，要将这些机遇转化为实效，教师必须具备相应的智能教育素养。^[9]当前，人工智能正深刻重塑高等教育的生态，并重新定义教育数字化的内涵，基于 AI 应用的数字素养已成为高校教师不可或缺的核心职业能力。面对数智化教育的新常态，教师需以“人机对话”能力为核心，确立积极理性的数字化意识。这意味着，教师发展的目标必须从单纯的“技术工具操作”进阶为“智能教育素养培育”，不仅要“会用”AI，更要“慧用”AI 赋能教学。

（二）嵌入教学全流程，构建人机协同的教学新生态

人工智能赋能教师发展的关键在于深入教学实践，以《学前儿童社会教育》课程为例，人工智能赋能教学不能是简单的教案撰写，而是对教学机制深层的探索。人工智能赋能贯通该课程的课前、课中、课后各环节，形成覆盖“学情诊断—课堂互动—评价反馈”的全流程赋能闭环。课前，教师借助智能备课平台，输入本周主题，如“分享与合作”，人工智能即时生成涵盖不同文化背景的绘本推荐、游戏案例及视频素材，丰富教学资源储备。更重要的是，智慧学情分析工具可扫描学生对儿童社会性发展理论的预习数据，精准定位其对“亲社会行为”“攻击性行为”等核心概念的认知盲区。人工智能辅助学情分析与精准诊断，帮助教师准确把握学生的学习起点与需求差异。课中，人工智能不再是被动的演示工具，而是化身“模拟助教”，构建“教师—AI 智能体—学生”三者互动的教学新生态。以“同伴冲突解决策略”教学为例，教师负责价值引领与情感示范，把握教学方向，人工智能基于大语言模型模拟真实幼儿冲突对话场景，生成不同性格、不同年龄段幼儿的反应模式，供学生分组演练与即时辩论，有效激发学生参与度。人工智能同步实时捕捉课堂互动数据，辅助教师快速识别学生在案例分析中的情感倾向与逻辑漏洞。课后环节的人工智能赋能集中体现在评价机制的重塑上。教师利用智能评阅系统对学生作业进行评估，如“幼儿园社会领域活动教案”这个作业，人工智能可以从目标设定、环节匹配度、活动材料适宜性等维度提供基础修改建议，教师则聚焦教案的教育适宜性、文化敏感性及创意创新进行人工复核。人工智能评价工具的介入并非替代教师专业判断，而是将教师从重复性、标准化评价劳动中解放出来。此外，人工智能能够生成学生个人的学习情况，支持学生开展循证反思，明确自身在观察幼儿社会行为时的具体不足并持续改进。这种“全流程嵌入、多场景覆盖”的实践路径，使人工智能不再游离于教学之外，而是真正成为教师教学发展的有机组成部分。

（三）完善制度支撑与伦理边界，护航教师可持续发展

人工智能赋能教师教学发展的可持续推进，离不开制度保障与伦理规范的支撑。以《学前儿童社会教育》课程为例，当前人工智能在该课程中的赋能尝试多为教师个体的自发性探索，尚未上升为院系层面的系统规划。部分教师因不熟悉人工智能提示词设计策略，生成的幼儿社会性行为模拟案例往往偏离《3-6 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的目标要求；另一些教师则陷入盲目依赖，将幼儿行为观察分析的诊断权完全交由人工智能判断，忽视了学前教育特有的情感温度与人文关怀。这些困境表明，单纯的技术无法落地生根，必须从制度层面建立覆盖职前培训、在岗研修、成果转化的闭环保障体系，为教师提供分阶段的人工智能素养提升路径，同时为其保留充分的课

程自主设计与专业判断空间。在使用人工智能的时候还要考虑其伦理性。人工智能赋能教师发展必须坚守“育人为本”的基本立场,人工智能与教育融合发展背景下,教师正从技术应用的旁观者转变为深度参与的行动者,但算法逻辑与育人目标的内在冲突不容忽视。高校教师应守好人工智能应用边界,拥抱智能不等于盲从技术,高效赋能不等于无度滥用。因此,人工智能在课堂中的角色应严格界定为“辅助工具”与“模拟对象”,承担标准化对话演练、教学资源初步筛查等机械性任务,涉及价值判断、情感回应、教育适宜性裁定等核心环节,必须由教师亲自把关。例如,人工智能生成的“同伴冲突解决”对话脚本,教师需要逐一审核其是否传递了尊重、共情、公平等核心价值观,而不是全盘接纳。走好人机协同时代的专业成长之路,既需要教师坚守育人初心、科学运用智能技术,也需要学校和教育管理部门协同发力,不断完善智能教育配套保障,搭建有效的教师智能素养培训体系。

四、结语

人工智能赋能高校教师教学发展是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必然趋势,也是推动教师队伍高质量建设、提升人才培养质量的核心路径。然而,技术在推动教育改革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应用适配不足、角色认知模糊及伦理风险等问题。人工智能与教师专业发展的深度融合应从智能素养培养、教学框架构建、制度保障完善等多维发力,坚守育人为本的基本立场,厘清人机协同的合理边界,才能在赋能教学创新的同时有效规避潜在风险。

参考文献:

- [1] 袁振国.教育数字化转型:转什么,怎么转[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23,41(3):1-11.
- [2] 张立群.人工智能赋能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的中国范式构建[J].中国高等教育,2024,(24):9-13.
- [3]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等五部门关于印发《“人工智能+教育”行动计划》的通知[EB/OL] (2026-04-08) [2026-7-17].http://www.moe.gov.cn/srcsite/A16/s3342/202604/t20260410_1433240.html?use_xbridge3=true&loader_name=forest&need_sec_link=1&sec_link_scene=im&theme=light.
- [4] 刘维凡.人工智能驱动高校教学变革的理性审思——基于技术赋能与教育本质的双重视角[J].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6,49(2):96-104.
- [5] 冷秀娟,邢军,王晓莉,等.数智赋能背景下人工智能通识课程建设与实践:——《人工智能概论》为例[N].农业科技报,2025-12-03(005).
- [6] 高星.生成式人工智能赋能地方财经院校金融学课程的教学改革研究[J].文教资料,2026,(5):177-180.
- [7] 张剑,姜语.范式转型与角色调适:人工智能时代高校思政课教师发展研究[J].齐鲁师范学院学报,2026,41(1):33-40.
- [8] 戴丽敏,孔苏.“生命·实践”教育学视域下人机协同教学的三重难题与纾解路径[J].中国电化教育,2025,(5):109-116.
- [9] 张雪凌,龙宝新.人工智能赋能教师专业发展:机遇、挑战与路径[J].教育理论与实践,2025,45(8):27-32.

Research on the Path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Empowering the Teaching

Development of College Teachers

Zha Tingting, Bai Lianru

(Huaibei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Huaibei, Anhui, China)

Abstract: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represented by deep seek, ChatGPT, and others, is continuously being integrated into university teaching. The empowerment of university teachers' teaching development by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s an inevitable trend in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and it is also a core path for promoting high-quality construction of the teaching staff and enhancing the quality of talent cultivation. However, in the process of empowerment, issues such as insufficient application adaptation, vague role cognition, and ethical risks have also become prominent. The deep integration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teachers'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should be promoted from multiple dimensions, such as intelligent literacy cultivation, teaching framework construction, and institutional guarantee improvement, to better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university teaching.

Keyword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Higher education teaching; teacher development

数字化背景下民办高校青年教师教学能力提升路径探析

白连汝, 查婷婷

(淮北理工学院, 安徽 淮北 235000)

摘要: 数字化转型背景下, 提升民办高校青年教师教学能力势在必行。本文分析了民办高校青年教师的理念、素养、创新及评价方面存在的滞后与不足, 指出其原因在于内生动力缺乏、培训针对性不强、激励机制滞后及环境受限。对此, 提出更新理念、分层培训、搭建平台、健全教研、优化激励及强化自我赋能等策略, 旨在通过内外联动破解青年教师教学能力不足的现实困境, 打造高素质教师队伍。

关键词: 数字化; 民办高校; 青年教师; 教学能力; 提升路径

基金项目: 安徽省人文社科项目: 马克思人学视域下卓越幼师成长路径研究 (2024AH053172)

DOI: doi.org/10.70693/202607211924

一、引言

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高速发展、广泛落地, 已然成为驱动高等教育变革的核心动力。数字化发展不仅颠覆了传统知识获取与传播的固有方式, 也对高校教育教学模式、授课方法和育人生态带来了深层次、全方位的重塑。基于此, 高校需要主动适配教育领域的数字化变革, 把数字技术用好, 让它成为解决实际教学难题、推动教学改革和创新的有力工具。

民办高校肩负着培育多元化应用型人才、助推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职责, 是我国高等教育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主体。如今, 青年教师已然成为民办高校师资队伍的核心主力, 是推进教育强国建设的关键力量。但在教育数字化全面转型的大环境下, 不少民办高校青年教师在教学理念更新、数字技术应用、课堂教学实操等方面, 暴露出诸多短板与现实挑战。因此, 如何在数字化背景下有效提升民办高校青年教师的教学能力, 已成为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

二、数字化时代民办高校青年教师教学能力提升的重要性

(一) 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必然要求

立德树人是教育的根本任务。进入数字化时代, 网络信息内容繁杂、各类社会思潮交织碰撞, 很容易对学生的价值认知与思想观念造成潜移默化的影响。民办高校青年教师与学生年龄差距小、沟通互动更为密切, 在课程思政融入日常教学的过程中, 具备天然优势, 是开展课程思政的重要力量。对青年教师而言, 教学能力的提升, 不只是精进讲授技巧, 更是提升自身利用数字技术讲好中国故事、弘扬主旋律的能力。借助数字化教学资源与技术手段深度挖掘课程蕴含的思政内核, 将价值引领潜移默化融入专业知识教学全过程, 可以切实增强课堂育人的感染力与实效性, 真正落地立德树人的核心教育使命。

(二) 适配学生数字化学习需求的现实需要

目前在校学生被称为“数字原住民”, 他们的成长过程伴随着互联网、智能手机, 习惯了通过短视频、在

作者简介: 白连汝 (1998—), 女, 硕士, 助教, 研究方向为教师教育与教师专业发展研究;

查婷婷 (2000—), 女, 硕士, 助教, 研究方向为教师教育与教师专业发展研究。

线课程等数字化方式获取知识,对教学的互动性、体验性要求更高。如果青年教师固守传统的讲授式教学,不仅难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还容易引发学生的厌学情绪。通过数字化方式提升青年教师的能力,如引入翻转课堂、丰富教学手段和方法,利用数字技术分析学情,制定个性化学习方式,能够有效适应新时代大学生学习需求、提升课堂教学满意度。^[1]

(三) 保障民办高校人才培养质量的关键所在

民办高校大多以培养应用型人才为目标,产教融合是其人才培养的必然要求。实践教学师资队伍建设,特别是青年教师的实践教学能力提升是决定人才培养质量的关键性因素。在数字化时代,产业对人才的需求正在发生深刻变化,数字素养已成为各类人才的核心素养之一。如果教师自身的教学能力无法适应数字化转型的要求,就难以培养出符合时代需求的高素质人才。青年教师教学能力的发展对民办高校人才培养质量、师资队伍建设及可持续发展有重要影响。^[2]

(四) 促进民办高校可持续发展的内在动力

当前,民办高校在师资队伍治理中依然存在着教师社会认可度低、人员流动性大、培训机制不健全等问题。青年教师规模越来越大,已成为民办高校教师团队的主体力量。通过提升青年教师的教学能力,打造一支师德高尚、业务精湛、充满活力的高素质专业化青年教师队伍,能够提升民办高校核心竞争力、实现可持续发展。

(五) 促进青年教师职业发展的核心路径

数字化转型为青年教师提供了更多的职业发展通道,掌握数字化教学能力的青年教师可以参与在线开放课程建设等工作,获得更多教学成果申报、教学竞赛获奖的机会,通过在线资源学习与交流,提升教学能力。^[3]提升数字化教学能力已经成为青年教师职业发展的刚需,这与新时代高校青年教师专业发展的逻辑完全契合。

三、数字时代民办高校青年教师教学能力现存的问题

(一) 教学理念滞后,数字化教学意识淡薄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部分青年教师对数字化教学认识仅停留在工具层面。一方面,缺乏融合理念,将数字化简单等同于“PPT+视频”,仅做形式上的“黑板搬家”,教学仍沿用“满堂灌”,“穿新鞋走老路”的现象普遍。另一方面,存在畏难情绪,不愿尝试混合式教学,视数字化为额外负担,主观能动性不足。此外,少数教师重科研轻教学、重形式轻实效,将数字化教学视为任务式工作,青年教师将更多精力投入到论文发表、项目申报中,对教学模式创新、数字化能力提升的主动性不足,没有完成从“知识讲授者”到“学习引导者”的角色转变,这与教师专业能力结构重塑的要求存在明显差距。^[4]

(二) 数字素养欠缺,技术应用能力不足

根据《教师数字素养》标准,教师应具备数字获取、制作、使用、交互等能力。^[5]虽然大部分教师能够使用基本的办公软件和多媒体设备,但在利用大数据分析学生学习困难、利用虚拟仿真技术解决教学重难点、利用智能教学平台进行过程性评价等方面能力明显不足。例如,在面对复杂的专业课程时,如何利用数字化工具设计交互性强、参与度高的教学活动,许多教师显得捉襟见肘。除此之外,多数青年教师自主开发数字化教学资源水平有限,难以独立制作适配专业课程的微课及数字化配套教材,日常备课大多直接照搬网络现成素材,很难结合本校学生基础、学习特点调整内容,教学内容和自身授课对象的实际学情出现明显脱节。

(三) 教学创新能力薄弱,课程建设同质化

数字化时代虽然为高校青年教师提供了创新机遇,但其教学创新能力普遍不足。一是教学设计固化。多数青年教师仍然沿用传统框架,没有基于数据的个性化设计与分层教学,很难精准施教。二是课程资源同质化。部分青年教师缺乏资源整合开发能力,直接套用网络通用素材,没有结合本校情况打造特色资源,针对性与实用性都不强。三是教学模式单一。多数青年教师混合式教学流于表面,缺乏对学生的过程性考核,线上线下融合不够。

四是互动深度不足。工具应用停留在浅层刺激,缺乏引发深度思考的探究设计,师生情感交流受阻,难以构建良好的师生关系。

(四) 数字化教学评价体系不完善,导向性不足

传统教学评价模式过于固化,长期以期末笔试成绩作为评判学生学习效果的唯一标准,存在明显的片面性。进入数字化教学阶段后,各类智慧教学平台能够全程留存学生学习轨迹、练习反馈、课堂互动等丰富的过程性数据,但多数青年教师缺乏对应的数据分析与应用能力,使得海量教学数据长期处于闲置、沉睡的状态。在日常教学中,教师大多仅关注学生是否完成视频学习、是否按时提交作业,忽视了挖掘数据背后蕴含的学习偏好、知识薄弱点、学习短板等深层信息,难以依据数据开展针对性教学调整,让精准施教无法真正落地,教学评价的诊断、激励与导向价值也难以发挥。与此同时,多数民办高校尚未建立适配青年教师发展的数字化教学专项评价标准,无法科学评判教师的数字资源运用水平、混合式教学实施质量等核心能力。加之配套激励机制不完善,数字化教学创新、课程改革等成果未有效纳入绩效考核、职称评审、评优晋升体系,难以调动青年教师投身数字化教学改革的主观能动性与积极性,无法形成主动钻研、持续提升教学能力的良性育人氛围。

四、民办高校青年教师教学能力不足的原因分析

(一) 青年教师职业认知偏差与内生动力不足

民办高校青年教师大多刚从高校毕业就走上讲台,存在教学经验欠缺、实践能力不足等问题。部分教师缺乏清晰的职业发展规划,专业发展动力不足。在能力结构上,许多青年教师虽然具有较好的学科专业知识,但在教学法知识、教育技术知识方面存在短板,尤其缺乏将三者有机整合的能力。部分教师终身学习意识不够强,面对日新月异的数字技术,未能及时更新知识结构,导致教学能力与时代需求脱节。

(二) 院校培训体系不完善,针对性不强

民办高校针对青年教师的培训多以“校本培训”为主,形式单一,内容陈旧。一是培训内容与需求脱节。学校组织的培训往往侧重于师德师风、规章制度宣讲,或者通用的软件操作技能,缺少贴合各学科、各专业的数字化教学专项培训。缺乏对于如何将数字技术深度融入专业课程教学的深度指导。二是培训方式流于形式。多以集中讲座、报告为主,“灌输式”培训很难激发青年教师的兴趣,而且容易增加教师负担。缺乏实操性、沉浸式的课堂教学实战演练,导致教师“听懂了但不会做”。三是缺乏后续的跟踪指导。培训结束后没有继续跟踪指导,青年教师在实际教学中遇到的问题无法得到及时解决,导致培训效果大打折扣。四是传帮带机制流于形式。虽然多数民办高校推行青年教师导师制,但导师多专注于传统教学指导,缺乏数字化教学指导能力,对青年教师开展教学数字化改革的帮助效果甚微。

(三) 教学评价激励滞后,约束引导作用薄弱

完善的制度体系是师资队伍建设的保障,当前民办高校相关制度滞后于教育数字化发展速度,制约了青年教师教学能力提升。一方面,教学评价制度滞后,现有评价体系沿用传统评价标准,未将数字资源开发、混合式教学实施、教学数据应用、教学创新成果、学生数字素养提升等数字化教学指标纳入评价体系,无法精准评价青年教师数字化教学能力,难以发挥评价的导向、激励、改进作用。另一方面,缺乏激励机制。学校对改革成效显著者缺乏专项奖励与职称倾斜,致使青年教师投入数字化教学改革的精力与回报失衡,极大挫伤了其自主提升的积极性。

(四) 行业竞争压力较大,发展环境受限

从行业发展环境来看,民办高校师资队伍不够稳定,青年教师面临较大的工作压力和职业不确定性。一方面,民办高校教学考核严格、课时任务较为繁重、行政事务比较繁杂,青年教师日常工作较多,几乎没有空余时间参与数字化教学培训、教研科研和教学创新实践,精力被过度分散,制约了教学能力提升。据统计数据显示,民办高校青年教师中“中度压力”和“严重压力”的比例达到44.8%,而“特别严重压力者”更是高达16.7%。^[6]

另一方面,民办高校青年教师薪资待遇、晋升空间相较于公办高校存在差距,部分青年教师存在职业焦虑和流动性倾向,缺乏长期深耕教学的信心,不愿投入过多精力打磨数字化教学能力,普遍存在重短期应付、轻长期提升的心态,不利于教学能力的持续迭代和稳步提升。

五、数字化背景下民办高校青年教师教学能力提升策略

(一) 更新教学理念,打好数字化育人思想基础

思想通才能行动顺。学校要引导青年教师改变旧思维,建立适应数字时代的新观念。一是通过讲座、案例分享,让老师明白数字化不仅是“用电脑上课”,更是用技术改进教学、用数据驱动课堂,主动适应改革。二是结合民办高校应用型特点,利用数字技术对接行业需求、贴合学生实际,开展精准化、实战化教学,改变过去“满堂灌”的旧模式,实现从单纯教知识向引导学生学习的角色转变。三是增强教师职业认同感,克服浮躁心态,沉下心来钻研教学,积极投入数字化创新实践。

(二) 分层开展培训,提高数字教学实操能力

针对青年教师数字教学能力参差不齐的现状,要建立分层、实用的培训体系。一是分层培训。对新入职教师,重点培训如何操作上课平台、课件制作等基础技能,让他们“懂技术”;对成长期教师,重点培训混合式教学、数据分析等进阶内容,让他们“会融合”;对骨干教师,侧重培训教学改革和AI应用,培养创新带头人。二是创新形式。改变光讲理论的做法,多进行实操演练、名师带徒、观摩听课等,让青年教师在实践中练出真本事。三是搭建平台。整合优质网课资源,方便教师利用零碎时间自学,形成“集中训+自主学+动手练”的长效机制。

(三) 搭建数字平台,提供数字教学实操载体

平台和资源是老师练好数字化教学本领的“练兵场”。民办高校得加大投入,把基础设施建好。一是硬件要升级。改造教室和实训室,配齐智能大屏、互动设备、虚拟仿真系统等,让老师随时能用智能设备上课。二是资源要共享。建好校级资源库,把好课件、好案例都收进来,让老师能随时调取、修改,结合实际做出特色课程。三是用好新技术。设立试点课程,引导老师用AI备课、分析学情,让技术真正融进课堂,解决“技术与教学两张皮”的问题,让教学更管用。

(四) 健全教研机制,提升创新能力

用教研带动教学,帮青年教师过好“创新关”。一是搞好“传帮带”。选拔校内教学名师、骨干教师、数字化教学能手作为指导导师,一对一帮扶青年教师,聚焦数字化教学设计、课堂创新、资源建设、教学反思等核心内容,通过常听课、多评课,帮青年教师尽快上手,把课上好。二是多交流。定期组织数字化教学研讨会、教学案例分享会、课程改革交流会,鼓励青年教师分享教学实践中的问题、经验和创新思路,相互交流、取长补短、共同提升。同时,加强校企教研合作,引导青年教师深入行业一线,将行业前沿技术融入课堂教学,提升应用型数字化教学能力。三是做课题。支持鼓励青年教师申报教改项目,边教边总结,用研究成果推动教学水平升级。

(五) 优化评价激励,激发内在动力

好制度才能让老师有动力。一是科学评价。不搞“一张试卷定成绩”,既要看技术用得熟不熟,更要看学生学得好不好,把教学创新、资源建设算进考核,全面衡量。二是给足激励。把数字化教学能力和职称晋升、评优评先直接挂钩。设立专项奖励,对表现突出的青年教师给予绩效倾斜,让改革者有“获得感”,激发主动提升热情。三是及时反馈。变“督促检查”为“指导服务”,及时发现问题并给予改进建议。构建“评价—反馈—改进”闭环,帮助教师及时纠偏,在反思中精进技艺,形成良性循环。

(六) 强化自我赋能,养成成长习惯

外部保障是基础,内生动力才是青年教师持续成长的核心。青年教师应当秉持终身学习理念,建立自主成长

机制,从被动参训转向主动提升。第一,主动拓展学习渠道。不能完全依靠校内培训,主动跟进教育数字化前沿内容,利用课余时间线上资源学习数字教学方法,结合自身课堂吸收借鉴,持续更新教学思路。第二,坚持课后复盘反思。教学不能只重进度,更要关注实际育人效果。课后及时梳理数字工具使用、课堂互动存在的问题,长期记录教学反思,在不断修正中积累实践经验。第三,积极参与实战锻炼。跳出理论空谈,主动参加公开课、教学竞赛,在备课磨课中优化数字化教学设计,听取同行意见,做到以赛促教,在实战中夯实教学能力,应对数字化教学各类挑战。

六、结语

数字化时代的浪潮已不可逆转,教育数字化转型既是挑战也是机遇。对民办高校来说,青年教师教学能力建设是一项系统性工作。一方面青年教师要主动更新教学观念、夯实自身教学功底,主动适配数字化教学改革;另一方面学校也要完善培训体系、革新教学评价机制,打造利于教师成长的制度环境与教学文化。唯有内外协同、多管齐下,才能真正破解民办高校青年教师教学能力提升的现实困境,打造一支高素质、专业化、创新型的青年教师队伍,助力民办高等教育走高质量发展道路,为教育强国建设贡献民办力量。

参考文献:

- [1] 杨继娟. 民办本科高校青年教师教学能力提升策略探究——基于教育数字化转型视域[J].时代报告(奔流), 2025, (7): 129-131.
- [2] 胥剑利,赵燕妮,盛馨禾. 智能时代民办高校教师教学能力提升路径[J].西部素质教育, 2025, 11 (13): 119-122.
- [3] 于丹. 数字赋能视域下民办高校教师教学能力提升策略探析[J].山西青年, 2024, (15): 138-140.
- [4] 石艳,崔蓓. 教育数字化转型背景下的教师专业能力结构重塑[J].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3, (5): 55-66.
- [5]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教育部关于发布《教师数字素养》教育行业标准的通知[EB/OL].(2022-11-30)[2026-07-12].http://www.moe.gov.cn/srcsite/A16/s3342/202302/t20230214_1044634.html
- [6] 余沛,黄莉,邱荣茂,等. 教育数字化背景下民办高校青年教师成长中的现实问题与实践路径[J].四川民族学院学报, 2024, 33 (6): 34-39.

Exploring Pathways to Enhance Teaching Competence of Young Faculty in

Private Universities under the Digitalization Context

Bai Lianru, Zha Tingting

(Huaibei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Huaibei, Anhui, China)

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improving the teaching ability of young teachers in private universities is imperative.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lagging and shortcomings in the concepts, qualities, innovation, and evaluation of young teachers in private universities, pointing out that the reasons lie in the lack of internal motivation, insufficient targeted training, outdated incentive mechanisms, and limited environment. In response, it proposes strategies such as updating concepts, conducting tiered training, building platforms, improving teaching and research, optimizing incentives, and strengthening self-empowerment, aiming to address the current difficulties of inadequate teaching ability among young teachers through internal and external coordination, and to build a high-quality faculty team.

Keywords: Digitalization; Private universities; Young teachers; Teaching ability; Improvement path

体质强健计划导向下县域小学体育家校共育现状研究与对策

朱禹, 向浩荣

(成都大学, 四川 成都 610000)

摘要:为落实《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生体育工作 实施学生体质强健计划》政策部署, 破解县域小学体育家校协同脱节、育人合力薄弱、课外体育育人缺位等现实难题, 本文采用文献资料法、问卷调查法、数理统计法与逻辑分析法, 以射洪市4所县域城区小学的体育教师及3—6年级学生家长为调研对象, 系统开展体育家校共育现状实证研究。调研结果表明, 当前县域小学体育家校共育普遍存在家校育人认知错位、协同运行机制不健全、共育内容形式单一、双向沟通渠道不畅、配套保障体系不完善等突出问题。本文以协同育人理论、家校合作理论为支撑, 结合县域小学办学特质与小学生体质发展规律, 从认知共育、机制构建、内容优化、渠道拓展、保障完善五个维度构建系统化共育优化路径。研究成果可县域小学体育家校协同育人工作提供实证依据与实践参考, 助力常态化、规范化体育共育体系构建, 持续提升小学生体质健康水平。

关键词: 体质强健计划; 县域小学; 体育教育; 家校共育

DOI: doi.org/10.70693/202607220928

一、引言

青少年体质健康是全民健康战略的重要基石, 也是新时代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核心评价指标。为扭转我国青少年体质健康持续下滑的态势, 夯实学校体育育人根基, 教育部联合多部门印发《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生体育工作 实施学生体质强健计划》^[1], 明确提出构建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协同育人体系, 压实家庭体育育人主体责任, 推动家校体育协同育人常态化、制度化、规范化, 为中小学体育家校共育工作的开展提供了明确的政策导向与行动遵循。

相较于中心城区优质小学, 县域小学受地域条件、资源配置、家长教育认知、配套设施等多重因素制约, 面临校内体育教学提质受限、学生课外体育锻炼缺乏保障、家校体育联动碎片化等发展困境, 单一的校内体育教学模式已无法适配新时代学生体质强健的育人需求。家校共育作为延伸体育育人边界、补齐课外体育育人短板的核心路径, 能够有效整合学校专业体育教学资源与家庭陪伴育人资源, 构建课内外一体化、校内外联动化的体育育人体系, 是落实体质强健计划的关键抓手。

当前国内学界关于体育家校共育的研究多聚焦于城市中小学, 针对县域小学的实证化、精细化研究较为匮乏, 现有研究提出的育人策略通用性较强、县域适配性不足, 难以精准解决基层体育共育的现实问题。基于此, 本文以体质强健计划为政策引领, 立足县域小学教育发展实际, 通过实地实证调研梳理体育家校共育现存痛点与症结, 构建适配县域场景、可落地、可长效的体育家校共育路径, 旨在补齐县域小学体育育人短板, 为基层学校体育家校协同育人工作提质增效提供实践参考。

二、文献综述

国内学界围绕中小学体育家校共育展开了丰富的理论与实践研究, 形成的系列成果为本文研究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在政策解读与育人价值层面, 张宇^[2]指出, 家校深度协同是新时代学生体质强健计划落地见效的核心关键, 家庭体育育人缺位是导致青少年课外锻炼不足、体质达标率偏低的核心诱因, 强化家校体育联动是落实体育育人政策的核心抓手。2025年最新相关研究进一步印证, 在体质强健计划全面落地的政策背景下, 家校协同

作者简介: 朱禹 (2001-), 男, 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体育教学;
向浩荣 (2001-), 男, 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体育教学。

育人已从传统辅助手段转变为中小学体育教育提质的核心支撑,家庭体育参与质量直接决定青少年体质提升效果与终身体育习惯的养成朱博凡等^[2]的研究表明,小学阶段是学生体育兴趣培育、运动习惯养成的关键窗口期,家校共育能够有效弥补学校体育课时有限、锻炼场景单一的短板,实现体育育人全过程、全覆盖渗透。陈正黄等^[3]通过随机对照试验证实,家校联动体育育人模式不仅能够显著提升小学生耐力、力量等核心体质指标,还能优化亲子陪伴质量,兼具体育育人与家庭教育建设双重价值。

在现实困境研究层面,刘思琪^[7]研究提出,县域家长普遍存在“重文化课、轻体育”的认知偏差,对学生体育锻炼的重视度不足,且缺乏科学的家庭体育指导能力,直接造成家校体育育人衔接断层、育人实效弱化。伍川俊^[4]针对县域教育场景的专项调研指出,基层小学普遍存在体育共育资源下沉不足、分层精准指导缺失、常态化活动载体匮乏等现实问题。

在育人路径研究层面,李少娟^[5]认为,新时代体育家校共育需立足家校社协同育人格局,通过拓展育人内容、创新活动形式、整合本土资源,破解基层学校体育育人形式单一的难题。吴琼^[6]聚焦家庭体育育人短板,提出趣味化、轻量化、常态化的小学体育家庭作业设计思路,为家校共育内容优化提供了可落地的实践方案。国外相关研究中,Zhong 等^[10]、Liang^[9]围绕青少年体育家校协同育人开展深耕研究,证实家庭持续性体育陪伴、学校专业化指导、双向动态沟通机制是培育学生体育兴趣、提升体质水平的核心要素,提出基层学校需构建适配本土学情的个性化共育体系,摒弃同质化、形式化的育人模式,该结论与我国体质强健计划的育人导向高度契合,为本文路径构建提供了国际化理论支撑。

综合现有研究成果来看,国内体育家校共育的研究体系已初步成型,2024—2025 年前沿研究逐步向县域基层学校、新政策落地实践聚焦,但针对县域小学的实证调研、分层育人、长效生态构建的精细化研究仍存在明显短板,多数研究成果通用性强、县域针对性不足。本文立足县域教育实际,紧扣最新政策导向与前沿研究成果,通过实地调研精准研判县域小学体育家校共育的现实痛点,构建分层化、长效化、可落地的育人路径,有效弥补现有研究的不足,具备较强的理论补充性与实践创新性。

三、研究方法

1. 研究对象

本文以体质强健计划导向下县域小学体育家校共育优化路径为核心研究对象,选取射洪市 4 所县域城区小学的 3—6 年级学生家长及在岗体育教师作为调研样本,确保调研样本覆盖不同办学规模、不同育人层次的县域学校,保障研究数据的代表性与全面性。

2. 研究方法

2.1 文献资料法

通过中国知网、万方数据库、教育部官方平台等渠道,系统检索 2022—2026 年与体质强健计划、小学体育教育、家校共育、协同育人相关的政策文件、期刊论文及学位论文,梳理汇总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与政策规范,厘清核心研究概念、理论基础与研究现状,为本文的问题分析、路径构建提供坚实的理论支撑。

2.2 问卷调查法

结合本文研究主题与研究需求,自主设计《县域小学体育家校共育现状调查问卷》,问卷涵盖家长体育育人认知、家校体育沟通现状、家庭体育锻炼开展情况、家校共育活动参与度、育人需求等多个核心维度。本次调研采用方便抽样法,对射洪市 4 所县域城区小学开展专项调研,累计发放问卷 200 份,回收有效问卷 182 份,剔除作答不完整、随意作答等无效问卷 5 份,最终留存有效问卷 177 份,问卷有效回收率为 97.3%,调研数据真实可靠,能够客观反映当地县域小学体育家校共育的实际发展现状。

2.3 数理统计法

将本次调研获取的 177 份有效数据录入 Excel 数据处理软件,对调研数据进行分类整理、筛选汇总与统计分析,运用频数、百分比等统计指标量化分析县域小学体育家校共育的现状特征与现存问题,为论文的问题剖析、成因分析与路径构建提供精准的数据支撑。

2.4 逻辑分析法

以协同育人理论、家校合作理论为核心理论支撑,对文献资料、调研数据进行归纳、演绎、分析与总结,系统梳理县域小学体育家校共育的发展现状、现存困境及深层成因,结合体质强健计划政策要求与县域育人特色,

提炼科学、可行、适配的家校共育优化路径。

四、研究结果与分析

为直观、清晰呈现本次县域小学体育家校共育调研结果，本文将核心调研数据进行整理汇总，从家长育人认知、家校沟通、家庭体育锻炼、共育活动开展四个核心维度梳理各项指标占比情况，具体现状数据如下表所示。

表 1 家校共育现状

调研维度	调研具体指标	占比 (%)
家长体育育人认知	认可体育锻炼对学生成长重要性的家长	67.2
	主动配合开展家庭体育育人的家长	37.9
秉持“重文轻体”观念的家长	认为多注重文化课程不必过多参与体育锻炼的家长	42.4
家校体育沟通现状	定期开展体育家校常态化沟通的体育教师	29.4
家庭体育锻炼开展	每周开展 3 次及以上规范课外体育锻炼的家庭	31.6
共育活动开展现状	定期开展特色体育家校共育活动的学校	25.8

结合上表量化数据，结合调研实际情况，对县域小学体育家校共育各维度现状展开详细分析如下：

1.家长体育育人认知现状

调研数据显示，67.2%的家长能够认可体育锻炼对小学生身心成长的重要价值，但仅有 37.9%的家长能够主动配合学校落实家庭体育育人工作，多数家长存在体育育人懈怠、参与度不足等问题。其中，42.4%的家长仍固守“重文化、轻体育”的传统应试教育观念，将学生文化课成绩提升作为核心目标，认为体育锻炼会占用学习时间、影响学业进度，忽视体育锻炼在增强学生体质、锤炼意志品质、提升学习效率等方面的重要作用。整体而言，县域小学家长体育育人认知存在明显偏差，育人理念滞后是制约体育家校共育落地的首要因素。

2.家校体育沟通交流现状

家校沟通是开展协同育人的重要纽带，本次调研发现，县域小学体育家校沟通普遍存在被动化、碎片化、滞后化问题。仅有 29.4%的体育教师会通过家长会、班级微信群、线下沟通等常态化渠道，向家长普及科学体育锻炼知识、反馈学生课堂体育表现与体质发展情况。绝大多数家校体育沟通仅发生在学生体育成绩不合格、体质测试不达标等问题出现后，属于被动式、问题式沟通，缺乏常态化、双向化的良性沟通机制。同时，县域家长主动咨询学生体育学习情况、反馈育人困惑的比例极低，家校双向互动渠道未完全畅通，育人信息存在明显壁垒。

3.家庭体育锻炼开展现状

家庭体育锻炼是落实体质强健计划、实现课内外体育育人衔接的核心载体。本次调研数据显示，仅 31.6%的家庭能够保证学生每周开展 3 次及以上规范课外体育锻炼，大部分学生存在课外锻炼时长不足、锻炼频次不够、锻炼形式单一等问题。多数家庭的体育锻炼仅为随意散步、简单跑步等无规律活动，缺乏系统性、科学性、针对性的锻炼方案。同时，县域家长普遍缺乏专业的体育指导知识与能力，无法结合学生年龄特征、身体素质、体质短板制定个性化锻炼计划，导致家庭体育锻炼随意性强、育人效果薄弱，难以有效衔接校内体育教学目标。

4.体育家校共育活动开展现状

当前县域小学体育家校共育活动载体单一、形式固化、创新性不足。学校开展的体育共育活动多局限于校级运动会、期末体质健康测试等常规性、阶段性活动，常态化、趣味性、亲子化的特色体育共育活动严重不足。调研显示，仅有 25.8%的学校会定期组织亲子体育开放日、家庭体育挑战赛、趣味亲子运动会等特色共育活动。整体来看，县域小学体育家校共育活动载体匮乏、育人氛围薄弱，难以充分调动家长的参与积极性，无法实现常态化共育育人效果。

五、现状分析

1.家校共育意识薄弱

当前县域小学体育家校共育的认知层面存在双向短板。一方面，多数县域家长受传统应试教育思维影响，体

育育人重视程度不足,将体育教育归为学校的专属责任,忽视家庭在学生课外体育锻炼、运动习惯培育、体育素养提升中的主体作用,缺乏主动参与体育共育的意识与行动。另一方面,部分县域小学体育教师育人思维局限,工作重心仅聚焦于校内体育课堂教学、运动技能传授与体质测试达标,忽视家校协同育人的重要价值,缺乏主动联动家长、指导家庭体育育人的工作意识,最终导致家校育人理念脱节、育人目标不统一,育人合力难以形成。

2. 协同机制任然不完善

依据协同育人理论,权责清晰、流程规范、闭环运行的协同机制是形成家校育人合力的核心前提。当前县域小学尚未建立标准化、常态化的体育家校共育专项机制,缺乏明确的家校权责划分、固定沟通制度、过程监管机制与效果考核机制。学校层面无明确的体育家校沟通频次、沟通内容与工作标准,家长层面无清晰的家庭体育育人责任规范与行动要求,使得家校联动长期处于“被动沟通、问题驱动、临时应对”的碎片化状态。同时,学校缺乏专门的体育家校共育统筹管理机制,工作无统筹、无落实、无反馈、无优化,导致协同育人工作稳定性差、实效性弱。

3. 共育内容形式过于老化

现阶段县域小学体育家校共育内容固化、形式单一,创新性、趣味性、针对性严重不足。学校开展的共育活动多以大型集体性活动为主,采用统一化、一刀切的育人模式,未结合小学低、高年级学生的身心发展规律、运动能力差异、体质短板特征设计分层育人内容。低年级学生侧重体育兴趣启蒙、趣味运动体验,高年级学生侧重体能提升、专项技能训练与运动习惯固化,但当前共育内容未形成学段分层体系,无法适配学生差异化的发展需求。同时,家庭体育锻炼缺乏校内专业指导与内容衔接,锻炼内容随意零散,与校内体育教学目标脱节,造成课内外体育育人割裂。

4. 保障体系尚不健全,共育工作支撑不足

完善的保障体系是体育家校共育常态化、长效化开展的基础支撑。当前县域小学体育家校共育存在师资、资源、制度多重保障缺位的问题。师资层面,县域小学体育师资总量有限,教师日常教学、赛事组织、体质测试等工作任务繁重,缺乏充足的时间与精力开展常态化家校共育指导工作。资源层面,县域家庭普遍缺乏专业体育锻炼器材,乡镇及社区公共体育配套设施不完善,学生课外锻炼场地、资源受限。制度层面,多数县域小学未制定体育家校共育专项管理制度,工作开展无规范、无考核、无激励、无约束,难以充分调动体育教师、学生家长的参与积极性,共育工作难以常态化落地。

六、优化对策

1. 深度统一家校体育育人理念

基于家校合作理论,育人理念统一是构建家校协同育人体系的首要前提。针对当前家校体育育人认知错位、共育意识薄弱的问题,学校需搭建常态化认知培育与理念宣讲平台,全方位夯实家校双方的体育共育认知。一方面,学校通过专题家长会、体育育人讲座、班级宣讲、校园公众号推文、家校群科普等多元形式,向家长深度解读学生体质强健计划的政策内涵与育人要求,普及青少年体质健康对身心发展、学业提升、终身成长的重要价值,破除家长“重文轻体”的传统误区,明确家庭体育育人的法定责任与核心作用,引导家长主动参与、主动配合体育共育工作。另一方面,定期开展体育教师专项培训,强化教师协同育人思维,将家校共育纳入体育教师常态化教学工作范畴,引导教师主动对接家庭、指导家庭、联动家庭,打破校内校外体育育人壁垒,构建家校同心、目标同向的育人共识。同时,深耕校园体育文化建设,营造全员重视体育、全员参与体育的良好氛围,潜移默化提升家校共育的主动性与自觉性。

2. 构建更全面的育人体系

依据协同育人理论,规范化的运行机制是破解家校联动碎片化、被动化问题的核心关键。县域小学需结合自身办学规模、师资配置与学情特点,构建“学校统筹、班级落实、家庭参与”的常态化体育家校协同育人机制。首先,明晰家校权责边界,学校承担统筹规划、方案设计、专业指导、平台搭建、活动组织的核心职责,家庭承担落实日常课外锻炼、监督学生运动、配合学校育人、反馈成长情况的主体责任,实现权责清晰、各司其职、协同

发力。其次,建立常态化双向沟通机制,明确体育教师每月开展1次专项体育家校沟通,通过线上答疑、线下交流、数据反馈等方式,同步学生课堂表现、体质测试数据、运动短板,解答家长育人困惑,收集家长育人诉求与优化建议。最后,搭建闭环评价反馈机制,定期对家校共育落实情况进行复盘梳理,针对育人薄弱环节动态优化方案,形成“统筹部署—落地实施—双向沟通—评价反馈—优化提升”的完整育人闭环,保障共育工作规范有序推进。

3. 优化更新共育内容,打造分层分类育人模式

针对共育内容单一、针对性不足、课内外脱节的问题,学校需立足小学生学段差异与体质差异化需求,优化共育内容体系,构建分层分类、精准适配的体育育人模式。低年级聚焦体育兴趣启蒙与运动习惯培育,设计亲子跳绳、趣味跑跳、亲子球类小游戏等轻量化、趣味化、低门槛的共育内容,降低家庭参与难度,激发学生运动兴趣。高年级聚焦体能提升、专项技能巩固与体质短板补齐,结合学生耐力、力量、柔韧等维度的体质数据,制定个性化、常态化的课外锻炼方案,引导家长全程监督落实。同时,打通课内外体育育人衔接通道,依据校内体育教学进度,每周推送适配的家庭体育作业与锻炼任务,实现课外锻炼与课堂教学目标同向、内容衔接、效果互补。此外,丰富共育活动载体,常态化开展亲子体育打卡、班级体育挑战赛、校园体育开放日、家庭体育风采展示等特色活动,提升共育趣味性与实效性。

4. 强化家校共育保障基础

充足的师资、资源与制度保障,是体育家校共育常态化落地的重要支撑。在师资保障上,学校整合校内体育教师资源,组建专项家校体育指导小组,实行学段、班级分工负责制,精准对接各年级家庭体育指导工作;同时定期邀请体育教育专家、骨干教师开展专题培训,提升教师家校沟通、家庭体育指导、共育方案设计的专业能力。在资源保障上,针对县域家庭体育资源匮乏的现状,学校常态化推送无器材、简易化、高适配的家庭锻炼方案,降低家庭体育开展门槛;有序开放校园操场、球场、器材室等体育资源,在周末、节假日面向学生及家长开放,弥补县域家庭与社区体育配套短板。在制度保障上,制定《小学体育家校共育实施细则》,明确共育工作的开展标准、实施流程、考核评价方式与激励机制,将家校共育落实情况纳入体育教师教学考核与班级育人评价体系,对积极参与、成效突出的家庭与教师予以表彰激励,充分调动各方育人积极性。

5. 培育常态化共育生态

体育家校共育是助力学生终身健康发展的长期性、系统性工程,绝非阶段性工作。县域小学需紧扣体质强健计划长效育人目标,摒弃短期化、形式化的育人思维,着力培育常态化、可持续、有特色的体育家校共育生态。一方面,建立学生体质动态跟踪档案,常态化记录学生体质测试数据、课外锻炼情况、运动兴趣变化与能力提升情况,结合学生成长规律动态调整共育方案,实现因材施教、精准育人。另一方面,推行线上常态化体育打卡机制,依托班级平台开展每日家庭体育打卡活动,引导家长坚持亲子陪伴锻炼,长期培育学生自主运动、终身锻炼的良好习惯。同时,深度挖掘县域民俗体育、本土特色运动资源,将本土体育项目融入家校共育内容,打造具有县域辨识度的体育共育品牌,持续提升家校共育质量,为学生体质健康长效发展筑牢根基。

六、结论与展望

本文以体质强健计划政策为导向,以县域小学为研究场景,通过实证调研系统剖析了当前县域小学体育家校共育的发展现状与深层困境。研究表明,县域小学体育家校共育主要存在家校育人认知错位、协同运行机制不完善、共育内容形式单一、双向沟通渠道不畅、资源制度保障缺失等问题,共育工作碎片化、形式化问题突出,是制约县域小学生体质健康提升、体育育人政策落地见效的核心瓶颈。

为精准落实新时代学生体质强健计划的育人要求,破解县域小学体育家校共育难题,学校需立足县域教育发展实际,以协同育人、家校合作核心理论为支撑,从理念统一、机制完善、内容优化、资源保障、生态培育五个维度协同发力,构建全方位、常态化、专业化、可落地的体育家校共育体系。通过深化家校认知共育、健全双向联动闭环机制、打造学段分层育人模式、夯实资源制度保障,彻底打通校内体育与家庭体育的育人壁垒,凝聚家校育人合力,有效补齐县域小学体育育人短板,持续提升基层学校体育育人质量,为新时代青少年体质健康全面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参考文献:

- [1] 教育部.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生体育工作 实施学生体质强健计划[Z].2024.
- [2] 朱博凡,隋红.体育教联体构建“家校社”协同育人研究[J].辽宁体育科技,2025,47(02):129-134.
- [3] 陈正簧,王淋枝,曾杰.家庭—学校联动体育计划对青少年体质健康与亲子关系的双重效益:一项随机对照试验[J].中国体育研究,2025,7(04):32-40.
- [4] 伍川俊.家校合作视角下小学生体育锻炼习惯养成策略[J].体育视野,2025(12):89-91.
- [5] 李少娟.家校社共育模式在体育课程中的应用实践[J].当代体育科技,2025,15(27):76-78.
- [6] 吴琼.小学体育家庭作业趣味化实施路径研究[J].冰雪体育创新研究,2025,6(08):69-71.
- [7] 刘思琪.新时代体质健康视域下家校体育协同育人研究[J].体育风尚,2025(03):65-67.
- [8] 张宇.新时代中小学体育家校协同育人机制构建研究[J].体育科技文献通报,2023,31(08):189-191.
- [9] Liang C M.From Margins to Center: Transition and Pathways of School Physical Education in the Context of Collaborative Education[J].Journal of Shenyang Sport University,2024,43(05):36-42.
- [10] Zhong H,Wang D,Qi C.School-family cognitive discrepancies in the cultivation of children's interest in sports:an exploratory study based on grounded theory[J].Frontiers in Public Health,2025,13:1713106.

Research on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Countermeasures of School-Home Co-Education in Physical Education of County Primary Schools under the Guidance of a Strong Physical Constitution Enhancement Plan

Zhu Yu, Xiang Haorong

(Chengdu University, Sichuan, Chengdu, China)

Abstract: To implement the policy deployment of "Comprehensively Strengthening and Improving Physical Education for Students in the New Era and Implementing the Student Physical Constitution Enhancement Plan", and to address practical challenges such as disconnection in school-home collaboration in physical education, weak educational synergy, and lack of extracurricular physical education for students in county primary schools, this paper adopts literature review, questionnaire survey, mathematical statistics, and logical analysis methods. Taking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ers from 4 county urban primary schools in Shehong City and parents of students in grades 3-6 as research subjects, it conducts systematic empirical research on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school-home co-education in physical education. The research results show that there are prominent problems in the current school-home co-education in physical education of county primary schools, including misalignment of school-home educational cognition, imperfect collaborative operation mechanisms, single content and forms of co-education, unsmooth two-way communication channels, and incomplete supporting guarantee systems. Supported by collaborative education theory and school-home cooperation theory, and combined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ounty primary school educa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laws of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physical constitution, this paper constructs a systematic optimization path for co-education from five dimensions: cognitive co-education, mechanism building, content optimization, channel expansion, and guarantee improvement. The research results can provide empirical basis and practical reference for the collaborative education work of school and home in physical education of county primary schools, help build a normalized and standardized physical education co-education system, and continuously improve the physical health level of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Keywords: Physical Constitution Enhancement Plan; County Primary School; Physical Education; School-Home Co-Education

高职院校国际教育师资岗位能力清单构建路径研究

郇久阳, 胡梦蝶, 殷雨时

(扬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江苏扬州 225127)

摘要: 高职院校国际教育师资岗位能力清单的构建是推动国际化办学从规模扩张转向内涵提升的基础性工程。本文以能力本位教育理论为支撑, 构建内涵界定—现状诊断—难点识别—路径构建四维分析框架, 系统考察了高职国际教育师资岗位能力清单的构建问题。分析了当前师资队伍面临的“数量不足、结构失衡、能力断层”三重困境, 识别了能力清单构建中需求动态性、边界模糊性与期望多元性三项关键挑战, 并从顶层设计、方法驱动、全链贯通三个维度提出了系统性实施路径。

关键词: 高职院校; 国际教育; 师资能力; 岗位能力清单; DACUM法; 德尔菲法

基金项目: 2026年江苏高校“青蓝工程”项目; 2026年度扬州市社科类决策咨询课题(项目编号2026YJC-050); 江苏省教育科学规划课题(编号: B/2023/02/21)

DOI: doi.org/10.70693/202607282132

引言

在“一带一路”倡议持续推进和职业教育对外开放政策深化的背景下^[1], 我国高职院校的国际化办学已从规模扩张阶段进入内涵提升阶段^[2]。2026年6月, 教育部印发的《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加强“留学中国”品牌和能力建设, 规范有序开展海外办学。国际教育作为高职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师资队伍的能力水平直接决定了国际化人才培养的质量与院校的国际竞争力。

然而, 当前高职院校国际教育师资的能力建设仍面临标准缺失、路径模糊、评价缺位等突出问题^[3]。一方面, 国际教育岗位的能力要求与普通师资存在显著差异, 涉及跨文化教学、国际课程开发、双语沟通、国际项目管理等复合性能力维度^[4]; 另一方面, 现有研究多聚焦于双师型教师能力模型的某一维度^[5], 或在师资国际化建设、国际教育发展等宏观层面展开讨论, 缺乏对能力清单系统性构建方法的深入探讨。

教育部2026年印发的《关于深化职业教育教学关键要素改革的意见》(教职成〔2026〕1号)中明确提出要细化教师能力清单。所谓岗位能力清单, 是指基于特定岗位的工作任务分析, 系统梳理并结构化呈现岗位所需的知识、技能和态度要素的管理工具。从构成要素来看, 岗位能力清单通常涵盖知识维度、技能维度、态度维度三个横向要素, 以及通用能力、专业能力、发展能力三个纵向层次。在国际教育师资岗位中, 能力清单还需叠加跨文化理解、国际课程开发、多语沟通等国际化能力要素, 呈现出显著的复合性特征^[6]。

本文构建“内涵界定—现状诊断—难点识别—路径构建”四维递进分析框架, 系统考察高职院校国际教育师资岗位能力清单的构建问题。全文在梳理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首先诊断当前师资队伍的能力缺口, 进而识别清单构建过程中的核心难点, 最终提出系统性的实施路径与策略建议, 以期高职院校国际教育师资能力建设和制度设计提供理论参照与实践指引。

一、高职院校国际教育师资队伍现状与能力缺口

1.1 师资队伍结构与国际化水平

当前, 我国高职院校国际教育师资队伍在结构上呈现出若干值得关注的特征。从学历结构来看, 具有博士学

作者简介: 郇久阳(1990—), 男, 博士, 讲师, 研究方向为教师职业发展路径;

胡梦蝶(1991—), 女, 硕士, 助理研究员, 研究方向为教师引进和培养策略;

殷雨时(1982—), 男, 博士, 副教授, 研究方向为教育科学管理。

通讯作者: 郇久阳

位的教师比例偏低,硕士及以下学历者仍占主体;从职称结构来看,高级职称比例不足,中初级职称教师承担了大部分国际教育课程的教学任务。从学科背景来看,外语类和教育类学科背景的教师占比较高,而具有国际商务、国际工程等复合型学科背景的教师相对稀缺。在海外经历方面,具有连续一年以上海外学习或工作经历的教师比例不足,且海外经历多集中于语言培训类项目,在国际课程开发、国际项目管理等实务领域的训练机会有限。

这些结构性问题反映了高职国际教育师资队伍建设存在先天不足与后天失调的双重困境。一方面,高职院校的师资引进渠道相对有限,难以吸引具有国际教育背景的高层次人才;另一方面,在职教师的国际化培养机制尚不健全,海外研修项目的覆盖面与实效性有待提升。师资队伍存在的学历层次偏低、海外经历比例不足、学科背景单一的结构性问题,构成了制约国际教育质量提升的基础性瓶颈。

1.2 核心能力维度的现实表现与缺口

从跨文化教学、国际课程开发、外语应用和国际项目管理四个核心能力维度审视,当前高职国际教育师资的实际表现与岗位需求之间存在显著缺口。在跨文化教学能力方面,多数教师能够完成基本的国际化课程授课任务,但在跨文化教学设计、国际学生学情分析和文化敏感性教学策略的运用方面能力不足。在国际课程开发能力方面,能够独立完成国际课程模块开发的教师比例较低,大部分教师依赖引入的国外课程资源,本土化改造与创新的能力薄弱。在外语应用能力方面,教师的外语水平呈现读写强、听说弱的不均衡结构,以英语为媒介开展全英文授课的能力亟待提升。

最为突出的缺口出现在国际项目管理能力维度。高职院校国际教育涉及中外合作办学项目、留学生管理、国际交流项目等多个业务板块,要求教师具备项目策划、跨文化沟通、质量监控和风险应对等综合管理能力。然而,当前师资队伍中兼具教学能力与项目管理能力的复合型人才极为匮乏,多数教师缺乏国际项目运营的实务经验。跨文化教学设计能力与国际项目运营经验是当前师资能力缺口最为突出的两个维度,其根源在于职前培养与在职培训的双重缺失。

1.3 能力缺口的多维成因分析

能力缺口的形成并非单一因素所致,而是制度供给、培养体系、评价导向和资源投入四重因素叠加的结果。在制度层面,高职院校国际教育师资至今缺乏统一的准入标准和能力框架,各院校在师资引进时缺乏明确的能力参照依据,导致入口质量参差不齐。在培养层面,现有的师资培训体系仍以学科知识更新和教学方法改进为主,缺乏针对国际教育岗位能力的系统性培训项目,培训内容与岗位实际需求之间存在结构性脱节。

在评价层面,高职院校的教师考核评价体系仍以论文发表、项目申报等传统学术指标为主导,国际教育服务、跨文化教学创新等体现国际教育岗位特色的能力维度尚未纳入核心指标。在资源层面,国际教育师资培养需要境外研修、国际课程开发、外籍专家引进等专项经费支持,但多数高职院校的国际化办学经费有限,资源投入不足制约了能力建设的深度与广度。能力缺口的形成是制度供给不足、培养体系脱节、评价导向偏差与资源投入有限四重因素叠加的结果,任何一个维度的单点突破都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二、能力清单构建的难点与关键挑战

2.1 岗位能力需求的动态性与清单的更新机制

国际教育政策环境、产业需求变化和技术迭代对师资岗位能力需求的影响具有显著的动态性特征。随着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教育合作的深化、中外合作办学模式的创新以及数字技术在国际教育中的加速渗透,高职国际教育师资的能力需求正经历持续演变。例如,后疫情时代在线国际教育的发展对教师的数字化教学能力和虚拟跨文化沟通能力提出了新的要求;而全球产业格局的调整则要求教师能够及时更新国际课程内容,对接国际产业标准和技术规范。

然而,能力清单这种结构化的能力描述工具具有天然的静态性特征。如何建立动态更新机制,使其能够及时响应外部环境因素变化,是清单构建时面临的首要挑战。能力清单的有效性取决于其能否建立与政策变化和产业需求同步的动态更新机制。这要求清单在构建初期就嵌入“定期评估、反馈修订、版本迭代”的制度化流程,而不能将清单当成一次性开发产物。

2.2 岗位边界模糊性与能力界定的方法论挑战

高职国际教育师资岗位的边界模糊性构成了能力清单构建的另一核心难点。与普通专任教师相比,国际教育师资的工作内容不仅涉及课堂教学,还延伸至国际项目开发、留学生管理、国际交流协调等非教学领域,其岗位边界与行政管理人员、国际合作交流人员之间存在显著交叉。这种岗位边界的模糊性带来了能力界定的方法论挑

战。如果严格按照单一岗位进行能力分析,可能遗漏跨岗位的核心能力。如果涵盖过宽,则可能导致清单缺乏针对性。

此外,不同院校因国际化办学定位和规模的差异,其国际教育师资岗位的职能配置也存在较大差异。部分院校的国际教育师资以教学为主,部分院校则要求教师同时承担项目管理、招生宣传等多元职能。岗位边界的模糊性要求能力清单构建方法从单一岗位分析转向岗位簇分析,以增强覆盖面和灵活性,这需要在方法论层面进行创新和调适。

2.3 多元利益相关方期望的协调与整合

能力清单的构建涉及院校管理者、行业企业、教师群体、学生等多个利益相关方,各方对能力清单的期望存在显著差异。院校管理者倾向于将能力清单作为师资绩效考核和岗位聘任的工具,关注能力的可量化性与可评价性;行业企业则期望能力清单能够反映国际产业标准和岗位实践需求,强调清单的行业对接性。教师群体更关注能力清单对其职业发展的引导价值,期望清单能够体现专业成长路径。学生作为国际教育的直接受益者,对教师的跨文化沟通能力和学业支持能力有较高期待。

这些差异化的期望在清单构建过程中可能转化为显性或隐性的阻力。如果过度偏向某一方的期望,可能导致清单在其他利益相关方中的接受度下降,进而影响清单的推广与应用。多元利益相关方的期望差异是清单构建中的隐性阻力,参与式构建机制是化解这一阻力的关键路径,通过将各方纳入清单构建的协商与决策过程,在共识形成中实现期望的协调与整合。

三、岗位能力清单构建的实施路径与策略

3.1 顶层设计: 制度保障与标准引领

能力清单的构建不是一项孤立的技术性工作,而是需要制度保障与标准引领的系统性工程。在制度层面,建议将能力清单纳入高职院校师资队伍建设和国际教育质量保障体系,使其成为师资引进、培养、考核和发展的基础性制度工具。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可参照双师型教师资格认证的经验,探索建立国际教育师资岗位能力认证制度,为能力清单的推广应用提供政策支撑。

在标准层面,需要构建“国家基准、省级标准、院校清单”国三级标准体系。国家层面制定国际教育师资岗位能力基本要求,明确能力清单的通用框架和核心能力维度。省级层面结合区域产业发展和国际教育需求,制定符合地方特色的能力标准。院校层面则在国家和省级标准指导下,结合自身办学定位和国际化战略,具体构建适用的岗位能力清单。能力清单的构建需要以制度化的标准体系为引领,将清单纳入院校师资发展规划和国际教育质量保障框架,实现从工具开发到制度嵌入的转化。

3.2 方法驱动: DACUM 与德尔菲法的组合应用

在方法层面,DACUM 法与德尔菲法的组合应用为高职国际教育师资岗位能力清单的构建提供了科学化的方法论支撑。具体而言,DACUM 法负责第一阶段的工作任务分析:通过组织由国际教育领域资深教师、教学管理人员和行业专家组成的工作坊,系统梳理国际教育岗位的主要职责、工作任务和操作步骤,产出初步的工作任务清单和能力要素清单。德尔菲法负责第二阶段的能力要素验证与共识达成:将初步清单编制成专家咨询问卷,通过两至三轮匿名咨询,收集专家对能力要素重要性、可培养性和优先级的评价意见,在统计分析的基础上形成共识性的能力清单。

两个方法的衔接点在于能力要素的转化:DACUM 法产出的工作任务和操作步骤需要转化为可观察、可测量的能力指标,而德尔菲法的专家咨询则为这一转化过程提供了校准与验证机制。DACUM 法负责岗位能力分解与任务分析,德尔菲法负责能力要素的专家共识达成,二者组合形成分析、验证、优化的闭环构建流程。在实践操作中,建议采用“先 DACUM 后德尔菲”的串行模式,以确保能力清单既扎根于实际工作过程,又具有前瞻性的专家判断。

3.3 全链贯通: 从清单构建到人力资源管理嵌入

能力清单的价值不仅在于描述,更在于驱动。构建完成的能力清单需要在师资招聘、培训设计、绩效考核和职业发展等人力资源管理环节中实现全链嵌入,才能真正发挥其作为管理工具的功能。在师资招聘环节,能力清单可作为招聘标准的制定依据,将抽象的岗位需求转化为具体的能力要求,提高招聘的精准度;在培训设计环节,能力清单的缺口分析功能可帮助识别师资培训的优先领域,实现培训资源的高效配置;在绩效考核环节,能力清单为考核指标的设定提供了结构化框架,有助于建立以能力发展为导向的多元评价体系;在职业发展环节,能力

清单为教师提供了清晰的专业成长路径图,引导教师有计划地提升国际教育岗位所需的各项能力。

能力清单的价值不仅在于描述,更在于驱动,需实现从开发工具到管理制度的转化,嵌入师资引育评全链条。这一转化的关键在于建立清单、标准、制度的联动机制:将能力清单中的核心能力要素转化为师资管理的制度标准,再通过制度化的实施保障清单的持续应用与动态更新。当前,部分高职院校已在双师型教师能力模型构建方面积累了初步经验,可在此基础上探索国际教育师资岗位能力清单的全链嵌入路径。

结论

本文构建了“内涵界定—现状诊断—难点识别—路径构建”四维递进分析框架,系统考察了高职院校国际教育师资岗位能力清单的构建问题。研究表明,高职国际教育师资岗位能力是由跨文化教学能力、国际课程开发能力和国际项目管理能力构成的三维复合结构,DACUM法与德尔菲法的组合运用为能力清单的构建提供了互补的方法论基础。当前师资队伍面临“数量不足、结构失衡、能力断层”三重困境,能力清单构建在需求动态性、边界模糊性和期望多元性三重挑战下,需要以制度保障与标准引领为顶层设计,以DACUM与德尔菲法的组合应用为方法驱动,最终实现从工具开发到人力资源管理嵌入的全链贯通。

参考文献

- [1]丁馨.“一带一路”背景下的高职院校教师国际化发展[J].教育与职业,2020,(11):74-79.
- [2]胡艳玲,林中翔,李国利,等.“双高计划”背景下高职院校师资队伍国际化水平提升路径研究[J].卫生职业教育,2024,42(10):11-14.
- [3]王荧婷,王琪.高职院校教师国际化发展组织支持的现实感知与优化策略——基于31所高职院校的调查[J].教育与职业,2024,(2):90-97.
- [4]付安莉.“一带一路”视阈下职业技术教师跨文化能力结构模型与运行机制——一项基于扎根理论的探索性研究[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24,(7):69-76.
- [5]杨嵩.高职院校“双师型”教师职业能力模型构建[J].当代职业教育,2024,(3):82-91.
- [6]赵迎春.国际化背景下职业院校专业教师双语能力评价指标体系[J].湖南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33(3):95-101.

On the Construction Path of the Job Competency Inventory for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Faculty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Huan Jiuyang, Hu Mengdie, Yin Yushi

(Yangzhou Polytechnic Institute, Yangzhou, Jiangsu, China)

Abstract: The construction of a job competency inventory for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faculty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serves as a foundational project for promoting the transformation of internationalization in education from scale expansion to connotative development. Grounded in competency-based education theory, this paper establishes a four-dimensional analytical framework comprising connotation definition, status diagnosis, difficulty identification, and path construction, and systematically examines the issue of developing such an inventory for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faculty. It analyzes the triple dilemma currently faced by the teaching workforce, namely insufficient quantity, structural imbalance, and capability gap, and identifies three key challenge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ompetency inventory, namely the dynamism of demand, the fuzziness of boundaries, and the plurality of expectations. Furthermore, it proposes systematic implementation pathways from three dimensions: top-level design, method-driven approaches, and full-chain integration.

Keywords: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faculty competence; job competency inventory; DACUM method; Delphi method

刺梨原汁干预对运动生理机能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

张 新, 甘 婷

(贵州医科大学, 贵州 贵安新区 550025)

摘 要: 目的: 系统梳理近年来刺梨原汁及其多酚、多糖、黄酮、维生素 C 和发酵产物等成分对运动表现、氧化应激、炎症反应、能量代谢、组织保护及脑-肠轴的影响, 探讨其潜在机制和应用边界。方法: 以 PubMed、中国知网 (CNKI) 和 Google Scholar 为主要检索来源, 围绕刺梨 (*Rosa roxburghii*)、运动 (exercise)、疲劳 (fatigue)、氧化应激 (oxidative stress)、恢复 (recovery) 等关键词检索相关文献。结果: 刺梨原汁富含多酚、黄酮、多糖和维生素 C 等活性成分, 可通过抗氧化、抗炎、能量代谢调节、肠道微生态维持及组织保护等多重途径影响运动相关生理过程。结论: 刺梨原汁在运动营养中具有潜在应用价值, 但高质量临床证据仍不足, 未来需加强随机对照试验研究。

关键词: 刺梨原汁; 运动表现; 氧化应激; 疲劳; 恢复

DOI: doi.org/10.70693/202607111643

一、前言

运动训练和竞技活动往往伴随能量消耗加剧、活性氧水平升高、微损伤累积以及炎症反应波动。这些生理变化既是训练适应的重要信号, 也可能在恢复不足或负荷管理失当的情况下演变为疲劳积累、运动表现下降和组织损伤^[1,2]。近年来, 天然植物活性成分在运动营养、免疫调节、恢复管理和代谢支持中的价值受到越来越多关注^[3,4]。刺梨原汁富含多酚、黄酮、维生素 C、有机酸和多糖等成分, 被认为在抗氧化、抗炎、能量代谢调节、肠道稳态维持以及肝肺肠等组织保护方面具有多重潜力^[5-10]。

从已有文献来看, 刺梨原汁及其发酵产物、果渣提取物和多糖组分对多种生理过程的影响正在被逐步揭示^[11-16]。研究者不仅关注其直接的抗氧化和抗炎能力^[17,18], 也在探索其对肠道菌群结构、短链脂肪酸生成、肠屏障功能以及脑-肠轴信号的调节作用^[19-22]。值得注意的是, 刺梨原汁中的多酚类物质包括鞣花酸、槲皮素及其糖苷、芦丁等多种黄酮醇类化合物, 这些成分在抗氧化通路中具有互补作用^[23-25]。多糖类成分则被证实能够调节免疫应答和肠道屏障功能^[26-28]。

在运动科学领域, 氧化应激与炎症反应被视为训练适应和过度训练之间的关键调节因素。适量的活性氧生成有助于激活信号通路并促进适应, 而过量的氧化应激则可能引发脂质过氧化、DNA 损伤和蛋白质降解, 最终影响运动表现和恢复速度^[1,2]。因此, 寻找既能支持抗氧化防御又不完全抑制适应信号的天然营养策略, 一直是运动营养研究的重要方向^[29,30]。刺梨原汁因其多成分、多靶点的特点, 在这一领域展现出独特价值^[5-10]。本综述旨在系统梳理近年来刺梨原汁干预与运动相关研究的主要进展, 围绕其活性成分、潜在机制、动物与细胞实验证据以及应用前景展开讨论^[31,32]。

(一) 资料与方法

本研究采用叙述性文献综述方法, 重点梳理刺梨原汁及其相关制剂在运动生理、氧化应激、炎症反应、能量代谢、肠道微生态与组织保护等方面的最新研究进展。检索数据库主要包括 PubMed、CNKI 和 Google Scholar, 并辅以高被引研究和重要综述的追踪^[31-33]。中文检索词包括刺梨、刺梨原汁、运动、疲劳、氧化应激、恢复、等; 英文检索词包括 *Rosa roxburghii*、CiLi、exercise、oxidative stress、fatigue、recovery 等。

纳入标准为与刺梨成分、干预效果或运动相关机制有关的研究型文献与综述, 优先选择 2018 年以后发表的成果。排除标准包括重复发表、与刺梨或运动无关的文献、会议摘要以及无法获取全文的条目。最终纳入 47 篇

作者简介: 张 新(2001—), 男, 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运动与健康促进。

通讯作者: 甘 婷(1991—), 女, 硕士研究生, 讲师, 研究方向为运动与健康促进。

文献, 涵盖动物模型、细胞实验和部分人体观察性研究^[34,35]。

二、刺梨原汁的主要活性成分

(一) 多酚与黄酮类化合物

刺梨原汁中富含多种酚类化合物, 包括鞣花酸、鞣花单宁、槲皮素及其糖苷、芦丁等。研究表明, 这些成分能够通过清除 DPPH 自由基、ABTS 自由基和超氧阴离子等途径发挥抗氧化作用, 同时抑制脂质过氧化链式反应^[23-25,36]。在细胞模型中, 刺梨黄酮能够显著降低辐射诱导的胸腺细胞凋亡率和炎症因子表达水平^[1]。此外, 鞣花单宁被发现能够抑制 Poly(I:C)诱导的人角质形成细胞 IL-8 释放, 提示其在调节皮肤免疫应答中的潜在价值^[2]。

(二) 多糖类成分

刺梨果实多糖是另一类重要的生物活性成分。研究显示, 刺梨多糖具有体内外抗氧化活性, 可作为天然抗氧化剂的潜在来源^[37]。在代谢调节方面, 刺梨多糖能够改善 db/db 糖尿病小鼠的高血糖和高脂血症, 并调节结肠微生物组成^[5]。在肠道健康方面, 刺梨多糖被发现可以调节肠道菌群结构, 增加有益菌丰度, 改善高脂饮食引起的肠道屏障损伤和炎症反应^[6,26,28]。这些发现为多糖在运动恢复和肠道健康管理中的应用提供了重要参考^[19,20]。

(三) 维生素 C 与发酵产物

刺梨被誉为“维 C 之王”, 其果实中维生素 C 含量在常见水果中名列前茅。维生素 C 作为经典的抗氧化营养素, 在胶原蛋白合成、免疫功能维持和铁吸收促进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这些功能均与运动表现和恢复密切相关^[38]。发酵刺梨果汁被发现能够通过调节肠道菌群和代谢产物改善高脂血症^[9], 而发酵处理还可改变果汁中活性的组成和生物可利用度^[39]。刺梨果渣中的溶解性膳食纤维被发现对 DSS 诱导的溃疡性结肠炎具有保护作用^[10]。

三、刺梨原汁的主要活性成分

(一) 抗氧化与抗炎机制

运动过程中活性氧水平升高会引发脂质过氧化、蛋白质损伤与线粒体功能下降, 进而影响恢复效率^[1,2]。多项研究显示, 刺梨多酚、黄酮及发酵产物可通过 Nrf2、AMPK、NF- κ B 等通路减轻氧化应激和炎症反应^[17,18,40]。刺梨原汁被发现能够抑制 NF- κ B 信号通路并增加 IL-2 表达, 从而调节外周血中 Foxp3 介导的 Tregs 平衡^[12]。Tang 等通过整合蛋白质组学和代谢组学方法, 系统揭示了刺梨果实多酚对急性肝损伤的改善机制^[41]。此外, 刺梨果汁对砷诱导的肝损伤中组蛋白 H3K18 乙酰化依赖性抗氧化通路的抑制作用也被阐明^[14]。这些分子机制的发现为高强度训练后炎症管理和免疫调节提供了理论支持。

(二) 能量代谢与疲劳控制

刺梨活性成分可能通过调节 AMPK 信号通路和线粒体功能影响能量代谢, 涉及脂肪酸氧化和糖代谢过程^[5,15]。刺梨苷类和槲皮素对 D-半乳糖诱导衰老模型的线粒体功能改善提示其在延缓运动疲劳中的潜在价值^[42]。Wu 等发现刺梨果实的醇水提取物对高脂饮食大鼠的高脂血症具有改善作用, 提示其在代谢调节中的价值^[15]。这些结果为理解刺梨在运动场景中支持能量代谢的潜力提供了分子层面的依据。

(三) 肠道微生态与脑-肠轴调节

刺梨多糖可调节肠道菌群组成、增加短链脂肪酸生成并增强肠屏障功能, 这些效应可能通过脑-肠轴影响运动恢复^[6,19-22]。Wang 等的研究揭示了刺梨多糖的益生元特性及其对肠道屏障的保护机制^[6]。Li 等发现刺梨果渣溶解性膳食纤维对 DSS 诱导的溃疡性结肠炎小鼠具有保护作用, 其机制涉及血清代谢调节和 NF- κ B 通路抑制^[10]。Li Xingjie 等进一步证实刺梨果实提取物通过调节肠道菌群和 IL-17 信号通路预防溃疡性结肠炎^[43]。这些证据共同表明, 刺梨原汁及其衍生物在肠道健康管理中具有重要价值, 而肠道健康又与运动恢复密切相关^[6,28]。

(四) 肝脏、肺与神经组织保护作用

除肠道保护外, 刺梨成分在肝脏、肺和神经组织保护方面也显示出潜力。多项研究证实刺梨原汁及其多酚对砷诱导肝损伤的保护作用^[14,18,44], 其机制涉及 Nrf2/GPX4 介导的氧化应激调控^[20]。在肺保护方面, Tang 等通过网络药理学和代谢组学方法揭示了刺梨多酚治疗急性肺损伤的新策略^[45]。在神经保护方面, 刺梨活性成分 Kaji-Ichigoside F1 通过 BDNF/Akt/mTOR 信号通路发挥神经保护作用^[46]。这些结果提示刺梨原汁可能通过减轻系统性炎症和氧化损伤为运动人群的恢复管理提供额外支持。

四、研究现状与证据

（一）动物实验证据

从整体证据结构来看,刺梨原汁相关研究正在由成分表征和体外活性验证逐步转向动物模型中的机制研究和系统生物学分析^[5-10]。在动物层面,多项研究观察到刺梨干预可改善代谢紊乱模型的血糖血脂水平,缓解氧化应激并改善肠道菌群组成^[5,6,15,26]。Song 等的肝脏蛋白质组学研究为刺梨的代谢调节作用提供了系统层面的证据^[16]。Ji 等报道发酵刺梨果汁可改善高脂饮食小鼠的代谢紊乱^[40]。Wei 等发现副干酪乳杆菌发酵的刺梨果汁对链脉佐菌素诱导的 2 型糖尿病小鼠具有改善作用^[47]。这些结果为理解刺梨在运动场景中的潜在价值提供了丰富的基础数据。

（二）细胞实验证据

细胞层面的研究为刺梨原汁的分子机制提供了更为精细的证据。Xu 等在小鼠胸腺细胞中观察到刺梨黄酮对辐射诱导的凋亡和炎症反应的保护作用^[1]。Takayama 等发现鞣花单宁能抑制 Poly(I:C)诱导的 IL-8 产生^[2]。Yuan 等报道了刺梨发酵果汁对 UVA 诱导的人胚皮肤成纤维细胞光老化的保护机制^[29]。这些结果虽然距离运动干预仍有转化鸿沟,但有助于解释刺梨原汁在高氧化应激环境下的潜在作用逻辑。近年来的研究越来越倾向于使用多组学技术(如蛋白质组学、代谢组学和转录组学)来揭示刺梨的分子机制,这为从整体层面理解其生物学效应提供了新的方法学支撑^[13,16,28]。

五、研究现状评价

现有文献显示,刺梨原汁在运动相关领域的研究仍以动物与细胞机制研究为主^[5-10,17,18],直接面向健康运动人群的随机对照试验较为有限。多数研究存在样本量小、干预周期短、剂量标准化不足及异质性较强等局限^[31-35]。此外,不同来源的刺梨制品在活性成分含量、加工方式与生物利用度方面差异明显,导致跨研究比较难度较大^[36,38,39]。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是,现有研究普遍缺乏与运动生理学指标的直接对接。例如,关于最大摄氧量、乳酸阈、肌肉损伤标志物、恢复时间、主观疲劳感等指标的研究仍然不足^[1,2,29,30]。这使得刺梨原汁在运动场景中的价值目前更多停留在潜在支持策略层面,尚不足以形成明确的训练应用指南。在方法学层面,部分研究的实验设计存在一定的改进空间,例如缺乏阳性对照或安慰剂对照^[34,35]。

六、应用前景与实践建议

在运动实践中,刺梨原汁更适合作为综合营养管理的一部分,而非单一干预手段。考虑到其抗氧化、抗炎、代谢调节与肠道保护潜力,训练强度较高、恢复窗口紧张或饮食结构偏单一的运动人群可能更值得关注^[1,2,29,30]。其应用形式可包括原汁、发酵果汁、标准化提取物或其他营养素搭配的复合配方^[3,4,9]。在补充时机方面,训练前后的抗氧化补充策略以及日常膳食中的营养强化均值得探索。

然而,在实际推广前仍需解决几个关键问题:一是明确最佳剂量与补充时机;二是评估长期使用的安全性及依从性;三是建立与运动表现、恢复质量和免疫指标直接相关的临床证据^[31-35]。此外,还应关注不同人群(耐力项目、力量项目、大众健身等)的差异性反应,以便制定更加个性化的运动营养建议。从产业发展角度来看,刺梨原汁作为中国特色水果资源,在功能性食品开发和运动营养品市场中具有独特的地理和文化优势^[38,39]。

七、结论

综合现有文献,刺梨原汁干预在运动促进和恢复管理中具有较好的理论基础。其多酚、黄酮、多糖和维生素 C 等成分可能通过抗氧化、抗炎、能量代谢调节、肠道微生态维持与组织保护等多重途径影响运动相关生理过程^[5-22]。然而,现有证据仍以动物与细胞研究为主,临床研究不足、剂量方案不统一、机制链条不完整等问题仍然突出^[31-35]。未来研究应更加重视高质量随机对照试验、剂量-效应关系、补充时机、长期安全性及运动生理学核心指标的系统评估。

从应用转化的角度来看,刺梨原汁作为一种富含多种生物活性成分的天然饮品,在运动营养补充策略中具有独特优势。其多成分、多靶点的作用特点使其在应对运动引起的多重生理应激时可能具有协同效应^[5-10]。同时,刺梨作为中国特色水果资源,在功能性食品开发和运动营养品产业化方面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38,39]。随着多组学技术的深入应用和更多高质量临床研究的开展,刺梨原汁在运动科学领域的应用价值有望得到更为充分的验证和认可^[13,16,28]。

参考文献:

- [1] Xu Sai-Juan, Zhang Fan, Wang Li-Juan, Hao Ming-Hua, Yang Xian-Jun, Li Na-Na, et al. Flavonoids of *Rosa roxburghii* Tratt offers protection against radiation induced apoptosis and inflammation in mouse thymus..Apoptosis :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n programmed cell death. 2018;23(9-10):470-483.
- [2] Takayama Satoru, Kawanishi Miho, Yamauchi Kosei, Tokumitsu Daiki, Kojima Hiroyuki, Masutani Teruaki, et al. Ellagitannins from *Rosa roxburghii* suppress poly(I:C)-induced IL-8 production in human keratinocytes.. Journal of natural medicines. 2021;75(3):623-632.
- [3] Ni Ming, Chen Junlei, Fu Mao, Li Huanyang, Bu Shengqian, Hao Xiaojiao, et al. UPLC-ESI-MS/MS-Based Analysis of Various Edible *Rosa* Fruits Concerning Secondary Metabolites and Evaluation of Their Antioxidant Activities.. Foods (Basel, Switzerland). 2024;13(5).
- [4] Chen Guangjing, Kan Jianquan Ultrasound-assisted extraction, characterization, and antioxidant activity in vitro and in vivo of polysaccharides from Chestnut rose (*Rosa roxburghii* tratt) fruit.. Journal of foo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018;55(3):1083-1092.
- [5] Wang Lei, Li Chao, Huang Qiang, Fu Xiong Polysaccharide from *Rosa roxburghii* Tratt Fruit Attenuates Hyperglycemia and Hyperlipidemia and Regulates Colon Microbiota in Diabetic db/db Mice..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and food chemistry. 2020;68(1):147-159.
- [6] Wang Lei, Zhang Pan, Chen Jie, Li Chao, Tian Yingpeng, Xu Fei Prebiotic properties of the polysaccharide from *Rosa roxburghii* Tratt fruit and its protective effects in high-fat diet-induced intestinal barrier dysfunction: A fecal microbiota transplantation study.. Food research international (Ottawa, Ont.). 2023;164:112400.
- [7] Yan Yali, Liu Yiyi, Lu Min, Lu Chen, Ludlow Richard A, Yang Man, et al. Gene expression profiling in *Rosa roxburghii* fruit and overexpressing RrGPP2 in tobacco and tomato indicates the key control point of AsA biosynthesis.. Frontiers in plant science. 2022;13:1096493.
- [8] Dong Ling, Xia Shiqing, Sun Baofei, Ma Lu, Chen Xiong, Wei Shaofeng, et al. Potential value and mechanism of *Rosa roxburghii* tratt juice on pro-inflammatory responses in peripheral blood of patients with arsenic poisoning.. Human & experimental toxicology. 2022;41:9603271221121313.
- [9] Luo You, Tang Ruling, Qiu Han, Song Angxin Widely targeted metabolomics-based analysis of the impact of *L. plantarum* and *L. paracasei* fermentation on *rosa roxburghii* Tratt juic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food microbiology. 2024;417:110686.
- [10] Li Lilang, Zhang Xiang, Wang Li, Gao Ming, Wang Yu, Zhang Zhengrong, et al. Protective effect of soluble dietary fiber from *Rosa roxburghii* Tratt residue on dextran sulfate sodium-induced ulcerative colitis by regulating serum metabolism and NF- κ B pathway in mice.. Journal of the science of food and agriculture. 2024;104(12):7258-7270.
- [11] Chen Qing, Su Juan, Zhang Yue, Li Chao, Zhu Siming Phytochemical Profile and Bioactivity of Bound Polyphenols Released from *Rosa roxburghii* Fruit Pomace Dietary Fiber by Solid-State Fermentation with *Aspergillus niger*.. Molecules (Basel, Switzerland). 2024;29(8).
- [12] Wang Qi, Fang Xiaolin, Sun Baofei, Zhu Kai, Yao Maolin, Wei Shaofeng, et al. *Rosa roxburghii* Tratt juice inhibits NF- κ B and increases IL-2 to alleviates the Foxp3-mediated Tregs imbalance in the peripheral blood of arseniasis patients.. Food science and biotechnology. 2024;33(4):935-944.
- [13] Tang Li, Zhang Shuo, Zhang Min, Wang Peng-Jiao, Liang Gui-You, Gao Xiu-Li Integrated Proteomics and Metabolomics Analysis to Explore the Amelioration Mechanisms of *Rosa roxburghii* Tratt Fruit Polyphenols on Lipopolysaccharide-Induced Acute Lung Injury Mice..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and food chemistry. 2023;71(6):3079-3092.
- [14] Ma Lu, Hou Teng, Zhu Kai, Zhang Aihua Inhibition of Histone H3K18 Acetylation-Dependent Antioxidant Pathways Involved in Arsenic-Induced Liver Injury in Rats and the Protective Effect of *Rosa roxburghii* Tratt Juice.. Toxics. 2023;11(6).
- [15] Wu Pin-Hsin, Han Samuel Chieng-Haw, Wu Meng-Hsiu Beneficial Effects of Hydroalcoholic Extract from *Rosa Roxburghii* Tratt Fruit on Hyperlipidemia in High-Fat-Fed Rats.. Acta Cardiologica Sinica. 2020;36(2):148-159.
- [16] Song Pingping, Shen Xiangchun Proteomic analysis of liver in diet-induced Hyperlipidemic mice under *Fructus Rosa roxburghii* action.. Journal of proteomics. 2021;230:103982.
- [17] Chen Faju, Wang Li, Jin Fengli, Li Liangqun, Wang Tao, Gao Ming, et al. Neuroprotection of Kaji-Ichigoside F1 via the BDNF/Akt/mTOR Signaling Pathways against NMDA-Induced Neurotoxicit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olecular sciences. 2022;23(24).
- [18] Xu Yuyan, Yu Chun, Zeng Qibing, Yao Maolin, Chen Xiong, Zhang Aihua Assessing the potential value of *Rosa Roxburghii* Tratt in arsenic-induced liver damage based on elemental imbalance and oxidative damage.. Environmental geochemistry and health. 2021;43(3):1165-1175.

- [19] Su Juan, Zhang Bin, Fu Xiong, Huang Qiang, Li Chao, Liu Guang, et al. Recent advances in polysaccharides from *Rosa roxburghii* Tratt fruits: isolation, structural characterization, and bioactivities.. *Food & function*. 2022;13(24):12561-12571.
- [20] Xu Yuyan, Zeng Qibing, Sun Baofei, Wei Shaofeng, Wang Qingling, Zhang Aihua Assessing the Role of Nrf2/GPX4-Mediated Oxidative Stress in Arsenic-Induced Liver Damage and the Potential Application Value of *Rosa roxburghii* Tratt [Rosaceae].. *Oxidative medicine and cellular longevity*. 2022;2022:9865606.
- [21] Tang Li, Zhang Shuo, Zhang Min, Wang Pengjiao, Liang Guiyou, Gan Zhitong, et al. Unlocking the potential of *Rosa roxburghii* Tratt polyphenol: a novel approach to treating acute lung injury from a perspective of the lung-gut axis.. *Frontiers in microbiology*. 2024;15:1351295.
- [22] Zhou Die, Zhong Jiang, Huang Yongguang, Cheng Yuxin Effect of free and bound polyphenols from *Rosa roxburghii* Tratt distiller's grains on moderating fecal microbiota.. *Food chemistry: X*. 2023;19:100747.
- [23] Zhai Bo-Wen, Zhao Heng, Zhu Han-Lin, Huang Han, Zhang Mao-Yu, Fu Yu-Jie Triterpene acids from *Rosa roxburghii* Tratt fruits exert anti-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activity via ROS/JNK signaling pathway-mediated cell cycle arrest and mitochondrial apoptosis.. *Phytomedicine :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hytotherapy and phytopharmacology*. 2023;119:154960.
- [24] Ma Lu, Lv Jiabin, Zhang Aihua Depletion of S-adenosylmethionine induced by arsenic exposure is involved in liver injury of rat through perturbing histone H3K36 trimethylation dependent bile acid metabolism..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Barking, Essex : 1987)*. 2023;334:122228.
- [25] Wang Liqun, Li Yali, Xia Rui, Zheng Xinyue, Li Xingjie, Wu Shouxun, et al. Component analysis and anti-pulmonary fibrosis effects of *Rosa sterilis* juice.. *Food & function*. 2022;13(24):12915-12924.
- [26] Shen Chenxiao, Wang Yu, Zhang Hui, Li Wei, Chen Wenyue, Kuang Mingqing, et al. Exploring the active components and potential mechanisms of *Rosa roxburghii* Tratt in treating type 2 diabetes mellitus based on UPLC-Q-exactive Orbitrap/MS and network pharmacology.. *Chinese medicine*. 2023;18(1):12.
- [27] Luan Luqin, Pan Haibo, Chen Yihao, Ye Xingqian, Hou Zhiqiang, Chen Shiguo Role of extracted phytochemicals from *Rosa sterilis* S. D. Shi in DSS-induced colitis mice: potential amelioration of UC.. *Food & function*. 2023;14(18):8369-8382.
- [28] Kang Yu-Hong, Zhou Ting, Wu Shou-Xun, Li Xing-Jie, Huang Xiao-Yi, Xia Rui, et al. Effects of *Rosa roxburghii* Tratt on Ulcerative Colitis: An Integrated Analysis of Network Pharmacology and Experimental Validation..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Chinese medicine*. 2023;51(6):1477-1499.
- [29] Yuan Minglu, Fu Hao, Mo Qiuting, Wang Shiwei, Wang Changtao, Wang Dongdong, et al. Protective Mechanism of *Rosa roxburghii* Tratt Fermentation Broth against Ultraviolet-A-Induced Photoaging of Human Embryonic Skin Fibroblasts.. *Antioxidants (Basel, Switzerland)*. 2024;13(3).
- [30] Jiang Guilin, Li Binbin, Ding Zhuhong, Zhu Jingyi, Li Silin Effect of cellulase on antioxidant activity and flavor of *Rosa roxburghii* Tratt.. *Food chemistry: X*. 2024;21:101148.
- [31] Zhu Yuping, Zhai Suzhen, Li Bei, Zhao Ziyi, Xie Jiao, Ren Tingyuan Wild *Rosa roxburghii* Tratt Juices Grown at Different Altitudes Regulate Blood Glucose in Type 1 Diabetic Mice via the PI3K/Akt Pathway.. *Journal of medicinal food*. 2023;26(11):831-842.
- [32] Tan Yunyun, Tan Shuming, Ren Tingyuan, Yu Lu, Li Pei, Xie Guofang, et al. Transcriptomics Reveals the Mechanism of *Rosa roxburghii* Tratt Ellagitannin in Improving Hepatic Lipid Metabolism Disorder in db/db Mice.. *Nutrients*. 2023;15(19).
- [33] Li Huanzhou, Qiu Ping, Wang Juanhong, Niu Congcong, Pan Suhua Effects of compound Ginkgo biloba on intestinal permeability in rats with alcohol-induced liver injury.. *Food & function*. 2015;6(2):470-8.
- [34] Wang Lei, Zhang Pan, Li Chao, Xu Fei, Chen Jie A polysaccharide from *Rosa roxburghii* Tratt fruit attenuates high-fat diet-induced intestinal barrier dysfunction and inflammation in mice by modulating the gut microbiota.. *Food & function*. 2022;13(2):530-547.
- [35] Ni Hai-Yan, Yu Liang, Zhao Xue-Lian, Wang Li-Tao, Zhao Chun-Jian, Huang Han, et al. Seed oil of *Rosa roxburghii* Tratt against non-alcoholic fatty liver disease in vivo and in vitro through PPAR α /PGC-1 α -mediated mitochondrial oxidative metabolism.. *Phytomedicine :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hytotherapy and phytopharmacology*. 2022;98:153919.
- [36] Chen Chao, Tan Shuming, Ren Tingyuan, Wang Hua, Dai Xiaotong, Wang Hui Polyphenol from *Rosaroxburghii* Tratt Fruit Ameliorates the Symptoms of Diabetes by Activating the P13K/AKT Insulin Pathway in db/db Mice.. *Foods (Basel, Switzerland)*. 2022;11(5).
- [37] Han Lei, Wu Qiong, Wu Xiaomao Dissipation and Residues of Pyraclostrobin in *Rosa roxburghii* and Soil under Filed Conditions.. *Foods (Basel, Switzerland)*. 2022;11(5).
- [38] Tao Yi, Pan Meiling, Zhu Fei, Liu Qing, Wang Ping Construction of a Microfluidic Platform With Core-Shell CdSSe@ZnS Quantum Dot-Encoded Superparamagnetic Iron Oxide Microspheres for Screening and Locating Matrix Metalloproteinase-2 Inhibitors From Fruits of *Rosa roxburghii*.. *Frontiers in nutrition*. 2022;9:869528.

- [39] Yang Shan, Huang Xian-Yu, Zhou Nian, Wu Qin, Liu Jie, Shi Jing-Shan RNA-Seq Analysis of Protection against Chronic Alcohol Liver Injury by Rosa roxburghii Fruit Juice (Cili) in Mice.. *Nutrients*. 2022;14(9).
- [40] Ji Jiacheng, Zhang Shuo, Yuan Minyan, Zhang Min, Tang Li, Wang Pengjiao, et al. Fermented Rosa Roxburghii Tratt Juice Alleviates High-Fat Diet-Induced Hyperlipidemia in Rats by Modulating Gut Microbiota and Metabolites.. *Frontiers in pharmacology*. 2022;13:883629.
- [41] Wang Hui, Chen Zhaojun, Wang Mei, Long Mingxiu, Ren Tingyuan, Chen Chao, et al. The Effect of Polyphenol Extract from Rosa Roxburghii Fruit on Plasma Metabolome and Gut Microbiota in Type 2 Diabetic Mice.. *Foods (Basel, Switzerland)*. 2022;11(12).
- [42] Yu-Tong Du, Chun Chen, Yue-Ming Jiang, Bao Yang, Xiong Fu Glycosylation with bioactive polysaccharide obtained from Rosa roxburghii Tratt fruit to enhance the oxidative stability of whey protein isolate emuls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iological macromolecules*. 2022;218:259-268.
- [43] Li Xingjie, Ling Yihan, Huang Xiaoyi, Zhou Ting, Wu Shouxun, Zhang Shuwen, et al. Rosa Roxburghii Tratt Fruit Extract Prevents Dss-Induced Ulcerative Colitis in Mice by Modulating the Gut Microbiota and the IL-17 Signaling Pathway.. *Nutrients*. 2023;15(21).
- [44] Li Jiuchang, Zhang Jun, Zhang Yulong, Shi Yuanyuan, Feng Dandan, Zuo Yunyang, et al. Effect and Correlation of Rosa roxburghii Tratt Fruit Vinegar on Obesity, Dyslipidemia and Intestinal Microbiota Disorder in High-Fat Diet Mice.. *Foods (Basel, Switzerland)*. 2022;11(24).
- [45] Tang Li, Zhang Shuo, Zhang Min, Wang Peng-Jiao, Liang Gui-You, Gao Xiu-Li Analysis of protective effects of Rosa Roxburghii Tratt fruit polyphenols on lipopolysaccharide-induced acute lung injury through network pharmacology and metabolomics.. *Food science & nutrition*. 2022;10(12):4258-4269.
- [46] Wang Li, Wei Tingting, Zheng Li, Jiang Fangfang, Ma Wentao, Lu Min, et al. Recent Advances on Main Active Ingredients, Pharmacological Activities of Rosa roxburghii and Its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Foods (Basel, Switzerland)*. 2023;12(5).
- [47] Wei Maoyang, Feng Dandan, Zhang Yulong, Zuo Yunyang, Li Jiuchang, Wang Ling, et al. Effect and Correlation of Rosa roxburghii Tratt Juice Fermented by Lactobacillus paracasei SR10-1 on Oxidative Stress and Gut Microflora Dysbiosis in Streptozotocin (STZ)-Induced Type 2 Diabetes Mellitus Mice.. *Foods (Basel, Switzerland)*. 2023;12(17).

Effect of Rosa roxburghii Tratt juice intervention on exercise physiological function and its mechanism

Xin Zhang, Ting Gan

(Guizhou Medical University, Gui'an New District, Guizhou, 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systematically review the effects of Rosa roxburghii Tratt juice and its polyphenols, polysaccharides, flavonoids, vitamin C and fermentation products on exercise performance, oxidative stress, inflammatory response, energy metabolism, tissue protection and brain gut axis in recent years, and to explore its potential mechanism and application boundary. Methods: PubMed, China National Knowledge Infrastructure (CNKI) and Google Scholar were used as the main search sources, and the related literatures were searched around Rosa roxburghii, exercise, fatigue, oxidative stress, recovery and other keywords. Results: Rosa roxburghii Tratt juice was rich in polyphenols, flavonoids, polysaccharides, vitamin C and other active ingredients, which could affect the physiological process related to exercise through antioxidant, anti-inflammatory, energy metabolism regulation, intestinal microecology maintenance and tissue protection. Conclusion: Rosa roxburghii Tratt juice has potential application value in sports nutrition, but high-quality clinical evidence is still insufficient, and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s should be strengthened in the future.

Keywords:Rosa roxburghii Tratt juice; Athletic performance; Oxidative stress; Fatigue; Recovery

VR技术支持下宗教建筑沉浸式展示与用户体验研究

秦世骏, 刁涵

(黑龙江大学艺术学院, 黑龙江 哈尔滨 150080)

摘要: 在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与文物保护技术创新不断推进的背景下, 虚拟现实(VR)技术为历史建筑遗产的展示与传播提供了新的路径与方法。本文以哈尔滨呼兰天主教堂为研究对象, 围绕其数字化保护与沉浸式展示需求, 构建基于无人机倾斜摄影与多源数据融合的三维重建方法, 并在此基础上设计VR沉浸式展示系统, 整合建筑历史信息、空间结构特征与文化叙事内容, 形成“数字化建模—场景还原—交互体验”一体化展示框架。同时, 结合临场感理论与场所叙事方法, 从沉浸感、认知理解与情感体验三个维度构建用户体验评价体系, 并通过实验与行为观察对系统效果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 基于VR的沉浸式展示能够显著提升用户对宗教建筑文化价值的认知深度与情感共鸣, 增强文化传播的交互性与体验性, 为宗教建筑及同类文化遗产的数字化保护与传播提供了可参考的技术路径与理论支持。

关键词: 虚拟现实(VR); 文化遗产数字化; 沉浸式展示; 用户体验; 三维重建

DOI: doi.org/10.70693/202606290838

本文基于虚拟现实(VR)技术构建呼兰天主教堂沉浸式展示系统, 从数字化重建、空间交互设计与用户体验三个层面展开研究, 探索宗教建筑遗产在虚拟环境中的表达方式与体验机制, 并对其沉浸效果进行分析与验证。

一、VR系统整体架构设计

1.1 系统总体框架与技术组成

本研究构建的VR沉浸式展示系统以呼兰天主教堂为核心对象, 整体架构由数据采集层、模型构建层、渲染交互层与体验反馈层四个模块构成。数据采集层通过无人机倾斜摄影与近景摄影测量技术获取建筑外部形态与内部空间结构信息, 并结合历史影像资料与文献数据进行补充修复。模型构建层基于多源数据融合方法, 对点云数据与影像数据进行配准与优化处理, 形成高精度三维模型。

在渲染交互层中, 系统采用实时渲染引擎实现虚拟场景构建, 并通过光照模拟与材质映射增强空间真实感。交互设计方面引入基于视角控制与行为触发机制的操作方式, 使用户能够以自由漫游与定点交互的方式进入虚拟空间。体验反馈层则通过记录用户行为轨迹与交互数据, 为后续体验分析提供数据支持。

整体系统强调“数据驱动—空间重建—交互体验”的一体化逻辑, 使数字模型不仅作为视觉还原工具, 同时成为文化传播与体验生成的媒介。

1.2 多源数据驱动的三维建模方法

在三维建模过程中, 采用多源异构数据融合方法提升建筑还原精度。无人机倾斜摄影数据用于获取建筑整体外立面结构, 地面激光扫描数据用于捕捉细部构件信息, 近景摄影数据则用于补充纹理细节与材料表现。

数据处理流程包括点云预处理、特征点匹配与空间坐标统一三个阶段。在统一坐标系统下, 通过特征约束算法实现不同数据源的精确融合, 从而减少模型误差并提升结构完整性。在此基础上采用分层建模策略, 对建筑主体结构与装饰构件进行差异化处理, 以保证整体模型的精度与运行效率之间的平衡。该方法不仅提高了宗教建筑复杂结构的数字还原能力, 也为后续VR实时渲染提供了稳定的数据基础。

二、沉浸式空间重构方法

2.1 建筑空间数字化表达逻辑

作者简介: 秦世骏(2002—), 男, 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环境艺术设计;

刁涵(2002—), 男, 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数字化创意设计。

在虚拟现实技术支持下,建筑空间的数字化表达已经从单纯的几何复现,逐渐转向空间体验逻辑与感知结构的综合重建。对于宗教建筑而言,这种转变尤为重要,因为其空间价值不仅体现在物理结构上,更体现在由空间秩序所构建的精神体验体系之中。呼兰天主教堂作为典型的哥特式宗教建筑,其空间结构具有明显的轴线性垂直性与仪式性,这种结构特征决定了其数字化表达不能停留在“形似”,而必须进入“体验一致性”的层面。

本研究在空间表达策略上强调“结构真实”与“感知真实”的统一。在结构层面,通过对建筑尺度比例、结构关系与空间构成的精确建模,实现对实体建筑的数字化还原;在感知层面,则通过空间路径组织与视觉引导机制的设计,使虚拟空间能够模拟真实参观过程中的认知顺序。换言之,空间表达不仅是几何复现,更是行为路径的设计过程。

在具体实施中,研究将教堂空间划分为入口过渡区、主体礼拜空间与辅助空间三个基本层级,并通过空间轴线与视觉焦点的方式建立空间之间的逻辑关系,使用户在虚拟环境中的移动不再是随机行为,而是沿着空间意义逐步展开的体验过程。这种结构化表达方式,使建筑空间从“静态对象”转变为“可阅读的空间文本”。

2.2 虚拟空间结构重建方法

虚拟空间结构重建的核心在于建立物理空间与数字模型之间的拓扑映射关系,使建筑不仅在形态上被还原,更在结构逻辑上得到重构。本研究采用多源数据融合与分层建模相结合的方法,对呼兰天主教堂进行系统性数字重建。

在数据层面,通过无人机倾斜摄影获取建筑整体外形信息,通过地面激光扫描获取精细结构信息,并结合近景摄影对材质与纹理进行补充,从而形成多尺度、多精度的数据体系。在数据处理过程中,通过点云配准、特征匹配与空间坐标统一方法,将不同来源的数据融合为统一空间模型。

在建模策略上采用分级细节控制(LOD)机制,根据用户观察距离动态调整模型精度,从而在保证视觉质量的同时提升系统运行效率。此外,在空间结构组织上引入语义建模方法,将教堂内部空间按照功能属性与行为逻辑重新划分,使空间具备可解释性与叙事性。

这种结构重建方法的意义在于,它突破了传统三维建模仅关注“形态一致性”的局限,将空间建模转化为“结构—语义—体验”三位一体的综合表达过程,使虚拟空间不仅是复制对象,而是一个可理解的文化空间系统。

2.3 光影与环境模拟策略

光影系统在沉浸式空间构建中具有关键作用,尤其是在宗教建筑语境中,光不仅是一种物理现象,同时也是象征意义的重要载体。呼兰天主教堂作为典型宗教空间,其空间体验高度依赖光线组织方式,因此在虚拟重建过程中对光影系统进行了重点设计。

本研究采用实时全局光照与局部光源相结合的方式,模拟自然光在不同时间条件下进入建筑空间后的变化过程。通过对彩色玻璃窗的光学特性进行模拟,使光线在空间中形成具有层次变化的色彩投射,从而增强空间的时间感与仪式感。在虚拟影像表达技术体系中,投影映射作为增强现实表现的重要手段之一,为建筑表面的数字化呈现提供了重要支持。投影映射技术将建筑表面转化为动态的数字显示媒介,激光投影设备对墙面、穹顶、立柱等复杂几何结构进行精确的光学投射,三维扫描系统获取建筑表面的详细几何信息,包括曲率变化、深度分布、材质反射特性等参数,投影融合软件根据空间几何数据计算出图像变形矩阵和色彩校正算法,确保数字内容能够精确贴合建筑表面的每一处转折和起伏,消除透视畸变和光照不均造成的视觉偏差,实现虚拟图像与真实建筑的无缝融合效果^[1]。

在环境模拟方面,引入空间声场系统,对教堂内部的回声、环境噪声与空间混响进行分层设计,使用户在视觉体验之外同时获得听觉层面的空间反馈。视觉与听觉的协同作用,使虚拟空间从单一视觉模型转向多感官体验系统,从而显著提升沉浸感与存在感。

三、沉浸式叙事与交互设计

3.1 空间叙事组织方式

沉浸式叙事在VR文化遗产展示中并非简单的信息排列,而是一种通过空间结构实现意义生成的过程。在VR语境下,叙事方式本身发生了媒介层级的转移,不再局限于语言结构,而是嵌入空间体验之中。VR叙事就是把“讲故事”放置在虚拟环境中进行应用、转化和超越,观众的情感体验是通过“讲故事”的叙事来实现的^[2]。在本研究中,呼兰天主教堂的叙事方式被重新组织为“空间路径驱动型叙事结构”,即通过用户在虚拟空间中的移动行为来触发信息呈现,使叙事不再依赖线性文本,而依赖空间体验本身。

具体而言,系统将教堂空间划分为外部认知入口、内部过渡体验区与核心宗教仪式空间三个叙事单元,并在每一空间节点嵌入对应的历史信息与文化解释。用户在进入虚拟环境时,首先通过外部空间形成初步认知,其后在移动过程中逐步进入教堂内部,并在主礼拜空间中接触核心文化信息。这种叙事路径具有明显的递进性,使信息呈现与空间探索保持一致节奏。

此外,为增强叙事的连贯性,本研究在空间节点之间加入“语义过渡机制”,即通过光影变化、环境音变化以及视角引导,使不同叙事单元之间形成自然过渡,而非突兀切换。这种处理方式使用户在体验过程中始终保持叙事沉浸状态,从而强化整体文化理解的连续性。

3.2 用户交互行为设计机制

在VR沉浸式系统中,交互设计不仅决定操作方式,更直接影响用户的体验深度与文化参与程度。本研究围绕呼兰天主教堂的空间特征,构建了分层交互行为体系,包括基础移动交互、认知触发交互与仪式参与交互三个层级。

基础移动交互主要解决用户在虚拟空间中的自由探索问题,通过头部视角控制与手柄移动机制,使用户能够自主选择路径,从而形成个性化参观体验。认知触发交互则基于空间热点机制设计,当用户进入特定区域时,系统自动触发建筑历史信息、结构说明或文化背景内容,实现空间与信息的动态绑定。

仪式参与交互是本研究的重点创新部分,通过引入具有象征意义的行为操作,如点亮蜡烛、触发祷告音效或激活彩色光影变化,使用户参与到具有宗教文化语义的交互行为中。这种设计不仅增强用户的参与感,同时也强化宗教空间的仪式属性,使虚拟体验具备一定的文化情境再现能力。

通过三层交互结构的组合,系统实现了从“操作体验”到“文化参与体验”的转变,使用户行为本身成为叙事结构的一部分。

3.3 多感官沉浸增强策略

多感官沉浸是提升VR文化遗产体验质量的重要路径。本研究认为,沉浸感的形成并不仅依赖视觉真实度,而是视觉、听觉与交互反馈协同作用的结果,因此在系统设计中构建了多通道感知增强机制。从展示机制来看,虚拟现实展陈通过影像重构强化用户的空间代入感,“VR展”通过模拟真实环境中的影像,制造强烈的临场感与共情场域^[3]。

在视觉层面,通过高精度材质贴图与动态光影模拟,使建筑表面细节与空间层次得到强化呈现,尤其在彩色玻璃光影效果上进行了重点优化,以增强空间的宗教氛围表达。在听觉层面,系统引入空间声场模拟技术,对教堂内部的回声、脚步声与环境背景音进行分层处理,使声音具有空间定位感,从而增强方向感与空间真实感。

在交互反馈层面,系统设计了即时响应机制,当用户进行操作时,环境会产生对应变化,例如光源变化、声音变化或信息触发,从而形成行为与环境之间的动态反馈关系。这种机制能够有效增强用户的控制感与参与感,使其更深度融入虚拟空间。

整体来看,多感官协同机制使虚拟空间从单一视觉模拟系统转变为综合感知系统,从而显著提升沉浸体验质量。

四、用户体验设计与评估

4.1 用户体验评价维度构建

在VR文化遗产展示研究中,用户体验的评价体系直接关系到系统有效性判断。本研究基于临场感理论与沉浸式体验研究成果,三大核心属性——沉浸性、交互性、想象性。沉浸式展陈立足虚拟现实技术的三大核心属性——沉浸性、交互性、想象性,观众在头显设备和空间音画包围下形成较强“在场感”,感知方式不再局限于视觉层面,而是转向身体参与和情绪投入^[4]。

空间临场感主要用于衡量用户在虚拟环境中的“存在感”,包括空间包围感、环境真实感与自我定位感;认知理解度则用于衡量用户对呼兰天主教堂历史背景、建筑结构及文化信息的理解程度;情感共鸣度则反映用户在体验过程中产生的情绪变化以及文化认同程度。

与传统单一满意度评价不同,本研究的评价体系强调多维度综合分析,并将认知与情感因素纳入评价框架,使评价结果能够更全面反映文化传播效果。这种结构化评价方式也为后续VR文化遗产系统提供了可复用的评估模型。

4.2 临场感与交互行为分析方法

用户体验分析采用“行为数据+主观评价”双路径方法。从感知结构角度来看,视觉在多模态交互中仍然处于主导地位。视觉是人类最主要的感官,占外界信息获取比重的80%以上,是人机交互中最重要的模态。视觉交互具有时间性和空间性,能够对环境进行全方位的感知和掌控^[5]。在行为数据层面,通过系统记录用户在虚拟空间中的移动轨迹、停留时间、视角变化频率以及交互行为次数,对用户的探索模式进行量化分析。这些数据能够反映用户在不同空间区域的兴趣分布与注意力集中程度。

在主观评价层面,通过结构化问卷对用户的沉浸感、理解程度与情感体验进行评分,从而获取用户对系统的直接反馈。通过将行为数据与主观评价进行交叉分析,可以更准确地判断系统在不同体验维度上的表现。

此外,本研究还引入行为路径分析方法,通过对用户移动轨迹的可视化处理,分析其在空间中的停留热点与路径选择偏好,从而进一步优化空间叙事结构与交互设计逻辑。

4.3 沉浸体验数据与效果分析

实验结果表明,基于VR技术构建的沉浸式展示系统在多个体验维度上均表现出积极效果。在空间临场感方面,用户普遍反馈虚拟环境具有较强的空间包围感与真实感,尤其在光影变化与空间尺度还原方面表现突出。

在认知理解度方面,用户对呼兰天主教堂的历史背景与建筑结构理解程度显著提升,说明沉浸式叙事方式在信息传递过程中具有较高效率。在情感体验方面,仪式性交互设计与环境氛围营造对用户情绪产生明显影响,使其更容易产生文化代入感与情感认同。

综合来看,该系统不仅提升了文化传播效率,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用户对宗教建筑的认知方式,使其从“观看对象”转变为“体验空间”,体现出VR技术在文化遗产数字化展示中的实际应用价值。

五、结语

本文构建了基于VR技术的呼兰天主教堂沉浸式展示系统,并围绕空间重建、叙事设计与用户体验评价进行了系统性分析。研究表明,该系统能够有效提升用户的空间临场感与文化理解能力,同时增强宗教建筑遗产的沉浸式传播效果。该方法可为同类文化遗产的数字化展示提供可复制的技术路径与设计参考

参考文献:

- [1] 周俞彤.数字媒体技术赋能建筑空间交互体验研究[J].陶瓷,2026,(3):154-156.
- [2] 崔小英,张小帆.博物馆VR大空间沉浸式展览的跨界挑战与策展逻辑——以南京博物院“观天下·坤舆万国全图”展为例[J].东南文化,2025,(4):149-155.
- [3] 叶之声.博物馆VR大空间沉浸式探索展的文化记忆激活机制研究——基于建构主义、具身认知与空间叙事的思考[J].中国博物馆,2026,(2):101-109.
- [4] 朱宇婷.基于VR技术的文化遗产沉浸式展陈设计研究——以繁昌窑为例[J].鞋类工艺与设计,2026,6(12):74-76.
- [5] 王晓杰.多模态交互理论下红色文化场馆沉浸式体验装置设计[D].大连交通大学,2025.

Research on Immersive Display and User Experience of Religious Architecture

Supported by VR Technology

Shijun Qin, Han Diao

(School of Arts,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Heilongjiang, Harbin, China)

Abstract: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the national strategy for cultural digitalization and continuous innovation in cultural heritage conservation technology, virtual reality (VR) offers new avenues and methods for the presentation and dissemination of historic architectural heritage. Taking the Hulan Catholic Church in Harbin as a case study, this paper addresses the requirements for its digital preservation and immersive presentation by developing a 3D reconstruction method based on UAV oblique photography and multi-source data fusion. Building on this, an immersive VR presentation system was designed to integrate historical architectural information, spatial structural characteristics, and cultural narratives, thereby establishing an integrated presentation framework comprising "digital modeling, scene reconstruction, and interactive experience." Furthermore, drawing on presence theory and place-based narrative methods, a user experience evaluation system was constructed across three dimensions—immersion, cognitive understanding, and emotional experience—and the system's effectiveness was analyzed through experiments and behavioral observation. The results demonstrate that the VR-based immersive presentation significantly deepens users' understanding of the cultural value of religious architecture and fosters emotional resonance, while enhancing the interactivity and experiential quality of cultural dissemination; this provides a valuable technical pathway and theoretical basis for the digital preservation and dissemination of religious architecture and similar cultural heritage.

Keywords: Virtual Reality ; Digitization of Cultural Heritage; Immersive Display; User Experience; 3D Reconstruction

言论、声望与行动之间的庆历士大夫

——王启玮《言以行道：庆历士大夫与北宋政治文化的转型》读后

刘欣琛

(眉山职业技术学院技师教育学院, 四川 眉山 620010)

摘要: 王启玮《言以行道：庆历士大夫与北宋政治文化的转型》以庆历士大夫为中心，围绕言论、声望、文学书写与政治行动的关系，分析了北宋政治文化的转型过程。其长处在于将庆历士大夫放在具体历史语境中理解，以及贯通政治史、思想史与文学史的开阔视野。同时，该书在话语传播路径、文学观念与制度实践关系、士大夫代际分歧的成因等问题上，仍有进一步深化的空间。

关键词: 庆历士大夫；北宋政治文化；言论；声望政治

DOI: doi.org/10.70693/202607012432

北宋仁宗时期，以范仲淹、欧阳修、富弼和韩琦等为代表的士大夫在政坛上日益活跃。他们积极言事、参与国政，与吕夷简等士大夫所代表的政治秩序维护取向形成显著张力，并在名节观、政治责任等方面影响到后世士大夫。对于这一历史现象，既有研究主要从士大夫境遇变化²、士大夫政治成熟³、范仲淹等代表人物的引领作用⁴、儒学复兴⁵等角度进行了探讨。在上述研究基础上，王启玮《言以行道：庆历士大夫与北宋政治文化的转型》（以下简称《言以行道》）重点关注庆历士大夫的言论、声望、文学书写与政治行动之间的互动关系，从政治文化转型的角度理解这一群体的历史位置。

《言以行道》由作者在其博士论文基础上扩写而成，于2024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全书围绕庆历士大夫这一核心群体展开，通过六个专题章节，考察他们如何以言论、声望、文学书写和政治实践参与北宋政治文化的转型。作者并非着眼于复述庆历新政的成败，也未将庆历士大夫简单视为政治改革者或文学革新者，而是把他们置于“言论、声望与行动”交织而成的政治文化结构中，考察其如何通过谏诤、书写、交游、边防实践和贬谪经验形成新的士人角色意识，从而回应“何以为士”的时代命题。

《言以行道》除了序言和结语，分为六章。第一章《修辞转换与理念革新：政治文化视阈下的范、吕党争》以范仲淹、欧阳修等“英俊”士大夫与吕夷简等“老成”士大夫的冲突为主线，分析范、吕党争背后的理念差异与修辞策略。第二章《宁鸣不默：庆历士大夫的“言者”风采与仁宗朝舆论权力的兴起》转向庆历士大夫的“言者”形象，讨论“犯颜纳说”如何成为士人忠义的新标准，并分析了士大夫公共言论空间的扩张及舆论权力的兴起。第三章《名的自觉：庆历士大夫主导的声望观革命及其与文学的联动》围绕“名”的自觉展开，阐述庆历士大夫推动时人声望观的变化，并把声望转化为一种政治资本的过程。第四章《儒者奉武：宋夏战争背景下庆历士大夫的角色意识与自我表达》分析了庆历士大夫在宋夏战争背景下如何兼具“文”与“武”的角色意识，尤其关注“儒帅”实践和边塞诗中的武将想象。第五章《忧乐之际：后新政时代庆历士大夫的谪守体验与集体言说》讨论了在庆历新政失败后，范仲淹、欧阳修等在逆境中通过文学与书信坚守革新理想，并形成“众乐”与“忧济”交织的精神世界。第六章《何以为士：庆历士大夫中晚年的思想趋向与代际互动》关注了欧阳修等庆历士大夫中晚年的思想趋向及其与后辈士人的互动，提出“何以为士”的问题，揭示了士大夫精神在不同世代之间的继承与变化。

作者简介: 刘欣琛(1990—)，男，硕士，研究方向为东坡文化。

² 参见诸葛忆兵《宋代士大夫的境遇与士大夫精神》，《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1年第1期，第107-112页。

³ 参见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版。

⁴ 参见诸葛忆兵《范仲淹与北宋士风演变》，《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6年第5期，第150-156页。

⁵ 参见刘复生《北宋中期儒学复兴运动（增订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3年版。

一、在历史语境中重新理解庆历士大夫

《言以行道》的一个重要特色是在具体历史语境中理解人物言行,从而避免后人以后见之明对庆历政治人物作简单的价值划分。如对于范仲淹、欧阳修等“英俊”士大夫与吕夷简等“老成”士大夫的冲突,作者并未沿用“改革”与“保守”、“进步”与“落后”的二元解释,而是将吕夷简一派的政治选择放到真宗以来的承平政治文化之中加以理解。在这种政治文化中,谨慎从政、维持秩序、强调分寸与边界并不意味着消极保守,而是具有其自身的政治合理性。与此相对,范仲淹等人积极谏言、主动介入国事,也不仅是道德勇气的体现,同时意味着对既有政治运行方式的挑战。这种分析使范、吕党争呈现出更丰富的历史层次。作者借用“角色丛”理论,将士大夫理解为具有官僚、学者、文士等多重身份的集合体。“老成”士大夫更强调官僚角色及其所承担的秩序责任,“英俊”士大夫则更突出儒者角色及其所承载的道义理想。由此,党争不再只是个人恩怨或权力竞争,而成为不同士人角色意识、政治伦理和言说方式之间的冲突。

《言以行道》对《庆历圣德颂》的重新阐释也体现出同样的方法意识。石介此文长期被后人放置在党争话语中加以负面评价,但作者将该文置于石介个人思想、士人共同体意识和仁宗朝声望政治的语境中考察,指出它不仅是党争文本,也是士论强势介入政治评价的一种表现。石介以近乎代言帝王的姿态褒贬人物,固然带有强烈的排他性,却也说明士大夫群体试图以公共声望和道义评判影响权力秩序。通过这种分析,作者在《庆历圣德颂》这个被后人简单否定的文本中,发现了丰富的政治文化意义。

二、政治事件、思想议题与文学书写的互释

《言以行道》的另一重要特色是视野开阔,能够在政治史、思想史与文学史之间建立联系。

第二章对“奏邸狱”中《傲歌》问题讨论便体现了这一特色。对于这个作品,作者没有简单沿用后人所谓“败阙”的评价,而是回到具体写作语境中,指出苏舜钦、王益柔等人酒后调侃圣贤的行为,既与中古以来酒后调侃圣人的文化传统有关,也与他们的自我认同、个性气质和仕途经历相关。与此同时,作者也重新理解张方平等“老成”士大夫的行为动机,认为他们介入“奏邸狱”未必完全是为了党争,也是出于对“轻薄”士风的警惕。由此,政治事件、诗学传统与士风观念之间形成了互相解释的关系,“奏邸狱”也不再只是庆历时期党争中的一桩案件,而成为观察北宋中期士人风气和政治文化变动的一个重要窗口。

第五章关于尹洙之死、“众乐”实践与《岳阳楼记》的讨论,则进一步显示出作者以开阔视野处理复杂问题的能力。作者注意到士大夫与僧人对于尹洙之死有着不同解释,并将这种差异放在唐宋思想变迁和排佛浪潮中考察。一方面,范仲淹等人借悼亡文字重新建构儒家性命之说,另一方面僧人也借此回应士大夫排佛趋势。由此,一场死亡书写便有了思想史意义。关于“众乐”,作者将欧阳修等人的亭记与唐人作品进行比较,指出宋人亭记有着强调公共之乐、与民同乐的特点,具有文学革新意义;同时又将这一现象放在庆历时期吏治观念和孟子升格的思想运动的背景中考察,说明“众乐”并非单纯的文学主题,也是北宋中后期士大夫的一种政治意识。对于《岳阳楼记》,作者也没有停留于名篇赏析层面,而是通过分析公与私、忧与乐、进与退等概念关系,揭示出范仲淹“先忧后乐”思想的丰富内涵。作者既将这一观念与先秦儒家相关理论进行比较,指出其更为积极的经世取向,也注意到它与韩愈思想之间的继承和超越关系,以及北宋后期、南宋士人围绕这一观念展开的持续讨论。这一解读将《岳阳楼记》从文学名篇重置于庆历士大夫自我正名、回应污名化与建构责任意识的脉络中,使其政治文化意涵得以彰显。

通过这些个案,《言以行道》有效突破了政治史、思想史与文学史之间的分隔。政治事件因文学书写而获得新解释,文学作品因政治、思想语境而呈现出更深层意义;士大夫精神也由此不再只是抽象观念,而是在具体事件、具体文本和具体人际关系中被不断表达出来。

三、话语传播、制度关联与代际解释的延展

《言以行道》虽有上述优点,但在一些问题上仍有继续推进的空间。第一,第二章强调庆历士大夫通过直谏和二元修辞建构新价值观,但“话语如何传播”问题仍可作更细致的展开。若能进一步呈现庆历士大夫内部及其与其他士大夫之间书信往来、诗文唱和、交游与地域网络之间的具体关系,将更能说明新的士人价值观如何在群体内部形成、扩散并产生影响。第二,第四章关于“儒帅”的讨论提出了文学、观念与制度互动的问题,但三者之间的作用关系仍需辨析得更清楚。文学创作可以表达观念、凝聚共识,但它如何进一步影响制度安排,以及影响到何种程度,仍需结合更具体的政治过程加以说明。否则,文学表达与制度变化之间容易停留在相关性层面,而难以形成更有力的因果解释。第三,第六章关于代际分歧的分析具有启发性,但仍可进一步讨论。如庆历士大夫与熙宁以后士大夫之间的差异,未必只是政治理念的分歧,也与个人仕宦经历、学术资源、政治风险感知、人

际交往和政局变化等因素有关。此外, 应注意的是, 两代士大夫在对士大夫精神认同和政治实践上虽有相同之处, 但时代变化使其“同”中有“异”。对于这个问题, 笔者曾有过初步讨论。如苏轼与欧阳修虽都勇于谏诤、以民为本、明辨是非等, 但神宗朝相对于仁宗朝更为严峻的政治氛围, 使得苏轼在政治实践重心、政治角色扮演等方面不同于欧阳修。两代士大夫对于“以天下为己任”精神的理解和实践方式, 也因此呈现出不同面向。⁶从北宋士风变化来看, 范仲淹、欧阳修等人的政治实践推动了积极言事、关切国政的士风形成, 而苏轼的政治实践则更多体现为在北宋后期士风日趋败坏背景下, 对士大夫不依附权贵等政治品格的坚守。⁷若从这些层面继续展开, “何以为士”的问题将不仅是思想史命题, 也会成为社会史和政治文化史交叉意义上的命题, 同时也将有助于更全面地揭示“为士之道”在北宋中后期的变化。

结语: 从“言以行道”理解北宋士大夫政治

《言以行道》的意义在于它以庆历士大夫为中心, 揭示了北宋政治文化转型中一个极为关键的机制: 士大夫通过言论证明其道义责任, 通过声望扩大其政治影响, 又通过文学书写和实际行动维系其群体认同。所谓“言以行道”, 并非简单地以语言表达道德理想, 而是把言说本身转化为一种政治实践。

因此, 《言以行道》不仅是一部关于庆历士大夫的专题研究, 也为理解北宋士大夫政治提供了具有解释力的观察角度。作者提醒我们, 北宋政治文化的转型并不只发生在制度、思想等层面, 也发生在士人如何说话、如何成名、如何书写、如何行动以及如何理解自身责任的过程中。正是在这些看似分散的言论、声望与行动之间, 庆历士大夫完成了对“为士之道”的重新建构, 也为此后宋代政治文化的发展留下了深远影响。

参考文献:

- [1] 王启玮. 言以行道: 庆历士大夫与北宋政治文化的转型[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24.
- [2] 诸葛忆兵. 宋代士大夫的境遇与士大夫精神[J].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2001(1): 107-112.
- [3] 余英时. 朱熹的历史世界: 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1.
- [4] 诸葛忆兵. 范仲淹与北宋士风演变[J].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2006(5): 150-156.
- [5] 刘复生. 北宋中期儒学复兴运动(增订本)[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23.
- [6] 刘欣琛. 欧阳修、苏轼政治实践比较与北宋士大夫精神的代际传承[J/OL]. 乐山师范学院学报. <https://link.cnki.net/urlid/51.1610.G4.20260702.1548.002>.
- [7] 刘欣琛. 苏轼廉政思想的三个层次及其与北宋士风嬗变之关系[J]. 黄冈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26(1): 1-6.

Qingli Scholar-Officials Between Speech, Reputation, and Action: A Review of Wang Qiwei's *Speaking to Practice the Way: Qingli Scholar-Officials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Political Culture in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Liu Xinchun

(School of Technician Education, Meishan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College, Meishan Sichuan, China)

Abstract: Wang Qiwei's *Speaking to Practice the Way: Qingli Scholar-Officials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Political Culture in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centers on the Qingli scholar-officials and reinterprets the transformation of political culture in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by exploring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speech, reputation, literary writing, and political action. The book's strengths lie in its contextualized understanding of the Qingli scholar-officials within their historical setting, as well as its broad vision that integrates political history, intellectual history, and literary history. At the same time, there remains room for further exploration in areas such as the pathways of discourse disseminati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iterary concepts and institutional practices, and the causes of generational divisions.

Keywords: Qingli scholar-officials; political culture of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speech; reputation politics

⁶ 参见刘欣琛《欧阳修、苏轼政治实践比较与北宋士大夫精神的代际传承》,《乐山师范学院学报》网络首发于2026年7月2日。

⁷ 参见刘欣琛《苏轼廉政思想的三个层次及其与北宋士风嬗变之关系》,《黄冈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26年第1期,第1-6页。

贝叶斯确证理论中的“旧证据问题”及其当代辩护¹

王雅哲

(湘潭大学, 湖南 湘潭 411105)

摘要: 贝叶斯主义是当代科学哲学的主流确证理论, 它以一套精确的量化形式框架, 刻画了经验证据对科学假说的支持机制。但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 该理论始终受到“旧证据问题”的挑战: 倘若某项证据在假说提出之前便已成为学界共识, 那么依据标准贝叶斯条件化规则, 这一证据将无法为假说提供任何确证效力, 而这一推论显然与科学史上的实际案例相矛盾。本文系统梳理了“旧证据问题”的逻辑结构与哲学意涵, 并深入剖析两种主流辩护策略: 以豪森为代表的反事实策略, 和以加伯为代表的命题重构策略。在批判性考察两种策略的洞见及其内在困难的基础上, 尝试提出一种“认知-历史语境”的综合辩护框架。该框架主张, 要恰当评估旧证据的确证力, 必须将贝叶斯计算安置在一个经过理想化重构的、处于特定历史情境中的认知主体的知识背景之下。这样一来, 旧证据问题不仅得以消解, 而且促使我们对贝叶斯确证过程的动态性、历史性与语境依赖性产生更深刻的理解。

关键词: 贝叶斯主义; 确证理论; 旧证据问题; 反事实策略; 条件化; 科学推理

DOI: doi.org/10.70693/202607012736

贝叶斯主义以概率演算为核心, 将证据对假说的支持关系形式化为后验概率相对先验概率的提升, 是当代主流的科学推理规范性框架。但格莱莫尔在《理论与证据》一书中提出的“旧证据问题”, 直指这一理论的核心根基。这一问题的核心逻辑在于: 在贝叶斯主观概率的设定下, 若证据 E 已成为科学共同体的公共知识, 其置信度 $P(E)$ 便等于 1; 代入贝叶斯定理可推得, $P(H|E)=P(E|H) \cdot P(H)/P(E)=P(E|H) \cdot P(H)$ 。若假说 H 蕴含 E, 则 $P(E|H)=1$, 最终得到 $P(H|E)=P(H)$ ^[1]。也就是说, 旧证据无法给假说带来任何概率提升, 其确证力完全消失。这一推论与科学史上的事例明显冲突。经典的案例是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 (H) 对水星近日点反常进动 (E) 的解释。早在爱因斯坦提出其理论半个多世纪前, 天文学家就已经精确地观测并记录了这一现象^[2]。直观上, 广义相对论能够完美解释这一“旧证据”, 是其获得科学界认可的的决定性因素之一。但是, 在标准的贝叶斯模型下, 由于证据 E 在广义相对论提出之时已是科学界的共识, 对于任何一位当时的科学家而言, 其对 E 的信念概率 $P(E)$ 都等于 1。根据贝叶斯定理的数学形式 $P(H|E)=P(E|H)P(H)/P(E)$, 当 $P(E)=1$ 时, 等式变为 $P(H|E)=P(E|H)P(H)$ 。广义相对论可严格导出水星轨道的观测结果, 此时 $P(E|H)=1$, 代入后可得 $P(H|E)=P(H)$ 。换言之, 旧证据 E 完全无法提高我们对假说 H 的置信度。在标准贝叶斯条件化框架下, 这类证据不具备任何确证效力, 而这一结论显然不符合科学确证实践的直觉。

正是这种理论推论与历史实践之间的差距, 推动贝叶斯主义者寻求系统的辩护方案。目前影响最广的两条路径分别是: 以豪森为代表的反事实策略, 设想以科学家尚未得知该证据时的合理信念来替代现实中的 $P(E)=1$; 以及以加伯为代表的命题重构策略, 将确证的对象从证据本身转移到“假说蕴含证据”这一逻辑关系之上, 从而重新赋予旧证据以确证意义。然而, 两种方案均面临各自的内在困难。

在批判性剖析上述策略的解释力及其局限的基础上, 尝试提出一种“认知-历史语境”的综合辩护框架。贝叶斯确证分析的合适主体, 不应是超然于时间之外的全知观察者, 而应当是身处特定历史语境之中的理想化认知者。以确定的历史背景知识为依托, 可以为反事实概率的评估提供更可靠的依据; 与此同时, 吸收命题重构策略对“发现逻辑蕴含关系”这一认知环节的重视, 又可弥补反事实策略对认知动态性关注不足的缺陷。

一、贝叶斯确证理论与“旧证据问题”的起源

(一) 贝叶斯主义的核心原则: 信念的动态更新

作者简介: 王雅哲(2003—), 女, 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逻辑学;

通讯作者: 王雅哲

为了精确理解“旧证据问题”的逻辑基础,我们必须首先回顾贝叶斯确证理论的基本构件。贝叶斯主义将命题的“概率”诠释为理性主体对该命题为真的信念程度,这是一种主观或认识论意义上的概率^[3]。这一框架的核心由静态约束和动态规则两个部分构成。静态约束是在任一时刻,一个理性主体的信念分布必须满足概率论公理。这意味着其信念网络内部是融贯的。动态规则则要求当主体获知新证据 E 时,他应该通过“严格条件化”规则来更新其对其他所有命题(如假说 H)的信念。具体而言,更新后的信念 $P_{\text{new}}(H)$ 应该等于原先的条件概率 $P_{\text{old}}(H|E)$ 。贝叶斯定理正是实施条件化的计算工具: $P(H|E) = [P(E|H) * P(H)] / P(E)$ 。

其中 $P(H)$ 为假说 H 的先验概率,即认知主体在获知证据 E 之前对 H 的置信度; $P(H|E)$ 为 H 的后验概率,对应主体获知 E 之后的置信度。 $P(E|H)$ 为似然度,表示假说 H 为真时证据 E 成立的概率; $P(E)$ 为证据的边缘概率,即主体对 E 本身的先验置信度。在该框架中,确证被定义为后验概率相对先验概率的提升:当且仅当 $P(H|E) > P(H)$ 时,证据 E 确证假说 H。经代数变形即可证明,这一定义等价于 $P(E|H) > P(E)$ ^[4]。这一不等式直观呈现了确证的核心逻辑:若假说 H 为真会提高证据 E 出现的概率,那么 E 便反过来为 H 提供确证支持。

(二) 格莱摩尔的挑战与问题的形式化

格莱摩尔的批判,正是指向了上述动态规则在特定情境下的应用^[5]。他观察到,在许多重要的科学案例中,证据 E 早已是背景知识的一部分。这意味着,对身处那个时代的科学家而言, E 是一个确定性事实,其概率值为 1。将背景知识 K 明确引入后,贝叶斯公式的严谨表述应为: $P(H|E \& K) = [P(E|H \& K) * P(H|K)] / P(E|K)$,而确证的发生当且仅当 $P(H|E \& K) > P(H|K)$ 。在“旧证据”情境下, E 之所以为“旧”,恰在于它已被背景知识 K 所蕴含。此时, $P(E|K) = 1$ 。代入公式,分母即为 1,于是 $P(H|E \& K) = P(E|H \& K) * P(H|K)$ 。又因为 K 已蕴含 E,“E & K”等价于 K,故 $P(H|E \& K)$ 实际上就是 $P(H|K)$ 。将其代入等式,便得到 $P(H|K) = P(E|H \& K) * P(H|K)$ 。只要 $P(H|K)$ 不为零,两边消去即可推出 $P(E|H \& K) = 1$ 。这一结果的悖论性在于:在 H 提出之前, E 本身就已确凿无疑,它对 H 的确证力无从体现,旧证据问题由此在逻辑上被清晰地构造出来^[6]。

(三) 科学史中的经典案例:水星近日点进动

这一形式化的结论与科学史的冲突体现在水星近日点进动的案例中。19 世纪中叶,法国天文学家勒维耶发现,水星轨道的近日点的进动速度比牛顿万有引力定律预测的要快。这个观测数据 (E) 与牛顿理论之间的微小差异,成为一个困扰了天文学界半个多世纪的“反常”。科学家们曾尝试用各种方式来修补牛顿理论,例如假设水星内部存在一颗未被发现的“火神星”,但都以失败告终。因此,在 1915 年之前, E 是一个确凿无疑的、且无法被现有主流理论完美解释的“旧证据”。

1915 年,爱因斯坦提出了广义相对论 (TGR)。令人震惊的是,根据广义相对论的场方程计算出的水星近日点进动值,与观测值 E 完美吻合。这一成功被爱因斯坦本人和整个科学界视为对广义相对论的一次强力确证。物理学家马克斯·玻恩指出这一发现是对爱因斯坦理论最有力的证明。

然而,如果我们用标准贝叶斯模型来重构这一历史时刻:假说 H 是广义相对论 (T_{GR})。证据 E 是水星近日点的反常进动数据。背景知识 K 包含了 1915 年之前所有的物理学和天文学知识,其中自然也包括 E 本身。由于 E 属于 K, $P(E|K) = 1$ 。根据前述推导, $P(T_{GR}|E \& K) = P(T_{GR}|K)$ 。这意味着,广义相对论对这个著名难题的解释,在贝叶斯主义者看来,不构成任何确证。这显然是荒谬的。一个能够解释旧理论无法解释的反常现象的新理论,理应获得来自该现象的确证。旧证据问题因此对贝叶斯主义者的描述充分性和规范合理性引发了争议。

上述形式化的结论与科学史的争议集中体现于“水星近日点进动”这一经典案例中。19 世纪中叶,法国天文学家勒维耶发现,水星轨道的近日点进动速度超越了牛顿万有引力定律的理论预测。这一观测数据与经典力学体系的微小偏离,构成了困扰天文学界半个多世纪的“经验反常”。尽管科学家曾尝试通过引入未知的“火神星”等辅助性假说来调和牛顿理论,但均以失败告终。因此,在 1915 年之前,该观测数据作为一个确凿的既成事实,成为了经典范式无法消解的“旧证据”。1915 年,爱因斯坦提出了广义相对论 (记为 T_{GR})。该理论场方程的推导结果与水星近日点进动的观测数据高度吻合。这一进展随即被爱因斯坦本人及物理学界视为对广义相对论的强力确证,物理学家马克斯·玻恩亦称其为该理论“最有力的证明”。然而,若诉诸标准的贝叶斯条件化模型对这一历史确证过程进行逻辑重构,则会陷入显著的理论悖谬。设假说 H 设为广义相对论 T_{GR} ,证据 E 为水星近日点反常进动数据,背景知识 K 包含 1915 年之前的所有既有经验与理论成果。由于 E 已被吸纳进 K 之中,其先验概率必然被设定为 $P(E|K) = 1$ 。根据前述推导,后验概率方程将变为: $P(T_{GR}|E \wedge K) = P(T_{GR}|K)$ 。这一形式化结果表明,广义相对论对科学史重大反常的成功消解,在贝叶斯确证逻辑中竟无法产生任何实质性的确证增量。这一推论显然违背直觉,并由此暴露了标准模型在理论上的局限。当一个新假说能够成功解释旧理论所无法消解的

现象时,标准贝叶斯框架却反过来判定其确证效力为零。这种悖论意味着,“旧证据问题”已不仅仅是一种工具层面的批评,它更从根本上拷问了贝叶斯主义在描述科学实践与提供规范辩护这两个方面的充分性。

二、反事实辩护及其困境

面对旧证据问题的挑战,贝叶斯主义者发展出多种辩护策略,其中影响最为深远的当属“反事实辩护”。这一策略的核心主张是:贝叶斯确证度的评估,不应以研究者当下的实际知识状态为基准,而应诉诸一种假设性的反事实认知情境。

(一) 豪森与厄巴赫的反事实重构

科林·豪森(Colin Howson)与彼得·厄巴赫(Peter Urbach)在《科学推理:贝叶斯方法》(Scientific Reasoning: The Bayesian Approach)中系统发展了这一方案。在他们看来,旧证据问题之所以出现,根源在于对贝叶斯模型适用条件的误读:确证关系本是证据与假说之间的逻辑—概率关系,理论上不应因主体获知证据的时间先后而有所不同。基于这一判断,他们主张,计算确证度的关键在于以一个反事实的先验概率 $P(E|K')$ 取代主体当前背景知识 K 下已经等于 1 的概率 $P(E|K)$ 。这里的 K' 是从现有背景知识 K 中剔除证据 E 本身、以及 K 中逻辑上蕴含 E 的全部内容之后所得到的假设性知识库,用以还原主体尚未获知 E 时的认知状态。以水星近日点进动为例,这一反事实评估可转换为这样一个问题:假定回到 1915 年,在掌握除水星轨道精确观测数据之外的全部天文学知识(即 K')的条件下,我们对该进动观测结果应赋予多大的先验置信度 $P(E|K')$? 在牛顿力学的框架内,这一观测结果属于无法解释的反常现象, $P(E|K')$ 的取值理应相当低。由此,确证关系的比较落在 $P(E|H \& K')$ 与 $P(E|K')$ 之间:广义相对论几乎能够精确预测该进动数值,故 $P(E|H \& K') \approx 1$; 而在缺少广义相对论的反事实背景中,该观测结果只是一个发生概率极低的事件,即 $P(E|K') \ll 1$ 。由 $P(E|H \& K') \gg P(E|K')$ 可知, E 满足贝叶斯确证理论中的“概率提升”标准,即 $P(E|H \& K') > P(E|K')$ (依贝叶斯定理,这等价于 $P(H|E \& K') > P(H|K')$)。由于二者数值悬殊, E 对 H 构成了强有力的确证。反事实策略以此避开了 $P(E)=1$ 所带来的困境,使贝叶斯确证的计算结果与科学实践中的直觉判断趋于一致。

(二) 反事实辩护的合理性与吸引力

反事实辩护的吸引力在于它抓住了确证的核心即解释力或预测新颖性。一个假说之所以被一个证据所支持,是因为这个假说让这个证据的出现“不出所料”^[7]。无论这个证据是新是旧,这种“让惊讶感消失”的解释力量是客观存在的。反事实的思考实验,正是为了在形式上重现这种“惊讶感”,从而量化解释力的大小。

此外,这种辩护也符合科学家在实际思考中的某些心理过程。当一位科学家提出新理论来解释旧难题时,他实际上就是在进行一种反事实的比较:在我的理论框架下,这个现象是自然的推论;而在旧的框架下,它则是一个令人费解的谜题。这种比较本身就蕴含了反事实的推理。

(三) 认知可及性与概率的确定性难题

反事实辩护在论证形式上可靠,但引起了两个哲学方面的问题,分别触及概率赋值的客观性基础与认知操作的实际可行性。就概率赋值的确定性而言,如何为反事实背景知识 K' 下的先验概率 $P(E|K')$ 给出客观的赋值方案,是一项实质性难题。从一个庞大且逻辑融贯的知识体系 K 中剔除核心事实 E ,其实质是一种信念收缩操作,而非简单的内容删除。约翰·厄曼已明确指出,这一操作很可能不存在唯一解:满足极小修改原则的收缩方案往往不止一种,标准贝叶斯框架对此并未提供进一步的选择约束。当主体着手剔除 E 时,为维持知识库的逻辑自治,势必连带搁置诸多与 E 相关的信念;具体保留哪些、放弃哪些,将直接影响 $P(E|K')$ 的取值^[8]。以水星进动案例为例:在搁置水星轨道精确数据的同时,是否必须一并推导出该数据所依赖的观测技术与理论假设?不同的收缩路径将导向差异显著的反事实概率,使确证度的计算失去稳定的客观基础。就认知操作的可行性而论,反事实辩护所要求的,是认知主体能够将一项已内化的背景知识暂时排除在现有认知状态之外,并在此基础上完成概率推断。然而,一旦某一事实深度嵌入主体的认知系统,这种操作是否真正可行,本身便存有疑问,在某些情形下甚至根本难以落实。大卫·克里斯坦森在研究贝叶斯确证框架的规范基础时指出,一个理性规范模型所要求的认知操作,至少应在原则上具有可执行性^[9]。若反事实辩护所预设的认知状态在实践中难以真正还原,该方案作为规范理论的约束力便会受到实质性削弱。两个难题共同揭示了一个困境:反事实策略虽然在形式上规避了 $P(E|K)=1$ 的障碍,却将概率赋值的核心难题转移到了背景知识 K' 的构造之上。反事实概率并非一个给定的、自明的量值,其客观性与可操作性本身尚需辩护,这便对该方案的论证效力构成了制约。

三、证据命题的再诠释

反事实辩护所面临的困境,促使学者们开辟出另一条重要的辩护路径。这一路径的倡导者认为,问题的关键

或许并不在于如何构建一个反事实的知识状态,而在于我们一开始就误判了科学家在旧证据案例中真正获得的新信息究竟是什么。该策略的核心是重新解释那个提供确证作用的“证据命题”本身。

(一) 加伯的逻辑关系确证

丹尼尔·加伯 (Daniel Garber) 是这一思路的杰出代表。他认为,在爱因斯坦的案例中,1915 年的科学界所“新学到”的,并不是水星近日点进动的数据 E (因为 E 是旧的),而是“广义相对论 (H) 能够逻辑地或数学地蕴含 (entails) 观测数据 E”这一事实^[10]。把这个新命题记为 L,即 $L = "H \models E"$ 。在爱因斯坦完成他的计算之前,科学界并不知道 L 的真假。也就是说,在 1915 年提出广义相对论但尚未完成相关计算的那个瞬间,对于一个理性的主体而言,其对 L 的先验概率 $P(L)$ 是小于 1 的。而当爱因斯坦成功地从他的理论中推导出 E 时,科学界便“学习”到了 L,即他们可以将 $P_{\text{new}}(L)$ 更新为 1。

在加伯的方案中,提供确证力的事件不再是获知 E,而是获知 L。因此,贝叶斯更新应该计算的是 $P(H|L)$,而不是 $P(H|E)$ 。由于 $P(L) < 1$,旧证据问题的形式障碍自然就消失了。

这一不等式的成立,可从以下两个层面加以说明。从认知层面看,一个假说若能解释此前悬而未决的已知现象,这一发现本身便构成支持该假说的理由,足以提升对其的置信度,这与科学实践中的通常判断是一致的。从概率结构看,由贝叶斯定理可知, $P(H|L) > P(H)$ 成立的充分条件是 $P(L|H) > P(L|\neg H)$: 当 H 为真时, H 与 E 之间存在解释性联系的概率,理应高于 H 为假时的情形,正是这种不对称性保证了该不等式在加伯方案的概率框架内通常可以得到满足。需要指出的是,学习到 L 所排除的,是 L 为假的所有可能世界 (即 $H \models E$ 不成立的情形),而并非仅限于“H 为真却无法解释 E”的那部分世界;这一区分对于准确理解加伯方案的概率更新机制至关重要。

在理论层面,加伯方案的实质贡献在于将确证的核心节点从“获取经验事实”转移至“认知到假说与已知事实之间的解释性联系”。以广义相对论确证水星进动为例:使爱因斯坦的置信度得以提升的,不是对观测数据的重新获取,而是对 $GR \models$ 水星进动这一推导关系的把握。这一分析与科学史的实际情形颇为契合,也正是加伯方案在哲学上颇具解释力的原因之一。

(二) 命题重构策略的优势与局限

就策略优势而言,加伯方案的优势在于彻底规避了信念收缩操作所带来的构造困难。该方案所涉及的全部概率,包括 $P(H)$ 与 $P(L)$,均在科学家实际的历史知识状态下加以评估,无须为尚未发生的认知状态设定缺乏客观约束的假设参数。这一特点不仅赋予了该方案较强的认知可操作性,也与科学发现的历史进程本身更为贴合:科学家确实是在某一具体时间节点上认识到 H 能够解释 E,这一认识本身构成信念更新的实际事件,作为确证载体在逻辑与历史两个层面均可得到说明。

然而,该方案在两个方面面临实质性的哲学问题。

第一是框架一致性问题,即关于特设性的质疑。加伯方案是针对旧证据情形专门设计的,其操作依赖于将 L 纳入概率空间这一额外步骤;而在标准情形下即证据 E 为新获取的情况,概率空间本身无须做出这样的扩展,确证直接来自对 E 的更新。这意味着该方案对新旧两类证据分别适用结构上有所不同的概率框架,而一个具有普遍解释力的确证理论,应以统一的机制覆盖两种情形。随情境调整概率空间的做法,在方法论上具有特设性^[11]。

第二是筛选问题。厄曼指出,即便承认学到 L 构成一个确证事件,这一机制也未必能够充分捕捉旧证据 E 本身所具有的全部确证依据。在加伯方案的概率结构下,一旦学到 L, E 对 H 的边际确证效力便被 L 完全吸收,即 $P(H|L \wedge E) = P(H|L)$, E 在 L 之外不再提供独立的概率支撑。然而,这与科学推理的实际情形存在差异:一个理论对某现象的解释性蕴含 (L) 与该现象的精确量化内容 (E 的具体数值) 对理论的支持,在直觉上并非等价。以广义相对论与水星近日点进动为例,“GR 在逻辑上蕴含进动现象”与“观测值恰好落在 GR 预测的精确区间之内”,后者所具有的意义无法在加伯框架中得到体现。将确证力完全归于 L,掩盖了 E 之精确内容本身所具有的认识论意义。综合上述分析,命题重构策略通过将确证的核心载体从经验事实转移至解释性联系,为旧证据问题提供了在认知操作上切实可行的处理方案。但其对旧证据的差异化框架设置,以及对证据精确内容之确证价值的系统性忽略,因此该方案在理论完备性上仍有待进一步检验。

四、结论

(一) 两种辩护路径的局限与互补

“旧证据问题”自被明确提出以来,始终是贝叶斯确证理论难以回避的核心困难。它触及了标准贝叶斯条件化模型的内在张力:当新理论最重要的理论成就恰在于解释已知的反常现象时,贝叶斯框架却无从为这一确证过程给出恰当的刻画。围绕这一困境,学界先后形成了两条主要的辩护路径,各有其认识论依据,也各有其理论局限。

反事实辩护所依托的核心判断是：确证力量源于假说对已知证据的解释性涵纳——使原本低概率的证据在理论图景下变得可期。为此，它通过构建一个假设性的认知情境——主体尚未获知证据 E——来为旧证据恢复理应具有的确证效力。这一进路将确证理解为一种跨认知状态的比较：相较于去除 E 的假设认知状态 K'，当前获有假说 H 的实际认知状态使 E 的先验地位显著提升，两者之间的概率差即为确证力量的量度。然而，这一构想在操作层面遭遇严重困难：反事实概率 $P(E|K')$ 的赋值既缺乏客观约束，在认知上亦难以真正落实，由此引发了关于该方案不过是以特设性构造填充理论空缺的质疑。

证据命题重构则另行其路。加伯等人将确证事件的焦点从“获知证据 E”转移至“认识到假说 H 在逻辑上蕴含 E”，即认知主体学到命题 L。这一转移有其实质的认识论依据：它正视了 E 早已为人所知这一历史事实，同时将科学家领会到 H 与 E 之间解释性联系的认知突破视为真正引入新信息的节点。与反事实方案相比，这一处理在概念上更为清晰，也更贴近科学发现的实际进程。然而，该方案同样面临两方面质疑：面向旧证据情形的框架调整是否具有普遍适用性，尚无定论；而学习到 L 究竟能否完整捕捉 E 对 H 的全部确证力量，还是仅能触发一次有限度的信念更新，也仍是未解的问题。

对两种方案加以比较，就其认识论取向而言，可以作如下区分：反事实辩护着眼于确证的历时性结构，意在刻画主体的实际认知状态与相应的反事实认知状态 K' 之间，证据 E 的认识地位所发生的变化；命题重构则立足于确证的共时性节点，聚焦于科学家在特定时刻领会到解释性联系这一事件，并在当下知识状态下实时触发的信念更新。就此而言，两种方案与其说是相互排斥的竞争理论，不如说各自切入了科学确证结构的不同侧面。一个在理论上更为完备的确证方案，或许需要在形式上同时容纳这两个维度，而这一整合工作本身，仍有待进一步的理论建构。

（二）“理想认知主体”的引入

两种辩护路径面临一个共同的基础性缺陷：各自所依赖的概率赋值均缺乏可供公开检验的客观标准。反事实辩护中的 $P(E|K')$ 需要从当前知识状态中执行无唯一解的信念收缩操作；命题重构中的概率更新则因主体认知历史不同而缺乏统一的赋值依据。为了解决这一困境，对贝叶斯推理所预设的认识主体加以重构：以一个由特定历史时期科学共同体的知识状态明确界定的“理想认知主体”，取代标准贝叶斯框架中那个脱离于具体历史语境之外的抽象逻辑主体。将这一进路概括为“认知—历史重构方案”。

该方案的核心立场是：在评估旧证据 E 对假说 H 的确证效力时，适当的参照系是特定历史时期科学共同体所共同拥有的知识基础，而非当下哲学家的后见之明，亦非某个具体科学家难以还原的私人认知状态。据此，确证评估所要回答的问题变为：对于一个以该知识基础为背景的理想主体，假说 H 的提出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了证据 E 的认识地位？

仍以广义相对论确证水星近日点进动为例。在这一框架下，进行确证评估的参照主体，是以 1914 年前后天文学共同体的知识状态为基础的理想天文学家。其背景知识库 K_{1914} 涵盖当时的牛顿力学体系、已有的观测技术与天文学理论，以及包括水星进动观测数据 E 在内的全部已知事实，但不含广义相对论 H。在 K_{1914} 的理论框架内，牛顿引力理论 T_N 是支配天体运动的主导模型；然而以 T_N 为基础，水星近日点的实测进动量与理论预测值之间存在无法消解的系统性偏差，即 $P(E|T_N \wedge K_{1914})$ 显著偏低。这一概率赋值的关键在于：它并非出于任意的判断，而是可以通过考察当时的理论模型、观测误差讨论及相关科学文献加以历史重构的——这也是该方案相较于标准反事实辩护在客观性基础上的主要改进。当然，“历史重构”本身是否能够提供唯一确定的概率值，在文献中仍有争议，此处的主张较为审慎：历史证据能够约束赋值的合理范围，而非给出精确的单一数值。

当广义相对论 H 引入这一框架时，确证评估的核心在于比较两个条件概率： $P(E|H \wedge K_{1914})$ 接近于 1，因为 H 在数学上可以精确推导出 E 的具体数值； $P(E|T_N \wedge K_{1914})$ 则显著低于 1。由贝叶斯定理可知，这两个条件概率的似然比直接决定了在 K_{1914} 的背景下，H 相较于 T_N 获得概率支持的程度： $P(H|E \wedge K_{1914})/P(T_N|E \wedge K_{1914}) \propto P(E|H \wedge K_{1914})/P(E|T_N \wedge K_{1914})$ 。两者比值的悬殊差距，为旧证据 E 对新假说 H 形成强有力确证提供了明确的概率结构说明。

（三）综合框架的哲学意涵与理论价值

认知—历史重构方案的理论价值，不止于为旧证据问题提供了一条在操作上更具可行性的处理路径，更在于它从概率赋值的基础层面重新界定了确证评估的参照框架：以知识状态由特定历史语境明确界定的理想认知主体，取代贝叶斯框架中抽象的逻辑主体，由此在同一分析结构内容纳了前两种辩护进路各自的核心洞见。

就具体的分析结构而言，该框架对旧证据确证过程的刻画可以概括如下：一个知识状态由特定历史时期科学共同体所界定的理想主体，在认识到新理论 H 与旧证据 E 之间存在解释性蕴含关系 L 之后，将 H 对 E 的解释效

力与当时主导理论框架下 E 的理论地位加以系统比较,由此获得支持 H 的正向概率更新。在这一过程中,“学习到 L”的认识论作用,在于将似然比 $P(E|H \wedge K)/P(E|T \wedge K)$ 引入主体的推理链条,使这一比率得以被明确评估。从认识论结构上看,这一分析同时对应了反事实辩护所聚焦的解释力维度,以及命题重构所强调的认知事件维度,两种进路在此并非相互替代,而是各自对应确证结构中的不同层面。

旧证据问题的意义,在于它将贝叶斯确证理论一个深层的预设暴露出来:任何概率赋值都预设了一个确定的认识主体,而这个主体的知识状态并非游离于历史之外的抽象设定,而是由具体的理论框架、观测实践与历史时期共同构成的。承认这一点,并不意味着放弃确证的客观性;它要求的是将客观性理解为一种有条件的、可公开检验的历史重构,而非逻辑上的先验给定。就这一意义而言,认知—历史重构方案提供了一种值得深入检验的概念框架。除水星近日点进动之外,量子理论对黑体辐射谱高频段系统性偏差的解释(即普朗克 1900 年对瑞利—金斯定律局限的处理)、以及玻尔模型对氢原子巴尔末系谱线规律的诠释,均属理论提出时相关观测数据早已为人所知的情形,可作为进一步检验该框架解释力与适用边界的历史案例。

参考文献:

- [1] Howson C. The ‘old evidence’ problem[J]. The British Journal for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 1991, 42(4): 547-555.
- [2] 徐娟娟. 反事实策略对旧证据问题的消解及其困境[J]. 自然辩证法通讯, 2025, 47 (9): 38-45.
- [3] Joyce J M. How probabilities reflect evidence[J]. Philosophical perspectives, 2005, 19: 153-178.
- [4] Earman J, Earman J. Bayes or bust?: A critical examination of Bayesian confirmation theory[M].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92.
- [5] Portugal A C. Theism, Bayes's theorem and religious experience: an examination of Richard Swinburnes's religious epistemology[D]. University of London, 2003.
- [6] Christensen D. Measuring confirmation[J]. The Journal of Philosophy, 1999, 96(9): 437-461.
- [7] Eells E. Problems of old evidence[J]. Pacific Philosophical Quarterly, 1985, 66(3-4): 283-302.
- [8] Earman J, Earman J. Bayes or bust?: A critical examination of Bayesian confirmation theory[M].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92.
- [9] Christensen D. Measuring confirmation[J]. The Journal of Philosophy, 1999, 96(9): 437-461.
- [10] Garber D. Old evidence and logical omniscience in Bayesian confirmation theory[J]. 1983.
- [11] Sprenger J. A novel solution to the problem of old evidence[J]. Philosophy of Science, 2015, 82(3): 383-401.

The "Old Evidence Problem" in Bayesian Confirmation Theory and Its Contemporary Defenses

Wang Yazhe

(Xiangtan University, Xiangtan, Hunan, China)

Abstract: Bayesianism, as the dominant theory of confirmation in contemporary philosophy of science, offers a precise formal framework for characterizing the mechanism by which empirical evidence supports scientific hypotheses. Since the 1980s, however, the theory has been persistently challenged by the “old evidence problem”: if a piece of evidence was already accepted as consensus within the scientific community before a hypothesis was proposed, then, according to the standard Bayesian rule of conditionalization, that evidence cannot provide any confirmatory force to the hypothesis—a consequence that plainly contradicts actual cases from the history of science.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examines the logical structure and philosophical implications of the old evidence problem, and provides an in-depth analysis of two major defensive strategies: the counterfactual strategy represented by Howson, and the propositional reconstruction strategy represented by Garber. On the basis of a critical assessment of the insights and inherent difficulties of both strategies, the paper attempts to propose a synthetic defense framework termed the “cognitive-historical context” approach. The framework maintains that an adequate evaluation of the confirmatory force of old evidence requires situating the Bayesian calculation within the knowledge background of an idealized epistemic subject who is embedded in a specific historical situation. In this way, the old evidence problem is not only dissolved, but also prompts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the dynamic, historical, and context-dependent character of Bayesian confirmation.

Keywords: Bayesianism; confirmation theory; old evidence problem; counterfactual strategy; conditionalization; scientific reasoning

以用户需求为基点的适老化产品包装设计与应用研究

董笑迎

(黑龙江大学艺术学院, 黑龙江 哈尔滨 150080)

摘要: 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剧,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感日益成为社会关注的问题,适老化产品市场日益壮大。适老化产品包装设计作为产品与老年用户之间的重要沟通桥梁,以用户需求为核心出发点,充分考虑老年人在生理、心理和使用习惯等方面的特点,以提升产品的易用性、安全性与情感亲和力。随着适老化产品市场逐渐扩大。本研究聚焦于适老化产品包装设计,以用户需求为核心出发点,通过调研分析老年人的生理、心理及行为特征,探索如何优化适老化产品包装设计,以提高老年人的使用体验,并对其应用进行深入研究,旨在为适老化产品包装设计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指导。

关键词: 适老化; 产品设计; 包装设计; 适老化产品

DOI: doi.org/10.70693/202607028591

在全球人口结构快速老龄化的背景下,老年群体在社会消费结构中的比重不断提升,并逐渐成为产品设计必须重点关注的重要用户群体。然而,从当前产品包装设计实践来看,大多数设计仍然沿用面向普通成年群体的统一设计标准,在信息密度、视觉表达以及交互方式上缺乏针对老年用户的差异化适配机制。老年用户由于视力下降、注意力分配能力减弱以及手部精细动作能力下降等因素,在面对复杂包装结构或信息密集型包装时,往往难以快速完成信息识别与操作理解,从而在实际使用过程中产生较高的认知负担与操作风险。因此,从用户需求出发重新审视产品包装设计逻辑,构建更加符合老年群体行为特征与认知规律的适老化包装体系,不仅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同时也是提升产品社会包容性的重要路径。

一、适老化产品概念

适老化产品是指适应老年人身体机能及心理需求特点,旨在提高老年人生活自理能力、保障老年人安全、丰富老年人精神文化生活等诸多方面的产品^[1]。这些产品涵盖了老年人家居生活、医疗保健、休闲娱乐等多个领域。在老龄化背景下,传统包装设计忽视老年用户需求。包装不仅是信息载体,也是交互界面,因此需要从用户视角进行适老化优化设计。

从用户需求角度来看,老年群体在产品使用过程中表现出明显的差异化特征,这些特征主要体现在生理、认知与行为三个层面。在生理层面,随着年龄增长,老年人普遍存在视觉敏感度下降、对比度识别能力减弱以及手部肌肉力量衰退等问题,这使得其在识别小字体信息或操作复杂包装结构时存在明显困难。在认知层面,信息处理速度的下降与工作记忆能力的减弱,使得老年用户更依赖结构清晰、逻辑简单的信息表达方式,对于多层次、多信息并列的复杂包装结构容易产生理解障碍。在行为层面,老年用户在操作过程中更倾向于简单、直观且具有明确反馈的交互方式,对于需要复杂步骤或隐性逻辑的操作路径接受度较低。因此,适老化包装设计必须在充分理解上述用户需求的基础上进行系统性优化。

二、基于用户需求的适老化产品设计原则

随着老龄化进程的加速,老年人的健康和生活质量越来越受到社会的关注。在公园和城市道路中,适老化产品的设计与应用对于方便老年人的走路活动和健身运动至关重要^[2]。

2.1 安全性原则

作者简介: 董笑迎(2001—),女,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视觉传达与数字艺术设计;

2.1.1 减少安全隐患

老年人身体机能下降,行动相对迟缓,反应不够灵敏,因此要尽可能消除环境中的危险因素。例如,在居家环境中,避免使用有尖锐边角的家具和装饰品,防止老人不小心碰撞受伤;选择无刺激性、无毒无害的装修材料,保障老人的身体健康。

2.1.2 防滑防摔设计

考虑到老人容易滑倒摔伤,地面应采用防滑性能良好的材料,防滑地砖、防滑地板等,并且保持地面干燥清洁,减少水渍残留。在卫生间、浴室等容易滑倒的地方,安装扶手和防滑垫,辅助老人站立和行走,降低摔倒风险。

2.1.3 无障碍设计

为了方便老人使用轮椅或助行器等辅助器具,室内空间应保证足够的通行宽度,门的宽度应不小于 800mm,走廊、过道等的宽度也应满足轮椅通行要求。同时,减少地面的高低差,如门槛应尽量与地面齐平,或者采用斜坡过渡,方便轮椅进出。

2.2 便利性原则

2.2.1 易操作性

产品的操作方式应简单易懂,避免过于复杂的设计和过多的功能按钮。例如,适老化的电子产品可以采用大按钮、大字体、简洁明了的界面设计,方便老人操作;家居用品的开关、拉手等部件,应设计得易于抓握和操作。

2.2.2 合理的空间布局

根据老年人的身体尺寸和活动习惯,合理规划空间布局。例如,卧室中床的高度应适中,方便老人上下床;衣柜的内部结构应设计合理,便于老人取放衣物;卫生间内的马桶、淋浴喷头、洗手盆等设施的位置和高度,也应根据老人的使用习惯进行调整,提高使用的便利性。

2.2.3 便捷的收纳设计

提供充足的收纳空间,方便老人整理和存放物品。收纳柜的高度应考虑老人的抬手范围,避免过高或过低;抽屉和柜门应采用易于开启和关闭的设计,如采用拉手或按压式开关等。此外,可以在收纳空间内设置分区,便于老人分类存放不同类型的物品。

2.3 舒适性原则

2.3.1 人体工程学设计

产品的尺寸、形状和材质应符合人体工程学原理,为老人提供舒适的使用体验。例如,座椅应具有良好的支撑性和舒适性,座面高度和深度合适,能够减轻老人长时间坐立的疲劳感;床垫应选择软硬适中的款式,既能提供足够的支撑,又能保证睡眠的舒适度。

2.3.2 良好的环境适应性

考虑到老年人对环境变化的敏感度较高,产品应具备良好的环境适应性。如室内的温度、湿度调节设备,能够满足老人对舒适环境的需求;家具和装饰品的材质应具有透气性和保暖性,为老人营造一个舒适的居住环境。

2.3.3 感官友好性

在视觉方面,选择柔和、不刺眼的灯光,避免强光直射对老人眼睛造成伤害;色彩搭配应简洁、明快,避免使用过于鲜艳或复杂的颜色,以免引起老人的视觉疲劳或不适。在听觉方面,控制环境噪音,如使用隔音材料、选择低噪音的电器设备等,为老人创造一个安静的生活环境。

2.4 情感性原则

2.4.1 尊重与关爱

在设计过程中,充分尊重老年人的生活习惯、兴趣爱好和个人隐私,关注他们的情感需求。例如,在产品的外观设计上,可以融入一些具有怀旧元素或符合老人审美情趣的图案和色彩,让老人感受到被关注和尊重。

2.4.2 社交互动性

鼓励老年人与家人、朋友和社会进行交流互动,增强他们的社交生活。适老化产品可以设计一些具有社交功能的元素,如带有视频通话功能的电子产品、适合多人共同使用的休闲娱乐设施等,为老人提供更多与他人交流的机会,减少孤独感和寂寞感。

2.4.3 个性化定制

由于不同老年人的身体状况、生活习惯和个人喜好存在差异,因此适老化产品应具备一定的个性化定制能力。例如,家具的尺寸、颜色、材质等可以根据老人的具体需求进行定制;康复辅助器具也可以根据老人的身体状况进行个性化调整,提高产品的适用性和舒适性。

2.5 经济性原则

我国老年人群体的消费相对理性,对价格因素相当敏感,产品设计在注重实用性的同时也要注意性价比,功能越实用、使用越方便越能受到老年人的青睐。所以,设计者需要在设计制造与价格之间找到平衡点。

2.6 易用性原则

对于老年人而言,产品使用越简单越好,这是因为他们的智力水平和学习能力日趋下降,因此产品设计要更多满足他们的“直觉操作”,即通过简单操作、呼叫就能实现交互性功能应用,这是一种潜意识的交互,但也是产品能否打开老年人心门的关键。

三、老年群体的生理特点与需求

3.1 生理特点

3.1.1 视觉

老年人的视力普遍下降,表现为对光线的敏感度降低、视觉对比度减弱、视野变窄以及色觉辨别能力减退等。这使得他们在阅读产品包装上的文字、识别图案和颜色时存在困难,例如难以区分相近的颜色,对小字体的识别能力较差。

3.1.2 听觉

听力衰退也是常见现象,老年人对高频声音的感知能力下降,难以听清细微的声音和声音的细节变化。这在产品包装开启过程中的声音提示或使用说明的音频讲解方面会产生影响,可能导致他们错过重要信息。

3.1.3 触觉

皮肤敏感度降低,触觉感知能力减弱,手部的灵活性和力量也有所下降。这使得他们在触摸产品包装时,难以准确感知包装的材质、纹理和形状,对于一些需要通过触摸来操作的包装部件(如瓶盖、拉环等),可能会出现操作不便的情况。

3.2 心理特点

3.2.1 渴望被尊重和关爱

随着年龄的增长,老年人在社会中的角色逐渐发生变化,他们可能会感到被边缘化,因此内心深处渴望得到他人的尊重和关爱^[3]。在产品包装设计中,体现对老年用户的关怀和尊重,能够增强他们对产品的认同感和好感度。

3.2.2 注重产品的可靠性和安全性

由于身体机能的下降,老年人对产品的可靠性和安全性更为关注。他们更倾向于选择那些包装设计让人感觉稳定、可靠、无风险的产品,因为这会给他们带来心理上的安全感。

3.2.3 怀旧情感浓厚

老年人往往对过去的事物有着深厚的情感和记忆,怀旧元素在产品包装设计中的运用可以唤起他们的情感共鸣,增加产品的亲和力和吸引力。

四、适老化产品包装设计

4.1 易用性和无障碍设计

易用性设计：针对老年人手部力量和灵活性下降的特点，包装应采用易于开启和关闭的设计。如采用易撕拉的开口设计，避免复杂的密封方式；或者使用大尺寸的旋钮、按钮等开启装置，方便老年人抓握和操作。包装上的文字和图形信息应清晰、简洁、易懂。文字应使用较大的字号，通常建议最小字号不低于 18 磅，并且采用高对比度的颜色，如黑底白字或白底黑字，便于老年人阅读。考虑到老年人的体力和使用习惯，产品包装的容量不宜过大或过重。例如，将大包装的产品分成多个小容量的独立包装，方便老年人取用和储存。

无障碍设计：对于视力障碍的老年人，可以在包装上增加触觉引导元素，如凸起的文字、图案或盲文标识，帮助他们通过触摸来识别产品信息和使用方法。利用声音提示功能增强包装的无障碍性。例如，在一些药品包装上设置语音播报功能，当老年人打开包装时，能够自动播报药品的名称、用法用量等重要信息。在包装设计时，应考虑与特殊需求辅助工具的兼容性。例如，设计包装时预留出足够的空间，方便老年人使用辅助工具如开瓶器、放大镜等操作。

4.2 大字体和对比度

字号选择：产品包装上的文字和信息应当采用大字号、高对比度的设计，以确保其易于辨识^[4]。一般建议标题性文字字号不低于 24 磅，正文文字不低于 18 磅。例如，产品名称、品牌标识等重要信息可采用更大的字号，如 30 磅或 36 磅，以确保远距离或视力较差的老年人也能清晰看到。

字体样式：选择简洁明了、笔画清晰的字体，避免过于复杂或装饰性过强的字体，以防影响识别度。无衬线字体通常比衬线字体更清晰易读，同时，对于一些关键信息，可采用加粗或适当变形的方式突出显示，但要注意保持整体的简洁性和可读性。

颜色搭配原则：采用高对比度的颜色组合，如黑与白、蓝与黄、红与绿等，确保文字与背景之间的色差足够大，使文字更加醒目。一般来说，对比度至少要达到 4.5:1，以满足老年人的视觉需求。

避免干扰色：尽量避免使用过于鲜艳或相近的颜色组合，以防产生视觉干扰和混淆。同时，也要注意色彩的搭配协调，符合产品的定位和品牌形象。

局部对比强化：对于一些重要信息或操作区域，可以通过局部提高对比度的方式进行强调。如在药品包装上，将服用方法和剂量等关键信息用高对比度颜色突出显示，方便老年人快速获取。

4.3 记忆辅助和提示功能

使用步骤简化与图示化：将产品的使用步骤简化为 3—5 个关键步骤，并以大图标和简洁文字相结合的方式，按顺序展示在包装的显眼位置。例如，一款老年奶粉的包装上，用大的图片分别展示“打开盖子”“舀取奶粉”“倒入杯中”“加水搅拌”“盖上盖子”这几个步骤，每个步骤旁边配上简短的文字说明，这种直观的图示可以帮助老年人更好地记住操作流程，减少因遗忘步骤而产生的困扰。

用量提示与量具结合：对于需要定量使用的产品，如药品、保健品等，在包装上不仅明确标注每次的用量，还可以直接在包装内配备专用的量具，并在量具上设置明显的刻度和用量标识。比如，将药品的包装盒设计成一个小药盒，里面带有分格的药盒和一个带有清晰刻度的小药勺，药勺的容量与每次的用药量相对应，这样老年人在取药时可以直接使用附带的量具，避免因忘记用量或使用错误的量具而影响用药效果。

时间提醒设置：对于一些需要按特定时间间隔使用的产品，如眼药水、慢性病药品等，包装上可以增加一个简单的提醒装置。例如，采用一个可旋转的圆盘，上面标记好一天中的各个时间段，使用者可以在每次使用产品后将圆盘指针旋转到下一次使用的时间位置，当时间到了下次用药时间，圆盘上的凸起部分会触碰到一个小型的发声装置，发出轻柔的提示音，提醒老年人按时用药。这种简单的时间提醒装置不需要复杂的电子设备，成本较低且易于操作，能够有效地帮助老年人记住用药时间。

重复信息强化记忆：在包装的不同位置多次呈现关键信息，如产品名称、使用方法、注意事项等，利用重复的力量加深老年人的记忆。例如，在包装盒的正面、侧面以及内部说明书的首页等位置，都以相同的格式和内容展示产品的主要使用方法和注意事项，使老年人在不同的使用场景下都能方便地获取到这些信息，从而强化他们对产品使用方法的记忆。

4.4 温度敏感性

隔热材料运用：针对一些对温度较为敏感的产品，如药品、保健品、食品等，包装应选用具有良好隔热性能的材料。如在药品包装中，采用多层复合隔热材料，像铝箔与塑料的复合结构，能有效阻挡外界热量的传入，维持药品在适宜的温度范围内。

温度调节材料：一些新型的包装材料具有温度调节功能，可根据环境温度的变化自动调节包装内的温度。例如，含有相变材料的包装，当环境温度升高时，相变材料吸收热量并发生相变，从而降低包装内的温度；当环境温度降低时，相变材料释放热量，保持包装内温度相对稳定。

温度指示标识：在包装上设置直观的温度指示标识，让老年人能够轻松了解产品所适宜的储存温度范围。可以采用色彩编码的方式，如绿色表示适宜温度范围，黄色表示接近临界温度，红色表示超出适宜温度范围，以便老年人快速判断产品的储存状态。

温度异常提醒：对于一些对温度要求极高的产品，如某些生物制剂、疫苗等，包装可配备温度异常提醒装置。当包装内温度超出设定的安全范围时，提醒装置会发出声音或震动警报，及时告知老年人产品可能存在的风险。

五、结语

以用户需求为基点的适老化产品包装设计是一个综合性的设计过程，需要充分考虑老年用户的生理、心理和认知特点，从功能、视觉传达和情感体验等多个方面进行优化设计。使适老化包装呈现出多元性、趣味性、多样性。老年人群对产品包装的需求不仅体现在感官层面，也需注重包装设计的创新性和交互性^[5]。通过满足老年群体对产品包装便利性、安全性、易识别性和情感需求的追求，不仅可以提高老年用户的生活质量，还能够为企业赢得老年市场的竞争优势，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双赢。在未来的设计实践中，设计师应更加深入地了解老年用户的需求，不断探索创新的设计方法和理念，推动适老化产品包装设计的发展，为老年群体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

参考文献：

- [1] 赵巍.基于用户需求的适老化产品设计与应用研究[J].绿色包装,2024,(10)
- [2] 姚湘, 胡蓉, 杨熹, 胡鸿雁.基于用户需求的老年人可穿戴设备功能层次研究 [J].包装工程,2018(20):159-165.
- [3] 袁雨欣,尹典.适老化视角下智慧养老平台运行困境与优化路径[N].山西科技报,2026-06-08(A06).
- [4] 刘雷.人工智能驱动的艺术设计与适老化产品包装创新[J].上海包装,2024,(7):31-33.
- [5] 杨微,王琼.基于用户需求的适老化包装设计研究[J].中国包装,2024,44(5):125-127.

Research on Elderly-Friendly Product Packaging Design and Application Based on User Needs

Xiaoying Dong

(School of Arts,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Heilongjiang, Harbin, China)

Abstract:With the aging population getting worse, the quality of life and happiness of older adults is increasingly becoming a social concern, and the market for senior-friendly products is growing. Packaging design for senior-friendly products serves as an important communication bridge between the product and older users. Starting with user needs at its core, it fully considers the physiological, psychological, and habitual characteristics of seniors to improve product usability, safety, and emotional appeal. As the market for senior-friendly products gradually expands, this study focuses on packaging design for these products. It starts with user needs, analyzes the physiological, psychological, and behavioral characteristics of older adults, and explores how to optimize packaging design for seniors to enhance their user experience. The study also conducts in-depth research on its applications, aiming to provide both theoretical basis and practical guidance for packaging design of senior-friendly products.

Keywords:Aging-friendly; Product Design; Packaging Design; Aging-friendly Products

论《桃花扇》柳、苏作结的人物安排和结构表达

吴苑陶

(云南大学, 云南 昆明 10673)

摘要: 孔尚任所创作的《桃花扇》意图以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 其最后一出《余韵》以柳敬亭和苏昆生两位民间艺人为戏剧结尾, 是独具匠心的结构设计。现学界对人物和结构的研究多分而论之, 以此情节作为切入点把握人物安排和结构表达的关联及意义, 仍有较大的研究空间。从文本出发, 通过分析柳敬亭和苏昆生的历史真实结局和戏剧艺术结局, 这一人物安排乃是作者有意为之; 而与以此二人结尾的结构设计有机统一起来, 可见这一结构表达完成了左右两部人物的交汇集合、双线叙事的最终合流, 同时又以戏中戏的艺术表达丰富了作品的意蕴、启发观众抽离爱情叙事, 对桃花扇底所系的南朝兴亡旧事进行深入思考, 从而抵达孔尚任的创作初心, 领会《桃花扇》的思想艺术魅力。

关键词: 《桃花扇》; 柳敬亭; 苏昆生; 人物安排; 结构表达

DOI: doi.org/10.70693/202607065822

一、引言

清初剧作家孔尚任的《桃花扇》历来被视为中国古代历史剧的典范, 其写清初士子侯方域与歌妓李香君的离合, 牵出南明弘光小王朝的兴亡之事, 桃花扇上承载着深沉的历史慨叹。此剧构思精巧, 在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上皆具有很高的成就, 前辈学者多从《桃花扇》一剧整体入手, 作者孔尚任的生平经历、创作际遇以及创作思想、作品所涉及的历史真实与艺术表达、思想内容、叙事结构和各类人物形象, 都得到了众学者全面而深入的论证。

其中, 《桃花扇》的戏剧结构和人物形象皆为研究的热点论题。在这样一部艺术成就卓越的戏剧作品中, 此两方面是紧密联系、相辅相成的。孔尚任在写作时对人物以及人物相关的情节进行了独具匠心的安排, 他写有《桃花扇纲领》, 其中将剧中人物按照性别、阵营和作用分为五部, 这种人物安排在他看来很具意义, 实际上是服务于戏剧的情节建构和主题表达的。学界现有对人物和结构的分析, 多分而论之, 将二者统一起来研究, 尚有研究空间。具体到最后一出《余韵》而言, 尽管前人已注意到这一出的重要作用, 郭英德的《明清传奇史》论及《桃花扇》时借柳苏二人的唱词谈《桃花扇》戏剧的思想主旨[1]; 徐爱梅同样关注《余韵》一出承载的思想情感[2], 任中敏先生则看到了此创新结构的作用, 为分析结构与创作主旨提供了参考视野[3]。可见很少有研究者关注这一出的人物安排与结构表达的关联与意义。

基于此, 本文探讨作者为何选择让柳敬亭和苏昆生登场为戏剧结尾、这一人物安排和戏剧的结构表达之间存在的内在关联的问题, 深入文本分析研究这一安排之意义, 通过发现戏剧对历史人物结局的艺术加工, 阐明人物安排与结构表达有机关系, 并在对结构表达所具有的两大艺术效果的分析中抵达作者感叹兴亡的写作主旨。

二、柳、苏作结的人物安排

《桃花扇》最后一出《余韵》当中, 登台演唱的是柳敬亭和苏昆生。南明弘光小王朝已沉在历史的风沙当中, 这两位当年兴亡之事的亲历者最后用自己最擅长的说书弹词和唱曲, 评说历史沧桑, 把深沉的历史慨叹尽数唱进曲里。从作者自己撰写《桃花扇》种种前言和说明这一行为来看, 孔尚任在写作《桃花扇》时是抱持着高度自觉的结构意识的, 最后一出不言侯方域和李香君两位主角的后续故事, 而是让前面情节中起辅助作用的柳敬亭和苏昆生在台上为戏剧作结, 是一种独具匠心的对舞台人物的安排。而《桃花扇》刻画了一众栩栩如生的人物, 最后总结全剧的重要任务为什么落到被塑造成隐士的柳敬亭和苏昆生身上?

讨论这一点,首先要分析柳敬亭和苏昆生作为历史真实人物,被孔尚任选取、进入《桃花扇》这一出在各方面都力求接近真实的历史剧的用心所在。

(一) 考时地: 柳敬亭与苏昆生的历史真实结局

《桃花扇》是一出历史剧,能够进入《桃花扇》叙事的,大都是南明兴亡这一段历史中的真实人物,选用柳敬亭和苏昆生二人本就承载着作者的意图。

柳敬亭和苏昆生,一个是说书艺人,一个是唱曲大家,都是明末清初这段历史中真实出现过的人物,且在当时已经负有盛名。明末清初的大家吴伟业曾写有《柳敬亭传》,谈及柳敬亭因伎艺高超而被达官显贵引为座上宾,且其后来入左良玉军中,为其谋事,深得左良玉信任,切实参与了明朝末期的风云历史[4]。吴伟业所写的《柳敬亭传》提到柳敬亭在左良玉身死后选择重操说书的旧业;而同时期黄宗羲的《柳敬亭传》,同样说明柳敬亭颇受左良玉赏识一事,也提到柳敬亭在南明王朝灭亡后,仍然以说书谋生[5]。同样生活在明末清初的动荡时代的余怀著有《板桥杂记》一书,其《下卷·轶事》中则记柳敬亭“年已八十余矣,间过余侨寓宜睡轩中,犹说《秦叔宝见姑娘也》”[6],说明历史真实中的柳敬亭晚年依旧活在市井红尘当中。

相对柳敬亭而言,苏昆生相关的记载则较少。清初陈维崧有《贺新郎·赠苏昆生》一词,词前小序记“苏,固始人,南曲为当今第一。曾与说书叟柳敬亭同客左宁南幕下,梅村先生为赋《楚两生行》”[7],肯定了苏昆生在当时戏曲界的卓越地位,也说明苏昆生与柳敬亭曾同入左良玉幕中。吴伟业为柳敬亭和苏昆生二人写有《楚两生行》,其《并序》详细记有二人经历,也说明苏昆生和左良玉相识,并指出其在左良玉身死后有悲痛削发入山的归隐行为[8]。但最终,苏昆生还是回到了社会当中,继续漂泊的人生。历史真实中的柳敬亭和苏昆生,在南明王朝成为历史以后都选择了回归红尘社会。

(二) 传新奇: 孔尚任笔下二人结局的艺术表达

孔尚任让历史上与左良玉相交甚密、声名较显的柳敬亭和苏昆生进入所创作的《桃花扇》中,为了完成戏剧主旨的艺术表达,对二人的经历进行了艺术性的剪裁与再创作。柳敬亭的结局不再是真实历史的八十而终,而成了入山捕鱼;苏昆生的入山之举在被孔尚任留意到,并加以艺术提纯,成为戏剧中人物的最终结局。其以樵夫和渔夫这两大中国古代文学中经典的隐逸身份出现,可见柳敬亭和苏昆生二人在经历前面四十出的种种波澜后,也选择归隐山林、闲逸度日。在新朝派人入山搜寻隐士的时候各自逃入山中,以实际行动表明了不入新朝的决心。柳敬亭和苏昆生二人的行为在戏剧中并未循着入新朝的历史原型发展,而是选择了常常发生在遗民群体上的归隐山林作为结局。

在中国古代历史与文化中,改朝易代之际,不事新朝而隐入山林是遗民诸多选择中的一种,其先例最早可溯源至商周时遁入首阳山的伯夷和叔齐,此举可被视为对民族气节的坚守。在《桃花扇》中,柳敬亭和苏昆生两位混迹民间江湖的下层人士也如士子一般,高度具备民族气节和家国情怀。虽为传统意义上的社会下层人物,却因着满腔忠义热血,成为《桃花扇》中被塑造的最为精彩的人物;同时亦说明,南明王朝这段兴衰历史给人极大的触动,社会影响面很广,不必说侯方域一般饱读圣贤书的士子,就连演史的艺人们都为此伤心感怀,选择避祸山林,可见一朝兴亡带给广大人民极深的触动感怀。柳、苏二人在戏剧结尾处以隐士身份登场这种人物安排,是基于历史真实进行的富有艺术性的改动,强化和突出了作者想要表达的感叹兴亡的戏剧主旨。

总的来说,柳敬亭和苏昆生因南明历史亲历者和著名民间艺人的双重身份,得以被安排进入《桃花扇》的结尾叙事当中,承担起完整戏剧结构的重要任务。他们由单纯卖艺谋生而有几分本领的艺人变为亡国后坚守品行的隐逸者,由于他们在戏剧中亦如历史真实一般,全程深度参与了这一段惨痛的亡国历史,人物本身具有相当厚度的复杂情感体验;同时,此二人本身便具有高超的评说演唱本领,天然具备闲谈历史、唱演兴亡之情的技能,能够将桃花扇底系着的南朝之事精彩有力地演绎出来,这一层身份则为他们以说书和唱曲的形式完成总结与升华提供了才艺前提和情感基础。让柳敬亭和苏昆生为《桃花扇》收尾,有其人物安排和主旨表达上的合理性,也在侯、李双双入道的结局以后,再次续上对历史的总结以及对国破家亡之哀情的阐发,《桃花扇》这部历史剧的结构因柳、苏作结这一安排也显得更为圆融、紧密和完整。

三、柳、苏作结的结构表达

《桃花扇》为何以柳敬亭和苏昆生作结?除了前文所论此二人双重身份设置下必然的人物安排以外,另一层原因则在孔尚任自觉的结构意识驱动下所完成的艺术表达。《桃花扇》并没有随着侯李二人入道而结束,而是让柳敬亭和苏昆生唱出国破家亡的哀伤余韵,将个人离合之悲升华为家国兴亡之痛。结尾处的这一设计,不仅实现了左右两部人物的交汇集合,使得男主角侯方域和女主角李香君所代表的两条叙事主

线在结尾合二为一；而且达到了戏中戏的艺术效果，回环往复、余音袅袅。多重意蕴交织之下，戏剧结构得到了浑融严密的完美呈现，作者着力突出的历史之苍凉沉郁得到了有力表达。

(一) 牵密线：左右两部双线叙事的合流

从孔尚任自撰《桃花扇纲领》一文，将剧中人物分为五部来看，他的人物安排的确是有一定意识的，即“色者，离合之象也。男有其俦，女有其伍，以左右别之，而两部缙铢不爽。”[9]其中，柳敬亭作为“合色”[9]，分属以侯朝宗为代表的左部，苏昆生也作为“合色”[9]，分属以李香君为代表的右部。左右两部人物都与桃花扇串联起的侯、李爱情相关，其中，左部人物与侯方域有关，右部人物与李香君有关。而对于两部人物在情节发挥的作用，冯欣桐和史继东结合全剧情节结构，指出在侯李二人长期分离的基础上，一系列次要人物承担了联系两条叙事线索的功能[11]。柳敬亭和苏昆生二人，在设定上，则属于完善男女主角两条叙事线索的重要人物，分别参与到侯李二人相关的情节当中。此二人之于左右部具有关键意义。

首先，系统梳理《桃花扇》全剧中柳敬亭与侯方域相关的情节可见，柳敬亭作为孔尚任安排的“合色”[9]，在围绕男主角侯方域而展开的一系列叙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不仅见证了侯李二人的初次相见，也在最后陪伴侯方域前往栖霞山与李香君相见，是侯李爱情的实际见证者。同时，柳敬亭也见证了侯方域身上的民族大义。第八出《闹榭》一出，侯、李、柳、苏四人一同参加了复社文人的水榭集会，在敌视阮大铖此类奸佞这一件事上，四人本就志同道合；更重要的是，在《修札》一出中，柳敬亭帮助侯方域传书，而进入左良玉军中。这一行为在凸显其本人的英勇大义的同时，还间接使侯方域进入弘光朝宏大的政治历史叙事之中。作为复社文人的侯方域得以真正介入劝阻左良玉东下、挽救王朝危机一事，其身上的家国责任通过柳敬亭的义举而展现在众人面前。柳敬亭发挥了由男女个人离合爱情到社会普遍兴亡哀情的桥梁作用，是侯方域这名心怀家国的文人积极参与政治活动的有力助力。柳敬亭是男主这一条叙事线索中不可缺少的重要角色，之于侯方域的私情以及家国大义都有见证作用。

从第二出《传歌》苏昆生的上场可知，苏昆生与柳敬亭一样，都在得知阮大铖的奸邪后，愤然离去，这一设置赋予经历相似的柳、苏二人拥有了心怀大义的凛然性情，以及在各自的叙事线索中处于同等且对称的地位的可能。苏昆生更是深度参与了侯方域与李香君二人的离合爱情，他与柳敬亭一齐见证侯李二人的相见，并且与杨龙友一起完成了对染上鲜血的诗扇的改画，目睹了李香君的痴与烈。随后，他更是一路漂泊，落水性命危急之时也要把装有扇子的包裹高举，方将这一柄承载了李香君万千相思愁情的桃花扇送至侯方域手中。苏昆生的送扇之举使侯方域终于得知李香君之经历，为下文其前往南京寻李作情节上的铺垫，平行已久的两条叙事线索因苏昆生的行为得以短暂交汇。最后，亦是苏昆生陪同李香君去寻找侯方域，使得侯李二人得以在栖霞山会合。作为教授李香君唱曲的师傅，苏昆生一路相伴，在二人因时局长期处于分离状态时，尽力帮助李香君传情，也尽力营救侯方域，是使得两条平行的叙事线索得以交汇、推动二人悲欢离合之爱情发展的重要人物。

通过对相关情节的梳理，可见柳敬亭和苏昆生在长期平行的侯李两条叙事线索中相互对称，对二人情感的发展推波助澜，并通过相关的一系列波折的情节展现，让人从各个侧面看到了李香君的情和侯方域的义，如李国栋所言：“寄扇是为侯、李之情，传檄是为国家之事，一去一回，政治兴亡和婚姻爱情两条线索相互关联，在叙事脉络上形成了血肉交融双线结构。”[12]柳敬亭和苏昆生是左右部不可或缺的重要人物，在二人身上发生的情节多次使得两条故事线实现汇合，而不是从一而终的分离。剧中的侯方域和李香君长期分离，却被此二人牵连起来，双线叙事因此显得并不孤立和离散，而是始终交融前进，此即为试一出《先声》中所言“奸马阮中外伏长剑，巧柳苏往来牵密线”[9]之“牵密线”[9]。柳敬亭和苏昆生所牵出的戏剧情节，不仅是侯李故事的交融，更是男女爱情与历史浮沉的交织。

把握柳敬亭和苏昆生之于左右部人物双线叙事的重要作用以后，再看结尾，可见此二人为戏剧收尾可视为左右部所代表的两条叙事线索的最终合流，是合乎叙事逻辑、使得结构更加圆融完整的必然表达。随着南明王朝溃败、侯李入道，陪伴侯方域的柳敬亭和陪伴李香君的苏昆生在功能上完成了推进情感和情节发展的人物任务，二人因侯李的聚合而再次汇聚。柳苏的相会不再如同《闹榭》《访翠》中一般，仅是短暂相会；而是伴着侯李堪破情事的结局，以及尘埃落定的王朝历史，实现了日日相逢，这是《桃花扇》结构上的双线的彻底合一，比侯方域和李香君的相见更多了一份稳定。至此，戏剧由合到分，再由分到合，全部叙事收归到柳苏的演唱之中，整体结构完整圆融，趋于完美。也正是在柳苏的促膝闲话之中，奔腾着侯李所怀抱之浓郁情义的两条河流汇成一道，翻涌出浓厚的历史沉浮之思、家国兴亡之殇。个人情感经由两部人物的集合，被升华成普遍而厚重的历史感悟，实现了作者“场上歌舞，局外指点，知三百年基业，隳于何人？败于何事？消于何年？歇于何地？不独令观者感慨涕零，亦可惩创人心，为末世之一救矣”[9]的创

作意图的呈现。

(二) 唱兴亡：戏中戏的艺术笔法与思想意义

除了双线叙事的合二为一以外，以柳敬亭和苏昆生为戏剧作结尾的“大收煞”，关联着二人在戏中的民间艺人身份。柳敬亭唱弹词，苏昆生唱曲，在《余韵》这一出戏中，实际上于戏剧表演舞台上又套用了以演绎讲述为主的这两种民间艺术，形成了第二层表演。这和《传歌》一出李香君学唱《牡丹亭》的情节类似，是一种嵌套式的结构安排，都达到了戏中有戏的表达效果。这是传奇作品无所不包的兼容特性所造成的，《桃花扇小引》开篇即点出了传奇的综合性：“传奇虽小道，凡诗赋、词曲、四六、小说家，无所不包”[9]；而明代戏曲大家汤显祖也曾在《宜黄县戏神清源师庙记》中直陈戏的生发作用，认为其“生天生地生鬼生神，极人物之万途，攒古今之千变”[10]，由于戏剧的角色扮演特性，世间万物皆可在一方戏台上被敷演开来，戏剧表演中再嵌一层艺术表演，自然也是可行的。中国古典戏剧向来不乏戏中戏的呈现，戴谨忆认为这种戏中戏的结构表达能够“让戏内戏外的节奏进展的有条不紊，引导观众审美向‘场上’关注”[13]。可见，戏中戏的结构安排，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扩大表演容量、丰富内涵意蕴。说书讲史作为流传千年的民间艺术，本就具有理性敷演历史、感慨兴亡得失的传统功能。而《余韵》中，本就擅长讲史的柳敬亭充分发挥高超的说书本领，以一首新编的弹词【秣陵秋】，将南京旧事唱进格律工整的词里，唱词与前面四十出所演相照应，最后将南明王朝走向不可挽救的颓亡的历史深层原因揭露出来。此段弹词，言简意赅，评说精辟，的确实现了“六代兴亡，几点清弹千古慨；半生湖海，一声高唱万山惊”[9]的效果。而苏昆生所编的北曲【哀江南】，以套曲的形式唱尽朝代灭亡以后的物是人非，并注入了更多的悲恸伤感。《余韵》所嵌套的戏中戏，是在第四十出已经写全侯李堪破情事的结局之后，对戏剧真正想要书写的历史感慨的展现，戏剧所具备的社会意义及深度内涵在戏中戏的结构中显得更加丰富深刻。

此外，这种戏中戏的结构还能通过明确的提示，引导观众从戏剧极力营造的真切艺术世界当中适度抽离出来，与场上所演之事拉开现实与虚构的距离，从而在享受戏剧艺术审美的同时展开对场外之事的冷静思考。试一出《先声》当中，扮演老赞礼的副末就已经一语道破自己戏中人的身份，《桃花扇》由此敷衍开来，可见孔尚任有意识地提醒诸位看官，这仅仅是一本传奇、一场演出。而《余韵》柳、苏的收束结尾，则是将孔尚任的意图贯彻到底，在戏剧表演中杂以说书和唱曲，一新表演形式，带给观众新颖的观看体验，以这种别开生面的形式调动台下观众的注意力，让观众意识到此处表演戏中有戏，而非主线剧情的继续推进。这样一来，观众在将思绪从爱情叙事抽离出来的同时，自然地集中到柳、苏二人具体唱演的内容之上，从而保持对所演之事的理智思考。隐士山中闲歌，余音袅袅，唱的不是《桃花扇》所演出的侯方域和李香君的爱情故事，而是更普遍、更具深度的对于南明弘光小王朝的历史评说，其中有着深刻的对奸邪小人的痛斥、对误国昏君的批判，还有对朝代兴亡的哲思。这才是孔尚任前加试一出，后续《余韵》，苦心造出此一部《桃花扇》，以戏中戏结构启发人们思考其作戏意义的宗旨所在。

四、结语

《桃花扇》在四十出的基础上再添试一出《先声》，后有续四十出《余韵》，体现了孔尚任在戏剧结构安排上的创新，凝结着他的创作意图。在为侯方域和李香君二位主角安排双双入道的悲剧式结局后，《余韵》一出选择让柳敬亭和苏昆生登场为全剧收尾，本文即以此作为切入点，将人物安排和结构表达两大方面统一起来分析这一情节设计的创作匠心。

首先，二人具备历史亲历者以及民间艺人的双重身份，孔尚任将其戏剧结局加以艺术化加工，改为隐入山林度日，着力突出柳、苏二人所具备的遗民身份，其所抱持的民族气节可见一斑。这样的人物设置安排为二人以戏中有戏的说书唱曲表演总结此间兴衰历史提供了深厚的情感基础以及能力前提。同时，通过对相关情节的系统梳理，可见在柳、苏二人的“牵密线”之下，以侯方域为代表的左部和以李香君为代表的右部人物在尾声处实现了汇合，生旦双线叙事不再分离、最终合流，这不仅实现了结构上的圆满，而且让二人的情义被柳敬亭和苏昆生两位关键人物升华为更为普遍、更具哲思的亡国悲痛与兴衰思考。此外，这种说书唱曲作结的戏中戏安排，赋予了戏剧更丰富的内容意蕴，也启发戏外观众保持对戏剧所反映的历史现实的睿智思考，从而达到孔尚任“惩创人心，为末世之一救”[9]的创作目的。

总的来看，《桃花扇》一剧是匠心打造的有机整体，柳敬亭和苏昆生结尾则是人物安排和情节结构两大层面的有效统一。这种匠心设计，让人领会到孔尚任以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的创作初心，同时感悟《桃花扇》精湛的艺术魅力。若将研究视野自孔尚任笔下的一柄桃花扇投向中国古典戏剧的广阔天地，走进戏剧艺术结构的研究空间，亦可从类似柳、苏作结的情节小切口出发，通过深入挖掘人物结构之意义，抵达

古代戏剧的结构之美。

参考文献:

- [1] 郭英德. 明清传奇史[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1.
- [2] 徐雪梅. 孔尚任和《桃花扇》新论[M]. 济南: 山东大学出版社, 2013.
- [3] 任中敏编著, 许建中, 陈文和点校. 新曲苑: 下[M]. 南京: 凤凰出版社, 2014.
- [4] 吴伟业. 梅村家藏稿: 卷五十二 文集三十 传[M]. 四部丛刊景武进董氏新刊本.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29.
- [5] 黄宗羲著, 沈善洪主编, 吴光执行主编. 黄宗羲全集: 第十册[M]. 杭州: 浙江古籍出版社, 2007.
- [6] 余怀著, 李金堂校注. 板桥杂记 (外一种) [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0.
- [7] 陈维崧著, 陈振鹏标点, 李学颖校补. 陈维崧集: 下册[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0.
- [8] 吴伟业撰, 程穆衡原笺, 杨学沆补注. 吴梅村诗集笺注: 上册[M]. 北京: 中华书局, 2020.
- [9] 孔尚任著, 王季思, 苏寰中, 杨德平校注. 桃花扇[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22.
- [10] 汤显祖著, 徐朔方笺校. 汤显祖集全编[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5.
- [11] 冯欣桐, 史继东. 论《桃花扇》中柳敬亭、苏昆生的功能性作用[J]. 贵州师范学院学报, 2020, 36(7): 1-6.
- [12] 李国栋. 论《桃花扇》的叙事结构[J]. 四川戏剧, 2015(12): 90-96.
- [13] 戴谨忆. 明清戏曲“戏中戏”场上审美样式研究[J]. 戏曲艺术, 2021, 42(2): 56-60.

On the Character Arrangement and Structural Expression of the Ending with

Liu Jingting and Su Kunsheng in The Peach Blossom Fan

Wu Yuantao

(School of Liberal Arts, Yunnan University, Kunming, Yunnan, China)

Abstract: Kong Shangren's *The Peach Blossom Fan* (*Taohua shan*) is conceived with the intent of delineating the vicissitudes of dynastic rise and fall through the lens of personal love and separation. Its final act, "The Lingering Tone" (Yuyun), brings the drama to a close with two folk performers, Liu Jingting and Su Kunsheng—a structurally deliberate and meticulously crafted design. While existing scholarship has largely examined characterization and dramatic structure as separate domains, a holistic inquiry into the interplay between character arrangement and structural expression, centered on this particular closure, remains an open terrain. Proceeding from a close reading of the play, this paper first examines the historical fates of Liu and Su in contrast to their dramatic destinies, revealing Kong's conscious authorial intervention. It then demonstrates how this character arrangement, when read in organic unity with the structural design of the finale, accomplishes a dual convergence: the synthesis of the play's two character divisions (left and right) and the ultimate fusion of its bifurcated narrative lines. Furthermore, the embedded "play-within-a-play" device enriches the work's thematic resonance, inviting the audience to detach from the romance narrative and redirect their contemplation toward the deeper historical vicissitudes of the Southern Dynasties that lie beneath the peach-blossom fan. In so doing, the play attains Kong Shangren's original authorial vision, and the reader gains a fuller appreciation of the intellectual and artistic power of *The Peach Blossom Fan*.

Keywords: *The Peach Blossom Fan* (*Taohua shan*), Liu Jingting, Su Kunsheng, character arrangement, structural expression

陕西红色体育文化的理论内涵、时代价值与发展路径研究

张卓¹，冯佳慧¹，唐勛¹，范耀元¹，熊芮姝涵²，梁静¹

(1.西安医学院卫生管理学院，陕西 西安 710021；2.西安医学院临床医学院，陕西 西安 710021)

摘要：目的：阐明陕西红色体育文化的内在结构、现实价值与发展路径，为地方红色文化资源活化和体育文化建设提供理论参考。方法：采用文献分析、历史梳理与逻辑分析等方法，基于体育强国、全民健身和文化强国建设背景下，对陕西红色体育文化的历史生成、精神内核、实践载体与转化机制进行归纳分析。结果：陕西红色体育文化并非红色符号与体育活动的简单叠加，而是以革命历史记忆为基础、以身体实践为媒介、以群众参与和社会教育为功能取向的复合型文化形态。其当代价值主要体现在丰富体育强国建设的文化内涵、深化学校体育育人功能、增强区域文化认同、推动文旅体融合发展、完善中国体育文化叙事等方面。结论：推动陕西红色体育文化内涵式发展，应从资源谱系整理、理论阐释深化、体验场景建构、课程体系融入、数字传播创新和协同治理完善等方面协同推进，并逐步形成可评估、可反馈、可持续的建设机制。

关键词：陕西；红色体育文化；时代价值；内涵式发展；体育文化传播

基金项目：陕西省体育局2025年常规课题（编号：20251324）；陕西省“十四五”教育科学规划2025年度课题“深度学习视域下医学院校管理类课程设计与应用研究”（SGH25Y3603）

DOI: doi.org/10.70693/202607064599

一、引言

红色体育文化并不是一个只属于体育史的概念。它既关乎革命年代的身体训练、群众动员和组织生活，也关乎新时代体育文化如何讲好中国故事、地方故事和人民故事。陕西在中国革命历史中具有特殊地位，延安及陕甘宁边区留下的大量革命文化资源，使陕西红色体育文化具有鲜明的地域根脉。与单纯的体育赛事、场馆展示或红色旅游相比，红色体育文化更强调人在运动中的体验、记忆和认同：身体锻炼塑造意志，集体活动形成纪律，群众参与连接历史与现实。

近年来，体育强国建设和全民健身战略不断强调体育文化、群众参与和人的全面发展^[1-2]。与此同时，关于红色体育发展进程、历史意义、时代价值和群众体育功能的研究逐渐增多，相关成果为红色体育文化的理论阐释提供了基础^[3-7]。但就陕西地域语境而言，现有研究对红色体育文化资源的地方转化、体验机制和评价路径讨论仍显不足。具体来看，仍有三个值得追问的问题：陕西红色体育文化的“体育性”体现在哪里？它与一般红色文化、一般体育文化的区别是什么？在当下又如何从纪念性资源转化为可参与、可传播、可评价的文化实践？基于上述问题，本文采用文献分析和逻辑分析方法，对陕西红色体育文化的理论内涵、时代价值与内涵式发展路径进行梳理。

二、陕西红色体育文化的理论内涵

讨论陕西红色体育文化，不能把它简单理解为“红色主题+体育活动”的组合。其内涵至少包含历史生成、

作者简介：张卓（1989-），女，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公共管理；
冯佳慧（1990-），女，会计师，研究方向为公共管理；
唐勛（2004-），男，本科在读，研究方向为公共政策；
范耀元（2006-），女，本科在读，研究方向为公共管理；
熊芮姝涵（2007-），女，本科在读，研究方向为健康管理。

通讯作者：梁静

精神结构、身体实践和载体系统四个层面。

(1) 历史生成：从边区生活到人民体育传统

陕西红色体育文化形成于特定历史情境之中。延安时期和陕甘宁边区的体育活动，常常与军事训练、劳动生产、学校教育和群众文化生活结合在一起。它并非现代竞技体育制度的简单复制，也不是单纯以比赛成绩为目标的项目组织，而是在艰苦环境中服务于增强体质、振奋精神、凝聚组织和改善生活的社会实践。由此看，陕西红色体育文化的历史根基并不只存在于某一项运动或某一场赛事之中，而是体现在革命时期体育与人的生存、教育、组织和共同体建设之间的关系之中。相关体育史和红色体育文化研究也表明，革命时期体育活动往往与军事训练、群众动员和社会教育相结合^[8-9]。

(2) 精神结构：以人民立场和奋斗品格为核心

红色体育文化的“红色”并非外在标签，而是体育实践中蕴含的价值取向。体育活动强调力量、耐力、速度、规则和协作，革命历史语境又赋予这些身体经验更深的精神意义。它所呈现的不只是“强身健体”，还包括艰苦奋斗、团结协作、遵守纪律、服务集体和依靠群众等价值。对陕西而言，这种精神结构与延安精神、群众路线和边区社会生活之间存在内在联系。因此，阐释陕西红色体育文化时，应避免只讲故事和口号，而要解释体育实践如何把精神价值转化为可体验的行为。

(3) 实践形态：身体经验与社会教育的结合

体育区别于一般文化传播的重要特征，在于它以身体参与为媒介。红色体育文化的教育功能，也不是仅靠观看展板或聆听讲解实现的。操练、竞赛、游戏、行进、远足、队列和集体项目等活动，会把历史记忆转化为身体经验，使参与者在运动中理解纪律、协作和坚持。这一特点说明，陕西红色体育文化的活化不宜只依赖静态展陈，更应重视体验式、参与式和情境化设计。

(4) 载体系统：从史料保存到场景转化

陕西红色体育文化的载体并不单一。革命旧址、纪念馆、地方志、口述资料、图片影像、学校课程、群众赛事、研学线路、数字平台和公共体育空间，都可以成为承载红色体育文化的媒介。不同载体有不同功能：史料负责保存事实，场馆负责呈现场景，课程负责转化知识，赛事负责形成体验，数字平台负责扩大传播。内涵式发展的关键，不是不断增加活动数量，而是让这些载体之间形成互相支撑的系统。

三、陕西红色体育文化的时代价值

新时代体育发展已超越单纯竞技成绩或健身活动的范围，体育越来越多地与文化认同、公共服务、青少年教育和社会治理发生联系。《体育强国建设纲要》将体育文化建设纳入体育强国建设框架^[1]，《全民健身计划（2021—2025年）》强调全民健身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中的基础作用^[2]。在这一背景下，陕西红色体育文化的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1) 为体育强国建设补充历史维度

体育强国不只意味着竞技水平提升，也意味着体育精神、体育传统和体育文化的充分发展。陕西红色体育文化保存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发展体育事业的早期经验，它提醒人们：体育并不是脱离社会的身体技术，而是与国家命运、人民生活和社会组织紧密相关的文化实践。将这种历史维度纳入体育强国叙事，有助于纠正体育文化传播中过于强调赛事成绩和消费场景、相对忽视精神传统和社会教育的问题。

(2) 为学校体育育人提供地方素材

学校体育承担着技能传授、体质提升和价值塑造的复合任务。陕西红色体育文化具有鲜明地方性，适合转化为体育课程思政、校园体育活动和研学实践内容。比如，可以围绕延安时期体育实践、边区群众体育、革命体育人物和红色体育精神开发专题模块，将历史讲述、运动体验和课堂反思结合起来。这样既能避免课程思政

与体育教学“两张皮”，也能使学生在具体运动情境中理解体育与国家、社会和个人成长的关系。这也与当前体育思政和体教融合研究中强调的价值引导方向相一致^[10]。

（3）为区域文化传播提供参与式路径

陕西红色文化资源丰富，但资源优势并不会自动转化为传播优势。单向讲解和纪念式参观容易形成“看过即止”的浅层体验，而体育活动具有参与性和可重复性，能够把历史叙事转化为公众可以进入的生活场景。红色主题健步走、定向越野、校园运动会、社区健身节、红色体育研学线路等形式，都可以让红色文化从“被观看的历史”转化为“可参与的实践”，进而增强红色文化传播的体验深度和持续性^[3]。

（4）为文旅体融合形成差异化品牌

文旅体融合需要辨识度。陕西具有红色文化、历史文化和自然地理资源叠加的优势，红色体育文化能够在其中发挥连接作用。一方面，体育活动可以延长红色旅游的体验链条；另一方面，红色叙事又可以提升群众健身和户外运动的文化厚度。关键在于避免把红色元素简单贴附到商业活动上，而要以尊重历史、保护资源和提升公共文化服务为前提，形成具有陕西特色的文化品牌，从而提升文旅体融合发展的辨识度和可持续性。

四、当前发展中的主要问题

既有研究已注意到红色体育文化在资源整合、传播方式和实践转化方面存在现实困境^[7,11]。陕西红色体育文化建设已经具备较好资源基础，但从“拥有资源”到“形成影响”之间仍有距离。结合相关研究与现实推进情况，当前问题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1）资源整理仍显分散

红色体育文化资源分布在革命旧址、地方志、学校史、体育史资料、纪念馆陈列和口述记忆之中，资料来源较广，但整合程度有限。一些资源尚未形成清晰目录，也缺少按人物、事件、场所、项目、文献和精神主题进行分类的框架。没有资源谱系，后续阐释和传播就容易停留在零散故事层面。

（2）理论阐释容易停留在概念叠加

部分实践把红色体育文化理解为在体育活动中加入红色标语、红色路线或纪念仪式，忽视了体育本身的身体性、组织性和教育性。这种做法短期内容易形成活动声量，却难以沉淀为稳定的文化影响。红色体育文化需要解释“为什么通过体育能够传承红色精神”，而不仅是说明“哪些体育活动可以使用红色主题”。

（3）传播方式对青年群体吸引不足

当前不少传播仍以文字说明、图片展板、现场讲解和一次性活动为主。对于习惯移动端信息获取和互动体验的青年群体而言，单向传播的吸引力有限。红色体育文化要进入青年日常生活，需要把历史叙事、身体参与和数字传播结合起来，在短视频、数字地图、线上课程、互动任务和社交媒体叙事等方面进行再设计，而不是简单把线下内容搬到线上。

（4）建设成效缺少稳定评价工具

红色体育文化建设涉及资源保护、理论阐释、课程转化、活动组织、传播效果、社会参与和保障机制等多个维度。如果缺少评价体系，就难以判断哪些项目真正产生教育效果，哪些活动只是形式热闹。评价不足还会影响经费投入、项目改进和经验推广，使建设工作更多依赖经验判断。

五、内涵式发展的推进路径

内涵式发展强调质量提升和价值转化，而不是活动数量的简单扩张。对陕西红色体育文化而言，内涵式发展应围绕“资源—阐释—体验—课程—传播—评价—治理”的链条展开。

（1）建立资源谱系，夯实研究和转化基础

应围绕人物、事件、场所、文献、项目和精神主题六个维度，系统梳理陕西红色体育文化资源。资源整理不应只服务于宣传材料编写，更应形成可供研究、教学、展陈和活动设计使用的基础数据库。对于史料出处、时间背景、人物关系和地域空间，应尽量做到可核验、可追溯，避免过度演绎和符号化包装。

(2) 强化理论阐释，提升红色体育文化辨识度

陕西红色体育文化要形成影响力，首先要讲清自身特质。可以从人民体育传统、身体实践教育、群众动员机制、延安精神转化和地方文化认同等角度建立解释框架。理论阐释越清晰，课程开发、展陈设计、活动策划和品牌传播就越有依据。尤其要强调体育的独特作用：它不是红色文化传播的附属形式，而是把精神价值转化为身体经验和群体行动的重要方式。

(3) 设计体验场景，使红色文化可参与

应从“参观式传播”转向“参与式传播”。在革命旧址、红色教育基地、校园、社区和公共体育空间中，可开发红色主题健步走、定向赛、体育研学、校园红色运动会、社区体育节等活动。活动设计要避免单纯娱乐化，应将历史背景、运动任务和反思环节结合起来，使参与者在运动后能够理解活动背后的历史意义和精神内涵。

(4) 融入学校体育，推动课程与实践结合

学校是红色体育文化传承的重要场域。陕西高校和中小学可结合地方资源，建设红色体育文化课程模块。课程内容既可以包括红色体育史、体育人物和革命时期体育实践，也可以设计与学生年龄相匹配的运动体验、主题竞赛和社会实践。教师在组织教学时，应避免把红色体育文化变成课堂说教，而要通过运动参与、资料阅读、小组讨论和实践反思形成完整学习过程。

(5) 创新数字传播，扩大青年群体覆盖面

数字传播不是简单“上线”，而是对内容进行重新组织。可建设陕西红色体育文化数字地图，将历史地点、体育故事、运动线路和研学任务关联起来；也可围绕典型人物、事件和运动场景制作短视频、微课程和互动任务。数字平台应突出轻量化、互动性和可分享性，使红色体育文化进入青年群体的日常媒介环境。

(6) 完善协同治理，形成长期运行机制

红色体育文化建设涉及体育、教育、文旅、宣传、档案、学校、社区和社会组织等多元主体。应建立跨部门协同机制，明确资源保护、课程开发、活动组织、传播推广和成效评价等职责。高校和科研机构可承担理论研究和评价工具开发；学校和社区可承担日常化实践；文旅机构和社会组织可提供场景与服务。只有形成稳定分工，红色体育文化才能避免“一阵风”式活动化。

(7) 建立评价体系，增强建设工作的可反馈性

后续研究可从资源基础、价值阐释、教育转化、传播效能、社会参与和保障机制等维度构建评价指标体系。具体方法上，可先通过文献分析和专家访谈形成初始指标，再采用德尔菲法进行指标筛选，运用层次分析法确定权重，最后结合模糊综合评价或案例比较检验其适用性。评价的目的不是制造复杂表格，而是帮助地方判断建设成效、发现薄弱环节并持续改进。

表 1 陕西红色体育文化内涵式发展评价维度建议

评价维度	主要观察点	功能指向
资源基础	史料完整度、资源保护状况、空间可达性	判断资源是否具备转化条件
价值阐释	理论表达、精神提炼、叙事完整度	提升文化辨识度和学术支撑
教育转化	课程融入、活动设计、学生参与反馈	服务学校体育育人和课程思政
传播效能	媒体覆盖、互动参与、青年群体接受度	扩大公共传播影响

社会参与	社区、学校、社会组织和公众参与程度	推动日常化与生活化传承
保障机制	部门协同、经费支持、人才队伍和评价反馈	保证长期运行和持续改进

六、结论

陕西红色体育文化是红色文化与体育实践在特定历史情境中形成的复合型文化形态。其理论内涵不仅包括革命历史中的体育活动,也包括人民立场、奋斗品格、集体协作、身体实践、社会教育和多元载体等内容。其当代价值并不止于历史纪念,更在于能够为体育强国建设、学校体育育人、区域文化传播和文旅体融合提供具有地方辨识度的文化资源。

当前,陕西红色体育文化发展仍面临资源分散、阐释不足、传播单一、评价缺失和协同不够等问题。推动其内涵式发展,应在尊重历史真实性的基础上,建立资源谱系,深化理论阐释,设计参与式体验场景,融入学校体育课程,创新数字传播,并完善跨部门协同治理机制。未来研究还可进一步通过专家咨询、层次分析和案例验证等方法,构建更加稳定的评价工具,推动陕西红色体育文化建设从经验推动走向科学评估和持续改进。

参考文献:

- [1] 国务院办公厅. 体育强国建设纲要[EB/OL]. (2019-08-10)[2026-07-05].
- [2] 国务院. 全民健身计划 (2021—2025 年) [EB/OL]. (2021-08-03)[2026-07-05].
- [3] 闵航, 张凤彪. 红色体育助力新时代群众体育发展研究[J]. 体育学刊, 2022, 29(1): 30-35.
- [4] 刘洋波. 论红色体育文化的历史意义与时代价值[J]. 体育研究与教育, 2014, 29(3): 6-9.
- [5] 李洁明. 中国红色体育的发展进程与特征分析[J]. 体育成人教育学报, 2015, 31(4): 59-62.
- [6] 刘波. 红色体育文化的历史意义与时代价值分析[J]. 佳木斯职业学院学报, 2019(2): 124, 126.
- [7] 黄正廩, 刘小芹. 红色体育文化的发展困境及路径选择[J]. 遵义师范学院学报, 2018, 20(2): 152-156.
- [8] 谷世权. 中国体育史[M]. 北京: 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 2003.
- [9] 党挺. 中国红色体育文化研究[M]. 北京: 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 2013.
- [10] 杜雅, 李红霞. 中华体育精神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实现路径: 以“体育思政”深化“体教融合”[J]. 北京体育大学学报, 2021, 44(6): 149-158.
- [11] 黄文宾. 红色体育文化的当代价值与实践路径[J]. 体育研究与教育, 2017(5): 38-40.

Theoretical Connotations, Contemporary Value and Intensive Development Path of Red Sports Culture in Shaanxi

Zhang Zhuo¹, Feng Jiahui¹, Tang Xu¹, Fan Yaoyuan¹, Xiong Ruishuhan², Liang Jing¹

(1. School of Health Services Management, Xi'an Medical University, Xi'an, Shaanxi, China; 2. School of Clinical Medicine, Xi'an Medical University, Xi'an, Shaanxi,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his paper clarifies the internal structure, contemporary value and development path of red sports culture in Shaanxi, so as to provide a theoretical reference for the activation of local red cultural resource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sports culture. Methods: Literature analysis, historical review and logical analysis are used to examine the historical formation, spiritual core, practical carriers and transformation mechanisms of Shaanxi red sports culture in the context of building a leading sports nation, promoting national fitness and strengthening cultural development. Results: Red sports culture in Shaanxi is not a simple combination of red symbols and sports activities. Rather, it is a compound cultural form based on revolutionary historical memory, mediated by bodily practice, and oriented toward mass participation and social education. Its contemporary value lies in enriching the cultural dimension of sports development, strengthening value education in school sports, enhancing regional cultural identity, promoting the integration of culture, tourism and sports, and improving the narrative of Chinese sports culture. Conclusion: The intensive development of red sports culture in Shaanxi should be advanced through systematic resource classification, deeper theoretical interpretation, experiential scene construction, curriculum integration, digital communication innovation and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A sustainable evaluation and feedback mechanism should also be gradually established.

Keywords: Shaanxi; red sports culture; contemporary value; intensive development; sports culture communication

“隐而不逸”：论明遗民从“外王”走向“内圣”的隐逸心理 ——以王夫之为例

方慧琳

(同济大学, 上海 200092)

摘要：明末清初是中国历史上大分化、大变革、大动荡的特殊时代。面对朝代鼎革，王夫之先是进行武装反清，后失望于南明朝廷，走向了遗民之隐。异族的统治、清廷的逼迫，使得王夫之将“隐”作为一种抵抗清朝的消极方式。然而，王夫之从未享有隐居之乐，物质上和精神上的压力都使他陷入痛苦和煎熬的境地，“隐而不逸”是其隐逸心理的真实写照。但不逸之隐有其重要意义，从“外王”到“内圣”的存道之法，正是王夫之在无道之世中隐居的意义所在，也是王夫之身为前朝遗民的价值所在。

关键词：王夫之；隐而不逸；内圣外王；遗民存道

DOI: doi.org/10.70693/202607146809

“隐与仕自古就是士大夫生活的两极，隐遁和逃世一直是中国古代人生观的重要内容。”^[1]但同为“隐”，遗民之隐与逸民之隐又有不同。正如明遗民归庄所言：“凡怀道抱德不用于世者，皆谓之逸民；而遗民则惟在兴废之际，以为此前朝之所遗也……遗民之称，视其一时之去就，而不系乎终身之显晦。”^{[2][170-171]}由此可见，遗民与逸民都有着“不用于世”的共同选择，但遗民的“不仕”比之逸民又多了几分兴废之际的无奈和矛盾，这和逸民出于对精神自由的追求而归隐田园有着本质上的不同。处于明清易代之际的明朝遗民，也大多在反清复明失败之后选择了归隐山林，远离新朝，王夫之、黄宗羲不外如是。本文即以王夫之为例，通过对其隐逸心理的深入探析，“盖亦欲观微知著，借‘个人良知’以察‘集体良知’”^[3]，试图揭开当时遗民士大夫群体精神世界的一角。

一、“遗民久愤”：王夫之从抗争到归隐的人生转向

王夫之出生在动荡不安、危机四伏的晚明时期，青年时期的他与大部分儒生一样，致力于科举一道，以求进入仕途、为国效力，实现“治国、平天下”的至高理想。崇祯六年起，王夫之开始参加乡试，屡战屡败、屡败屡战，前前后后进行了整整三次乡试，终于在崇祯十五年得以考中举人。同年，王夫之赴京参加会试，然而，因李自成军克承天，张献忠军攻蕲水，道路被阻，他只好自南昌而返。可以说，如果没有农民起义，没有明清易代的政治变局，王夫之会一心一意地走科举仕途，实现他的人生理想，但是李自成的农民军阻断了他北上“圆梦”的道路，历史的潮流推动着王夫之选择了一条坎坷但多彩的人生道路^[4]。

公元1644年，伴随清军入关和崇祯皇帝自缢，明朝大一统政权彻底颠覆，整个社会秩序土崩瓦解。值此鼎革之际，王夫之和其他儒生士大夫一样，面临着政治身份丢失的现实困境，他们多年来为科举和理想做出的努力付之东流，相对稳定的生活环境也被打破。彼时的王夫之悲愤欲绝，诗曰：“悲风动中夜，边马嘶且惊。壮士匣中刀，犹作风雨鸣。”^{[5][126-127]}诗歌慷慨激昂，表露出王夫之希望为国效力的拳拳之心。

1648年，王夫之的家乡衡阳失陷，这更激起了他反清的决心，并促使其付诸行动。家乡陷落之后，王夫之与管嗣裘一同组织武装力量以抗击清兵，但无奈己方势弱难以成事，不久便溃败而退。之后，他南赴肇庆，官至永历朝行人司行人，此时他又将复国的希望寄托于南明朝廷。然而，永历朝廷正值内部党争势同水火之时，王夫之因数次弹劾首辅王化澄而几陷大狱，几经徘徊后至桂林追随瞿式耜。不久，桂林陷没，瞿式耜殉难，王夫之眼

作者简介：方慧琳(2002—)，女，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政治思想、中国古代哲学。

看永历朝廷岌岌可危，恢复无望，乃决心隐遁。几年之后，孙可望挟持永历帝，两次以君命招王夫之前往，“久陷异土，既以得主而死为歆。托比匪人，尤以遇巷非时为戒”^{[6]183}，那时的王夫之还心存报国之志，但南明朝廷腐败分裂、孙可望把持朝政的现实又让他踌躇，他察觉到贸然前往非但不能有所作为，反而很可能白白葬送自己，因此陷入了“得主而死为歆”和“遇巷非时为戒”的思想斗争之中。他进退失据，极为痛苦：“欲留则不得干净之土以藏身，欲往则不忍就窃柄之魁以受命，进退萦回，谁为吾所当崇事者哉？”^{[6]183}最终，他还是决定留着有用之身以寻找别的价值实现之途。

1662年，永历帝朱由榔在昆明身亡，南明自弘光、隆武至永历风雨飘摇十七载，最终还是无可挽回地走向了灭亡。南明朝廷的覆灭给了遗民们沉重的一击，根本上动摇了他们恢复故国的信念，多数负隅顽抗的遗民也渐渐看清了“事之不可为”的现实，放弃了对清政府的军事抵抗，大规模的反清斗争已然成为过去。至此，明朝政权彻底结束，王夫之则坚持不仕新朝，在清政府的追捕施压下，他窜身窑洞，伏处深山，后回到家乡衡阳潜心治学，在石船山下筑草堂而居，真正走向了遗民之隐。

二、“遗民泪尽”：王夫之“隐而不逸”的心理探析

南明亡后，王夫之深知故国难以重建，痛不欲生，相反，清朝统治却日益稳固，再难动摇。“遗民泪尽胡尘里”，这是南宋爱国词人陆游发出的悲叹，复明无望的王夫之又何尝没有体会到“泪尽”的滋味呢？痛苦悲愤之下的王夫之毅然决然地选择了归隐山林，以一种别样的方式对新朝进行抗争。然而，所谓“隐逸”，“隐”与“仕”有分，“逸”与“缚”相对，能做官而不做或不屑做者谓之“隐”，在束缚中而不为其所困者谓之“逸”，显然，能“隐”者不一定能“逸”，能“逸”者也不一定要“隐”。诚然，王夫之选择了“隐”的生活方式，但隐后的他面临着物质上和精神上的双重困境，物质的匮乏和精神的痛苦使得他无法真正做到超脱的“逸”，可以说，“隐而不逸”是王夫之遗民隐逸心理的真实写照。

（一）作为一种消极抵抗的“无道则隐”

“隐”作为明遗民普遍选择的生活方式，实际上是一种消极抵抗的“无道则隐”。遗民作为儒者，其关怀和抱负本以仕为基础，“士之仕也，犹农夫之耕也”^{[7]79-80}，因此，当南明尚存之际，遗民大多主动谋求官职，尽显自己的儒者担当，王夫之就是如此。可见，明遗民之不仕，并非不欲仕，而只是不欲仕于清而已，这种“隐”的方式只针对于新朝政治，很大程度上代表着明遗民对满清朝廷的反抗以及对其政治合法性的否定。

在王夫之看来，明清易代并非一般意义上的王朝更替，而是“异族入侵，以夷易夏”的无道之世。因此，他在明亡之初反复强调夷夏之别，在他的观念里，只要不是异族统治，皇族改姓无甚关系，正如他所言：“君权可继、可禅、可革，而不可使夷类间之。”^{[8]501}换句话说，君臣伦常固然重要，但比之“华夷之辨”，它是排在第二位的，对于华夏民族而言，立君的主要目的是“保其族”“卫其群”，从而不被文明程度落后的异族“夷狄”入侵和占领。^{[9]394}在《原极》中，他还进一步指出：“人不自矜以绝物，则天维裂矣。华夏不自矜以绝夷，则地维裂矣。天地制人以矜，人不能自矜以绝其党，则人维裂矣。”^{[8]501}显然，王夫之在这里将“华夷之辨”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即维系天、地、人纲常秩序的纽带，从而在华夷之间设置了一道无法逾越的屏障。不可否认，以现代的眼光来看，王夫之的夷夏思想是具有一定局限性的，但却有着其时代的合理性：孔子之后，“华夷之辨”被视作“春秋大义”，满之清取代汉之明，在深受儒家传统影响的王夫之看来，是野蛮对文明的征服，是中华传统文明的失落。因此，在明遗民的道德标准中，入仕清朝，不仅在政治道德上意味着背叛旧明，在君臣伦理上意味着舍弃“旧君”，在个人操守上意味着有失节义，更在民族大义上意味着亲附异族，在思想道义上意味着抛弃正统。^[10]很明显，这种道德律的基本底线在于“不仕二姓”以及“不予合作”。同时，儒家开创的传统——“天下有道则现，无道则隐”，也指明了“隐”不仅可以具有明确的政治立场，也可以成为政治斗争的手段。因此，清之代明的无道之世使得“隐”成为必要，而“无道则隐”的儒家传统又赋予“隐”以合法性，这构成了王夫之选择归隐的根本原因。

当然，清政府强硬的逼迫，如剃发、易服等严苛法令，是促使王夫之归隐最直接的原因。剃发、易服与否从来就不仅仅代表风俗习惯的变化，在满族和汉族看来，它是具有高度敏感性的政治话题。满族认为，只要汉人愿

意剃发，并且换下自己民族的传统衣冠，就会断其归明之路，从而效忠清朝；对王夫之等汉族人士而言，剃发、易服就代表着投降，代表着对故国的背叛，代表着对汉族文明的遗弃。因此，王夫之不愿屈服，选择了逃窜深山、归隐山林，坚持捍卫自己身为汉人的尊严。同时，正是清政府采取的这一系列逼迫政策，让王夫之对“无道之世”的感觉更为强烈。

其实，“隐”这一方式得以长期存在于遗民群体中，依赖于“通三统”的传统，正是这一传统使得清政府得以允许隐逸遗民的存在，而非赶尽杀绝。所谓“通三统”，张祥龙先生曾解释道：“以新王或新时代为主导之统，但同时要让前两统或前两王之后代以非主导的或边缘的方式存在；也就是此二者被退封百里而为公侯国，‘使服其服，行其礼乐，称客而朝’，这二统仍奉其祖先当王时的正朔时制，因而在其方圆百里的公国中仍服其故有之服色，行故有之礼乐，当朝天子也以‘客待之，而不臣也’。”^{[11]227-228}由此可见，暂居于正统的一方，应当给予边缘一方以“客待之，而不臣也”的尊重，这为新朝对待遗民提供了可供参考的明智标尺。正是因为如此，当奉行旧时正朔的王夫之选择归隐山林，不再像早期那样进行反清复明的武装斗争，清朝政府也选择了默许，事实上，清初统治者采取的众多文化政策中，其中一项即是招纳隐逸，到康熙朝，清政府对这些隐逸遗民更是礼遇有加，是以，庙堂与山林、新朝与旧统之间得以“各行其道”。

总之，相对于早期对清政府的军事抵抗，“隐”的方式更加温和和消极。南明尚存的时候，王夫之心中仍有复明的希冀，南明覆灭、清朝统治日益稳固，满族入主中原已成定局，可以说，王夫之唯一的希望也破灭了，因此，在这无道之世中，王夫之秉持着“天下无道则隐”的原则，选择了“隐”这一方式来进行消极的反抗，换言之，王夫之深知复国无望，从而选择了不暴力也不合作的消极态度——“隐”。而当王夫之放弃了武装反清，转而选择归隐之后，清政府也在“通三统”的原则下默许了“隐”这一行为，使得“隐”能够成为王夫之长期继续的生活方式。

（二）“隐而不逸”：王夫之的矛盾与痛苦

面对异族统治的无道之世，王夫之不甘于也不屑于走进阶荣身之道，那么可以预料，他的仕途之贫是注定的，至于生活之贫，虽不像仕途之贫那样难以避免，但诚如孙静庵在《明遗民录》的自序中称：“宋明以来，宗国沦丧，予遗馀民，寄其枕戈泣血之志，隐忍苟活，终身穷饿以死，殉为国殇者，以明为尤烈。”^[12]王夫之的物质生活也是非常贫困的，最艰难之时甚至于书写用的纸笔都需友人资助。可以说，生活之贫、仕途之贫抑或称精神之贫是隐逸遗民生存状态的最好概括，当然也有例外，如四处流亡的顾炎武便是一个擅长治生之道的遗民，他的生活并不像其他遗民那样捉襟见肘，但如顾炎武这般的终是个例，大部分隐逸遗民还是像王夫之那般穷困潦倒。是以，在物质和精神的双重压力下，王夫之虽“隐”却不“逸”，甚至可以说是矛盾和痛苦的。

具体来讲，“不逸”一方面是由于“治生”之困境，亦即物质上的匮乏。在明朝，儒生士大夫们不从事生产，将科举视为获取功名利禄的阶梯，一旦丧失或放弃这一入仕机会，士人马上就会陷入到贫而无养的窘迫境地，王夫之也不例外。同时，对于明遗民而言，有些职业是不可为、不屑为、不便为的，可供他们选择的既可养活自己又可保持名节的职业少之又少。幸而，还有一份较少有争议的职业，那便是务农，王夫之退隐山林之时即以务农为生。然而，不事生产的他首先难免会面临“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尴尬，其次，王夫之内心深处也将专心务农看作趋利行为，从而不以为为：“销磨岁月精力于农圃簞豆之中，而荒废其与生俱生之理，何勤之有！”^{[13]483}他还说：“吾自有吾之志气，勤于此则荒于彼。鸡鸣而起，孳孳为利，专心并气以趋一涂，人理亡矣。”^{[13]483}因此，务农不仅无法彻底解决王夫之的生计问题，还会使其陷入纠结矛盾的两难境地，这也就无怪乎王夫之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只能依靠亲朋故交的资助而勉强维持生计。事实上，明遗民们都羡慕陶渊明那般的闲适和高雅，但却难以摆脱尘世的羁绊，因为想要“逸”，物质条件是最基础的，士人们既难以“忍穷”，又无法打心底里接受“躬耕”，所以很难像陶渊明一样寻得心中的“桃花源”。

另一方面是“失意”之困境，亦即精神上的痛苦。儒家倡导“学而优则仕”，认为学的目的是能够成为经世致用之才，这种积极入世的思想深深地影响着王夫之。然而，按照中国古代的政治权力格局，儒生士大夫一直处于依附地位^[4]，士人如果想要实现“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理想，就必须凭借科举考试以获得进入官僚体系的资格，而后再依托君主来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所谓“贤臣托明君以成功业”便是如此。是以，青年时期的王夫之

一心科举,希望能够居于庙堂而辅其君、忧其民,诚然,若逢太平盛世,凭借王夫之的文韬武略、满腹才华,定能在朝堂上大展拳脚、有所作为,但明清易代使这一切化为乌有,皇城之中端坐着的是异族皇帝,纵使王夫之有经世济用之心,也无法找到发挥的空间,悲叹之余只能终老于林泉。正因如此,困境中的遗民常悲叹自己“生不逢时”的凄惨命运,隐居于他们而言实在是无可奈何的选择。此外,虽然南明已灭亡,王夫之的抗争情绪也有所消减,但他对故国的思念和追悼之情依旧强烈,更何况他亲眼看着故国一步步走向覆灭,这样的亡国之恨怎能轻易消解?“问青天,何意留住孤鸾只。教空辜负,当年无限,山海恩德”^{[14][1102]},王夫之经营半生却复明无望,悲伤愁苦之际只能含泪问青天:为何让昔日反清同志悉数死于清兵刀下,只留下自己独自一人在人间煎熬呢?尤其是“教空辜负,当年无限,山海恩德”之语,凄苦、沉痛、悲凉等负面情绪萦绕在王夫之的心头,难以释怀,这也注定了他的隐居生活无法安逸。

显然,在物质和精神的双重困境之下,王夫之的隐居生活是矛盾和痛苦的,生不逢时的喟叹、欲有所为而不能为的煎熬、故国已逝的悲痛……如此种种,无不紧紧束缚着王夫之,将其困于其中,难以真正做到心灵的超脱,甚至连隐居都是迫于形势的无奈选择,遑论隐居之乐。一直到康熙十七年(1678年),康熙帝颁布了博学鸿儒科的诏令,王夫之等遗民的态度才有所缓和,且此时易代造成的破坏已基本恢复,人民生活也逐渐安定下来,大部分遗民已不再对清朝进行过度的反抗,王夫之虽然还是坚持不仕,但对子孙的选择已采用放之任之的姿态。他的四个儿子和八个孙子中,除了其中四个夭折外,只有王旂未曾从事科举。到了隐居的晚期,暮年的王夫之心境已淡然许多,虽时有思念故国的愁绪,但也接受了现实,这种痛苦矛盾的隐逸心理随着清政府态度的变化、时间的冲刷渐渐归于平淡。但这种平淡并不意味着完全“逸”,只是相较于明朝刚亡时的激烈不满和初隐时的痛苦煎熬,晚期的王夫之更加看清了现实,也找到了隐居的价值和意义,在时间的抚慰下将那种愁苦和悲伤深深地埋藏在心灵深处,此时的“不逸”更加内敛而深沉了。不过,无论是归隐前中期深刻激烈的痛苦矛盾,还是后期内敛深沉的愁苦悲情,王夫之的隐居生活都从未有过真正的“逸”,实际上,“隐而不逸”正是王夫之整个隐居生涯的最好概括。

三、“遗民存道”:王夫之从“外王”走向“内圣”的价值选择

如前所述,隐居后的王夫之面临着物质上和精神上的双重压力,“隐”却不能“逸”,隐居于他而言实在是无可奈何的人生选择,那么,这样的隐居到底还有什么意义呢?

王夫之用行动给出了回答,那就是隐居立言以存道。在异族统治的无道之世中,“外王之道”已不可得,那么从“外王”到“内圣”的存道之法,是王夫之隐居的意义所在,也是王夫之身为前朝遗民的价值选择。

“内圣外王”之说最早出自《庄子·天下》:“是故内圣外王之道暗而不明,郁而不发,天下之人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15][393]}后来这一思想经由儒家发展,被赋予了另外一层含义:“内圣”强调的是明德,即“格物、致知、诚心、正意、修身”,使自身的道德修养臻于完善;“外王”注重的是经世,即“齐家、治国、平天下”,将“内圣”所学施于外;“内圣”和“外王”的和谐统一是儒者们追求的最高境界。在承平之时,儒生大都以“内圣”为基础,从“修身”到“齐家”再到“治国平天下”,“内圣外王”之道得以统一;但在风雨飘摇、动荡不堪的乱世之中,尤其是异族当道的明清易代之时,“外王之道”于明遗民们而言已难实现,“内圣外王”的和谐统一境界被打破,隐居立言正是明遗民出于对政治或对抗或逃避的态度,以完善自身道德为目的而选择的生存方式。

《清史稿》言:“守志不屈,身虽隐而心不死,至事不可为,发愤著书,欲托空文以见志。”^{[16][13865]}这是对明遗民志行的肯定,也是对其隐居意义的揭示,即隐居为遗民们创造了发愤著书的绝佳机会,从而使明遗民们得以“欲托空文以见志”。至于见的是何志,王夫之就说到:“隐之为言,藏道自居,而非无可藏者也。”^{[17][699]}他还进一步指出:“儒者之统,与帝王之统并行于天下,而互为兴替。其合也,天下以道而治,道以天子而明;及其衰,而帝王之统绝,儒者犹保其道以孤行而无所待,以人存道,而道可不亡。”^{[17][568]}可见,王夫之隐居实乃为了中华民族“道统”的延续,既然“治统”已被满族窃去,那么儒者当力争而保者在“道统”,也就是说,“治统”指向的政治统治权已落入异族之手,即所谓的“帝王之统绝”,那么,王夫之身为儒者自当肩负起“圣人之教”的“道统”,继承儒家的思想传统,在异族统治下保存和传承中华文化,这实质上是通过保持本民族价值观

以保存重建独立民族国家可能性的精神性退守^[18]，同时，这也是遗民儒者选择隐居的终极关怀所在。

正是秉持着立言以存道的内圣信念，王夫之在隐居期间远离尘世喧嚣，于湘西草堂内潜心著述，将大部分精力都投入到学术思想的精进当中。他在《病起连雨》中写到：“故国余魂长缥缈，残灯绝笔尚峥嵘。”^[19]⁴³⁸正是凭借着峥嵘的笔锋和坚定的意志，王夫之撰写了许多传世名作，实现了他学术思想上的重大突破，在政治思想、经济思想、哲学思想等各个领域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他的许多代表作品如《噩梦》、《俟解》、《宋论》、《读通鉴论》、《张子正蒙注》等等都成书于此时期。

实际上，以现在的眼光来看，王夫之的著述事业又岂止是一项传孔孟之道、存中华道统的书生事业而已？他发愤著书，对政治局势有着自己别样的洞见，尤其注重对明朝灭亡和中国几千年封建君主专制的反思。虽然他也曾孤独失意乃至绝望，但他最终还是在物质和精神的双重折磨中进行了深刻的思考，与时俱进，不再汲汲于恢复故国，而是超越了对一个王朝的追思，突破了寻常遗民的思想境界，上升到了对整个君主专制的批判。可以说，王夫之隐居立言的深层价值是通过明末清初启蒙思想的发展体现出来的，他从探究明王朝灭亡的原因出发，扩展至对三千年来君主专制政体的反思和批判，这不仅是对中华民族道统的存续，更是一次伟大的超越。正如梁启超所言：“中国的学者，向来十有九都和政治有关系，这种关系每每妨碍思想之独立，最少也分减了研究的岁月和精神。清初因为满洲人初进来，统治者非我族类，第一流学者对于他们，或采积极的反抗态度，或采消极的‘不合作’态度。这些学者，都对于当时的政治不肯插手，全部精力都注在改良学风作将来预备，所以有许多新颖思想自由发挥，而且因积久研究的结果，有许多新发明。”^[20]明遗民大多怀有经世致用思想，不断地反思政治之阙，从而上升至批判君主专制的高度，王夫之“循天下之公，天下非一姓之私也”^[17]¹⁸¹的思想正是如此。

王夫之曾这样描述宋人陈抟的人生：“当其处五代乱世之时，力不赡，志不遂，退而隐伏，乃测天地之机，为养生之术，以留目而见澄清之日。迨宋初而其术成矣，中国有天子，而其志抑慰矣。”^[21]¹¹⁰此言既是王夫之对陈抟隐居立言的肯定，也是他对自己的期待，正如他所说的“吾书二百年后始显”、“吾道五百年后大昌”。不负其所望，晚清变局之时，王夫之的著作被视为思想的火种而显于世，并成为晚清仁人志士救亡图存和民族复兴的重要思想根源，这可谓是不负贤哲隐居山林数十年的满腔热血。

四、结语

明清易代是中国历史上大分化、大变革、大动荡的特殊时代。面对朝代鼎革，王夫之被迫放弃科举，走向了武装反清之路，失败后出仕南明，然而，腐败分裂的南明朝廷令他失望，进退失据之间他还是决心归隐。直到南明灭亡，王夫之真正走向了遗民之隐，此时的他深知复明无望，拒不入仕，退隐乡野，以隐作为一种抵抗异族无道之世的消极方式。但是，王夫之的隐居生活并没有“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悠闲惬意，物质资源的匮乏、故国逝去的沉痛、才华无法施展的悲叹等等物质上和精神上的压力都使得他陷入痛苦和煎熬的境地，“隐而不逸”是其隐逸心理的真实写照和隐居生涯的最好概括。不逸之隐虽是王夫之无可奈何的选择，但却不是毫无意义的。从“外王”到“内圣”的存道之法，正是王夫之在无道之世中隐居的意义所在，也是王夫之身为前朝遗民的价值所在。归隐后的王夫之秉持着立言以存道的内圣信念，发愤著书，不仅为中华民族道统的延续做出了重大贡献，更是超越此界限上升到了对君主专制的批判，为后世启蒙思想奠定了基础。

明末清初的遗民学者，无论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还是方以智、傅山、屈大均等，都是那个变动时代里的杰出代表，他们处在明清鼎革之际，大都抱有家国之痛、身世之感，有人选择归隐山林，有人选择遁迹方外，亦有人选择云游四方，总之，不仕新朝是他们的基本底线。但是，明遗民的主要价值并不在于他们对故明王朝忠贞不二的节操，实际上，真正第一流的遗民并不是一味以泪洗面、颓废一生的，他们归隐或遁迹之后并非终日郁郁寡欢、无所作为，而是发愤著书，肩负起了传承华夏文明、延续中华道统的遗民责任，正如屈大均所说：“盖以其所持者道，道存则天下与存。”^[22]梁启超也感叹：“清初是前明遗老支配学界的时代。”^[23]¹⁸在这个意义上，明遗民之“隐”便不只是其个人追求的狭隘体现，而是具有了存道以存天下的传世价值。

参考文献

- [1] 蒋寅.陶渊明隐逸的精神史意义[J].求是学刊, 2009,36(05):89-97.
- [2] 归庄.归庄集[M].北京: 中华书局, 1962.

- [3] 余英时.方以智晚节考序(增订版)[M].北京:三联书店,2004.
- [4] 陈珊珊.明遗民群体的心态嬗变和启蒙思想的生成[D].浙江大学,2007.
- [5] 王夫之.杂诗四首·其四//王船山诗文集[M].北京:中华书局,1962.
- [6] 王夫之.章灵赋//船山全书:第15册[M].长沙:岳麓书社,1996.
- [7] 朱熹.四书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3.
- [8] 王夫之.黄书·原极//船山全书:第12册[M].长沙:岳麓书社,1992.
- [9] 萧蓬夫,许苏民.王夫之评传[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
- [10] 丛扬.明清之际的遗民心态[D].辽宁师范大学,2009.
- [11] 张祥龙.从现象学到孔夫子(增订版)[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
- [12] 谢正光.明遗民录辑[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5.
- [13] 王夫之.俟解//船山全书:第12册[M].长沙:岳麓书社,1992.
- [14] 王夫之.多丽·别恨//船山全书:第15册[M].长沙:岳麓书社,1996.
- [15] 孙通海.庄子(中华经典藏书)[M].北京:中华书局,2013.
- [16] 赵尔巽.遗逸二//清史稿[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77.
- [17] 王夫之.读通鉴论//船山全书:第10册[M].长沙:岳麓书社,1992.
- [18] 李瑄.存道:明遗民群体的价值体认[J].学术研究,2008,282(05):112-118.
- [19] 王夫之.病起连雨四首·其三//船山全书:第15册[M].长沙:岳麓书社,1996.
- [20] 梁启超.明清之交中国思想界及其代表人物//中国哲学思想论集:第5册[M].台湾:台湾牧童出版社,1978.
- [21] 王夫之.宋论//船山全书:第11册[M].长沙:岳麓书社,1992.
- [22] 屈大均.翁山文钞·卷八//清代诗文集汇编:第119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 [23]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M].上海:东方出版社,1996.

"Reclusive but Not Carefree": On the Reclusive Mentality of Ming Loyalists in Their Shift from "Outer Kingliness" to "Inner Sageliness"

— A Case Study of Wang Fuzhi

Fang Huilin

(Tongji University, Shanghai, China)

Abstract: The late Ming and early Qing dynasties constituted a distinctive era marked by profound division, drastic transformation and violent turmoil in Chinese history. Confronted with the dynastic transition, Wang Fuzhi first launched armed resistance against the Qing regime. Disillusioned by the Southern Ming court later on, he embraced the reclusive life of a loyalist to the fallen dynasty. The alien rule of the ethnic minority and persistent suppression by the Qing court led Wang Fuzhi to regard seclusion as a passive form of resistance against the Qing Dynasty. Nevertheless, Wang Fuzhi never savored the peace and contentment of a hermit's life. Suffering from both material deprivation and spiritual torment, he endured relentless anguish and affliction, a state perfectly encapsulated by the phrase "reclusive but not carefree", which truthfully reflects his inner mentality as a hermit. This uneasy seclusion, however, carried profound significance. His shift from pursuing "outer kingliness" to upholding "inner sageliness" as a way to preserve orthodox Dao embodied the core meaning of his seclusion amid a disordered age, as well as the intrinsic value of his identity as a surviving loyalist of the preceding Ming Dynasty.

Keywords: Wang Fuzhi; Reclusive but Not Carefree; Inner Sageliness and Outer Kingliness; Preserving Orthodox Dao as a Loyalist

师古·造化·我心

——赖少其《黄山之雾》中的笔墨运用与精神还乡

刘雪风

(广州美术学院, 广东 广州 510000)

摘要: 本文以赖少其先生晚年山水画代表作《黄山之雾》为研究对象, 通过视觉语言分析与艺术渊源追溯, 探讨其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的笔墨运用与精神表达。文章首先从观展体验出发, 指出赖少其先生与弘仁的风格关联与差异, 进而梳理其在新安画派、黄宾虹等传统脉络中的学习与选择, 并重点分析《黄山之雾》在构图、透视、皴法、点墨等方面的融合与创新。文章认为, 该作品不仅是赖少其先生个人艺术生涯的总结, 更体现了其在“师古人、师造化”基础上走向“我师我心”的创作自觉, 实现了从自然景观到心象图式的升华, 完成了一次深具文化寓意的“精神还乡”。

关键词: 赖少其; 新安画派; 黄山; 精神还乡

DOI: doi.org/10.70693/202607160012

一、前言

在《造化为我——赖少其与现代山水画创作研究展》的现场驻足, 尤其于“我师造化”板块中, 见到赖少其先生笔下那些黄山写生的手稿时(图一), 笔者忽然有种恍如故人相逢的触动。其线条的疏朗与山石结构的清峭, 竟与弘仁的风格极为神似, 恍惚间仿佛穿越时空, 窥见两位画家在面对自然时相似的凝望与提炼。

这并非偶然的联想——上个学期笔者正好选修了《明清山水小品临摹》课程, 其间多次临摹弘仁的作品(图二、三), 对他简淡中见深秀、枯笔里藏生意的语言尤为熟悉。也正是因为这样的前缘, 当笔者走到《黄山之雾》(图四)面前时, 感受格外复杂: 一方面, 构图与笔意中透出所熟悉的弘仁式气象; 而另一方面, 赖少其先生又在墨韵与氛围的铺染中融入了鲜明的现代感知与个人记忆。那种介于承袭与创新之间的张力, 让笔者既感到亲切, 又觉得新鲜。

于是笔者忍不住想去追问: 这熟悉感, 是来源于笔墨传统的内在延续吗? 而这陌生感, 是否正来自赖少其先生先生在师古人、师造化之后, 最终走向“我师我心”的创造距离?

二、赖少其先生的艺术渊源与选择

新中国成立之初, 国家在美术领域采取“派出去、请进来”的发展战略, 推动了苏联现实主义绘画的引入与传播。在此背景下, 苏联现实主义、以徐悲鸿为代表的法国古典主义, 以及以江丰为核心的延安鲁艺革命美术体系, 共同构成了当时美术创作的主导思潮。然而, 赖少其先生却选择了一条不同于主流方向的探索之路。

早年在上海主持文艺工作期间, 赖少其先生专程赴杭州拜访年事已高的黄宾虹, 并陆续为他筹办寿庆、颁发奖状、组织画展与出版画册。这段为期三年的交往, 深刻影响了赖少其先生一生的艺术走向。纵观其四十余年的山水画创作, 虽在笔墨技法上未直接模仿黄宾虹, 但其笔墨观念与艺术实践却无不渗透着黄宾虹的艺术滋养。

自五代董源、巨然以来, 江浙地区一直是山水画发展的重要中心, 大家辈出, 影响深远。赖少其先生在上海的七年时间里, 与江浙画家交流密切, 深受地域画风熏陶, 同时也置身于时代的洪流之中。面对当时部分人主张将中国画改为“彩墨画”的思潮, 赖少其先生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如果说中国画是一门艺术科学, 则更符合艺术规律。例如突破空间限制, 正是西洋画欲突破而未能突破的领域”^[2]。由此可见, 虽然出身西画, 赖少其先生

作者简介: 刘雪风(2005—), 女, 本科在读, 研究方向为中国画论与近现代美术史的绘画视觉语言分析。

^[2] 赖少其. 画坛忆旧: 上海中国画院筹备情况[M]. 合肥: 安徽美术出版社, 2015:259.

对中国传统绘画的理解却具有独到的洞察。



图一：赖少其先生黄山写生稿



图二：弘仁山水册



图三：笔者的临摹作品



图四：《黄山之雾》 赖少其先生 1991 年

响仕女徽后，赖少其先生潜心锤炼山水画笔墨，留下了大量与生于皖。新安画派作为安徽地区里安的绘画传统，是当地画家无法绕开的影响来源，赖少其先生亦不例外。他多次临摹新安诸家的作品，尤其推崇程邃，曾在其《溪山无尽图》（1964）上题写：“此图笔致神奇，令人观之神往情移，真法物也”^[3]。在《明程邃山水临本册》（1986）的题跋中，他进一步写道：“邃画用枯笔干皴，余喜其粗笔苍茫浑厚，落墨不多，气象万千，此大手笔也。余习之经年，苦未能入室，惜晚生三百余年，未能拜其门下也”^[4]。谢稚柳在赖少其先生所临《山村泊渔船》（1964）上亦评其“喜用渴笔焦墨，得垢道人三昧”，可见赖少其先生通过长期临习，已深入掌握枯笔焦墨、苍茫浑厚的表现语言。

赖少其先生在师法古人的道路上，可追溯到五代的“荆关”，用北派画法描绘南方山水雄伟的一面，也用“董巨”的“解索皴”法表现山水的迷蒙。赖少其先生对米元章的“落茄皴”喜爱有加，对王蒙更是偏爱，以至于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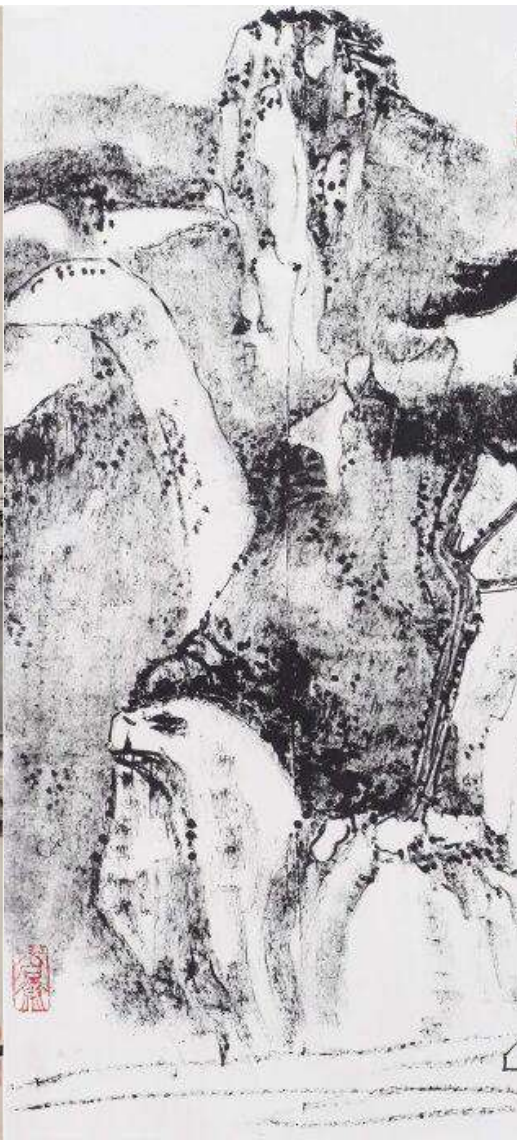
^[3] 于在海.赖少其山水集[M].合肥：安徽美术出版社，2015:8.

^[4] 于在海.赖少其山水集[M].合肥：安徽美术出版社，2015:8.

两次变法中,较多地借鉴了其“牛毛皴”法。赖少其先生取唐伯虎和龚半千山水构图之雄奇,推崇文徵明的青绿法和浅绛法相互融合之道,使作品既清丽雅致又富有笔墨情趣。他也借鉴了石涛笔法之流畅凝重,松柔秀拙,尤习其点苔之法,密密麻麻,劈头盖面。赖少其先生取新安画派之枯笔焦墨(图五),去其冷峻静逸。他也反复临摹黄宾虹,往往“愈似愈远”,遂悟“不似之似”。



图五: 弘仁的山水画



图六: 《黄山之雾》局部

三、《黄山之雾》的视觉语言分析

赖少其先生在《丙寅变法》(图七)中是这样描述的:“我继续用‘干笔焦墨’之法作画...以西画写生之法画黄山,不仅可以如实的反映黄山,还有自己的特别。我是学版画的,发现版画的方法——黑白对比,与中国画基本相似。我又在画法上下工夫。”这一理念在作品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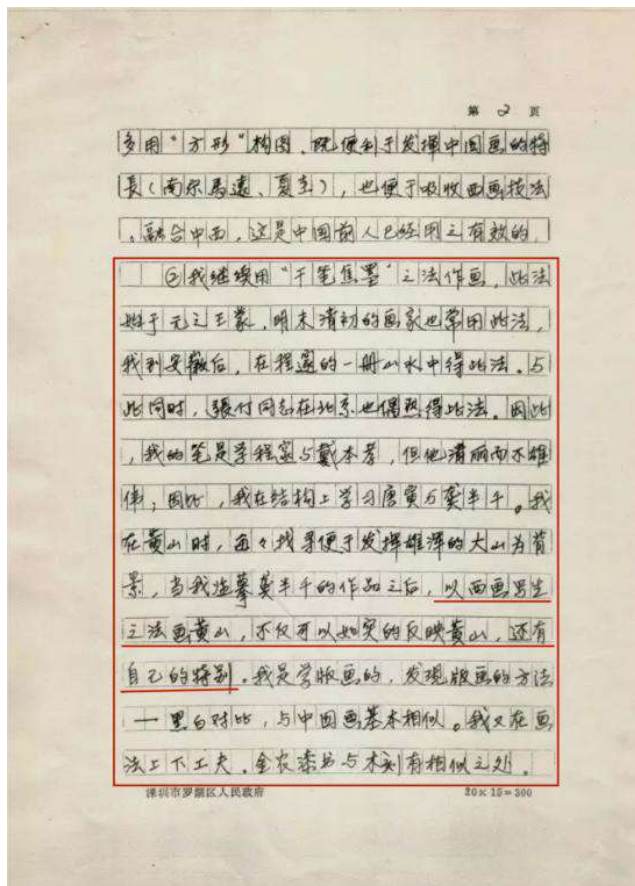
《黄山之雾》延续了新安画派干笔浓墨的技法,但摆脱了那种清冷安静的感觉,画面显得更浑厚有力。在构图上,画面疏密搭配得当,有动有静、有远有近、清晰处与朦胧处相互衬托(图八),整体来看,画面上部密集、下部疏朗,把黄山高耸入云的气势充分表现了出来;采用的是西画中的焦点透视,与中国画中散点透视不同,焦点透视使画面具有强烈的立体感和真实感;同时,通过强烈的明暗对比,画面黑白分明,进一步强化了黄山的体积感、质感与空间层次。

一。画面中尤以荷叶皴法为特色(图九),笔锋自上而下铺展,脉络四面散宕,直至山脚,既表现出黄山石

质的坚硬嶙峋，也营造出峰峦在雾气中若隐若现的虚实层次。

画面中亦可见大量的点法运用：于山体结构上聚点成线、化线为点，岩石表现则线、皴、点交融互渗；松叶以墨点写成，近处浓重，远处浅淡。整幅画作中点、线、皴、墨浑然一体，将黄山的山石林木表现得淋漓尽致。这种以点为主导、积点成象的“点墨法”，在表现手法上与西方“点彩派”颇有相通之处。

赖少其先生善于表现山石的体量感与结构感，画面中他将巨岩环峙、壁立千仞之势予以适度夸张，并融入对形式美的现代理解，赋予画面一种兼具抽象意味的视觉张力。其山石铁骨铮铮，有“铁打江山”般的坚毅豪迈；同时又刚中带柔，方圆兼备。近处山石挺拔屹立，远处以皴擦点染营造空间纵深，整体构成一派雄浑而又深秀的黄山意象（图十）。



图七：赖少其先生《丙寅变法》第2页他人代抄手稿 1986年6月17日



图八：《黄山之雾》作品疏密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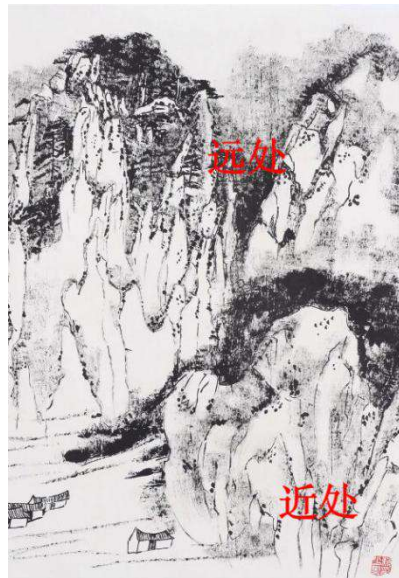
《黄山之雾》不仅捕捉到黄山幽深奇崛的自然意境，更传递出其内在的神韵与生命力。正因如此，日本称赖少其先生笔下的黄山为最高峰，唐云赞赖少其是“新黄山画派”的执旗人^[5]。

笔者给《黄山之雾》这幅作品的一个关键词是：精神还乡。赖少其先生早年投身革命，长期远离故乡广东。晚年他常回广州、深圳居住，并重游了对他艺术产生决定性影响的黄山。《黄山之雾》可以看作是他用艺术方式对“精神家园”——黄山的一次深情回望和总结。并且，在《黄山之雾》中，还可以清晰看到他对新安画派、黄宾虹等先贤笔墨精髓的化用，这何尝不是一种在创新基础上的“精神还乡”。

《黄山之雾》创作的年份是1991年，这是赖少其先生正“丙寅变法”之后。这个时期，他笔下的黄山已超越了地理景观的局限，成为融合现实与梦境的心象图式。他将黄山峰峦景观解构重组，云雾以留白的方式流动于山脊之间，既呼应黄山气候的瞬息万变，又暗合道家“虚室生白”的哲学意境，体现出变法之后其艺术向内心本源回归的自觉追求。这也许就是笔者在看到这幅画，感到陌生的原因。



图九：《黄山之雾》画面中荷叶皴的应用



图十：《黄山之雾》远近对比

四、思考与总结

本文通过对赖少其先生《黄山之雾》的视觉语言分析及其艺术渊源的梳理，不难发现，这幅作品既是赖少其先生个人艺术生涯的凝练，也是中国山水画在现代语境中转型的一个生动案例。

赖少其先生的艺术实践提示我们：真正的传承并非机械摹古，而是在深入传统内核的基础上，注入当下的体验与思考。他笔下的黄山，既承载着新安画派的笔墨基因，又融入了西画的空间意识与版画的黑白构成，更蕴含着作为革命者与游子的生命记忆。这种“融汇中西、贯穿古今”的创作路径，使得他的山水作品在延续文人画精神的同时，也具备了鲜明的现代品格。

而笔者所提到的“精神还乡”，不仅指向赖少其先生个人的情感回归，也隐喻着中国画在现代性冲击下的文化自觉与身份重构。在全球化与图像化的今天，中国画家如何既保持笔墨传统的深度，又回应时代的视觉经验？赖少其先生通过“丙寅变法”所实现的，正是一种“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创作自由——在把握笔墨规律的同时，敢于打破程式，将自然景观转化为心象图式，从而实现了“造化”与“我心”的统一。

回到一开始提出的问题，笔者认为答案是肯定的：那熟悉感源自笔墨传统的血脉相连，而那陌生感则来自赖少其先生在“师古人、师造化”之后，最终走向“我师我心”的创造距离。正是在这熟悉与陌生、继承与出走的张力中，《黄山之雾》得以超越时空，成为连接传统与现代、自然与心灵的艺术桥梁。

参考文献：

- [1] 胡志亮.木石魂：赖少其传[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0.
- [2] 于在海.赖少其版画文献集[M].合肥：安徽美术出版社，2003.

^[5] 丁远飞.线上展厅·公共教育——赖少其艺术馆系列展示活动（第十三期·上）.赖少其先生艺术馆.2020-10-23.<https://mp.weixin.qq.com/s/WCnBo28nspY1SRLE2sd5DQ>

- [3] 赖少其艺术馆.《赖少其艺术学术研究参考图文集》[M].合肥: 安徽美术出版社, 2012.
- [4] 陈传席.中国山水画史[M].天津: 天津美术出版社, 1998.
- [5] 于在海.赖少其山水画集[M].合肥: 安徽美术出版社, 2015.
- [6] 陈传席.六朝画论研究[M].北京: 中国青年出版社, 2014.
- [7] 陈传席.评现代名家与大家·续集——赖少其[J].国画家.2005(02).
- [8] 罗一平.大道之道——赖少其绘画艺术[J].美术报.2015(011).
- [9] 傅爱国.剑胆琴心托豪素笔底风云是精神——赖少其书画艺术释读[J].书画世界.2006(02).
- [10] 陈光俊.赖少其山水画传统略论[J].书画世界. 2012(154).
- [11] 周宗岱.由赖少其谈传统书画学习方法[J].美术报.2012-11-10(010).
- [12] 李伟铭.林风眠、关良、赖少其艺术异同论[N].中国文化报.2007-11-18(006).

Learning from the Ancients, Emulating Nature, and Following One's Heart: Brush-and-Ink Application and Spiritual Homecoming in Lai Shaoqi's Mist on Mount Huangshan

xuefeng liu

(Guangzhou Academy of Fine Arts, Guangzhou,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takes *Mist on Mount Huangshan* (1991), a representative landscape painting from Lai Shaoqi's later years, as its primary subject. Through visual analysis and a tracing of artistic origins, it explores the artist's brush-and-ink practice and spiritual expression situated between tradition and modernity. The study begins with the author's exhibition experience, pointing out the stylistic connection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Lai Shaoqi and the early Qing master Hongren. It then examines Lai's engagement with and selective absorption of the Xin'an School of Painting and Huang Binhong's legacy. The core analysis focuses on the synthesis and innovation in composition, perspective, texturing methods (*cunfa*), and dotting techniques within *Mist on Mount Huangshan*. The paper argues that this work not only encapsulates Lai Shaoqi's lifelong artistic achievement but also manifests his creative self-awareness of moving from "learning from the ancients" and "emulating nature" to ultimately "following his own heart." In doing so, it elevates natural scenery into a mental landscape, accomplishing a "spiritual homecoming" rich with cultural significance.

Keywords Lai Shaoqi; Xin'an School of Painting; Mount Huangshan; spiritual homecoming

文化转译视角下金上京历史博物馆铜镜纹饰文创设计研究

邬思文

(黑龙江大学艺术学院, 黑龙江 哈尔滨 150080)

摘要:在博物馆文创由文物复制向文化体验转型的背景下,传统纹饰如何保持历史依据并进入当代生活,成为地方博物馆文创设计的重要问题。文章以金上京历史博物馆金代铜镜纹饰为研究对象,运用文献研究、图像分析与设计推演方法,从纹饰题材、构图结构和文化语义三个层面分析其视觉特征,并构建“文化资源识别—语义解码—视觉基因提取—形式重构—场景适配—反馈优化”的文化转译路径。研究提出,双鱼纹、龙纹、人物故事纹、瑞花纹及环带边饰等纹饰,不宜以整体临摹和表面粘贴的方式直接应用于产品,而应通过核心形态提取、语义分级、模块化重组和媒介适配,实现从文物图像到现代视觉符号的转化。在此基础上,文章提出以双鱼纹为核心母题、以龙纹和瑞花纹为辅助图形,并通过分层色彩、系列化产品与数字传播形成统一文创视觉系统。该路径可为提升金上京文创的地域识别度、文化准确性与生活适用性提供方法参考。

关键词:文化转译;金上京历史博物馆;金代铜镜;纹饰;文创设计

DOI: doi.org/10.70693/202607128500

一、研究缘起:铜镜纹饰文创转译的必要性

博物馆文创并非文物形象的简单复制,而是将馆藏知识、历史记忆和审美资源转化为公众可理解、可使用、可持续接触的文化产品。文化消费语境的变化,使文创产品由“纪念性物件”逐步转向兼具信息传递、审美体验和生活功能的文化媒介^[1]。然而,部分地方博物馆在开发过程中仍存在元素选择零散、同质化贴图、产品之间缺少视觉关联等问题,文化资源优势未能转化为稳定的品牌识别^[2]。

文化转译强调在不同语境之间完成意义转换。其关键不是改变传统文化的基本内涵,而是以现代视觉语言重新组织传统符号,使其在新的媒介、功能和受众关系中保持可识别性。刘媛霞、殷俊提出,传统图像的数字文创设计需要经历文化信息选择、视觉元素转化和媒介表达等环节^[3]。这一思路同样适用于金代铜镜纹饰:只有先解释纹饰的历史语义和构成规律,再进行形态简化、结构重组与场景匹配,才能避免“有纹样、无文化”的表层化设计。

金上京历史博物馆以金代历史和金源文化为核心,铜镜是其具有辨识度的馆藏门类之一。铜镜背面的纹饰不仅体现铸造工艺和装饰审美,也记录了金代社会生活、吉祥观念及多民族文化交流。金代铜镜在继承汉唐宋镜传统的同时,形成了双鱼、龙纹、人物故事、瑞兽、瑞花等具有时代特色的题材^[4]。因此,以铜镜纹饰为切入点开展文创设计,能够把器物研究、地域文化表达和现代视觉传播连接起来。

二、金上京铜镜纹饰的文化与视觉特征

(一)纹饰题材体现生活经验与文化交融

金代铜镜纹饰的文化价值首先体现在题材的多样性。双鱼纹与北方水域环境、渔猎生活及“有余”“和合”等吉祥观念相联系;龙纹延续传统权力和祥瑞象征,又呈现粗犷有力、盘旋聚合的北方审美;人物故事纹将农事、游乐、传说等内容纳入镜背空间,使铜镜成为具有叙事性的生活图像;瑞花、植物纹及几何环带则以生长、秩序和连续性形成辅助寓意。

(二)圆形制约形成分区、对称与环绕结构

作者简介:邬思文(2002—),女,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视觉传达。

铜镜以圆形为基本器形，镜钮通常处于中心，纹饰围绕中心向外展开，形成中心区、主体区和边缘区等层级。其视觉组织多采用旋转、放射、对称、连续和环绕等方式。这种结构一方面保持了器物的稳定与秩序，另一方面通过曲线方向、疏密变化和主次层次营造动态感。文化符号融入文创设计时，应同时识别“题材形象”和“组织规律”：前者回答画了什么，后者决定如何构成。仅截取单个鱼、龙或花瓣而忽略其对向关系、环形节奏和层级分区，往往会削弱铜镜纹饰的原有识别特征^[5]。

（三）纹饰视觉基因具有系统化开发价值

所谓视觉基因，是指在图形被简化、变形或跨媒介使用后，仍能指向原始文化来源的核心特征。金代铜镜纹饰的视觉基因主要包括三类：一是具有指向性的主题形态，如双鱼的对游姿态、龙纹的盘曲走势；二是具有稳定性的构图骨架，如中心聚合、环带分区、轴线对称；三是具有连续性的装饰节奏，如卷草、花瓣与几何边饰。将三类信息分层提取，可以形成主图形、辅助图形和边饰纹样，进而支撑包装、文具、织物、首饰及数字界面的系列化设计。

表 1 金代铜镜典型纹饰的转译要素

纹饰类型	文化语义	视觉基因
双鱼纹	生息、和合、水域生活	对向游动、S 形曲线、环形构图
龙纹	力量、祥瑞、权力与秩序	盘旋走势、遒劲线条、中心聚合
人物故事纹	生产生活、礼俗与文化融合	场景层次、叙事节点、连续画面
瑞花纹、植物纹	生长、吉祥、生命秩序	放射花瓣、卷曲枝蔓、连续边饰
几何环带纹	结构秩序与装饰节奏	重复单元、环带分区、疏密变化

三、文化转译视角下铜镜纹饰的设计方法

（一）文化资源识别：建立可追溯的纹饰样本

文化转译应从样本筛选开始。设计者需要依据馆藏图录、展签、考古资料和相关研究，记录文物名称、年代、尺寸、出土信息、纹饰题材及释义，避免仅凭网络图片或个人审美选择元素。样本可按照“文化代表性—图形完整度—转化适宜度”进行筛选：优先选择与金源地域文化联系明确、纹饰保存相对完整、构图具有延展可能的铜镜。金上京文创的核心符号不宜过多，可将具有在地识别度的双鱼纹设为核心母题，将龙纹、瑞花纹和环带纹作为辅助系统，以保证品牌形象集中而不单调。

（二）文化语义解码：区分核心意义与延伸意义

对纹饰的解释需要建立语义层级。第一层为必须保留的核心意义，如双鱼纹与金代北方生活经验、吉祥观念之间的联系；第二层为可以转化的情感意义，如活力、共生、流动；第三层为可根据产品场景补充的当代意义，如陪伴、循环和可持续。地域文化符号的设计不能只保留外形，还应通过名称、文案、包装叙事或数字交互说明其来源^[6]。语义分层既能防止过度阐释，也为不同产品确定表达重点：知识型产品强调历史信息，生活型产品强调情感联想，礼赠型产品则突出祝愿与身份表达。

（三）视觉基因提取：从完整纹样转向模块化单元

视觉提取可依次经历描摹、骨架分析、特征概括和模块建立。描摹用于确认原始线条与比例；骨架分析提取中心、轴线、旋转方向和层级分区；特征概括保留最具识别度的外轮廓与动态走势；模块建立则把主形、辅形和边饰转化为可以重复、拼接和变换的基本单元。符号学研究指出，文化符号的设计价值来自能指形式与文化所指之间的稳定联系^[7]。因此，简化应以“不破坏识别”为边界：鱼体可以几何化，但对向游动和水波关系不能同时消失；龙纹可以减少鳞甲细节，但盘旋姿态和力量方向应得到保留。

（四）形式重构与场景适配：建立跨媒介视觉系统

形式重构包括几何化、正负形、局部放大、连续排列、叠加错位和色彩再编码等方法。重构后的图形还需与产品形态相匹配：中心式纹样适合徽章、杯垫和封面；连续环带适合丝巾、胶带、包装侧面；叙事纹样适合插画、绘本和动态海报。故宫文创等案例表明，具有统一核心元素、辅助图形和色彩规范的视觉系统，更容易形成跨产品的品牌连续性^[8]。同时，产品开发应保留反馈环节，通过样品测试、用户访谈和小规模试售，检查文化识别、图形清晰度、功能适配和购买意愿，再对图形复杂度与产品组合进行调整。

文化保真：历史依据、语义边界、地域识别



当代适配：审美、功能、媒介与用户体验

图1 铜镜纹饰文化转译流程

四、金上京铜镜纹饰文创设计应用策略

（一）构建“核心母题—辅助纹样—色彩系统”的视觉层级

设计应用可形成三级视觉层级。第一层以双鱼纹为核心母题，保留两鱼相向或环游的动态关系，通过线面结合形成简洁主标识；第二层以龙纹、瑞花纹和水波环带为辅助纹样，用于丰富系列差异；第三层以圆形分区、镜钮和边缘铭刻感为版式语言，建立包装和数字界面的结构统一。色彩不宜停留在仿古褐色，可从铜镜材质、金源地域环境和当代审美中提取青铜灰、深松绿、暖金和冰雪白，构成“历史基色+地域辅助色+媒介高亮色”的组合。这样既保持器物的时间感，又避免整体视觉沉闷。

（二）以生活化产品延长文化接触时间

文创产品由纪念品进入日常生活，是文化转译完成的关键。张君认为，传统文化进入日常生活需要在功能和文化表达之间建立新的关系^[9]。金上京铜镜纹饰可以围绕“随身—居家—赠礼”设置产品层级：随身类可开发胸针、丝巾、手机配件和文具；居家类可采用杯垫、香具、织物与装饰灯；赠礼类可形成主题礼盒和节庆套装。设计重点不在于产品数量，而在于让同一视觉基因根据形态和使用方式产生变化。例如，双鱼核心图形用于杯垫时保持中心聚合，用于丝巾时转化为连续环游，用于手机界面时则以微动效表现水波与游动。

（三）通过叙事与多感官设计增强文化理解

铜镜纹饰包含较强的历史信息，仅靠图形可能难以完成意义传递。可在包装内页、标签和数字页面中采用“文物原型—纹饰释义—设计演变”的三段式叙事，使消费者理解产品与文物之间的对应关系。情感化设计研究强调，文创产品应在本能、行为和反思层面共同建立体验^[10]。因此，在材质上可利用金属压印、局部烫金、磨砂与镜面反差模拟铜镜触感；在开合方式上借鉴圆镜旋转或层层展开的结构。多感官不是技术堆叠，而是帮助用户从“看见纹样”进入“理解文化”^[11]。

（四）拓展数字传播并维护文化一致性

数字传播可将静态纹饰转化为动态视觉资产。围绕双鱼纹可设计循环游动、聚散和水波扩散动画，围绕人物故事纹可开发分镜式短视频或互动长图；在线上展览、社交媒体和导览界面中统一使用主图形、色彩和叙事语气，避免实体产品与数字内容彼此割裂。体验层次研究指出，数字媒介能够通过参与和反馈提高用户对文化内容的记忆^[12]。但数字化表达仍需遵守文化准确性：动效和交互可以创新，文物名称、年代、纹饰释义及图像来源必须清楚标注。只有把视觉资产、知识内容和使用规范共同纳入管理，金上京铜镜纹饰才能由单件产品素材转化为可持续更新的文化资源。

五、结语

金上京历史博物馆铜镜纹饰兼具器物审美、生活叙事和地域文化价值，是金源文化文创开发的重要视觉资源。文化转译的核心不在于对传统纹样进行形式包装，而在于建立文物依据、文化语义、视觉形态与使用场景之间的

连续关系。本文提出的“文化资源识别—语义解码—视觉基因提取—形式重构—场景适配—反馈优化”路径,将铜镜纹饰由完整文物图像拆解为可追溯、可组合和可延展的视觉单元,并以核心母题、辅助纹样、色彩规范及跨媒介应用构成系列化文创系统。

这一方法能够在文化保真与当代适配之间形成相对清晰的设计边界:既避免纹饰被无差别复制,也防止现代化改造切断其历史来源。后续研究仍需结合馆藏实物测绘、文博专家校核、用户评价与样品生产,对不同纹饰的识别阈值、产品偏好和传播效果进行量化验证,并进一步探索动态视觉、增强现实与线上教育中的应用。

参考文献:

- [1] 易平. 文化消费语境下的博物馆文创产品设计[J]. 包装工程, 2018, 39(8): 84-88.
- [2] 程辉. 博物馆文创产业研究的现状、问题与方向[J]. 包装工程, 2019, 40(24): 65-71.
- [3] 刘媛霞, 殷俊. 基于文化转译的桃花坞木版年画数字文创设计[J]. 包装工程, 2022, 43(10): 326-334.
- [4] 史策. 金代铜镜纹饰研究: 以上京地区为中心[D].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17.
- [5] 李娟, 陈香. 地域文化符号融入博物馆文创产品的设计策略[J]. 包装工程, 2020, 41(8): 160-165.
- [6] 付振宇. 基于地域文化的文创产品创新设计[J]. 包装工程, 2019, 40(20): 215-218+222.
- [7] 孙晟博, 高炳学. 符号学在文创产品设计中的应用现状[J]. 包装工程, 2022, 43(18): 283-292+326.
- [8] 李红超, 王昕宇, 李维钰. 基于文化元素的故宫博物院文创产品设计研究[J]. 包装工程, 2022, 43(2): 325-332.
- [9] 张君. 从文创设计与 IP 打造看传统手工艺进入日常生活的路径[J]. 包装工程, 2019, 40(24): 286-291.
- [10] 李帅, 易姗姗, 郑仁华, 等. 博物馆文创产品情感化设计研究[J]. 包装工程, 2022, 43(16): 372-379.
- [11] 张祖耀, 叶镠勤. 基于多感官体验的博物馆文创产品设计研究[J]. 包装工程, 2021, 42(18): 368-373.
- [12] 王海亚. 基于体验层次的文创产品叙事设计研究[J]. 包装工程, 2020, 41(16): 330-335.

Cultural and Creative Design of Bronze-Mirror Motifs at the Jin Shangjing

History Museu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Translation

Wu siwen

(School of Arts,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Heilongjiang, Harbin, China)

Abstract: Against the shift of museum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from object reproduction to cultural experience, this study examines how traditional motifs can retain historical credibility while entering contemporary life. Taking bronze-mirror motifs associated with the Jin Shangjing History Museum as the research object, the paper analyzes their themes, compositional structures, and cultural meanings through literature review, image analysis, and design deduction. A cultural translation path is proposed, including cultural-resource identification, semantic decoding, visual-gene extraction, formal reconstruction, scenario adaptation, and feedback optimization. The study argues that motifs such as paired fish, dragons, narrative scenes, auspicious flowers, and circular borders should not be mechanically copied onto products. Instead, their core forms, structural relations, and semantic levels should be modularized and adapted to different media. A visual system centered on the paired-fish motif, supported by dragon and floral patterns, layered colors, product series, and digital communication, can strengthen regional identity, cultural accuracy, and everyday usability. The proposed approach provides a practical reference for the contemporary activation of Jin cultural resources and the systematic development of local museum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Keywords: Cultural Translation; Jin Shangjing History Museum; Jin-dynasty Bronze-mirror Motifs; Cultural and Creative Design

格吕克《阿勒山》与《阿弗尔诺》中的反挽歌书写

江涵伟

(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 北京 100089)

摘要:当代挽歌中,美国诺奖诗人露易丝·格吕克的后现代式哀悼蕴含着深受斯多葛主义影响的冷峻。她拒绝浪漫主义式的慰藉与抒情感伤,倾覆了传统挽歌的宣泄逻辑。本文以《阿勒山》与《阿弗尔诺》两部诗集为研究对象,考察格吕克如何在私人哀悼与公共创伤之间,发展出一种具有后现代意义的反挽歌书写。《阿勒山》作为其最具自传色彩的诗集之一,集中呈现个体死亡经验;而写于“9·11”事件之后的《阿弗尔诺》,则将个体创伤扩展为一种悬置于历史与神话之间的集体哀悼形式。格吕克以刻意节制、近乎冷峻的语言风格,将挽歌重塑为一种铭刻创伤记忆的诗学实践,而非情感宣泄或超验救赎的中介。

关键词:露易丝·格吕克;哀悼;反挽歌;“9·11”;记忆

DOI: doi.org/10.70693/202607144835

一、引言

细读露易丝·格吕克(Louise Glück)的诗歌,不难发现,其诗歌语言高度凝练,“极度简朴”,或许会从中“辨识出一种苦修式的冲动”^{[1]132}。苦修(*askēsis*)源自古希腊斯多葛传统,以自我弃绝与克己节制为特征,追求精神超越。苦修哲学虽然渗透进了格吕克的诗学气质,成为其面对人类存在困境的一种本体论回应;但如果从她的挽歌切入,其旨归却又不乏含混性。

在书写家庭琐细的挽歌集《阿勒山》中,诗歌《生日》、《爱花人》与《天堂》用词极简,明显构成了一种克制的诗学实践。在此,哀伤并未被化解,而是常于缄默与含蓄之中得以存留,这样的诗学表达也与她父亲“清教徒般”反对亲密关系中表演性、伪善性的印记相吻合^{[2]182}。这种带有压抑意味的成长经验,深刻形塑并铭刻了她童年时期在家庭关系中的心理创伤。与此对照,在诗集《阿弗尔诺》中,特别是在“9·11”恐袭后迟迟写就的长诗《十月》里,格吕克延续了她克制的哀悼诗学,但更为复杂——通过借助“置换”策略,改写大量神话文本(包括维吉尔、赫西俄德、荷马与奥维德的作品),融合珀耳塞福涅、得墨忒耳与诗人自身声音生成复调人格,重新穿越了“归零地”^{[3]39}。通过冥界入口阿弗尔诺斯(*Avernus*)、历史灾难的死亡之坑“归零地”、人类裂隙的化身珀耳塞福涅,一个处于生命与死亡、创伤与疗愈之间悬置状态的共同受难空间得以建立,且始终停留在意义的困境,亦即“疑难”(*aporia*)之中,超越了历史与时间的界限。在这一阈限空间中,暴行、创伤与死亡等问题被不断延宕、悬而未决,多重意义彼此碰撞。格吕克所创设的“疑难”本身即可被理解作为一种苦修哲学:既不追求救赎,也拒绝感伤式的慰藉,而是为无法愈合的创伤保留一种记忆方式或诗性空间。

疑难的居间状态恰恰是当代挽歌运作的核心特征。在2010年出版的《牛津挽歌手册》中,卡伦·韦斯曼(Karen Weisman)同样在开篇处指出挽歌在框定失去、死亡时所创设的“悬置空间”,她认为挽歌“可以被拉扯在生者与死者的世界之间,拉扯在当下的悲痛生活与被假定为充满欢乐的逝去过往之间”^{[4]1}。这种悬置在古典挽歌中已然隐含,在当代的书写中则逐渐发展,上升为中心特征。从《阿勒山》到《阿弗尔诺》,露易丝·格吕克的哀悼诗学汇入了由贾汗·拉马扎尼(Jahan Ramazani)所阐发的当代反挽歌潮流。在《哀悼之诗——从哈代到希尼的现代挽歌》(1994)一书中,拉马扎尼指出,现代挽歌诗人倾向于颠覆传统的补偿性哀悼,使失去处于不可慰藉的状态。从心理学视角看,这种“忧郁性哀悼”的转向,背离并挑战了田园与葬礼习俗中挽歌文类的慰藉功能,可被称为“反挽歌”;但同时,它又“远非全然忧郁”^{[5]14, 26, 30}。其后,克利夫顿·斯帕戈(R. Clifton Spargo)进一步指出:“反挽歌最明确的标志,在于其拒绝从文化纪念功能中寻求补偿”^{[6]444}。在斯帕戈的视阈中,格吕克的两部诗集似乎呈现着相互矛盾的立场,但二者的分歧恰恰揭示了这一文类的内在张力。

尽管近年来格吕克的作品在学界受到大量关注,但其独特的当代反挽歌诗作仍然相对缺乏系统研究。本文试

图超越现代反挽歌倾向于抗拒慰藉、沉湎忧郁的西方学界解读,将格吕克在《阿勒山》与《阿弗尔诺》中的反挽歌书写阐释为一种居间性实践,突出格吕克的反挽歌在哀悼与表征哀悼之间的伦理张力。

二、家庭挽歌:《阿勒山》对田园哀歌传统的重塑

由赛奥克里托斯(Theocritus)的第一首《牧歌》(“Idyll”)中提尔西斯(Thyrsis)对达夫尼斯(Daphnis)的哀悼开始,田园哀歌逐步发展为一种诗歌创作模式——将私人伤痛置入“宜人之地”(locus amoenus)或“绿色世界”的意象体系中,通过自然图景的象征转化达成情感慰藉,最终指向符号性的复活与超越^{[7]149}。弥尔顿的《黎西达斯》(“Lycidas”)、雪莱的《阿多尼》(Adonais)、丁尼生的《悼念》(In Memoriam)、惠特曼的《紫丁香》(“Lilacs”)——这些哀歌正典无不浸润于这一牧歌传统之中^{[8]222}。学界虽已意识到格吕克的挽歌“深度运作于田园哀歌的成规之内”^{[9]361},但其具体如何在《阿勒山》中重塑这一传统仍待进一步研究。

若田园哀歌传统仰赖自然的符号性意义,将花朵作为复活的能指、花园作为重生的场所,那么格吕克《阿勒山》则对这种符号性意义施行了决然否定。贝克(Baker)指出,格吕克的苦修诗学语言克制、刻意删削,拒斥自然意象的慰藉功能^{[1]45}。在《阿勒山》中,哀悼并非发生于传统挽歌中的“宜人之地”,而是“郊区哀悼者的逼仄居所”^{[2]179},自然在此退场。从失去到治愈的经典挽歌范式被一种止息式的坚忍修辞取代,恰恰呼应了格吕克在诗歌《劳动节》的结尾诗行:“不是一句话,只是一口气,一个停顿。”^{[10]206}。同时,曾一度承载隐喻功能的花朵意向既有的象征效力也在《阿勒山》中逐步消解。随着20世纪90年代诗学的发展演进,格吕克逐渐意识到,“花的语言已无法充分承载她的悲恸与渴望”^{[2]178}。尽管她在《阿勒山》中反复调动花的意象以书写家族记忆,但在这一诗集中,花已不再是稳固的意义载体,而转化为一个“牵涉文学权威的争议性场域”:自然是否应被据为一种“具有意义的象征体系”^{[2]179}?正是这种内在的张力、犹疑,构成了她在承继、反思乃至倾覆田园传统过程中一个关键的诗学维度。

以《生日》为例,每年送至母亲手中的玫瑰唤起“母亲美貌的传说”,这一纪念姿态原本呼应着田园传统中花井作为象征延续的载体,却戛然而止:“十年后,玫瑰不再来”^{[10]221}。花井在此非但不再象征永恒与重生,反而暴露了自身的贫乏:它们无力抵抗时间。莫里斯(Daniel Morris)精辟指出,格吕克拒斥将花井转化为可能延宕死亡的哀歌隐喻;反之,她认为沉默是更为真切的哀悼方式,是一种映照父亲情感节制的哀悼^{[2]182}。与此类似,《天堂》一诗以反讽强化对自然意象作为慰藉中介的拒斥。姐姐承袭传统哀歌角色,在园中除草蒔花,将郊区居所化为花井纪念空间:“对她而言,这像乡村——/修剪齐整的草坪,条状的彩色花朵。/她不知它曾是什么”^{[10]231}。与此相对,说话者坚持此种姿态的虚饰,意义贫乏,将自己与父亲“对情感的蔑视”结盟^{[10]230}。此中恰恰否定了田园挽歌循环重生的传统。花井的季节性绽放在格吕克的诗歌中不再是复活的隐喻,相反,是一种情感欺骗,掩盖着父位缺失这一未愈创伤。《爱花人》则更直白地呈现了格吕克的家人对花朵这一哀悼符号的拒绝:“在我们家,人人都爱花。/正因如此,墓地才如此古怪:/没有花,只有草皮的锁,/中心立着花岗石碑。”^{[10]207}在花朵惯常象征超越的传统中,格吕克代之以裸露无饰的“花岗岩石碑”。此种苦修式的简素是风格选择,也是她对于哀悼的伦理姿态,亦即通过近乎禁欲的方式拒绝将隐喻作为慰藉的手段。总之,花朵、田园、季节意象在格吕克的挽歌中被质疑、被否定,不再作为修复、重生的隐喻。格吕克对田园哀歌模式的重塑,正是通过否定的修辞完成:剥离传统自然意象的隐喻功能,裸裎悲恸的未愈伤口。

三、后9·11书写:《阿弗尔诺》对循环重生的拒斥

《阿勒山》对传统慰藉意象的质疑,为格吕克在《阿弗尔诺》中重塑的更激进的反哀歌范式奠定了基础。若《阿勒山》剥离自然的隐喻潜能而选择裸裎悲痛,《阿弗尔诺》则将此种批判推至田园哀歌所依托的循环时间逻辑。重生的写法深植于田园哀歌传统,通常以季节循环来呈现。从斯温伯恩(Swinburne)至劳伦斯(D. H. Lawrence)、威廉斯(William Carlos Williams),珀耳塞福涅(Persephone)始终是现代哀歌书写的关键意象。然而,随着工业革命与都市生活的侵蚀,此种慰藉式的书写传统在当代文学语境中也渐渐松动,产生演进,对形而上的怀疑渗透进了挽歌书写。邦妮·科斯特洛(Bonnie Costello)论及伊丽莎白·毕肖普(Elizabeth Bishop)的诗歌时指出,“现代对牧歌式挽歌(pastoral elegy)的修正最显见于哀悼作品中封闭性与慰藉性的缺失,这反映了现代诗歌更普遍的偏好——暴露问题,而非解决问题”^{[9]346}。格吕克的修正恰在于对循环式重生的拒斥。古典田园哀歌通过季节回归或珀耳塞福涅等神话意象寻求符号性复活,格吕克却在重写这一原型时动摇其模式。诗歌《夜徙》中毅然开始质疑:既然“我们依赖的这些事物/终将消逝,/灵魂那时将凭何慰藉”^{[10]489?}

尽管格吕克在《阿弗尔诺》中援引珀耳塞福涅,季节母题在其反哀歌书写中已大为变形。国内学者但汉松(Dan)认为,格吕克“试图在神话的‘阿弗尔诺’和‘9·11归零地’之间建立超历史的关联,同时为生活中无处可逃的断裂与死亡提供了冷峻的诗歌见证”,但最终是为了“重塑一种当下感,规劝我们放弃对回归的情感执念”。^{[11]41}

这精当地揭示了格吕克《阿弗尔诺》对历史灾难的诗学见证，但在某种程度上，诗集《阿弗尔诺》拒斥此种具有治愈可能的时间线性。《阿弗尔诺》或许并非旨在将当下重铸为新的稳定地基；相反，它滞留于过去灾难与当下存在难分难解的悬置状态——时态的游移暗示说话者不断从当下逸入记忆又复归。统摄格吕克哀悼的苦修诗学，恰与此种解读中隐含的目的论相悖。

学界公认《十月》为诗集中最为震撼之作。《十月》由六个部分组成，前四首诗歌穿越冬、夏、春、秋的召唤，不无对自然治愈之力的古老信仰。正如贝克评论，第四首“尽管姿态从容，比济慈的《秋颂》或史蒂文斯的《星期天早晨》末章更为炽烈”^{[1]138}。然而，穿越阿弗尔努斯的神话之旅是一场无终的趋近，它持续至第五部分，成为一种滞留与延宕的苦修。所余者，似乎只是一颗在“苦涩耻辱、寒冷荒芜”空间中的思忖之心^{[10]500}。开篇数行，说话者反复质问：“难道夜没有尽……难道它们没结束，后园 / 没被耙过种过—— / 我记得泥土的触感，红而密实， / 在硬直的行垄中，难道种子没被种下”^{[10]493}，将种植与生长的循环同创伤的持存并置。问句的重复加强了对时间循环慰藉功能的质疑：纵使种子播下、季节轮回，言者身心仍不可逆地烙刻创伤。此一自然外观连续与内在创伤持存的张力贯穿全诗：第二段中，说话者观察到阳光回归，“枫树的长影 / 在碎石小径上近乎淡紫”^{[10]494}，却旋即断言：“它对我毫无用处；暴力改变了我”^{[10]495}。此处，田园更新之诺——夏、阳光、丰饶的回归——被不可逆地创伤化的意识所抵销：“暴力后的慰藉”幻象被诗人拒斥^{[10]495}。季节更新带来的慰藉已然失效，甚至转化为“剥夺我们幻象、所爱之人、之地、之物的时间暴力”^{[1]136}。尽管诗人仍召唤田园哀歌传统中的春播、夏长、秋收，其更新与慰藉功能已被剥离。在第四段中，世人仍言及“放弃希望并未摧毁你”^{[10]497}。此希望之弃绝中，生出对世界苦难的坚忍认同、一种升华的心境。《阿弗尔诺》其实是在寻求一种辨认丧失的不可逆性，这也正是科斯特洛所言格吕克持续“质疑与修正心理叙事”的体现^{[9]361}。

综而论之，《阿勒山》与《阿弗尔诺》中的苦修哀悼，通过拒斥自然意象与循环更新重塑了田园哀歌传统。以节制的措辞、简练的句法、神话的延宕，格吕克将悲恸转化为持存的伦理在场，强调丧失的不可逆性，而非传统的修复与时间闭合。

四、“不可能哀悼”的见证：格吕克挽歌的内在张力

在贝克对格吕克苦修诗学三分法中，第一种是“旨在抵御经验压力、塑造独立自我的弃绝之路”，其中“经验”指涉“他人、对他人的依赖、他人的索求”^{[1]134}。格吕克少女时期，此种弃绝在厌食症这种对他人干预的身体性拒斥中得以具像化，正如格吕克自述：“我分离自己、建立清晰边界的方式，是将自己置于他人声明的欲望之外，利用他们的意志来塑造我的意志”^{[12]10}。然而，成熟的格吕克重塑了此种苦修，使其不再成为是防御性的孤立，而成为一种有节律的接受力、一种为他人持续在场预留空间的苦修形式。如前所述，在《阿勒山》中，格吕克拒绝任何慰藉性替代，规避悲恸的象征中介（如姐姐以花卉纪念父亲）以保存丧失的伦理完整性。这呼应斯帕戈（Spargo）的论断：反哀歌抵制“存在于哀悼与表征的替代性联结之间、对死者施以慰藉性象征评估的倾向”^{[13]13}。《阿弗尔诺》则以珀耳塞福涅故事接纳了神话的替换手段。然此处的替代并非要让悲恸走向闭合，而是无限延宕其消解。神话的循环时间性践行着生与死间的永恒阈限，以其对终结的拒绝映照德里达的延异。

从《阿勒山》的拒绝到后“9·11”写作《阿弗尔诺》中象征性采纳的表层转向，与其说是对反哀歌精神的背离，不如说是其策略的扩展。它将我们带回开篇所述的临界空间：格吕克并非以替代消解创伤、慰藉死者，而是再造珀耳塞福涅神话以持存一个居间空间。形式上是替代，本质上却是反慰藉。此种哀悼中的策略性张力揭示出格吕克反哀歌的内在弹性，这是一种源于对他者伦理敞开性的弹性。借用德里达在《保罗·德曼的记忆》中的表述，哀悼者的任务被一种无可避免的疑难所标记：在试图通过记忆保存死者时，我们无可避免地将其内化，从而抹除其他异性。在“谟涅摩叙涅”（“Mnemosyne”）一章中，他这样论及哀悼行为：“何为不可能哀悼？关于记忆的本质，它告诉了我们什么？至于我们之中的他者，即使在此‘对他者的遥远预感’中，最不义的背叛位于何处？是最令人痛苦、甚至最致命的背信，在于那将死去他者的图像、偶像或理想内化于我们之中、使其仅活在我们之中的可能哀悼？还是那不可能哀悼——它让渡他者以他异性，尊重其无限远离，从而拒绝或无力将他人纳入自身，如同纳入某种自恋的坟墓或窖藏？”^{[14]6}

哀悼，本质上是一种悖论性表演，一种同时背叛与尊崇他者的不可能忠贞。此视角下，格吕克在《阿勒山》中对象征替代的拒斥，可被解读为对此种不可能性的坚持：通过拒绝花卉纪念，她抵制以慰藉性图像覆写丧恸的诱惑。她的缄默哀悼，事实上持守着死者所要求的伦理距离——其说话者“对维持花园纪念的漠不关心，展现了她对父亲的冷酷而诚实的评估”^{[2]184}。格吕克的苦修诗学、近乎生硬的书写方式，正揭示出她将沉默认定为“悲恸深度的证词”^{[2]182}。

格吕克曾自省：“我着迷于省略、未言、暗示、雄辩而蓄意的沉默。未言于我，施以巨大力量：我常希望整首诗能以此词汇构成”^{[12]73}。此种沉默与裸露深植于抒情的凝缩传统，也阐明了她在《阿弗尔诺》中的诗学实践：

诗作的措辞赤贫、质地精简，如她其他诗歌，功能如同废墟或不完整的艺术品，“它们萦绕人心，因其不圆满，而圆满被暗示”^{[12]73}。同理，她的哀悼并不解决，而是悬置于雄辩的沉默中，被缺席却隐含之物萦绕，双子塔的毁灭性袭击如幽灵般漂浮在读者眼前。对“9·11”的拒绝命名是对不可言说之物、一场过于灾难性的恐怖的回应。因此，《阿弗尔诺》中的神话转向并未否定这一伦理姿态，而是以不同模式将其戏剧化。格吕克以替代取代命名。她运用神话、半人半神的演说者、“与身体的分离”来言说不可言说之物^{[3]35}。通过呈现珀耳塞福涅在生死两界间的永恒穿行，格吕克将哀悼重新构想为一种如精灵般悬置于阈限的永恒状态。神话的功能正如德里达所称的幽灵——一个既象征失去、又暴露其不可跨越距离的补替。此意义上，格吕克的替代运用并未美化死亡，反而强化了这一历史悲剧作为他者的不可言说性。

从《阿勒山》到《阿弗尔诺》，格吕克将哀悼呈现为抗拒闭合的伦理遭遇。无论是通过拒绝还是神话延宕，她的反哀歌戏剧化了主体对他者缺席的脆弱性，践行一种暴露诗学——持守哀悼作为哀悼的不可能性，以此尊崇死者，拒绝将其同化入慰藉性表征。

五、结论：反挽歌作为诗歌媒介的伦理潜能

实际上，哀悼的不可能性触及一个更根本的问题：文学作为通达现实的媒介。格吕克在《死亡与缺席》中提供了对其诗学媒介观的关键洞见，指出诗歌创作是积极在场，而非“镌刻于岩石”的静态铭文^{[12]128}。她论道：“诗歌并非作为客体而持久，而是作为在场。当你阅读任何值得记忆的文字，你解放了一个人的声音；你将一个陪伴的灵魂再次释放入世界。”^{[12]128}。这或许解释了为何她在《阿勒山》中以父亲（或叙述者之父）的方式哀悼。通过尊崇其在场，拒绝将其吸纳于“我”的哀悼方式，格吕克使哀悼者得以接触作为他者的他者，而非同化或美化丧失。通过这种方式，诗歌成为了一种媒介，哀悼在其中既未完成，也未获得象征性的解决，而是被中介化，维持着那种张力和矛盾，这些张力和矛盾正是她反哀悼式实践的特征。

然而，当面对“9·11”这一不可言说的历史浩劫时，格吕克开始质疑媒介本身：“的确，世上没有足够的美。/ 确实，我无力修复它”^{[10]498}。这正像 W. H. 奥登面对战争的集体苦难时在《纪念叶芝》中所写的那样：“诗歌不能使任何事情发生”^{[16]1473}。二者皆直面肖莎娜·费尔曼（Shoshana Felman）和多里·劳布（Dori Laub）在《证词：见证的危机》（*Testimony: Crisis of Witnessing*）中定义的“无指涉物”（without referent）的事件——一种极端到逃逸表征的历史创伤^{[15]102}。极端创伤溢出语言，直接言说在恐怖重压下坍塌。然而，此时诗中的“人格面具”（即说话者）似乎化身为一位艺术家、一位诗人，宣称“既无坦诚可言，而在此我或能有所用……我 / 在工作，尽管我沉默”^{[10]498}。奥登也接着写道，诗歌“幸存”。在该组诗最后转向月亮的段落中，贝克将其解读为“格吕克苦修式艺术的缪斯，这种艺术旨在目睹幻觉被剥离后尚存之物”^{[11]140}。最终，格吕克的挽歌诗作并非以疗愈为目的，而是为集体的不可疗愈之物腾出空间——“你并不孤单，/ 那首诗说”^{[10]499}。

格吕克的诗学并不将诗歌视为一种能够抵消创伤与死亡的救赎性行为，而是将其看作一个临时的遭遇场域——在那里，那面色苍白、徘徊不去的他者的声音，纵然脆弱、破碎、断断续续，却仍可能被听见。通过识破感伤疗愈的幻象以及能指或文学再现的局限，格吕克以一种见证的形式向挽歌传统发起挑战：这种见证既不纪念，也不化解，而是将哀悼赤裸裸地悬置、延宕在一个阈限空间之中，置于那“黑暗的隧道”^{[10]499}里。她不寻求“一个主宰性的原动力”；相反，在这个居间的、近乎“存在主义—虚无主义”的空间中，她化身为见证并记录故事的“智者”，“一个存在意义上的创造者，等待着超越人类的暴力”^{[3]44}。换言之，格吕克重申：从创伤与暴行中获得救赎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于文学之中，存在于诗歌之中。

综观《阿勒山》与《阿弗尔诺》，格吕克的哀歌实践展现了一种独特的当代反哀歌形态，植根于哀悼与表征间的张力。通过对挽歌传统的重塑，格吕克的两部作品揭示了慰藉性表征的局限，摹画出哀悼的边界：《阿勒山》以简约措辞与直接经验语言演绎私人悲恸，抵制象征性的收束闭合，持守逝者他异性；其伦理承诺在于忠于他者，而非将逝去的他者同化入自我；《阿弗尔诺》则以迂回方式触及“9·11”集体创伤，神话置换与非线性叙事为其创造了一个居间空间，以斯多葛式的集体哀悼表达，保存了历史灾难的不可化约的他异性。借此，格吕克对哀歌传统的介入与对挽歌模式的挑战揭示了一种将艺术视为创伤媒介的矛盾态度，她既承认诗歌作为创伤见证的可能性，又不断质疑其表征效力，从而揭示符号在直面死亡与创伤时的局限——无论这种创伤是私人性的，还是公共、历史性的。

参考文献:

- [1] Baker, Robert. "Versions of Ascesis in Louise Glück's Poetry." *The Cambridge Quarterly*, vol. 47, no. 2, 2018, pp. 131-54.
- [2] Morris, Daniel. *The Poetry of Louise Glück: A Thematic Introduction*. U of Missouri P, 2006.
- [3] Azcu, Mary Kate. "Persona, Trauma and Survival in Louise Glück's Postmodern, Mythic, Twenty-First-Century 'October'." *Crisis and Contemporary Poetry*, edited by Ann Karhio, Sean Crosson, and Charles Armstrong, Macmillan, 2011, pp. 33-49.
- [4] Weisman, Karen, editor. *The Oxford Handbook of the Elegy*. Oxford UP, 2010.
- [5] Ramazani, Jahan. *Poetry of Mourning: The Modern Elegy from Hardy to Heaney*. U of Chicago P, 1994.
- [6] Spargo, R. Clifton. "The Contemporary Anti-Elegy." *The Oxford Handbook of the Elegy*, edited by Karen Weisman, Oxford UP, 2010, pp. 444-61.
- [7] Watterson, William C. "Nation and History: The Emergence of the English Pastoral Elegy." *The Oxford Handbook of the Elegy*, edited by Karen Weisman, Oxford UP, 2010, pp. 145-62.
- [8] Hammond, Jeffrey. "New World Frontiers: The American Puritan Elegy." *The Oxford Handbook of the Elegy*, edited by Karen Weisman, Oxford UP, 2010, pp. 221-39.
- [9] Costello, Bonnie. "Fresh Woods: Elegy and Ecology among the Ruin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the Elegy*, edited by Karen Weisma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pp. 346-65.
- [10] Glück, Louise. *Poems 1962-2012*.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2012.
- [11] Dan, Hansong 但汉松. "暴力改变了我, 然后呢? ——格吕克《阿弗尔诺》中的后'9·11'悲悼." *外国文学*, no. 3, 2021, pp. 30-42.
- [12] Glück, Louise. *Proofs and Theories: Essays on Poetry*. Ecco Press, 1994.
- [13] Spargo, R. Clifton. *The Ethics of Mourning: Grief and Responsibility in Elegiac Literature*. Johns Hopkins UP, 2004.
- [14] Derrida, Jacques. *Memoires for Paul de Man*. Translated by Cecile Lindsay, Jonathan Culler, Eduardo Cadava, and Peggy Kamuf, Columbia UP, 1989.
- [15] Felman, Shoshana, and Dori Laub. *Testimony: Crises of Witnessing in Literature, Psychoanalysis, and History*. Routledge, 1992.
- [16] Ferguson, Margaret, et al. *The Norton Anthology of Poetry, Fifth Edition*. New York: W.W. Norton & Company, 2005.

Louise Glück's Anti-Elegy in *Ararat* and *Averno*

Jiang Hanwei

(Beijing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Beijing, China)

Abstract: Throughout the contemporary writing of elegy, Louise Glück's postmodern mourning is tinged with her stoic poetics of austerity. Her poems dismantle traditional elegiac forms by refusing both consolation and lyric sentimentality. This paper seeks to explore such an elegiac writing through her mourning in collections *Ararat* (1990), one of Louise Glück's most autobiographical collections on familial tensions, and *Averno* (2006), a post-9/11 volume in which individual trauma swells into that of a communal one. Rather than presenting trauma as a narrative of personal triumph or growth, *Ararat* and *Averno* both mourn through the refusal to deny trauma in different ways—bareness and substitution, tracing death and the violence embedded in it and deeming trauma as an immutable fact. Thus, the Romanticist's transcendence remains deferred, not realized in her mourning. Ultimately, Glück's elegiac poems function not to heal, but to hold space for the unhealable. By seeing through the illusions of sentimental healing, Glück challenges the elegiac tradition in a form of witness: one that neither commemorates nor resolves, but starkly defers and suspends.

Keywords: Louise Glück; mourning; (anti-)elegy; memory

罗马埃及行省治理与犹太人结构性困境

王佃玉¹, 王丙宜²

(1. 山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山东济南 250358; 2. 商丘工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 河南商丘 476000)

摘要: 罗马帝国对埃及行省的统治是帝国行省统治的经典范例。本文以埃及犹太人的困境为切入点, 审视罗马帝国的统治模式。在托勒密王朝时期, 犹太人是王室中一支受信任的中层力量, 享有军事、经济和司法特权。罗马征服后, 他们的地位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 引发了数次大规模冲突。罗马帝国对埃及行省的统治并非仅仅依靠军事征服和暴力镇压, 而是通过重建社会等级制度、改革财政和税收体系以及统一司法系统来实现的。这些机制有着共同的潜在逻辑: 帝国以个人流动的承诺取代了对集体特权的认可, 吸纳了行省精英, 同时瓦解了族群社群, 确保所有资源最终都流向帝国中心。犹太人的结构性困境, 正是其所属共同体在宗教与律法的结合点上, 拒绝了帝国治理模式核心交换条件的结果。

关键词: 罗马帝国; 埃及行省; 犹太人; 治理模式; 身份等级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罗马帝国埃及行省治理模式研究”(21BSS047)

DOI: doi.org/10.70693/202607188278

引言

公元前30年, 屋大维征服埃及, 将这片尼罗河谷地设为皇帝私人行省。与其他元老行省不同, 埃及由皇帝直接任命的骑士阶层总督统治, 元老未经许可不得进入。这一特殊安排源于埃及不可替代的战略价值: 它是罗马的粮仓, 每年提供罗马城三分之一的谷物; 它易守难攻, 控制埃及者随时可威胁帝国统治。埃及的行省治理因此集中体现了罗马帝国最核心的统治逻辑。

在埃及行省众多的族群中, 犹太人以其独特的命运成为观察帝国治理模式的绝佳标本。托勒密王朝时期, 犹太人是被王室倚重的中间力量, 享有军事、经济和司法诸方面的特权; 罗马征服后, 犹太人的地位发生根本性转变, 先后爆发了公元38年骚乱、公元66年起义和公元115年流散战争。这些冲突的烈度和广度, 远超埃及其他族群的抗争, 迫使研究者追问: 犹太人困境的根源究竟何在?

以往研究多从犹太人自身寻找冲突的根源——他们的宗教排他性、与希腊人的宿怨、对罗马统治的不适应。美国学者费尔德曼(Louis H. Feldman)在其专著《古代世界的犹太人与异邦人: 从亚历山大到查士丁尼时代的观念与交往》(*Jew and Gentile in the Ancient World: Attitudes and Interactions from Alexander to Justinian*)¹中认为, 犹太人的独一神信仰与希腊-埃及的多神传统之间存在本质上的不可兼容性。犹太人对偶像崇拜的严格禁止、独特的饮食法、安息日制度以及割礼等宗教实践, 使其在希腊化城市中显得“格格不入”。这种宗教排他性被希腊-埃及知识分子(如阿皮翁)解读为“仇视人类”。英国学者塔恩(W. W. Tarn)在《希腊化文明》(*Hellenistic Civilisation*)²中认为, 犹太人在接受希腊语、希腊生活方式的同时, 却坚守犹太教核心理念, 这种“不完全的同化”使其既无法完全融入希腊社会, 又与被排斥的埃及人保持距离, 最终陷入“两头不讨好”的境地。国内学者郑阳在《希腊化—罗马时期地中海世界的犹太观念》³中认为, 在多神论盛行的希腊化-罗马时期, 犹太文明的生活样式不仅与众不同, 而且本质上不能与其他建基于多神传统的文明相融合, 两种文明之间的互动才产生了强大的张力。苏蕤的硕士论文《试论公元66—70年犹太战争爆发的原因及影响》⁴则认为, 罗马统治对犹太人的强迫与欺压(如总督弗洛鲁斯的暴政)、文化观念上的巨大差异(特别是犹太人拒绝皇帝崇拜和偶像崇拜)、犹太行省的经济崩溃与社会动乱, 以及罗马扶植犹太祭司阶层的失败, 共同导致了冲突的激化。

上述研究各有洞见, 但共同的问题在于: 它们都将犹太人视为冲突的“主体”, 而将罗马帝国视为被动的“背景板”。本文尝试将视角反转, 以埃及犹太人的治理变迁为切入点, 以犹太人的境遇为透镜, 反向考察罗马帝国对埃及行省的治理模式, 探索犹太人的困境与帝国行省治理模式之间的深层关联。本文认为, 这种治理模式由四

作者简介: 王佃玉(1984—), 男, 博士, 讲师, 研究方向为世界古代史;

王丙宜(2002—), 女, 硕士, 研究方向为世界史。

通讯作者: 王佃玉

重相互关联的机制构成：身份等级制度的重构、财税体系的直接化、司法体系的统一化以及意识形态的忠诚测试。每一重机制都遵循同一个底层逻辑：帝国以个体流动的承诺取代集体特权的承认，在吸纳行省精英的同时瓦解族群共同体，确保所有资源最终流向帝国中心。

一、权力架构：埃及行省的总督制及其逻辑

埃及行省治理的首要特征，是其有别于其他行省的权力集中程度。奥古斯都将埃及设为皇帝私人领地，由骑士阶层出身的总督全权管辖，下设财务官、司法官和若干行政长官，形成一套垂直管理的官僚体系。这种安排并非偶然，而是罗马内战的直接产物：埃及在共和末期曾是安东尼的势力根基，屋大维在消灭安东尼后决意杜绝任何元老在此培植独立势力的可能。

在总督人选上，埃及与其他行省不同，它由骑士阶层的总督治理，总督由皇帝任命并直接对皇帝负责。不过，被释奴也有可能担任这一官职。例如，公元 32 年，一个名叫希贝鲁斯（Hiberus）的被释奴便取代去世的维特拉西乌斯·波利奥（Vitrasius Pollio），曾短暂地担任过埃及总督。⁵第一任埃及总督科尔奈利乌斯·加鲁斯（Cornelius Gallus）带领罗马军队进驻埃及，其首要任务是保证埃及境内的稳定。通过加鲁斯的治理，底比斯科普特斯（Koptos）地区的叛乱城镇明显减少。然而，他在任期间个人势力不断膨胀，甚至吹嘘自己的功绩，声称是他本人带领罗马军队向埃及以南地区扩展，致使罗马版图达到前所未有的范围。⁶他的所作所为可能引起了奥古斯都的猜忌，奥古斯都将他免职，并禁止他进入埃及行省，最后他被迫自杀。加鲁斯的命运揭示了一个关键事实：即便是最受信任的总督，也不能在埃及建立独立于皇帝之外的个人权威。

埃及总督的职位可谓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埃及总督仅对罗马皇帝负责，不受元老院管辖，是埃及的最高行政长官。他受到的唯一限制是：当人们反对他，或者对他的行政管理、司法审判等不满意时，可以不经过他本人而直接向皇帝提出申诉或控告。埃及总督具有很多法老时代国王的特点，在一定程度上甚至可以将其视为托勒密国王的继承者。例如，他们和法老时代的统治者一样，严禁在泛滥季航行于尼罗河上。⁷总督对行省管理的所有方面拥有控制权，包括财政、军事和司法。埃及总督的任期一般为三年，但在奥古斯都和提比略统治时期，总督的任期经常不固定。总督掌管赋税、控制亚历山大里亚，与其他骑士阶层官员主持管理重要案件的审判，并在一系列官员的辅佐下统领军队。

埃及行省的最高司法权威也是总督。埃及境内的所有罗马公民，在涉及死刑案件或重要的民事案件时，有权向皇帝上诉。其他人，除极少数之外，只能上诉至本行省内部的司法机构，但总督在必要时会前往罗马请求皇帝予以裁决。总督对个人案件的司法裁决实行巡回审判制度。埃及主要有三个地区可以设置巡回法庭：亚历山大里亚（负责三角洲西部地区）、佩鲁西乌姆和孟菲斯（管辖中埃及与上埃及）。⁸行省总督在案件的审判与裁决中，拥有很大的选择权和灵活性。除了巡回法庭之外，罗马还在其他地区，如阿尔西诺或科普特斯，以及后来的安提诺波利斯（Antinoopolis）的城镇中设有司法会议，负责处理司法事宜。

除了行省总督之外，罗马管理埃及行省的其他官员也能行使司法权，但仅限于民事诉讼。他们的头衔分别是：大法官、祭司长、“特殊金库”长官和财务审计官等。⁹由于此方面的文献资料特别稀少，我们很难区分这些长官的行政职能和司法职能。总督每年到一些诺姆进行巡察，并组织巡回法庭。在此期间，上述官员作为总督的随行人员，一起前去巡察。在总督巡察的过程中，由于他很少到达孟菲斯或阿尔西诺以南的地区，这些地区的诺姆官员便沿尼罗河而下，面向总督汇报。总督很少过问下级法庭审讯事宜，只是对上诉案件进行个别抽查和审理。因此，大多数行省居民无法接触到行省的最高司法权威——行省总督的审判。对于他们来说，诺姆“将军”（epistrategoi）才是他们的最高司法官，即便是他们越级上诉，最终被转回来的案件还是由“将军”审理。

这套体系的核心特征是：所有权力最终汇聚于总督一人之手，总督只对皇帝负责，罗马元老院对埃及事务没有任何发言权。这种权力架构源于罗马内战的经验，但更深层的原因在于：埃及作为帝国最大单一粮源地，其稳定直接关系到罗马城的粮食供应和民众对皇帝的忠诚度。任何可能导致埃及动荡的因素，都可能演变为对皇权的致命威胁。因此，罗马在埃及行省追求的目标远不止于维持秩序和征收赋税，还包括彻底消除任何能够独立于皇权之外的中间势力。

在这种权力架构下，埃及总督的权威几乎不受制约。他可以颁布具有法律效力的法令，可以调动驻军镇压骚乱，可以自行裁决重大案件，甚至可以将整个族群或社区置于歧视性政策之下。公元 38 年亚历山大里亚骚乱期间，总督弗拉库斯试图废除犹太人的市民权并解散其长老会议，正是这种专制权力的体现——总督的意志就是行省的法律，他不需要经过元老院批准，也不需要遵循共和时期的程序约束。犹太人在这种权力架构中的脆弱性不言而喻：他们享有的权利完全取决于皇帝和总督的意愿，缺乏任何制度性的保障。这种绝对权力的存在，使得任何政策转变都可能对特定族群造成毁灭性的冲击。

二、身份等级：社会分层与犹太人的中间地带

埃及行省治理的第二重机制，是以人口普查为基础的身份等级制度。奥古斯都征服埃及后，首次引入了罗马式的人口普查，对全体居民进行法律身份的分类登记。从共和国到帝国时期，罗马人口普查的内容主要包含意大利及海外罗马公民本人的宣誓申报和对其个人财产的价值评估，包括动产和不动产、贵重物品和奴隶。但在埃及行省，罗马所进行的人口普查主要是登记人口、土地及其房屋。每个家庭的户主，无论他所定居的房屋是归他所有还是租借而来，都有义务提交一份人口普查申报单，按姓名、年龄等列出与其共同居住的所有人。如果房屋无人居住，房屋的主人则需提交相关声明。对户主申报的土地，有专人进行丈量登记。然后，政府根据这些人口普查和地籍丈量的统计数据，计算出受普查人的经济地位，进而确定其所要承担的赋税和徭役的额度。普查的核心目的在于：确定每个人的税收等级和司法管辖归属，从而将全体行省人口纳入帝国的管理和榨取体系。

埃及的身份等级大体分为三层。顶层是罗马公民，包括帝国派往埃及的官员、驻军的部分成员以及极少数获得皇帝特许的行省居民。罗马公民享有最广泛的法律保护，免缴人头税，其案件由总督巡回法庭直接审理，地位超然。中层是亚历山大里亚、瑙克拉提斯和托勒密城等希腊城市市民，他们保留了部分希腊城邦的自治传统，设有自己的议事会和法庭，享有特定税收减免，构成了罗马在埃及依赖的行政管理层。底层是“埃及人”，这是一个法律范畴而非民族标识，囊括了除前两类之外的所有行省居民，承担最重的税赋，受罗马法最严格的约束。这种身份等级制度是一种典型的“分而治之”策略，其核心在于将帝国统治的政治秩序与法律特权直接嵌入社会结构的每一个角落。这种等级制度不仅通过赋予不同群体差异化的法律地位来维持统治，还通过制造群体间的隔阂与竞争来巩固帝国对埃及的控制，使得任何一个群体都无法单独挑战罗马的权威，从而确保了帝国在埃及的长期稳定与税收来源。

犹太人的身份困境恰好暴露了这套等级制度的深层逻辑。托勒密时期，犹太人因与王室的密切关系而事实上接近于希腊市民阶层，享有相当的自治权。部分犹太人跨越了民族与地位的界限，跻身上层阶级。托勒密王朝时期的《犹太纸草文献》(*Corpus Papyrorum Judaicarum*) 记载了一位名为多西修斯(Dositheos)的犹太人在王室宫廷中身居高位：托勒密三世时期，他曾于公元前240年左右担任国王的书记官；公元前222年，他曾担任大祭司；托勒密四世时期，他于公元前217年成功挫败针对国王的暗杀企图，并跟随托勒密四世参加了拉菲亚战役(托勒密王朝与塞琉古王朝之间为争夺领土爆发的战争)。¹⁰到了公元前2世纪，赫拉克里奥波利斯(Heracleopolis)的文献中就已经有关于犹太人社区(politeuma)的记载，犹太人享有一定程度的法律地位和自治权，拥有自己的宗教活动场所。

罗马到来后，这种基于个人恩宠的地位失去了制度根基。犹太人既不因其宗教和文化传统被归入希腊人行列，也不完全等同于埃及土著农民，其身份地位成为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犹太作家斐洛(Philo)、约瑟夫斯(Josephus)等人都称犹太人为亚历山大里亚市民，属于行省中等级最高的社会群体；但希腊作家则相反，阿皮翁(Apion)、喀莱蒙(Chaeremon)等人都强烈抵制这种观点，他们将犹太人等同于行省底层的“埃及人”。这种论争本身说明，犹太人的地位确实受到了动摇。公元38年，亚历山大里亚发生犹太人骚乱，斐洛在著作中描述，埃及总督弗拉库斯试图废除犹太人的“市民权”(politeia)，解散长老会议(gerousia)，并迫害犹太长老。¹¹

面对这场争论，罗马政权采取了极具策略性的暧昧态度：不作最终裁决，坐视双方争斗，以仲裁者身份根据局势需要随时调整立场。这种暧昧是一种高效的治理技术。通过悬置犹太人的确切身份，帝国达到了多重目的：犹太人因身份不确定而无法形成稳定的政治预期；希腊人因担心犹太人分享特权而被激励向帝国表现忠诚；总督则可以根据局势需要在关键时刻选择支持某一方，从中渔利。克劳狄皇帝公元41年的敕令最清晰地揭示了这层逻辑：为了防止互相敌对的希腊人和犹太人再挑起事端，他决定恢复奥古斯都曾经授予犹太人的权利，但不允许他们参与城市政治生活，严禁他们争取更多的权利，严禁犹太新移民进入亚历山大里亚。¹²犹太人被固定在一个既非完全剥夺、也非真正平等的中间地带，其地位完全取决于帝国意志，没有任何制度化的保障。

这种身份悬置带来的后果是深远的。一方面，犹太人无法像希腊人那样享有明确的法律地位和自治权利，也不能参与城市政治生活，其社会地位的不确定性使其始终处于弱势。另一方面，身份悬置也使得犹太人无法融入“埃及人”的底层群体，与埃及土著居民之间的隔阂难以弥合，进一步加剧了其孤立状态。这种“不上不下”的处境，正是罗马帝国治理策略的精妙之处：通过制造身份的不确定性，帝国既避免了直接得罪任何一个群体，又使得所有群体都依赖于帝国的仲裁和裁决。

三、财税改造：从包税制到直接征收的体制转型

埃及行省治理的第三重机制是财税体系的根本改造。托勒密王朝实行严格的经济控制政策，政府未扶持私营经济，而是将所有土地和企业收归王室所有。非皇家垄断产业若想经营，必须购买特许状或上缴部分产出。托勒密王朝的财政建立在包税制基础之上：王室将特定区域和特定税种的征收权拍卖给出价最高的私人承包商，承包商在交纳承包费后可在征收区内自行组织征收，超收部分归己所有。犹太人从托勒密王室那里取得了若干专营贸

易的特许权，经济实力上升，跻身富裕阶层。¹³这套制度使得犹太人中富有资本和政治资源的家族——如托比阿德家族的约瑟夫——得以通过竞拍包税权而积累巨额财富，成为王朝的重要中间人。约瑟夫的父亲托比阿斯 (Toubias) 曾担任托勒密王朝在约旦河东岸的军事殖民地首领，与埃及政府关系密切。约瑟夫通过家族传承的金钱和政治资本，获得了叙利亚和腓尼基地区的税收承包权，成为托勒密王室在该区域的主要财政代理人，利用包税权积累了巨额财富。

此外，犹太人深度嵌入了希腊化的金融体系。根据犹太纸草文献记载的一份借贷契约，两位犹太人均拥有“后备兵” (Epigone) 身份，属于军事移民阶层，享有一定法律特权。他们之间进行了一笔高达 2 塔兰特 3000 德拉克马铜币的房产抵押贷款，数额巨大，且借贷条款完全遵循希腊法律框架，拥有详细的抵押物描述、违约金（加收 50%）及逾期利息（每月每米纳 2 德拉克马）等标准条款，这表明犹太人已熟练运用希腊化世界的金融工具进行资本运作。¹⁴同时，契约显示犹太人拥有不动产，并积极参与民间信贷活动，这印证了犹太人在托勒密埃及的经济活动并非局限于单一领域，而是广泛分布于金融、贸易和土地持有等多个层面。不过，这种经济上的活跃与成功，也使其成为其他族群嫉妒和怨恨的靶心，构成了族群冲突的深层经济根源。

罗马征服后，对埃及的财税体系进行了彻底重构。包税制逐渐被强制性的公共服务制度取代。首先，收税人员通过强制征派产生。收税被视为一项强制性的义务，而非自愿选择。地方政府从有一定收入的村民中提名征税人员，被提名者必须履行职责，否则将面临处罚。这些被征派的官员负责征收人头税、谷物税、沐浴税、冠冕税等各类税种。其次，地方官吏要承担连带责任。罗马皇室把收税作为义务强加给埃及地方官吏，规定如果收不足税收，所欠税额则由地方官吏本人负责补足。这导致被“派差”的官吏在收税时对纳税人更加残酷无情，甚至不惜将纳税人变为债奴。许多官吏因无法收足税额而自己破产，沦为普通老百姓。第三，除了征税，埃及人民还需为罗马统治者负担各种强制性劳役，如义务修建水利工程、公共建筑物、道路和军营，以及提供车、船和牛运送人员和货物等。例如，罗马当局强制推行了“公共服务”，要求埃及农民每年必须为政府提供五天服务，用于清理运河、修建水坝等工程。简言之，税收征管成为地方官员必须无偿承担的义务，征收额度由帝国预先确定，征收过程受到财务官的严密监督。

这项改革的根本目的是消除中间人，使帝国能够直接面对纳税人，最大限度地减少征收过程中的截留和流失。对犹太人而言，这种制度变化的冲击是多重的。其一，他们作为包税人的经济角色被直接取消，丧失了重要的财富来源和政治影响力。其二，随着身份制度改革，犹太人失去了此前可能享有的希腊城市市民税收特权，必须像埃及土著居民一样缴纳全额人头税。这个变化具有强烈的象征意义：它标志着犹太人从财税体系的参与者变成了单纯的被征课对象。其三，公元 66 年，因地位下降而积怨的犹太人发动了反对罗马统治的大规模起义，结果遭到残酷镇压，许多犹太人的财产被没收，犹太社区遭受沉重打击。韦伯芟皇帝更是对帝国全境犹太人开征“犹太税”。这项税种的征收对象是全体犹太人，不论其居住地和经济状况，原来向耶路撒冷圣殿缴纳的丁税被改为献给罗马的朱庇特神庙。每次缴纳都是信仰上的羞辱，也是帝国权威的确认，犹太人的族群身份因此被打上了被征服者的财政烙印。

埃及行省的财税改革在整个帝国具有一定的先导性。强制性的公共服务制度后来被推广到其他行省，体现了罗马从间接统治向直接统治转变的总体趋势。犹太人作为一个曾经在包税制中享有特殊利益的群体，在新的财税体系中丧失了位置。帝国财税机器的运转不再需要他们的参与，只需要他们的服从。这种从参与者到被征税对象的转变，深刻地改变了犹太人在埃及社会中的地位和处境。

四、司法统一：从法律多元到层级化司法体系

埃及行省治理的第四重机制是司法体系从多元并存走向统一。在司法领域，托勒密埃及实行独特的法律多元制度，以应对其复杂的人口构成。涉及希腊人纠纷时，由希腊法庭 (*chrematistai*) 审理，适用希腊法律；涉及埃及人纠纷时，由埃及当地法庭 (*laokritai*) 审理，适用埃及传统法律；混合案件则由混合法庭 (*koinodikion*) 审理。这些案件审理权的归属是由合同语言决定的，并没有将各族群划分为三六九等，似乎他们在司法实践上是平等的关系。而犹太社区更是设有内部法庭，可以依据犹太律法裁决内部纠纷，甚至还要求居住在犹太区的希腊移民也要遵从犹太人的城市法。¹⁵可以说，托勒密时代犹太人的司法地位与一般亚历山大人的司法地位相近，亚历山大居民所依据的法律几乎与居住在大都市以外的希腊人的法律相同。¹⁶

罗马征服埃及后，奥古斯都采取务实策略，确认了亚历山大里亚犹太人“依照祖先律法生活”的权利。犹太史家约瑟夫斯记载：“实际上在神圣的奥古斯都统治时期，这些特权就已经得到了保障……在我们势力范围内的犹太人理应不受任何阻碍地遵循其祖先的习俗。”¹⁷这看似是对托勒密时期法律多元秩序的延续，实则是帝国在征服初期的临时妥协。随着行省治理体制的巩固，罗马统治者通过皇帝敕令、总督法令等中央立法，逐步收编地方司法体系。

罗马依靠分而治之的策略维系对行省的管控：当局容许犹太人等地方族群保留部分固有司法传统，但犹太人的法律自治权存在明确边界，附带诸多限制，且始终置于罗马统治秩序之下。犹太审判者有权裁决犹太社群内部普通民事与轻微刑事案件，但其作出的判决均可上诉至罗马法庭。一如斐洛的记述，犹太律法在民间细碎纠纷层面尚能保有较大自治空间，一旦触及重大事务，罗马法便会架空《托拉》的法律效力。尤其是重案审理，审判标准往往完全以罗马规范为准，犹太律法形同虚设。¹⁸

埃及境内的所有罗马公民，在涉及死刑案件或重要的民事案件时，有权向皇帝上诉。其他人，除极少数之外，只能上诉至本行省内部的司法机构，但总督在必要时会前往罗马请求皇帝予以裁决。针对死刑案件，行省总督需亲自主导诉讼，或委派专职审判官；其余各类案件则原则上由希腊法官负责，唯有被告主动申请，方可更换罗马公民担任承审法官。由此形成一套审判规则：除死刑案件外，若被告未提出更换法官的诉求，全部司法流程均由希腊法官全权处置。

总督巡回法庭是帝国推行法律统一的核心工具。总督对个人案件的司法裁决实行巡回审判制度。埃及主要有三个地区可以设置巡回法庭：亚历山大里亚（负责三角洲西部地区）、佩鲁西乌姆和孟菲斯（管辖中埃及与上埃及）。¹⁹行省总督在案件的审判与裁决中，拥有很大的选择权和灵活性。除了巡回法庭之外，罗马还在其他地区，如阿尔西诺或科普特斯，以及后来的安提诺波利斯的城镇中设有司法会议，负责处理司法事宜。总督每年在埃及的主要城市巡回开庭，其裁决依罗马法作出，享有凌驾于所有地方法庭之上的权威。一旦涉及刑事罪行、重大财产纠纷或任何被总督认定为“重要”的案件，罗马法律立即介入，地方律法包括犹太律法即刻退场失效。在这种层级化的司法架构中，犹太社区法庭的管辖权被持续压缩，最终仅限于婚姻、家庭仪式等边缘性的私人事务。犹太律法作为公共行为准则的地位实质上被取消了。

这重机制揭示了一个重要的事实：帝国对行省的法律一体化并非通过公开废除地方律法来实现，那样做成本高昂且可能导致激烈的抵抗。更有效的办法是保留地方律法和法庭的外在形式，同时在其上叠加一个享有绝对优先权的帝国司法层级。具体而言，任何案件只要被判定为涉及帝国利益、公共秩序或国家安全，就可以被提审到总督法庭，按罗马法裁决。这种看似温和的司法策略，实际上在潜移默化中侵蚀了地方律法的权威边界，使帝国法律成为最终裁决的准绳。犹太人的遭遇不过是这种普遍性司法政策在特定群体中的具体展开。当犹太社区内部发生纠纷时，帝国司法系统往往有意无意地偏向希腊人或罗马人一方，或者在关键问题上以“公共秩序”为由介入，逐步压缩犹太人按祖先律法自治的空间。这种司法层面的渐进式干预，远比直接废除法令更为隐蔽和有效，正是罗马帝国维持对埃及长期统治的核心策略之一。

结语：帝国行省治理的底层逻辑

通过对埃及犹太人治理变迁的考察，可以发现罗马帝国对埃及行省治理模式的关键特征。这些特征贯穿于前述四重机制之中，构成了帝国治理的底层逻辑。

首先，权力高度集中且不受内部制衡。埃及作为皇帝私人行省，总督集行政、司法、军事权力于一身，只对皇帝负责。这种权力架构使得行省政策可以依据局势需要而迅速调整，也为总督个人意志的恣意行使留下了空间。犹太人的权利在弗拉库斯的打压和克劳狄的安顿之间剧烈摇摆，正是这种权力架构的制度性后果。其次，身份等级制度被用作治理工具而非固定的社会描述。帝国的身份划分不是被动承认既有社会结构，而是主动塑造一套每个人都知道自己位置、也知道向上流动方向的等级秩序。犹太人被置于身份悬而未决的状态，反映的是帝国如何在族群之间制造竞争和制衡。第三，财税体系和法律体系都经历了从间接多元到直接统一的过程。帝国消除财政中间人，建立直接面对纳税人的征收体制；帝国以层级化司法体系取代法律多元，在保留地方法庭形式的同时确立罗马法的最高权威。这些改革服务于同一个目标：消除任何可能截留帝国资源或分流帝国权威的中间环节。

所有这些机制共享一个底层逻辑：帝国给予行省居民的上升通道是以个体为单位的，而非以群体为单位的。一个犹太人可以通过在辅助部队服役获得罗马公民权，但他获得公民权之后，他的集体身份将逐渐消解。他不再依赖于犹太社区——犹太教法庭对他不再有管辖权，犹太税不再适用于他，犹太社区的社会网络在他的个人上升中不再发挥本质作用。帝国以个体流动的承诺换取共同体瓦解的后果，治理因此如水银泻地，穿透了原本封闭的族群边界。

犹太人之所以成为埃及行省治理中的“不安定因素”，不是因为他们比其他族群更有反抗精神，而是因为他们所属的共同体恰好在宗教与律法的结合点上，拒绝了帝国治理模式的核心交换条件。他们的反抗因此成为一种持久的姿态，也注定是一种无法得胜的姿态——因为在罗马帝国的秩序中，拒绝被消解意味着被排斥，拒绝接受个体流动意味着在集体上永久处于权力的底层。这种结构性困境，正是理解罗马帝国行省治理深层逻辑的关键所在。

参考文献:

- ¹ Louis H. Feldman. *Jew and Gentile in the Ancient World: Attitudes and Interactions from Alexander to Justinian* [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3.
- ² W. W. Tarn. *Hellenistic Civilisation* [M]. 3rd ed. Cleveland; New York: The World Publishing Company, 1961.
- ³ 郑阳. 傲慢与偏见——希腊化-罗马时期地中海世界的犹太观念 [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24.
- ⁴ 苏蕤. 试论公元 66-70 年犹太战争爆发的原因及影响 [D]. 长春: 东北师范大学, 2015.
- ⁵ Dio Cassius. *Roman History: Vol. VII* [M]. Earnest Cary, trans. London: William Heinemann LTD;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5:237.
- ⁶ Alan K. Bowman, ed. *The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 Volume X, The Augustan Empire, 43 BC – AD 69*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680.
- ⁷ J. B. Campbell. *Rivers and the Power of Ancient Rome* [M]. North Carolina: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12:137.
- ⁸ Alan K. Bowman, ed. *The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 Volume X, The Augustan Empire, 43 BC – AD 69*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691.
- ⁹ David S. Potter. *A Companion to the Roman Empire* [M].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ing, 2006:63.
- ¹⁰ Joseph Méléze Modrzejewski. *The Jews of Egypt: From Rameses II to Emperor Hadrian* [M]. Varda Books, 2001:61.
- ¹¹ Angelo Segré. *The Status of the Jews in Ptolemaic and Roman Egypt: New Light from the Papyri* [J]. *Jewish Social Studies*, 1944,6 (4):389.
- ¹² Joseph Méléze Modrzejewski. *The Jews of Egypt: From Rameses II to Emperor Hadrian* [M]. Varda Books, 2001:173.
- ¹³ 汪世超. 希腊化时代亚历山大城犹太区的兴衰 —— 兼论反犹运动的缘起 [D].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 2011:66.
- ¹⁴ Victor A. Tcherikover. *Corpus Papyrorum Judaicarum I* [M]. Cambridge: Magnes Press, 1957:163-167.
- ¹⁵ 郭子林. 托勒密埃及的法律与司法实践 [J]. *历史研究*, 2010 (4):10-11.
- ¹⁶ Angelo Segré. *The Status of the Jews in Ptolemaic and Roman Egypt: New Light from the Papyri* [J]. *Jewish Social Studies*, 1944,6 (4):396-400.
- ¹⁷ Josephus. *Jewish Antiquities* [M]. Louis H. Feldman, tran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5:351.
- ¹⁸ Ewin R. Goodenough. *The Jurisprudence of the Jewish Courts in Egypt* [M].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29:16-21.
- ¹⁹ Alan K. Bowman, ed. *The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 Volume X, The Augustan Empire, 43 BC – AD 69*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691.

Roman Rule in Egypt and the Structural Plight of the Jews

Wang Dianyul¹, Wang Bingyi²

(1. 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 Shandong Normal University, Jinan, Shandong, China; 2. School of Marxism, Shangqiu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Shangqiu, Henan, China)

Abstract: The Roman rule of Egypt is considered a classic example of imperial provincial rule.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Roman Empire's ruling model by focusing on Egyptian Jews. During the Ptolemaic dynasty, Jews were a trusted middle-class force within the royal court, enjoying military, economic, and judicial privileges. After the Roman conquest, their status underwent a fundamental transformation, triggering several large-scale conflicts. The Roman rule of Egypt was not solely based on military conquest and violent repression, but rather on the reconstruction of social hierarchies, reform of the fiscal and tax system, and unification of the judicial system. These mechanisms share a common underlying logic: the empire replaced the recognition of collective privileges with a promise of individual mobility, absorbing provincial elites while simultaneously dismantling ethnic communities, ensuring that all resources ultimately flowed to the imperial center. The structural predicament of the Jews was a result of their community's rejection of the core exchange conditions of the imperial governance model at the intersection of religion and law.

Keywords: Roman Empire; province of Egypt; Jews; governance model; social hierarchy

科学理性与道德想象：乔治·艾略特小说中的有机社会观

霍舒缓

(江苏理工学院, 江苏 常州 213000)

摘要：19世纪科学的发展深刻影响着乔治·艾略特的创作思想。她将观察、分析和因果推理等科学方法融入现实主义小说写作，小说人物处于遗传、环境、家庭和社会关系构成的复杂网络之中，揭示个体与社会的相互依存关系。艾略特通过家庭、地方共同体和自然景观等意象建构有机社会观，反思工业化与个人主义带来的社会问题。然而，艾略特并未陷入生物决定论，而是将科学理性与同情、想象力和道德责任相结合。本文认为，科学思想、有机社会观与伦理关怀的融合，构成了艾略特现实主义创作的重要特征，体现了她对个人、社会与现代性关系的深刻思考。

关键词：乔治·艾略特；科学思想；有机社会观；现实主义；道德责任

课题项目：本文系2022年度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立项项目“乔治·艾略特小说中的景观书写与英国性的流变研究”(2022SJYB1286)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DOI: doi.org/10.70693/202607220045

引言

艾略特的社会有机说受到赫伯特·斯宾塞、奥古斯特·孔德、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和乔治·亨利·刘易斯的影响。^[1]这些思想家的社会学立场以有机发展的视角来看待社会文明进步和前工业时代的社会传统的消失，有机社会观成为解决工业化带来诸多问题的手段和工具，这弥合了现代性带来的断裂现象。艾略特对历史连续性的强调，对过去的珍视，现在对未来的影响，构成了她的有机社会进化观。她强调个人在追求个体利益和自由的同时，必须时刻明确自己所担负的社会职责，即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动态互动关系。19世纪在科学进步的话语社会中，大多数的人们如《米德尔马契》中的人物一样，努力寻找自我的个人发展。事实上，如果不考虑社会整体的精神或者经济背景，个人的发展必然碰壁，不同的个体之间相互依赖，共同运作才可以维持整体，但社会整体论并不意味着和谐。维多利亚时代的文学作品多数情况下将社会机体描绘成分裂失衡的状态，剥削、贪婪成为社会深层问题的原因。事实上，对社会失序状态的描述前提是预设了社会本身是和谐理想的有机统一体。维多利亚小说通过冲突、同情与和解叙事，目的是让读者参与社会问题的想象。由此，整体有机社会论提供了社会分析的方法，构建的道德框架使得小说家能够探讨经济对人们生活的影响，以及个体行为又如何反过来影响整个社会的状况。

一、科学语境与小说创作

乔治·艾略特对科学的关注以及在小说创作中对科学概念的运用成为理解其创作思想的关键。刘易斯在《海滨研究》中写道：

在最早的生命形式中，正如在最早的社会状态中一样，所有的一切是整体性的，各部分都各尽所能。没有独立的消化系统，没有独立的呼吸系统，没有独立的肌肉系统，没有独立的神经系统。动物的每一部分都在吸收、呼吸、收缩和运动；就像在蛮族部落中一样，每个人都是自己的裁缝、自己的供应商、自己的建筑师和自己的律师。最后出现了社会分工，对整个有机体适用的真理，对一个器官就不再适用了。例如我们不能要求一个胳膊去消化食物。^[2]

乔治·亨利·刘易斯和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对孔德思想阐述的重点是有机主义的概念，即整体中的各部分功能之间的相互依赖，无论是身体器官还是社会中的个人，这对艾略特的有机社会观的形成有着促进作用。艾略特的整体和部分之间的有机联系在《弗洛斯河上的磨坊》中进行了论述

作者简介：霍舒缓(1986—)，女，博士，讲师，研究方向：英美文学。

我们用不着害怕拿着微小事物去和巨大事物进行这种比较,因为科学不是告诉我们,它的最高努力就是要确定把最微小的事物和最巨大的事物结合起来的一种统一性吗?我知道,在自然科学中,对于远观统摄事物各种关系的头脑来说,没有什么东西是微不足道的,每一件单独的事物都能使他联想到广阔的条件状态。对于观察人类的生活,肯定也同样如此。^[3]

19 世纪的科学语境使得小说家不可避免地受到社会科学思想的影响,而艾略特受科学思想的影响尤为突出,“她在当代社会和科学理论方面的知识广度是她的同龄人所无法比拟的。科学思想不仅贯穿于她作品的隐喻和形象之中;在创作小说的过程中,她与当代科学思想进行了积极的对话。”^[4]大卫·卡罗尔对乔治·艾略特的有机理论和小说形式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细致的分析认为:“不管艾略特描写的是人物性格心理、社会、宗教还是艺术,她的思想都弥漫着有机体的思想。”^[5]在现代工业社会中,有机发展的社会概念调和了社会变化带来的不稳定性,强调连续性的重要性。刘易斯认为“社会是一个有机体,内在的持续发展伴随着持续的稳定形式。”^[6]维多利亚时期的社会理论家倾向把个人权力置于社会责任的框架内,将个人的能动性理解为与社会责任密不可分的一部分。个人欲望受到对家庭、社群乃至整个社会的道德义务的引导和制约。乔治·艾略特的小说以深刻细腻的方式做出了回应。例如《米德尔马契》中的女主人公玛吉处于个人自由和社会责任的冲突和矛盾中时,把社会责任看作是自己的行为准则。亨利·詹姆斯在谈到《米德尔马契》时认为这部小说“是达尔文和赫胥黎科学思想的回声”,表达了对科学侵入小说领域的反感。^[7]1965 年伯纳德·帕里斯出版了《生命中的实验:乔治·艾略特对价值的追求》(*Experiments in Life: George Eliot's Quest for Values*)后,评论界越来越关注科学在艾略特小说中的作用。

二、有机社会理论与共同体建构

有机体主义几乎遍及 19 世纪文学和文化的各个层面,经济和社会相互依存的有机关系最明显地体现在维多利亚时期的小说创作中。有机社会观在维多利亚时代尤为盛行,快速的工业化、城市扩张、技术创新和帝国扩张彻底改变了日常生活,加深了人们对社会相互依赖性的认识。密尔(Mill)在《论自由》(*On Liberty*)中乐观地认为社会进步就像个人发展一样,类似于生物有机体充满活力的成长;在《威尼斯之石》(1853 年)中有机主义激发了约翰·拉斯金对哥特式建筑的自然主义构思;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在《社会有机体》(*The Social Organism*, 1860)一书中也将其作为社会学理论的基础,在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的基础上提出了社会进化论的学说。人类社会同样遵循生物进化的阶段和过程,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19 世纪的有机思想得益于生物学和浪漫主义理论的发展,有机主义作为一种历史学发展模式,反对社会结构静态发展的观念。艾略特并未将人类经验简化为生物学决定论。她的作品在科学分析的基础上,融合了同理心、想象力与道德责任。事实上,维多利亚时期的有机书写是对社会传统模式下静态社会秩序概念的批判。正如乔治·艾略特在她早期的文章《德国生活的自然史》(*The Natural History of German Life*)中所写的那样,尽管社会在变化,但社会的高度组织性要求社会只能缓慢地变化,因此几乎不可能从外部强行进行变化。^[8]维多利亚时代的小说以清晰的文学形式展现了经济与社会之间的有机联系。小说将个人的命运与阶级、财产、贸易及社会责任体系联系到一起。我们可以看到在艾略特的作品中,科学分析与想象力、伦理反思以及对人类责任的深切关怀相辅相成。她没有将人类描绘成自然法则被动的产物,强调人在社会与境遇限制下仍具备做出道德选择的能力。这种科学探究与道德视野之间的平衡,使艾略特区别于 19 世纪其他更具决定论倾向的思想家。

1856 年夏天,艾略特和刘易斯在伊尔弗朗姆(Ilfracombe)度假期间收集了一些微观物种,这些物种特征使得之后《米德尔马契》中费厄布拉泽(Farebrother)收集的物种有了真实的历史背景。艾略特在给查尔斯·布雷的信中描述了她在伊尔弗拉科姆的房间:“里面有黄色的蛋糕盘,一个仆人,以及装满了虫生动物、软体动物和无脊椎环节动物的瓶瓶罐罐。”^[9]艾略特在旅行期间的日记记录了她所收集到的各种人物原型和场景,以及“发现小小的红色系膜时的兴奋和的喜悦”以及“仙人掌的浅褐色触须像小蛇一样凶恶地摆动”带给他们的喜悦。^[10]这些自然史的物种为艾略特在伊尔弗朗姆访问期间所写的评论文章《德国生活自然史》提供了重要的隐喻。她总结道:对自然主义的理解使得我们按照自然史的复杂性来理解历史,“就像德国人说的那样,植虫动物、软体动物和棘皮动物的特殊团体在他们的皮肤中能感到自在”^[11]。这契合了赫伯特·斯宾塞的有机论,认为人类社会跟植物一样是一个有机体。

有机论几乎渗透到 19 世纪文学与文化的方方面面,影响着作家、思想家和社会评论家对个人与其所处社会结构之间关系的理解。作为有着社会责任感的文学艺术家,艾略特在小说中通过书写亚当·比德、玛吉·杜利佛和多萝西娅·布鲁克等人物的个人经历和挣扎,将其与所处的整个社会的精神进步联系起来。在工业化发展时期,现代性冲击着有机共同体,人们的身份认同受到威胁,共同体成为小说人物发展的社会文化背景。艾略特探索了在社会精神共同体面临危机的时刻,个体在建构身份所经历痛苦。艾略特认为社会发展和进步的步伐是不可阻挡的,但是一切需遵循循序渐进的原则,反对通过革命暴力的手段来强制改变。她长期与刘易斯生活在一起,受其

科学思想的影响,对自然界的植物和生物都充满着浓厚的兴趣,认同人类社会的发展应该与植物的有机生长一样,遵循自然法则,新与旧之间不是替换而是相互渗透。乔治·艾略特对科学的兴趣以及小说中的科学概念,对于理解其创作思想至关重要。艾略特身处生物、地质、医学、心理学和进化论等领域迅速发展的时代,她密切关注当时的科学争论,并将科学的观察方法融入自己的小说创作中。

三、艾略特的小说创作观

艾略特和那个时代的许多作家和思想家一样,被有机社会基础理论深深吸引。简单地说,有机理论认为社会是自然的有机体。她通过家庭、英国和自然景观等一系列概念,构建了自己的社会观,即有机社会优于工业化和经济扩张带来的新社会形式。^[12]简单来说,这一理论认为社会是根植于自然、历史、记忆以及共同道德情感中的有机体。对艾略特而言,社会如同植物有机体一样,通过血缘、家庭、地方习俗、宗教习惯以及情感等无形联系逐步发展。在艾略特的想象中,英国是由地方传统、乡村记忆、地域语言和道德构成的历史有机共同体。她的小说聚焦于英格兰的乡村,社区使她能够将社会视为相互关联的整体加以审视。

此外,这与在当时获得声望的新生物科学有联系。有必要指出,有机理论对那个时期的知识分子很有吸引力,部分原因是它们提供了用以反对工业化造成的经济和社会结构的变化富有表现力的术语。在这一时期,机器作为有机体的对立面,代表着不人道和不宜居的现代世界。然而,有机理论倾向于不反对一切形式的变化,而是在其中隐含着一个渐进变化的概念。他们认为,社会应该被允许像植物一样发展或生长,保持与传统社会相关的社会价值,但同时融入技术革新和经济变革。艾略特的小说为这些理念提供了富有想象力的形式,所以她不仅仅是在描述自然世界。艾略特在19世纪个人主义和工商业化的城市语境中,关注传统、习俗和价值观的弱化问题,试图重新定义和重塑社区的概念。艾略特作为现实主义小说家,设想通过准确地再现社会,通过社会同情的觉醒来复兴共同体。

19世纪的社会思想家都试图用不同的方式来建构新的有机共同体,目的是恢复社会凝聚力和人们的身份归属感。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艾略特试图重塑传统观念以适应当下社会的现代化模式。她不是简单地反对社会的进步力量,而是将传统和现代结合在一起,以一种连续性、包容性和凝聚力的观点来看待社会的发展。乔治·艾略特在最后一部小说《丹尼尔·德隆达》中谈到了小说创作与科学研究之间的比拟:

如果没有虚构的前提假设,人类将一事无成。即使是严谨的科学,也要从一个虚构的单元或单位开始,在星体的不断运动中假定一个固定点,然后假定这个固定恒星的时刻从零开始。^[13]

她强调了个人在探索世界和社会的过程和科学实验如出一辙,认为自己的小说创作过程等同于科学的研究方法,文学和科学一样在反映现实的同时也是一种想象的建构。这表明艾略特在小说创作中,把科学的研究方法贯穿到小说实践中。乔治·艾略特在小说创作中有意将科学研究方法融入虚构写作的艺术之中。她的现实主义超越了日常生活的简单描绘,体现了以观察、分析和因果解释为基础的严谨探究方式。如同科学家研究自然现象一般,艾略特细致地考察了人类性格形成的影响条件,尤其关注遗传、环境、教育等因素。她笔下的人物并非孤立的个体,而是由相互关联的力量共同塑造出的复杂存在。她的现实主义创作观以及对自然史的强调,对事物的细致观察和准确描述,这些都体现着她小说中的科学性。科学家在科学探索中要预先构建一个框架,设定理想的实验条件,然后将观察的数据或者现象置于其中,最后得出结论。艾略特的创作方法与此类似,在小说创作之前,小说的道德价值观或者社会历史观都得到规划和预设,然后通过具体的人物或者情节得以建构和阐释。乔治·艾略特对科学研究方法和小说创作的对照,使得她对社会科学的有机理论异常关注。

结语

19世纪英国社会科学技术稳步发展,工业化的大生产使得越来越多的农业人口流向城市,城市人口密度增加,生活环境逐渐恶化。资本主义的发展使得个人利益成为社会的价值观,金钱成为衡量一切的标志,人类的道德信仰逐渐分裂。乡村社会的景观不仅被工业文明所改变,道德价值观和风俗习惯也逐渐分崩离析。土地对传统社会而言有着重要意义,超越血缘的邻里关系,信仰和风俗都与共同生活在特定的地方和土地上有着密切关系。工业现代化使得个人的流动性加强,传统的社会模式就会瓦解,随着而来的是情感和身份认同的危机。雷蒙·威廉斯在《乡村与城市》中谈到了可知共同体的问题,他认为乡村共同体是可知的,而城市由于经验和内部关系的复杂性使得完整或者可知的共同体变得困难。^[14]这点在艾略特的小说中得到验证,艾略特很少描述城市经验,创作的重心在英格兰中部的乡村地区,关注生活的日常经验,以一种近乎纪实的方式把社会经验贯穿到小说中。她意欲从可知的共同体中找到社会发展的原始模式,以一种保守的态度,用社会有机发展的历史连续性来解决工业化社会中的断裂问题。

参考文献:

- [1] Suzanne Graver. *George Eliot and Community: A Study in Social Theory and Fictional Form* [M].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4.
- [2] George Henry Lewes. *Sea-side studies at Ilfracombe, Tenby, the Scilly Isles, and Jersey* [M]. London: Blackwood, 1858: 60.
- [3] 乔治·艾略特.《弗洛斯河上的磨坊》[M]. 伍厚恺译. 成都: 四川文艺出版社, 2018: 296.
- [4] Shuttleworth, Sally. *George Eliot and Nineteenth-Century Science: The Make-Believe of a Beginning*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4: ix.
- [5] David Carroll. "Janet's Repentance and the Myth of the Organic" [J], *Nineteenth Century Fiction*, 1980 (35):331-48.
- [6] G. H. Lewes. *Comte's Philosophy of the Sciences* [M]. London: Routledge/Thoemmes Press, 1853: 234.
- [7] Carroll, David. *George Eliot: The Critical Heritage* [M], New York: Barnes & Nobel Inc., 1971: 359.
- [8] Thomas Pinney. *Essays of George Eliot* [M].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63: 127.
- [9] Gordon Haight. *The George Eliot Letters (Vol. II)* [M].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8: 252-3.
- [10] Gordon Haight. *The George Eliot Letters (Vol. II)* [M].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8: 252-3.
- [11] Thomas Pinney. *Essays of George Eliot* [M].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63: 288.
- [12] On the social applications of organic theory, see Suzanne Graver. *George Eliot and Community: A Study in Social Theory and Fictional Form* [M].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4.
- [13] George Eliot. *Daniel Deronda* [M]. Ware: Wordsworth Classics, 2003:3.
- [14] 雷蒙·威廉斯.《乡村与城市》[M]. 韩子满 刘戈 徐珊珊等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3: 232.

Scientific Rationality and Moral Imagination: George Eliot's Organic Conception of Society in Her Novels

HUO Shuhuan

(Jiangsu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Changzhou, Jiangsu, China)

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science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exerted a profound influence on George Eliot's literary thought. She incorporated scientific methods, including observation, analysis, and causal reasoning, into her realist fiction. By situating her characters within complex networks shaped by heredity, environment, family, and social relationships, Eliot reveals the interdependence between the individual and society. Through such images as the family, the local community, and the natural landscape, she constructs an organic conception of society and reflects critically on the social problems caused by industrialization and individualism. Eliot, however, does not succumb to biological determinism. Instead, she combines scientific rationality with sympathy, imagination, and moral responsibility.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the integration of scientific thought, an organic conception of society, and ethical concern constitutes a defining feature of Eliot's realist writing and demonstrates her profound reflections on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the individual, society, and modernity.

Keywords: George Eliot; scientific thought; organic conception of society; realism; moral responsibility

《幽闲鼓吹》作者、版本考述及条目校勘

郝婷婷[#]，梁仙缘[#]

(暨南大学，广东 广州 510632)

摘要：《幽闲鼓吹》是晚唐张固所著笔记小说集，历代目录书对其作者与内容记载存在争议，近年《张固墓志》的出土为厘清其生平提供了关键线索。现存版本多为明清丛书收录本，内容以中晚唐朝野轶事为主。历代记载对此书作者、内容涉及和条目数量均有分歧，经文献与墓志考证，今所见《幽闲鼓吹》作者为唐代张固；书中所记内容覆盖时期广泛，非仅目录书所记唐宣宗朝事；全书条目情况于宋代以后出现改动，因此导致目录书记载不一，明清时期的丛书收录也传承了不同的条目划分与条目数量。最后，综合梳理得出此书历代版本的源流情况与史料价值。

关键词：幽闲鼓吹；张固；晚唐；墓志

DOI: doi.org/10.70693/202607241664

张固《幽闲鼓吹》是晚唐重要的笔记小说集，历代目录书对其作者、内容记载存在分歧，对其进行版本整理和校勘尤为重要。前人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幽闲鼓吹》部分条目内容的考释。陆颖瑶在《〈幽闲鼓吹〉“李藩侍郎尝缀李贺歌诗”考》中考证认为，“李藩侍郎尝缀李贺诗”条中“李藩”应为“李潘”，二者并非同一人，辨明“李藩”事迹，纠正了《幽闲鼓吹》这条记载。^②另外，艾明在《〈幽闲鼓吹〉中“校(此夕)子”校》中，对“乔彝京兆府解试”条进行考订，认为该条中表示“好一些”含义的文本处原文应为“校些子”，且这一说法在当时口语中流行。^③

另一方面，传世文献对《幽闲鼓吹》作者张固的记载鲜少，近出《张固墓志》对于梳理张固的生平经历与《幽闲鼓吹》的创作背景提供了重要线索。孙晨晨在《〈幽闲鼓吹〉作者唐张固墓志考释》中运用墓志材料，侧重对张固的家世生平作了考证。^④高慎涛在《新出唐代小说家张固墓志考释》中侧重论述张固的小说世家背景，认为张固写作小说受到家族文学传统影响。^⑤

一、作者考辨与成书背景

《新唐书·艺文志》载：“张固《幽闲鼓吹》一卷。”《幽闲鼓吹》作者张固，生平材料留存甚少，两《唐书》中均无传记。另外，《全唐诗》收录张固《重阳宴东观山亭和从事卢顺之》及《独秀山》诗。^⑥自《崇文总目》始，历代目录书对其所撰《幽闲鼓吹》一卷多有记载。北宋《新唐书·艺文志》提及作者姓名：“张固《幽闲鼓吹》一卷”。自南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始，目录书多记张固为“懿、僖间人”，近年来出土的《张固墓志》在记载其卒年信息时称张固“不幸遘疾，薨于亲仁里之私第。时大中十年（856）八月十八日也，享年六十

作者简介：郝婷婷(2003—)，女，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隋唐史、历史文献学；
梁仙缘(2000—)，女，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史。

通讯作者：郝婷婷
[#]共同一作

^② 陆颖瑶：《〈幽闲鼓吹〉“李藩侍郎尝缀李贺歌诗”考》，《古典文学知识》2017年第3期，第146-150页。

^③ 艾明：《〈幽闲鼓吹〉中“校(此夕)子”校》，《扬州师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81年第1期，第66-67页。

^④ 《唐前桂管都防御观察处置等使正议大夫使持节都督桂州诸军事守桂州刺史兼御史中丞上柱国赐紫金鱼袋赠尚书刑部侍郎常山张公墓志》，现藏于西安交通大学博物馆，志文及相关论述参考孙晨晨《〈幽闲鼓吹〉作者唐张固墓志考释》，《墓志碑帖研究》2024年第5期，第106-107页。

^⑤ 高慎涛：《新出唐代小说家张固墓志考释》，《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25年第1期，第6-14页。

^⑥ 彭定求主编：《全唐诗：精华版》，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1742页。

六。”由此可补其生卒信息为：生于德宗贞元七年（791），卒于大中十年，即唐宣宗末期。则其生活年代实际上早于《郡斋读书志》所推测的懿、僖间，此处志文可补其他留存史料关于张固生平记载所缺。明代以后的一些目录书则提供更多信息，记载《幽闲鼓吹》时称其作者为清河人。^①而据《张固墓志》所述，张固出自常山张氏。明代以前目录书多不提及张固籍贯，自明代以后的目录书开始提及其为清河人，应是与明嘉靖时顾元庆《顾氏文房小说》本《幽闲鼓吹》正文前记载其作者为“清河张固”有关。孙晨晨认为可能顾元庆刊刻《幽闲鼓吹》时，不知张固籍贯何处，遂冠以唐代张氏诸郡望中最有名的“清河张氏”，目录书这样的记载则应当是受到顾本的影响。^②

据其墓志内容，张固所属的常山张氏本是小说世家，张固撰《幽闲鼓吹》一方面也受到家族传统影响。^③张固父“工部侍郎、史馆修撰、赠太保，谥宪公，讳荐”。除此之外，张荐事迹还见于《旧唐书》卷一四九、《新唐书》卷一六一、《顺宗实录》卷三，另有碑刻材料《张荐墓志》一则。^④结合上述史料可见张荐工于文字，长于记述，同时不仅与颜真卿、陆士修、崔万等人广有交游，还曾在“大历中居左司御率府兵曹参军、史馆修撰”，“自拾遗至侍郎，凡二十年，常兼史馆修撰”。^⑤这些为他提供了丰富的材料来源，促使他创作了不少作品，如《宰辅传略》、《灵怪集》、《同僚籍》、《寓居录》等，这些作品多散佚，仅《灵怪集》有今人辑文。^⑥

张固曾祖张鹭，著有笔记小说《朝野僉载》。《旧唐书》卷一四九、《新唐书》卷一六一附其事迹，述其“字文成，聪警绝伦，书无不览。”^⑦除《朝野僉载》外，张鹭还著有《游仙窟》、《朝野僉载》、《龙筋凤髓判》。对比《朝野僉载》与《幽闲鼓吹》二书内容，可以看出其叙述内容具有相似之处，但叙事风格略有不同。从描写对象上看，均侧重对朝臣轶事的叙述。但《朝野僉载》主要言及人之丑行恶事，且多讥刺之语，这也是张鹭一贯的语言风格，并终因此频遭贬谪，仕途多舛。^⑧《容斋续笔》评价曰：“《僉载》纪事，皆琐尾摘裂，且多媒语。”^⑨《幽闲鼓吹》的叙事风格受到馆臣中肯的评价，“固所记虽篇帙寥寥，而其事多关法戒，非造作虚辞、无裨考证者比。唐人小说之中，犹差为切实可据焉。”^⑩相比较而言，《幽闲鼓吹》语言短小精悍，内容上所述之事更近现实常理，故事情节侧重世人少知但奇特的文人至帝王轶事，人物表现也更为平实可信。

除张鹭外，张固伯父张著亦有撰述。《张固墓志》述“张固伯父张著，生平散见于史，撰《翰林盛事》一卷。”此书久佚，《崇文总目》卷四传记类著录：“《翰林盛事》一卷。”《郡斋读书志》职官类著录：“《翰林盛事》一卷。右唐张著撰，记唐朝儒臣美事，凡三十八。”《直斋书录解題》卷五载：“《翰林盛事》一卷。唐剡尉常山张著处晦撰。纪儒臣盛事，自武德中迄于天宝。首载张文成七登科者，即著之祖也。”^⑪据目录书记载，《翰林盛事》主要记载武德至天宝年间儒臣之事，而结合俞林波考证并从《太平广记》、《云仙杂记》等书中辑出的数则条目，^⑫与《幽闲鼓吹》内容进行比对，可知《翰林盛事》写作对象范围与叙事倾向同《幽闲鼓吹》亦有相似之处，凸显出常山张氏家族独特的笔记小说文学创作传统。

据《张固墓志》，张固“始以器乐词藻，取重于乡里间”，丁公著曾举荐张固授试太子正字。任期满后，张固“换协律，从萧相国之召于冯翊，去府就调，判入高等。又为不见知者褫之于中书，既而补伊阙尉。”张固凭借其文学才能，以试协律郎的身份入萧俛幕府，后补任伊阙县尉。此后又历入丁公著幕府，任观察支使、试评事、监察御史里行等职。文宗大和九年（835年），迁崔郾幕府，在署前任职。^⑬而据《杜审权墓志》，杜审权“大

①（明）高儒：《百川书志》载：“幽闲鼓吹一卷。唐清河张固。撰宣宗二十五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年）

② 参见孙晨晨：《〈幽闲鼓吹〉作者唐张固墓志考释》，《墓志碑帖研究》2024年第5期，第104-114页。

③ 相关论述参见高慎涛：《新出唐代小说家张固墓志考释》，第6页。

④（唐）权德舆撰，郭广伟点校：《权德舆诗文集》卷二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337页。

⑤（北宋）欧阳修、宋祁等：《新唐书》卷一六一《张荐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点校本，第3878页。

⑥ 权德舆撰，郭广伟点校：《权德舆诗文集》卷二二，第338-339页。

⑦（后晋）刘昫等：《旧唐书》卷一四九《张荐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点校本，第2734页。

⑧《旧唐书·张荐传》：“开元初，澄正风俗，鹭为御史李全交所纠，言鹭语多讥刺时，坐贬岭南。”（后晋）刘昫等：《旧唐书》卷一四九，第2734页。

⑨（南宋）洪迈撰，孔凡礼点校：《容斋随笔·容斋续笔》卷十二，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364页。

⑩（清）纪昀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四〇，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185页。

⑪ 陈振孙撰，徐小蛮等点校：《直斋书录解題》卷五，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159页。

⑫ 参见俞林波：《唐代诗人张著〈翰林盛事〉辑考》，《中国典籍与文化》，2010年第3期，第37-40页。

⑬ 孙晨晨：《〈幽闲鼓吹〉作者唐张固墓志考释》，第113页。

和五年(831)射策上第,授弘文馆校书。始从鄂州崔公尚书郎为观察推官。”^①可知张固与杜审权同在崔幕共事,此时已有交游之机。文宗开成二年(837年),任集贤殿修撰,其后数年累迁侍御史、司驾外郎、金部郎中。宣宗大中九年(855年),又任桂管观察使。可见张固不仅仕宦经历丰富,同时交游广泛。除与杜审权有交游外,根据《全唐诗》收录卢顺之《重阳东观席上赠侍郎张固》诗,联系前文提到的张固所作《重阳宴东观山亭和从事卢顺之》诗,^②可推知张固与卢顺之的交游关系。

现存《幽闲鼓吹》无作者序,不知是遗失还是本无序,因此要理解作者写此书之出发点或意图,需要通过书名、内容并结合作者经历来推测。“鼓吹”是一种军乐,“幽闲”一方面指书中所记载事件多为朝臣佚事,另一方面也暗含写书人的状态。据《张固墓志》,张固卒于大中十年,而《幽闲鼓吹》中叙述的宣宗朝的多数事件均发生于张固晚年时期,可推知张固应于晚年写成此书。张固应是在致仕之后,整合此前在史馆、各处幕府任职时收集的史料,加之多年来与杜审权、卢顺之等人的交游听闻,才能细致地描写诸多朝野之事,使各人物形象跃然纸上。同时,目录书多记载张固为懿、僖间人,应主要是根据书中所载宣宗朝内容而得出的判断,但忽略的一个因素是后人整理时的改动。根据《张固墓志》所记载的生卒时间,书中所记宣宗的最后一条内容所反映的事件发生时间晚于张固卒年,而张固不可能写出身后之事,由此可以判断《幽闲鼓吹》在张固完成之后,经后人整理时有改动,增添了新的条目。^③

《顾氏文房小说》版《幽闲鼓吹》顾元庆跋提到:“余尝阅唐诗鼓吹,读姚文公序,文谓宋高宗退居德寿宫,尝纂唐宋遗事为《幽闲鼓吹》。愚谓姚公不知固有是书而谓纂于高宗耶?抑高宗之所纂别有其书耶?亦不可得而深考也。”^④姚文公,即姚燧,《元史》有传。著有《牧庵文集》,已散佚。清人辑有《牧庵集》。^⑤据姚燧《唐诗鼓吹注》序云:“鼓吹,军乐也。取以名书,则由高宗退居德寿,尝纂唐宋遗事为《幽闲鼓吹》。”^⑥其说法如顾氏所言,即认为宋高宗曾撰写一本记载“唐宋遗事”的《幽闲鼓吹》。此作者之争的可能缘由有二:第一种缘由,这两本《幽闲鼓吹》是同一本著作,而在此前之目录书有载的情况下,姚燧理应知道张固有这本著作,因此可能为姚燧在记述中有误。第二种缘由,宋高宗确实存在同名著作,但未见著录,可能因为此书仅见于内廷高层群体,其他人难以得见。也可能所谓“宋高宗纂《幽闲鼓吹》”,起于宋高宗读张固《幽闲鼓吹》而后有所感,因此作《幽闲鼓吹》相关笔记手稿,而非自作《幽闲鼓吹》一书。

除此目录书中提到外,其他文献中也存有对于宋高宗纂《幽闲鼓吹》的记载。如《唐诗品汇》载:“幽闲鼓吹。宋高宗纂唐宋遗事。唐艺文志作张固撰。”^⑦《山堂肆考》云:“幽闲鼓吹。宋高宗纂唐宋遗事,名幽闲鼓吹。唐艺文志作张固撰。”^⑧两本书的出现时间皆晚于明《顾氏文房小说》刊印时间,因此这番记载也应是受到顾元庆跋中提及的《唐诗鼓吹》姚燧序记述之影响。

同时,按姚燧所云,宋高宗本《幽闲鼓吹》也当包含宋朝遗事,而现存《幽闲鼓吹》只见唐遗事。则综上,可以判断现存《幽闲鼓吹》作者应为唐代张固。

二、版本情况

原唐本《幽闲鼓吹》已佚,现存《幽闲鼓吹》一卷均以被丛书收录的形式留存下来。《中国丛书综录》中所收录的现存版本有《续百川学海》本、《顾氏文房小说》本、《历代小史》本、《宝颜堂秘笈》本、《说郛》本、《五朝小说》本、《四库全书》本、《唐人说荟》本、《唐代丛书初集》本、《学海类编》本、《古今说部丛书》

^① 郑贻:《唐故忠武军节度使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司徒兼太子太傅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赠太尉京兆杜府君墓志铭》,该墓志参考秦金聚:《晚唐宰相杜审权夫妻墓志考释》,《河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4期。

^② (清)彭定求主编,陈书良,周柳燕选编:《全唐诗:精华版》,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1742页。

^③ 张固《幽闲鼓吹》,罗宁点校:《大唐传载(外三种)》:“宣宗坐朝,次对官趋至,必待气息平均,然后问事。令狐相进李远为杭州,宣宗曰:比闻李远诗云:‘长日唯销一局棋。’岂可以临郡哉?”对曰:“诗人之言,不足有实也。”仍荐远廉察可任,乃俞之。”(北京:中华书局,2019年,第64页。)参考孙晨晨:《〈幽闲鼓吹〉作者唐张固墓志考释》,第104-114页。

^④ (明)顾元庆:《顾氏文房小说·幽闲鼓吹》顾元庆跋,国立公文书馆藏一卷本,第12册第10-11页。

^⑤ (明)宋濂等:《元史》卷一七四《姚燧传》,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4057-4060页。

^⑥ (元)姚燧:《牧庵集》卷三《序十四首·唐诗鼓吹注序》,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31页。

^⑦ (明)高棅辑:《唐诗品汇》序《引用诸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影印本,第16页。

^⑧ (明)彭大翼辑:《山堂肆考》角集卷二十七《文学》,北京:北京出版社,明万历二十三年刻四十七年张幼学重修本《四库提要著录丛书》影印本,第278页。

本、《说库》本、《景印元明善本丛书十种·历代小史》本、《旧小说》本等。^①现将所见现存《幽闲鼓吹》版本情况梳理如下。

（一）《说郛》及其衍生系统

本系统包含三个子系列，均源自陶宗仪《说郛》或其版片。

1.《说郛》本体传承系列

(1) 清顺治三年（1646）宛委山堂重刊本。元末陶宗仪辑。是编凡一百二十卷，收书一千二百余种。半页九行二十字，白口，左右双边，上白鱼尾，版心标卷数。

(2) 民国间涵芬楼本。民国间，海宁张宗祥据京师图书馆所藏六种明抄本重加校订的涵芬楼本。

(3) 1988年《说郛三种》本。198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合刊的《说郛三种》本，乃目前最完备的本子。

2.《续百川学海》支系

《续百川学海》本。明吴永编，仿宋左圭《百川学海》体例，按天干分十集，《幽闲鼓吹》收“丙集”。丛书凡一百十种，明末刻本。半页九行二十字，小字双行同，白口，单白鱼尾，左右双边，版心上端刻篇目名称。以明本《说郛》刻版纂辑而成，与清顺治宛委山堂本《说郛》及《说郛续》存在明显差异。现有2014年中国书店出版社据明钞本整理本、2015年北京中国书店影印本。

3.《五朝小说》支系

《五朝小说大观》，明代文言小说集，辑录者为署名为“桃源居士”的佚名人士。清代据《说郛》《续说郛》重编为《五朝小说》。半页九行二十字，白口，左右双边，上白鱼尾。《幽闲鼓吹》收录于《五朝小说·唐人百家小说·记载家》，未标卷数，文末附顾元庆跋。通过校勘，其失于考查、疏漏之处，从顾元庆跋部分之刊印情况可以看出，如文末“春三月”中的“月”误刊作“用”。

（二）《历代小史》系统（明万历-1937）

1.明万历《历代小史》本

明李栻辑。明万历李栻刻本。半叶十一行，行二十六字，白口，四周双边，单黑鱼尾，版框高约20.7厘米、宽约13.2厘米。《历代小史》一百五卷，《幽闲鼓吹》收录于卷之二十三，为删节本，仅保留原本16条内容。

2.民国《景印元明善本丛书十种》本

民国二十六年（1937）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半页十一行二十六字，白口，四周双边，上黑鱼尾。历代小史本《幽闲鼓吹》收录于《景印元明善本丛书》中，保留原有版式。

（三）《宝颜堂秘籍》系统（明万历中-1922）

1.明万历中绣水沈氏尚白斋刻本

明万历年间嘉兴沈德先、沈孚先兄弟主持刊刻，托名陈继儒辑。《宝颜堂秘笈》六集合计收书234种473卷，《幽闲鼓吹》收录于正集《陈眉公先生订尚白斋秘笈》。半页十六行，行三十六字，白口，四周双边，上黑鱼尾。明万历绣水沈氏尚白斋刻本为丛书祖本；乾隆间因禁书令版被毁。

2.民国上海文明书局石印本

民国十一年上海文明书局据明万历绣水沈氏尚白斋刻本石印，凡48册。清华大学藏。所收《幽闲鼓吹》卷首题“陈眉公订正幽闲鼓吹”，未标卷数，下附撰、订、校者姓名及对应时间。

（四）其他版本

1.明代《顾氏文房小说》本

又名《阳山顾氏文房》，四十种四十七卷，明顾元庆所编明代文言小说丛书。半页十行十八字，黑口，左右双边。其版刻经年，前为正德十二年（1517），后为嘉靖十一年（1532）。以宋本翻刻者，或记夷白斋，或记十友斋，凡11种。《顾氏文房小说》本作为宋本翻刻，具有重要的版本价值。顾本保留了《幽闲鼓吹》未被拆分前的原

^① 上海图书馆编：《中国丛书综录（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338页。

始条数, 后世《宝颜堂秘笈》本、《说郛》本、《唐人说荟》本等 26 条之系统, 实际上都是在顾本 25 条基础上的进一步演变。

2. 清康熙间《学海类编》本

旧题清曹溶辑、陶越增订。《学海类编》广收唐宋至清初人著述 430 余种 800 余卷, 按经翼、史参、子类、集余四部分类。《幽闲鼓吹》为所收子目之一。该书初以抄本流传, 清道光十一年 (1831) 六安晁氏木活字排印; 民国九年 (1920) 上海涵芬楼据以景印; 1994 年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缩拼景印; 2007 年江苏广陵书社出《学海类编》全十册。半页九行二十一字, 白口, 左右双边, 上白鱼尾。台湾图书馆藏。

3. 清乾隆《四库全书》本

清乾隆时期编修。《四库全书》收《幽闲鼓吹》于子部小说家类, 《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四〇有提要。底本系据陶珽重编《说郛》本录入。半页九行二十一字, 白口, 四周双边, 上黑鱼尾。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指出: 顾元庆跋称 25 篇, 与晁公武《读书志》合; 四库本检为 26 篇, 盖误断元载及其子一条为二; 并评价其“唐人小说之中, 犹差为切实可据焉”。^①现存可见台北故宫博物院文渊阁本、中国国家图书馆文津阁本等。

4. 清道光《唐人说荟》本、《唐代丛书》本

清陈世熙 (山阴莲塘居士) 辑, 一题王文诰编。陈世熙于乾隆五十七年 (1792) 在明代桃源居士 144 种辑本基础上, 择采《太平广记》《说郛》等书增补, 以《唐人说荟》为名刊行挹秀轩本; 乾隆五十八年 (1793) 编成《唐代丛书》。全书六集, 收唐人小说 164 种, 《幽闲鼓吹》收录于初集。

清道光二十三年 (1843) 弁山楼刻本, 半页九行二十一字, 白口, 四周双边, 上黑鱼尾, 共 36 册; 天津图书馆藏。《唐人说荟》编纂质量不佳, 存在删节、乱分篇目、乱改文句、妄题撰人、妄造书名等问题, 故《唐人说荟》本《幽闲鼓吹》的校勘价值有限, 仅可作旁证, 不宜作底本。

三、条目校勘

此次整理选取现存较早且刊刻精良的明嘉靖间顾元庆所刻《顾氏文房小说》本为底本, 对勘其他各版本, 发现内容上基本一致, 主要差异在于部分条目的划分方式, 造成不同版本条目数有异。历代目录书记述也颇有意于此点, 《四库全书》云: “是书末有明顾元庆跋, 称共二十五篇, 与晁公武《读书志》所言合。今检此本乃二十六篇, 盖误断元载及其子一条为二耳。”^②又《郑堂读书记》云: “晁氏称固纪唐史遗事二十五篇, 后有明顾元庆跋, 亦同。然‘李师古子孟阳’一条, 起首无‘李师古’三字, 自当并‘李师古跋扈’一条为一, 传本误离而二之, 晁氏、顾氏皆不道, 就其本数之耳。”二者皆认为造成条数不同的原因是传本划分方式有误, 但二者所质疑的条目则不同, 分别为“元载及其子”条、“李师古子孟阳”条。

着重对勘不同版本的这几条内容, 最合理的划分方式是划分为二十六条。

其中, “元载”条和“元载子伯和”条均为表现元载为宰相时权利之重, 分别从其本人事迹和其子事迹两个方面来阐述, 因此合为一条有理。但二者落脚点又不同, 高慎涛认为前者倾向于强调元载作为宰相的权势, 而后者则侧重述元载之子元伯和对于音乐的欣赏, 因此合为一条又有些牵强。^③此次校读亦支持该说法, 此处更应该分为两条。

而所谓“李师古子孟阳”条, 则应是《郑堂读书记》作者周中孚对于“李师古”条和“潘炎子潘孟阳”条这两条的误读。此处错误的原因应是在刊刻时, “李师古”条字数刚好够至底格, 使得夹在二者之间的“潘炎侍郎”条在传刻时, 被误合于其上一条“李师古”条。周中孚阅览时只注意到顶格以示段落划分的“孟阳”条, 于是误以为孟阳为李师古子。《旧唐书》记载: “潘孟阳, 侍郎炎之子, 以荫进, 登博学鸿词。母, 刘晏女也。公卿多父友及外祖宾从, 故得荐用。”^④可见孟阳为潘炎之子, 应为潘孟阳, 而非李孟阳。再结合“潘炎侍郎”条与“孟阳”条内容, 发现二者主旨皆在于表现潘炎之妻刘夫人的智慧与识人之才, 因此当合并为一条。

又顾本“潘炎侍郎”条: “潘炎侍郎。德宗时为翰林学士, 恩渥极其异。妻刘晏女也。京尹某有故伺候, 累

^① (清) 纪昀等: 《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四〇, 第 1185 页。

^② (清) 纪昀等: 《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四〇, 第 1185 页。

^③ 高慎涛: 《新出唐代小说家张固墓志考释》, 《古籍整理研究学刊》, 2025 年第 1 期, 第 12 页。

^④ (后晋) 刘昫等: 《旧唐书》卷一六二《潘孟阳传》, 第 4239 页。

日不得见。乃遗阍者三百缗。夫人知之，谓潘曰：‘岂为人臣，而京尹愿一谒见，遗奴三百缗。其危可知也。’遽劝潘公避位。”“孟阳”条：“子孟阳初为户部侍郎，夫人忧惕，谓曰：‘以尔人材，而在丞郎之位，吾惧祸必之至也。’户部解喻再三，乃曰：‘不然，试会尔同列，吾观之。’因遍招深熟者。客至，夫人垂帘视之。既罢会，喜曰：‘皆尔侔也，不足忧矣。’问：‘末座惨绿少年何人也？’曰：‘补阙杜黄裳。’夫人曰：‘此人全别，必是有名卿相。’”^①

综上，元载及其子一条不必合为一条，而“潘炎及其子”条应合为一条，合并为“潘炎妻刘夫人”条。由此划分得全书条目为二十六条。且由上述条目信息校勘，结合历代目录书所见与今所见版本情况，可得《幽闲鼓吹》版本流传情况如下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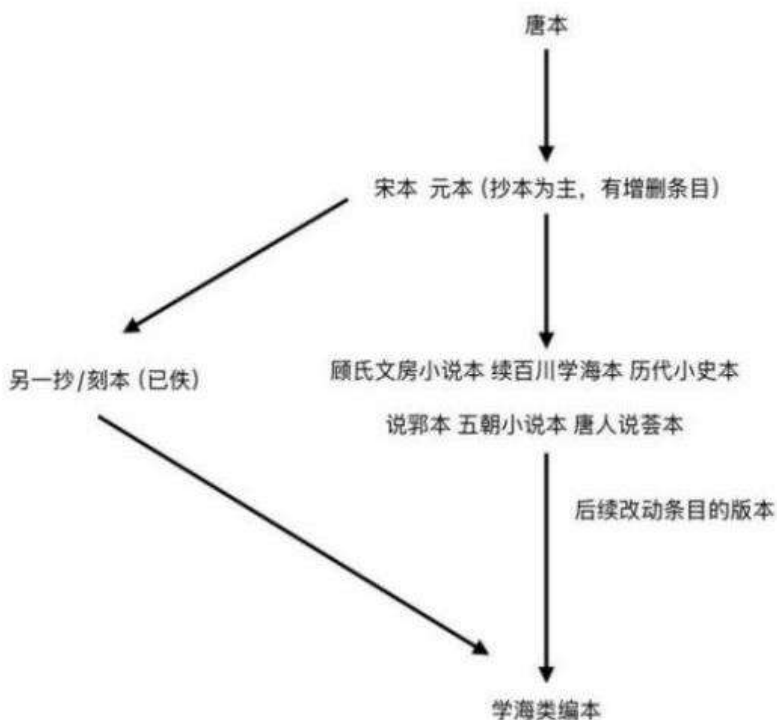


图1 《幽闲鼓吹》版本源流情况

四、结语

《幽闲鼓吹》的个案是晚唐笔记小说流传史的一个缩影。《幽闲鼓吹》作为唐代笔记小说的代表之作，虽篇幅短小，却生动展现了中晚唐时期宫廷政治、文人交往与社会风貌。通过新出《张固墓志》与文献比对，让我们得以窥见作者张固其人，更揭示出唐代常山张氏家族一脉相承的文学传统。从张鷟的诙谐批判到张固的平实纪事，风格虽异，却均以细节折射时代真相。书中虽部分内容可能经后人增改，但整体仍具“切实可据”的特点，为研究晚唐历史提供了独特视角。此外，历代目录书对《幽闲鼓吹》的著录差异与其版本变迁，亦反映出此书在传播过程中的接受情况与重构方向，体现了古籍在流传过程中被不断阐释与建构的过程。今日所见的古籍，既是历史的遗存，也是历史过程本身的结果。拨开历史的层累，并还原文献更为贴近历史本真的面貌，这一工作，不仅是对一部小说集的作者、内容与版本的考证与源流理清，更是对中晚唐社会文化记忆形成过程的一次细致探寻。

^① (唐) 张固：《幽闲鼓吹》，《顾氏文房小说》本，第2328页。

参考文献:

- [1] (后晋)刘昫,等.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2734.
- [2] (清)纪昀,等.四库全书总目[M].北京:中华书局,1965:1185.
- [3] 高慎涛.新出唐代小说家张固墓志考释[J].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25(1):6-14.
- [4] 孙晨晨.《幽闲鼓吹》作者唐张固墓志考释[J].墓志碑帖研究,2024(5):104-114.
- [5] (南宋)陈振孙,撰;徐小蛮,等,点校.直斋书录解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159.
- [6] (唐)张固,撰.幽闲鼓吹[M]//罗宁,点校.大唐传載(外三种).北京:中华书局,2019:64.
- [7] (明)高棅,辑.唐诗品汇[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影印本:16.
- [8] (明)顾元庆,撰.顾氏文房小说[M]// (明)顾元庆,辑.顾氏文房小说.国立公文书馆藏一卷本,第12册:10-11.
- [9] (唐)权德輿,撰;郭广伟,点校.权德輿诗文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337.
- [10] (南宋)洪迈,撰;孔凡礼,点校.容斋随笔·容斋续笔[M].北京:中华书局,2006:364.
- [11] (元)姚燧,撰.牧庵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5:31.
- [12] (明)彭大翼,辑.山堂肆考[M]//四库提要著录丛书.北京:北京出版社,2010:278.

A Study on the Textual History and Collation of Youxian Guchui

Hao Tingting, Liang Xianyuan

(Jinan University, Guangdong, Guangzhou, China)

Abstract: Youxian Guchui, a collection of anecdotal notes compiled by Zhang Gu of the late Tang dynasty, has long been beset by conflicting records in successive bibliographies regarding its authorship and content. The recent excavation of Zhang Gu's tomb epitaph provides crucial clues for reconstructing his biography. Extant editions are predominantly preserved in Ming and Qing collectanea, with their contents mainly comprising anecdotes from the court and countryside of the mid- to late Tang. Historical accounts diverge on the book's author, its thematic scope, and the number of entries. Through combined textual and epigraphic research, it is confirmed that the author of the extant Youxian Guchui is Zhang Gu of the Tang. The recorded subject matter covers a broad chronological span, not confined solely to the reign of Emperor Xuanzong of Tang as earlier bibliographies assert. The book's entries underwent alterations after the Song dynasty, which caused inconsistencies in catalogue descriptions; correspondingly, the Ming – Qing collectanea perpetuated divergent schemes of entry division and tallies. Finally, a comprehensive review delineates the diachronic textual transmission of this work and evaluates its value as historical source material.

Keywords: Youxian Guchui; Zhang Gu; Late Tang; Tomb epitaph

列宁妇女解放思想及其当代价值探析

任江东

(新疆师范大学, 新疆 乌鲁木齐 830017)

摘要: 作为第一位将马克思主义落地实践并成功缔造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列宁, 在继承马克思恩格斯妇女解放思想并参考借鉴贝贝尔、蔡特金妇女解放思想的基础上, 结合俄国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实际, 形成了自身内涵丰富且极具洞察性、前瞻性的妇女解放思想。立足当前, 探究列宁妇女解放思想可以为我国推进妇女全面发展事业提供理论指导与现实观照, 进而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凝聚起磅礴的妇女力量。

关键词: 列宁; 妇女解放; 当代价值

DOI: doi.org/10.70693/202607226600

妇女解放是人类解放的尺度, 是阶级解放、社会解放和人类解放的重要组成部分。^[1] 妇女解放的首倡者是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傅立叶, 他在《四种运动和普遍命运的理论》一文中最先进行了阐发。恩格斯曾指出, 傅立叶“第一个表明了这样的思想: 在任何社会中, 妇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普遍解放的天然尺度。”^[2] 这句话已经成为马克思主义关于妇女解放的经典论述。

列宁的妇女解放思想, 在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学说以及借鉴其他学者的有关思想基础上, 立足本国实际, 探索出了一条适合当时那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俄国实现妇女解放的道路, 它在开辟本国妇女解放运动新局面的同时, 也为当时乃至之后的世界范围内的妇女解放运动提供了理论指导和精神力量。

一、列宁妇女解放思想的理论依据及时代语境

(一) 理论依据

1. 对马克思恩格斯妇女解放思想的继承。

马克思恩格斯妇女解放思想是其历史唯物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列宁妇女解放思想的主要理论基础。马克思曾高度赞扬妇女的力量, 并揭示了女性地位与社会进步的关系, 他指出: “每个了解一点历史的人也都知道, 没有妇女的酵素就不可能有伟大的社会变革。社会的进步可以用女性 (丑的也包括在内) 的社会地位来精确地衡量。”^[3]

虽然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专门的一篇著作来论述妇女解放, 但马克思恩格斯在各个时期都非常关注妇女这一群体的境况, 从他们涉及妇女的大量文章中, 我们可以清晰地体会到马克思恩格斯对妇女解放事业的深切关怀。通过文本对比来看, 能系统展现马克思恩格斯妇女解放思想的代表著作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恩格斯在书中明确指出: “只要妇女仍然被排除于社会的生产劳动之外而只限于从事家庭的私人劳动, 那么妇女的解放, 妇女同男子的平等, 现在和将来都是不可能的。”^[4] 接着, 恩格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 从经济事实出发, 阐释了人类两种再生产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考察了妇女地位的演变, 同时也进一步指明了妇女解放的根本路径, 即消灭私有制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

综合来看, 马克思恩格斯对妇女问题的分析论述, 常常放在私有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阶级社会和父权制家庭结构等这些宏大的框架之中, 他们详细剖析了妇女解放的历史过程、革命作用、权利和义务、解放途径等问题, 揭示了妇女解放的实质、发展规律、条件, 为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研究和解决妇女问题提供了理论基石和方法论指导。

2. 对倍倍尔、蔡特金妇女解放思想的借鉴

列宁在继承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妇女解放思想的同时, 对于其他一些在妇女解放工作方面颇有建树的马克思主

义者的相关论述也进行了吸收借鉴,在这方面他主要汲取了奥古斯特·贝贝尔和克拉拉·蔡特金的优秀成果。

奥古斯特·倍倍尔是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创始人、国际工人运动的活动家、第二国际的创始人和领导人之一。列宁曾称赞到:“他把自己全部充沛的精力毫无保留地用来为社会主义的目标服务。”^[5]“他冲破了一切障碍去树立坚定的社会主义信念,成为工人领袖的典范,成为资本的雇佣奴隶为争取人类社会的美好制度而进行群众斗争的代表者和参加者的典范。”^[6]

倍倍尔善于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分析和研究各种历史的和现实的问题,尤其是研究妇女解放与无产阶级革命的关系他认为,为了根本改变无产阶级妇女的现状,必须彻底地改造现存的国家制度及其社会组织。他的妇女解放思想主要体现在《妇女与社会主义》一书中,该书填补了此前没有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系统研究妇女问题的空白,是一部里程碑式的著作。他在书中指出妇女和工人一样同为被压迫对象,妇女的解放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无产阶级的妇女解放指明了道路,使妇女解放运动与工人运动相结合,成为社会主义运动的重要力量。

克拉拉·蔡特金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左派领袖之一,更是国际社会主义妇女运动杰出领袖、国际妇女节创始人之一。列宁对蔡特金这位国际女领导人以及她在共同事业中的坚决立场,有非常高的评价。^[7]1889年7月在巴黎第二国际成立大会上,克拉拉·蔡特金发表了“关于妇女劳动问题”的演说,大会后不久,她的讲话以《当前的女工和妇女问题》为题出版发行,这本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阐述妇女问题的小册子成为无产阶级妇女运动的理论纲领,在欧洲国家的女工中广泛流传起来,对于促进无产阶级国际妇女运动起了巨大作用。

在担任国际上各种妇女组织的领导职务,致力于推进无产阶级国际妇女运动的过程中,蔡特金起草了《共产主义妇女运动的方针》等文件,发表了《关于共产主义妇女运动问题》等一系列讲话,撰写过《妇女及其经济地位》、《只有联合无产阶级妇女,社会主义才能胜利》、《列宁给全世界妇女的遗训》等专著文章,在这些讲话和文章中,她论述了无产阶级妇女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地位、作用和社会责任,阐述了资产阶级女权运动和无产阶级妇女运动的本质区别,并指明了无产阶级妇女解放的正确道路,这些先进的思想观点,对于促进当时广大的妇女群体的觉醒、开展无产阶级妇女运动,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此外,她创办了无产阶级妇女报纸《平等报》,担任主编25年之久,使之成为教育和团结妇女、反对改良和修正主义的强大阵地。蔡特金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舞台上奋斗了近60年,为无产阶级和广大妇女的解放贡献终生,鉴于蔡特金在国际妇女解放运动中的卓越贡献,人们称誉她为“国际妇女运动之母”。

奥古斯特·倍倍尔和克拉拉·蔡特金的妇女解放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思想起到了重要的补充作用,也对列宁妇女解放思想的形成有着重要影响。

(二) 时代语境

1. 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下妇女的严酷境况

资本主义在上升时期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使得工业革命大范围开展与资本在全球范围内流动,推动机器生产代替手工作坊劳动,创造了远超以往的社会财富。但是当其发展到末期,也就是从自由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资本主义,乃至其最高阶段的帝国主义时,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各种弊端则严重妨碍了社会的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

在列宁所处的资本主义垄断时代,妇女深陷多重压迫,面临着政治法律层面、社会经济层面、家庭生活层面的困境,其生存状况十分堪忧。通过对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现实状况的考察,列宁深刻的指出:“甚至在有充分政治自由的最民主的共和国里,都使劳动者事实上处于贫困的、雇佣奴隶的地位,使妇女处于受双重奴役的地位。”

“甚至最先进国家的资产阶级立法也利用妇女较弱的地位,使她们处于不平等的和受屈辱的地位。”^[8]列宁认为,资本主义制度在本质上与妇女的真正解放是对立的,妇女的解放绝非改良资本主义框架所能实现,而必须与整个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紧密结合,通过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推翻资本主义私有制度才能摧毁压迫的根基,实现事实上的真正平等。

2. 俄国内部妇女问题及妇女运动的兴起

受到世界资本主义发展潮流的影响,俄国内部也开始发展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但正如列宁指出那样:“资产阶级的事业就是发展托拉斯,把儿童和妇女赶进工厂,在那里折磨他们,腐蚀他们,使他们过着极端贫困的生活。”^[9]此外,由于1861年俄国农奴制改革并不彻底,导致俄国长期处于资本主义与封建制度残余并存的僵局之中,

“在19世纪末的俄国,不仅可以看到最发达的、美国式的纯粹资本主义剥削的一切‘美妙的东西’,而且还可以看到纯粹中世纪的、在先进国家中早已消失了的工役制和徭役制的经营方式。”^[10]在这种困境下的俄国广大妇女仍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在工厂工作中,资本家凭借看管机器不需要花费太多体力这一特点加强奴役妇女来操作机器,并付给她们比

男性更少的工资,这种压迫的出现却是因为资本家们利用妇女们“甘愿接受低得可怜的工资来给自己和家里人‘多挣’一块面包”^[11]这一生存心理。在家庭生活中,“父权制”家庭使妇女处于“家庭奴隶”地位,“男尊女卑”这一浓厚封建主义色彩的阴云仍旧笼罩在妇女头上,妇女被繁重家务的压得喘不过气来。对于当时的俄国妇女而言,如果仅仅从事家务劳动而不进入雇佣工厂,那她处于完全的经济依附地位,如果既要从事家务劳作又要进入雇佣工厂,那她最终又处于双重的压迫之中。

在种种不平等压迫之下,俄国妇女运动也开始出现并活跃起来。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就已经有女权主义者开始关注妇女问题,她们建立起廉价住房协会,给妇女提供廉价干净的住所;创办妇女出版合作社,给受过教育的妇女提供工作;发起星期日学校运动,给妇女提供教育机会;此外还为患病妓女提供住所和医疗救助,并劝导其离开这一职业。后来她们陆续又建立了“俄国妇女互助博爱会”、“妇女平等权利同盟”、“妇女进步党”、“俄国妇女平等联盟”等组织团体,从最初的从事慈善事业,到争取妇女受教育权利和经济地位,再到后来争取政治平等权利,她们为推动俄国妇女解放事业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到了20世纪初期,俄国妇女解放事业在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下开辟了崭新的局面。

二、列宁妇女解放思想的主要内容

(一) 妇女解放的重要意义

首先,妇女解放是无产阶级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妇女解放与无产阶级革命是辩证统一的运动。无产阶级革命的目标是实现全人类解放,若妇女仍处于被压迫的不平等状态,革命便不是彻底的。因此列宁非常重视妇女在革命事业中的作用,甚至于认为其关乎革命的成败:“从一切解放运动的经验中可以看到,革命的成败取决于妇女参加解放运动的程度。”^[12]在列宁看来,妇女解放一方面能为无产阶级解放事业注入强大力量,另一方面就无产阶级自身来说,“如果不争得妇女的完全自由,就不能得到完全的自由。”^[13]在同苏维埃俄国的敌对势力进行坚决战斗的过程中,在处境非常困难时,列宁认为“最宝贵的莫过于广大非党女工群众的帮助了。”^[14]他非常赞赏妇女们在无产阶级革命战争中所作出的贡献,并认为“如果没有她们,我们就不会胜利。”^[15]

其次,妇女解放与社会主义建设是密切相关的。在无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成功建立苏维埃政权之后,仍然需要调动全体劳动者的积极性,去进一步巩固政权、建设社会主义,妇女作为重要的生产和建设力量,动员她们参与进来是大有益处的。列宁指出:“我们追求社会主义的理想,要为社会主义的彻底实现而奋斗,在这方面,妇女有十分广阔的工作场所。”^[16]但是“如果不使妇女走出使她们愚钝的家庭圈子和厨房圈子,那就不能保证真正的自由,甚至不能建立民主,更不用说建立社会主义了。”^[17]同时,当妇女在参加具体工作时,列宁又告诫不要去担心妇女不能很好地进行工作,因为她们“通过管理很快就会掌握业务,赶上男子。”^[18]

(二) 妇女解放的实践途径

首先,从法律上赋予男女的平等权利地位。列宁指出,虽然在几十甚至几百年前的西欧解放运动中,有许多代表人物都提出废除那些妇女与男子不平等的旧法律,但是到目前为止,即使是最先进的共和国,也没有实现这个要求。“资产阶级民主不过是讲些冠冕堂皇的词句、庄严的保证、动听的诺言,喊几句自由平等的响亮口号的民主,而实际上这一切却掩盖着妇女的不自由和不平等。”^[19]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立法者“专门利用妇女较弱的地位”,在立法时常常制定“把她们置于不平等的甚至往往是受屈辱的地位的法律。”而苏维埃共和国这一劳动者的政权已经“彻底废除了使妇女处于从属地位的法律。”^[20]苏维埃共和国现在所颁布的法律中完全找不到使妇女处于不平等地位的法律条文。

其次,帮助妇女摆脱家务束缚,参与共同的生产劳动。“只要妇女忙于家务,她们的地位就不免要受到限制。”^[21]列宁指出家务“多半是非生产性的、最原始、最繁重的劳动。”对妇女在其他方面的进步毫无帮助。为此,在列宁的领导下,苏维埃共和国大力建设公共食堂、托儿所、幼儿园等公共设施机构,将妇女从家庭私人领域解放到社会公共领域,从而使她们参与到更为广阔的生产劳动中去。比如在粮食部门给群众分配粮食、在食堂工作、监督产品分配和大型试验农场工作,以及在战争时期鼓励、支援军队工作等一系列新工作。

最后,提倡妇女参加政治活动,参与管理和监督。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妇女是极少参与政治的,因为她们处于无权的地位,而作为劳动者的政权的苏维埃共和国“政治活动是向女工开着大门的”^[22]。列宁指出:“不仅要吸引妇女独立地参加一般政治生活,而且应当吸引她们参加经常的人人要担任的公务,否则,不仅社会主义,就连完备而稳固的民主制度也无从谈起。”^[23]对于吸收的范围、吸收的条件,列宁则认为:“不仅需要党员女工和觉悟的女工,而且需要非党女工和觉悟最低的女工都来参加。”^[24]但是她“要是正直的女工,能有条有理地勤勤恳恳地工作。”^[25]

在战争结束后,列宁又进一步强调:“妇女在这种时候参加党和苏维埃的工作具有巨大的意义。妇女应当在

这一和平的组织工作中起极重要的作用,当然,她们也一定会起这种作用。”^[26]

三、列宁妇女解放思想的当代价值

正如与列宁建立过深厚友谊的国际妇女解放运动灵魂人物蔡特金所说的那样,在所谓文明世界里只有一位真正伟大的党的领袖、群众的领袖开始坚毅不拔地在言论和行动上贯彻争取妇女完全解放和平等这一要求,这就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他是一位为妇女的解放和平等而奋斗的坚毅、果断、忠实的先进战士。^[27]

列宁妇女解放思想作为列宁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凝结着他探索落后俄国如何打破陈旧思想禁锢,从而唤起广大妇女为捍卫自身平等权益、积极投身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智慧。在21世纪研究列宁妇女解放思想,对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来说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 为制定完善权益保障体系提供政策参照

在总结妇女运动的发展情况之后,列宁深刻意识到,妇女解放不能仅靠自发的社会运动,必须依托无产阶级国家政权的力量,通过立法和行政手段推进男女平等。在苏维埃俄国早期,列宁就推动颁布了《全面禁止妇女从事夜间工作的法令》《关于公民婚姻、子女和户籍登记的法令》《关于离婚的法令》等一系列法律文件,废除了封建婚姻制度和资产阶级法权的压迫,赋予女性平等的选举权、受教育权,甚至在基层政权中设立“妇女部”,专门负责保障妇女权益,通过各种国家主导路径,极大地提高了妇女的地位和改善了妇女的生活质量。

列宁的实践表明,国家力量既是推动性别平等的核心力量,也是保障妇女权利的坚强后盾。在当代,男女平等早已成为全球共识,绝大多数国家都将妇女权益保障,通过法律体系和具体执行机制将其从理念变为现实。但是在部分国家和地区、部分领域对妇女压迫和性别不平等情况仍然存在。例如职场中的隐形性别机会不平等,就需要国家通过劳动监察执法保障女性就业权益;再如家庭暴力等侵害女性身心健康的行为,需要严格按照《反家庭暴力法》及配套执法机制加以遏制。

(二) 为促进当代妇女全面发展提供思想支撑

在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列宁始终强调,妇女不仅是被解放的对象,更是这一过程中的主体性力量。他积极鼓励女性参加十月革命、国内战争以及战后经济恢复工作,让女性在实践中发挥了自身的巨大潜力,激发了女性参与社会治理、推动社会进步的活力,使女性在认识到自身价值的同时,也促进了这一群体的普遍觉醒。

在当代社会,女性在教育、科技、文化、政治等各个领域的贡献日益凸显,但仍有部分人群受到传统观念影响,仍单一地认为女性是“弱势群体”,严重妨碍了女性发挥其作为社会建设主体力量的价值。列宁的思想提醒我们,女性的解放与社会发展是双向互动,即女性的积极参与为社会发展注入强大动力,而社会的进步又能进一步推动女性全面发展。例如在脱贫攻坚、乡村振兴实践中,无数女性通过就业、创业成为致富带头人;女性科研者在医药、科技、航天等领域取得突破性成果,等等。这些实践充分证明,破除性别刻板印象,激发女性社会参与与活力,为女性提供平等的参与机会和平台,女性是完全能够在国家建设中发挥“能顶半边天”的作用的。

(三) 为克服狭隘女权主义观点提供理论武器

女权主义(女性主义)起源于18世纪末的欧洲,以1791年法国女权主义者奥兰普·德古热发表的《女权宣言》为标志。1792年英国女权主义者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发表的《女权辩护》一书成为女权主义的奠基之作,从此之后,女权主义在欧美国家广泛传播,并随着资产阶级革命而力量不断壮大。在历史上,女权主义曾为推动社会进步发挥过积极的作用,对女性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获得与男性平等地位做出不少贡献。但是,在女权主义的发展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激进女权主义派别,他们其中一些人被资产阶级利用,模糊了男女平等权利的实质,进而散发宣传被异化、被扭曲的女权主义言论,脱离社会事实,偏离正确方向,开始走向狭隘、极端女权主义道路。

近年来,网络上的所谓“女权主义”声音就是狭隘、极端女权主义的代表。他们背离女权主义追求平等的初衷,抛弃捍卫女性权利的正确道路,一度造成男女关系紧张局面。列宁曾经十分坚决地反对错误女权主义的思潮,因为它吸引了一部分渴望自由的女性走上进行两性间的斗争的错误道路。^[28]这就警示我们在具体实践过程中,要学会从马克思主义有关妇女解放的经典著作中学、思、悟,进而甄别出社会中的“伪女权主义”,并坚决打击这类行为,防止其破坏公序良俗。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主义大辞典[M].武汉:崇文书局,2017:227.

- [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76.
- [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99.
- [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81.
- [5] 列宁全集:第23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383.
- [6] 列宁全集:第23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388.
- [7] 列宁全集:第46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78.
- [8] 列宁选集:第4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46.
- [9] 列宁全集:第28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174.
- [10] 列宁全集:第17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99.
- [11] 列宁全集:第23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119.
- [12] 列宁全集:第35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181.
- [13] 列宁全集:第38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178.
- [14] 列宁全集:第37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195.
- [15] (德)克·蔡特金.列宁印象记[M].马清槐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4:57.
- [16] 列宁选集:第4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48.
- [17] 列宁全集:第29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42.
- [18] 列宁全集:第38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178.
- [19] 列宁全集:第37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283.
- [20] 列宁全集:第37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192.
- [21] 列宁全集:第37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194.
- [22] 列宁全集:第37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195.
- [23] 列宁全集:第29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163-164.
- [24] 列宁全集:第37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195.
- [25] 列宁全集:第38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178.
- [26] 列宁全集:第40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86.
- [27] (德)蔡特金.列宁给全世界妇女的遗教[M].魏城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0:2-3.
- [28] (德)蔡特金.列宁给全世界妇女的遗教[M].魏城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0:3.

An Analysis of Lenin 's Thought of Women 's Liberation and Its Contemporary Value

Ren jiangdong

(Xinjiang Normal University,Xinjinag,Urumqi,China)

Abstract:As the first to put Marxism into practice and successfully create the world 's first socialist country, Lenin, on the basis of inheriting Marx and Engels ' thought of women 's liberation and referring to August Bebel and Clara Zetkin's thought of women 's liberation, combined with the reality of Russian revolution and socialist construction, formed his own rich connotation and very insightful and forward-looking thought of women 's liberation. Based on the current situation, exploring Lenin 's thought of women 's liberation can provide theoretical guidance and practical observation for China 's promotion of women 's all-round development, and then gather majestic women 's strength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a strong country and the great cause of national rejuvenation.

Keywords:Lenin ; women 's liberation ; contemporary value

《金阁寺》的废墟诗学与精神重构

魏美如

(云南大学, 云南 昆明 650000)

摘要:《金阁寺》的创作背景植根于战后日本社会的精神荒芜与价值崩塌,三岛由纪夫借助林养贤纵火烧毁金阁的真实事件,将“废墟”由物质层面引入精神维度。可以从废墟美学的视角出发,考察金阁在小说中兼具物质性与象征性的特质。沟口对金阁的焚烧其实一种主动制造废墟的行动,而三岛的叙事有意省略大火场面,将毁灭化为平淡,反而凸显废墟生成之际自由的悬置。最终金阁化为灰烬,沟口说出那句“我想活下去”,达成了最后的废墟之美与精神重构。

关键词:《金阁寺》;三岛由纪夫;废墟美学;精神重构

DOI: doi.org/10.70693/202607275470

夏多布里昂强调:“废墟使我们心灵产生了崇高的回忆,给艺术带来了激动人心的作品。”^[1]显然,“废墟诗意”的基础是人类物理建筑随着时间的摧残后形成的失去迹象的遗迹,更细致地说,即是古代文明的遗迹。然而“废墟”的意指不是简单的“吊古战场”式的感怀,更多地指向精神文明的荒芜。“人类不过是一座倒塌建筑,一块罪孽与死亡的碎片;他温柔的爱情,他动摇的信仰,他有限的仁慈,他不完整的情感,他贫乏的思想,他破碎的心,他身上的一切都只是废墟。”^[2]精神的故步自封的堡垒在中世纪以后遭受到了各种思想的摧残,直至当时,欧洲文明趋向一种崩溃的边缘,尽管走向这个阈值还用了一百年,然而夏多布里昂却敏锐地感受到了这一趋向。

这种对“精神废墟”的洞察,在一个多世纪后的三岛由纪夫笔下获得了极为激进的回响。《金阁寺》中的废墟,是一个必须由人主动制造的结局。三岛的主人公沟口,面对那座拒绝朽坏、拒绝衰败、固执地闪耀着金色光辉的金阁,感受到的是一种窒息般的压迫。彼时的日本文学,把对人类自身“只是一座倒塌建筑”的剖白,从外在景观移入内在本质,包括人的情感、信仰、思想,无一不被纳入“遗迹”的范畴。回应着一百年前夏多布里昂对欧洲文明“崩溃”的忧郁,因为届时的日本,也笼罩在一种“崩溃”的忧郁里。

一、战后日本的“废墟性”

1950年7月2日,京都市北区金阁寺町方向,拥有五百余年历史的国宝建筑金阁,在这一个凌晨化为灰烬。纵火者是这座寺院里的一名二十一岁的见习僧人林养贤。他在金阁后山的左大文字山上切腹未遂,被护林员发现后救回,面对审讯,他的供词只有一句:我嫉妒金阁的美^[2]。六年后,三岛由纪夫将这句话放大成为一部长篇小说,取名《金阁寺》。小说远远走出了“嫉妒”这个单一的动机。三岛在动笔之前,专程前往京都和金阁寺,走访了纵火者的故乡舞鹤,“凡能看的地方都看了,能去的地方都去了,估计有用的东西都详尽地作了笔记,就像采集植物和采集昆虫标本一样”^[3]。他甚至特地爬上了林养贤企图自杀的左大文字山,去感受那个纵火后远眺金阁燃烧的视角。

1956年,三岛开始写作《金阁寺》,此时距离战败已经过去十一年,距离金阁被烧过去六年,日本正在进入“神武景气”的经济高速增长期。1956年还被称为“战后”的结束年份,日本政府在当年的《经济白皮书》中写下了那句著名的话:“现在已经不是战后的了。”然而,也正是这一年,三岛偏偏要写一部关于战时的、关于战败的、关于废墟的小说。西村清和曾说:“所谓废墟,无论是枯朽建筑物残骸留下的痕迹,还是作为‘词语的遗物,仅存其名的名胜古迹与歌枕’,它首先是一个沉淀着历史的浓密记忆的场所。”^[4]某种程度上来说,三岛是在追索战败与废墟给日本人,至少给某个类型的日本人留下的心灵烙印。

作品中多方面呈现着这种历史的“废墟性”。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此后的日本城市景观中,焦土和瓦砾是最常见的景象。东京、大阪、名古屋、广岛、长崎……上百座城市在轰炸中化为废墟。战后

作者简介:魏美如(2005-),女,云南大学文学院学生,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文学及文论。

的头几年，黑市横行，配给制下粮食短缺，通货膨胀失控。在《金阁寺》里，沟口进入金阁寺之后，寺里的伙食一直是“沉淀在粥碗底下只有几粒米”的甘薯粥，副司偶尔买些黑市米还要谎称是“施主的赠予”^[5]。鹤川之所以能比别的徒弟滋润一些，是因为家里源源不断从东京寄来食物。

小说情节横跨了整个战争末期和战后初期。沟口来到金阁寺时，正值战局恶化，美军 B29 对日本本土展开大规模空袭。京都是少数几个几乎未被轰炸的主要城市之一。一个重要原因是盟军顾及京都作为千年古都的文化价值，事前已经在地图上将其标出，刻意避开了。也就是说，金阁在现实历史中受到的是特殊的保护，与被轰炸的“废墟城市”是格格不入的。但在沟口的想象里，却是这种“保护”让他愤怒。沟口反而幻想金阁在空袭中化为灰烬：“烧死我的大火也能烧毁金阁，这一想法几乎使我陶醉。在同样的灾祸和同样的不祥之火的命运之下，金阁和我所居住的世界处在同一条水平线上。”^[5]

从日本其他建筑和金阁寺的对比而言，显然它们是处于“不平等”的地位，但这种“不平等”背后又渗透出一种可怖的“平等性”——战争将人的阶层、贫富、美丑在燃烧弹面前全部拉平。对一个口吃的、自卑的、被排除在“正常人生”之外的少年来说，那是一种解放。在共同的毁灭面前，金阁不再高傲，不再完美无缺，而是和他一样脆弱、一样可以被终结。这种可以共同毁灭的关系，反而让他觉得幸福，所以沟口会说：“金阁降低到和我同样的高度”。这种和平的假象正依靠“毁灭”得以建立，实现“毁灭”的方式就是把所有建筑与人都变成瓦砾。

战争结束了，金阁没有化为灰烬。它毫发无损地屹立在镜湖湖畔，在停战诏书广播之后的第二天，一切秩序都恢复了。沟口走到金阁前，“灼热的石子路上，只有我的身影。可以说，金阁在彼岸，我在此岸。”^[5]沟口对于金阁寺没有毁灭，内心是很“失落”的。也正是由此，三岛的笔触从一种物质性的废墟转向了一种精神性的废墟。日本的战败带来了“所有价值的崩溃”，但在沟口的观感里，崩溃的不是金阁，而是全世界。金阁反而在废墟之中显得更加坚固、更加辉煌。金阁寺是唯一没有跟着大家一起“倒下”的东西，“民族悲哀”和“战败冲击”没有让它动摇，反而衬托出它的超然。所以沟口登上不动山顶，俯瞰京都市时，“灯火一片辉煌”，灯火管制解除了，“这光景对我来说简直是个奇迹”。他说：“这是俗世。战争结束了，灯光下人们为邪恶之念所驱使。……请让包容邪恶的我心中的黑暗，和包容无数灯火的夜的黑暗，等量奇观吧！”^[5]物质废墟的年代结束了，但剩下的是精神的摇摇欲坠。

二、金阁寺的物质性：“预备废墟”

在讨论“精神废墟”之前，首先要阐述作品里“物质废墟”的前提。所谓“前提”，是指金阁寺在作品里本来就呈现出一种“将要成为废墟”的状态。

实际上，今天人们站在镜湖湖畔看到的那座金碧辉煌的建筑，已经不是 1397 年足利义满建造的那一座，甚至也不是沟口烧掉的那一座。它在成为“永恒”之前，已经反复“死”过多次。金阁寺始建于 1397 年，1408 年义满死后改为禅寺。应仁之乱中，鹿苑寺境内绝大多数建筑被战火烧毁，惟独舍利殿，也就是金阁幸存，这意味着金阁寺本来就是“废墟”。今天游客看到的是 1955 年重建、1987 年重新贴金箔的复制品。金阁在现实中的命运其实经历了“被烧、重建、再被烧、再重建”的过程，从来都不能归为“不朽”，但又反复从废墟中站起来。

正因为金阁寺本就是“废墟”，所以可以说一直有一种“重建”和“坍塌”的张力在其中。三岛由纪夫通过描写金阁寺的样式和材质，为沟口焚烧它做出了一个“预设”。

金阁寺的样式总共有三种，第一层法水院是平安时代的寝殿造，第二层潮音洞是镰仓时代的武家造，第三层究竟顶是中国唐代的禅宗佛殿风格。显然它们对标的是不同时代、不同风格的内容，本身就带有上一次被“摧毁”时的痕迹。“这种散乱的三层设计，在美术史家眼里只能是折中的样式，无疑是为寻求一种使不安得以结晶、自然形成的样式。”^[5]金阁甚至不是为了和谐而造的，它本身就象征一种不安的心态在建筑中落成。三层金阁寺之间也不会真正融合，它们只是被金箔覆盖、被视觉统一，而金箔是会剥落的。沟口看到的是“可怜的金箔的痕迹”，金箔消散后露出的木质材料，正是金阁寺被掩盖的不和谐的躯体。金箔是一种伪装，是对断裂的建筑形式的掩饰，金阁在物质层面原本就是一座“拼贴的废墟”。

在材质上，金阁寺亦是容易被“摧毁”的。沟口第一次亲眼见到金阁时，觉得它“只不过是一座陈旧而灰暗的小小三层建筑”^[5]。现实中的金阁和他心中那个金光灿烂、无与伦比的幻影之间，隔着一层厚厚的灰暗。金阁本来就是旧的，甚至在它落成的那一天就已经开始走向陈旧。因为它是木头做的，木头的宿命就是朽坏、开裂、被虫蛀、最后燃烧。沟口说：“金阁虽然很坚固，但也具有易燃的木炭般的肉体。”^[5]木头之间的连接不用铁钉，全靠榫卯。榫卯是一种精密的结构，同时也是脆弱的，会因木头的年久变化而失去它的坚固。

鹤川曾向镜湖里投入一颗石子，“刹时之间，美丽精致的建筑崩溃了”^[5]。倒影比本体更容易崩溃，也更像废墟，具备着模糊、荡漾、残缺的特性。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金阁的美从来就不在于它的坚固，而在于它的脆弱。

金阁在成为废墟之前，早就活成了一座废墟。沟口自然就不是它的毁灭者，只是它漫长朽败过程中的最后一双手。金阁寺在历史及物质上，标志着某种“辉煌”，但在“辉煌”背后又有无限的“脆弱”。用巫鸿的话来说：“‘理想’的废墟必须具有宏伟的外形以便显示昔日的辉煌，但同时也要经历足够的残损以表明辉煌已逝。既要有宏伟的外貌以显示征服之不易，也需要破败到让后人为昔日的征服者唏嘘感叹。废墟彰显了历史不朽的痕迹和不灭的辉煌的永恒，也凸示了当下的易逝和所有现世荣耀的昙花一现。所以废墟能唤起的情感既可能是民族的自豪，也可是忧郁和伤感，甚至是乌托邦式的雄心壮志。”^[6]金阁寺过于完好地保存了辉煌，反而丧失了废墟应有的“已逝性”；又因金阁寺拒绝残损，于是沟口替它制造了残损。沟口放的那场火，不过是让金阁终于配得上它已在倒影中演绎了五百年的角色。

三、坍塌的瞬间：“废墟”的生成

美国美学家罗伯特·金斯堡在《废墟美学》中提出，废墟不只是一种静态的残迹，更是一种过程，一种“正在成为废墟”的动态。废墟的美不在于它“已经”坍塌，而在于它“仍在”坍塌。坍塌的瞬间被无限拉长，变成一种悬置的时间。

《金阁寺》中的摧毁“瞬间”正是如此。小说几乎没有正面描写火焰吞噬金阁的画面，而是将笔墨集中在沟口做决定的瞬间、烧之前的自由、以及火烧之后的那句“我想活下去”上。三岛刻意省略了壮烈的燃烧场面，意味着真正的废墟之美不在火中，始终在燃烧的边缘。

小说中，沟口第一次明确说出“必须烧掉金阁”的地点是由良的海边。他站在内日本海荒凉的沙滩上，北风劲吹，灰云堆积，海水浑浊。那里没有美，只有冷和空旷。就在这片“反美学”的风景里，那个念头出现了：“必须烧掉金阁。”^[5]三岛用极其平和的语调写下这句话，像在陈述一个天气的变化。沟口甚至没有在心里重复一遍，没有犹豫，没有挣扎，一切都是自然的。决定烧毁金阁的那一瞬间，金阁并不在场。沟口没有看着金阁做出这个决定，他面对的是海，那个从少年时代起就象征着“看不见的远方”的海。金阁在此变成了一个概念、一个记忆、一个必须被清除的障碍。

沟口回到金阁寺，继续日常的生活，但一切都变了：“一想到金阁总有一天会烧掉，不管多么难以忍受的事都能熬过去了。”^[5]他对寺里的人变得和气，对大自然变得亲切，甚至说出“我学会站在终点上看问题，我感到我已经亲自决断自己站到终点上来。这就是我获得自由的根据。”^[5]可以说，沟口摧毁金阁寺的“瞬间”不是火点燃的那一刻，而是从做出决定到付诸行动之间那段悬置的时间。在这段时间里，金阁已经死了，至少在沟口的心里已经死了。沟口提前站在了未来的废墟上回望现在，于是现在的一切压迫都失效了。所以，沟口把“金阁已毁”当作一个已经发生的事实来生活，于是金阁对他的威压提前解除了，沟口在放火之前就已经自由了。大火只是把这种自由变成一个看得见的事件，让所有人都看到，包括金阁自己。三岛塑造了一个提前抵达终点的人，甚至他回身看着还在起点挣扎的自己，觉得那一切都很可笑。

火烧发生时，叙述反而变得模糊，文中写“金阁开始冒烟”^[5]，然后就是警报声、人群奔跑。沟口躲在山上，叼着烟，心里想：“我要活下去。”放火事件变成了一个黑洞，所有铺垫都指向它，但它本身几乎不可见。由此看来，三岛的叙述完成了一种“省略”，这种“省略”还具有另一层深意——三岛不愿让读者享受毁灭的快感，也不愿让沟口享受征服者的胜利。金阁没有被“壮烈地”烧掉，它只是“冒烟了”，然后“涌出浓烟”。这种平淡的、几乎反高潮的描写，把金阁的毁灭从“事件”降格为“过程”，既不神圣，也不恐怖，只是发生了。而这正是废墟美学最冷静残酷的面向，这种叙事方式意味着美真正消失的时候往往毫无戏剧性，它只是停止在那里，倏忽地就被“毁灭”了。

本雅明在讨论废墟时曾指出，寓言家的工作就是“从废墟中收集碎片”，是为了让碎片自身的真实性显现。三岛正是这样的寓言家，他收集了金阁的碎片，然后用六年时间亲手制造了更多碎片。在碎片中，金阁不再保有威严的、拒绝一切的绝对之美，而只是一堆燃烧、散落，乃至被踩在脚下的物质。这种将美还原为物质的过程，正是废墟诗学的核心所在。

四、“废墟”的诗意与精神的重构

传统意义上的废墟诗意来自时间的自然侵蚀，例如华兹华斯的《丁登寺》，书写了风化的石柱、蔓生的荒草、残存的拱门，召唤的是怀古的幽情与对不朽的叹息。但《金阁寺》提供的是一种全然不同的废墟经验，它是将一件过于完美的艺术品从“永恒”的牢笼中释放出来。巫鸿曾说：“凝视（和思考）着一座废弃的城市或宫殿的残垣断壁，或是面对着历史的消磨所留下的沉默的空无，观者会感到自己直面往昔，既与它丝丝相连，却又无望地和它分离。怀古之前因此必然为历史的残疾及其磨灭所激发，它的性格特征包括内省的目光、时间的断裂，以及消逝和记忆。”^[6]巫鸿所描述的怀古之情，是以“历史的残疾”与“时间的断裂”为前提的，观者与往昔之间隔

着一段不可逾越的消逝，正是这段距离催生了内省的目光与伤感的诗意。

在《金阁寺》中，沟口面对的金阁却不存在这种距离。它并没有以残垣断壁的样貌存在，反而保有自己完整如初的辉煌，它以过于连贯的永恒压垮了观者的时间感。沟口无法“与它丝丝相连”，因为金阁的完美拒绝一切连接；他无法“无望地分离”，因为分离的前提是曾经靠近。他困在一个既不能触及其美、也无法彻底逃离的夹缝里。于是，他选择用火焰制造那个本应存在的断裂，让金阁终于成为一座可以凝视并使之“直面往昔”的废墟。

沟口烧掉金阁之后，并没有陷入虚无。相反，他说出了全书最朴素也最有力的一句话：“我想，我还是要活下去。”^[5]在此之前，沟口一直活在金阁的阴影下，那座金光灿灿的建筑像一面镜子，日夜映照出他的口吃、丑陋，和一切他与世界之间无法弥合的裂痕。金阁越是完美，他的自我就越是破碎，这是一种单向的、压迫性的关系。

精神的重构正是接受破碎本身，以此搭建出新的完整性，而非修复它。沟口没有在废墟上重建一座新金阁，也没有变成一个“积极的、阳光的”人。他的口吃还在，他的孤独还在，他的过去，那些堆积在记忆中的死者，也没有被抹去。火烧金阁改变的不是沟口其人的“内容”，而是他与这些内容的关系。从前，他把口吃当作缺陷、把孤独当作惩罚、把死者当作无法偿还的债务。而在金阁化为废墟之后，他终于可以像柏木吹响尺八一样，从自己的空洞中发出声音。废墟的诗意不在于它曾经是什么，而在于它现在可以容纳什么——风、光、记忆，以及一个不再试图填补空洞的人。

值得注意的是，金阁屋顶上那只金铜凤凰并没有在火中重生。它熔化了，坠落了，再也没有站起来。这不死鸟的“不死”终究只是一个传说。真正活下来的是沟口，一个从未奢望过不朽的、口吃的、平凡的少年。他从山上走下来，身后是浓烟与灰烬，前方是没有金阁遮挡的天空。这天空既不神圣也不美丽，但它属于他。精神的废墟在这一刻形成了，意味着“生命”走出了废墟。而那句“我想活下去”，既不是对过去的告别，也没有对未来的承诺。它只是一个人站在灰烬中间，确认自己还在呼吸。这就够了。

参考文献：

- [1] 夏多布里昂.基督教真谛[M]//夏多布里昂精选集.李焰明选译.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0:351,353.
- [2] 谷光灿,谢凝高.以金阁寺为例看日本学者视野中的遗产真实性[J].中国园林,2012(9):87-90.
- [3] 潘利锋.论《金阁寺》的美学思想[J].理论与创作,2011(3):82-85.
- [4] 西村清和.场所的记忆与废墟[J].外国美学,2016(1):24-38.
- [5] 三岛由纪夫.金阁寺[M].陈德文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21-243.
- [6] 巫鸿.废墟的故事[M].肖铁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19-22.

The Ruin Poetics and Spiritual Reconstruction of The Temple of the Golden Pavilion

Wei Meiru

(Yunnan University, Kunming, China)

Abstract: The creative background of *The Temple of the Golden Pavilion* is rooted in the spiritual desolation and collapse of values in postwar Japanese society. Mishima Yukio, drawing on the real incident in which Hayashi Yoken set fire to the Golden Pavilion, extends the concept of “ruin” from the material level to the spiritual dimens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uin aesthetics, one can examine the dual nature of the Golden Pavilion in the novel, which possesses both materiality and symbolism. Mizoguchi’s burning of the Golden Pavilion is in fact an act of actively creating ruins, while Mishima’s narrative deliberately omits the scene of the great fire, reducing destruction to plainness, thereby highlighting the suspension of freedom at the moment the ruins are generated. In the end, the Golden Pavilion is reduced to ashes, and Mizoguchi speaks the words “I want to live,” achieving the ultimate beauty of ruins and spiritual reconstruction.

Keywords: The Temple of the Golden Pavilion; Mishima Yukio; Ruin Aesthetics; Spiritual Reconstruction

试论进步主义运动对美国水电开发的影响

金昱昊

(山东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 山东 济南 250358)

摘 要: 进步主义时代是美国承上启下的时代, 因此对 20 世纪后的美国发展产生了长久而深远的影响。进步时代所产生的资源保护主义思想对美国环保运动发展产生了重要作用, 而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为了合理开发水电而成立的联邦电力委员会也同样发挥着很重要的作用。在进步主义时期, 联邦电力委员会由于不是专门机构而且人员多为别处借调, 很难履行职责; 在 20 世纪 30 年代之后, 联邦电力委员会成为了独立的机构并且职权范围也得到了扩大, 但由于受资源保护主义思想指导以及为应对电力短缺问题, 联邦电力委员会往往采取了唯电力利益至上的水电开发原则, 而忽视或轻视其他非电力价值; 但随着现代环保运动的兴起,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后, 联邦电力委员会逐渐转向了兼顾多种用途开发。1977 年联邦电力委员会转变为联邦能源管理委员会对当今美国电力开发中仍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 进步主义运动对美国水电开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 进步主义运动; 资源保护主义; 联邦电力委员会

DOI: doi.org/10.70693/202607025887

一、引言

进步时代是美国历史上重要的转型和发展时期, 标志着美国逐步进入现代社会。“美国由农业时代进入工业时代, 由传统社会进入现代社会, 由早期资本主义发展到现代资本主义……可以把进步主义时代视为一个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时期”^{[1]P300} 因此, 进步主义运动的影响并非仅仅局限于运动进行和发展时期, 而是对 20 世纪之后的美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国内对于进步主义运动的评价多是从进步主义时期进行分析, 并未从长时段视角分析进步主义运动的长远影响; 而且对于进步主义运动对于美国环保运动的作用也涉及较少^[2-4], 本文试图以长时段视角从进步主义运动对 20 世纪后的美国水电开发的影响角度论述进步主义运动在美国环保运动中的重要作用和深远影响。从资源开发和利用的角度来看, 进步主义时代设立的管理水电开发的联邦机构——联邦电力委员会(Federal Power Commission)一直沿用至今, 且这一时代的资源保护主义也对美国人的思想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因此, 进步运动在这个角度来说极为成功的。

二、进步主义时代: 资源保护主义与联邦电力委员会设立

进步主义这一观念虽然是在美国 20 世纪初的进步时代被提出并作为这一时期的指导思想, 但观念的生成往往早于观念的提出。这种观念实际上源于从北美殖民地到美国发展过程中不断膨胀的乐观主义, 即从五月花号进入北美开始, 殖民者们通过自己的努力生存下来并不断发展壮大, 到美国独立并成功赢得独立战争的胜利, 再到后续发展中西进运动以及工业革命取得的巨大成就, 似乎没有什么困难是美国人克服不了的, 这就带给了美国人一种独特的乐观主义精神。在国家层面, 这种乐观主义精神就表现为一种“美国例外论”, 美国可以避开其他国家所面临的困境和问题, “将如山巅之城, 为万众瞻仰”; 在个人层面, 这种乐观主义就表现为一种通过个人努力就能取得事业成功的信心; 在资源开发和利用中就表现为人定胜天, 随意征服和改造自然。美国自然资源丰富, 使美国人有了资源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错觉。

因此, 在 20 世纪初前后, 在这种乐观主义的驱使下, 美国人便认为自然资源可以随意开采和利用, 加之资

本家肆意开采,政府又不加以控制,很多资源都被浪费^{[1]P158}。主要表现为对于土地资源的不加节制进行侵占、对森林资源的过度砍伐以及对燃料煤、石油和天然气等资源的不合理开采以及低效率利用。大量土地资源“落入了大个人或大企业的手中,而这些人的目标永远是牟利……大土地所有者紧紧抓住他的土地不放,直到环境实际上使他无法再持有土地为止”^{[5]P7};当时林木资源年增长量仅为年消耗量的三分之一;煤炭采掘率不到一半,而剩下一多半不易开采或质量较差的煤则因废弃矿井塌陷而导致永远无法开采,而开采出来的煤能源利用率也仅为5%,已然废弃的油气田中虽然仍存在大量油气资源,但人们放任天然气自然挥发以及石油流入水中,甚至大量燃烧石油使其易于排出^{[5]P4-5},种种资源浪费现象不胜枚举。

在进步主义时期会产生早期的环保思想,就是为了解决盲目乐观导致的资源浪费问题。在这个时期中,对于环境问题以及能源开发问题,进步主义者的主要代表有两种观点:一种是以吉福特·平肖为代表的“资源保护主义”(Conservation),另一种是约翰·缪尔为代表的“自然保护主义”(Preservation)。吉福特·平肖《为保护自然资源而战》一书中揭露了自然资源开发和利用中的资源浪费行为,认为“保护意味着在最长的时间内为最大多数人谋取最大的利益”^{[5]P21},对于自然资源只要不是无节制开发,并且开发的资源是为了公众利益而非私人利益就是合理开发,就可以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兼顾资源保护。而约翰·缪尔在其著作《我们的国家公园》中详细描述多个国家公园的壮丽景色,倡导将自然景色进行保留,并通过完全不对该地区进行任何人为开发和利用来进行保护,“到自然中寻求安全”^[6]。

这两种思想由于都注意到了发展中需要对环境或资源进行保护,因此共同努力,形成一股合力,推动了进步时代的环境保护。但是这两种思想本身就有本质的区别,最终在“赫奇赫奇山谷争论”中分裂并由“资源保护主义”占据了主导地位^[7]。这种资源保护主义一直在环境保护和资源开发中起主导作用,直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现代环保运动兴起才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其主导地位。受资源保护主义影响,在西奥多·罗斯福担任总统时期就注重水力资源的开发,1902年的《垦殖法》(The Reclamation Act)中就允许联邦政府用出售西部公共土地所得的一部分来修建水坝、水库和其他开发工程,罗斯福大坝就是《垦殖法》下的五个主要项目之一,虽然主要目的是为了解决灌溉问题,但同时利用水力进行发电^[8]。第一次世界大战能源短缺刺激下,伍德罗·威尔逊任总统期间,1920年6月10日通过的《联邦水电法》设立了联邦电力委员会,并赋予其对美国可航水域及联邦公共土地、保留地上的水电开发项目发放许可证的权力^[9],也就是说对开发水电项目进行监督管理以及对河流的水力资源进行合理开发。自此,联邦电力委员会对美国水电开发进行管理和监督。但这一时期的联邦电力委员会发挥作用明显不足,主要原因是委员会中的工作人员都由其他部门借调而来,在履行职责方面缺乏专业性和责任感,在联邦电力委员会的第一次年度报告中就指出了该问题,“我们亟需一个由训练有素、经验丰富的人员组成的小组……建议立即采取措施修订该法案,至少在必要的程度上允许委员会聘用自己的人员”^[10],这就导致了委员会发挥职能受限,委员会就连第一个年度的10万美元的财政拨款都未使用完。因此,联邦电力委员会在进步主义时期可以说是并没有发挥多大的作用。

虽然进步主义时期在20世纪20年代结束,但终究唤醒了人们注重资源保护和关注自然环境的意识。资源保护主义观念下形成的联邦机构联邦水电委员会这一联邦机构被保留了下来并在后续得到发展,并且资源保护主义思想一直贯穿于美国环保运动发展进程中。正如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在演讲《与人民的进步契约》中所说:“我们的事业建立在永恒的正义原则之上;即使我们这些现在的领导者暂时失败,最终事业本身也必将胜利”。

三、20世纪30年代到60年代中期:资源保护主义影响下的单一用途开发与对其他用途的兼顾

1930年的《重组联邦电力委员会法》改善了联邦电力委员会的处境,将原先由三位内阁部长兼任的联邦电力委员会改组为由总统任命的五人委员会,并赋予其自行任用工作人员的权力^[11],拥有了更大的职权以履行职责。1935年《公用事业法》第二编修订了《联邦水力法》,并将修订后的法律命名为《联邦电力法》;该法明确赋予联邦电力委员会对州际输电和州际批发售电费率,以及相关会计与记录制度的管辖权^[12]。20世纪30年代随着“实用共识”逐渐遍及整个美国,建立起了受州政府监管的垄断电力公用事业公司对各自所在地区进行电力供应^[13]。电力公司为了获得规模效益,采取了大规模扩建发电厂以降低电价来换取消费者电力需求的增长,电价本就是逐渐降低的,甚至达不到州监管机构所定的最高电价,因此联邦电力委员会想要监管电价便更为困难,而且虽

然联邦电力委员会在《规定》中对全国电力公用事业公司都有管辖权，但《联邦电力法》“有意保留了州的大部分传统管辖权”^[14]。因此联邦电力委员会对于各州电力公用事业公司的监管权就主要集中在监管公司水电开发方面并决定是否发放水利工程的建设许可。

虽然联邦电力法中有兼顾河流其他价值的考量，但联邦电力委员会以及整个美国都受资源保护主义影响，而水电开发又是为了满足公众电力需求，因此就存在单一用途开发的趋势即唯电力利益至上的原则，而忽视其他河流其他方面的价值，如鱼类、风景等非电力需求。尤其是在二战后民众总消费也在持续增长。“从1950年的1910.09亿美元，增长到1960年的3252.41亿美元”^[15]。总消费的持续稳定增长又会进一步刺激经济发展。人民平均消费也在持续增长，“每人每年平均实际消费，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的1350美元，上升到1962年的1824美元，增长35%。到1956年，81%的美国家庭有了电视机，96%的家庭有了电冰箱，67%的家庭有真空吸尘器，89%的家庭有洗衣机”^[16]。这种高消费的模式，不仅居民电器使用增多，加速了电力的消耗；消费刺激的工业生产发展同样加剧了电力紧张的状况。电力需求不断上升的情况下，联邦电力委员会唯电力利益至上的开发趋势愈发明显。

这种趋势在20世纪50年代的水电开发中表现的极为明显。在电力需求与非电力需求对比中，联邦电力委员会都会倾向于对电力需求的支持，因此在这一时期联邦电力委员会对于水力发电厂都是进行许可。塔科马案(The Tacoma Case)则是较为典型的案例，根据《联邦电力法》，塔科马市(The City of Tacoma)有权建造和运营发电厂，因此申请了在通航水域建造和运营水电项目的许可证。1951年联邦电力委员会授权塔科马市在华盛顿州的考利茨河上修建两座高坝，但该申请遭到该州的反对，理由之一是拟建水坝将形成的水库将淹没该州拥有的一个鱼苗孵化场。但委员会仍然颁发了水坝的开发许可证，协调措施是安装计划包括花费900多万美元来减少考利茨河产卵期鱼类的损失，但该计划仍然违反了华盛顿州旨在为鱼类产卵提供而全面保护限制该河上水坝高度为25英尺的法规^[17-18]。经过长期诉讼，尽管民众倡议重申了25英尺的高度限制，华盛顿州最高法院最终仍然在深思熟虑后批准了塔科马的申请，做出确认大坝债券有效性的宣告性判决^[19]。从这个案件中，我们可以看到，联邦电力委员会对于水电站建设的许可的优先级很高，可以违反州法规规定，虽然联邦电力委员会在开发电力的考量优先于其他非电力需求，但也不是完全不顾及其他需求，可以通过许可条件对开发公司加以限制，此案中的减少产卵期鱼类损失的措施便兼顾了生态利益。

波特兰通用电气公司(the Portland General Electric Company)对鱼类问题持类似态度，联邦电力委员会向波特兰通用电气公司颁发许可证，允许其在俄勒冈州德舒特河(the Deschutes River)上修建一座带有发电设施的水坝。尽管俄勒冈州德舒特河上的水坝会对鲑鱼和硬头鳟造成伤害。委员会的理由是，每年电力收益超出电力成本的金额估计为3.51万美元，而使用水坝上游德舒特河的鱼类每年的价值为1.77万美元。最高法院维持了联邦电力委员会的裁决，认为该委员会有权做出适当决定，并指出许可方将实施令人印象深刻的补救性保护计划^[20]。这个案例就充分表现了联邦电力委员在衡量电力价值与其他价值的大小以做出判断，渔业价值远远小于电力价值时，联邦电力委员会会偏向于发电，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在电力价值远远大于其他价值时，仍然采取了补救保护计划。

联邦电力委员会出于娱乐价值而拒绝水电开发工程的案例并非没有，在纳梅卡贡河水电公司(Namekagon Hydro Company)一案中，委员会拒绝为威斯康星州仅存的几处自由流动的水道之一——梅卡贡河下游的水电站颁发许可证。委员会在此案中拒绝接受基于价值比较的分析，因为特殊娱乐活动的机会“不能用金钱来充分评估”^[21]。第七巡回法院确认，为了保护该河流的“独特娱乐价值”，拒绝纳梅卡贡河项目是必要的。法院强调纳梅卡贡河未经开发，自然风光优美，可以安全地划独木舟和钓鲈鱼，因此需要牺牲相对较小的水力发电项目^[22]。与塔科马和波特兰案例中批准的庞大项目相比，拟议的设施只有1500千瓦的发电能力。因此，纳梅卡贡案的裁决并不意味着娱乐价值优先于大型发电效益。对于较小规模水电厂，联邦电力委员会并不会将其电力开发效益放到首位。

太平洋西北电力公司(Pacific Northwest Power Company)面临一个更棘手的决定，联邦电力委员会被迫在华盛顿州蛇河的两个水电厂选址之间做出选择，分别是位于蛇河和鲑鱼河交汇处的尼兹珀斯(Nez Perce)厂址和位于鲑鱼河口上游的高山羊(High Mountain Sheep)厂址。尽管联邦电力委员会发现尼兹珀斯发电厂发电和蓄洪能力更强，运营成本更低，但联邦电力委员会还是批准了高山羊的提案，因为后者具有“决定性的优势”，即避免干

抗鲑鱼逆流而上。对于这一决定与塔科马市的做法不一致的说法,委员会虽然出于电力开发考量批准了一些项目开发,但这并不意味着渔业资源必须屈从于电力考量。在特定情况下根据两种诉求的相对重要性,权衡利弊才是决定性的。委员会认为与高山羊设施相比,内兹珀斯站点的电力优势在经济上微不足道^[23]。这项裁决以及公用事业区的裁决表明,在不损失大量电力利益的情况下,委员会越来越愿意保护鱼类资源。

因此,虽然联邦电力委员会为应对电力需求增长而在水电开发中趋向于以电力开发为主,但在发展过程中,实际上联邦电力委员会同时也注意到了对其他非电力因素的保护,而在这个过程中,美国人也逐渐质疑起了原本占据主导地位的资源保护主义并推动环保思想向现代环保主义发展。

四、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后:现代环保主义推动生态价值的彰显

20 世纪 60 年代,现代环保思想逐渐兴起,联邦电力委员会注重电力开发的行为遭到了希望保护生态民众的指责。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的“风暴王山争论”被认为在现代环保运动中具有里程碑意义^[24],该事件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才得到了解决,可以说是贯穿于美国现代环保运动始终,体现了现代环保主义兴起对联邦电力委员会决策的影响。20 世纪 60 年代,美国纽约的联合爱迪生公司(Consolidated Edison Company of New York)主要出于经济因素的考量,决定在康沃尔附近的风暴王(Storm King Mountain)开发一座水力发电站,哈德逊风景保护协会(Scenic Hudson Preservation Conference)认为该工程会破坏风暴王山的自然景观,反对项目开发。导致联合爱迪生公司与以哈德逊风景保护协会为代表的环保组织进行了近 20 年的争论。风暴王山争论以 20 世纪 80 年代初联合爱迪生公司与环保组织签订协议而告终,康沃尔项目最终未被建成。在该事件初期,联邦电力委员会出于电力开发的需求,批准了纽约联合爱迪生公司在具有极大风景价值的风暴王山开发水电站的建设许可,就遭到了以哈德逊风景保护协会为代表的民间环保团体的阻挠和上诉。该水电站未能成功建设不仅反映了美国环保思想由保护主义逐渐转向现代环保主义,也说明联邦电力委员会以往为电力利益至上的开发趋向的终结。

在此之后,联邦电力委员会便不断在电力开发与生态保护之间努力进行权衡,1977 年《能源部组织法》的颁布,联邦能源管理委员会正式成立。根据该法,联邦能源管理委员会是“能源部内的一个独立监管委员会”,联邦电力委员会的大部分职责都下放给了新成立的联邦能源管理委员会^[25],换句话说,联邦电力委员会并没有消失,而是转变为了联邦能源管理委员会并于今天仍在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五、结语

进步主义时期产生了资源保护主义这一思想并为开发水电设立了联邦电力委员会这一机构。联邦电力委员会在成立后以资源保护主义为指导,监督指导开发了美国 20 世纪 60 年代前的水电开发,为保障美国能源安全发挥了重要作用。虽然在发展过程中忽视了他非电力价值,但随着现代环保运动兴起,联邦电力委员会也受这种思想的影响,努力平衡能源开发与生态保护,其转变后的联邦资源管理委员会在今天仍然对美国电力发挥极大作用,而这一转变进程由发现问题并努力解决问题本身也是进步主义的体现。因此,从资源开发和利用的角度来看,进步主义时代设立的管理水电开发的联邦机构——联邦电力委员会一直沿用至今,且这一时代的资源保护主义也对美国人的思想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因此,进步运动在这个角度来说是极为成功的。

参考文献:

- [1] 李剑鸣. 大转折的年代——美国进步主义运动研究[M]. 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1992.
- [2] 高芳英. 美国经济结构的变动与进步运动[J]. 世界历史,1999,(4):112-116.
- [3] 王春来. 转型、困惑与出路——美国“进步主义运动”略论[J].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3,(9):71-78+86-124.
- [4] 冯伟年. 论美国进步运动的历史背景及其社会影响[J]. 西北大学学报(哲社版),2001,(5):131-136.
- [5] Pinchot, Gifford. The fight for conservation[M]. CreateSpace Independent Publishing Platform,2010.
- [6] 约翰·缪尔. 我们的国家公园[M].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1-25.
- [7] 胡群英. 资源保护和自然保护的首度交锋——20 世纪初美国赫奇赫奇争论及其影响[J]. 世界历史,2006,(3):12-20+159.
- [8] U.S. Congress. Act of June 17, 1902[S]. United States Statutes at Large,1902,32:388.
- [9] U.S. Congress. Federal Water Power Act: Act of June 10, 1920[S]. United States Statutes at Large,1920,41:1063,1065,1075.

- [10] POLAND S L, et al. A Salute: 75 Years for the FPC and FERC[J].Energy Law Journal,1995,16(2):294-295.
- [11] U.S. Congress. An Act to Reorganize the Federal Power Commission[S].United States Statutes at Large,1930,46:797-798.
- [12] U.S. Congress. Public Utility Act of 1935[S].United States Statutes at Large,1935,49:847-855,863.
- [13] HIRSH R F. Power Loss: The Origins of Deregulation and Restructuring in the American Electric Utility System[M].Cambridge, MA: MIT Press,1999.
- [14] FREEMAN J. The Uncomfortable Convergence of Energy and Environmental Law[J]. Harvard Environmental Law Review,2017,41:350.
- [15] ALEXANDER C C. Holding the Line: The Eisenhower Era, 1952-1961[M].Lond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75:103.
- [16] 刘绪怡, 韩铁, 李存训. 美国通史:第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136.
- [17] State of Washington Department of Game v. Federal Power Commission[S].Federal Reporter,1953,207(2):391,395-396.
- [18] City of Tacoma v. Taxpayers of Tacoma[S].Washington Reports,1953,43(2):468,482-489.
- [19] Portland General Electric Co.[S].Federal Power Commission Reports,1951,10:445.
- [20] Federal Power Commission v. Oregon[S].United States Reports,1955,349:435.
- [21] In re Namekagon Hydro Co.[S].Federal Power Commission Reports,1953,12:203,206.
- [22] Namekagon Hydro Co. v. Federal Power Commission[S].Federal Reporter, Second Series,1954,216:509,511-513.
- [23] Pacific Northwest Power Co.[S].Federal Power Commission Reports,1964,31:247,259-262,272-273.
- [24] LIFSET R D. Power on the Hudson: Storm King Mountain and the Emergence of Modern American Environmentalism[M].Pittsburgh: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2014.
- [25] U.S. Congress. Department of Energy Organization Act[S].United States Statutes at Large,1977,91:565,582-583.

An Analysis of the Impact of the Progressive Movement on U.S. Hydropower

Development

Jin Yuhao

(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 Shandong Normal University, Jinan , China)

Abstract: The Progressive Era was a pivotal period of transition in American history, exerting a long-standing and profound influence on the country's development throughout the 20th century and beyond. The ideology of conservationism emerging from this era played a crucial role in the evolution of the American environmental movement.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is ideology, the Federal Power Commission (FPC) was established to ensure the rational development of hydropower, occupying a significant position in federal administration. During the Progressive Era, the FPC struggled to fulfill its mandates as it was not yet an independent specialized agency and relied heavily on personnel seconded from other departments. After the 1930s, the FPC was reorganized into an independent regulatory body with expanded jurisdiction. However, driven by conservationist tenets and the need to address power shortages, the Commission often adopted a "power-supremacy" principle in hydropower development, prioritizing electricity generation while marginalizing or neglecting non-power values. With the rise of the modern environmental movement in the mid-1960s, the FPC gradually shifted toward a "multi-purpose" development approach. In 1977, the FPC was succeeded by the Federal Energy Regulatory Commission (FERC), which continues to play a vital role in contemporary U.S. energy development. In conclusion, the Progressive Movement has left a deep and enduring imprint on the trajectory of hydropower develop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Keywords: Progressive Movement; Conservationism; Federal Power Commission

产业补贴绩效评价机制的国际可解释性： 规则压力、证据链构建与治理路径

黎银霞

(广州商学院, 广东 广州 511363)

摘要：全球产业政策竞争加剧背景下，产业补贴、财政贴息、税收优惠、低成本融资、政府采购和土地电力优惠等政策工具被广泛用于支持战略产业、科技创新和产业链安全。与此同时，国际补贴审查逐渐从补贴存在性判断，转向补贴对象、企业级数据、市场份额变化和竞争影响评估。我国地方产业补贴在推动产业链补短板、培育新质生产力和促进区域招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仍存在口径分散、绩效证据不足、穿透核验较弱和退出问责不清等问题。文章结合产业政策有效性、产业政策与竞争、技术溢出、补贴规则和预算绩效管理研究，提出产业补贴绩效评价应突出国际可解释性、过程可核验性和结果可审计性，并从全口径台账、五段式披露、五流合一核验、第三方审计和透明度报告等方面完善治理路径。

关键词：产业补贴；绩效评价；国际可解释；补贴透明度；预算绩效管理

DOI: doi.org/10.70693/202607171377

一、引言

产业补贴是政府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科技创新和产业链安全的重要政策工具。近年来，主要经济体围绕半导体、新能源、人工智能、绿色制造和先进装备等领域持续加大产业政策力度，产业补贴的争议焦点已不再局限于补贴工具本身，而是进一步转向补贴目标是否清晰、绩效是否真实、是否造成市场扭曲，以及能否被国内外监管主体核验和解释。

从国际规则看，补贴审查正在由传统贸易救济扩展至公共采购、并购审查和市场准入场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工业补贴数据库以企业级数据追踪政府补贴、税收优惠和低于市场价格融资，并关注补贴对企业市场份额和竞争格局的影响。世界贸易组织（WTO）《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定》要求成员通报补贴形式、金额、政策目标、期限和贸易影响。欧盟《外国补贴条例》则将第三国财政性资助对欧盟内部市场竞争的潜在扭曲纳入审查，覆盖并购、公共采购和依职权调查等场景。

从国内治理看，地方产业补贴在招商引资、产业培育和链条补强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但部分地区仍偏重资金申报、资金拨付和项目落地，对企业研发投入、技术转化、订单增长、纳税就业、产能利用和产业链带动等真实绩效核验不足。产业补贴绩效评价因而已不只是财政管理问题，也关系到产业政策质量、国际规则表达和企业海外经营中的合规成本。

产业政策有效性研究表明，政府补贴并非天然有效，其效果取决于政策目标、实施对象、竞争环境和退出机制。Crisuolo et al. (2019) 基于英国区域性投资补贴研究发现，补贴能够促进就业和投资，但效果主要集中于小企业，对大企业的增量作用有限。这说明产业补贴评价不能只看资金拨付和项目落地，还应识别是否产生真实增量绩效。Juhász (2018) 以拿破仑大陆封锁为自然实验，发现临时保护能够促进部分地区技术采用，但长期效果具有条件性，提示产业政策必须关注政策期限、适用条件和退出安排。

产业政策与竞争研究进一步指出，有效产业政策应与竞争机制相容。Aghion et al. (2015) 发现，配置到竞争性行业或能够促进竞争的产业政策更可能提升生产率；如果补贴长期固化于少数企业，则可能削弱竞争并诱发资源错配。Bloom et al. (2013) 关于技术溢出与产品市场竞争的研究也表明，创新活动既具有知识溢出效应，也会带来产品市场竞争效应。因此，产业补贴绩效评价不能只考察受助企业个体产出，还应关注技术外溢、市场竞争和产业链带动。

绿色产业政策研究进一步强调，补贴治理的关键不在于完全避免政策选择错误，而在于建立目标约束、持续监测和退出机制。Rodrik (2014) 指出，绿色产业政策具有应对环境外部性和技术外部性的合理性，但必须

作者简介：黎银霞(1987—)，女，博士，研究方向为人工智能、产业经济。

通过清晰目标、过程监督和政策调整来降低寻租与低效保护风险。Schmitz et al. (2015) 则强调, 产业政策中的租金并非必然无效, 关键在于能否对租金进行管理, 使其服务于创新、转型和公共目标, 而不是固化为寻租收益。

补贴规则研究表明, 产业补贴已从国内财政工具转化为国际竞争和规则审查对象。世界贸易组织补贴规则以财政性资助、利益、专向性和贸易影响为核心识别逻辑; 欧盟《外国补贴条例》进一步将非欧盟补贴对内部市场竞争的影响纳入审查。与此同时, 我国全面预算绩效管理制度已要求改变重投入轻管理、重支出轻绩效的问题, 建立全方位、全过程、全覆盖的绩效管理体系。

总体看, 既有研究仍存在三方面不足。第一, 产业政策研究较多讨论补贴是否有效, 对补贴绩效如何形成可解释、可核验、可审计的证据链讨论不足。第二, 国际贸易规则研究较多关注补贴认定和争端解决, 对地方产业补贴如何开展企业级数据披露和穿透核验关注不足。第三, 预算绩效研究较多关注资金使用效率, 对产业补贴在国际规则语境中的解释语言和透明度报告机制讨论不够。

二、现实压力与核心问题

第一, 国际补贴审查正在从补贴存在性判断转向竞争影响评估。欧盟《外国补贴条例》的适用表明, 外国补贴审查已不再局限于货物贸易中的反补贴调查, 而是进入公共采购、并购和依职权调查等场景。相关案例显示, 产业补贴透明度不足可能直接转化为中国企业海外投标、并购和市场准入中的合规成本与退出风险。

第二, 国内绩效管理正在从资金合规转向结果问效。产业补贴与一般公共项目不同, 其目标不是完成财政支出, 而是推动产业能力提升。因此, 绩效评价不能停留在预算执行率、项目进度和企业落地, 而应进一步回答财政资金是否撬动社会资本、企业是否形成技术能力、产品是否进入真实订单、产能是否有效利用、税收和就业是否增长、低效项目是否按期退出。

第三, 政策工具分散导致绩效证据链断裂。产业补贴不仅包括财政奖补, 还可能表现为贴息贷款、税费优惠、政府采购、土地优惠、电力优惠、低成本融资和政策性资金安排等。由于政策工具分散在多个部门, 同一家企业可能同时获得多类支持, 若缺乏统一台账和项目识别机制, 容易出现重复支持、交叉补贴、绩效重复计算和责任边界不清。当前评价仍较多依赖企业自报和部门汇总, 缺少资金流、票据流、物流、用电流、税社流相互印证的硬证据链。

三、分析框架: 国际可解释、可核验、可审计

产业补贴绩效评价的核心, 不只是证明财政资金已经拨付, 而是证明补贴是否产生可识别的增量绩效, 并且是否避免低效保护和竞争扭曲。一个具有国际可解释性的评价机制, 应同时回应规则表达、过程核验和结果问责三个层面的要求。

国际可解释性要求产业补贴不再停留于支持发展、培育产业、壮大集群等概括性表述, 而要能够说明政策目标、支持对象、工具类型、财政成本、支持期限、绩效指标、退出条件和竞争影响。其重点不是公开企业商业秘密, 而是用国内外监管主体能够理解的规则语言说明补贴的政策目的、支持边界、财政成本、绩效结果和退出安排。

过程可核验性要求绩效评价从企业自报、部门汇总和材料审核, 转向多源数据交叉验证。资金流用于核验财政支付、银行流水和资金最终用途; 票据流用于核验增值税发票、设备采购合同和付款凭证; 物流流用于核验仓储、货权流转和报关信息; 用电流用于核验设备负荷和产线开工情况; 税社流用于核验纳税、社保、就业和工资支付。五类数据相互印证, 能够降低虚假申报、资金回流、关联交易套利和重复补贴风险。

结果可审计性要求产业补贴形成从立项、拨付、实施、产出、结果到退出的闭环。补贴不是一次性财政安排, 而是有目标、有期限、有绩效、有退出的政策契约。对于未达到绩效目标、长期依赖补贴、产能利用率低、资金使用不规范或存在虚假申报的项目, 应建立暂停拨款、核减资金、追回资金、纳入限制名单和责任追究等机制。

四、治理路径

第一, 建立全口径产业补贴台账。应覆盖财政补贴、贷款贴息、税收优惠、政府采购、土地优惠、电力优惠、设备更新补贴、低成本融资和政策性资金安排。每个项目设置唯一识别码, 关联企业统一社会信用代码、项目备案号、财政预算项目编号、税务信息和银行账户信息, 形成政策工具、支持对象、支持金额、支持期限、政策目标、绩效指标和退出条件相互对应的基础数据底座。

第二, 建立白名单与负面清单。白名单重点支持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产业链断点堵点补强、公共技术平台和共性技术服务、绿色低碳转型、市场资本供给不足但具有战略价值的早期硬科技项目。负面清单应限制无真实订单、无核心技术、无稳定现金流、低水平重复建设、产能明显过剩、概念包装融资、重复享受补贴且未披露, 以及存在虚开发票、资金回流和骗补风险的项目。

第三, 建立五段式绩效披露表。投入端披露财政补贴、贴息、税收优惠等支持规模; 过程端披露资金拨付、

设备到位和研发投入；产出端披露专利、技术转化、新产品、订单和产能利用率；结果端披露营收、纳税、就业、出口、社会资本撬动倍数；退出端披露补贴到期、低效项目清退和违规资金追回。通过分阶段披露，可以把补贴绩效从单一支出结果扩展为完整政策过程。

第四，建立五流合一核验机制。财政、税务、金融监管、市场监管、电网、交通运输、海关和审计等部门应协同核验资金流、票据流、物流、用电流和税社流。对财政支持金额较大、高补贴高关注行业以及出现异常信号的项目，实行强制核验和专项审计，提高绩效评价的真实性和可追溯性。

第五，建立第三方审计和分层披露制度。第三方评价应重点核查财政资金撬动社会资本倍数、研发投入强度、专利转化率、产能利用率、单位补贴带动税收和就业、订单真实性、节能降碳效果和退出执行情况。披露可分为社会公开、部门共享、审计监管和国际说明四个层级，在保护商业秘密的同时增强政策可信度。

第六，发布地方产业补贴绩效透明度报告。可选择产业基础强、外向型程度高、财政管理能力较好的地区先行试点，每年披露补贴总规模、工具结构、行业分布、支持期限、研发投入、专利转化、订单增长、纳税就业、产能利用率、低效补贴退出和竞争中约束执行情况，逐步形成能够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企业级补贴追踪、世界贸易组织补贴通报和欧盟外国补贴审查逻辑对话的绩效表达体系。

五、结论

产业补贴绩效评价改革的重点，在于提升产业政策质量和财政资金使用效率，而非简单压缩产业政策空间。全球产业政策竞争加剧和国际补贴审查趋严，要求我国地方产业补贴由拨付合规审查进一步延伸到绩效生成、风险核验和退出问责。本文提出的产业补贴绩效评价框架，强调以全口径台账为基础，以清单管理为边界，以五段式披露为结构，以五流合一为核验手段，以第三方审计和退出问责为约束，以透明度报告为国际解释载体。通过这一机制，可以推动地方产业政策从优惠竞争转向制度竞争、生态竞争和产业链竞争，既提升财政资金使用效率，也增强我国产业政策的国际公信力。

参考文献：

- [1] Aghion, P., Cai, J., Dewatripont, M., Du, L., Harrison, A., Legros, P. Industrial policy and competition[J]. 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Macroeconomics, 2015, 7(4): 1-32.
- [2] Bloom, N., Schankerman, M., Van Reenen, J. Identifying technology spillovers and product market rivalry[J]. Econometrica, 2013, 81(4): 1347-1393.
- [3] Criscuolo, C., Martin, R., Overman, H. G., Van Reenen, J. Some causal effects of an industrial policy[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19, 109(1): 48-85.
- [4] Juhász, R. Temporary protection and technology adoption: Evidence from the Napoleonic Blockade[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18, 108(11): 3339-3376.
- [5] Rodrik, D. Green industrial policy[J]. Oxford Review of Economic Policy, 2014, 30(3): 469-491.
- [6] Schmitz, H., Johnson, O., Altenburg, T. Rent management: The heart of green industrial policy[J]. New Political Economy, 2015, 20(6): 812-831.
- [7] OECD. OECD MAGIC Database of Industrial Subsidies[R/DB]. Paris: OECD, 2026.
- [8]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Agreement on Subsidies and Countervailing Measures[EB/OL]. 1994.
- [9] European Union. Regulation (EU) 2022/2560 on foreign subsidies distorting the internal market[EB/OL]. 2022.
- [10] European Commission. Foreign Subsidies Regulation[EB/OL]. Brussels: European Commission.

International Interpretability of Industrial Subsidy Performance Evaluation: Rule Pressure, Evidence Chain Construction and Governance Pathways

Yinxia L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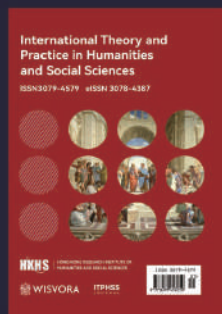
(Guangzhou College of Commerce, Guangzhou, Guangdong, China)

Abstract: Against the background of intensified global industrial policy competition, industrial subsidies, interest subsidies, tax incentives, low-cost financing and government procurement have become important tools for supporting strategic industries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Meanwhile, international subsidy scrutiny is shifting from the existence of subsidies to firm-level data, market share changes and competitive effects. China's local industrial subsidies have supported industrial upgrading, but still face fragmented policy tools, insufficient performance evidence, weak penetrating verification and unclear exit accountability. This paper argues that industrial subsidy performance evaluation should strengthen international interpretability, process verifiability and result auditability, and proposes governance measures such as full-scope subsidy ledgers, staged performance disclosure, five-flow cross-verification, third-party auditing and transparency reports.

Keywords: industrial subsidy; performance evaluation; international interpretability; subsidy transparency; budget performance management

WISVORA 出版社：專注於學術出版管理，WISVORA 出版社提供期刊編輯、論文出版和國際索引、期刊創辦、期刊託管等服務，增強學術研究的全球傳播和影響力。

www.wisvora.com



人文與社會科學學刊

《人文與社會科學學刊》是由香港 WISVORA PUBLISHING 出版、面向全球發行的國際中文學術期刊。本刊聚焦人文社科領域的理論創新與實踐應用，深耕學科核心議題與前沿研究，倡導跨學科、跨文化的多元研究視角，打通學術研究與社會實踐的溝通壁壘，推動學術知識的傳播、共享與轉化，助力全球華語學術界交流與發展。

國際標準連續出版物號

印刷出版 ISSN 3079-4579

電子出版 ISSN 3078-4387

ISSN 3079-4552



9 773079 455255



權責聲明

本期刊所刊載的評論、意見、觀點等均出自文章作者個人立場，不代表本期刊的觀點或看法。對於文章任何部分及文內引用材料給任何個人、機構、及其財產所帶來的任何損失及傷害，本出版社均不承擔任何責任。我們鄭重聲明，本出版社的出版業務，不構成對任何產品商業性能的保證，也不表示本社業已承認本社出版物中所述內容適用於某特定用途。如有疑問，請尋找專業人士協助。